



## 苏联兴亡史论

主编 陈永发 著 李静杰

СССР

人民出版社



---

**СССР**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苏联兴亡史论

---

主编 陆南泉 姜长斌 徐 葵 李静杰

人 民 出 版 社

## 作者分工

(以各章先后为序)

陆南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导，撰写前言、第二十、二十一章；

陆南泉、姜长斌：合作撰写导论；

姜长斌、郭建平：前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后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教授，合作撰写第一—六章；

王坚红：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教授，撰写第七—十章；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撰写第十一—十三章；

蒲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撰写第十四章；

陈新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博士，撰写第十五章；

李静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撰写第十六章、结束语；

吴仁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撰写第十七章；



胡延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博士，撰写第十八章；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经济室主任、研究员、博士，撰写第十九章；

潘德礼：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撰写第二十二—三十章。

全书由主编负责搭设框架并修改定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邢广程博士参加了本书框架设计的讨论，并对第三编的有关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特此表示谢意。

#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1)

## 第一编 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

<b>第一章 18 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及俄国的“封建帝国主义”</b> .....	(54)
第一节 彼得一世改革使俄国“封建帝国主义”进入鼎盛阶段 .....	(54)
第二节 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开明专制”到复旧 .....	(61)
<b>第二章 19 世纪：俄国农奴制开始瓦解与社会转型的起步</b> .....	(71)
第一节 19 世纪前半期：社会转型前夕的俄国 .....	(71)
第二节 1861 年的“农民改革”，社会转型的畸形时期 .....	(79)
<b>第三章 20 世纪初，没有完成的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b> .....	(88)
第一节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 .....	(89)
第二节 1917 年二月革命 .....	(99)
<b>第四章 俄国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和政党运动</b> .....	(111)
第一节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基本国情 .....	(111)

第二节	俄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先导:拉吉舍夫、卡拉姆津等人 .....	(112)
第三节	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从契切林到合法马克思主义 .....	(116)
第四节	民粹主义的深远影响:从革命民粹主义到左派社会革命党 .....	(119)
第五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孟什维克派 .....	(121)
<b>第五章</b>	<b>布尔什维克的崛起与十月革命 .....</b>	<b>(123)</b>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列宁 .....	(123)
第二节	俄国国情与列宁的早期学说 .....	(125)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分野的再回顾 .....	(128)
<b>第六章</b>	<b>对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历史反思 .....</b>	<b>(139)</b>
第一节	农民国度与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及主力军问题 .....	(139)
第二节	走向一党执政的第一步:“转瞬即逝”的立宪会议 .....	(141)
第三节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从多党制到一党制 .....	(143)
 <b>第二编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学说的理论与实践</b>		
<b>第七章</b>	<b>列宁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国情的认识 .....</b>	<b>(149)</b>
第一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国情 .....	(149)
第二节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和科学认识 .....	(155)
第三节	俄国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	(159)
<b>第八章</b>	<b>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和探索 .....</b>	<b>(164)</b>
第一节	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	(164)
第二节	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同盟军 .....	(170)
第三节	俄国革命的途径——暴力革命 .....	(176)
<b>第九章</b>	<b>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b>	<b>(187)</b>

第一节	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	(188)
第二节	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一个集中的、秘密的、 战斗的革命家组织 .....	(192)
第三节	列宁对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实践 .....	(197)
<b>第十章</b>	<b>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其局限性 .....</b>	<b>(201)</b>
第一节	列宁的帝国主义观 .....	(203)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提出的口号及其结果 .....	(208)
第三节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局限性及其影响 .....	(213)
<b>第十一章</b>	<b>列宁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演进及实践 .....</b>	<b>(219)</b>
第一节	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与败 .....	(219)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途径 .....	(230)
第三节	历史的遗憾——新经济政策没有形成共识 .....	(244)
<b>第十二章</b>	<b>列宁对无产阶级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及未能 解决的问题 .....</b>	<b>(251)</b>
第一节	“立行合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	(251)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未能改变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 .....	(259)
<b>第十三章</b>	<b>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演变与时代局限性 .....</b>	<b>(292)</b>
第一节	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 .....	(292)
第二节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两重性外交 .....	(297)
第三节	现实变化所带来的理论调整 .....	(306)

### 第三编 斯大林与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凝固

<b>第十四章</b>	<b>列宁去世后的理论论争与模式选择 .....</b>	<b>(318)</b>
第一节	列宁主义之争 .....	(319)
第二节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争 .....	(333)
第三节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方案及其评价 .....	(359)
第四节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方案及其评价 .....	(368)

第五节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方案及其评价·····	(382)
<b>第十五章</b>	<b>斯大林模式的形成</b> ·····	(388)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	(388)
第二节	斯大林模式的初步形成阶段·····	(395)
第三节	从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模式的原因分析·····	(416)
<b>第十六章</b>	<b>斯大林和苏联社会科学的命运</b> ·····	(441)
第一节	斯大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秘密谈话·····	(441)
第二节	斯大林“谈话”的背景与动机·····	(445)
第三节	30年代在学术界进行的大批判和大清洗·····	(448)
第四节	学术界大清洗的后果·····	(456)
<b>第十七章</b>	<b>斯大林模式的特征</b> ·····	(464)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	(465)
第二节	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特征·····	(467)
第三节	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特征·····	(478)
第四节	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的特征·····	(483)
第五节	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	(486)
<b>第十八章</b>	<b>斯大林模式的凝固及其历史影响</b> ·····	(490)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	(490)
第二节	战后新的历史条件对斯大林模式的冲击·····	(494)
第三节	战后斯大林模式凝固和强化的原因·····	(507)
第四节	战后斯大林思想的变化·····	(515)
第五节	斯大林模式凝固、强化的历史影响·····	(527)

#### 第四编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模式改革

<b>第十九章</b>	<b>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b> ·····	(532)
第一节	赫鲁晓夫改革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532)

第二节	反对个人崇拜——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	(535)
第三节	赫鲁晓夫时期的体制改革及其成效 .....	(548)
第四节	赫鲁晓夫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 .....	(566)
<b>第二十章</b>	<b>对苏联走向衰亡起着重要作用的勃列日涅夫</b>	
	<b>时期</b> .....	(588)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地位 .....	(588)
第二节	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 .....	(593)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	(604)
第四节	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 .....	(608)
第五节	体制改革停滞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 .....	(624)
<b>第二十一章</b>	<b>事业无成的安德罗波夫时期改革与濒死</b>	
	<b>状态的契尔年科时期</b> .....	(663)
第一节	理论上探索改革的必要性 .....	(663)
第二节	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 .....	(670)
第三节	推行的改革政策与措施 .....	(676)
第四节	处于濒死状态与白白浪费时间的契尔年科时期 .....	(682)
<b>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b>		
<b>动荡与解体</b>		
<b>第二十二章</b>	<b>不成功的改革起步:初期经济改革的失败</b> .....	(694)
第一节	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构想的提出 .....	(694)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实施 .....	(699)
第三节	经济改革起步失败的原因 .....	(702)
<b>第二十三章</b>	<b>公开性和民主化</b> .....	(707)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认识 .....	(707)
第二节	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施 .....	(710)
第三节	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引起的分歧和混乱 .....	(713)

<b>第二十四章 “新思维”和外交政策的调整</b> .....	(717)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国内外背景 .....	(717)
第二节 “新思维”的基本内容 .....	(719)
第三节 “新思维”指导下的外交调整 .....	(727)
<b>第二十五章 政治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b> .....	(732)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思想 .....	(732)
第二节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政治改革的实施 .....	(746)
第三节 政治改革的曲折道路 .....	(754)
第四节 政治改革导致的权力斗争和全面失控 .....	(760)
<b>第二十六章 改革时期的苏共</b> .....	(765)
第一节 苏共的队伍从分歧走向分裂 .....	(766)
第二节 落伍和涣散的“先锋队” .....	(769)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苏共地位的变化 .....	(771)
第四节 苏共的派别化和联邦化 .....	(777)
第五节 苏共的瓦解 .....	(783)
<b>第二十七章 改革时期的社会和社会分化</b> .....	(787)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	(787)
第二节 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 .....	(791)
第三节 各种社会思潮的泛起与社会情绪的“激进化” .....	(793)
<b>第二十八章 民族矛盾——联盟解体的导火线</b> .....	(797)
第一节 历史遗留问题 .....	(798)
第二节 认识落后于实际 .....	(801)
第三节 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高涨 .....	(804)
第四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	(809)
第五节 建立新联盟努力的失败与苏联的解体 .....	(815)
<b>第二十九章 苏联剧变，必然还是偶然</b> .....	(823)
第一节 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	(823)
第二节 内因和外因 .....	(828)

---

第三节 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	(834)
第三十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 .....	(847)
结束语: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 .....	(857)
参考文献 .....	(882)
后记 .....	(895)



## 前 言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出现了一些较有质量的论著，不少学者对苏联、俄罗斯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较为系统与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改革提供了不少启示，也总结了一些教训，这对我国改革少走弯路是十分有益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先后发生剧变。为什么发生剧变，这自然就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与此同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更广阔的视野研究苏联兴亡的历史，分析兴亡的原因和总结其历史教训，日益受到关注。在此背景下，《苏联兴亡史论》在1996年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课题，本书就是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在研究本课题过程中，作为中间成果出版了《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苏联剧变<sup>①</sup>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只意味着一个超级大国的崩溃，而且还意味着长达70年之久的苏联社会主

---

<sup>①</sup> 这里我们用的“剧变”一词，主要包含以下内容：（1）苏共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苏联解体；（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与斯大林体制模式彻底决裂，都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轨；（4）这些国家不再坚持以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可能是对原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义和一批东欧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这个历史事件要比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与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得多和深刻得多。因此，从苏联发展历史过程中来研究其兴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特别要指出的是，当东欧各国和苏联剧变而导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通过改革开放转变体制，决心摆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之际，通过对苏联兴亡历史的研究并得出科学结论，这对今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苏联剧变后，对苏联的兴亡问题有了一些研究。这几年来，国内外更多地从苏联剧变原因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一些著作。但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上，观点的差异很大，因此得出的经验教训亦很不相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对苏联兴亡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这么一个重要课题，涉及到如此广泛的领域与问题，需要更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开展百家争鸣，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这一研究得以深化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苏联的兴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

苏联的兴盛，突出表现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它以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全新的体制模式出现在世界，保持了几十年的稳定时期，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部门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后来成为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抗衡的军事、经济大国。但是，在这个兴盛过程中，就潜在着衰落与败亡的因素。衰亡开始的时间，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分析。如从体制角度看，战后，斯大林的体制模式已不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了，已失去了动力，进入了死胡同；如果从经济

发展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明显出现了停滞，严重的经济问题已日益暴露，拼消耗、高浪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已走不下去了；如果从苏联解体角度看，则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

苏联兴亡的历史跨越时间长，涉及面广，理论层次深，实践内容丰富。但我们认为，要解决的难题，应该与论述苏联兴亡原因这一主题相联系。而研究苏联兴亡的主要原因，不仅要抓住苏联七十多年中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与改革这条主线，而且要把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放在俄国史和苏联七十多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大背景下加以透视。这里讲的是研究苏联兴亡的主线或者说大思路，因此并不否定与它相关的一些问题的重要性，如苏共党的问题、民族问题、国际战略与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与弄清苏联兴亡的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上述研究主线出发，需要突破以下一些难题：

1. 首先，必须对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从头研究：第一，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所发现的社会运动规律仅“限于西欧各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那么，这一理论体系传入东方之后会出现什么特点？如何认识、归纳这些特点？第二，什么是列宁主义的精髓？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概括错在哪里？应怎样继承和发展列宁学说的科学内核？第三，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科学体系，那么毫无疑问，它也代表着新兴的人类文明，这个文明体系怎样才能更好地同东方文明（首先指俄国）相结合，使东方文明既能保持优秀传统，又能抛弃反进步、反科学的有害部分。

2. 在弄清上述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基础上，具体、深入地研究在文化、经济落后的俄国产生十月革命的因素，阐明在该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在这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将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简言之，要阐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问

题。这些问题在俄罗斯国内有着尖锐的意见分歧。

3. 列宁思想的实质及其发展轨迹。苏联二三十年代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模式，是受列宁早期思想影响大，还是受他晚期思想影响大？就是说，要真正弄清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同列宁主义的相互关系。

4. 在研究斯大林高度集权体制模式形成过程基础上，对这一模式做出科学评价。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对苏联兴亡史的整个研究，往往与这个问题相关联。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在总体上或者说其最宝贵的方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人则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基本上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从而使苏联及移植该模式的东欧各国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说，斯大林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应该从当时苏联的历史条件分析斯大林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曾起的作用。与此同时，又要看到这种体制的局限性与改革的必要性。

5. 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体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原因何在？我国学术界对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改革都存在歧见，如首次对斯大林模式发动冲击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对其评价至今说法不一。又如对勃列日涅夫时期长达 18 年的改革，有人以这个时期苏联国内稳定、综合国力提高为依据，给予了肯定；而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停滞时期，特别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给苏联留下一大堆问题，不能把改革停步视为稳定，这一时期经济的一定增长，是以消耗国内大量资源为代价的，而且当时国际市场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等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已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危机。至于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特别是

联系到苏联解体，分歧也很大。以上问题不弄清楚，就很难对苏联兴亡原因得出正确结论。

6. 由于苏联时期对传统体制的改革未取得成功，因此畸形经济结构也难以调整。这使苏联的传统体制不能与世界科技革命相适应，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改变，长期保持粗放的、浪费型的增长方式。这个问题的研究，对分析苏联兴亡极为重要。但至今我国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中国正面临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大转变，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增长方式的转变又取决于体制的转变。苏联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发展道路过渡，但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转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苏联经济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

7. 要把对苏联兴亡过程的分析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苏联是个大国，长期来是与美国共同争霸的超级大国，因此，考察苏联兴亡必须对各个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战略进行分析，要研究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与条件。特别要研究苏联长期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与实践，霸权主义、扩张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对苏联各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8. 意识形态对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体制改革、科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有着重要影响。特别要分析斯大林长期垄断理论对苏联产生的消极后果。必须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去考察这些问题与苏联兴亡的关系。

9. 苏共性质问题。长期以来，苏联是由苏共一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兴亡与苏共性质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苏共官僚化，压制民主，坚持僵化的、脱离变化了的实际生活的体制等因素，可否说明苏共已蜕变成脱离人民的党？否则，如何解释1991年叶利钦

宣布停止苏共活动时，没有一个工人出来加以反对，也没有一个苏共支部起来捍卫苏共？人民抛弃党的缘由何在？

10. 民族问题。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大俄罗斯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矛盾。这里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政策在苏联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评价问题。1991年宣布苏联解体时，为什么各加盟共和国如此迅速地纷纷宣布独立，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对这些问题必须加以深入研究并得出符合苏联发展历史的结论。

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要用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要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考察、研究苏联兴亡的原因、过程与经验教训。我们在研究苏联兴亡问题时，特别强调要站在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评价与分析苏联的兴亡原因并得出正确的历史教训。任何一门科学，只要是真正的科学，总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它首先要求我们，对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实不能更改，要求后人尊重历史；但这决不是说，后人不能对历史做出新的判断，做出新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相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推动理论的发展。

我们在研究苏联兴亡问题时，力求做到：1. 秉笔直书、实事求是。这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要用可靠和充实的资料说明问题。对已有的有关著作要吸取其所长。2. 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对苏联兴亡问题的研究要有一条十分明确的主线，使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3. 对苏联兴亡问题的研究要集中回答主要问题，而不是写苏联历史书，因此，史料的运用是为了论证所研究的问题，力求做到史论结合，以论为主。

由于研究的问题涉及的领域广泛，问题十分复杂，我们的水

平有限，书中肯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得到同行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陆 南 泉

2001年3月

## 导 论

《苏联兴亡史论》涉及的领域与问题十分广泛,但本书主要论述苏联兴亡的原因,而研究这一问题的主线是体制问题。这里说的体制是指斯大林时期形成、巩固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未能进行根本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不抓住这条主线,就难以科学地回答苏联兴亡的原因,因为体制模式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意义。

我们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设计了全书的框架。全书由导论、正文五编和结束语共同组成。以往研究苏联史或苏联社会主义史,绝大多数都从十月革命开篇,但我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或苏联模式与俄国历史传统密不可分,因此我们的研究是从俄国近代史的主要史实与突出特征开始的。



本书第一编《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着重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近现代沙皇俄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二是俄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政党运动概况。

沙皇俄国直接起源于14世纪中叶形成的莫斯科公国,早期的



莫斯科不过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庄而已。<sup>①</sup>但是这个偏安一隅的俄罗斯东北部的小小公国，由于地缘上没有“后顾之忧”，加之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蒙古鞑靼汗奉行“百依百顺地取悦”政策，博得了特殊待遇。在“莫斯科公”伊凡·卡里达统治（1325—1341年）时期，很快由一般的“公”获得高出一格的殊荣：“弗拉吉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封号。马克思对此评论说，伊凡·卡里达不惜“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sup>②</sup>到1613年建立罗曼诺夫王朝时，俄罗斯主要还是一个内陆扩张国家，先是并吞了各个割据的俄罗斯公国，继而征服周边异族国家。实际上，早在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3年即“全俄罗斯大公”位，1547年即“沙皇”位，死于1584年）时，沙俄就已不再满足于内陆大国的地位了。他在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之后，立即挥师西向，发动立沃尼亚战争，力求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但在波兰、瑞典及日尔曼立沃尼亚圣剑骑士团的抵御下，终以失败告终。伊凡雷帝留下的名言是：“波罗的海海水是值得用黄金来衡量的。”<sup>③</sup>

实现俄国君王这一梦想的，是沙皇彼得一世（彼得大帝，在位时间为1682年至1725年）。在俄国历史上，这是一次飞跃，是从内

---

① 俄国和苏联一般的史书都认为沙皇俄国起源于10—11世纪的基辅罗斯，但是乌克兰史学家则认为，基辅罗斯国家体在今乌克兰境内西南部，是乌克兰最早的发祥地，莫斯科公国不过是蒙古—鞑靼入侵后出现的诸多斯拉夫封建主公国之一罢了。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这里只好把沙皇俄国的起源追溯到莫斯科公国为止。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③ 转引自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飞跃。最明显的标志是，彼得把首都从内地莫斯科迁至君临波罗的海的彼得堡，通过征战控制了波罗的海海上通道。俄国史的这一飞跃基础，是由彼得一世对内进行大刀阔斧的封建改革结出的“硕果”。但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没有触动俄国封建社会的根基，反而把俄国的封建制度推向了鼎盛阶段。这同当时的西欧各国封建制度纷纷垮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马克思对彼得一世的评价是：“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sup>①</sup>

由于彼得大帝改革对以后的俄国史乃至对苏联时期的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僵化都有巨大的影响，本书对彼得改革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彼得一世的改革可以区分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99—1707年，是积蓄力量阶段；第二阶段为1707—1714年，是俄国荣耀兴盛阶段；第三阶段为1714—1721年，是建立良好秩序阶段。我们研究彼得改革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三个特点。这些特点在苏联模式中都有极其相似的反映。

彼得改革的第一个特点是，为了推进改革大开杀戒，镇压了一大批敢于反对改革的贵族、僧侣，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皇太子。俄罗斯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之后，领土扩张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一扩张过程总是伴随着“高潮—低潮—高潮”这样一种规律。权力斗争主要集中在宫廷和上层统治阶级中间。斗争的方式则是在“改革”名义下，无情地、大批地铲除异己，从肉体上消灭政敌。16世纪伊凡雷帝进行“改革”时，不仅杀掉了大批异己的贵族，还杀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彼得大帝之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是杀掉自己的丈夫——彼得三世登上王位、施展她的抱负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620页。

彼得改革的第二个特点是,尽可能地压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奴。兴办军工企业需要大批劳动力,彼得下令允许工场主把整村的农奴买到工场做工。他还亲自给乌拉尔地区拨去 2.5 万名农奴。彼得一世变原来的“户口税”为“人丁税”,除了贵族和僧侣是免税特权阶层外,农奴、市民、地主家用奴仆及老人、小孩均须按“丁”缴税,以扩大国家财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农奴在人身上更加依附于地主贵族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奴情况更加凄惨,更加没有社会地位了。彼得的改革是以牺牲广大农奴的起码生存条件为代价的。

彼得改革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推行行政改革,即建立并完善在严格等级制基础上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同时举全国之力发展国防工业,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

他废除了大贵族波雅尔杜马(又称“领主杜马”)和中央及地方许多衙门,代之以只对沙皇一人负责的参政院,参政院下设分管军事、政务等的 11 个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厅。此外,特设沙皇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总检察官一人——“国君的眼睛和国家事务的司法稽查官”。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更加严格,全国文官一律分为 14 个等级,军官从元帅到下级军官同样定为 14 个级别。为了更有利于沙皇的统治,彼得削弱了教会僧侣的势力,排除宗教干政的传统,先是将教会部分财产和领地收归国有,随后于 1721 年颁布敕令,规定东正教牧首(总主教)职务由沙皇任命的非宗教人士组成的宗教事物管理局取代。

为了争夺出海口,彼得大力发展俄国海军,亲赴西欧考察造船技术,引进人才,主持制订颁布俄国《海军章程》。实行军事改革、扩军备战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此,他强迫商人贵族兴办大型工矿企业和官办工场,并提供贷款、津贴、免税权和垄断权等优惠条

件。

军事改革是彼得改革的最重要内容。彼得大帝首先从改变军队体制入手,把以往组织松散、纪律涣散的射击军改造为适应当时的“现代化”战争需要的常备军。1699年,他颁布敕令,规定按比例从自由民中抽取兵丁。在1699—1725年间,总共征兵53次,达28万余人。

自然,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一个总目标,即加强俄国的军事实力,实行领土扩张。

经过二十余年的北方战争,彼得迫使主要对手瑞典就范,俄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占领波罗的海及其沿岸地区的战略目标。彼得改革的结果是:俄国自此成为欧洲军事强国。俄罗斯改称“帝国”,彼得也被加冕为“大帝”。彼得还在东方实行扩张:东线,派军沿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企图开辟出一条通往印度洋的要道;中亚线,派军攻打希瓦汗国;波斯线,彼得亲自率军进占高加索,入侵波斯。但俄国在以上三条战线上均未取得明显战绩。

彼得改革也打开了通往西欧的“门户”,欧洲文明(文化、科学、教育)开始传入俄国。这本来不是彼得最愿意看到的。他希望有控制地学习西方,例如,他对西欧国家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俄国社会从此开始发生变化,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是彼得意料之外的事了。

彼得在位期间连年征战,穷兵黩武,民力困乏,怨声载道,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武装起义接连不断。彼得死后,宫廷内乱不断,延续三十余载。但是,这一期间沙俄的侵略扩张从未停止过。

马克思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里翔实地揭露了彼得大

帝以后 30 年间俄国侵夺大片大片领土的事实。<sup>①</sup> 恩格斯于 1866 年写道,俄国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它在“征服别的民族,并吞左右邻邦的领土”方面,“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关于彼得大帝,恩格斯说,他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sup>②</sup>

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 年即位,死于 1796 年)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1762 年推翻其夫彼得三世,自登皇位。她的出身,使她对西欧启蒙思想颇为熟悉。登基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度想把流行于西欧的“开明君主专制”嫁接到俄国封建社会中来,同时以更加强硬的手段奉行扩张政策。结果,在扩张政策连连得手的同时,却激化了俄国的社会矛盾。农奴们揭竿而起,其中最著名的是规模宏大、持续三年之久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1773—1775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调集重兵镇压起义之后,转而推行强化中央封建皇权制的政策,并且为她的侵略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她在位期间,俄国同普鲁士、奥地利联手三次瓜分波兰,与土耳其争战(1768--1774 年),占领黑海北岸大片领土,夺得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出海口,成为黑海海上霸主。叶卡捷琳娜二世还南下征服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东侵中国,兼并北部阿留申群岛。叶卡捷琳娜二世时的俄国充当了名副其实的欧洲反动堡垒和维护旧秩序的宪兵。沙俄是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急先锋,坚决站在法国保王党一边,曾决定派军 6 万前往法国扑灭革命,只是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中风死亡而未果。

以上情况证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那样,沙俄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第 17 页。

② 同上书,第 16 卷,第 180—182 页,第 12 卷,第 637 页。

建制度已经不止于俄国一国之内的事了，而是成了全欧洲革命势力的拦路虎和反动势力的代表。

由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所统治的沙俄，是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鼎盛时期，其特点是对内千方百计地维护并加强封建的皇权集权制，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这一点也是沙俄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以前的突出历史特征。

应该说，这一历史特征对后来斯大林—苏联模式也有深刻而强劲的影响。

进入19世纪以后，罗曼诺夫王朝历经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三世，沙俄在欧洲和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没有变化。除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在俄国境内抗击拿破仑的战争属于正义战争之外，它在境外进行的多次战争都属于拓展疆域或争夺殖民地性质的侵略性争战。其中，既有它伙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共同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也有它同其他列强国家之间为开拓俄国疆域或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

这里不能不提到沙俄对中国的侵略。沙俄通过1858年《璦琿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无数财宝和赔款。

还值得特殊指出的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完全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及领海进行的争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稍具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更不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斯大林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俄国的战争。1945年9月2日，他在《告人民书》中是这样说的：“日本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就利用沙皇政府的虚弱，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的俄

国舰队……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清洗，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待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了。”<sup>①</sup>

在沙俄跻身欧洲和国际列强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不能不对俄国社会产生影响，俄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下，俄国国内也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是畸形的、漫长的，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时也没有完成这一转变。之所以说这种转变是畸形的，是因为俄国政治制度的变化不是由自下而上的革命力量直接推动的，而是在社会矛盾的影响下，由以沙皇为代表的中央专制制自上而下地、缓慢地进行的。俄国资产阶级始终处在依附于专制制度的地位，尽管俄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早在彼得“改革”时期就出现了。

19世纪是俄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缓慢增长、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世纪。19世纪俄国史上发生过两大社会—政治事件。一是1825年贵族自由派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从而开始了俄国社会转型的“发酵”过程；二是1861年由沙皇颁布法令开始的“农民改革”，即资本主义因素加快增长的过程。

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很快地、甚至是转瞬即逝地失败了，但是它标志着俄国的社会矛盾由在皇权思想严重影响下的农民自发起义，转向社会上层有组织的革新过程的开始。不过，整个19世纪的俄国社会反封建专制，还主要是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启蒙和反专制力量秘密结社或集会阶段。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政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470页。

党运动的雏形,如1861年的“土地和自由社”,1879年的“民意党”、“土地平分社”,1883年的“劳动解放社”等。这一时期,俄国革命者还参加了马克思主持的第一国际的活动,但是他们都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巴库宁等)或民粹主义革命家(早期的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在意识形态领域,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产生过冯维辛(1744—1792年)、拉吉舍夫(1749—1802年)、卡拉姆津(1766—1826年)等启蒙思想家。他们的作品揭露了沙俄专制下俄国农民的凄惨生活,但同时又寄希望于开明的君主。既接受他们的思想启蒙,又有游历西欧的经历,正是十二月党人的特点。但19世纪对俄国社会意识形态起到重大影响作用的,是后来的一批思想家:别林斯基((1811—1848年)、赫尔岑(1812—187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等人。他们既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又是俄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他们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另一方面,他们又幻想在俄国村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俄国革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起到了武装俄国革命者头脑的先进作用,但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又起到了贻误革命者的负面作用,在这方面,对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对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都不例外。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入政党革命或称改良运动时期。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了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等派别,代表的是从无产阶级到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等阶级和阶层的利益。1901年成立的社会革命党,代表的是农民阶层的利益。1905年成立了立宪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十月十七日联盟”(统称“十月党人”)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代表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是俄国式的资产阶级自



由派，十月党人则代表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被列宁称做“黑帮”。这两个党的共同主张是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在如何实现君主立宪制问题上存在较大不同。在早期，列宁对立宪民主党的出现是持欢迎和赞赏态度的。

本书作者认为，像过去那样只是肯定布尔什维克一党的革命作用，而排斥其他一切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作用，是不恰当的。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运动中，上述各个政党都起过程度不同的历史推动作用。恩格斯的评价是：“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按：即早期的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中。”<sup>①</sup>

在分析和研究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成因时，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合力论方法，即要看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 二

本书把十月革命前列宁的革命学说理论和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实践，单独列作一编，即第二编。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社会革命党的偏狭性及其指导思想的空想实质，它们都不可能担当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第 45 页。

领导任务。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政党的肩上了。为此，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俄国社会的特殊实际完整地结合起来。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奋斗，终于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干成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曲折，又初步找到了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新经济政策。

列宁接受马克思主义、踏上革命道路的第一步是调查、研究俄国社会的实际。他面临着多重的战斗任务，既要反对照搬西欧工人政党的经验（当时它们已经成为公开的、合法的“议会”政党），更要反对俄国式的革命空想——民粹主义，还要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为此，他先后写出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年）、《怎么办？》（1902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等一大批奠基之作。一方面，列宁看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同西方资本主义一道进入了垄断阶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列宁看到了俄国仍然是封建制度和贵族—地主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水平极其落后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列宁得出结论：俄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讲得尤其充分、明白。但是，俄国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同于西方已经有过的一切民主革命，在那里，民主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在俄国，由于资产阶级的成长是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的，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它时时考虑到的是如何出卖革命利益，同专制制度达成妥协，因此担当不起革命的领导任务。这个领导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来完成，这是其一。其二，由于沙皇专制制度到处实行警察镇压，俄国革

命没有和平途径可谈，暂时参加钦定的国家杜马也只能是争取群众的手段，俄国革命必须走暴力夺取政权的道路。其三，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能是一个思想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实行民主集中制）、秘密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布尔什维克在所有上述问题上，不仅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形成对立，而且也同孟什维克有着尖锐而深刻的分歧。

1905—1907年的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虽然不是完全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但是参与这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队伍却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取得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党在革命低潮期间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流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这些斗争使得列宁学说更加成熟了。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不是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也不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次革命，与其说是组织的、由某一政党领导的，倒不如说是处于深刻社会危机中的广大下层群众，出于对专制制度的极端不满和激烈的反战情绪，而自发地形成的。

但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二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罕见的历史机遇。这一机遇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把持的临时政府软弱无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优势的苏维埃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而造成了俄国是各交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这种形势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并且壮大自己。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面包、自由、和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深得群众拥护，从而形成了党和群众鱼水相得、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写出了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即“帝国主义论”）这样的重要著作，对帝

国主义的矛盾、特征、实质、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都做了分析和结论性的判断。这对启发人们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掠夺性本质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但是，列宁的学说也受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局限，如，大战使各交战国普遍陷入社会危机，反战、反帝国主义成为各国人民的一致要求，这些暂时的情况使得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已经证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断言，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进入“世界革命”阶段，这是明显地低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力。由此出发，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除了在俄国一国内这一口号得以实现之外，列宁曾经寄予极大期待的“世界革命”并没有成为事实。列宁曾经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夺得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有后续的欧洲革命的支援，才能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列宁所期待的“世界革命”的形势很快地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立即面临如何领导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917年，列宁对俄国革命的社会性质——民主革命抱有极其清醒的认识，认为在俄国“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在他所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四月提纲”里却又含有直接过渡的思想，如，认为俄国正处在“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在俄国最重要的农民问题上，主张“重点放在雇农代表苏维埃”上，“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农场”，等等。十月革命后通过的《土地法令》虽然接受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思想，但是列宁持有极大的保留态度。这一切孕育着内战期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先兆。只是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挫折，列宁才回到了早年对俄国社会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上，即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

遗憾的是,新经济政策思路并没有成为俄共(布)全党的共识。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仅仅执行了四年,到1928年春就实际上夭折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新经济政策的争论,变成了党内权力之争,最终的胜利者是斯大林。这一点不幸被列宁言中了。列宁在晚年曾经坚决地主张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可惜,列宁的愿望没有实现。

列宁关于党和国家机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尽管不够成熟,但也是极其宝贵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遗产。它向我们提供了早期苏维埃政治体制遇到的问题,以及列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想法。

### 三

斯大林与苏联模式的形成和凝固为本书的第三编。本编有两个重点,一是专门介绍了列宁逝世后俄国共产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论战情况;二是用了较多篇幅评介了斯大林—苏联模式。我们认为,理解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实质,是揭开苏联兴亡之谜的关键,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1921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苏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的探索。从1921年春到1923年春,列宁不断地发展新经济政策思路,肯定新经济政策不是临时的“退却”,而是在俄国条件下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整整一个历史时代”,是要经过许多代人的艰苦努力和奋斗的长远途径。他迫切地号召共产党人要学“做(欧洲方式的)文明商人”。同时,列宁的思路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晚期思想至今仍有重大启发意义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列宁晚期思想可以用“我们不

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一句话加以概括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但是列宁逝世后不久,苏联共产党内就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道路的激烈论战,结果是斯大林大获全胜,并且形成了“苏联斯大林模式”。

本书用较大篇幅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联共党内的论战,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特征和凝固(僵化)过程。用了专门一章介绍、分析了苏联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悲惨命运。

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党内论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权力之争压倒了理论争执。在这场论战中被打倒和遭到镇压的,不仅有“左”倾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而且还有坚持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前者所提出的“左”派言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极好的反面教材,斯大林后来实行的建设路线,同这些“左”的主张如出一辙。而布哈林等人在论战中阐述的一切,至今仍然不失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宝贵遗产。总之,不论从理论方面看,还是从权力之争方面看,这场大论战都可以被看做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准备阶段。

形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三大社会运动,在本书中也有较详尽的介绍。三大社会运动是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政治大清洗,它们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本书不仅介绍了政治大清洗的一般情况,而且还特殊地介绍了在社会科学和自然

---

<sup>①</sup> 列宁的晚期思想是指1921—1923年的一系列著作,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比较集中于“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科学领域中的清洗状况。20世纪30年代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镇压,使苏联整个的思想界丧失了创新能力。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了领袖言论和本本的诠释者。

长期以来,关于形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原因,多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即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表面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决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路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最主要的成因,我们认为,还在于它重蹈俄国历史传统的老路,是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再现并且极大程度地照搬并强化俄国历史上“成功经验”。斯大林—苏联模式的

雏形，形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政治手法、经济途径，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我们在伊凡雷帝（16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17世纪末—18世纪）、亚历山大一世等俄国君主所进行的“改革”那里，都能找到相似的思路和相似的做法——除了社会主义这一旗号之外。这也是本书为什么要单立一编，着重介绍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改革”和统治方式的用意所在。

斯大林是20世纪人类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以及他代表的斯大林—苏联模式不仅对苏联的命运，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后果至今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残存着。

我们认为，看待斯大林这位历史人物，必须看到他的“两重性”，即：第一，他是苏联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沿袭俄罗斯的政治传统，手里集中了空前的“无限的权力”；第二，他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缔造者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这样的两重性集中于一人，问题就复杂了。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同俄国历史上的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等人一样，是成功的“强国主义者”。20世纪20—30年代成功地把苏联经济转变为备战经济，同世界人民一道战胜了人类的死敌——希特勒法西斯，苏联人民的这一伟大贡献是彪炳史册的。有人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归功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不仅有苏联，而且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像中国这样的落后的国家。即使从俄罗斯历史上看，也有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辉煌胜利。不能把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正如二战期间，苏联官兵冲锋陷阵时高呼“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口号一样，谈不上什么社会主



义内容；相反，在战时，斯大林模式的控制反而有所放松，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

作为苏联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模式是不是就是一个好得很的东西呢？完全不是。在这一点上评价斯大林的功与过，完全是“过大于功”的。如果说，二战之前，实行斯大林体制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二战结束后，在苏联面临根本改革这一体制的关键时刻，斯大林不仅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实行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化战前备战体制，使得根本改革苏联的僵化模式越来越困难——当然，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此也难辞其咎。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邓小平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1980年1月说的：“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第二句话是1985年8月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第三句话是1986年9月说的：“看来（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sup>①</sup>历史是邓小平上述判断的最好见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大批东欧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它们实行的斯大林体制模式，都是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苏联的刺刀威逼下、镇压下不得不接受的。1991年，连斯大林模式的发源地——苏联也解体了，苏共也垮台了。

我们上面引用了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国内有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斯大林问题，认为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当时有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50页；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78页。

当时的特殊情况。一句话，“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前人”。对此我们不能苟同。我们只能站在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邓小平理论的立场上，科学地分析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否则我们会失掉判断是非的标准，会陷入恩格斯批判过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怪圈中。<sup>①</sup>况且，即使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行为中，也看不到多少理性的东西，例如，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中消灭“富农”的政策、疯狂的政治大清洗运动，都是非理性的政策。

与其说“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产物，倒不如说是俄国历史的产物更为确切。但要清理这团“乱麻”并不容易。在斯大林的著作里，通常都是大段大段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除外），特别是列宁的原话。斯大林一贯自称是列宁的学生，给人的印象，只有他才是“第二个列宁”。但是，他只引用列宁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的著作。他从来不把列宁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学说对待。他引用列宁著作，主要是为了制服论战对手、压倒对手，实质是要宣扬他斯大林个人的“主义”。例如，他最推崇的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著作。斯大林反复引用列宁早期说过的“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他把列宁在战时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sup>②</sup>这句话无限拔高，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和出发点，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随心所欲地发挥

---

<sup>①</sup> 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15—216页。

<sup>②</sup> 列宁原话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66页。

为：“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sup>①</sup>我们请读者注意，在这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不见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统统不见了！

斯大林也不是不想搞社会主义，但是他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大致有三个。一是他早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早年就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是没有商品、货币、市场的产品经济社会，他以后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包括他的晚年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种思想非常容易被落后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俄国人接受。二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一贯被置于苏联国家利益之下，来自于俄国特有的“俄罗斯思想”，即认为俄罗斯天生负有“解放”人类使命的“俄罗斯使命论”。这种思潮在俄国根深蒂固，是16世纪东正教中心从拜占庭转移到俄罗斯之后形成的世俗—宗教思想。它有时表现为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泛斯拉夫主义，有时直接表现为“俄罗斯救世主”思想。<sup>②</sup>三是，“左”倾教条主义是斯大林理论的致命特点。斯大林“言必称马列”，但是“马列”言论必须是符合他的“左”倾教条主义或者他的大国沙文主义胃口的，像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sup>③</sup>和前述恩格斯批评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64页。

② 确切些说，“俄罗斯使命”思想的源头，始于16世纪“全俄罗斯沙皇”伊凡三世，俄罗斯沙皇被尊称为“真正东正教世界首领”，首都莫斯科被称为“第三罗马”，意即前两个帝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衰落，“第三帝国”俄罗斯将会永存。

③ 马克思的这篇重要著作，就没有被收入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现在我们读到的是其中文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沙俄对外政策的言论或著作则不在此列。

本书作者认为，斯大林建成的苏联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以个人迷信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专断；（二）以扩军备战为主导的国家统制经济，即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三）以闭关锁国（由一国扩大为一个阵营）这一慢性自杀方式为特征的僵化体制，并满足于这种极端保守和落后的体制，还把这一体制吹嘘为优越于一切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这三个特征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它们是通过三大社会运动，即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超高速工业化运动、政治大清洗运动，耗时十几年才最终定型的。二战以后，这三大特征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与凝固。

在斯大林—苏联模式中，国家经济生活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计划体制，地方和企业毫无自主权可言。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必然空前地臃肿庞大、效率低下，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在所有制领域，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国有制和准国有制（集体农庄所有制），分配领域则实行金字塔式的等级平均主义。此外，财政、价格等等全部由中央统管起来。军事扩张性则体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经济生活体现出临战或备战状态。人民生活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永远赶不上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主要表现为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和党的组织高度机关化。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方面，1929年以庆祝斯大林50岁生日为起点，到二战之后逐步升级，到1952年苏共十九大时达到高峰。此时，斯大林已经不是凡人，而是被吹捧为超凡脱俗的英明的“神”了。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各级苏维埃统统变成了“群众组织”，从根本上违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宗旨。领袖的权力、

党的机关权力不受监督，所谓党的监察委员会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对同级党委毫无监督可言，更不要说对党的高层领导权力的监督了。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文化体制的特征是，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不清，连自然科学的一些先进理论都可以随时随地地、任意地被扣上“唯心主义”、“伪科学”、“资产阶级谬论”等等大帽子。

不可否认，斯大林—苏联模式在 20 世纪 30 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过某种促进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为打赢反希特勒法西斯战争准备了某种条件。但是，不可高估这一作用。在俄国史中，沙俄以劣势的装备打赢了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俄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苏联为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造成了人力物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至于二战以后，苏联强行把斯大林模式推广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是贻害无穷，是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剧变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本书也有必要的交代。

最后，我们还要谈谈斯大林以及他所建立的体制模式的巨大影响问题。

不论在当代世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的影响都是巨大而又深远的。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完全站在他的影响之外。时至今日，斯大林仍在影响着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或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曾经照搬过苏联模式，主要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模式确曾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时我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种“照搬”的严重后果，以至于直到今日我们还不得不为国有企业改革绞尽脑汁。对此，邓小平早在 1988 年就说过：“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

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sup>①</sup>

由于斯大林最善于把他的“列宁主义”改换成一整套的“斯大林主义”，所以人们很容易误把斯大林的学说和著作看成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实，列宁在世时，从来没有人从正面使用过“列宁主义”这个术语（20世纪初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论争时，“列宁主义”被孟什维克从反面用作过讥讽语），列宁本人也不会同意使用它，当然也就不会对“列宁主义”做出定义了。1923年列宁病重时，托洛茨基首先使用术语“列宁主义”，引发了关于列宁主义定义的一场激烈争论。当时的情况是，谁能取得对“列宁主义”定义和内容阐述的最高权威，谁就将成为列宁当然的“接班人”。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几个问题》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其中混杂着许许多多列宁绝对不会同意的东西。俄国原本就是一个东方落后国家，斯大林的学说最容易对亚、非、拉国家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说，斯大林理论和他所创建的苏联模式影响了几代共产党人。例如，历史上，我们也曾一度把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误当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百科全书”加以学习，贻害无穷。

在很长的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是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曾支援过其他国家的革命——尽管多数情况下苏联是出于维护并扩大其自身利益和影响才这样做的，同时它这样做时，还做出过许多极其错误的决定或“命令”，干扰了其他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但是，其他国家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之后，能够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就使得苏联在客观上起了推广马克思列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宁主义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社会主义并没有错，错的是斯大林—苏联模式。令人痛心的是，今天一些国家连社会主义也一起抛弃了——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并且充分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

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伟大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任重而道远。只要我们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社会主义就是大有希望的。要把眼光放远，人类终归是要走到一起的。

#### 四

1953年，斯大林逝世。由于在他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背离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而逐渐失去生命力。如果再继续沿着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走下去，将永远也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在此历史条件下，改变斯大林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如果说，在苏联东欧各国中，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是最早推行体制改革（1950年），力图尽早摆脱斯大林的苏联模式，是斯大林寒冬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中走自己之路的第一枝改革报春花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则是苏联的第一个改革者。在苏联这么一个大国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无疑是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即改革时期。以后的苏联各届领导人，尽管改革步子有大有小，某些时期还出现了严重倒退，但毕竟为了苏联社会的发展，为了克服客观存在的严重弊端，都曾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改革政策，所以，我们把本书第四编称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模式改

革》。

本书作者认为,战后世界处于和平发展时期,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巩固。本来,斯大林应抓住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大好时机,对已不适应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但一直到斯大林晚年,他推行的外交政策并没有顺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而是在所谓两大阵营对抗理论上制定了僵化与偏执的对外战略与路线。随着战后“斯大林模式的阵营化”,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在斯大林逝世前,两大军事集团的冷战已经达到了非战争条件下最为紧张的状态。由于斯大林独断专行,实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政策,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与南斯拉夫关系已破裂。这些严重破坏了苏联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在国内,斯大林在战后一直在强化原有的体制,无视苏联国内日益显露出来的矛盾与问题,更多地强调“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比它更巩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sup>①</sup>而实际上,战后苏联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党内积累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苏联要前进,只能进行改革。

“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重要标志。从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开始,到苏共二十大(1956年)和苏共二十二大(1961年),赫鲁晓夫持久地、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尽管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目的有众多不同看法,但从改革角度来看,应该说反对个人崇拜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的起点,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在斯大林执政的30年间,苏联神化斯大林的造神运动不断发展,斯大林成了真理的化

---

<sup>①</sup>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45页。



身。对斯大林的崇拜在苏联已成为一种宗教现象，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在这种条件下，赫鲁晓夫要改革斯大林的体制模式，修正斯大林的理论，调整斯大林时期推行的内外政策，不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不可能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不少历史学家把1956年视为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折年，它标志着斯大林时代的结束，赫鲁晓夫时代的开始。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主要是列举了斯大林滥用权力和违反法制的种种表现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

应该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1956年9月与南共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与邓小平同志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迷信都是肯定的，认为是“一个重要功绩”，“打破了神化主义”，“这是一种解放，一种解放思想”。

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深远意义还在于：

首先，使人们认识到，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必须改革，这为进行体制改革创造了思想前提，对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反对个人崇拜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大胆探索改革理论。在赫鲁晓夫授意下，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叶·格·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文章提出的主要观点是：在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前提下，重建整个计划制度，计划的重点要解决国民经济的总量与结构变化，用经济方法引导企业，使其符合宏观计划要求，减少对企业的指令性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与鼓励企业竞争；并且指出，应把利润指标视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热烈讨论。这次大讨论，不仅为苏联以后的改革作了奥

论准备,对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可称得上是苏联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也对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实行改革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三,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推动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进程。长期以来,苏联把斯大林模式视为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不允许别国偏离一步,否则动辄批判、开除,甚至加以镇压。在改革从苏联逐步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扩展的同时,赫鲁晓夫则表示,别国可以走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建立不同的体制模式。1963 年 6 月,赫鲁晓夫在面临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声谴责南斯拉夫背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南斯拉夫是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不是“空谈革命”,而是“具体建设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发展是“对总的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具体贡献”。<sup>①</sup>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最早着手改革的领域是农业,因为农业问题在苏联显得最为突出。在 1958 年以前,苏联农业改革的主要思路是“放权”与贯彻“物质利益”原则。1957 年赫鲁晓夫对工业与建筑业的大改组是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大改组的核心是取消部门领导经济的管理体制,实行地区管理体制。通过这一改革,试图解决中央统一计划管理过分集中、统得过死、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方面也作了某些改革,如加强集体领导,恢复与健全法制,建立干部更新制度,调整政府机构,精简管理人员,改进苏维埃制度和按照生产原则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组织结

---

<sup>①</sup> 参见赫鲁晓夫 1963 年 3 月 30 日在南斯拉夫维堡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构,在边疆区和州一级分别成立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系统。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绩效:在政治上,主要是在消除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造成的后果、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紧张状态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经济上,主要是在克服强制农业集体化给农业带来的消极状况进一步恶化、扩大地方与企业权限方面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总的来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有其严重的局限性,1957年的大改组“只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改组是“没有经过周密思考、没有仔细权衡、没有经过实际试验的改组”。这一时期改革不成功,甚至半途而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因素有:

首先,改革仍然是在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并未摆脱斯大林时期的霸权主义、对外扩张和民族利己主义;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只是试图把原来美苏各霸一方的尖锐对抗变成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在经济理论方面,基本上仍坚持“产品”经济观,因此,他的经济改革从来没有把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和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作为主线。这就不可能改变行政指令的计划体制,结果只能是地方行政指令代替了中央行政指令。加上赫鲁晓夫改革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唯意志论色彩,导致后来苏联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对地方处于失控状态,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困难。

第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严重弊端缺乏深刻的认识,亦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主要不是由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体制的产物,加上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在国内与国际上引起的复杂局面所形成的对他的压力,使得赫鲁晓夫不能把非斯大林化与体制改革合乎逻辑地一致

起来,将它们视为相互促进的同一进程。这就导致赫鲁晓夫后来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的动摇与后退。

第三,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的领导人,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他不具有把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素质与能力。后来,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也在充分利用斯大林的独裁主义体制,自己也搞起了个人迷信。

通过一场真正的“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14日取代了赫鲁晓夫。他执政18年(1964—1982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为此,我们用了较长的篇幅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的表象是稳定。而人们往往忽视更重要的一点: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意味着停滞。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如果把把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的角度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的重新斯大林化”。从最近十多年来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大量材料来看,可以确定地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剧变准备了条件。就是说,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这是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中的确切定位。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与重新斯大林化,在政治体制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这反映在很多方面:

一是党政集中领导体制的恢复与加强。主要体现在: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大大发展。1977年5月,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一时期,在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

比过去更多。

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像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事情，也只是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后做出决定的。个人集权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

二是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对他的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到1976年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和吹捧之词已达到令人作呕的程度。如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小地》等几本小册子，获列宁文学奖，到1981年底竟出版1960次；1978年11月12日的《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这些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人们把它看作是一出荒诞剧。没有人相信报纸上说的是真的，这样做只能增加人民对领导、对党的不信任。

三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变动很小，18年只换下12人。终身制的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为75岁。地方党政机关也存在同样的情况。1974年12月，勃列日涅夫两次中风，病得很重，但还活了八年、统治了苏联八年。这时，他实际上已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开会时，勃列日涅夫茫然地坐在那里，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有谁，应该做些什么。

十分明显，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主导方面是恢复传统的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是朝着进一步僵化和集权化方向发展，谈不

上改革,如果与赫鲁晓夫时期比较,不少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

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是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要解决的任务是克服赫鲁晓夫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并向“新经济体制”过渡。从18年的改革进程看,勃列日涅夫经济改革的主要原则是: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管理经济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与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实现以上三项改革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应该说,上述改革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有可取之处。这一改革思路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病,但可以缓解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矛盾。如果改革不断深化,最后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发展,并且不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消除来自这方面对经济改革的阻力,那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遗憾的是,1965年苏联实行“新经济体制”时,改革原则贯彻实行一段时间后,逐步后退,以致最后未能实现,经济体制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触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一是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样,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理论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一个时期。二是因循条规、求稳抑变的思想导致改革的停滞。在贯彻改革政策时,明显表现出保守性,改革只允许对传统体制进行修补;改革缺乏坚决性,遇到阻力和困难就动摇、退缩,1971年之前,苏联经常使用“改革”一词,而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而改用“完善”一词;改革缺乏综合性,没有一个可行的全面的改革总思路。后来,勃列日涅夫对改革已经厌烦,一次他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以下的话:“看他想出什

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这个改革。”<sup>(1)</sup> 三是对勃列日涅夫来说,为了推行“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和推行帝国野心政策,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在勃列日涅夫后期,扩军、争霸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已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的漩涡。正如有些苏联知名人士指出的:“如果我们公布实情:我们在军事需要上花的钱要比美国多1.5倍。”<sup>(2)</sup> 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把苏联军事实力推向“鼎盛”时期的。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的停滞给苏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经济的停滞。这一时期的停滞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全面的停滞,这自然有个发展过程;二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开始了新的科技革命的条件,这种停滞意味着社会的倒退;三是在停滞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消耗着苏联存在的各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从而使苏联逐步走向衰败。

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造成的严重社会经济后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政治问题日趋增多与尖锐:弄虚作假、言行不一盛行,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党已不那么相信;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与独断急剧发展成了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道德堕落,酗酒、吸毒与犯罪日益滋长;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的文化、艺术盛行;政治上的奉承、送礼、滥发奖章与勋章等,大大

(1)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2) [俄罗斯]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页。

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时代是“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生活军国主义化;特权阶层扩大化;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2. 经济增长率递减和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的一个苦果是大量严重的经济问题。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1966—1970年,社会总产值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4%与7.8%,而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1982年,它们分别下降为3.3%与2.6%。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个低速增长并不反映这一时期的实情。这其中,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猛涨起了很大作用。据保守的估计,1974—1984年苏联获得的石油美元约为2700亿—3200亿美元。另一个因素是靠生产和销售对人体有害的酒精饮料。如果排除上述两个因素,苏联有差不多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

农业严重衰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突出经济问题。在这一时期,苏联进行了巨额农业投资,但由于在农业体制方面未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并没有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1979—1982年出现连续四年歉收。农业不断恶化直接影响着市场供应,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的多次讲话中谈到,食品问题已成为苏联“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3. 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的低效日趋严重。应该说,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脆弱性,它是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4. 与上述问题有关,粗放型的投资是导致经济效率低和浪费



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勃列日涅夫时期投资的特点有三：一是投资规模大，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二是贪大、战线长，导致未完工程大幅增加。1982年未完工程为1089亿卢布，比1965年的296亿卢布增长了2.68倍，占当年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1965年的69%上升为1982年的84%。三是投资效益大大下降，1980年与1970年相比，每卢布投资产生的国民收入增长额下降了36.4%。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恰图罗夫计算，每增加1卢布的国民收入所需要的基建投资在1951—1955年为1.81卢布，到1976—1977年则需要6卢布，增加了2.3倍。1977年，苏联同美国相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的投资额高出近50%。

5. 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之所以很快在军事实力方面达到“鼎盛”与“顶峰”，除了由于当时苏联坚持旧的外交思维这一主要因素外，还因为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把军人视为他掌权的非常重要基础。不少人指出：“军人与斯大林分子”是勃列日涅夫统治的“两大支柱”。

巨额的军费开支成了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这使苏联经济年复一年地衰败下来。没有任何敌人像军国主义那样吞没一切。

军备竞赛导致苏联经济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6. 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首先是从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开始的。与此同时，扩大了思想限制的范围，赫鲁晓夫时期与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准许讲的话，甚至领导人在崇高的讲台上讲过的话，后来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在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也在走回头路。

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

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化，决不是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其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

以上就是执政18年、胸前挂满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闭上双眼时给苏联留下的沉重“遗产”。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两位领导人，在对待改革和个人品行、素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也有共同点：一是执政时间都很短；二是年老体弱，身患疾病。（安德罗波夫执政14个月，上台任总书记时已68岁；而契尔年科执政仅13个月，上台任总书记时已73岁）

安德罗波夫在成为第一把手前，于1982年5月接替了1982年1月去世的苏斯洛夫，任苏共中央书记，成了第二把手。他又当过克格勃的头。因此，安德罗波夫十分了解在勃列日涅夫逝世时苏联的状况及面临的严峻形势。他也理解，苏联社会并没有从斯大林主义中恢复过来。因此，他看到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苏联围绕体制改革问题展开的各种形式的讨论，其深度并不亚于赫鲁晓夫时期的1962年。讨论的首要问题是，在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应该说，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是带了头的。他在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当前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

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为了促进体制改革，在理论上探索改革必要性的同时，还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把勃列日涅夫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建成论”改为“起点论”；强调所有制的变革是长期

的、多方面的，不应该是简单化的进程，并认为在理论上是可以把占有方式与经营方式区别开来的；探索了民主管理问题，强调管理民主化对推动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等等。

安德罗波夫在短短的执政期间，除了花大力气整顿劳动纪律外，还在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在工业中实行了一些扩权的措施。这些改革措施虽使1983年经济状况好于1982年，但总体而言，由于时间很短，改革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但苏联一些人士认为，安德罗波夫时期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

遗憾的是序幕与序曲刚开始，安德罗波夫便于1984年2月9日逝世。之后病魔缠身的契尔年科上台。他执政的13个月，被称之为处于濒死状态与白白浪费时间的时期。苏联人对他的上台感到是一种屈辱，是一个负担，不愿意谈论这段历史，但不能抹掉这段历史。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1984年要任命“已患有严重的疾病，而且不得人心”的契尔年科任党的总书记？必须揭发使契尔年科上台的“根源”。实际上，寻找这个“根源”并不难，那就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后来又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继承下来的并得到不断发展的腐朽的政治体制。

## 五

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仅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先后三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病亡。人们都还记得，1985年3月初，即在契尔年科逝世前几天，苏联电视台两次播出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契尔年科在别人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电视摄像机前面的情景。这不仅使苏联人感到厌恶，并且似乎在向全世界告示：斯大林的苏联社

会主义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由此，苏联人民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苏联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那样的人上台执政了，他们需要一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二是使人更懂得，苏联是多么需要改革，而且是根本性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1985年3月11日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联第八位也是最后一位最高领导人的。他的上台，当时是众望之所归。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状态的严峻形势，使戈尔巴乔夫深切地感到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而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耽误，哪怕是耽误一天”。<sup>①</sup>他把改革看做是自己的毕生事业，视为时代和苏联现实赋予他的历史使命。力图通过改革重建苏联，振兴苏联。

但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的解体、苏联的“亡”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何评价，对他的改革与苏联发生剧变的关系等问题，至今存在不同的看法，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考虑到这些情况，本书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动荡与解体》单列一编，用较大的篇幅加以论述。

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大体上说，他的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苏联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1988年6月至1990年初，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

---

<sup>①</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57页。

议为标志,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社会出现了混乱和动荡;第三阶段为1990年初至1991年“8·19事件”发生前,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接受了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的现实,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苏共由党内意见分歧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激进民主派开始左右苏联政局;第四阶段为1991年“8·19事件”后至同年年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宣告失败,其标志是苏联发生剧变,苏联不再存在,“亡”了。

戈尔巴乔夫虽然执政时间不长,总共才六年,但这是大变革的六年,是充满着矛盾、斗争与有着很多历史事件的六年。要正确认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以及它与苏联剧变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对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并弄清提出这些思想的历史背景。

首先是公开性与民主化问题。戈尔巴乔夫早在1984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前,就曾详细论述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他一再强调,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与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他还认为,公开性是个政治问题,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民主。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大力提倡公开性与民主化,其目的是为了调动群众参与改革的政治积极性。应该说,这在当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在调动群众积极参与改革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从原则上讲,提倡公开性与民主化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在公开性与民主化实施过程中,很快就走向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与片面夸大民主的极端,整个社会陷入“政治热”,导致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亦为各种反对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准备,社会日益处于失控状态。

其次,关于“新思维”问题。1987年,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他在书中指出:“新思维”是核时代的政治思维,它一方面是针对核战争和国际政治问题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总的来说,苏联一直用冷战思维对待国际政治问题,“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sup>①</sup>另一方面,“新思维”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面临急剧转折时期提出的,目的在于指导苏联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初期提出“新思维”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一是尽可能消除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因素,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减轻苏联沉重的军费负担;二是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消除以往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对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三是确立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关系,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四是为国内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调整了外交政策。

不可否认,“新思维”对苏联所处时代的重新认识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改变了通过革命和暴力手段战胜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放弃了把苏联模式和苏联发展道路绝对化的观点,承认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否定了两个世界,即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当然,“新思维”并不是一种完善的理论体系,存在不少相互矛盾与含糊不清的东西。例如,作为新思维核心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虽有其合

---

<sup>①</sup> [俄罗斯]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13-14页。

理的成分,作为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主动的宣传口号,动员进步人类与可能导致核战争的威胁进行斗争,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但它并不能成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准则,因为它模糊了核威胁的根源;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将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混淆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当今世界,在实力外交与强权政治的条件下,抽象地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以此观点进行实际外交的操作,也是不切实际的。

另外,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有些人认为,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主要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关。这个说法是值得推敲的。

这里不妨分析一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提出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就着手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2月提出“根本的经济改革”方针,强调苏联的政策是在“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的方针下进行的。但后来发现,经济改革遇到很大阻力。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前几年推行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改革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教条主义理解产生的保守思想。当时苏共认为,必须迅速改变社会意识,改变人们的心理与思维方式,否则改革就难以推进与取得成功。1987年的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接着,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大会上又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充分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从戈尔巴乔夫发表的论著与讲话看,他有关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有:目前的社

会主义概念还停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水平上,而那时苏联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任务;在苏联并没有完全贯彻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改革的目的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到了 1988 年 6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但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未采用这一概念,说明它尚未被全党接受。1989 年 11 月 26 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1990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使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题目。这是该概念首次进入党的正式文件。这个概念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人道主义与自由,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公有化的和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公正;真正的人民政权;高度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主张和平与合作。

从上述分析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到 1990 年才正式形成,苏联才刚刚开始付诸实践,而东欧国家 1989 年就先后发生了剧变。当时人们并不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

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相关,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要把解决人的问题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一切事情都必须从人出发,还提出“全面落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与解决人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一个要害问题是践踏了人,不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尊严,把人视为集权管理体制上的一个螺丝钉,从而使广大劳动者疏远政权、公有制与管理,使人的精神与肉体处于麻木的半睡眠状态,导致思想的单一化和停滞



不前,社会缺乏活力,从而产生异化,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最终结果是使社会主义濒临危机,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苏联“亡”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有其十分复杂的因素,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 1. 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失误。

首先,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同时,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而是实行加速战略。这是走错的第一步。

在苏联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严重畸形的条件下,在推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时,必须同时下大决心和采取重大战略性措施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即在改变旧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同时,应及时改变经济发展战略,使后者与前者相适应,并为前者创造有利的条件。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后不久就推行加速战略。对加速战略作一简单分析就可发理,其主要失误和消极后果有:

(1) 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的需要。正如苏联一些经济学家所说:苏联经济的发展政策仍是背离“一切为了人的福利”这个口号的,变形的国民经济结构“是背向人的”。

(2)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来看,加速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政策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由于加速的重点仍放在重工业,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失调,经济更加不合理,从而使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

(3) 加速战略的直接后果是使消费品市场更加紧张。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市场上出理的是全国短缺。这种经济状况使广大群众感觉不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实惠,从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逐

步失去信心。这又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困难。苏联一些学者在总结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的教训时普遍认为,没有把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与经济改革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而实行加速战略,这是一大失误,并认为,在结构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已输掉了第一个回合。

其次,经济体制改革未从农业开始,农业改革滞后,是戈尔巴乔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体制改革应从农业开始,这有其客观必要性。对苏联来说,这种必要性更为明显:

(1) 由于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2) 由于苏联长期实行剥夺农民的农业政策,强制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因此,农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亟需通过改革加以调整,以便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3) 苏联在农业管理方面,一直忽视集体所有制的特点,像对国营企业一样,下达大量指令性指标,从而不能使农业因地制宜地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对农业生产所起的消极作用要比工业部门大得多,因此,改变农业管理体制显得更为迫切。再说,农业改革相对于工业来说,其难度要小些,在农业中商品货币关系较容易起作用,而且一般说来比工业部门的改革见效要快些。

(4) 市场供应紧张是苏联长期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市场问题中,主要是消费品供应问题,而消费品中最为突出的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

(5) 还应指出,苏联要调整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尽快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农业的状况。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失误使得改革难以奏效。

1987年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方案,确定从企业改革入手,并围绕建立新的企业经营机制来改革宏观调控机制。这一改革思路从总体上来说是可取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微观与宏观改革措施不衔接是个突出问题。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总目标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为此,这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是解决企业作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为此,要求改变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与管理方法,改革宏观调控的手段,即由行政指令改为经济方法。但在实际改革过程中,宏观调控机制改革或是滞后,或严重扭曲,或是原封不动。就是说,没有为企业成为真正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创造外部条件,企业无法搞活,因而企业改革往往处于“空转”状态。

微观与宏观改革不协调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是:宏观调控措施不力和不配套。在扩大企业权利的同时,并没有提高企业的经济责任。

第四,戈尔巴乔夫把在政治领域中实行的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是导致经济改革踏步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执行的政治策略是一种妥协策略,这是十分明显的。他利用一个极端来削弱另一个极端,还善于使自己的今天与自己的昨天、明天妥协。把这种妥协策略运用到经济体制改革中来,就会带来十分有害的作用。

(1) 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正确的改革方针、方案和措施一旦以决议的方式确定下来之后,就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因受到各种阻力而摇摇摆摆,这样会使改革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往往使改革半途而废。

(2) 妥协策略的结果,使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内容本身包含着很多矛盾,很难在实际中推行。

(3) 伴随妥协策略而出现的政策多变,必然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变得模糊不清,使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弄清改革的方向。这样,改革的拥护者日益减少,对改革领导人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连一些有名的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也感到摸不清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底牌是什么、究竟朝什么方向发展。

(4) 改革的反对者,利用妥协来争取时间,集聚反改革的力量,一有机会,就向改革派进攻,打乱改革派的阵脚,或者是钻妥协政策的空子,扭曲改革方针,使其变形,达到阻碍改革的目的。

(5) 妥协策略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各种消极影响,最终都能使经济改革速度放慢,贻误时机。

2. 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严重错误,逐步失去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在改革的准备阶段,只考虑如何进行经济改革,没有触动政治体制改革;后来发现,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经济改革的政策难以推行,或是在推行过程中被严重扭曲。这使得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整个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逆转的重要保证。这个思路是对的,但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政治体制改革搞得过激,一下子铺得太宽。结果是,一方面冲破了多年来苏联社会死水一潭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亦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旧的政治体制被摧毁,新的又未运转起来。这样,正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的:苏联这艘船成了无锚之舟。它漂泊摇曳,大家也随着摇晃。

在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等措施的同时，并没有及时加强法制建设，将“民主化”、“公开性”纳入法制轨道，从而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和社会严重动荡。

干部调整过多、过于频繁。

在实行党政分开、权力重心由党转向苏维埃过程中，由于行动过快，缺乏周密安排，形成了权力真空。

1988年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后，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形势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处于失控状态，被牵着鼻子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花在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问题上。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犹如打开了泄洪的闸门，却没有能力控制洪水泛滥。到后来，竟发展到宣布解散共产党，禁止党的活动，改革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

### 3. 不能忽视阻碍机制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影响。

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这种机制在过去就存在，为什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我们特别强调它对改革的阻碍作用呢？因为到了这个时期，苏联传统的体制在经过几十年的不成功的改革后，变得十分“成熟化”了，它已根深蒂固，墨守成规、对理论持教条主义态度、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已是厚厚的一层。客观地讲，到了这个时期，要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已经十分困难了，已是积重难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从苏共领导到学者，都十分重视对阻碍机制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

从政治关系看，由于苏联政权具有经过周密安排的职务上的等级制度，加上有一个保证国家对经济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直接集中领导的系统，从而产生党和国家的职能实际上的

相互重叠、难以分开，所有大权都集中在由上面任命的、不向人民汇报的行政领导阶层手中。在这种政治制度下，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生长繁殖，使得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全体人民，都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无法实现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

从经济关系看，称之为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是苏联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所有制只把劳动者看作是活劳动的体现者，而未能使劳动者成为它的主人。在高度集中管理国家财产的条件下，这种所有制形式的空洞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财产的分配以及财产的有效使用和增值，与生产者没有现实的利害关系。

从社会关系看，由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是以庸俗的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的思想为依据的，因而对各个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不相同的观点持轻视和隐讳的态度。

不少学者对阻碍机制的基础作了以上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阻碍机制是僵化的经济形式、陈腐的政治组织体制、无效的领导方法和管理杠杆的总和，它阻碍着已成熟的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体现，束缚着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并使其进步的速度放慢。”他们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官僚主义是阻碍机制的主要社会力量。”有的学者是这样解释这个结论的：官僚主义者生活在一切都颠倒过来的“办公室”世界里，他们首先是为人“谋前程”，为了在职务的阶梯上提升、当官以及每升一级就随之而来的物质福利和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当官威风”是官僚主义者相当流行的人生哲学。他们盲目相信从属关系和权威，盲目相信硬性规定的形式主义化的行动以及现成的世界观和公式。就其本质来说，他们是教条式的，对变革特别反感，并疯狂地加以反对。他们压制各种不听“上面”意见和富有创造精神的人，不相信劳动群

众的经验和对国家大事的思考。<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院士阿尔巴金在1987年5月访华时,对阻碍机制也作了分析。他认为,所谓阻碍机制是指阻碍事物前进、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因素,而不是个别的东西和因素。阻碍机制在苏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教条主义理论;二是在这个理论上产生的经济管理方法;三是苏联国民经济比例本身的失调;四是干部因素,主要是官僚主义。

我们对戈尔巴乔夫六年改革进行评价时,应该理清以下问题:

第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严重失误,特别是后期改革迷失方向,是苏联发生剧变现实的和直接的原因。

第二,更应看到,苏联的剧变有其十分深刻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仅仅停留在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这一直接原因去分析苏联剧变,只能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件大事的发生总有它的基础和导因,这种基础因素是决定性的,是历史发展中带有必然性性质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存在,导致事物在一段时期内的结束”。因此,在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同时,应该看到,“这种责任只能是直接意义和浅层次上的,是表面上的,属于导因性质,它诱发了社会内部长期以来的根本矛盾,离开了这些根本矛盾,戈尔巴乔夫的作用便无法去理解,也不可能存在”。<sup>②</sup>就是说,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

<sup>①</sup> 参见[苏联]《真理报》1987年6月12日。

<sup>②</sup> 郭焕成:《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对比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2年第1期。

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提供的深刻教训做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总结。

第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但不能因此对其在改革过程中提出的、在对苏联社会主义重新思考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采取简单的完全否定的态度。

第四，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本人的研究，由于十分复杂，不少问题不能说已弄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在一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看来，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这对深化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应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不能把戈尔巴乔夫六年的改革说成是个“闹剧”，不能用各种讥讽的语言代替科学的研究，更不能用某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制造的谎言作为根据，极不慎重地对戈尔巴乔夫做出政治结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在苏联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01年3月2日向戈尔巴乔夫祝贺70寿辰的信中说的：“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站在这样一个高度研究这一时期的苏联及其改革，有利于研究的深化。

## 六

本书的结束语，是在前面各编分析了苏联兴亡过程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以下八个方面简要地总结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

(一)在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



(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改革,必须不断地消除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观念与错误认识。

(三)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四)苏联长期以来,没有把通过发展生产来不断地提高人民生活的政策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苏联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弊端是缺乏必要的民主。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既不能使人们富裕,又不给人民民主,这种社会制度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五)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群众不断前进。苏共失去领导权,最后被取消,归根到底,是由于它没有注意自身的建设,不断犯错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的教训主要有:1.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永远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2. 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要注意发扬党内民主;3. 要坚决反对腐败。

(六)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其次,知识分子的多数是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劳动。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探索,允许犯错误。要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宽松的环境。

(七)在多民族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结合本国国情,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对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解决这一

---

问题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

(八)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体制改革时,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 第一编 十月革命前的 沙皇俄国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先进民族和国家相比，俄国总是要慢几个节拍。18世纪初，以彼得一世改革为标志的俄国“封建帝国主义”步入鼎盛阶段，而此时，西欧已相继完成或处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与此同时，那里的封建帝国制度也先后解体或衰落。当19世纪中叶俄国开始废除农奴制改革时，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波及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全盛时期已经到来。

正是俄国几百年历史的滞后和缓慢发展，日积月累为历史的重负，形成了难以根除的传统沉痾。不彻底抛弃这些历史形成的重负和积淀，俄国便无法继续前进和获得新生。这是进入20世纪后，摆在俄国面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 第一章 18 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及俄国的“封建帝国主义”

### 第一节 彼得一世改革使俄国“封建帝国主义”进入鼎盛阶段

公元 9—10 世纪东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形成的古罗斯国家,在原始公社瓦解后,没有经过奴隶制就进入了封建社会。11 世纪《罗斯法典》的颁布与完善,标志着封建农奴制的确立。也正是由于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在以后,俄国封建制一直带有深深的奴隶制印痕。从外部环境看,自 16 世纪末以来,俄国与欧洲强国争夺势力范围屡遭失败,这成了俄国统治者寻找建立稳固、强大封建帝国新出路的内在动力。

沙皇彼得一世(1721 年改称“彼得大帝”)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推行的。彼得一世的改革分三个阶段进行:“1700 年至 1707 年为积蓄力量阶段;1707 年至 1714 年为俄国荣跃兴盛阶段;1714 年至 1721 年为建立良好秩序阶段。”<sup>①</sup> 彼得一世改革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具体分析这次改革的目的、策略手段、具体内容和后果,对于深入认识俄国的历史传统及其对以后俄

<sup>①</sup>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 218—219 页。

国(苏联)社会的演变发展的影响,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一、俄国历史传统的急剧膨胀:改革的 战略目标与策略运用

彼得一世首先从改组军队入手,将以往组织松散、纪律涣散的射击军<sup>①</sup>改造为适应战争发展需要的常备军。1699 年彼得一世颁布敕令,规定按比例从自由民中抽取兵丁。1705 年的敕令进一步明确规定,每 20—30 农户和工商户中抽丁一人。在 1699—1725 年间,总共征兵 53 次,共达 28 万多人。<sup>②</sup>从此按户抽丁的义务兵役制固定了下来,从而保证了军队所需的兵源。为了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彼得一世调整、改组军事指挥系统,聘请外国人出任军事顾问,派遣贵族子弟到欧洲先进国家学习军事技术,在国内开办军事院校和各种军事技术训练班。彼得一世深知严格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为此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条令和规章制度。特别是 1716 年制定的“军事法规”和 1722 年颁布的“海军章程”等,在军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国原是内陆国家。历代沙皇无不为了争夺出海口而苦心经营,但往往收效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彼得一世的治国名言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如果只有陆军,他就只有一只手,如果他也有海军舰队,他就有两只手了。”<sup>③</sup>他亲手制定的

<sup>①</sup> 射击军是沙俄早期的常备武装力量,主要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警察职能,常用来保卫皇宫和皇室成员的安全。

<sup>②</sup>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 224 页。

<sup>③</sup> [苏联]尼·伊·帕夫连科著,斯庸译:《彼得大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116 页。

“海军章程”中更是强调：“只有既具备陆军又具备海军的人才是双手俱全的君主。”<sup>①</sup>

实行军事改革、扩军备战，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为此，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力扶持、发展军需工业，为军队提供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需品。为了发展军需工业，彼得一世通过行政命令手段，逼迫商人贵族开办大型工矿企业和兴建官办工场，并提供贷款、津贴、免税权和垄断权等优惠条件。兴办企业需要大批劳动力，彼得一世便发布命令，允许工场主把整个村庄的农民买到企业做工。他还亲自给乌拉尔地区的工矿企业拨去2.5万名农奴。彼得一世的军事改革，奠定了俄国工业发展的特有基础和模式。正如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时期所推荐的，“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sup>②</sup>

“金钱是战争的动脉。”扩充军队、建立海军、兴办军需企业，都需要巨额费用。资金从何而来？彼得一世时期，俄国人分为两个等级，即贵族和僧侣是免税特权阶层，而广大农民和市民属于纳税阶层。为了强化贡税制，彼得一世将原来的按户征税改为按人征收统一的“人丁税”。在对全国人口进行调查和核实登记的基础上，彼得一世于1723年颁布政令，规定地主农奴每人课税40戈比，国家农奴为1卢布14戈比，城郊市民为1卢布20戈比，家用奴仆和老

①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225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15页。

人、小孩也要交纳人丁税。<sup>①</sup>这样,仅1724年国家收入的850万卢布中,来自人丁税的就有460万卢布。人丁税的实施,使农民的赋税猛增近三倍。除人丁税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甚至连留胡子、洗澡、磨刀等都要课税。

彼得一世改革还涉及到开凿运河、发展科教文化等多方面。但无论哪方面的改革,都首先与发展、壮大军事实力紧密相连。正如一些传记中所揭示的,简化印刷字体和倡导翻译出版外国书籍,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军事无关,但只要浏览一下当时出版的书单,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讲军事的书籍,而用新字体印刷这类书只是为了易于阅读而已。<sup>②</sup>

## 二、建立在严格等级制度上的绝对君主制国家

维护封建贵族社会的统治秩序,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和巩固专制制度,是彼得一世改革的另一项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整顿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加强封建集权制。改革前,俄国拥有实权的国家行政事务管理机构为波雅尔杜马(又称领主杜马)<sup>③</sup>,下设许多政厅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具体事务。1689年彼得一世亲政后颁布法令,明确宣布:“沙皇陛下是专制君主,世界上没有

---

① 还有一种说法,所有农奴每年应交人头税74戈比。参见[苏联]尼·伊·帕夫连科著、斯庸译:《彼得大帝传》,第360页。

② 参见[苏联]尼·伊·帕夫连科著、斯庸译:《彼得大帝传》,第248—249页。

③ 16世纪前期,俄国建立统一的集权制国家后设立的有实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地位显要和有势力的王公贵族、领主组成。



一个人的事他不该管”。<sup>①</sup> 随后，便发布诏令设立只对沙皇本人负责的最高国家管理机构——参议院，以取代波雅尔杜马。参议院成员均为沙皇的亲信部属，下设陆军、海军、外交、开支、税务、矿务、手工工场、商务、监察、领地和司法 11 个委员会和专门负责监督地方的监察厅，统一掌管全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为了监督参议院绝对效忠和服从沙皇，彼得一世特别设立了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特权的总检察官。总检察官的职责是，只对沙皇负责，严密监控参议院的活动，惩办参议院成员的不轨行为。彼得一世将总检察官视为“国君的眼睛和国家事务的司法稽查官”。<sup>②</sup>

其二，调整区域行政部门设置，加强封建集权的地方管理机制。彼得一世极为关注地方行政部门设置，历经二十多年的反复调整，最终在俄国首次建起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系统。首先，在俄国两个主要城市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设置由沙皇直接掌管的市政总局与市政厅，各地有影响的城市均设隶属于市政总局的市政局。各类市政局均由城市的富裕阶层尤其是被列为“第一等级”的工商巨富组成。<sup>③</sup> 这样，沙皇彼得一世就把城市富豪、巨商和大工场场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了。其次，在俄国其他地区（省和州）设区域行政机构。全国划分为 11 个大省，由沙皇直接委派的省总督掌管军政大权。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监控，1719 年地方行政改革又

①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 2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23 页。

③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城市居民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在“上等”公民中，工场场主为第一等级，小商和拥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者属第二等级，其余处于贫困阶层的居民为“下等”公民，也称作“非正规公民”。规定，只有“上等公民有资格参加市政选举。由于财产实力的悬殊和当局的全力扶持，市政机构实际由所谓第一等级的最大富豪把持。

将全国划分为 50 个州，州长由中央管理机构任命并直接对最高当局负责，每个州管辖若干个区，州和区均有完整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此外，省和市都设有监察地方官吏的监察官，并直接受命于中央参政院的监察厅，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控与统治。

其三，削弱教会僧侣势力，将神权和政权集于沙皇一人手中。17 世纪以前，教会僧侣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拥有能够左右国家政局的巨大实力和权力。彼得一世期间，首先采取措施限制、削弱教会的经济实力。1701 年下令将部分教会的财产和领地收归国有。随后，1721 年颁布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规定东正教牧首（总主教）职位由沙皇任命的非宗教人士组成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取代，主持日常宗教事务和管理僧侣人士。这样，教会的使命仅限于在精神领域开展活动，绝不容许它干预政治。俄国的主人只有一个，即沙皇，教会也必须听命于他。

其四，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建立和完善官僚特权等级制度。以往的贵族等级制度已不能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彼得一世在位期间，破除旧的门阀制度，通过实行“论功取仕”和制定条令章程等措施，形成一整套效忠沙皇的新的官僚特权等级制度。特别是 1722 年颁布的《官秩表》法令，将文职官员分为 14 个等级，军队中也从准尉到大将、元帅分为 14 个等级，各级官员均规定有严格的相应权利与义务。此后，彼得一世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等级制的基本框架，长久地影响着俄国乃至苏联，并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 三、俄国的强盛和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深化

彼得一世以军事改革、行政改革为两大支柱，自上而下强制推

行改革的结果是使俄国成为高度集权的军事封建帝国。

到1725年彼得一世去世时，俄国已拥有一支二十多万人的庞大军队。海军从无到有，其中波罗的海舰队有35艘大型战舰、10艘巡航舰和近百艘小型战舰，水兵2.8万人。俄国自此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伴随着扩充军队，应运而生的军需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各地兴建了许多兵工厂、冶金工厂以及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军队需要的其他行业。到彼得一世统治的末期，俄国已有二百多家较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其中冶金业发展最快，18世纪中叶俄国生铁产量已超过英国（180万普特），达200万普特，有炼铁厂和锻压厂75家（其中乌拉尔地区有61家），成为欧洲主要产铁国之一。<sup>①</sup>

凭借日益强盛的军事实力，彼得一世不断向外扩张领土，抢占势力范围。首先，向俄国西部扩张，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及其沿岸地区。通过18世纪历时二十余年的北方战争，迫使主要对手瑞典就范，实现了沙俄上百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为表彰彼得一世这一功绩，他被沙俄贵族尊称为“全俄罗斯大帝”和“祖国之父”。其次，向俄国南部和东部扩张。仅彼得一世去世前的十余年间，就强占了黑海和高加索地区，使俄国版图向东延伸一大片。

由于不堪忍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贵族地主的双重压榨，还在彼得一世改革最为轰轰烈烈的时期，就接连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各阶层的反封建起义。这个期间发生过持续近一年的俄国东南部重要工商业港口和军事政治中心阿斯特拉罕的城市居民反封建起义（1705—1706年），顿河流域哥萨克农民起义（1707—1708年），巴什基尔地区各民族人民长达五年多的民族起义（1705—1711年）等。1725年1月28日沙皇彼得一世死后，各种形式的人民反封建

<sup>①</sup> 以上数字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236、284页。

专制斗争更是连绵不断。同时，贵族统治集团上层争夺皇位斗争白热化，宫廷政变频繁，宠臣显贵专权暴虐，但对外侵略扩张却从未间断过。

彼得一世期间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彼得一世改革加强了俄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并使之迅速发展为高度集权的军事帝国。另一方面，改革的结果深化了封建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意味着沙俄封建帝国由鼎盛时期逐渐走向衰落的开始。

## 第二节 叶卡捷琳娜二世从“开明专制”到复旧

1762年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其夫——仅在位一年的彼得三世，登上皇位，称叶卡捷琳娜二世，从而结束了自彼得一世以后的三十多年的政权剧烈动荡。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的34年（至1796年），是俄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又一重要历史时期。正如著名学者瓦利舍夫斯基所指出的，研究神秘莫测的现代俄国，“要摸清这个组织的底细，首先就应该研究叶卡捷琳娜，因为现代俄国多半不过是这位伟大国君的遗产”。<sup>①</sup>

18世纪下半期，正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之际。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了维护正在削弱的沙俄帝国和封建秩序，对内使用“开明专制”和严酷镇压双管齐下的统治手腕，对外继续推行彼得一世的军事扩张政策。

---

<sup>①</sup> [波兰]卡瓦利舍夫斯基著，姜其煌等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序言第3页。

## 一、西方启蒙运动与俄国土壤上的“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也称“开明君主专制”，起源于18世纪西欧启蒙运动，尤以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为突出代表。

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出生于普鲁士王公贵族家庭的沙俄女皇，自幼受欧洲传统文化的熏陶，对西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尤感兴趣。在俄国即位后，她从欧洲启蒙运动中汲取对自己有利的某些主张，试图推进所谓的“开明专制”。她通过调整中央集权机构、设立最高宫廷会议、限制教会势力、颁布圣谕和成立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等形式，扩大了贵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赋予大商人和工场主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市民依然是既没有地位，也没有任何权利。这种所谓“开明专制”在大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同时，却在进一步加强以沙皇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在把农奴制描绘成幸福的乐园的同时，却授权贵族地主可以任意买卖、处罚和流放农奴，使其处于封建主更为严密的绝对控制之下；在主张开明政治的同时，却在加强对全社会的监督审判系统，残酷镇压和消灭一切反抗者；在倡导发展国民教育的同时，却又极力主张“不应该让平民受教育，因为等到他们懂得和我们一样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服从我们了”。<sup>①</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所谓“开明专制”终归无法医治俄国的封建制度，只能使固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深化与尖锐。

---

<sup>①</sup> 参见苏联科学院主编、北京编译社等译：《世界通史》第5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90页。

## 二、沙俄的不断扩张与封建帝国的反动

叶卡捷琳娜二世继续实施以军事为手段的领土扩张政策。南部进入黑海，西部兼并波兰，北部把芬兰视为彼得堡的屏障。巩固并扩大俄国在彼得一世时所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地位，则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主要目标。

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波兰不仅是欧洲大国，而且是确保俄国向欧洲扩展的战略要地和“地理据点”，为历代沙俄君主向往和扩张的首选目标。<sup>①</sup>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并不满足于对波兰的局部征服。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战争（1768—1772 年）历时近五年，结果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彼得堡签订瓜分波兰的条约，俄国占领了西德维纳河、德鲁奇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地区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面积达 9.2 万平方公里，人口 130 万。<sup>②</sup>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叶卡捷琳娜二世极力鼓动普奥两国国王镇压法国革命，实为转移普奥两国视线，趁机独占波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法国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sup>③</sup>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反对波兰制定削弱沙俄控制的新宪法为由，于 1792 年出兵 10 万侵入波兰并占领全境。次年初，俄普缔结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彼得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第 25 页。

② 参见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波兰通史》第 2 卷，第 1 分册，第 76 页，华沙，1958 年俄文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第 27 页。

堡协定》，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一部分及乌克兰的大部分并入俄国，共计 25 万平方公里。仅一年后，沙俄与普奥“联合行动”，共同出兵残酷镇压波兰抗击外国入侵的克拉科夫起义。1795 年，俄普奥三国签订了第三次瓜分波兰的条约。俄国又一次得到了立陶宛、库尔兰（拉脱维亚西部旧称）、西白俄罗斯和沃伦西部（今乌克兰境内）领土，共计 12 万多平方公里，并将沙俄西部边界推进到涅曼河和布格河一带。<sup>①</sup>至此，波兰被俄普奥三国彻底瓜分，其中俄国获得 46 万多平方公里，占原波兰领土的 62%，是三次瓜分波兰获利最大的国家。

叶卡捷琳娜二世为夺取黑海和巴尔干地区，还与土耳其争战（1768—1774 年），占领了该地区大片领土并夺得了黑海出海口。为了彻底打败俄国西南部主要对手土耳其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制定了夺取克里木（克里米亚）和最终肢解土耳其的战略方针。当时沙俄总理大臣米沃隆佐夫上书叶卡捷琳娜二世，说：“克里木半岛的地势是如此重要，的确可以视为俄国和土耳其领土的钥匙，当它属于土耳其的时候，对俄国始终是危险的；反之，如果属于俄国或不附属于任何人，那么俄国的安全不只是可靠的而且是巩固的，那时候，亚速海和黑海就会处于俄国的统治下。”<sup>②</sup>1779 年，沙俄以武力迫使土耳其将克里木半岛及黑海北岸等地区割交俄国。俄国进而发动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2 年），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黑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势力范围，并取代奥斯曼帝国，成为

1 关于第二、第三次瓜分波兰，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1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4—316 页。

②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 361 页；[苏联]德鲁日宁：《1774 年库楚克—凯纳吉和约》，莫斯科，1955 年俄文版，第 66 页。

黑海地区的霸主。为了削弱沙俄北部主要对手瑞典的势力，还进行了历时两年的俄瑞战争（1788—1790 年）。

叶卡捷琳娜二世承袭彼得一世的扩张方针，同样不放弃东侵和南下。南下是向高加索地区推进，先后吞食库班河流域和小亚细亚东部，开辟了通向波斯（伊朗）和印度洋的通道。东侵则是为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和夺取太平洋沿岸出海口创造条件。她还将扩张政策延伸到非洲，同奥斯曼帝国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在北美洲建立立足点并将阿拉斯加等地据为己有。

正是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和强权政治，沙俄不仅是欧洲崛起的封建帝国，而且成为维护欧洲腐朽封建统治秩序的支柱和堡垒。

叶卡捷琳娜二世不仅要巩固沙俄封建帝国，而且急不可待地充当维护欧洲封建旧秩序的旗手。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叶卡捷琳娜二世便发誓要与“法兰西瘟疫”决一死战。随后，她大力扶持法国王党复辟势力，号召欧洲各国君主共同对付法国革命。1791 年，沙俄将曾是其争夺北欧主要对手的瑞典（1790 年俄瑞战争刚刚结束）拉入反法联盟，签订了《关于恢复欧洲均势和法国君主制度》的秘密协定。1792 年法国君主制度被推翻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起草了《关于在法国恢复国王政府》的备忘录，并极力鼓动普鲁士、西班牙、萨丁、那不勒斯等加入反法联盟。1793 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后，沙俄举国哀悼，叶卡捷琳娜二世随即与法国断交并以武力相威胁。1795 年反法联盟瓦解之际，叶卡捷琳娜二世立即重新聚集欧洲反法势力，并决定派遣 6 万俄军开往法国扑灭革命。次年 11 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突然中风死亡，才使得军事占领法国的计划未能实现。此后，沙俄仍是历次反法联盟（1798、1804、1806、1808 和 1813 年共五次）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动者。



叶卡捷琳娜二世临死前，甚至设想建立一个包括六个都城（彼得堡、莫斯科、柏林、维也纳、君士坦丁堡、阿斯特拉罕）的俄罗斯大帝国，而且声称“要是我能活上 200 岁，整个欧洲必将置于俄国统治之下”。<sup>①</sup>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沙俄领土从 1642 万平方公里扩展到 1705 万平方公里，打通了黑海出海口，成为扑灭革命烈火的欧洲宪兵。

### 三、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与强化封建集权制

18 世纪中后期，俄国社会阶级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与连年扩张征战，进一步使社会矛盾激化。灾难深重的农奴们纷纷暴动抗争，仅俄国中部和彼得堡省地区在 1762—1772 年间，起义就不下 50 次。叶卡捷琳娜二世也预感到，“所有农奴都参加的一场大风暴将接踵而至”。<sup>②</sup> 连接不断的农民起义与反抗，最终演变为一场震撼封建统治根基的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普加乔夫农民起义（1773—1775 年）。

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自幼饱尝人间疾苦，痛恨沙俄统治者。他冒充彼得三世，<sup>③</sup> 于 1773 年 9 月 17 日举事反抗封建农奴制度。至

---

<sup>①</sup>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 378—379 页；[美国] 弗罗伦斯基：《俄国——历史与解释》第 1 卷，纽约，1954 年英文版，第 604 页注 3。

<sup>②</sup> 参见[苏联]斯米尔诺夫等著、张书生等译：《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俄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4 页。

<sup>③</sup> 1761 年彼得三世即位，次年其妻叶卡捷琳娜发动宫廷政变取而代之并将彼得三世处死。但民间一直流传彼得三世未死。据统计，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前后有二十余人冒充彼得三世。

此，揭开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的序幕。

起义军初期主要由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巴什基尔、哈萨克和鞑靼等民族的农奴组成，所到之处广大农民纷纷加入，到 1774 年初发展到 5 万人，一度围攻沙皇政府东南地区的统治中心——奥伦堡达半年之久。惊恐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急忙调兵遣将救援奥伦堡，并纠集大军镇压起义。随后，普加乔夫率起义军转战俄国工业中心乌拉尔地区，当地的 124 个工厂中有近七十多个工厂的农奴工人参加了起义。普加乔夫在诏书中指出：“原盘踞于自己封建和世袭领地上之贵族，乃朕之宿敌，帝国之扰乱者及诸农民之摧残者，彼等对尔农民所作所为已背弃基督，故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其逮捕之，处决之，并施以绞刑，灭绝此等顽凶，尔等众人即可大享升平，直到永世无穷焉！”<sup>①</sup>

起义的第二年，义军与政府军在喀山地区决战失利，普加乔夫率余部五百多人转战伏尔加河西岸地区，迎来了又一次农民起义高潮。随着农民起义浪潮逼近沙皇统治的中心地带，数千名贵族地主望风而逃，连叶卡捷琳娜二世都准备将宫廷西迁里加。与此同时，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到全国众多省份，形成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沙皇统治的根基，叶卡捷琳娜二世急忙从与土耳其交战的前线调集重兵，全力镇压起义人民。1775 年 8 月，因力量悬殊，农民起义的烈火被暂时扑灭了。随着农民战争的失败，沙俄统治者立即进行残酷的血腥报复。被俘的普加乔夫

---

<sup>①</sup> 参见《普加乔夫起义》（文件资料集）第 1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 年俄文版，第 41 页；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 339—340 页。

及其战友在莫斯科惨遭杀害。沙俄军队及贵族地主更是到处焚烧村庄,搜捕杀害起义农民,成千上万农民被流放或服苦役。起义者的家属也难逃厄运,遭到株连。

残酷镇压农民的反抗与强化集权统治双管齐下,是沙俄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做法。叶卡捷琳娜二世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其一,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集中管理和控制。在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后的当年11月,便颁布《全俄帝国各省管理体制》的敕令,将彼得一世时期的三级(省、州、县)管理体制改为省、县两级,按人口分布将全国划分为50个省,每个省30万—40万人,县则2万—3万人。这种行政区域划分,主要是为了防范和镇压农民的反抗,使地方行政更集中于封建王朝手中。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是“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官方行政的区划”。<sup>①</sup>

其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皇权监控系统。叶卡捷琳娜二世后期,建成了完善的全国警察、司法系统。在省一级设有执行警察职能的“社会救济厅”和司法机关。县的行政长官则由集行政和警察职能于一身的县警察局长出任,而县法院同时又是县行政机关。城市的行政长官多由城防司令兼任,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最高行政长官则是警察总监。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实行严密监控的警察国家。列宁指出:这一时期“沙皇专制就是人民对官吏尤其是对警察的农奴制依附。沙皇专制就是警察专制”。<sup>②</sup>

其三,进一步强化个人独裁专制体制。叶卡捷琳娜二世一方面不断削弱彼得一世时期形成的国家权力部门,将权力最后集中在由沙皇直接掌管的外交、陆军和海军三个部门;另一方面,削弱参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152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117页。

政院的地位与职能,强化沙皇的直接控制作用。

其四,进一步在民族地区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叶卡捷琳娜二世将民族地区保留的或多或少的“自治”权,视为“是一种极大的错误”。<sup>①</sup>为此,先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等地,强制推广俄罗斯化的集中统一管理体制,消灭各民族间在传统习俗、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其五,进一步扩充中央集权的支柱——军队。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陆军从 1762 年的 33 万人增加到 1796 年的 50 万,成为欧洲各国最庞大的军队。这个时期,波罗的海舰队的实力比彼得一世时有了进一步加强,拥有 37 艘主力舰、13 艘三桅巡洋舰和 30 艘其他舰只。此外,新建了拥有 22 艘主力舰、6 艘炮舰、12 艘三桅巡洋舰以及其他舰只的黑海舰队。同时,沙俄大力发展军火工业,18 世纪后期仅为陆军直接服务的就有 3 个兵工厂、15 个炮厂和 60 个弹药厂。<sup>②</sup>

总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军事封建帝国的发展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关键性步伐。

#### 四、社会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18 世纪后期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沙俄,是俄国封建农奴制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深化的时期。主要表现

---

<sup>①</sup> 参见《苏联史纲(十八世纪下半期)》,莫斯科,1956 年俄文版,第 301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307、318—319 页;《俄国军事史文选》,莫斯科,1947 年俄文版,第 203 页。

是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矛盾——农奴与贵族地主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农奴地位最为悲惨。贵族地主有权随意将农奴当做牲口一样贩卖，当时的报刊上每天都登载出卖和交换农奴的广告，一个女农奴仅值十几个卢布，而一只猎犬却价值几百甚至上千卢布。仅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向达官显贵赠送农奴 80 万人。<sup>①</sup>正是这种民不聊生的悲惨命运，使得 18 世纪末的俄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并从边远地区很快蔓延到农奴制最发达的中部地区。

此外，叶卡捷琳娜二世对非俄罗斯民族实行空前的残酷剥削和高压统治，也促使俄罗斯同其他民族间的矛盾空前尖锐。

---

①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 2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166—169 页；姜其煌为《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作的“译者序”第 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中文版。

## 第二章 19世纪：俄国农奴制开始 瓦解与社会转型的起步

### 第一节 19世纪前半期：社会转型前夕的俄国

19世纪的初期，俄国封建生产关系已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农奴制没落瓦解趋势已日渐明显。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对外连年征战（1804—1813年与波兰、1805—1814年与法国、1809年与瑞典、1810年与土耳其），对内实施暴政统治，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动荡。俄国发生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席卷欧洲的新的革命浪潮则是促使俄国变革的催化剂。

#### 一、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

19世纪初期的俄国，尽管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各方面都居主导地位的“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则站在了革命运动的前列和“唤醒了人民”。<sup>①</sup>这样，当时的俄国出现了一批年轻的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3卷，第421页。

面对沙俄封建王朝的日趋腐朽没落，一些年轻贵族（大多二三十岁，且绝大多数是有学识的军官）力求寻找新的出路。他们深受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从西欧国家的变革动荡中汲取治国之道。特别是这些年轻贵族革命者大都亲身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远征（1812—1814年），到过欧洲许多国家，目睹了西欧的社会变迁，“接触到欧洲的民主思想而受了感染”，迫切要求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sup>①</sup>这些青年贵族军官们回国后相继组织秘密协会，讨论和传播国外进步思想，揭露社会时弊，抨击朝政，探寻救国的道路。被称做“十二月党人”的青年贵族主张效法西欧国家，废除农奴制和封建等级制，用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取代沙皇专制制度，走立宪治国之路。为此，他们试图通过密谋起义夺权的方式，实现其理想蓝图。

1825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病逝后一度皇位空悬，成为十二月党人决定举事起义的契机。12月26日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就职之际，十二月党人起义正式爆发。但是起义一开始，一些十二月党人便退缩逃避和惧怕人民群众的参加，使起义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当即调集上万军队围剿只有数千人的起义军。当天，十二月党人起义被血腥镇压。1826年1月，十二月党人再度举行武装起义，终因力量悬殊，坚持五天后失败。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利后，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审讯、处决参加起义的主要成员，上百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更多的起义士兵被鞭笞致死。这次短暂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试图以远离人民群众的宫廷政变方式改革俄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既暴露了代表新兴贵族的十二月党人的脆弱性与历史局限性，也反映了俄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远未形成。因为当时“农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第324页。

奴制的俄国是受压制的、停滞不前的。起来反抗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得到人民支持的软弱无力的贵族”。<sup>①</sup>同时，十二月党人起义又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度的武装起义，是俄国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新起点。列宁在评价十二月党人的历史地位时指出：“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sup>②</sup>

## 二、专制制度的强化与社会大倒退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长达30年的统治，是俄国历史上最为反动腐朽的一个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而对欧洲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相继土崩瓦解，俄国封建王朝千方百计扼杀革命，竭力挽救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尼古拉一世宣称：“革命到了俄国的门坎，但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会让它闯进来……”<sup>③</sup>为此，他将全俄国变成了高度集权统治的军事化兵营。他说，只有兵营这种“制度是很严格的，有绝对的法律性，不许论理，不许反对。事事井然有序。谁不先学会服从命令，就不能发号施令”。<sup>④</sup>恩格斯评论这位俄国沙皇时指出：“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毅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3卷，第42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1卷，第267页。

③ 参见[苏联]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第4卷，莫斯科，1967年俄文版，第260页。

④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第276—277页。



力量的表示。”“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sup>①</sup>如果说以往的沙皇有时还有“开明专制”的外表，尼古拉一世则是实行赤裸裸的恐怖统治。

在国内政治方面，实行高度专权的军事化治理。尼古拉一世即位不久便赋予“皇帝陛下办公厅”巨大权力，下设六个部门具体掌管国家的一切主要事务。尤其是专门设置了掌管警察和监狱事务、监视和惩办对现存制度不满的“国事犯”的第三厅，并将全国划分为七个管辖区，均配备有宪兵团和秘密警察作为具体执法机关，从而形成严密的和享有特殊权力的军警监控系统。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到处堡垒林立，宪兵警察恣意横行，监狱人满为患，到处笼罩着恐怖。尼古拉一世依靠军人贵族实行统治，他身边的13名大臣中，只有3人不是军人；此外，国务会议中的49%、参议院的30.5%和各省长的51.7%都为高层军事将领。<sup>②</sup>当时到过俄国的一位外国人描述道：“这里每件事的进行都像在军事学校里一样，所不同的是学员一直到死了才算毕业。”为此，全国全部支出的一半要用于维持庞大的军警队伍。<sup>③</sup>除此之外，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官僚统治机器得到前所未有的膨胀。国家管理机构从120个猛增到1500多个，仅基层的县衙官吏，“从前供养1名县警察局长和两三名陪审员，而现今农民却要养活数十名官吏”。<sup>④</sup>

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严密的监控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十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38页。

②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31页。

③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第278页。

④ 参见[苏联]翁契可夫斯基：《十九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111--112页。

月党人的起义，促使尼古拉一世格外关注思想舆论工具和学校教育领域，认为只有实行严密的监控，才能防止革命思想的传播与蔓延。为此，他将学校办学宗旨确定为“培养教会的忠实儿子、上帝和沙皇的忠实的臣民”。学校教育则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其中规定：“最下等人”农民的子女只能进一年制教区初级学校；商人、手工业者的子女只能进三年制的县立初等学校；只有贵族和官吏的子女才能进正规的七年制中学或大学念书。为了进一步防止革命思想在大学里传播，废除了大学的自治管理，改为对沙皇负责的学监督导制。同时将神学和维护沙皇专制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排除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有，颁布严格的出版检查条例，加强对书报的监管，严禁议论上层统治者和发表动摇东正教信仰的言论等等。<sup>①</sup>

在社会结构方面，极力维护封建贵族的特权利益。除原有贵族等级外，尼古拉一世时期又新设了三个等级：直接为沙皇服务的国家上层官吏为“官吏公民”；一般官吏和大商人为“有名望的公民”；其他有势力的商人和工场主为“荣誉公民”，赋予他们和原有贵族免税、免服兵役和免受体刑的特权。原贵族等级则划分得更细了。大贵族地主的特权进一步强化。规定拥有3000俄亩以上土地或100名以上农奴的贵族地主才有直接选举权，少于以上限额的只有间接选举权，拥有150俄亩以下土地或5名以下农奴的小贵族地主没有选举权。同时，严格规定非贵族出身的人不得进入贵族阶层。大贵族地主专政的封建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还应当强调的是，镇压欧洲革命、全力维护欧洲封建秩序，是沙俄社会进一步大倒退的重要标志。面对遍及欧洲大陆的1848年

<sup>①</sup> 参见[苏联]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第4卷，第264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尼古拉一世时期曾出兵欧洲中部多瑙河流域,军事占领中欧国家,扑灭匈牙利等国的革命运动,再次显示沙俄成了欧洲旧势力的堡垒,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国际卫道士。

### 三、阶级矛盾的加剧与社会意识的觉醒

19世纪上半叶的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全面加剧,封建制度危机进一步加深。除农民是反对贵族地主剥削的主要力量外,军队中的士兵和城市中的居民等也成了反对沙皇政权的重要社会力量。

1830年的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起义、1831年诺夫哥罗德省的士兵起义、1830—1831年彼得堡和坦波夫等中心城市的市民暴动,直接威胁到沙皇统治的核心地带。而农民起义更是日益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农民反抗斗争在1826—1831年间发生440次,1832—1837年为406次,1838—1843年为453次,1844—1849年上升到605次,其中仅1848年一年就有农民暴动二百多次。与此同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场工人也开始成为一支反封建斗争的重要力量。19世纪30年代发生工人罢工、起义44次,40年代达64次。<sup>①</sup>

不断的领土扩张和对各民族的殖民统治掠夺,是沙俄的传统国策。19世纪上半叶,沙俄又先后兼并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几乎全部南高加索及哈萨克斯坦等地区。16世纪的俄国领土为20万平方公里,1725年彼得一世去世时猛增为1536万平方公里,1796

---

<sup>①</sup> 参见[苏联]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第4卷,第282页;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35—36页。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时为1705万平方公里，1855年尼古拉一世去世时扩展到1995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万）。残暴的殖民式掠夺和种族灭绝式的大俄罗斯主义强制手段，使沙俄沦为各民族人民的监狱，从而激起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而且斗争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仅1830—1831年的波兰民族大起义，就“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有力地支援和“拯救了欧洲的革命”。<sup>①</sup>而19世纪30年代爆发并延续了三十多年的高加索山民起义，则构成了对沙俄封建殖民统治秩序的威胁。

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和封建统治危机的加剧，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俄国社会民族意识有了空前的觉醒。最显著的标志，是以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2年）、维萨里昂·格里果利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年）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兴起。他们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废除农奴制，号召农民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理想的新社会。这个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通过文学艺术形式鞭笞封建专制和农奴制，进一步唤醒全社会要求解放的强烈呼声。

#### 四、新兴资本主义的出现

18世纪下半叶，当西欧先进国家由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过渡之际，俄国才开始兴起工场手工业。同市场相联系的工场手工业，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原始形态。18世纪末，俄国已有手工业工场1200个，其中冶金和金属加工业200个，轻工业（麻布业、呢绒业、丝绸业、棉织业和制革业）有近千家，共雇佣工人42万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0页。

人。<sup>①</sup>

19世纪上半叶,在军事扩张需求的直接刺激下,受西欧产业革命的影响,俄国的工场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出现了手工劳动逐渐被机器生产代替的趋势,意味着俄国的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到1845年已有工场9994家。以往的工场手工业以农奴为主,到了19世纪中叶许多行业已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1860年雇佣工人已达近53万人,占工人总数的61.4%(其中加工工业的雇佣工人占87%)。其中棉纺织业发展最快,雇佣工人已占95%,并且在19世纪初已开始使用蒸汽机。产业革命的兴起,带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860年的彼得堡成为机器制造业中心,已有15家机器制造厂。<sup>②</sup>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间,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从萌芽到原始形态的发展,但是与欧洲典型的资本主义兴起相比,还有着明显的差距和特点。首先,西欧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经济基础瓦解甚至崩溃的基础上兴起与不断得到发展的,而俄国资本主义则是在封建农奴制依然占绝对主导地位甚至进一步强化的基础上得以兴起和成长的。其次,西欧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上层建筑已经或正在被摧毁的前提下得到迅速发展的,而俄国的资本主义则是在以封建集权制为特征的统治秩序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沙俄的侵略扩张和与之相应的发展军需业密切相关、相互促进,这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望尘莫及的。总之,俄国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附于沙俄

---

①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310页。

② 参见[苏联]涅奇金娜主编、刘祚昌等译:《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11、17页。

封建帝国制度，“在农奴制普遍统治的范围内得到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直接在农奴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sup>①</sup> 从而，俄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从一开始就带有深深的封建主义烙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 第二节 1861年的“农民改革”： 社会转型的畸形时期

沙俄封建帝国确立以来，每当其统治秩序遇到危机，都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渡过难关，这在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屡见不鲜。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期间，农民与贵族地主的阶级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克里米亚战争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的到来，俄国再也无法原封不动地保留封建制度的根基，从法律上“废除”农奴制已经势在必行。

### 一、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19世纪中期，沙俄伙同欧洲各国旧势力镇压了1848年革命后，成为欧洲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最顽固的反动堡垒，充当着维护旧秩序的国际宪兵。与此同时，颐指气使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面对国内异常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侵略扩张，以显示沙俄帝国“是绝对不可战胜的”。<sup>②</sup> 与英法等

<sup>①</sup> 参见[苏联]尼·阿·察哥洛夫著，厉以宁、赵辉杰译：《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sup>②</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4页。

国在巴尔干地区角逐,争夺对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便成为沙皇的首选目标,从而爆发了持续四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以东正教与天主教争夺“圣地”为导火线,1853年7月3日,沙俄出动8万大军首先占领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从此,揭开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序幕。

初期的战场,本是俄国与土耳其在多瑙河地区、黑海沿岸和高加索一带展开的。“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实现传统的野心的战争,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战争。”<sup>①</sup>结果,土耳其军队战败,沙俄控制了黑海。此事震动了整个欧洲。1854年3月,英法等国向俄国宣战,开始了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制权的新一轮战争。这场战争对双方来讲,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面对实力强大的英法等国的联合进攻,俄军节节失利,特别是历时11个月于1855年9月,俄军黑海舰队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占,意味着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以失败告终。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已成定局的形势下,1855年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其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局,迫使沙俄交出对黑海及其沿岸地区的控制权,沙俄向近东扩张的势头再次严重受挫并失去了主导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同时,战争的失败暴露了落后腐败的封建帝国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的实力差距。正如列宁指出的,“克里木(即克里米亚——引者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sup>②</sup>战争加速了俄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危机,引发了反农奴制斗争的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9卷,第48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74页。

高潮。据沙俄官方统计,1858年农民起义为86次,1859年有90次,1860年上升到108次,1861年猛增到1176次。<sup>①</sup> 社会各阶层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日益加剧,俄国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即将到来。

## 二、被迫的“自上而下”的农民改革

在俄国历史上,不论是16世纪50年代的伊凡四世(伊凡雷帝)时期,还是18世纪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自上而下改革”的途径,达到振兴和挽救封建王朝的目的。这已成为俄国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既定方针和传统。19世纪60年代,“自上而下改革”再次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维护封建帝国的“振兴之路”。

历经五年的准备和策划后,1861年3月2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改革宣言和《农民改革法令》,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农民改革。其基本内容是: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支配自身财产的权利,禁止买卖或交换农奴;贵族地主保留原土地的所有权,但须将其部分土地划为农民的份地作为耕种使用;农民获得份地的同时必须承担劳役租、代役租和履行为贵族地主服务的义务;农民占有份地和服役的数量由契约规定,而契约由贵族地主制定并负责监督实施;在征得贵族地主同意的前提下,农民缴纳赎金后可将份地归自己占有。为此,沙皇政府又相继颁布了数十个法规条令,对每项具体内容都做了详尽规定。

---

<sup>①</sup>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第392页。



改革法令颁布后,由沙俄政府各级官吏逐步向各地推广实施。改革的结果,使两千多万农民程度不同地“摆脱”了法律意义上的农奴依附地位,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成长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因此,列宁指出,1861年的农民改革“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sup>①</sup>但是,这种由沙俄封建统治阶级被迫实施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封建社会的根基。沙皇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仍居绝对主导地位,广大农民仍旧是没有自主权的被剥削的主要对象。

### 三、从“改革”中得利的贵族地主阶级

1861年“农民改革”中,封建贵族地主自始至终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也是获得最大利益的社会阶级。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前夕当面向贵族地主保证的:“诸位请相信,凡是为保障地主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sup>②</sup>

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的核心问题,也是确保贵族地主统治地位的基石。1861年改革法令明文规定:“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sup>③</sup>在划归农民耕种的份地的同时,也确保贵族地主首先占有足够数量和最好的土地,并且可随时收回农民的份地,就连农民赎买的份地,贵族地主同样有权赎回。这样,改革的结果丝毫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74页。

② [苏联]札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的废除》,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121页。

③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116页。

没有动摇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只不过是稍许改变了某些表面形式与占有手法而已。

改革前,农奴是贵族地主剥削的主要对象。改革后,依据契约耕种份地的农奴称作“暂时义务农”,必须向贵族地主履行相应的义务,即缴纳代役租和服劳役。为了确保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革法令强化了“村社”体制,由贵族地主支配的村社名为农民“自治”机构,实为确保贵族地主的利益不受损害,加强对农民的集中控制。农民仍是贵族地主的主要盘剥对象,农民对贵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依然如旧,只不过是对剥削控制农民的手法做了些许调整 and 变动而已。

贵族地主通过“改革”获取了更多的丰厚利润。按照改革的规定,农民赎买份地的赎金先由国家垫付给贵族地主,然后农民分期还本付息。为确保贵族地主的利益,土地赎金远远高于土地实际价格。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贵族地主出让的土地实际价格为6.5亿卢布,而国家付给贵族地主9亿卢布,农民交付赎金(截至1905年)共达20亿卢布。贵族地主阶级及其统治机器成为向农民“出让”土地的最大获利者。此外,在“改革”期间,贵族地主在有偿“出让”部分劣地的同时,还夺走了原属农民所有的1/5的土地。<sup>①</sup>“改革”的结果,农民不仅可能失去土地,而且还要背负沉重的赎金债务。正如列宁所痛斥的,“臭名远扬的‘解放’,是对农民的无耻掠夺,是对

---

<sup>①</sup>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2卷,第406—407页。[苏联]德米特里耶夫,《苏联史纲(1861—1904)》,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第47页。后者认为,贵族地主出让的份地地价按1854—1856年市价计算,总计为5.44亿卢布,实际得到的赎金总计为8.67亿卢布,而农民偿还赎金贷款(截至1906年)达15.7亿卢布。

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sup>①</sup>

#### 四、“改革”的连锁反应及其结局

19世纪60年代沙俄的“农民改革”是以农民和土地问题为中心展开的，随即涉及到行政、司法、军事、财政和封建制度等上层建筑领域。

60年代，由沙皇政府颁布法令在省和县设立地方自治局，在城市设置杜马。这是试图仿照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实质为“半封建、半宗法制的专制制度”的“最后的形式”——“地方代表机关”。<sup>②</sup>“地方自治机关从建立之初就注定作为俄国国家管理机关这个四轮大车的第五个轮子，官僚政治只有在它的无限权力不受到损害时才容许这个轮子存在。”<sup>③</sup>尽管按照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建立了司法诉讼体系，但从审讯到判刑依然保留了一系列封建农奴制的做法，并且司法机构完全由贵族地主和封建主所把持，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军事改革同样效法欧洲其他国家的做法，但是实际上通过调整军事管理机构、缩短服兵役期限、兵役制代替募兵制等，进一步增强了封建帝国的支柱。为加强沙皇政府对财政的集中管理，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的预算和支出统一的体制，等等。

“改革”后的俄国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沙皇依旧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贵族地主还是社会生活的绝对统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173--174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21页。

③ 同上书，第5卷，第30页。

治者。据统计,19世纪末沙俄共有四等文官955人,其中世袭贵族占3/4强(735人);贵族在军官中所占比例更高,在近卫骑兵军官中占96.3%,近卫步兵军官中占90.5%,近卫炮兵军官中占88.7%。<sup>①</sup>正如苏联早期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论述19世纪俄国“改革”时指出的,“可见农奴制国家在所有各条战线上并没有退却多远,而现在又在‘后方阵地’构筑起牢固的工事了”。<sup>②</sup>

以1861年“农民改革”为标志的俄国社会转型的起步,与欧洲其他国家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有着本质的不同,是一种被扭曲的、畸形的开端,从而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与后果。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农民发生了有限的“分化”。19世纪上半叶,俄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到19世纪末仍占将近80%。“改革”前的俄国农民,主要由贵族地主农民、国有农民和宫廷农民构成。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的20%、30%和50%,各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富裕农户占74%,而贫农只有9%。<sup>③</sup>中农,特别是贫农仍然严重依附于贵族地主,没有多少人身自由,与过去的农奴处境相似。尽管一些贫苦农民丧失土地后沦为无产者,但农民仍旧是沙俄

<sup>①</sup> 参见[苏联]达维多维奇:《帝国主义时期的专制制度》,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第190页;[苏联]札依翁契可夫斯基:《十九至二十世纪百年间的专制制度和俄国军队》,莫斯科,1973年俄文版,第203页。

<sup>②</sup> [苏联]波克罗夫斯基著、贝璋衡等译:《俄国历史概要》(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88页。

<sup>③</sup>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127—128页。

封建社会的主体。

第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部分演变。1861年改革后,俄国一些农村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农产品商品化有了一定发展,农业机器逐步推广使用,雇佣工人从60年代的70万人增加到90年代的360万人。俄国农村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农村中的贵族地主经济依然居绝对主导地位,只不过由农奴制时期的劳役制剥削方式改变为农民劳务工役制形式。特别是,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第三,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861年改革前,俄国的工业还处于由手工工场向现代工厂过渡时期;改革后的30年间,主要产业(特别是重工业)机器生产已居主导地位,从而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沿袭沙俄的工业发展模式,与军工产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依然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支柱,战争和军事扩张依然是其原动力。70年代末俄土战争结束,军事订货锐减,与军需业有关的工业部门受到很大影响,当即引发了1881—1883年的经济危机。而在这期间,为军事扩张大兴铁路建设,成为刺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新的重要因素。俄国在70年代主要铁路干线基本建成,80年代进一步加强了战略铁路的建设,90年代已形成相当发达的铁路网络。1861年时俄国也只有铁路1488俄里(一俄里相当于1.0668公里),1891年增加到2.8万俄里,1900年则达到4.78万俄里。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依赖于沙俄封建军事帝国的扶持与保护,俄国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封建贵族的前途命运密不可分。

第四,加速了对外扩张战略目标的实现。国内不断加强专制集权统治,国外不断扩张侵略,是沙俄军事封建帝国的两大支柱和不变的既定战略方针。1861年改革后,沙俄在近东的战略目标是重

新夺取黑海的控制权和占领巴尔干半岛，结果事与愿违，以俄土战争（1877—1878年）俄国失利暂告一段落。在中亚则先后征服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三个封建汗国，强占了大片领土。19世纪后期，也是沙俄大肆向东扩张、侵略中国的半个世纪。1858年它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璦琿条约》，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据为己有。1860年的《北京条约》，俄国又割走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又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自己的版图。19世纪80年代，沙俄两次侵占中国新疆地区领土共七万多平方公里。这样，沙俄共侵占中国领土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19世纪后期，靠掠夺扩张起家的沙俄成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不折不扣的封建军事大帝国。

总之，以1861年“农民改革”这种社会转型的畸形开端为起点，俄国进一步走上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并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演变与深化。同时，从总体上讲，俄国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依然是贵族地主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旧任重而道远。

### 第三章 20 世纪初:没有完成的 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新阶段,而俄国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依然居优势和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成为独具特色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这个时期正如列宁指出的:“如果把俄国前资本主义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而这种比较正是正确解决问题所必要的),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速度与现代整个技术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sup>①</sup>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任务,依然是俄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20 世纪初,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在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引导下,俄国相继出现了两次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551 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同时也为十月革命创造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

## 第一节 1905—1907年俄国革命

跨入20世纪门槛时,俄国依然是沙皇专制统治和小农经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2/3的封建主导型国家。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旧的统治秩序已不能容纳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必然要产生反对专制制度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sup>①</sup>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必然加剧,直至演变为互不相容的直接对抗。与此同时,以农民为主力军的社会各阶层反封建专制斗争的浪潮空前高涨,尤其是,这个时期工人阶级不断觉醒并开始作为推翻没落旧制度的新生力量登上了社会历史的大舞台。沙皇封建王朝已经步入穷途末路,俄国革命的形势日趋成熟。

以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流血事件”为开端、1907年“六三政变”为结束的革命运动,是俄国社会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尝试。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则是引发社会矛盾和加速革命到来的催化剂。

### 一、1904—1905年日俄战争对俄国社会的震撼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个后起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争夺东亚霸主地位和瓜分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帝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48—249页。



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20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强占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预演和前奏曲。

近代沙皇对外扩张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成为远东的霸主。沙俄在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等大片领土后，19世纪末进而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纳入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视野。与此同时，后起的日本占领朝鲜和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后，也试图吞并整个中国，称霸亚洲。为此，日俄瓜分中国领土（特别是辽东半岛）的矛盾愈演愈烈，双方都在为武力争夺加紧备战。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俄军节节败退，其海军太平洋舰队遭重创，陆上战略要地相继陷落，尤其是“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sup>①</sup>1905年初，日俄在沈阳展开决战，拥有33万人的俄军很快被27万日军全线击溃。随后，俄军太平洋舰队全军覆没，沙皇无力再战。1905年9月，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被迫将东亚霸主地位让于日本，并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及东三省大部分地区享有的特权和租借权转让给日本。这场历时一年多的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始终在中国领土和领海进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创伤，最终以沙俄失败告终。沙皇本想借助这次战争获得“一场小小的胜利”，一方面，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和矛盾，利用战争来“驱散革命的毒气”；另一方面，巩固在远东的既得利益并进一步争夺霸主地位。<sup>②</sup>结果却适得其反。俄国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严重动摇了沙皇政权，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

---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41页。

② 参见[苏联]波克罗夫斯基著、贝璋衡等译：《俄国历史概要》（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27页。

盾,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到来。<sup>①</sup>

## 二、从加邦请愿到群众性起义浪潮

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并迅速发展为全市工人大罢工,到1月20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已达15万人。1月22日,“彼得堡工厂工人大会”首领加邦<sup>②</sup>组织有20万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参加的和平请愿,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将土地归还人民、实行大赦和召开根据普遍、平等、秘密投票原则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等政治与经济要求。请愿队伍行进到冬宫前的广场时,遭到政府军警的血腥镇压,死伤四千六百多人,成为震惊俄国乃至世界的“流血星期日”,从而揭开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序幕。

如何评价工人请愿组织者加邦,这不是本篇讨论的内容,但

---

<sup>①</sup> 值得指出的是,斯大林却对日俄战争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竟然说:“日本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他还说:“但是,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斯大林:《告人民书》(1945年9月2日),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8—470页。

<sup>②</sup> 格·阿·加邦(1870—1960年),彼得堡工人区的牧师,1904年2月组建合法工人组织“彼得堡工人大会”,试图在沙皇制度下通过合法途径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对于加邦活动的评价,苏联历史著作认为他是沙皇政府的奸细,列宁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我国以往的论著大都认同这一看法,但在最新有关论著中却认为加邦不是沙俄奸细。至于加邦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应当怎样看待,也是一个应当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

是,这次工人请愿遭到血腥镇压,却是俄国历史上带有重要转折性的人民群众反沙皇封建专制斗争的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以往那种依赖沙皇政府“自上而下”改革社会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应当寻找新的变革途径和道路。正如列宁指出的,人民群众“在一天当中所受到的革命教育,是他们在浑浑噩噩的、平常的、受压制的生活里几个月、几年都受不到的”,这是“一个转折点”,是“俄国革命的开始”。<sup>①</sup>

彼得堡工人请愿队伍遭到血腥镇压,使请愿很快演变为反对沙皇政权的暴力冲突,并迅速蔓延到全国许多城镇。据当时的官方统计,1月份罢工人数达40万,超过了1905年以前10年罢工人数的总和,而1月22日以后的三个月内罢工人数就超过了80万。当年5月8日历时72天并有7万人参加的伊尔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大罢工,产生了俄国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广大农民反封建运动更是声势浩大,波及全国1/3的农村地区,全年农民起义达三千多次,仅1905年底前的3个月内,就有农民起义1590次。在沙俄军队中,这一年由穿军服的农民引发的士兵起义达百余次。<sup>②</sup>1905年6月的罗兹工人起义;6—7月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装甲舰水兵起义;11月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水兵起义;10月莫斯科社会各阶层200万人参加的罢工、罢市、罢课,以“打倒沙皇政府”和“立宪会议万岁”等口号为旗帜,发展为12月的武装起义,更是将革命推向高潮。这样,工人起义、农民起义、市民起义和士兵起义交相呼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85、188页。

② 以上具体数据可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302、318页;〔苏联〕波克罗夫斯基著,贝璋衡等译,《俄国历史概要》(下),第646页注①。

应,形成了矛头直指沙皇政权的有广泛社会阶层参加的群众性反封建浪潮。

正如列宁指出的,“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饥荒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横暴虐,对‘穷人’、‘庄稼汉’和士兵的横加凌辱。再加上黑帮肆无忌惮地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而这种暴行则是由昏庸暴虐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宫廷近臣暗中策划和指挥的……”。为此,“没有胜利的革命,俄国就不会有自由。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来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国就不会有胜利的革命”。<sup>①</sup>

### 三、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继续较量

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后,俄国首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入低潮,但是革命并未就此终止,反封建专制与维护旧统治秩序的泾渭分明的两大对抗势力继续进行较量。

沙皇政府依仗手中的专制强权和军警机器,极力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实行白色恐怖。仅1906年春,就抓捕了7.5万人。当时的内务大臣曾向各省首脑发布特别通令:“鉴于监狱坐满,应重新审查被捕者之罪,盖较准确释放最小危险者,方能安置新革命党人。”<sup>②</sup>但是,残酷镇压未能扑灭革命的烈火,1906年和1907年仍有110万人及74万人参加了罢工。1906年5—8月中有250个县,9—12月间有72个县爆发了农民起义。军队内部的士兵抗暴斗争也时有发生。

此外,国家杜马成为两大势力对抗的新舞台。国家杜马是沙皇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348、349页。

② 转引自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330页。

时期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来由封建贵族把持和控制。在1905年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沙皇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尽管是非常有限和不平等的),允许社会其他阶级参加杜马选举。封建统治者在反封建斗争浪潮中被迫实行部分的立宪制。这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因为沙皇专制统治制度终究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在国家杜马中的斗争也成为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6年3月的杜马选举,共选出代表499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166人,无党派人士144名,农民和工人代表(包括社会革命党人)约130—140名,社会民主党人18名(均为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届杜马选举,后来列宁也承认采取抵制的策略是错误的。<sup>①</sup>立宪民主党人当选为国家杜马主席。随后,在本届国家杜马(1906年5月10日—7月21日)活动期间,土地问题成为议会斗争的核心议题。1907年初新一届国家杜马共选举出代表518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98名,社会革命党人、农民和工人代表及人民社会党人共157名,社会民主党人54名,<sup>②</sup>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此次杜马选举,获15席。立宪民主党人再次当选杜马主席。新一届国家杜马(1907年3月5日—6月15日)活动期间,土地问题依然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较量的中心问题。两届国家杜马尽管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但是都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围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问题——土地问题,同封建贵族进行了较量,从而将革命

---

① 列宁认为,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是一个错误”。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92页。

② 这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工党占的54席中,孟什维克为33席,倾向孟什维克的3席,布尔什维克15席,倾向布尔什维克的3席。

进程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以往的苏联史论著,由于大都是围绕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展开的,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还只是一个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进程的新兴党派,并错误地抵制过杜马或在杜马中仅占很少的席位,因而对于杜马的斗争不予重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甚至认为,只有不惜一切将杜马“搞垮”,才是革命的首要任务。<sup>①</sup>应该依据历史的本来面貌,给俄国革命中的国家杜马活动以应有的位置,尤其是对国家杜马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围绕土地问题进行的反封建斗争,应给以客观和公正的评价。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不能不说是论述俄国近现代史(特别是1905—1907年革命)的一个缺陷。

#### 四、“六·三政变”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群众性起义迫使封建统治者从政治上做出让步,先后选举产生了两届国家杜马。但是,革命进步势力居主导的国家杜马一届比一届强烈要求解决俄国最为迫切和现实的土地问题,却是贵族地主所不能容忍的。1907年6月初,沙皇政府以国家杜马中的革命党人代表在军队中谋反为借口,将他们逮捕,并随即发布命令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这次事件史称“六·三政变”。一般史书以此为界,认为它意味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终结,并将以后的时期称做“斯托雷平政府反动统治时期”。

实际上,1905年开始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尝试的延续,

---

<sup>①</sup>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101页。

除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起义和两届国家杜马以外，还应包括斯托雷平政府执政的初期。苏联有的学者指出，“不对斯托雷平政府时期加以分析，我们就看不到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也看不到这次革命真正带给帝制俄罗斯的生活的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固然与革命者的理想很少相同，但却从根本上推翻了那种硬说什么革命以后‘一切都还照旧’的肤浅断言”。<sup>①</sup>

“六·三政变”后的斯托雷平<sup>②</sup>政府时期，一方面，在全国实行恐怖统治，大肆报复打击革命势力，制定并实施有利于封建贵族的新选举法并产生了便于沙皇政府控制的第三届国家杜马；<sup>③</sup>另一方面，斯托雷平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也应视为1905—1907年革命的一项成果。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其初期）对于俄国历史进程来说，斯托雷平政府是以社会进步和反进步的矛盾标志和面目出现的。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和社会各阶层联合斗争的共同努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着手解决土地问题。还在“六·三政变”前的1906年11月，斯托雷平政府就颁布法令，确认农民占有、支配、转让和赎买村社份地的权利。“六·三政变”后，该法令经第三届国家杜马补

---

① 参见[苏联]波克罗夫斯基著、贝璋衡等译：《俄国历史概要》（下），第801—802页。

② 彼·阿·斯托雷平（1862—1921年），曾出任俄地方省的首脑，1905年革命爆发后先任内务大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被沙皇任命为大臣会议主席（政府首脑）。

③ 第三届国家杜马总共422名代表中，代表贵族地主和与封建势力关系密切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299名，居主导地位；其他社会阶层代表居少数地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54名，劳动派132名，社会民主党人18名（布尔什维克只占其中的5名）。

充和审议后实施。与此同时，斯托雷平政府向地广人稀的边远地区实施移民政策，仅1906年以后的10年间，就移民三百多万，以缓解农民与贵族地主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尖锐矛盾。

这些以确认土地私有和实行移民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斯托雷平政府的土地政策，尽管从实质上讲是为了维护封建贵族和沙皇制度的统治地位，但它客观上破坏了俄国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从根基上动摇了数百年的封建经济基础，加速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尽管这是一种“地主式的资产阶级演变”，但总归是俄国社会历史的一个进步。因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是沿着‘普鲁士式的’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在这条道路上，到一定阶段可能发生辩证的转变”，即转变成“‘庄稼汉的’‘一般民主’运动，忽视这点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sup>①</sup>

### 五、浅论1905—1907年革命的几个问题

1905—1907年革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尝试。现就几个根本性问题，做以下简要阐述。

第一，关于革命的性质。1905—1907年革命的对象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尝试，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以往不少论著并未始终如一地以这场革命的性质为主线进行阐述，而夹杂了一些偏离这条主线的其他东西。为此，有必要强调和突出革命的性质问题，因为这是认识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基本前提，也是正确评价社会各阶层及其政

---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209页；第45卷，第295、299页。



党派别的首要出发点。

第二,关于革命的任务。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任务是清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和变革沙皇专制统治。俄国革命的任务,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因此,革命中的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和士兵起义等与沙皇封建制度针锋相对的斗争,是这次革命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这期间社会各阶层与封建贵族在国家杜马中的斗争,同样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往的论著往往侧重前者、忽视甚至贬低后者的倾向,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完全的。

第三,关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包括穿军装的农民),生力军是日益成熟和更具战斗力的工人阶级。但是,农民阶级自发与封建主斗争的同时,仍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工人阶级开始从自发的斗争走向自觉的斗争,但仍不具备独自与沙皇专制统治抗衡的实力。从俄国这次革命的整体(政治和经济影响)看,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领导阶级——尽管它未能完成领导阶级的使命——这也是俄国资产阶级首次占据革命的主导地位。这点在众多论著中往往是有意或无意回避的,或是将其他阶级(或政党)的作用做了违背历史事实的夸大。尽管俄国资产阶级极度软弱并具有鲜明的两面性(这也是导致俄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历史还是把它推到了前台。

第四,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成立不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就其整体而言,仍不足以与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而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尽管在革命实践上有分歧,但也只是策略、方法上的分歧,而在基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等)上却是一致的。同时,应当肯定孟什维克在革命中的历史作用,那种只承认布

尔什维克而否认孟什维克作用的做法,是狭隘片面的,也是与历史不符的。总之,应当对社会民主工党及其党内两个派别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五,关于革命的成果和意义。俄国1905—1907年革命不仅锻炼了革命队伍,教育了人民群众,而且产生了直接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为:经济上进一步瓦解了封建经济基础——地主贵族土地所有制,政治上严重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撕开了旧统治秩序无法再度弥合的缺口。应当承认,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进步政党首次占据国家杜马的主导地位以及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这次革命的重要成果。1905—1907年革命的成果和作用,长久影响着俄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直接影响了以后的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强调指出,它是以后俄国革命的预演。

但是,1905—1907年革命只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步和开始。正如列宁指出的:“沙皇还远远没有投降。专制制度根本没有不复存在。它只不过是把战场留给敌人,从战场上退却了,在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中退却了,但是它还远远没有被击溃,它还在集结自己的力量,革命的人民还要解决许多极其重大的战斗任务,才能使革命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sup>①</sup>

## 第二节 1917年二月革命

20世纪初,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起支配作用的欧洲主要大国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进行新的利益分赃,形成了“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三国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26页。

协约”(英国、法国、俄国)两大军事对抗集团。随即爆发了以欧洲列强为核心和欧洲作为主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作为世界大战的主要发动国和参战国之一,前线接二连三的失利和国内社会矛盾的相继激化,引发了二月革命,最终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300年的军事封建统治,为俄罗斯的新生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

正如列宁指出的,这场战争“是在两个压迫者集团即两伙强盗之间进行的,是为了确定怎样分赃、由谁来掠夺土耳其和各殖民地而进行的”,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sup>①</sup>这场历时四年的血腥厮杀,先后有31个国家(15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4)卷入,夺去了3000万人的生命,耗资3300多亿美元。

尽管这时的沙俄已经成为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封建军事帝国,但它仍不满足,而是野心勃勃地窥视着欧洲和亚洲更广阔的地区,妄图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更庞大的、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大帝国。为此,沙俄政府的战略方针和目标是:在亚洲夺取亚美尼亚、土耳其、阿富汗和波斯,以中亚为基地,瓜分中国和直叩印度大门;在欧洲夺取东普鲁士、加里西亚等地区,占领整个巴尔干和控制黑海海峡,使黑海变为俄国的内湖。夺取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在巴尔干地区扩张自身的势力,是沙俄统治者最为迫切的首要目标,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以德国为首的“三国同盟”势力。在两次巴尔干战争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24页。

(1912年和1913年)中,作为间接参与者的沙俄政府试图通过政治的和外交的手腕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巴尔干地区成为各列强国争夺和对抗的焦点,也成为世界战争的导火索和发源地。

1914年6月奥匈皇太子遇刺于萨拉热窝;7月,奥匈帝国在德国的唆使下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俄、德等国相继加入战争行列。欧洲列强蓄谋已久的世界大战爆发了。战火首先在欧洲大陆点燃,很快蔓延到中近东、远东和非洲等地。整个战争分为初期(1914年8月至当年底)、中期(1915年初至1916年底)和后期(1917年至1918年7月)三个阶段。

沙俄帝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发起国和参战国之一,在战争初期,利用德军主力在欧洲西部战线与英法作战并在东部战线采取守势之机,乘势进军东普鲁士、加里西亚和高加索地区,但战绩不佳,与对手处于互有得失的相持状态。同时,战争一开始就暴露出沙俄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军队装备低劣和指挥无能等致命弱点。1915年战争转入中期阶段后,随着德军作战重心东移以及同盟国军队的进攻,沙俄接连失利并全线溃败(这期间俄军损兵折将三百余万),引起沙俄统治集团的混乱与惊恐。沙皇尼古拉二世撤消尼古拉·尼古耶维奇大公的最高统帅职务,自任最高统帅并亲临作战前线指挥,试图稳住阵脚,但依旧无法挽救已经呈现出的失败前景。

战争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导致了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和沙俄帝国的崩溃。随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阻止了俄国进一步滑向灭顶之灾的深渊。

## 二、危机深重的俄国社会与走投无路的专制制度

这场历时四年的世界大战,使本已矛盾重重的俄国社会状况急剧恶化。经济上的全面危机,军事上的崩溃瓦解,使得沙皇封建军事专制政体已再无回天之策。统治俄国数百年的封建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

早在 19 世纪末期,沙俄就为战争做准备,与欧洲其他列强竞相攀比,大搞军备竞赛。“协约国”和“同盟国”六个主要国家 1902~1911 年的军事开支情况如下:

表 3-1

(单位:万马克)

年代	俄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奥匈	意大利
1902	95801.5	121830	82720.2	87453.6	40160.4	28257.3
1907	106563.1	117830.8	91012.7	109771.4	44273.4	37129.8
1911	128532.8	145248.3	105211.1	125902.9	54880	47258.3

资料来源: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3 卷,第 357—358 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战前 10 年间,俄、英、法、德、奥匈、意六国军费开支分别增长了 25.4%、16.1%、21.3%、30.5%、26.8% 和 40.2%。与此同时,各国竭力扩充军队,其中俄国陆军 1871 年时为 76 万多人,1904 年增至 104 万多人,1912 年已达 138 万多人,1913 年沙俄政府制定了新的“大规模扩军计划”,准备再增加 48 万人,此外,1914 年时还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源 560 万人。因此,大战爆发时,

俄国仅陆军正规部队已达 107 个师,比德法两国总和(德国 51 个师、法国 54 个师)还要多,是欧洲乃至世界最为庞大的一支军队。<sup>①</sup>如此沉重的军负压力,对经济和技术实力仅属于欧洲二流国家的沙俄来说,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就指出,战争前夕已经预示了“沙皇俄国在大战中的军事失败已成定局”,而“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是沙皇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sup>②</sup>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军备竞赛是拖垮俄国和加速沙皇政权倾覆的一个重要原因。想不到,以后的苏联又重蹈了历史的覆辙。

战争爆发以后,沙俄进一步扩张军备,将全国强行转入战时轨道。在沙皇政权下早已形成的经济政治军事化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全国犹如一座森严的大兵营。但是,战争是对手间的经济技术实力的总较量,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战争期间,经济技术实力处于劣势(尽管在参战人数上处于绝对优势)的俄国,很快将其致命弱点暴露无遗。战场上,军队装备简陋,到 1916 年战争的后期,仍有 20 万士兵赤手空拳,连起码的步枪都没有;前线阵地每月需要子弹 2.5 亿发、炮弹 150 万发,而二者的军工年产量仅为 5 亿发和 5 万发;至于欧洲其他列强所拥有的汽车、飞机等先进装备,沙俄军队更是望洋兴叹,因为俄国此时还没有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现代化产业。国内投入战争的费用与日俱增,从战争开始到二月革命期间,日军费开支高达 145 亿卢布(全国每日总开支为 305 亿卢布),沙俄政府只得靠向国外借债、在国内增税和滥发纸币维持

<sup>①</sup> 以上数据参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3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58—359 页。

<sup>②</sup>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 3 卷,第 207—208 页。

庞大的战争开支。国内经济一片凋敝，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农村丧失劳动力达 47.4% (1400 万人)，200 万马匹及其他牲畜被军队征用，1916 年全国的耕种面积仅为 1909 年的 85%，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sup>①</sup>这足以反映出，俄国的社会制度已面临全面的崩溃与瓦解。

1914—1916 年间，沙俄政府先后更换了四个大臣会议主席、六个内务大臣、四个国防大臣、三个外交大臣和四个司法大臣。这种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要员，连国家杜马都无法“认清被撤职大臣的面孔”了。<sup>②</sup>沙皇尼古拉二世最后把希望寄托在非利浦、塞拉非姆和拉斯普廷这样的江湖骗子身上，乞求神灵上帝的保佑。但凡统治者走到迷信巫术的地步，那确实是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在现代人类文明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当时的沙俄政府大臣维特已经认识到：“历史表明，每当宫廷中出现具有惊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统治人物，而这种神秘主义又往往同有名的招摇撞骗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那就预示着国家要出大事”。<sup>③</sup>

---

① 以上数据参见萨那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33—236 页；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 413—416 页。俄国如此的社会惨状，在许多著述中都有翔实的描述和记载。

②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 3 卷，第 232—233 页。

③ 参见李永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该书对沙皇迷信鬼神，特别是对江湖骗子拉斯普廷在宫廷中的作用和影响有详尽的描述，维特的话见该书第 207 页。

### 三、俄国二月革命及其性质

列宁在论述革命形势引发为全社会的革命时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具体讲,革命形势的“主要特征”是:“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以及“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种革命形势下,“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时社会革命便会降临。<sup>①</sup>这种革命形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经出现,以后随着主客观条件的更为成熟,终于演变为1917年的二月革命。

关于二月革命的发生及其过程,史书有详细的记载,这里只做简单交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俄国人民所受灾难最为深重,反对战争和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也就最为强烈。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和士兵反战的事件此起彼伏,到1917年初已经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这年的俄历1月9日(公历1月22日),为纪念“流血星期日”12周年,彼得堡15万人举行了反战罢工和示威游行。莫斯科等地随即响应,很快发展为全国性反战大示威,矛头直指沙皇政府。俄历2月,以彼得堡为中心的阶级搏斗已达白热化程度,“要面包,不要战争!”“打倒沙皇政府!”的示威发展为武装起义,沙皇军队也纷纷掉转枪口指向沙俄制度,各地相继成立苏维埃。在这种革命形势下,俄历3月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并将政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460-461页。



权转交给临时政府。至此，统治俄国达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家族王朝被推翻了。<sup>①</sup>以二月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历史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俄国二月革命毫无疑问是一次比1905年革命规模更大、意义更为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力量旗帜鲜明地反对并最终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斗争的矛头是始终如一的。就革命的内容讲，工人、农民、士兵和社会各革命阶层的普遍要求是反对战争、要土地和面包、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等，而这些要求完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就革命的领导力量（阶级）讲，从群众自发性斗争到有组织地推翻沙皇政权，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包括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居于主导地位。尽管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处于从属地位，革命中相继成立的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和杜马临时委员会及临时政府的组成，就是最好的说明。<sup>②</sup>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次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正如列宁针对俄国国情，在20世纪初就明确指出的那样：“马

---

<sup>①</sup> 1917年2月27日由杜马临时委员会取代了原由贵族地主把持的第四届杜马，该委员会主席是罗将柯，主要成员有叔尔金、米留可夫、齐赫泽和克伦斯基等，均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党派头面人物。3月1日组成的临时政府，也均由清一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列宁把这称做“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而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版，第29卷，第16页。

<sup>②</sup> 1917年2月27日彼得堡起义后成立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其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主席是齐赫泽（孟什维克），副主席克伦斯基是社会革命党人，斯柯别列夫是孟什维克，委员中有孟什维克三人、布尔什维克三人、社会革命党和无党派人士各一人。

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sup>①</sup>但是,在以往的研究和论著中,对俄国二月革命的性质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往往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仅仅将其看作是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过渡。这是脱离俄国历史和国情的,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

#### 四、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形势及其特征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没有像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出现了通常所说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是俄国民主革命独有的历史现象,也是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关于这点,许多著述都有几乎相同或类似的说法,即“形成了两个政权、两个专政即以临时政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以工兵代表苏维埃为代表的工农专政二者交错在一起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sup>②</sup>

关于“两个政权并存”的提法,作为习惯用语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对于上述“两个政权”内涵的解释,现在看来过于机械、教条和简单化了,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这里只简要指出以下几点加以说明。其一,齐赫泽、克伦斯基等人既是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也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54页。

② 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98页。

是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首要人物或重要成员；其二，彼得堡工兵代表苏维埃领导机构、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除个别代表外，均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并在“两个政权”中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sup>①</sup>因此，将“两个政权”一概视为相互平行甚至对立的论点，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尽管“两个政权”各自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它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俄国二月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问题，是一个很有意义且有待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课题，因为这对于十月革命的爆发乃至俄国以后的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甚至直接的影响。

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他们既是革命中推翻封建制度的主要阶级，也是继续推动革命发展和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主要社会力量。同时，这些社会阶级力量以政党的形式，体现着各自在整个革命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sup>②</sup>其中，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主要有“十月党”、“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等；<sup>③</sup>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是持民粹主义立场的政党。二月革命后这类政党有 16 个

---

① 有关“两个政权并存”期间，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具体活动情况，参见《专制制度被推翻后的俄国革命运动（文件资料集）》，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

② 这里讲的“整个革命进程中”，不仅仅指二月革命期间，是指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阶段）。

③ 十月革命党成立于 1905 年，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二月革命后更名为民族民主共和党，领袖是古契柯夫；进步党成立于 1907 年，二月革命后演变为激进民主党，是资产阶级左翼政党；立宪民主党成立于 1905 年，二月革命后改名为人民自由党，1917 年 5 月时党员有 3 万人，是具有实力和影响的资产阶级左翼政党，领袖是米留可夫、盛加路夫和涅克拉索夫。

之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社会革命党”;<sup>①</sup>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是“社会民主工党”。<sup>②</sup>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时期,各阶级及其政党在民主革命的最基本方向和任务上没有原则性分歧,区别只在于一些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党派在把握社会演变进程和争夺社会权力核心地位上的分歧很快显露出来,尤其是4月至7月临时政府的三次信任危机后,各政党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扩大。简言之,从二月革命到当年中期这段期间,俄国社会形势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代表各个阶级的党派,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都在进行方针政策的调整和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

二月革命后,尤其是临时政府镇压示威游行群众的“七月流血事件”发生以后,随着各党派间及其与新政府间的对立加剧,社会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左翼力量发展的趋势。<sup>③</sup>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已有24万党员(5月时还只有3万),成为一支举足轻重和最具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党派。当8月底托洛茨基取代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与实力急剧增强,便放弃了和平革命的方针,转而准备以武力夺取政权,并最终走上了十月革命

---

① 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2年,二月革命后党员号称有100万人,是各党中人数最多和影响最为广泛的政党,党内分为左、中、右等派别。

② 其中,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称有党员25万人,布尔什维克则有2.3万党员。

③ 7月20日以李沃夫为总理的临时政府辞职,21日组成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新政府。

的道路。<sup>①</sup>也就是说,革命的左翼力量(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借助有利的时机急速扩充自身的实力,为夺取政权做好了准备。这是二月革命后各党派间重新组合时的俄国社会形势发展的又一特征。

尽管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形势不断急剧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依然如故。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和民族自治问题,不仅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有的变得更为尖锐了。沙皇政府在战争期间的32个月中共发行了82亿卢布纸币;而临时政府仅仅在8个月里就发行纸币95亿卢布,通货膨胀形势更为严峻。特别严重的是全国性饥荒,10月份的粮食实际收购只是所需最低限度的1/5还不到,国家处于极度危机中,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局面。这就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有利的条件,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总之,二月革命只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开端,而这一革命进程的结束,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阶段。这一进程有机地包括在由十月革命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里。像俄国这样的封建专制旧势力、旧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能不带有这样的特点。对这种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试图跨越这一阶段,必然要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重演历史悲剧,直至走入社会演进的死胡同。俄国(以后的苏联)的历史事实,再好不过地验证了这一点。

---

<sup>①</sup> 列宁在9月10日—14日从芬兰写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之前,一直主张和平革命,主张以同其他左翼党派联合执政方式推进革命的不断发展。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14页;第32卷,第132页。

## 第四章 俄国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的 意识形态和政党运动

### 第一节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基本国情

要想真正了解七十余年中苏联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对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社会形态有所了解。一般的共识是,十月革命时的俄国仍然属于封建社会——尽管资本主义成分已有较大发展。列宁的著名定义是:旧俄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区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特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农民的剥夺,把封建农民变为无产阶级,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sup>①</sup>在西欧,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16世纪初演出的”<sup>②</sup>。就是说,那里的封建社会在15世纪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同一时期的俄国,情况却完全相反,封建社会正走着上升的路线,封建制度不断加强。到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国封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268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2页。

建制度空前加强。俄国虽然出现了商业资产阶级的萌芽,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但是直到十月革命前夕的1914年,俄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仍然是,国民经济固定资产构成:农业占53.7%,工业、交通、商业、事业总共占46.3%;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3.6%,其余占46.4%。<sup>①</sup>同年,城市人口仅占居民总数的17.9%,各类工人为1780万人,占总人口的11%,其中,同土地脱离关系的产业工人仅占一半多。<sup>②</sup>至于表明社会进步程度的文化情况就更差了。直到1920年,俄国文盲仍占近70%,所以列宁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sup>③</sup>列宁所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到19世纪末俄国一直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20世纪初虽经斯托雷平改革,但是情况没有根本改变。据统计,改革期间封建地主只出卖了1/10的土地,封建贵族地主掌握的土地仍超过其他成分60%。<sup>④</sup>这里不能不提到俄国迟到的启蒙运动先驱问题。

## 第二节 俄国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先导: 拉吉舍夫、卡拉姆津等人

俄国农奴制的惨状和西欧的自由主义革命运动,不可能不对

---

① [苏联]勃维金:《大变动前夕的俄国》,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俄文版,第113页。

② [苏联]费尔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312、313—31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6页。

④ [苏联]费尔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第309、316页。

俄国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早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的18世纪下半叶，就出现一批批“自由主义”学者和思想家了。<sup>①</sup>其中为人熟知的有作家冯维辛（1744—1792年，著名作品《纨绔少年》）、拉吉舍夫（1749—1802年，著名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历史学家卡拉姆津（1766—1826年，著有《俄罗斯国家史》）以及亚历山大一世重用过的斯佩兰斯基伯爵（1772—1839年，著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国法概论》）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仇视农奴制（斯佩兰斯基除外），同时又寄希望于开明君主。他们既是俄国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酵母”，又具有相当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带着俄国社会传统的“枷锁”。

接着要说的是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等人。

继拉吉舍夫等人之后，是新一代觉醒的俄国平民知识阶层，他们起着从贵族改良到向人民大众扩散革命思潮的过渡作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sup>②</sup>在苏联的著作中他们被笼统地称做“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sup>③</sup>这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他们既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革命思想是俄国特定历史

---

① 参阅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中“政治觉醒的开端”等章节，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0页。

② 别林斯基（1811—1848年），1839年起为《祖国纪事》、《现代人》杂志撰稿；赫尔岑（1812—1870年），著有《谁之罪？》，在《钟声》报上撰稿；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著有《怎么办？》等；杜勃罗留勃夫（1836—1861年），主编《现代人》杂志。

③ 参阅〔苏联〕马里宁著，丁履桂、郭楠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9页。



条件下的产物，既继承过去，又反映现实，更重要的是，广泛地影响着未来。从那时至今的俄国史证明了这一点。

说他们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是指他们对沙皇专制和俄国农奴制的革命性，比贵族自由主义者更进步、更激进、更彻底。在哲学方面，他们敢于向黑格尔挑战，别林斯基反驳说：“现实中存在的一切并不都是合理的。”<sup>①</sup>在政治方面，他们对沙皇专制的农奴制深恶痛绝、势不两立，他们要推翻的是整个国家制度，因此他们之中几乎所有人都遭到过沙皇专制国家机器的残酷迫害。但是，在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他们主张的是“村社社会主义”，即俄国可以不经“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市场经济

——而直接在宗法自然经济的村社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时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了马恩的学说，例如，读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他们一方面出于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恐惧而企图绕过它，另一方面又出于对俄国村社制度的偏爱而不自觉地、必然地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赫尔岑的战友奥加廖夫<sup>②</sup>的座右铭是：“我们宣誓要把一生奉献给人民及其解放事业，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他甚至肯定地说：“当我们（指他和赫尔岑）还是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头脑中产生的第一种思想便是社会主义。”<sup>③</sup>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怎么办？》（1863年）和《序幕》（1867—1869

<sup>①</sup> 《别林斯基全集》第4卷，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第493页。

<sup>②</sup> 奥加廖夫（1813—1877年），革命家、政治家、诗人，1830年莫斯科大学革命小组的组织者之一，《钟声》报的发起人和编辑，60年代初与赫尔岑等人共同筹建革命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

<sup>③</sup> 《奥加廖夫社会—政治和哲学选集》（2卷本）第2卷，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第306页。

年)更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文学化、形象化了。平民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基本上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们晚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倾向或参加过第一国际的活动。但这还不能说明他们已经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当时参加第一国际的俄国革命家形形色色,从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到恐怖分子(例如涅恰也夫)都有。平民革命知识分子表现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空想,直接导致的是革命民粹主义团体“土地和自由社”<sup>①</sup>的诞生。他们距离科学社会主义还很遥远。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马克思批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sup>②</sup>以及马克思就俄国村社问题给著名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坚持了科学的观点,认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马克思指出,只有具备下述条件才能谈及“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即“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sup>③</sup>

俄国社会转型并非易事,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到俄国社会实践中去,就更加困难。伴随着各种新思潮的出现,出现了各种政治—社会组织。它们对推动俄国社会变革,从不同的角度起着推动作用,亦即恩格斯所强调的历史发展所必需的“合力”作用。

---

① “土地和自由社”存在于1861—1864年,但在这之后,其思潮和社会实践并没有消失。

②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126—1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269页。

推动俄国社会转型的力量组合是复杂多变的。各类政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谁都离不开俄国进步力量同传统力量的较量、斗争这条主线——不论他们为自己冠以什么名义。

### 第三节 自由主义—立宪民主党：从契切林到合法马克思主义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所谓自由主义派既可以包括贵族自由派，如前述十二月党人，也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从阶级—政党的角度看，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正式成立于1905年，与它同时成立的另一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十月十七日联盟”（统称“十月党人”，即被列宁称做“黑帮”的政党）。这两个自由主义政党都存在时间不长，到1917年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它们都要求摆脱正统沙俄封建统治，使俄国新生资产阶级能够在沙俄制度庇护下得到发展。立宪民主党较为激进，十月党人则偏于保守。

这两个党的意识形态历史渊源则相当久远，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俄国政治理论界的分歧，从本质上说，是未来的俄国走一条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一条“俄国专制万岁”道路的问题。

如前所述，直到1917年俄国仍然是封建势力占主导的社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没有起过进步作用。18世纪下半叶俄国用兵频仍，国内矛盾日甚，经过克里米亚战争惨败，遂有1861年极不彻底农民改革出台。但这不是运动的终结，而是开始。恩格斯说得很对：“这样，在俄国的农村公社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

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sup>①</sup>

立宪民主派思潮和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鲍·尼·契切林<sup>②</sup>。立宪民主运动既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又突出了它的先进性。他们的理论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国家权力不能高度集中于沙皇一人，而应由有限的阶层分享。契切林当时认为俄国的立宪条件虽然还不具备，但不主张消极等待，而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向立宪制过渡。立宪民主派以沙皇专制有限的让步——地方自治机关为基地，要求实行“中央自治”制，但遭到沙皇的拒绝与压制，直到19世纪90年代立宪运动吸收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如米留可夫、罗季切夫、立沃夫、维尔纳茨基、司徒卢威等相继参加后，运动才形成规模，并使一些知识分子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力量。1899年，成立了跨地区组织“聚谈”，1903年创建非法的政治组织“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同盟”，1904年1月创建“解放同盟”。与此同时，立宪民主派的刊物《解放》也在国外创刊。<sup>③</sup>这时，列宁对自由主义派的活动是持支持态度的。他先后说过：自由主义者的言行是“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向新的抗议者——因而也是我们的新同盟者致敬。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5页。

② 鲍·尼·契切林（1828—1904年），法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③ 《解放》创刊于1902年7月1日，由司徒卢威任主编，沙霍夫斯科伊、立沃夫任编辑。

一定要帮助他们”。<sup>①</sup>

“解放同盟”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它的活动很快扩展到了工人运动内部，在工人集会上经常有人宣读自由民主派激烈抨击专制制度的文章。它支持1905年1月9日彼得堡20万工人游行请愿。同年12月武装起义失败使革命转入低潮后，国家杜马成了民主与专制斗争的新舞台，立宪派政党起着领导作用。这是1905年10月18日解放同盟改组为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后最辉煌的时期。

就基本政治立场而言，立宪民主党倾向于同革命力量结成联盟。其领袖米留可夫说：“我们右面的敌人……（是在）维护俄国大地主和工业家的狭隘利益。我们的党永远不会保卫这种利益。……在我们左面的（我无意说是敌人）同盟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界线，然而这种界线与我们右面所划的界线的性质完全不同。我们和他们一样，也是站在俄国政治运动左翼的。可是我们不同意他们关于民主共和国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只不过是理性的社会主义者……而那些左翼的则是非理性的。这就是整个的差别所在。”<sup>②</sup>从此，立宪民主派一直活跃在俄国政坛上，它所奋斗的目标——召开俄国的立宪会议，成了多数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号召民众的普遍口号。

立宪民主党的软弱性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决定的。他们的悲剧在于：既想保持专制制度的框架，又想同专制制度分享国家权力。1917年二月革命后，它更加明显右倾，成为社会革命的“第三者”，成为革命的主要阻力。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卷，第83页；第6卷，第345页。

<sup>②</sup> 转引自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第154页。

#### 第四节 民粹主义的深远影响：从革命 民粹主义到左派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成立于1901年，到1917年二月革命一直处于非法状态，是沙俄专制势不两立的敌人，代表人物是维·米·切尔诺夫<sup>①</sup>。该党名义上存在至1923年。这是最能表现俄国社会特色的一个政党。在思想信仰上，他们崇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依洛夫斯基学说，也吸收了西欧一些思想家“经验批判论”的某些成分。在阶级基础上，他们反映的是俄国农民的利益，1861年“土地和自由社”成立后，他们发起了以“到民间去”为著名口号的社会运动，并且身体力行，企图从下面发动暴力革命；但是他们作为政治家同政治觉悟甚低的农奴虽然思想上相通，但是当时却没有办法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对沙皇专制仍存有幻想并且不想跟随他们。由于响应者寥寥无几，运动以失败告终。1879年革命民粹派分裂成“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民意党仍坚持政治斗争和恐怖活动，转向以刺杀专制要员为主，而土地平分社则放弃恐怖活动，部分领导人转向1883年成立的“劳动解放社”，后来，其中的部分领导人又重归民意党。社会革命党的最大弱点是它信仰空想社会主义，把俄国村社制度理想化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经社会形态和社会生产方式，而是一种经营方式”。在

---

① 社会革命党创建人之一，党的理论家。19世纪80年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会议，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立宪会议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

俄国农村中,可以以合作社、村社、农业劳动组合等形式,达到生产社会化的目的。<sup>①</sup>由于不懈的努力和策略的不断变化,他们逐渐被农民所接受,成为农民阶级的代言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城市和工人之中,1917年以前在农村只有四个支部,影响微乎其微,而社会革命党在全部678个县里设有300个独立组织。在俄国,没有农民的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在1917年9月召开的各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力量微不足道,相反却有近一半代表拥护从社会革命党里分裂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此,布尔什维克积极开展争取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通过的两大法令之一《土地法令》,实际是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布尔什维克从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开始,才在农民中摆脱孤立状态,但直至1917年12月10日召开农民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代表也仅占91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占350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下降为305人。<sup>②</sup>由上述可见,社会革命党虽然由于先天不足,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它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是有功的,特别是后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更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生力军。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参加过第一届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至于它后来与布尔什维克反目为敌,则是要重新研究的问题。起码不能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革命党被沙皇专制制度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在推

---

<sup>①</sup> [苏联]司彼琳娜:《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念的破产》,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19--20页。

<sup>②</sup> 徐天新:《评左派社会革命党》,载《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8、102页。

翻沙皇专制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后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更不应视为正常现象。

### 第五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孟什维克派

十月革命前,孟什维克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尽管它是一股强大的思潮。它曾于1907年试图组成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但没有成功。<sup>①</sup>所以在名义上,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直到1917年都是在同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活动的。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上没有出现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野,那次大会只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试图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开始。<sup>②</sup>孟什维克,1903年因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列宁的新型建党原则并处于少数地位而得名(“孟什维克”在俄语中意为“少数”)。但在后来大多数的革命历程中,孟什维克并不总是处于少数地位,例如,在1905—1907年革命后,革命形势陷入低谷时期、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段时期,等等。孟什维克的特点是派别林立,组织松散,从接近布尔什维克到倾向于伯恩斯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都不乏其人。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劳动解放社骨干分子几乎都是向俄国传

---

① 只有十月革命后,少数左翼孟什维克于1918年2月在彼得格勒召开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派)成立大会,又称“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政党。该党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谴责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反布尔什维克活动,1918年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爆发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后,大部分成员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其右翼退党。其他人于1919年2月加入俄共(布)。

② 大会代表九人,列宁因为在流放地,没能出席大会。



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如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但后来却成了孟什维克主义者。孟什维克派理论和实践的特点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受西欧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第二国际的和平发展道路影响很深，忽视俄国的实际。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但是，今天回头来看，他们的追求也不是无一可取之处。他们向往民主、繁荣、自由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有影响的。

## 第五章 布尔什维克的崛起与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崛起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可以说,是俄国革命力量长期探索社会变革道路的必然。布尔什维克最大的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运用于俄国的具体实践中。其次,它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另一方面又要同渗入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俄国历史传统中有害的痼疾做顽强的斗争,即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扩张野心、个人独裁、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跨越阶段论)等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做不懈的斗争。

在整个 20 世纪里,俄国(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成长道路是曲折的,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 第一节 普列汉诺夫—列宁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孟什维克的精神领袖,但他同时又是向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他是从革命民粹主义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不仅是民粹派“土地和自由社”、“土地平分社”的重要创始人,而且也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1883年)的创始人。1882年他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获得了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高度赞许并为之作序。<sup>①</sup>

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期，是普列汉诺夫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他以马克思主义观撰写的哲学、思想文化史著作，至今仍葆有巨大意义。列宁对他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早在若干年以前就认为反对波格丹诺夫是责无旁贷的。因此，以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孟什维克，同波格丹诺夫进行了笔战。”列宁还称赞普列汉诺夫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sup>②</sup> 1921年是俄共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一年，列宁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是共产党员“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sup>③</sup> 正是在列宁的倡议下，1923—1927年苏联出版了24卷本《普列汉诺夫全集》（原计划出版26卷）。至于各种专集就更多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盛行个人崇拜时期，出现过一股否定普列汉诺夫历史功绩的思潮。<sup>④</sup>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抓住普列汉诺夫的要害。

普列汉诺夫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功绩是无可否认

---

① 《共产党宣言》传入俄国还要更早，1864年在彼得堡的《国外通报》第6期登载过拉弗罗夫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宣言》第一章的部分内容；19世纪60年代由巴枯宁全文翻译；1869年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并运往俄国，途中被警察截获，只有少部分运进国内；19世纪70年代前期再由莫斯科大学生小组秘密刊印。转引自《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科学社会主义特刊》，1998年）第7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324页；第20卷，第129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419—420页及其脚注。

④ 参见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2—645页。

的。他的弱点在于：受处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第二国际影响太深了，而对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俄国实际，却把握不住。早期，他是革命民粹主义者，幻想超越市场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思想来源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的空想社会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第二国际及西欧各国呈现出的“和平过渡”趋势的背景下，他又认为俄国缺少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条件。他的理论和实践始终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他是一个始终不渝追求真理的人，但在他的追求中有一种悲剧成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同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一样，主张维护俄国的胜利，而发展到后来，他直接否定十月革命，就是必然的了。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推论，东方国家就没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夺得革命的胜利，当然就更谈不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了。

相形之下，列宁就高出一筹了。

## 第二节 俄国国情与列宁的早期学说

列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于他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杰出的革命家一样，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原理，首先致力于俄国国情研究。<sup>①</sup> 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

---

<sup>①</sup> 例如，恩格斯的专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5月）及多篇论文；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

春)、《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和《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都是列宁学说的奠基之作。这些著作和其他一系列文章为形成布尔什维克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创新,起码有以下几点:

一、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列宁则确认俄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西欧各党普遍谈论的是社会主义变革问题,而且认为变革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思潮中,列宁能够实事求是地确认俄国革命的独特性质是很不容易的。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列宁论证说:“……必须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sup>①</sup>后来,列宁在为这部著作作序时,更加明确地说:“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sup>②</sup>在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237—238页;单引号中的话源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0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161页。

革命性质问题上,列宁不仅划清了同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界线,而且严格区分出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不同。他的结论是:在俄国“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sup>①</sup>值得重视的是,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后来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极大的启发。毛泽东从20世纪30年代初接触这部著作开始,就被它所吸引,到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sup>②</sup>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新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这是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性决定的。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担负起这个任务,那么它就会在历史的挑战面前畏缩不前,这个挑战是:“我们敢不敢胜利?”列宁论证说:“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sup>③</sup>

三、与当时西欧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不同,列宁提出,俄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只有组织成具有铁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职业革命家集团,才能胜任上述任务。这是布尔什维克与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56页。

② 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258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608、614、616页。

孟什维克的分水岭。面对强暴的沙皇专制制度，这个“职业革命家集团”只能走武装起义的道路，用暴力推翻旧制度。列宁反复强调，决不要幻想沙皇制度会允许一个以推翻这个制度为最低纲领的政党合法存在。

四、与俄国民粹派不同，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不是搞个人英雄主义、搞密谋、搞恐怖活动（例如暗杀活动），而是社会革命运动。“作为先进的和惟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作为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sup>①</sup>

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它也有历史局限性和后来经历的曲折。列宁的学说不是凝固不变的，必须用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研究列宁主义。但是，不管怎么说，“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遗憾的是，后来斯大林等人没有继承列宁学说的优秀传统，抛弃了这一科学学说的合理内核。

###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分野的再回顾

1895年底，在列宁的倡议下，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立“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是按照集中制、严格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参加协会核心组织的有15—17人，分别领导三个区，工作重心是工厂中的工人小组。尽管协会是按照列宁的思想组建的，可以说是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雏形，但是参加者也不乏后来的孟什维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尤·奥·马尔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616页。

托夫。此后出现了在更大的范围内组成统一政党的要求。1898年3月1—3日,在明斯克举行有几个地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参加的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选出由三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党的名义发表宣言,称:“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然后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sup>①</sup>但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制订党纲和党章。从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文章里同时使用的名称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组织名称一直存在到1917年。<sup>②</sup>孟什维克方面,除了局部的派别组织之外,一直没有独立的全国性组织。为了宣传党的宗旨,也为了给制定党纲和党章做准备,列宁于1900年8月专程去国外同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商讨出版党报、党刊问题。双方经过争论、让步,终于达成协议,由列宁拟订编辑《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方案。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任编辑,劳动解放社的普列汉诺夫、查苏里奇、阿克雪里罗得是有表决权的撰稿人(后来均成为正式编辑)。《火星报》的出版争取了较多的“同路人”,为列宁的建党纲领和党章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准备了条件。1903年7—8月,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拥有51票表决权,成员大致分为四个派别:以列宁、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坚定火星派,<sup>③</sup>拥有24票;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火星派,拥有9票;经济派和崩得派是“反火星派”,拥有8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第13页。

② 1917年布尔什维克单独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1925年改称苏联共产党(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

③ 转引自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第249页注。



票；动摇于两派之间的中间派“南方工人协会”（“泥潭派”）拥有 10 票。表决党纲时，分歧不大，只有一票弃权，基本获一致通过。但在讨论党章时，分歧却异常尖锐。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第一条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sup>①</sup> 反对这一点的是不坚定的火星派分子马尔托夫，他的草案虽然认为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和在物质上支持党，但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活动，只需以某种方式（例如财政上）支持党就可以了。两者的实质有天壤之别。按照列宁的方案，无疑就能够实现列宁的前述建党原则。而按照马尔托夫的方案，党就会变成一个松散的、成员自由进出的、工会式的“民主”联盟。大会表决结果是马尔托夫获胜（28：22，一票弃权）。但是列宁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获得了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即大会选出了列宁派占优势的《火星报》编委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总委员会（负责协调中央委员会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列宁被选为《火星报》编辑，并因此参加党的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他们都是列宁的拥护者。经过辩论，大会决议赋予中央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它“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际活动”，调配党的人力和物力，组织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这些机关的活动，“中央的一切决议，各级党组织都必须执行”。<sup>②</sup> 列宁提出的党章方案虽然未获得通过，但是会议结果却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坚定火星派占了上风。由此，列宁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意即多数派），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一派则被称为孟什维克。

这种情况决定了，贯彻列宁的建党纲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7 卷，第 238 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1 卷，莫斯科，1954 年俄文版，第 46 页。

### 一、布尔什维克建党纲领的初步贯彻

布尔什维克派虽然在中央一层即中央委员会、党的总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占有多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各地方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中也占有多数。即使在中央一级贯彻列宁的主张，也是困难的。例如，代表大会后不久（1903年11月）《火星报》的主导权就被孟什维克夺取，因而从第52期起它开始宣传孟什维主义，列宁愤而退出编辑部。1904年7月，孟什维克又夺取了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权。另外，普列汉诺夫在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本来是赞成列宁的，这时却以扩大编辑部为名，使四名有表决权的孟什维克撰稿人进入了编辑部，实际是搞了一次党内“政变”。列宁退出编辑部之后，普列汉诺夫为了调和党内矛盾，又使列宁被增补进中央委员会。列宁在中央委员会里又开始了同孟什维主义的艰苦斗争。1904年5月他出版了名著《进一步，退两步》，大力宣传自己的建党原则。此后，局面仍很困难。1905年春，在中央机关暂时占优势的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了单方面的“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这一时期的理论家和领导人是马尔托夫、唐恩、普列汉诺夫、阿克雷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马尔丁诺夫等人。这时的孟什维克一方面公开“承认自己是跟党的另一部分断绝了关系的一部分，同时却羞羞答答地把持着全党的称呼和名称（‘中央机关报’，‘总委员会’），同时却把持着国外同志们为全党募集的经费，把持着属于全党的印刷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做正直吗？”<sup>①</sup> 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示弱。同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81页。

年4—5月，布尔什维克在伦敦也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同样称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时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了，1月9日发生了“流血的星期日”事件。出席伦敦大会的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代表，大会就武装起义和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行为通过了决议。会后，革命形势使得两派趋于一致。1906年4—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又称“合并大会”）。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已成定局后，以布尔什维克为主于4—5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伦敦）。大会通过了谴责革命逃跑主义者一取消派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次革命中的妥协路线的决议。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此后，两派都陷入了革命低潮时期的困境中。直到1917年8月，即二月革命后才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崛起为拥有24万党员的大党了。

## 二、布尔什维克的困难时期

到1917年8月之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基本上是在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名称下活动的。尽管两者都有自己的地方性组织或专门组织，但是想确切说出两者在各个时期拥有的成员数，是很困难的事。苏联解体前，曾出版过一部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是一部资料翔实的集体专著，<sup>①</sup>也未能回答这个问题。其

---

① 作者手头有的是这部专著的第2卷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恰恰是叙述1905—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历史的，书中找不到准确的数字。

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分子,他们今天可能拥护孟什维克,明天形势变化了,又可能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去。即使列宁本人也曾一度坚决反对在具体的社会民主工党普通成员之间划出一条政治界限。1906年6月,波格丹诺夫等人曾建议召开“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你们宣传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这表明你们对党已经完全绝望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始终维护党性,现在我们继续执行的也只有这条路线,可是你们却在基层鼓吹分裂。在孟什维克中也有维护党性的派别。我们坚信并且捍卫党。”<sup>①</sup>

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史料,以有限的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崛起的曲折经历。

1905年3月,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形势显现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彼得堡、莫斯科、里加、下新城等大城市有成员近3500人。<sup>②</sup>发展速度很快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执行的是“左派联盟”政策,即同“孟什维克、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劳动派以及代表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民族的民粹主义政党”联合行动的政策。<sup>③</sup>同年秋天,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拥有成员约6500人,<sup>④</sup>在工人、士兵中的影响急剧增长。十二月武装起义在莫斯科、彼得堡遭受挫折后,革命势头并没有减弱,1906年4—5月社会民主工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0—11页。

② [苏联]波诺马廖夫主编、郭值京等译:《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135页

④ 同上书,第145页。

党第六次(合并)大会时,全党成员“已超过10万人”。<sup>①</sup>大会虽然没能完全弥合各派的分歧,但是,大会批准了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新党章,党章第一条采用了列宁的提法。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和影响都在增强。到1907年5月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党员15万人,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共303人,其中,布尔什维克有表决权的代表为89名,孟什维克为88名。<sup>②</sup>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党的队伍急剧萎缩,一些人遭到镇压,一些人脱党,一些人逃亡国外。到1908年底,仅布尔什维克就有近900名成员住在国外。<sup>③</sup>

在革命低潮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召回派、造神派、调和派(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等革命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和无原则的“中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也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他同布尔什维克一道建立护党联盟,参加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贡献尤为显著。列宁在其著作中多次给予普列汉诺夫极高的评价。

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才迎来了新的革命高潮,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俄国第二次革命高潮来临和布尔什维克再度崛起,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势逼近、爆发以及俄国陷入空前的社会危机分不开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389页。

② [苏联]波诺马廖夫主编、郭值京等译:《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第270页。

③ 同上书,第311页。

### 三、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布尔什维克

沙皇政府在镇压俄国第一次革命时，被迫实行“六·三”政治体制改革和斯托雷平土地改革，但是俄国的社会危机并没有解决。由于沙俄加紧推行向外扩张政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之一，更加深了国内的危机。

1907年7月，在英法的支持下，沙俄同日本签订第一次俄日秘密协定，瓜分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北满和外蒙被划入沙俄的势力范围，南满属于日本势力范围。1910年7月，俄日签订第二次秘密协约，规定第三国不得进入上述势力范围。1912年11月，沙俄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直接同它扶植的外蒙伪政权签订所谓的《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约》，规定俄国有权保护外蒙“自治”，协助训练军队，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俄国在外蒙享有治外法权及其他一系列特权。1913年11月，袁世凯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援助，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签署《中俄声明文件》，对沙俄做出让步。1915年6月，袁世凯又在沙俄的淫威下，签订《中俄蒙协约》（《恰克图协约》）。此外，1914年6月，沙俄悍然派遣大军进入外蒙西冯部唐努乌梁海，单方面宣布将这部分中国领土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1916年7月，俄国忙于欧洲战争，又与日本签订秘密协约，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规定：任何第三国进入上述势力范围，均将被视为敌国。<sup>①</sup>但俄国的扩张重点在欧洲。它同英法结成军事同盟，积极介入两次巴尔干战争，力争夺取黑海出海口，最终于1914年8月1日对德宣战。当年，俄国征召740万人人

<sup>①</sup>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第388—392页。

伍，次年再征召 430 万人。仅从军人数就占产业工人的 40%。<sup>(1)</sup>这无疑使俄国本已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雪上加霜，从而出现了 1917 年的革命机遇。

#### 四、二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

从史料上看，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对二月革命有完整的发动纲领，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列宁概括说：“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避免的标志，这是不容怀疑的。”<sup>(2)</sup>这是二月革命后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根本原因。起初，布尔什维克在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中都不占优势。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它的地方组织严密，有统一的纪律，大批领导人和党员迅速从流放地和国外返回，形成同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尖锐对立的反对派。最重要的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适时地提出了反映俄国民众切身利益的口号。1917 年 2 月 23 日，十几万群众涌上街头，喊出的口号是“要面包！”“打倒专制！”“打倒战争！”列宁虽然把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他动员民众的口号却是彻底的民主主义的：“面包、自由、和平”和“面包、自由、和平”+“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sup>(3)</sup>其他各党恰恰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踟躇不前，甚至幻想同旧政权搞妥协，因此在迅速加深的社会危机中急剧丧失了群众的拥护，士兵和工人转面参加或拥

---

(1) [苏联]基塔尼娜：《战争、面包和革命》，列宁格勒，1985 年俄文版，第 10 页。

(2)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169 页。

(3) 同上。

护布尔什维克。到了1917年7月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拥有162个组织、24万党员，尽管在苏维埃中仍不占多数，但已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了。

同年8月25日，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领导的武装叛乱，矛头直指临时政府。它要推翻的是软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然，掌握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中的苏维埃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是使1917年俄国革命形势出现根本转折的关键事件。

### 五、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

科尔尼洛夫叛乱表明，沙皇制度仍有复辟的可能。临时政府慌了手脚，不得不放手让布尔什维克发动并组织工人和士兵去镇压叛乱，组织涣散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和平夺取政权的幻想，跟着临时政府跑。布尔什维克在战胜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同时，也无限地壮大了自己。接着，布尔什维克相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许多大城市的苏维埃取得了多数的优势。

这时“以暴抗暴”的时机成熟了。从9月份起，列宁不失时机地把武装起义计划提上了日程（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一封单独给中央委员会的信《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但列宁首先碰到的障碍，却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内部。本来，1917年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接受并通过了列宁的武装起义计划。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却在半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公开发表反对武装起义的言论，遭到了列宁的严厉谴责，认为这是一种“叛徒立场”。托洛茨基犹豫不决，表示在召开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夺取政权更为妥当。武装起义时机成熟了，但苏维埃代表



大会的召开日期却没有确定。斯大林内心里同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主张。他除了在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上没有经过编委会同意就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反对列宁的谴责声明外，还擅自加了《编者按》，实际是维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立场。<sup>①</sup> 斯大林后来在经过修改的著作中竟然为自己这样辩解：“于是，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10月25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那时伊里奇已经到了彼得格勒。他微笑着，狡黠地瞅着我们说：‘是的，恐怕是你们对。’这使我们感动了。列宁同志是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的。”<sup>②</sup>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67页；并见[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81页。

## 第六章 对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历史反思

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面貌，创造了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新生的机遇。不管我们对列宁主义爱也好、恨也好，十月革命对世界的震撼力量都是不可磨灭的。今天，它所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作为后来人，我们不仅应该反思斯大林及其以后的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也有必要深入一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和反思十月革命前后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因为，我们不能断然地说，斯大林—苏联模式同列宁时期的一切都毫无联系。这里提出以下问题，仅供研究。

### 第一节 农民国度与社会主义革命的 领导力量及主力军问题

如前所述，列宁从一开始就对俄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具有清醒的认识，即从整体来说，俄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前的“农民”的封建的国度。农民占了总人口的 3/4，1905 年，8500 万农民中，有 7500 万人属于无地或少地户（只能租用地主土地，租金占收成的 80%

多),农奴制残余随处可见。<sup>①</sup>但是,令人奇怪的是,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的工作重心却放在城市,没有力争在农村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917年前,布尔维克有两万多党员,可是在农村只有四个支部、494名党员(约占2%);到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万名党员,可在广大农村却只有203个支部、4122名党员(约占10%);直到1918年苏维埃中央政权已经确立,布尔什维克仍在40%的县级苏维埃不占多数。<sup>②</sup>同时,以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社会革命党(后来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却一直在农村占据主要地位。

这里的第一个疑问是,在理论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否有过高估计俄国无产阶级、过低估计农民力量的问题?1913年,俄国各类工人178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其中真正的产业工人占一半略多,为900多万。<sup>③</sup>列宁一贯强调俄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革命战斗力却远远高于西方无产阶级。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考虑到俄国工人只是脱掉草鞋“刚刚”换上工装这一事实,那么,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只能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将在这个革命中构成被领导的主力大军也是无疑的。但是,布尔什维克却常常把农民,特别是广大的中下层农民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农民—土地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理论中一直没有得到妥善明确的解决,农民经常被视

---

① [苏联]费尔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1987年俄文版,第308—309页。

② 徐天新:《评左派社会革命党》,载《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第103页。

③ 参阅[苏联]费尔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第313—314页。

为无产阶级的异己力量。国内战争时期实行剥夺农民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是偶然的。直到1920年4月,处于国内战争末期的列宁还认为:“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①</sup> 可否说,正是这种摇摆不定的“异己”观念,成了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成因,也更深远地决定了苏联后来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实行。在整个苏联存在的大部分时期,对农民实行的是“剥夺”政策,其恶劣后果至今难以消除。

## 第二节 走向一党执政的第一步： “转瞬即逝”的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是俄国早期革命时期就已提出的奋斗目标,各类革命或改良政党、运动——包括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在内——无不视召开立宪会议为俄国社会制度新生的起点。历史的“误会”在于,它召开于十月革命刚刚成功之后,即1918年1月5日:掌权的政党与其他各党通过普选得到的代表席位比例(力量对比)相去甚远。这本来就在布尔什维克的预料之中。立宪会议的组成为:总席位715位,其中依次是:右派社会革命党370席;布尔什维克175席;民族政党86席;左派社会革命党40席;立宪民主党17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只是到了1921年3—4月,列宁才转变了对农民的看法,说“勤劳的农民是我国经济振兴的‘中心人物’”。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77页。

席；孟什维克 15 席；人民社会主义者 2 席；无党派 1 席。<sup>①</sup>此外，根据 1917 年 11 月对 54 个选区的票数统计，各主要政党的得票比例是：布尔什维克 25%；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62%；立宪民主党及其他 13%。<sup>②</sup>就是说，不论从哪个统计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及其拥护者（左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左派、人民社会主义者等）都不可能占据多数，不可能同右派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党相抗衡。刚刚通过暴力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当然不可能把政权拱手让给右派。对此，布尔什维克也有准备。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夕，即 1918 年 1 月 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全会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一部宪法性文件，即《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它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两个党团联合提出的，专门供立宪会议采用。该文件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苏维埃，同时规定立宪会议的任务是：拥护苏维埃政权和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制订对俄国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原则。<sup>③</sup>1 月 5 日，立宪会议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主持开幕，随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代表立即退出会场。第二天，即 1 月 6 日，人民委员会正式下令解散立宪会议，多数派代表被武力赶出会场。

至此，被追求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立宪会议，由于不能顺应历史潮流，仅仅存在了一天，就寿终正寝了。当时，俄国国内外许多名人，甚至共产党人对此是不理解、有怨言的。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无

① [苏联]A. H. 什梅列娃：《列宁的党反对小资产阶级集团和派别的斗争》，莫斯科，1918 年俄文版，第 153 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8 卷，第 1—3 页。

③ 《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 1 卷，莫斯科，1957 年俄文版，第 314—323 页。

情。究竟应如何对待立宪会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那么,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该怎样看待呢?

### 第三节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从多党制到一党制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度是苏维埃最高权力机构的重要环节之一,曾是以布尔什维克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机构。

列宁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三权鼎立”结构是持否定态度的,特别是对议会体制,贬之为没有意义的“清谈馆”。他主张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立行合一”的政权体制。因此,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是按“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格局组建国家权力机构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休会期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能,人民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和中央执委会的行政部门。且不说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在实行过程中所遇到的职能不清、相互扯皮的种种困难,<sup>①</sup>最值得研究的还是,苏俄政权如何从多党联合转变为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从而对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一直演变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领袖专政”。

事实上,主张“立行合一”的列宁,最初并不主张一党执政,而是力主以布尔什维克为主导的多党联合执政。只是后来由于事态的发展,事与愿违地走向了另一极端。

按照最初的政权格局设想,1917年10月26日(十月夺权后

---

<sup>①</sup> 这方面的情况请参阅姜长斌:《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第2章“苏维埃最高政权机构的权力分配”,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翌日),在由多党代表参加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按党派代表比例原则(10名代表选1人),选出102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30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6人;乌克兰社会主义党3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人。随后中央执委会成员大幅增加。最多的有两批,即12月10日农民苏维埃执委会代表108人和1918年1月初立宪会议解散后,原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代表全部加入中央执委会,使其成员激增至326人。<sup>①</sup>这时的机构就显得臃肿庞大了,无法代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平时职能,不得已只好组建中央执委会10人主席团(按党派每10名代表选1人),其中布尔什维克6人,左派社会革命党4人,另有2名布尔什维克为候补成员。<sup>②</sup>

人民委员会本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委会的执行机构,即工农政府。在全俄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开会讨论政府人选时,曾直接邀请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三位著名领导人(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与会并参加政府,但没有结果。这样,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共设11个委员部,15个人民委员,全是布尔什维克。此时,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处于犹豫状态,他们并不否定工农政府,只不过还想在布尔什维克同右派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之间做些调停工作。后来,调停无望,更由于各地农民代表的要求,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态度也迅速明朗起来。其间,也

---

<sup>①</sup> 其中布尔什维克18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111人,乌克兰社会主义党4人,社会革命党2人,孟什维克1人,无政府主义者1人,人民社会党1人,波兰社会党左派1人,无党派6人;见《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几个月里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莫斯科,1977年俄文版,第30—3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5、47页。

就是1917年11月中旬,布尔什维克提议左派社会革命党在政府中占5—6个席位,而尚未决定单独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只同意占2—3个席位。11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柯列加也夫成为工农政府农业人民委员,12月9日,又有七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成为内阁成员。这届联合政府一直顺利地工作到1918年3月15日。<sup>①</sup>

促使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开始分裂的起因有二。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许多人激烈反对签订对德布列斯特和约,以退出联合政府表示抗议,但是他们并未退出全俄中央执委会;二是,国内战争爆发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取代农村苏维埃,以便推行“余粮征集制”。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出现了两党的暴力对抗。从此,布尔什维克对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对它到处实行极其严厉的镇压政策。随之而来的是布尔什维克修改了总体的政党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从苏维埃俄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其他小党也随之消失了。

上述两大起因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为反对布列斯特和约而采取过激措施,当然是错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不是不可挽回的。当时,连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不少人反对签订和约想不通,例如布哈林等著名共产党人。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列宁的主张是对的,他们也就回心转意了。至于贫农委员会和余粮征集制问题,责任主要在布尔什维克。事实证明,后来由军事共产主义向

---

① 以上见[苏联]伊柳辛娜:《论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妥协问题》,载苏联《历史学报》,1963年第73期,第18页;[苏联]科烈涅芙斯卡娅:《苏维埃国家管理最高机构的建立》,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第34—43页。



新经济政策过渡,对苏维埃政权只是构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他们没有实力推翻苏维埃。考虑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不论是在协助布尔什维克取得十月革命胜利,还是在随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都是立有“汗马功劳”的,那么布尔什维克无限度的镇压措施就值得研究了。对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消灭,不仅在当时引起大量中农的恐慌和敌意,更主要的是苏维埃政权大框架的改变:由以布尔什维克为主导的多党联合变为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

这对后来的政权建设显然是不利的。

以上只是提出了三个值得反思的历史问题。当然,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还不止于此。例如,关于暴力输出革命(1920年进军华沙)、共产国际与各党的关系、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关系,等等,都是同后来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很密切关系的大问题。

## 第二编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学说的理论与实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使地球上一亿人首先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世界”,<sup>①</sup>揭开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给全人类带来了美好的希望,因而震撼了整个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各种因素中,列宁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战略、策略思想,以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起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俄的诞生和发展,是与列宁及其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缔造者;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十月革命成功的理论保证,是苏俄诞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石。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75页。

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sup>①</sup>

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列宁的革命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列宁的革命学说中的某些理论也确实有其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性。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不复存在的今天,在人们对苏联兴亡的历史和原因进行深入探寻并产生许多不同看法的今天,深刻地认识列宁革命学说的伟大历史作用,正确分析列宁革命学说中某些理论的不足和历史局限性,对于我们探寻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吸取其经验教训,无疑是有助益的。

---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2 页。

## 第七章 列宁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俄国国情的认识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一个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sup>①</sup>列宁的革命学说,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列宁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是列宁革命学说的基础,也是列宁革命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 第一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国情

#### 一、封建制的俄国资本主义却已 发展到特殊的垄断阶段

总体说来,1642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封建时代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6 页。

级革命是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一次更加彻底、更加深刻的革命，它影响和推动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封建斗争。到19世纪50、60年代，包括俄国在内的欧美各主要国家都基本上进行了封建制度的变革，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晚得多。它比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大约晚二百年。1861年俄国才实行农民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发展起来。此后，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因素占重要地位的国家，并以比欧美国家短得多的时间进入了垄断阶段，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时的俄国，生产集中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例如：1900年南俄七个大工厂所冶炼的生铁，占全国炼铁工业总量的37.6%；巴库五个大公司所生产的石油，占全国石油产量的46.2%；1902年成立了出售五金制品的辛迪加——“五金公司”，在石油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是“诺贝尔兄弟公司”和“罗特施尔德公司”两个垄断集团；纱线辛迪加虽然只包括两家公司，却囊括了俄国市场；1904年成立的专卖车厢的辛迪加——“车厢公司”，几乎垄断了俄国火车车厢的全部销售量。与此同时，银行和股份公司也加速发展。20世纪初，八个最大的银行控制了俄国全部银行资本的55.7%，银行控制了冶金工业资本的50%，控制了采煤工业资本的60%和电气工业资本的80%，银行资本与工业已融为一体。<sup>①</sup>但是，此时的资本主义俄国，与其他先进的欧美国家相比，有着许多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正如列宁所说，

---

<sup>①</sup> 参见[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3卷，第5—9页。

此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

## 二、俄国国情的特殊性

俄国国情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占优势、封建自然经济成分占主导的国家。一些比较新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据莫斯科高校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19 世纪—20 世纪初俄国史》统计,1897 年俄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城市的居民只占总人口的 13.4%,1914 年上升为 17.9%,各类工人为 178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1%;从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构成看,1914 年,农业资产占 53.7%,工商贸、交通、通讯加在一起,一共才占 46.3%;从国民收入构成看,农业占了 53.6%,其余仅占 46.4%。<sup>①</sup>

第二,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农奴制的残余还普遍存在,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新生的资产阶级严重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俄国的农奴制尽管在 1861 年被宣布废除,但由于这次“农民改革”是由沙皇颁布诏令,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它不可能摧毁封建的沙皇专制制度。于是,沙皇专制制度不但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而且还继续在俄国行使着专制的权力。新生的俄国资产阶级严重依附于沙皇专制制度,因为许多资本家就是从封建地主演变而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依靠着沙皇专制制度而存在、发展起来的。在俄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前,俄国工业中心城市出现的规模庞大的以封建家族为核心的工业集团,以及在进入垄断之后出

<sup>①</sup>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2 期,第 18 页。

现的官资结合的金融财团，便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尽管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但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继续存在，严重地阻碍着俄国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其他国家。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俄国生产的集中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然而经济技术仍然十分落后，而经济技术落后的第一个表现是农业落后。俄国直至十月革命前，还保留着封建农奴制的残余，保留着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普遍存在着农民的小商品生产，而且在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宗法制的自然经济，因此，俄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低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料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及德国的1/9、美国的1/2；1913年俄国每公顷耕地使用的化肥平均为6.9公斤，而比利时则为36公斤；在1909年至1913年间，俄国谷物的平均产量每俄亩为45普特<sup>①</sup>，而丹麦为195普特，德国为152普特。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还表现在工业方面，例如，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7%、德国的16.7%、英国的21.7%、法国的40%；战前俄国工业设备的总马力只相当于美国的1/15；机械化作业在俄国采煤工业中只占1.7%，而在美国则占50%以上。再从人均生铁消费量来看，1911年美国为233公斤，德国为136公斤，比利时为173公斤，英国为105公斤，而俄国仅为25公斤。俄国所装备的现代化生产工具比英国少3/4，比德国少4/5。比美国少9/10。<sup>②</sup>俄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很低。1913年，俄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及美国的1/10，从时间上看，俄国的劳动生

① 普特为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379页。

产率水平比美国要落后半个多世纪。

第四,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广大人民群众深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罢工斗争接连不断,农民暴动频繁发生,但基本上都是自发的。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激增,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抗日益加剧,工人阶级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运动蓬勃兴起。特别是 19 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国内发生大饥荒,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都表现得十分尖锐:工业停滞、经济萧条、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资本加速集中、工人大批失业、农民在饥饿中和死亡线上挣扎。沙皇政府对人民的压榨和压迫更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俄国的工人运动开始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1901 年 5 月 7 日,彼得堡奥布霍夫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变成了军警同工人的激烈搏斗,震动了全国。1902 年 11 月,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了整个城市的罢工和游行示威。1903 年,27 个城市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和集会。1904 年的夏季罢工浪潮席卷了彼得堡、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下诺夫哥罗德并涉及高加索。从 1904 年 11 月起,许多城市举行了反对日俄战争的示威游行,12 月又发生了巴库工人大罢工。而仅 1905 年 1 月就有 44 万工人参加罢工,比过去 10 年的罢工总人数还多。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暴动也频繁发生,学生运动声势浩大。1902 年春天,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省爆发的农民起义席卷了拥有近 15 万人口的 165 个村庄,自发的农民运动扩展到全俄国的许多地区。1900—1904 年,俄国农村地区发生的骚动达到 670 余次,比过去 10 年多两倍。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因对行政当局不满而掀起的学生运动风潮也十分猛烈。

第五,尽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是



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尽管俄国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但沙皇政府仍然积极实行领土扩张政策，与其他大国争夺势力范围。这个时期，沙皇俄国参加了1900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1904年，为了同日本争夺太平洋霸权和瓜分中国，沙皇俄国同日本发生了冲突，打了一场战争；1914年，沙皇俄国又参加了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发展水平本来就十分落后的俄国经济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破坏，使原本就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整个俄国社会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第六，曾是一种革命思潮的民粹主义成为俄国传播社会进步思想的障碍，也是俄国的特殊国情之一。长期流传于俄国社会，并在俄国的知识分子和一些先进工人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民粹主义思潮，在19世纪60、70年代时，曾代表农民利益，主张为彻底消灭农奴制残余而进行斗争，因而是一种革命的思潮。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废除农奴制后的俄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粹主义者不了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偶然现象，不可能发展起来，因而无产阶级也不会壮大和发展。他们宣布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退步，是错误，是偏离了仿佛为俄罗斯民族全部历史生活所规定的道路。他们把俄国农奴村社制度理想化，仍然主张通过政治变革使俄国村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宣扬唯心主义，特别是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甚至采取个人恐怖策略继续其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这时的民粹主义思潮已经变成了阻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屏障”。

## 第二节 列宁对俄国国情的深刻分析和科学认识

### 一、农奴制度的残余阻碍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俄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国情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列宁认为当时“在俄国占优势的还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sup>①</sup>

列宁首先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在 19 世纪 90 年代撰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中，多次阐明了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其障碍。

1894 年他指出，资本主义现时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sup>②</sup> 1895 年他又强调，“资本主义不仅在工厂工业中，而且在农村中，总之在俄国各地都已经稳稳地盘踞下来，已经完全定型了”，<sup>③</sup> 在俄国，“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sup>④</sup> 20 世纪初，列宁又进一步指出，俄国资本主义也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6 卷，第 329 页。

② 同上书，第 1 卷，第 164 页。

③ 同上书，第 340 页。

④ 同上书，第 341 页。

“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充分证明。而糖业辛迪加又明显地表明了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

在深刻阐明俄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列宁也清楚地认识到，尽管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了垄断阶段，但俄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小农占优势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度。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篇著作中，引用了1897年俄国人口调查中的数字，指明当时俄国城市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2.76%，<sup>①</sup>也就是说，经营农业的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5/6左右，而从事大小工业、商业、铁路和水路运输业、建筑业、森林采伐等等的人口总共只占全国人口的1/6左右。列宁还指出，尽管1861年俄国宣布废除农奴制，但俄国社会中还保留着许多封建农奴制的残余，如君主制、等级制、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而沙皇专制制度是“这些农奴制残余中最大的残余”。<sup>②</sup>列宁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依然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空前落后的国家，是一个贫穷和半开化的国家”。<sup>③</sup>列宁强调，“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它不能不是缓慢的”。<sup>④</sup>而俄国经济之所以发展缓慢，落后于其他欧洲先进国家，列宁认为其原因是，“俄国资本主义前的即农奴制的社会制度的许多残余，极其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sup>⑤</sup>“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sup>⑥</sup>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13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94页。

③ 同上书，第23卷，第379页。

④ 同上书，第3卷，第552页。

⑤ 同上书，第6卷，第194页。

⑥ 同上书，第3卷，第552页。

## 二、俄国社会深刻的阶级分化和革命形势

列宁还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俄国社会发生的深刻阶级分化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指出,随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农村村社解体,农民生活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变动,产生了深刻的经济悬殊和阶级分化,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明确指出:“商品经济体系作为我国包括‘村社’‘农民’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的主要背景,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同时还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商品经济而且正是这个商品经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成雇农)和资产阶级(吸血鬼)。”<sup>①</sup>在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下,“全俄国农户的绝大多数即几乎 2/3 都是贫苦农民……每逢荒年,每逢歉收,总有几万农户破产。……所有较好土地又都落在地主和富裕农民手里。这样,破产的人年年增加……他们的生活(姑且算是生活,而确切些说不能算生活,只是勉强度日)不靠田地,不靠家业,只靠当雇工”。<sup>②</sup>

对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社会危机,列宁也看得十分清楚和透彻。他指出,“俄国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残余还异常强而有力(比西欧),它像一付沉重的枷锁套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身上”,<sup>③</sup>“在俄国,工人的处境是,他们被剥夺了最普通的公民权利。他们既不能集会,也不能共同讨论自己的事情,既不能结社,也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196 页。

② 同上书,第 7 卷,第 133 页。

③ 同上书,第 1 卷,第 255 页。

不能刊印自己的声明。……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俄国（所有的欧洲国家中也只有俄国）直到现在还保存着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也就是保存着这样一种国家机构，沙皇一个人能够任意发布全国人民必须遵守的法令，而且只有沙皇任命的官吏才能执行这些法令”。<sup>①</sup>而俄国人民本身毫无民主可言。俄国人民生活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毫无民主，使俄国到处刮起革命的风暴，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学生运动十分猛烈地此伏彼起，而沙皇越来越频繁地动用军队来镇压罢工、游行示威和农民起义。列宁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革命的形势，他在1902年时指出：“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暴风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平静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时代的半个世纪作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革命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继续发展。”<sup>②</sup>

对于已经变成俄国社会进步思想传播障碍的民粹主义，列宁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列宁指出，民粹主义者存在着“缺乏理论上的研究，缺乏俄国生活事实的印证”<sup>③</sup>的弱点，因而对俄国的社会性质和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粹主义的错误所在。他说，“我们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观点体系，它包含以下三个特点：（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石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狂叫。（2）认为整个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并不认为必须把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83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365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240页。

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应用于俄国经济关系。农民村社被看作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石’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农业中的更发展的形式有联系。(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制度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有联系。否认这种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这就使人把这些因素看作是一种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一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等等的力量。”<sup>①</sup>列宁认为，“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成为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助长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sup>②</sup>因此，列宁认为必须清除民粹主义的错误思潮，才能推动俄国社会向前发展。

### 第三节 俄国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

#### 一、俄国的“村社”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正确分析和科学认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国情的基础上，对民粹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民粹主义者把俄国农奴制的农村村社看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而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对“基石”的理想化，是一种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 卷，第 404—405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407 页。

空想。列宁还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即使有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前提,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结合俄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对俄国的材料进行了专门研究,并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在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四易其稿写成的复信中,就对俄国农村村社是否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支点的问题,即俄国农村村社能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发表了深思熟虑的、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最后的定稿中写道:“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历史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sup>①</sup>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俄国国情与西欧各国国情的差别,并辩证地回答了俄国农村村社能否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问题,即认为这种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268—269页。

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清楚地看到俄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国情与西欧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根本不具备保证农村村社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农村村社本身存在的弱点，加之俄国社会上封建宗法制度残余的大量存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原封不动、农民所受到的双重残酷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农村严重的阶级分化，特别是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和落后，都使俄国农村村社不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也就是说俄国不具备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所以，列宁认为民粹主义者把农村村社看作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而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空想。根据俄国的国情，列宁认为，俄国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进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求彻底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大众的民主专政，使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等等，才能为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 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俄国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接踵而来的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错误地实行了同农民利益发生抵触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失败后，列宁又一次对当时的俄国国情进行了正确分析，并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21 年春，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俄罗斯，面积“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



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在穷乡僻壤……乡村同铁路，即同那连接文明、连接资本主义、连接大工业、连接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sup>①</sup>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对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列宁特别重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认为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即使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直接过渡的政治前提，也是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好几年后的1923年还强调：“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sup>②</sup>而且，列宁认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sup>③</sup>历史证明，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正是在列宁这个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于1921年春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使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苏俄经济迅速得以恢复，生产力水平开始提高，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列宁并没有僵化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16页。

② 同上书，第43卷，第391页。

③ 同上书，第43卷，第392页。

理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俄国的实际,积极地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俄国国情进行正确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对俄国革命道路所进行的探索,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坚持和发展。而列宁逝世之后的一些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僵化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苏联的国情,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sup>①</sup>甚至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sup>②</sup>从而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成为苏联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

① 参见《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 107—108 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0 页。

## 第八章 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和探索

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各种关于俄国革命道路思想和主张也随之产生。为了引导俄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对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和探索。列宁对俄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和探索,是列宁革命学说的核心,它主要包括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途径、领导力量、同盟军等等问题的认识和论述。基于对俄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列宁在对民粹派、孟什维克派、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的错误主张进行批判的同时,对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 第一节 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 一、俄国革命的双重性质

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就积极地探索俄国革命的道路。如前所述,列宁在阐明俄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时,明确指出了俄国社会中还严重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农奴制和其他许多中世

纪封建制度的残余,特别是沙皇专制制度还原封不动、俄国社会还是一个农民国度、农民还深受双重压迫的特点。列宁阐述了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和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得政治自由,并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问题。列宁认为:“俄国除开资产阶级的和过时的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sup>①</sup>“俄国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sup>②</sup>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或者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亦即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活动方面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的两种具体表现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表现(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表现(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sup>③</sup>也就是说,俄国革命的任务具有双重性质,它包括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不同内容。

而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革命的关系问题,列宁也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他始终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表现与内容是不同的,始终强调二者的根本区别,但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50页。

② 同上书,第129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29页。

时又强调民主革命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认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民主革命是俄国革命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革命的第二步,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必须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民主革命终结时,又必须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指出:“在现代俄国,构成革命内容的不是两种斗争力量,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战争:一种是在目前的专制农奴制度内部发生的,另一种是在未来的、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内部发生的。一种是全体人民争取自由(争取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争取民主,即争取人民专制的斗争,另一种则是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sup>①</sup>与此同时,列宁又指出了二者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sup>②</sup>列宁还强调,“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sup>③</sup>但“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sup>④</sup>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列宁非常强调民主革命对整个俄国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对民主革命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一般说来,俄国共产主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84-285页。

② 同上书,第68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92页。

④ 同上书,第11卷,第68页。

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应忘记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sup>①</sup> 因为，“整个俄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最迫切任务是反对专制政府，争取政治自由”。<sup>②</sup> 而且，民主革命对无产阶级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sup>③</sup> “谁不想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谁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是在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sup>④</sup>

## 二、俄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既然民主革命具有如此的重要性，那么，俄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时指出：“俄国的革命就其社会经济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sup>⑤</sup>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54—255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33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7页。

④ 同上书，第12页。

⑤ 同上书，第94页。

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发展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sup>①</sup>“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sup>②</sup>因此,列宁强调,“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充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30、31页。

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sup>①</sup>因此，“无视目前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即实质上资产阶级的性质，是荒谬的”。<sup>②</sup>这样，列宁就对俄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

实践证明，如果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进行得不彻底，不充分，使许多封建主义的残余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又长期得不到根除，那么，这些残余就会对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严重损害，就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苏俄初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取得的成绩以及斯大林过早地停止新经济政策、苏联社会中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等等给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极好的证明。联想到封建制度残余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论述是何等的正确，我们就不能不感到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清除封建残余的影响，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285页。



## 第二节 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同盟军

### 一、无产阶级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列宁在论证俄国民主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又正确地指出了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并对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应该起的领导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早在 19 世纪末，列宁就对民粹派关于代表俄国未来的是农民这一错误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阐明“俄国工人是俄国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惟一的和天然的代表”<sup>①</sup>的同时，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俄国革命，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专制制度的彻底的势不两立的敌人，只有它才不可能和专制制度妥协，只有工人阶级才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地拥护民主主义，其他一切阶级、集团和阶层，都不是绝对敌视专制制度，他们的民主主义始终是向后返顾的。资产阶级不能不意识到专制制度阻碍工业与社会的发展，但它害怕政治和社会制度完全民主化，随时都能与专制制度结成联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屈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63 页。

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作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这个阶级的地位不可能有丝毫改变……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sup>①</sup>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高举反对专制制度的旗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从而成为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到了20世纪初，列宁再次强调，“俄国正处于空前未有的政治高涨时期，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已经落在无产阶级肩上”。<sup>②</sup>

## 二、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阶层都是 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

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是俄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并号召俄国无产阶级要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也就是说，在当时还是一个农民国度的俄国，只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推翻专制制度的，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需要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谁呢？

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中，一切反对专制制度和反对专制政府的无限权力，即反对现行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阶级、阶层和一切民主分子，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他指出，所有反对专制制度无限权力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的同盟者，因为这种无限权力是工人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35—43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卷，第94页。

争取自身解放的主要障碍。

在众多的同盟者中，谁是工人阶级最主要的同盟者呢？列宁认为首先是农民，特别是农村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者，因为“农民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sup>①</sup>，而反对一切专制制度、等级制度、官僚制度的斗争，不但对于工人阶级有巨大的重要性，而且对农民也有巨大的重要性，不推倒这些反动支柱，就根本无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有效的斗争，只要这些支柱存在，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就永远改变不了闭塞无知担惊受怕的状况，只能作绝望的挣扎，因此，农村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有着最密切的共同利益。被剥削的贫苦农民即农村无产阶级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农民这个阶级的支持是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同农民一道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反动的等级和机构，是工人阶级的直接责任”。<sup>②</sup>

列宁认为，除农村无产阶级外，广大的小资产者阶层也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因为他们已为残暴的专制压迫所激怒，他们无力单独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但是，在无产阶级举起反对专制制度的旗帜时，他们就会向无产阶级伸出援助之手，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此外，列宁还强调在大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也都可以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因此，“社会民主党宣称它将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必须支持一切反对官吏，反对官僚管理机构，反对不受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97—198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55页。

限制的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sup>①</sup>但列宁强调，“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支持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必须记住：有产阶级只是他们暂时的同盟者，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工人需要消灭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是为了公开地、广泛地进行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sup>②</sup>

列宁指出，所有反对贵族、地主阶级的人们也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因为贵族、地主被视为俄国的第一等级，他们的农奴制残余还压迫着广大农民，因此，“社会民主党声明，它将支持所有起来反对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阶级的人们”。<sup>③</sup>

这样，列宁就对俄国民主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 三、对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

列宁充分地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列宁对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地位和作用却估计不足，甚至把广大农民（除了少数农村无产阶级以外）排除在同盟军之外。他说，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

---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91—92页。

②：同上。

③：同上书，第92页。

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等农民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也是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sup>①</sup>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中，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sup>②</sup>在这里，列宁是把农民划入人民的范畴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列宁又强调，“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sup>③</sup>显然，列宁在这里把广大农民排除出了同盟军的范围。列宁还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sup>④</sup>在这里，列宁又把“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看成了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对象。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对广大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又做出了这样的估计：“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657—65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69页。

④ 同上书，第68页。

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①</sup>在这里,列宁实际上是把广大农民划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把农民视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源泉。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列宁看来,农民群众中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即“内部的业主倾向”和“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sup>②</sup>因此可以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忽视和侵犯农民利益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极大困难,正是对还是一个农民国度中的广大农民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甚至估计错误的结果。当然,也还是列宁及时地纠正了忽视和侵犯农民利益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才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转危为安。然而,把广大农民看成是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影响,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地存在着,忽视农民利益、侵犯农民利益的情况不仅在列宁之后的苏联,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严重存在,而且在后来的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也严重存在,并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曾产生了或者还继续产生着不利的影响。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11页。

### 第三节 俄国革命的途径——暴力革命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

无产阶级革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通过什么途径夺取政权?是暴力革命的手段还是和平的方式?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但也不排除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

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要“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sup>①</sup>同时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sup>②</sup>1872年9月,马克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说:“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sup>③</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论述还有很多,在此我们不必一一例举。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认为暴力革命是各国无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4页。

② 同上书,第3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79页。

阶级取得政权的惟一方式。他们认为,由于各国制度不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也将是不同的。在专制主义的国家,要准备暴力革命;而在共和制比较健全的国家里,可以有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普法战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欧美许多工人政党相继取得合法地位,参加选举并取得较好成绩。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各国的情况,指出了在某些国家无产阶级采取和平斗争手段的可能性。1872年9月,马克思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地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sup>①</sup>恩格斯也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一文中写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sup>②</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国人民采用何种斗争方式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1871年9月21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sup>③</sup>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导言是恩格斯一生最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22卷,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17卷,第700页。



一篇重要政治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sup>①</sup>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而是认为处在一定条件下的某些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随着条件的变化,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应该变化。

## 二、俄国只能走暴力革命的道路

列宁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非常强调暴力革命的作用,强调用武装斗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个思想贯穿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尤其是在1905—1907年的著作中。例如列宁在1905年6—7月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就直接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任务。列宁认为:“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进行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sup>②</sup>列宁强调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这集中表现在他1917年8—9月写成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在这篇著作中,列宁把暴力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必须系统地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03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5页。

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sup>①</sup>

而对于俄国革命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取得胜利,能否和平地长入新社会的问题,列宁的回答是非常冷静而正确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俄国,由于封建专制制度还占着统治地位,因而根本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种通过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条件。他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合法的’和‘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sup>②</sup>列宁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俄国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路,而且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积极而努力地去实践这一思想。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列宁用暴力革命的思想去武装布尔什维克党,去教育广大的革命群众,使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丢掉对沙皇和反动政府的幻想,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

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必须走暴力斗争的道路,但也不排斥在一定的条件下,或者说在例外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

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通过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专制的沙皇制度。但二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却产生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现象。列宁认为这种特殊现象的产生是因为“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11卷,第38页。

围,但是还没有达到‘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sup>①</sup>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为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必须“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sup>②</sup>但是怎么过渡呢?列宁根据这时俄国的特殊情况,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转变,因为“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证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sup>③</sup>因而他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在1917年7月4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了彼得格勒举行和平游行示威的工人和士兵,并迫害布尔什维克,下令逮捕列宁(即七月事变)之后,政权完全转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终结。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列宁指出通过和平手段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已不可能,取得政权的惟一办法是举行工人武装起义。他号召布尔什维克和人民“不要再对和平道路抱任何幻想,不要进行任何分散的活动……而要聚集力量,重新组织力量,并在危机的进程允许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坚决地准备武装起义”。<sup>④</sup>但是,当1917年8月25日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布尔什维克领导和组织的工人和农民平息以后,俄国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又发生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54页。

② 同上书,第11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6—7页。

④ 同上书,第5页。

重大变化,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提高,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的苏维埃都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此时,列宁认为又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他指出:“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sup>①</sup>但是,当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议之后,列宁认为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的机会也消失了,他对这时俄国国内形势作了全面剖析,指出革命的和平发展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举行工人武装起义,明确提出“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区域)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sup>②</sup>并直接领导武装起义。在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的指引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和俄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之机,1917年10月24日—25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首都彼得格勒举行了武装起义,用暴力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三、列宁对参加杜马选举的态度

列宁强调暴力革命是俄国革命的惟一途径的思想还表现在列宁对待国家杜马选举的态度上。

1905年初开始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秋天进入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5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33—234页。

了高潮，全俄的政治罢工迅猛发展，沙皇慑于革命力量的增长，于10月17日签署了关于“赐予”政治自由和召开“有立法权”的杜马诏书；10月中旬，立宪民主党宣告成立。在是否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问题上，不但俄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不同，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也存在分歧。孟什维克认为党应该参加初选人和复选人的选举，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却主张积极抵制杜马选举。列宁对参加杜马选举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现在的杜马是人民代表机关的一个可怜的冒牌货，应该反对这种骗局，应该为准备武装起义来召开由全体人民自由选出的立宪会议”。<sup>①</sup> 列宁还认为：“杜马不是议会，而是专制政府的一个诡计，我们应该揭穿这个诡计，拒绝参加任何选举。”<sup>②</sup> 为什么要拒绝参加选举呢？列宁的理由是，首先，“新的一届杜马无疑是对人民代表机关的讽刺。我们如果参加选举，就会使人民群众误解我们对杜马的估价”。<sup>③</sup> 其次，“我们参加选举就会使无产阶级用错误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选举的策略会造成极大混乱，使无产阶级分不清谁是自己最亲密的同盟者，谁是自己的敌人”。<sup>④</sup> 最后，“通过抵制至少也可以实现参加选举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衡量无产阶级的力量、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保证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选民团中的优势，所有这一切通过革命地利用选举集会也完全可以办到，无需参加选举”。<sup>⑤</sup> 列宁还强调：“不管我们怎样说明我们的观点，不管我们提出怎样的保留条件，只要参加选举就势必会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45页。

② 同上书，第146页。

③ 同上书，第151页。

④ 同上书，第152—153页。

⑤ 同上书，第153页。

产生用杜马代替立宪会议、通过杜马召开立宪会议等等的思想。一方面指出杜马这个代表机关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要求用革命的方法召开立宪会议,同时又参加杜马,这样的策略在革命时期只会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sup>①</sup>因此,列宁主张“积极抵制杜马”,认为“利用议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原则上是必要的”,<sup>②</sup>但“目前还不具备可以使我党走上议会道路的条件”。<sup>③</sup>“社会民主党要想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应当在自己的全部工作中估计到新的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我们应当毫不留情地揭露由政府 and 以自由主义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立宪幻想……我们应当向广大群众说明第一次十二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新的起义的必然性,因为只有新的起义才能真正夺取沙皇专制政府的政权,真正把政权转交给人民。”<sup>④</sup>

1906年春夏两季,布尔什维克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没有取得成功。4月27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7月,沙皇政府又解散了第一届国家杜马。在革命形势低落的情况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总结了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决定参加1907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家杜马。列宁对杜马的态度也有了一些变化。1906年11月,在《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一文中,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认为议会制度(参加代表会议)是启发、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建立独立的阶级政党的手段之一,是争取工人解放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sup>⑤</sup>但是,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参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53页。

② 同上书,第361页。

③ 同上书,第342页。

④ 同上书,第360页。

⑤ 同上书,第72—73页。

加杜马运动的实质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我们根本不承认这个运动具有任何独立自主的甚至主导的意义”，“要使这个运动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不是为进行议会改良而实行议会制度，而是为召开立宪会议进行革命斗争，同时还要进行从近几年来斗争形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高级形式的斗争”。<sup>①</sup>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参加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在杜马运动的范围内同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以便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向全体人民进一步揭露立宪幻想并发展革命。因此，他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应该全力以赴地参与1907年的杜马运动。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杜马运动中的基本任务：“要向人民说明，杜马完全不适于作实现无产阶级和革命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要求的工具”，“要向人民说明，只要实权还掌握在沙皇政府手里，要想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自由是办不到的；要说明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的必要性”。<sup>②</sup>

综上所述可见，尽管列宁对是否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态度有变化，但他始终坚持的还是要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参加议会斗争只是为了教育人民，以便更好地准备武装斗争。

#### 四、暴力革命并不是在一切国家、一切时候都普遍适用的惟一方法

毫无疑问，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的建立与列宁关于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99页。

力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与俄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取得的成功。其实,暴力革命的方法并不是在一切国家、一切时候都普遍适用的惟一方法。也正如1919年3月列宁在《悼念雅·夫·斯维尔德洛夫》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sup>①</sup>十月革命正是在俄国的特殊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因此,各国无产阶级采取什么方法取得政权,要依自己国家的具体条件而定,决不能完全照搬别国的方法,在自己国家内也不能不顾条件的变化而死抱着一种方法不变。列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苏联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列宁之后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恰恰十分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和方法,面对自己国家和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二战之后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却依然僵化地沿用过时的思想、理论和方式方法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导致苏联模式的僵化。无疑,这是苏联走向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值得我们吸取的一个严重教训。

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列宁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俄国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也许只有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才能实现,而且“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非常可贵的,是极其罕见的”。<sup>②</sup>因此,列宁一贯强调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69页。

② 同上书,第32卷,第132页。



命的一般规律,而和平过渡只是个别的例外。由于列宁更多地主张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加之俄国革命的成功最终还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的,而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还没有现实的例子,这就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一种把暴力革命视为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惟一正确道路的“左”的思想。这种错误的观点曾给那些不顾自己国家具体条件、不顾时代变迁而一味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工人党带来过严重损失。实践证明,把任何斗争方式绝对化都是错误的。在 21 世纪的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与潮流,高科技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已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了,发展中国家情况又千差万别,各国人民只有根据各国不同的条件和不断变化着的情况,实事求是地采取不同的、最好的方法,革命才能取得成功。那么,什么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

## 第九章 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没有布尔什维克党,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苏联的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工人运动兴起并蓬勃发展,罢工斗争接连不断,农民暴动频繁发生,学生运动声势浩大,但基本上都是自发的,迫切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致力于在俄国建立一个不同于在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二国际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强调建立一个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俄国革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惟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sup>①</sup>因此,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同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懈斗争,并逐步形成了他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列宁主张建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与第二国际各国党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思想上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在政治上必须坚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257页。

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列宁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第一节 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 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 一、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共产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sup>①</sup>列宁从创建俄国党的最初时期起，就一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作为党的旗帜。

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呢？列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的：

首先，列宁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先进性进行分析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的理论、革命的理论、先进的理论。他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党的真正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组织社会主义社会。”<sup>②</sup>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9—4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0页。

在1899年,针对经济派竭力贬低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的错误,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sup>①</sup> 列宁在这里说的革命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1901年,在祝贺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五周年时,列宁又进一步强调:“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能够领导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sup>②</sup> 列宁在这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作用。而在1902年发表的《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更是系统地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形成牢固的思想统一的重要性,以及怎样形成这种牢固的思想统一。

其次,列宁是从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来分析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前面,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党的力量就在于它是用先进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所以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sup>③</sup>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sup>④</sup> 列宁这里所指的“革命理论”、“先进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需要革命理论,还在于它负有向自发的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使命。因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从有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332页。

③ 同上书,第6卷,第23页。

④ 同上书,第24页。

工人阶级单靠自身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意识,而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sup>①</sup>列宁还指出,当时俄国社会上存在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第三种思想体系,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要比社会主义思想久远得多,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多,因而能使工人阶级自发而又最深地接受其影响。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sup>②</sup>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要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这样,列宁就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道理。

## 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巩固的思想统一

列宁不仅指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而且进一步强调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巩固的思想统一。那么,怎样使党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形成巩固的思想统一呢?列宁提出:“必须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排除分歧和思想混乱”。<sup>③</sup>之所以要用党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是因为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对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纲领是实现党的团结和党的领导作用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316页。

重要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的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和指导各国党的建设中,曾为制定科学的革命纲领倾注了大量心血。列宁也非常重视为俄国党制定一个革命的、科学的纲领,认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一个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1895—1896年、1899年和1902年,列宁曾先后为俄国党提出过三个纲领草案,在这些纲领草案中,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当时俄国的国情出发,强调俄国党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俄国党的“纲领的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而斗争的最终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sup>①</sup>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他在《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sup>②</sup>即使这是由于疏忽,也是很不应该的。因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sup>③</sup>因此,列宁在为俄国党制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地写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2—163页。

② 同上书,第6卷,第215页。

③ 同上书,第216页。

道：“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的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成为生活的主宰，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号召：“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旗帜下进行斗争。”<sup>②</sup>

## 第二节 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一个集中的、秘密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

### 一、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革命家组织

要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认为除了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用革命的科学的纲领来巩固思想一致以外，还必须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sup>③</sup>因此，他非常重视党的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93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284页。

③ 同上书，第8卷，第415页。

织建设问题,认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即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十分强调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重要性。他指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sup>①</sup>“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sup>②</sup>然而,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外,还必须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忠于革命事业的人组成的,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部队,不能把它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只有成为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部队时,才能起先进部队的作用;因此,党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体党员都必须遵守同样的纪律。也就是说,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但是,在1905年前,针对俄国的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经济派崇尚党内手工业方式和组织涣散状态的错误观点,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应当考虑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sup>③</sup>列宁同时还强调,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一个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集中的、秘密的革命家集团为领导核心,“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sup>④</sup>1905年以前,列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128页。

③ 同上书,第112页。

④ 同上书,第116页。



宁特别强调党要实行集中制，认为在同专制制度及同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以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必须建立一个牢固的、集中的、秘密的、战斗的革命家组织。

为什么列宁强调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必须是集中的和秘密的？为什么党的领导核心需要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列宁认为这完全是由当时俄国的国情和党还处于非法状态的条件决定的，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可供利用、专制制度严重存在的国家里，处于非法和秘密状态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个职业革命家组织是由谙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斗争策略和久经考验的少数人组成的十分坚强而稳定的组织；另一部分则是广大的地方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在沙皇专制压迫的严酷环境下，保持领导核心的稳定性和继承性，才能使高度集中的秘密活动和尽可能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相结合，从而保证革命运动广泛而持续的发展，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列宁指出：“因此我认为：(1)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2)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应当愈巩固（因为各种蛊惑家诱惑群众中的不开展阶层也愈容易）；(3)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4)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5)而且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

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sup>①</sup>

列宁十分强调作为革命家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秘密性,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同与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组织是不一样的,工人的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sup>②</sup>他指出要建立一种向沙皇制度坚决宣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对这种坚强的革命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同这一条件相适应”。<sup>③</sup>

## 二、新型革命家组织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原则

除了秘密性之外,列宁还特别强调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家组织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原则,而不能实行经济派所主张的“广泛民主原则”,认为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才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攻击。为什么不能实行“广泛的民主原则”呢?列宁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实行“广泛民主原则”的条件。“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因此“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sup>④</sup>因此,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18页。

② 同上书,第107页。

③ 同上书,第129页。

④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页。

在俄国，“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说它是一种毫无意思的儿戏，是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组织从来也没有实行过什么广泛民主制，而且无论它自己多么愿意这样做，也是做不到的。说它是一种有害的儿戏，是因为贯彻‘广泛民主原则’的尝试只会便于警察进行广泛的破坏，永远保持目前盛行的手工业方式，转移实际工作者的视线，使他们放弃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这样重大的迫切任务，而去拟定关于选举制度的详细的‘纸上’章程”。<sup>①</sup>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具备严守秘密、极严格地挑选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sup>②</sup>

列宁之所以强调实行集中制，既是在秘密状态下建党的需要，也是为了克服党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制止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保证党的战斗力。在1904年发表的《进一步，退两步》这篇著作中，列宁坚持集中制的建党原则，针对孟什维克在建党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强调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应当是一个整体；党应当是尽量有组织的，它只能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无限扩大党的界限不能加强反而只能削弱党对群众的影响。党越坚强，党的队伍中的动摇性就越少，党就越能领导群众，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组织。列宁还强调，集中制不仅是严格的纪律，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2—133页。

② 同上书，第134页。

且是所有党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纪律,觉悟的工人应当“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sup>①</sup>

### 第三节 列宁对党内实行民主 集中制的认识和实践

#### 一、“民主集中制”科学概念的提出和确立

1905年以前,列宁之所以强调实行严格的集中制,是因为他认为由于党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只能秘密存在,而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实行自下而上的选举也是不可能的。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为了使党的组织有战斗力,列宁十分强调实行集中制。但列宁绝不是不要党内民主。恰恰相反,列宁是非常重视实行党内民主的。他认为实行严格的集中制这种现象只是党内生活中的一种暂时现象,在推翻专制制度以后,在有了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以后,这种现象就应当改变。

1905年革命后,当党的活动条件发生了变化,争取到了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有了在党内实行民主的条件之时,列宁就主张认真地实行党内民主,实行选举制。列宁的这个思想在1905年11月发表的《论党的改组》一文中充分体现出来。列宁认为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党的结构和党的组织工作。他指出,“我们党的活动的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已经争取到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395页。

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组织工作放到新的基础上，就必须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按照党章规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必须加紧按照新方式建立组织，必须让大家讨论新的办法，必须大胆而果断地确定‘新方针’”。<sup>①</sup> 列宁还写道：“在新的条件下，在向政治自由过渡的情况下，必须转而采用选举原则。”<sup>②</sup> 列宁认为应该尽量利用工人阶级争取到的合法机会，成立公开和半公开的党组织以及广泛的外围组织；应当吸收新党员，首先要从工人中吸收新党员，党的领导机关只要条件许可都应当由选举产生；应当成立支部作为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以代替过去处于地下状态的秘密小组。也就是说，列宁主张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各地方组织服从中央的原则。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决议中，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sup>③</sup> 从而第一次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

列宁非常重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06年5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多数派和少数派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在少数派和多数派合并后，“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③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9页。

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sup>①</sup>正是这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了党章,确立了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 二、积极实践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列宁特别强调少数服从多数,认为“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sup>②</sup>但列宁主张保证少数人的民主权利。其实早在1904年,列宁就主张正确对待党内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他说:“我们必须在党章中保证一切少数派的权利,使那些经常发生的和无法消除的不满、愤怒和斗争,不再变成通常的庸俗的无理取闹和无谓争吵,而是形成一种目前还不习惯的捍卫自己信念的合法而正当的斗争。”<sup>③</sup>列宁认为党内少数派“有权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充分的‘舌头自由’。必须提出最广泛的保证,让批评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党的书刊能够出版。……把中央曾向第二次代表大会少数派建议的出版不满分子的著作的措施,用党章固定下来,使不满情绪正当地表现出来……使不可避免的党内斗争、不致妨碍正常的工作”。<sup>④</sup>列宁对党内不同意见的这种正确态度,与后来斯大林对党内少数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

列宁主张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表现在列宁注重集体领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9卷,第5页。

③ 同上书,第8页。

④ 同上。

导,不搞个人集权。他把党、政、军三大权力分由三人掌管,由三驾马车运作。列宁还强调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他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作为大家公认的党的领袖,列宁不搞个人说了算,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从1918年到1923年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了六次党代表大会,即从七大到十二大,哪怕是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时期也没有中断过),就党面临的重大任务进行讨论和决策,改选中央委员会,并监督、更新中央领导成员等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与后来斯大林在掌握政权之后,大搞个人说了算,大搞个人迷信,大搞个人集权,集党、政、军三大权力于一身,不按时召开党代表大会(1924年列宁逝世后,1924、1925年还照常召开了十三大和十四大,可是后来代表大会年会制就越来越严重地遭到破坏。十四大到十五大相隔了2年,十五大到十六大相隔了3年,十六大到十七大相隔了4年,十七大到十八大相隔了5年,而十八大到十九大竟相隔了13年)<sup>①</sup>的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sup>①</sup> 参见宫达非主编:《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 第十章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及其局限性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生产和资本集中的过程大大加快。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各种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地建立起来,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而形成了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也随之确立。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垄断资本统治的产生和发展,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就开始对垄断资本统治的内容、特点、实质、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列宁,当然也十分注意研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统治的一系列问题。列宁把垄断资本统治的出现称之为“帝国主义”。1905年,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把日本称为“日本帝国主义”,<sup>①</sup>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这个概念。1907年,列宁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中,又提出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sup>②</sup>的概念,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表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后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9卷,第139页。

② 同上书,第16卷,第80页。



来,列宁又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等,构成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完整理论。特别是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成、1917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俗称帝国主义论)这篇名著中,对帝国主义的矛盾、特征、实质、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批判,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对帝国主义的特征、矛盾、实质、发展趋势、前途命运的分析 and 判断,一直是苏联共产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其他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帝国主义、判断世界形势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时间里,苏联党和国家在其对外政策中贯彻和实施的“世界革命”战略,就是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

实践证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于20世纪初及十月革命前后提出的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实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革命”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所实施的“世界革命”战略是失败的;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也是错误的。而列宁提出的作为“世界革命”战略和“争霸世界”战略基础的“帝国主义论”,虽然对帝国主义矛盾、特征、实质的分析是正确而深刻的,但对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前途命运的判断则出现了失误。

## 第一节 列宁的帝国主义观

### 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

究竟什么是帝国主义?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第二国际活动家希法亭、考茨基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布哈林等人都不相同。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布哈林等人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政策”,希法亭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非和平的暴力兼并政策,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布哈林也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结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的建立”相联系的。<sup>①</sup>而列宁则不然,他没有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而是把帝国主义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列宁在自己的《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sup>②</sup>“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sup>③</sup>其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性、寄生性与腐朽性、垂死性。列宁之所以把帝国主义看成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是他经过长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

① 参见张盛发:《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3期,第5页第2段及其脚注。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23页。

③ 同上书,第400页。

关于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列宁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sup>①</sup>他指出:“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sup>②</sup>所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垄断的资本主义。而垄断的资本主义有四种主要表现,这就是: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sup>③</sup>因此,“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sup>④</sup>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不仅给帝国主义下了上述的定义,而且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② 同上书,第400页。

③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4—435页。

④ 同上书,第401页。

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在分析这些特征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sup>①</sup> 在分析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在这里，列宁强调帝国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但不是旧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而这个新资本主义与旧资本主义相比，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sup>②</sup> 列宁上述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二、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之所以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除了认为帝国主义具有垄断性以外，还认为帝国主义具有“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关于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sup>③</sup>，而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是帝国主义特有的，是与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分不开的。列宁认为，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而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② 同上书，第434页。

③ 同上书，第436页。

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sup>①</sup>之所以垄断会产生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垄断使“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在经济上也就不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sup>②</sup>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是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sup>③</sup>二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sup>④</sup>“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sup>⑤</sup>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列宁在看到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势的同时,也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还有快速发展的趋势。他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sup>⑥</sup>尽管列宁清楚地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1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412页。

④ 同上书,第400—401页。

⑤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5—436页。

⑥ 同上书,第436页。

的两种趋势,但是,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趋势只是腐朽趋势的表面而已。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关于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列宁说:“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sup>①</sup>列宁这个论断是建立在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之上的。列宁认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的根源。而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不可调和,必须用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帝国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很快地灭亡。列宁还特别强调,在帝国主义阶段,“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sup>②</sup>列宁认为,由于垄断的存在和发展,帝国主义的经济不平衡,因而导致“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sup>③</sup>而“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sup>④</sup>因而,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所以,列宁的结论是:“帝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7页。

② 同上书,第438页。

③ 同上书,第326页。

④ 同上书,第327页。

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sup>①</sup>

## 第二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 提出的口号及其结果

### 一、“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口号的提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对俄国正式宣战而爆发。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但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战争爆发后,列宁撰写了《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战争与和平》等论著,阐明无产阶级对待战争的态度与策略方针。

列宁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是“这个或那个阶级‘政策的继续’”。因此,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列宁认为,是“军备的扩张,在各先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以及最落后的各东欧君主国的王朝利益,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而且已经导致了这场战争”。<sup>②</sup>“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达到同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们都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输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了。资本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3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卷,第12页。

主义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容纳不下，所以现在便来争夺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未被占据的地盘。”<sup>①</sup>因而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

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1914年10月1日列宁在瑞士洛桑市民众文化馆作的《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中指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性质。”<sup>②</sup>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基于对帝国主义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认识，列宁还认为，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与过去的民族战争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的民族战争与过去的民族战争曾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开始，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则表明资本主义的终结”。<sup>③</sup>

那么，无产阶级对这场“表明资本主义终结”的战争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呢？应该怎样行动呢？

列宁指出：“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想要回避它已不可能，必须行动起来，去做社会党人应做的事情。”<sup>④</sup>那么社会党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呢？列宁认为，由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交战双方都是为了侵略和掠夺，无产阶级绝不能支持任何一方，而只能是利用战争已经爆发的这种形势，发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使战争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从而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有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35页。

④ 同上书，第39页。



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sup>①</sup>列宁强调：“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sup>②</sup>对待这场战争，列宁认为“惟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只有这样的策略才会成为工人阶级适应新历史时期各种条件的真正革命的策略”。<sup>③</sup>总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这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无产阶级制定的口号和策略方针。这一口号和策略方针的实质就是号召和动员交战双方的各国人民利用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利用资产阶级交给他们的武器，掉转枪口去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显然是基于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和前途命运的认识，特别是基于帝国主义已经是“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认识，认为只要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帝国主义就可以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在欧洲取得胜利。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95页。

② 同上书，第38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 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为何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

应该说，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口号和策略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列宁提出的这个口号和策略方针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肯定。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第二国际的各大党都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爆发，并赞成如果战争爆发了，就应该尽力制止战争，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1912年的巴塞尔大会的决议和宣言都证明了这一点。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宣告：“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用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进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sup>①</sup>1912年的巴塞尔宣言又重申了斯图加特决议的主张，宣告“即将到来的欧洲大战是各国政府‘罪恶的’和最反动的行为，它必然引起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从而势必加速资本主义的崩

---

<sup>①</sup> 参见[苏联]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9年版，第139页。

溃”。<sup>①</sup>各国党赞成要利用战争给各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和群众的愤慨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后，第二国际中最主要的英、法、德、意、奥等各大党都纷纷转向了民族主义的立场，站在本国政府一边，支持政府的军事行动，走上了“保卫祖国”的“护国主义”的道路。由于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没有实行列宁提出的策略，相反，却违背了自己在战前的诺言和主张，“站到了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方面去了”，<sup>②</sup>因而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没能变成现实。

列宁提出的这个口号和策略方针之所以没能实现，除了第二国际主要政党背叛自己的诺言和主张以外，还有这个口号、策略方针本身的原因。首先，这个口号和策略方针与当时第二国际各主要政党的认识水平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可以说当时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正确理解“工人没有祖国”<sup>③</sup>的高度。其次，这些党在当时都已通过合法斗争的途径先后进入了议会和内阁。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党来说，要他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拿起枪杆子来推翻自己国家的政权，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此外，当时帝国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虽然已经十分尖锐，但还远没有达到“腐朽”和“垂死”、马上就可以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的地步。显然，列宁对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程度估计失误，对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这是他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没有得到历史肯定的主观原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33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87页。

### 第三节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局限性及其影响

#### 一、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局限性：对帝国主义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矛盾的能力估计不足

列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第一人，他的“帝国主义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正确地论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怎样通过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发展为帝国主义，并精辟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实质、矛盾和历史地位。他论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垄断没有消除竞争、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势不排除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等等论断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列宁对帝国主义前途命运的判断，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观点却没有被历史所肯定，说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前途命运的判断有误。

从当代资本主义，即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写成并出版八十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来看，列宁当时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自我调节各种矛盾的能力估计不足。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列宁指出的那些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资本主义却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改良措施对这些矛盾、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自我调节调整，使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变化，使这些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也得以增强。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对自身矛盾进行的自我调节确实取得了成效。而这一点,八十多年前的列宁是没有估计到的。因为列宁只看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和破坏性,而没有看到这一基本矛盾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主要动力。

众所周知,当代资本主义已不仅仅是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融合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是垄断资本已经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形成,几十年来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家资本主义又以新的形式异常迅速而普遍地发展起来,造成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政府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各领域的全面干预和调节;也就是说,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了宏观计划,并进行宏观调控。这样,在经济领域里,当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处于完全无计划、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而是有了一定的计划和秩序,通过宏观调控,在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机制,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问题进行了调节,从而也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制度,使社会不满在平时就可以通过某些渠道发泄出来,不至于积累到矛盾总爆发导致社会产生激烈动荡的程度。总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府对经济、社会各领域进行宏观调控,增强了自我调节矛盾的能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当代资本主义自我调节能力的提高,还表现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因为高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包括航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光纤通讯、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在内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居世界前列,而且还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更加“现代化”和“文明化”,三大差别进一步缩小,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显著减轻,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继续存在,但相对缓和。此外,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还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电脑广泛使用于生产部门和进入家庭,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延伸,使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新型的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劳动者大量增加,导致劳动生产的非社会化现象日益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原来的许多传统工业走向衰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数量明显减少,中间阶层日益扩大,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大大超过产业工人的数量,知识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显,传统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团结性遭到削弱。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减少的同时,利益的多元化却在不断发展。在不少企业,有些工人也是股东,因而工人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不再是单纯的、简单的对立,利益趋同的现象不断发展,导致劳资矛盾缓和,工会的影响下降,社会相对稳定。

由此可见,由于垄断的存在,资本主义出现了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垄断的结果使生产社会化迅速发展,特别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化。拥有巨资的垄断资本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能够运用前所未有的手段和方法来推动科技的进步,从而促进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巨大发展。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趋势就抑制了腐朽的趋势,从而使垄断资本主义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写成后的八十多年里,基本上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特别是在列宁亲自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变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为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这一事件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就更看不出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了。以上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垄断的资本主义还远不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尽管资本主义一定会被社会主义代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①</sup>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帝国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它还不会立即“腐朽”、“垂死”、灭亡。

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判断和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了些。这正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局限性之所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页。

## 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苏联兴亡的影响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和亡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从而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对苏联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且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sup>①</sup>然而,历史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通过自己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他在1915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sup>②</sup>后来,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再次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sup>③</sup>正是基于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22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66、367页。

③ 同上书,第28卷,第88页。



样的认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积极地领导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也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有一定的关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是苏联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战略、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深深地影响着列宁之后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者。正是因为他们总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垂死”的,从十月革命前后开始推行了几十年的“世界革命”战略,却遭到了失败。也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矛盾的能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潜力,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拒绝对资本主义开放,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加之西方国家的有意封锁,致使苏联经济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并致力于“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达到“埋葬帝国主义”的目的。由于长期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军费开支十分庞大,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致使苏联经济形势恶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出现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的现象。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腐朽”和“垂死”的情况。自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断地采取改良措施,对社会经济矛盾进行自我调节,缓和社会矛盾,同时紧紧抓住高科技的发展,使经济出现强劲的发展势头,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远远高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人民心中黯然失色,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丧失了信心。而这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 第十一章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演进及实践

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无史可鉴”的。为此,十月革命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艰苦曲折的探索,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些经验教训,直至今日也是十分必要的、具有迫切意义的课题。

### 第一节 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与败

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俄国社会矛盾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俄国并没有因为在革命方面处于先进地位而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落后状况。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内容应该是,既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又不失掉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布尔什维克能够由革命开始时的少数派,发展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其动员群众的口号是:把权力交给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满足广大群众对土地、和平、面包的需求。当时并未直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具体要求。

十月武装起义的翌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里,布尔什维克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

地纲领。<sup>①</sup>这一事实孕育着后来在土地问题和社会经济体制问题上必然要走一段弯路的根本原因。

列宁当时看到了俄国落后所带来的矛盾与问题,但是,他没有完全放弃1917年《四月提纲》里提出的“直接过渡”思想。1918年加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就是企图直接过渡到没有商品与货币交换关系的尝试。结果,只能是走了一段弯路。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曲折,列宁从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满足农民的要求出发,采用农民所熟悉的能够接受的方法走向社会主义。在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实践中,列宁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认识到“军事共产主义”是个错误,新经济政策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

## 一、“军事共产主义”——并非意外的选择

### (一)“军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初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时设想过,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为通向这一境界、特别是为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通向这一境界提出什么具体途径。1908年,列宁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中说:“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sup>②</sup>1917年8月至9月间,列宁为准备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21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111页。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在这部著作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时，列宁说：“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督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sup>①</sup>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是按照这种消灭商品货币的思路来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这一思想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以前，我们多把“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译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不确切的。战争是促使这一政策迅速完善并走向极端化的因素，但是在国内战争开始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基本方针已经确定。另外，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1920年，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立即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只是到了1921年，当经济危机发展为政治危机之后，才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

“军事共产主义”首先是为了迅速向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而采取的措施，其特征就是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由国家直接控制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便着手在全国建立“辛迪加”，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面的计算与监督。1917年12月底拟定的《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规定：“全国公民都必须参加当地的（村的、乡的、镇的、或包括城市某一部分、街道某一部分等等的）消费合作社。……每个消费合作社除采购和分配产品以外，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97页。

还要主持当地产品的销售。由消费合作社理事会设立若干供给委员会,如无有关的供给委员会的书面证明,不许运输任何产品。现有的消费合作社一律国有化,并且必须无一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如无供给委员会的证明而私自运输、买卖产品者,应当没收其全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劳动。……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必须售给当地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都必须组织若干监督、检查和指导小组来协助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供给委员会),并检查它们的报表以及它们管理的全部事项。”<sup>①</sup> 列宁当时设想:“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产品交换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sup>②</sup> 但是,现实生活并不如人愿,列宁的这一草案遭到了资产阶级消费合作社工作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合作社应该完全独立,不受苏维埃的领导。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于1918年4月10日发布了关于消费合作社的法令,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免费入社和一地全体居民只能加入一个合作社的原则,保留了货币制度。这是不得已的妥协。

1918年1月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为了消灭社会上和经济组织中的寄生阶层,将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1月27日颁布的《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法令明确规定:“发展农业中的集体经济,这种经济在节约劳动和产品方面都更为有利;减少个体经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农业机器和种籽的买卖由苏维埃政权机关垄断。”“粮食贸易,无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12—21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54页。

论是外贸或内贸,都应由国家垄断。”“土地首先交给为公共利益而不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而且愿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使用。”<sup>①</sup>对农民平均分配的只是十月革命前劳动农民实际使用的土地,而没收的地主、教会、官府等的土地作为国家的后备土地,并没有在农民中平均分配,农民得到的土地比他们期望的要少得多。国家鼓励的不是个体农民经济,而是给集体经济以优先权。

1918年春,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维埃政权取得了短暂的和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一文中所提出的经济建设的任务与措施实际上也包含着“军事共产主义”的内容。例如,他认为,对苏俄有决定意义的是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我们应该立刻开始实行劳动义务制”;他认为农民是“最顽固的和人数众多的农民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依靠专制与强制,“认为不要强制,不要专政,便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就是极端的愚蠢和荒唐的空想主义”。“我们愈接近于用武力把资产阶级彻底镇压下去,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自发势力对于我们也愈加危险。要同这种自发势力作斗争,决不能只靠宣传和鼓动,只靠组织竞赛,只靠选拔组织家。——进行这种斗争还必须依靠强制。”他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这就非搞好粮食和粮食生产(然后,再对一切其他必需品)的最严格的、无所不包的全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一卷,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第29、30、31页。

民计算和监督不可。”<sup>①</sup>但列宁对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执行得比较谨慎,停止了“赤卫队式”对资本的进攻,实行了“退却”,从直接剥夺剥夺者,转到在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用资产阶级的方式以高薪聘任专家,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国家监督货币流通,与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等等,这些措施相对于后来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要温和得多。列宁说:“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局部的让步,这样我们就能够创造向前进展的条件,这种进展比我们最初预计的要缓慢些,但是会更巩固”。<sup>②</sup>列宁当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小生产是一个进步,把“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与监督”这种社会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共通的手段作为中间站,“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sup>③</sup>列宁强调俄国经济的过渡性,但这并未触动他对市场所抱的否定态度,也没有真正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对此,列宁本人后来回顾说:“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设想,国家的生产和分配同私营商业的生产和分配这两种制度将互相斗争,而斗争所处的环境是: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58、165、157、175、177、167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③ 同上书,第274页。

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但是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sup>①</sup>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可以说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践的开始。

通行的看法是从1918年夏，随着国内战争的开始，苏俄才开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直到1921年春，这一政策才被新经济政策所取代。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初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已经包含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因素。只是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使用这一名词，随着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才出现了这一名词。于是，人们习惯于把它与战争联系起来，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第一个谈论“军事共产主义”的是A. A. 波格丹诺夫：“不可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1917年我说过——你们能够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军事共产主义，在1921年得到了承认——我们这里只有军事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sup>②</sup>1921年12月10日，波格丹诺夫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说：“1918年1月，在《新生活》上，那时还给我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写道，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开端，而是军事共产主义。”<sup>③</sup>

“军事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管理，采用的方法是行政命令的办法，国家机关——中央总管理局直接管理企业，企业只是执行国家计划的工具；农民对自己所生产的粮食也无任何处置权，先是按国家的固定价格卖给国家，从1919年1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sup>②</sup>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研究中心，全宗259，目录1，卷宗48，第28页。转引自《俄罗斯》《历史问题》1998年第2期，第123页。

<sup>③</sup> 《俄罗斯》《历史问题》1998年第2期，第123页。



月起实行余粮征集制，国家根据所需要的数额向农民摊派，农民无偿地按摊派的数额把“余粮”交给国家，却很少能得到补偿；严格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国家对粮食、农产品和工业品实行垄断，取缔私人商业，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投机》的法令规定，凡销售或为了销售而购买国家垄断的工业品、营养品等行为便是犯罪，将受到剥夺自由10年、被没收财产、强制劳动等处罚；努力实现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和取消中间环节，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结算采用簿记的方式，国家向企业无偿供应原料，企业的产品及其他一切收入也无偿上缴，职工的工资大部分也通过实物支付，国家无偿地向工人提供工作服和蔬菜，免费投递信件，国家对17岁以下的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全体学生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在分配领域中实行平均主义，集中平均分配有限的物资；实行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劳动义务制从对非劳动阶级扩展到了全民，1918年12月通过的《劳动法典》规定：所有公民，从16—50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这些措施并没有仅仅被看成是因战争而被迫采取的暂时政策，而被看成是符合共产主义原则的根本路线。列宁不仅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而且认为劳动义务制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他说：“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些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星期六义务劳动、劳动军、劳动义务制——这就是具体实行社会主义劳动和共产主义劳动的各种方式。”<sup>①</sup>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343页。

此,随着战争走向结束,这些措施不是被放弃,而是更进一步得到强化。

1919年对苏维埃政权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基本上巩固了政权。从1919年底开始,“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得到强化,把余粮征集制从粮食、糖、肉类、海鱼类扩大到马铃薯及所有农产品,更严厉地打击私商,关闭市场;着手消灭货币;从上到下建立普遍劳动义务制委员会,采用强制手段推行劳动义务制等等。1920年10月,苏俄与波兰签订了停战协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军事共产主义被作为正常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得到强化。1920年11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了把全国所有小工业收归国有的法令,规定凡雇佣工人5名以上,并有动力机械,或拥有雇佣工人10人以上而无动力机械的一切私人企业,全部收归国有。1920年11月30日,列宁在给取消货币税委员会的便条中说:“应该更深入地考虑过渡时代的条件(和更细致地研究相应的事实)。从货币过渡到没有货币的商品交换是毫无疑问的。为使这样的过渡胜利完成,应该实行产品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sup>①</sup>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实行无偿服务。1920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向居民无偿发放食品》的法令。

总的看,在国内战争开始前后,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即使不发生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也必然导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即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全国的生产和分配。战争使这一模式更加速地以更纯粹的形式得到了贯彻和实行。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2卷,第22页。转引自[俄罗斯]《历史问题》1998年第2期,第130页。

## 二、“军事共产主义”的误区

苏俄是在一个农民占 80% 的国家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最大的误区是对小农经济、小生产持否定态度。列宁说：“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经济措施的敌人。……我们非常明白，投机活动的经济基础，就是在俄国人数特别多的小私有者阶层，以及以每一个小资产者作为自己代理人的私人资本主义。”“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sup>①</sup> 列宁把不受国家监督的私商的活动看成是投机，而投机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粮食。因此，1918 年 5 月 8 日，列宁拟定了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规定：“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 10 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sup>②</sup> 当 1918 年夏国内战争开始后，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走向了极端，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派出大量的征粮队。1919 年 1 月开始实行的余粮征集制既是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饥荒而采取的，也是按照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的。

“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对农民经济性质的错误认识与评价。列宁在 1920 年 4—5 月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4 卷，第 276、277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295 页。

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sup>①</sup>1920年5月出版的布哈林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宣布说：无产阶级对所有农民所采取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不管听起来是多么离奇，都是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的方法”。<sup>②</sup>在1920年不少人提出应该中止这种严重伤害农民积极性的政策时，列宁对共青团员们说，必须“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把余粮全部交给工人国家……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sup>③</sup>但是，自由耕种土地、自由支配劳动成果是农民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把所有粮食都交出去，农民占有土地便失去了意义。因此，不断出现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据契卡统计，从1918年7月到11月，在苏俄有108起“富农叛乱”；在1918年全年，仅在20个中央省便发生了245起大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乌克兰的党的工作者承认：“在马赫运动中很难区分，哪是农民发动的，哪是富农发动的，这是群众性的农民运动。”<sup>④</sup>

“军事共产主义”另一个大的误区是只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无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此，当时不少非党人士提出了批评。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H. A. 罗日科夫于1919年1月通过高尔基转交一封信给列宁，他在信中说：“你们的粮食政策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您没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

② [苏联]布哈林著，余大章、郑异凡译：《过渡时期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27—128页。

③ 《列宁研究》1993年第1辑，第10页。

④ [俄罗斯]米·格列尔、阿·涅克里奇：《俄罗斯史(1917—1995)》第1卷，莫斯科：《MNK》出版社和《ATap》出版社，1996年俄文版，第104、106页。

促进私人商业的首创精神,于是谁也无法挽救不可避免的灾祸。如果您不这样做,你们的敌人会做,不能在20世纪还把国家变成一个中世纪的由封闭的地方市场组成的混合体……应该重新审视整个经济政策,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目的。”<sup>①</sup>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完全禁止贸易是不可能的。1918年至1919年,苏俄居民60%的粮食是从“黑市”上得到的。“军事共产主义”对保证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反而加剧了经济困难。

误区之三,无产阶级专政被理解成不受法律限制的直接的强制,依靠行政强制手段、靠普遍的军事化与集中化来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从大的国营工厂到只有一个理发匠的理发铺,都要实行国有化,都由国家管理,国家是难以胜任的。1921年10月,列宁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行总结时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 and 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sup>②</sup>新经济政策正是对“军事共产主义”这一错误政策的修正。

##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途径

1921年春天,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局势是严重的,国民经济陷

① [俄罗斯]《历史问题》1998年第2期,第12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入了崩溃的境地，社会上对“军事共产主义”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矛头指向俄共（布）的政治示威，农民公开说：他们赞成布尔什维克（俄文意为多数），但反对共产党。指望西方革命胜利并对苏俄进行援助的希望破灭，形势迫使俄共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实践使列宁认识到：“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sup>①</sup>这正是制定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当时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开始，列宁只把它当成“退却”，强调这一政策与1918年春政策的联系，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广，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完全”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 一、新经济政策——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俄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个体小农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体。完全不顾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不顾农民经济的特点，不顾农民的愿望和要求，靠强制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新经济政策是在“军事共产主义”实行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是农业生产者的一贯口号。早在1920年春，这一思想便在俄共（布）党内开始酝酿。这年1月下旬，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就根据尤·拉林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建议：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比余粮征集制低一半的实物税，而余下的全部粮食应通过自由交换的办法从农民那里得到。建议没有被采纳，拉林也因此没有被选进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1920年3月，托洛茨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8页。

基向中央建议改变对农民的政策，他建议同经济衰退做斗争，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根据交纳粮食的数量而不是按照阶级原则向农民提供工业品；二是强化余粮征集制，用强制手段“指导”对土地的耕种，广泛发展农业集体化。他的建议在中央委员会以 11：4 被否决。

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中央收到很多报告，内容既有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批评，也有要求改变政策的建议，如 1920 年 6 月，哈尔科夫省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产党员 H. H. 科尔恰什金给中央寄去了长达 20 页的书信，指出：革命危在旦夕，革命走得太远，必须彻底改变现状，首先应立即解决粮食问题；如若不改变粮食政策，革命必遭夭折。科尔恰什金写道：“两年多来，人民在苏维埃制度下忍饥挨饿，而被夺走粮食的人势必会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投奔并将投奔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从而延长国内战争。”为了结束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粮食固定价格，允许粮食贸易自由，“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融洽了，主要在乌克兰进行的内战才能结束”。<sup>①</sup>当时地方苏维埃的领导人也不断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征粮队发生矛盾。1920 年 6 月，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俄农村工作第二次会议，来自地方的代表强烈要求向农民做出让步，用税收代替余粮征集制。当时俄共中央没有决定改变经济政策。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部务委员阿·伊·斯维杰尔斯基声明说，余粮征集制有改成粮食税的趋势，现在农民在缴纳了规定的数额后已经认为自己自由了，他们用余粮进行买卖，从而获得了很大好处。其实，即使在

<sup>①</sup>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17，目录 65，卷宗 251，第 124—134 页。转引自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 年第 1 期，第 95 页。

“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市场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种畸型的、半公开的形式存在着。1920年夏，斯摩棱斯克省的领导告知农民应该向国家交多少粮食和土豆，并许诺不向他们多收，结果这个省在9月份只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任务。全俄肃反委员会对该地的情况通报说：“近来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有明显好转，其原因就在于改变了粮食政策。”<sup>①</sup>在1920年12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关于巩固和发展农民的农业经济的措施》这一法规草案时，孟什维克的代表达昂说：“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粮食政策破产了，尽管这种政策也榨取了3亿多普特的粮食，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播种面积普遍缩小（仅达原播种面积的1/4），牲畜饲养量缩小，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缩小，农村经济严重滑坡，把农民的谷物榨得一干二净，结果也和当年从农村横征暴敛人头税一样，我们毁坏了占我国经济3/4的农民经济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现在，当这一事实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把这种暴力政策从榨取农民劳动果实的领域照搬到农民生产的领域，是根本不能允许的……我们认为这种强化对农民暴力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只会导致城乡之间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用自由组织起来的农民阶级进行建设事业要容易得多。”<sup>②</sup>另一位代表说：“现在提议通过的法令肯定会使农民陷入一种处境，农民会把这种处境称为由政权实施的强迫命令……如果我们面对着成千上万不肯种地的农民群众，则几乎无

<sup>①</sup>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2，目录1，卷宗15337，第3页。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1期，第99页。

<sup>②</sup> 《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稿，莫斯科，1921年俄文版，第42—43页。转引自《俄罗斯》《经济问题》1991年第12期，第100—101页。



力完成这项任务”。<sup>①</sup>他们认为国家应该允许农民在完成严格规定的任务之后,可以按照商品自由交换的原则或合同规定的价格出售所有剩余的部分,取消贫农委员会,让农民有权建立自己的合作社组织等等。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也说,“对于农场来说,经营活动本身应当包含现实的动力。如果实际动力消失了,则某种有组织的强迫命令是不可能代替的……这种动力应当具体表现在,农场消耗了财物,向土地投放了劳动,就应当带来效果,效果可以用某些为经营和个人消费所必不可少的其他物质来计算。所以我们说,当前推行的多拿和少留下的制度应当换成税收制度。我们可以断定,对这种税收制度的诸多批评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认为,留在劳动农民手中的那部分经营剩余,随着国家工业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分配或交换的方式最终由国家收回来,因为工业现在事实上是由国家垄断的。”<sup>②</sup>俄共(布)当时对农民的政治情绪估计严重不足,并没有改变政策。余粮征集制的坚决拥护者是奥新斯基,他的理由是在国家没有商品储备的情况下,贸易自由会破坏国家对粮食的采购。俄共(布)党内多数成员也坚信余粮征集制的正确性,列宁虽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但基本上还是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政策。

1921年1月,粮食和运输形势骤然恶化,国内战争有再度升温的危险。当时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武装被打败后,苏维埃政权而对的是心怀不满的农民和由农民组成的红军,从复员兵中得到

---

① 《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稿,第197-198页。转引自[俄罗斯]《经济问题》1991年第12期,第101页。

② 《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稿,第48-49页。转引自[俄罗斯]《经济问题》1991年第12期,第101-102页。

补充的农民起义不断扩大。列宁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政策，放弃原来的幻想与打算。1921年2月8日，在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首次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思想。提纲规定：“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如果农民能迅速交足粮食税，应扩大他们将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sup>①</sup>在中央讨论该建议过程中，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2月中旬，一些城市发生了工人骚动，如2月23日，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区几家企业的数千名工人举行罢工，反对经济状况恶化，彼得格勒也发生了工人骚动，工人与军校学生还发生了冲突，3月1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叛乱。这对俄共震动很大，它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农民不再支持余粮征集制情有可原，工人也不赞同这一政策是出乎俄共意料的。在严重的危机面前，俄共（布）一致同意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3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大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因为不改变这一政策，无产阶级专政就难以保持。“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而不是公平分摊。我们帮助农民，因为这是我们保住政权所绝对必需的。”<sup>②</sup>

同时，红军在华沙城下的惨败对突然转向新经济政策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改变政策之初，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是从“军事共产主义”这种正常的经济政策的退却。列宁在1922年3月十一大期间还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到1922年底至1923年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33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2卷，第49页。

初,列宁改变了看法,深信社会主义不能完全靠热情来建设,也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按书本来建设。

## 二、农民与新经济政策

国内战争与严重的经济破坏使列宁认识到,在俄国这个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考虑农民的要求,不能把农民当成异己力量。尽管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仍认为:“流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我们所有的人,哪怕是只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的,都知道这种流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但是他看到“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们就必须有同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个体小经济相适应的刺激、动力和动因。这就离不开地方流转自由。……农民要求在实践中向他们证明,掌握工厂和工业的工人能够同农民建立流转关系”。<sup>①</sup>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之初,列宁仍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和小农的利益是不同的。在拟定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讲话的提纲》中,列宁写道:“这个问题的一般政治意义:=关于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问题。这个反革命性已在反对我们。”“谁战胜谁?两个不同的阶级。‘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教训——政治上:加强党内的团结(和纪律),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经济上:尽量满足中农的要求。”<sup>②</sup>“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54、5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65—366页。

系问题就是这样，或者是农民和我们达成妥协，而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sup>①</sup>经过多年的战争，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惟一的出路只能是与农民达成妥协。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列宁重新回到了他对俄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上，以占俄国80%的农民作为俄共（布）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列宁开始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而不是从阶级关系的角度去阐述新经济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是“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的惟一办法，“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sup>②</sup>

列宁进一步指出，党应该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还是其他阶层，首先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sup>③</sup>列宁特别注意倾听农民的呼声，他是党内惟一一位定期阅读《贫苦农民报》编辑部所提供的有关农民信件综述的人。他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检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已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即新的生产和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14页。

② 同上书，第42卷，第347页。

③ 同上书，第43卷，第109页。

来”。<sup>①</sup>因此，列宁对合作社做出了新的评价，他不再认为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sup>②</sup>列宁把合作社看成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又容易接受的向新制度过渡的最佳途径，并希望通过活跃农村经济、提高国内市场容量来发展工业。

列宁特别强调苏维埃政权对农村的帮助，强调政府的政策要适合农民的需要。他说：“应该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sup>③</sup>

新经济政策是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两年后，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提高，工农联盟得到了巩固，增强了列宁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期间，列宁明确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sup>④</sup>同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讲话。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他谈了苏维埃政权取得的伟大成就：争得了和平发展的权利，有了一个为全世界所承认的外交局面；他提出苏俄必须走向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3、75页。

② 同上书，第365页。

③ 同上书，第359、360页。

④ 同上书，第73页。

社会主义,为此要采取正确的政策,要让群众感觉到新制度好;最后,列宁充满信心地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sup>①</sup>在1922年12月至1923年3月政治活动的最后阶段,列宁对俄国这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总的战略思考,得出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结论,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sup>②</sup>这说明列宁不再把国际条件当成一国无产阶级胜利的主要先决条件了。俄国具有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地理条件:地大物博、雄踞一方、没有强邻,这为列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 三、商品、货币、市场与社会主义

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看法在新经济政策后经历了一个变化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62页。

的过程。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了对商品货币的看法，是实践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列宁设想的还是进行商品交换，但是商品交换一放开，便变成了商品买卖。1921年秋，苏俄政府便适应了这一变化，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我们不得不退得这样远，因为商业问题成了党的一个实际问题，成了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sup>①</sup>此后，列宁特别重视商业，特别强调要发展商业，把商业看成是整个经济链条中必须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sup>②</sup>“目前商业竟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结合的惟一可能的环节，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惟一可能的纽带。”<sup>③</sup>列宁要求共产党员学做“文明商人”，要求按商业原则改造工业企业。但是，列宁的思想仍处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认识到在小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必然要发展商业，允许存在贸易自由；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贸易自由就是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认识到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在俄国行不通，但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仍把商品经济看成是异己力量。但是，实践的发展促使列宁的思想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1922年3月，列宁承认，“我们受制于俄国和国际的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实质上承认了市场的客观存在及其对俄国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列宁认识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37页。

② 同上书，第248页。

③ 同上书，第347—348页。

并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sup>①</sup>“我们的人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sup>②</sup>列宁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发展要受市场机制的制约，而真正掌握市场机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依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还没有仔细研究地方农业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我们地方政权机关的实际能力……就进行不得当的干涉。”他提醒大家，在制定法律时，要避免因不适当的干涉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关于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和出租土地的条件问题，党代表大会建议这方面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要用过繁的手续来限制这两种现象，……党在农民中的整个工作，其首要目的是实际帮助迅速扩大播种面积，增加耕地，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减轻农民的严重贫困状况”。<sup>③</sup>

1923年初，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真回顾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他从“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看到，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原来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高度集中管理的“大工厂”，从把商业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间接手段发展为把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认识上出现了一次新的飞跃。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改变绝不只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同上书，第130页。



是表现在工作重心的转移上,还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性质与商品经济做出全新的判断上。一年多以前在《论粮食税》中,列宁还把合作社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现在列宁则改变了看法,他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合作化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sup>①</sup>列宁这里所说的合作社就是商品买卖机关,列宁已经把合作制及其赖以存在的商品经济看作是与社会完全一致的,说明列宁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自然也离不开市场。

如果深入研究列宁思想发展的脉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列宁的思想转变绝不是偶然的。在二月革命前,列宁就十分强调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5、362、367-368页。

道路，“资本主义”是俄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190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就说：“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sup>①</sup>“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sup>②</sup>推翻沙皇政府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sup>③</sup>十月革命后，列宁为当时的革命热情所鼓舞，企图越过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在俄国直接按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使列宁认识到，“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54页。

② 同上书，第558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8—39页。

相抵触的”。<sup>①</sup>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其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对这一认识的新发展。列宁不是说俄国要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这一课,而是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市场不是相斥的,而是相容的。

### 第三节 历史的遗憾——新经济政策没有形成共识

####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没有上升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列宁没有来得及为后世留下一个严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构想,他的晚期著作也只是从思路上就重新认识“军事共产主义”和实行新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新经济政策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与当时党不够成熟、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掌握不够、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构想绝对化有关,也与新经济政策本身实践的时间短、列宁的政治生命结束过早有关。在1921—1922年,即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前两年,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仍然强调使用行政手段处理经济问题。对于新经济政策执行的时间,列宁估计得也不够长。他在1921年十月革命节前夕所写的著名的《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说:“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几个最大城市的街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但是，无论上述那种使用黄金的办法多么‘公正’，多么有益，多么人道，我们仍然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应当像 1917—1921 年间那样紧张、那样有成效地再干它一二十年，不过工作的舞台比那时要广阔得多。”<sup>①</sup> 列宁思想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他晚年于病榻之上所作的战略思考，但列宁的这些思考却被党内某些领导人看成是不成熟的想法，很少有人予以注意。

新经济政策是为形势所迫而实行的，列宁和俄共(布)的领袖们起初都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列宁后来改变了看法，但是，俄共(布)其他领导人不是一下子，也不是全部都理解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对新经济政策、对其社会公正性的怀疑在俄共内产生了关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关于在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争论。新经济政策往往被看成是允许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的、与无产阶级原则格格不入的政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建议应该对新经济政策施压，以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之路。从托洛茨基在 1923 年党的十二大上的言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托洛茨基说必须尽最大可能用更新的政策代替新经济政策，即立即“缩小新经济政策，对新经济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

还有一些人把新经济政策只看成是某种策略，是两次进攻之间的喘息时机，一旦时机成熟或条件改变，还会重新实行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策，实行以前那种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把小农经济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政策。季诺维也夫写道：“新经济政策——这是类似于布列斯特的退却，是类似于 1917 年 6 月以后的退却。当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国家成熟和西方无产阶级给予我们帮助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2 卷，第 248—249 页。

时,我们就重新开始进攻。暂时我们所有的只是‘喘息’。”<sup>①</sup>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多,其中不仅有广大党员,而且有干部。国家粮食委员会成员斯维捷尔斯基回忆说,1921年列宁在一次工作人员会议上说:“当我与你们面对面时,你们似乎赞成我并说‘是’,而当你们转过身去时,则说‘否’。”<sup>②</sup>列宁与坚持世界革命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论战。经济学家、财政人民委员会主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22年在回答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这一小册子时说:什么黄金,什么改革卢布,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一俟世界革命之火燃起,世界上所有货币都得取消。1922年3月16日,列宁给政治局写信,批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左倾教条主义。列宁针对这种情绪强调,新经济政策是严肃的、长期的。

在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中还有一些被称为“原则卫士”的人,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为资本主义复活创造前提条件,是从十月革命口号的后退。一些人因此而退党。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新经济政策却使私商和“新经济政策的商人”发展起来了,出现了新的不公平。赫鲁晓夫在回忆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时的心态就很能说明问题:“新经济政策一执行,混乱和饥荒马上就开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复了生气。市场上的商店里又开始有产品供应了,物价也随之下降。那时党的口号是‘学会做生意!’我们设想,不采取行政措施,而用私商和‘新经济政策商人’自己那种办法去把他们击败。我们设法尽量接管更多的商业,把它掌握在国家手中。在国营合作社中,我们竭力把价

<sup>①</sup> [苏联]B. П. 阿法纳西耶夫, Г. Л. 斯米尔诺夫:《历史的教训》,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102页。

<sup>②</sup> 同上。

钱定得比‘新经济政策的商人’的低，也竭力供应质量较高的货物，并且改善服务态度。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但是要我们自己适应新经济政策，却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sup>①</sup>就党内高层领导而言，只有布哈林、李可夫、鲁祖塔克、瞿鲁巴等人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党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则没有跟上列宁思想的变化。而对国家政策能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恰恰是后一部分人。

俄共(布)党内的上述左倾情绪根深蒂固，在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中，“军事共产主义”的“惯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停下来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更容易理解，更简便易行，而列宁号召他们通过学习经商、管理等等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则太复杂，不容易理解和执行。当时并没有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理论上做出深刻的反思，“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实行劳动报酬的平均主义和无偿提供服务（如无偿提供取暖、照明、住房等）；经济管理的集中化与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等仍被当成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这些特征在后来形成的苏联模式中又得到了重复。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一直作为党的纲领、作为指导党员的行动指南沿用到1961年，该纲领规定：“国际共产党以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其伟大历史使命为己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抗的独立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种种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揭露剥削者的利益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并向他们解释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只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把人

<sup>①</sup>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4页。

类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苏维埃政权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在分配方面，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全部分配机关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sup>①</sup>

## 二、新经济政策本身存在的矛盾 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俄国的国情相适应，其成就是显而易见的：1921—1922年收购了3800万公担粮食，而在1925—1926年收购了8900万公担粮食。1925年播种面积达到了战前水平。1921—1924年国有大工业总产量增长了一倍，保存了工人阶级的基本骨干，从1923年起在国营企业工作的工人数量开始增长。创建了一些商业银行，1924年春完成了货币改革，实现了币值稳定。<sup>②</sup>

但新经济政策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与问题，如1923年出现的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的商品荒，1928年的粮食收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28、530、543、546页。

<sup>②</sup> [苏联]B. Г. 阿法纳西耶夫、Г. И. 斯米尔诺夫：《历史的教训》，第103、104页。

购危机,还有所谓的耐普曼(新经济政策人)迅速发展,国家并不能像预想的那样控制他们等等。这些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专门的经济知识来解决。但是,俄共党的领导人多为职业革命家,他们习惯于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解决问题,急于求成,没有耐心,所以,一出现问题便通过加强行政手段来解决。整个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这一特点是明显的,最后发展到完全用行政命令方式取代了经济管理方法,新经济政策被人为中止。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强调:“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像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为,是狠狠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他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要受“因‘职责关系’沿用‘适合欧洲’的行动方式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影响,而要同这种行动方式作斗争,制定新的民法,确定对‘私人’契约的新的态度,等等。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列宁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担当起职责,教会人民法院“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



审判来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sup>①</sup>但对于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的现象,并没有明确的界定。1923年秋发生销售危机时,捷尔任斯基曾把莫斯科的一些耐普曼商人流放到北极地区,中央开始采取限制私商的政策。当次年捷尔任斯基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后,他认识到国营商业并没有发展到可以代替私商的地步,又力主放宽对私商的限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直都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这类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却不想让它合法化。”<sup>②</sup>说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应是长期的,因此并没有为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建立起法律方面的保障,行政命令体制仍起很大作用。列宁强调,不能放弃“革命手段”,“以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会终止使用恐怖手段,那是极大的错误。我们还会重新采取恐怖手段,采取经济方面的恐怖手段的”。<sup>③</sup>这也为以后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中断新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前提。

---

① 以上引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25—428页。这是1922年2月20日列宁给库尔斯基的信,列宁在信上注明:“不得复制,传阅时必须签字,不得外传,不得泄露给敌人。”“在报刊上丝毫不要提到我的信。谁要愿意,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不要提到我,而且要多举一些具体材料!”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46页。

③ 同上书,第42卷,第460页。

## 第十二章 列宁对无产阶级民主实现途径的探索及未能解决的问题

### 第一节 “立行合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在二月革命前，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将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二月革命后，列宁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俄国的尖锐矛盾，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是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号召工人再次表现出英雄气概，夺取政权。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无产阶级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也成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在1917年所写的《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了新政权的理论框架。列宁的设想可以用“立行合一”来概括。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实践中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直至晚年才对此做了部分修正。

#### 一、广泛的民主制——无产阶级民主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的领袖们在描述未来社会的

特征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是要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彻底改变资产阶级民主内容与形式相脱节的现象,实行更切实的民主。“立行合一”这一政体形式是巴黎公社首创的,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扬和推崇。他们认为公社终于发现了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的新的政权形式,即它“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sup>①</sup>巴黎公社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普选主要是选举立法机关,而行政官员大多是任命的状况,也改变了议会会议而不决的低效率,其实质在于:政府从压迫人民的机关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机关,人民从压迫者变成国家的主人。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政治体制,它的监督与制衡功能,起到了防止个人专制的作用。但是,在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优势的社会里,它自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马克思从巴黎无产阶级的首创中否定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立,但他并没有否定对政权的监督。“立行合一”是以官员的普选为基础和前提的,选民可以随时罢免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sup>②</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明确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有国家和国家政权，但“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巴黎公社那样的国家”。“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限制并压抑群众自主的政治生活，不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工兵代表苏维埃则与此相反。”<sup>①</sup>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详细论述了什么是公社式的国家制度和政体形式：

一是更彻底、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sup>②</sup>

二是取消议会制，但不是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是把代表机构从清谈馆变成工作机构，即代表机构要“兼管行政和立法”，议员要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sup>③</sup>

与马克思一样，列宁对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设想，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如官吏成为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立法和行政分立导致无效率等等来设计的，他们的目的是使国家行政管理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要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率、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立行合一”不是不要监督，而是通过普选制——人民直接选举官员并能随时撤换不称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62页。

② 同上书，第31卷，第40、46页。

③ 同上书，第44—45页。

官员来进行监督的，“立行合一”的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立行合一”与“普遍选举”两条原则是结合在一起、缺一不可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并没有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在未来政体中应该如何具体行使领导职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实践来回答了。

## 二、理想被现实修正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把他的“立行合一”设想付诸实践。由于俄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又具有封建专制传统的大国，分散的农民占人口的80%，70%是文盲和半文盲，加之十月革命后不久即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叛乱，这与具有民主传统、工人集中的巴黎是有巨大差异的。因此，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所坚持的两项原则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立行合一”的政权渐渐脱离了全民直接选举这一基础。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多个政党并存，各政党通过在苏维埃的党团代表发挥政治影响。国家政权是由各级苏维埃组成的。这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1917年10月25日，即十月武装起义的第二天，第二届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它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国家由临时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管理。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人民委员会有监督与撤换权。这样，苏俄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由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构成。

这种政权结构曾经带来职责不明、机构重叠等问题。如全俄中

央执行委员会(其成员1917年10月有102人,1918年1月立宪会议解散后,成员增至326人,其中布尔什维克186人,占了优势)成立了主席团,随后又陆续设立了一系列职能部门,与人民委员会下的各部同名同类,立法权的归属也不明确,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具有立法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委员会是否具有立法权,却引起了争议,布尔什维克党内少数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党团曾反对人民委员会立法,斗争很激烈。<sup>①</sup>列宁坚持人民委员会是立法与行政相统一的机关。1918年7月,列宁亲自主持制定了俄罗斯联邦新宪法,最终确定了人民委员会的立法权,结束了争论。

1918年7月第五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全国性的立法文件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及人民委员会颁布”(第50条),人民委员会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负责(第40条)，“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政务总的管理属于人民委员会”(第37条)，“人民委员会为实施此项任务有权颁发一切法令、指令及命令并采取为保证国家生活正常、快速运转所必需的任何措施”(第38条),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具有全局政治意义的一切决定及决议,须提交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第39条),但“凡刻不容缓的一切法令及全国性措施,其中包括一切军事立法措施,一切必由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负责的措施以及外交措施,必须经人民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第40条)。

1918年宪法明确了人民委员会的立法权,但没有解决行政机

---

<sup>①</sup> 参见刘克明、金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5页。

构重叠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立法机构和双重行政机构,但权力的重心在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不仅在行政上是国家的领导,而且担当着大部分立法工作。这与当时严峻的环境有关。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要求尽快用立法的形式形成决策,列宁领导的人民委员会高效率的工作正是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的保证。

与此同时,列宁所设想的另一个原则——“官员”的普选并未实现,人民的自治和劳动者的直接管理和监督日益被党的管理和监督所取代。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受俄国缺少民主传统和人民文化水平低下这一历史条件的制约,显然,直接的普选制不适合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列宁的理论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认识到苏维埃政权虽然在法律上消除了劳动者参加管理的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sup>①</sup> 这个“先进阶层”就是俄共(布)。

列宁重视党的领导,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俄共和其他政党并存,党对苏维埃的领导采取的是在苏维埃中组织议会党团的形式。人民委员会开始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列宁任主席。后经布尔什维克的邀请、说服与让步,曾有七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参加政府。1917年11月底和12月中,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数超过布尔什维克(113:92,112:97)。列宁甚至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它是根据革命的经验,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建立的。”“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sup>①</sup>由于政见分歧,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相继退出政权机关,形成了俄共一党执政的局面。俄共不仅在方针、政策上起领导作用,而且逐渐代替人民行使行政职权。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八大指出,俄共应该“把自己最坚定忠实的党员提拔到所有苏维埃工作的岗位上,通过这些工作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

于是,任命制代替了选举制。凡政府系统各级干部、法律监察系统干部、军事系统的干部,均是由相应的领导人任命的,而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办事机构的干部及人民团体办事机构的干部等等也都是任命的。这与巴黎公社有很大不同,巴黎公社的最高行政与立法机关的公社委员会、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公证人)、国民军各级将领、甚至工厂企业负责人都是选举产生的。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确认,在特殊条件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同时建议中央委员会在分配工作人员时一般应以推荐代替任命。仅1920年4—11月,俄共(布)中央就任命了37547名干部。

纵观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践,“立行合一”体制保证了人民委员会的政令畅通,对苏维埃政权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其历史功绩不可否认。但是,由于这一体制离开了人民直接选举、直接监督这一原则,也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立法权分散,行政职责不明。人民委员会的立法权在非常状况下可以理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05、306页。



解,但在和平时期它享有此权并不合适,因为它是一个被任命的机关,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机关。另外,由于行政事务繁多,人民委员会常常无法兼顾,难免顾此失彼。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职责在宪法中没有规定,它与人民委员会的职能范围重叠。二是这种体制缺乏各政权机构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人民委员会权力过大。十月革命初期,在多党制的条件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多个党派的代表组成,对人民委员会起着一定的制衡和监督作用。但随着多党制向一党制转变,它们之间的监督与制衡作用大大降低,人民委员会权势日重,在列宁这样具有民主作风的领导者领导下,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也没有出现个人专断,但是这种体制不能防止出现个人专断,其工作的好坏完全系于领导者的个人品质,也是危险的。三是助长了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旧俄国,1913年每百名工人对应8.1个职员,而苏俄1920年则达到16名,增加近一倍。另外,1918年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机关只有2500名工作人员,各总局有3300人,总共不到6000人。但是到了1921年初,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机关就有2.4万人,省级国民经济委员会有9.36万人,县级10.6万人,总共达23万之众。<sup>①</sup>有些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的专靠行政命令办事,有的甚至只追求个人升官发财。四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严重。十月革命提出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苏维埃应该是人民群众自己选举产生的、实行自治的权力机关,后来却渐渐变成了“一个鼓动和通知的机关”。

---

<sup>①</sup> 转引自姜长斌:《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未能改变 业已形成的政治体制

俄共(布)改行新经济政策后,放宽了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为国家计划与个人分散经营相结合的经济运行形式所代替。但是,经济政策的放宽并没有相应地在政治体制上反映出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并没有根本改变。

### 一、党内的民主与集中:重心仍在集中

国内战争开始后,苏俄的政治体制从试图建立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转向了权力集中,人民民主、党内民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国家和社会权力向俄共(布)集中,多党执政向一党独存、一党执政转变,党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党内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从1919年开始,党内开始出现“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前一派别认为造成苏维埃政权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集中制的领导,权力集中已经超过限度了,应该逐步采取“充分的工农民主的形式”,走向“公社国家”;后一派别以工人的代表自居,称党的领导“脱离工人群众”,主张由工会抓经济。1920年9月,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提出了整顿党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专门的报刊机构,以便对党的地方和中央机关进行广泛的批评,强调绝不允许迫害对党决定的某些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还提出制定实际措施消除领导者和劳动者生活条件方面的不平等状况等等。此后,党内民主生活加强了,自由讨论空气浓厚了;11月,出现了关于工会作用的激烈争论。在党内民主得到发展

的同时,其他党,如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从右派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少数派”,也都能合法活动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出版了《旗帜》杂志,社会革命党少数派出版了《人民》杂志。1920年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他们在大会上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建议改变对农民的政策。

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改变国内战争时期党在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在工作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的要求首先提了出来。对于党本身的改革,列宁强调民主化和加强监督。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指出,为了适应向和平时期转变,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要发生变化,即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领导方法上的战斗命令制必须改变。“目前形式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地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sup>①</sup>但是,党的十大提出的向党内民主制的转变没有像新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政策转变那样得到根本的实现。列宁生病时,党内制度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坏了。1923年,党内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暴露出了

---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4页。

很不健康的倾向。

在强调加强党内民主的同时,1921年,俄共(布)十大还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其核心内容是禁止党内存在派别和进行派别活动,对从事派别活动者中央委员会可以处罚。这一决议改变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史上一直允许党内存在派别的传统,它是根据列宁的建议做出的。列宁建议党内禁止派别活动,是有历史背景的。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权被小资产阶级势力包围着,他们的势力在积聚着对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满,喀琅施塔得事件就是这种不满的表现,情况危急,所以,在这个转折关头要加强纪律。列宁认为派别斗争削弱了党,并可能被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利用以组织反革命活动。列宁认为不禁止派别活动,党有丢掉国家政权的危险。还由于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列宁把它只看成是退却,按照列宁的理论,队伍在退却时为了防止乱了阵脚,更要加强党的统一和纪律性。“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sup>①</sup> 列宁禁止派别活动还有一个动机,即克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来自党内的阻力。

斯大林却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把这个决议作为法宝,消灭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使这个决议遭到了很多非议。应该看到,这个决议在当时有其应急性的特点,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并非永久性的政策,而且其内容和着重点与后来俄共(布)所强调的并不一样。决议并没有禁止党内存在批评和意见分歧:“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分析党的总路线,总结党的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2页。

研究改正错误的方法等等,都不能由拥有某种‘政纲’等等的小集团去讨论,而应当由全体党员讨论。因此代表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每一个提出批评的人,应该考虑到党处在敌人的包围中的情况,并且应当自己直接参加苏维埃和党的工作,努力来实际地改正党的错误。”“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同时声明,在党员所特别注意的问题例如清洗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出党、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的问题上,对任何实际的建议都应该认真加以考虑,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试行。”<sup>①</sup> 这一决议的第7条规定:“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么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执行。”<sup>②</sup> 这一条是与民主集中制相抵触的,是一项应急措施,在党内生活正常发展和国内局势稳定后是应该取消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向全党公布这一条。列宁说:“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6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5—66页。

制都不容许的……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sup>①</sup>但是，在1924年党的十三大上，斯大林为了压制托洛茨基等人，首次把这条公之于众，并且被永久化，成为斯大林消灭党内持不同意见者的依据。

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梁赞诺夫建议在谴责派别活动的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列宁表示反对。他说：“如果在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我们决不能剥夺党和中央委员会向全党申诉的权利。”“我们在这次大会上的教训，是忘不了的。但是，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提议加以否决。”<sup>②</sup>由此看来，在党内发生重大的意见分歧时，列宁并不反对出现不同的政纲。可是决议本身又是排除出现不同政纲的。

虽然列宁禁止党内派别存在，但对派别活动的领导人并没有采取歧视态度。在俄共（布）十大上，“工人反对派”领导人施略普尼科夫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对于反对派提出的正确意见，列宁也注意从中汲取营养。在谈到“工人反对派”成员库图佐夫的发言时，列宁说：“有些人，譬如库图佐夫，有一部分话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们机关中的丑恶的官僚主义现象。我们回答说：对，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国家。我们号召非党工人也来同官僚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7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义作斗争。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应当更好地吸收库图佐夫这样的同志参加这个工作，把他们放到比较负责的岗位上去。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sup>①</sup>列宁的设想是党要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sup>②</sup>

在列宁时期，无论是严酷的国内战争时期，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开得更频繁，例如，在从党的九大到十大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全会召开了30次，即使在1919年3月政治局、组织局成立后，党的权力重心也在代表大会，重要问题要开全党会议决定。列宁作为党内有威望的领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党内也从来没有人认为列宁是党内惟一发表正确意见的人，如在布列斯特和约、外贸垄断制、成立苏联等问题上都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通过辩论和说服，达成一致。

但是，俄共（布）的民主机制并不健全，党的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等人也都缺乏民主作风。因此，在列宁这样有民主作风的领导人的领导下，俄共能够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的、开诚布公的讨论，但是，换了领导人，就不能保证会如此行事。在实行一党独掌政权的条件下，党内存在不同的意见曾为俄共（布）在重大问题上提供了多种选择的方案，保证了党内不会出现专断与强制。禁止党内派别的存在，对于当时应付危机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在危机过后，由于在持不同意见者和派别之间难以确定明显的界限，而社会主义建设在俄国是史无前例的，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有多种选择方案都是难免的，加上社会阶层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4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4页。

并不单一，在禁止其他政党存在的同时，又禁止党内“派别”活动，其实践的结果，是加强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的专断，使他们失去了监督与制约，也使党失去了有多种选择的可能。

列宁的患病使十大关于党的民主的决议没有切实得到贯彻。1922年，列宁只在4月和5月的一段日子和10—12月上半月出席党和国家机关的几次会议，其余时间只能通过写信或召见某些领导人来过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领导核心”。对此，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四大上说：“人们曾经对我党中央委员会内形成的核心议论纷纷，也知道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曾默认这个核心将继续领导我们的党，直至伊里奇痊愈。”<sup>①</sup>这个领导核心曾对列宁提出的一些原则性建议予以抵制，如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问题及格鲁吉亚事件。针对后者，列宁在病榻上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而1923年4月6日，政治局以多数票通过了不发表这篇文章的决定。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的其他一些文章和书信也同样没有按照列宁的意愿让全党知晓。

斯大林掌握了党的干部政策的全部杠杆，他趁列宁卧病之机，把自己的支持者大量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这使得实现党内民主制（当然包括干部的选举制）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党内当时有不少人看到了这样做的危险。

1923年夏，季诺维也夫等人也意识到了斯大林的专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书记处是一个样，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书记处完全是另一个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时，无论谁当

---

<sup>①</sup>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6年俄文版，第454页。



书记,无论谁在书记处,二者都同样只起有限的辅助作用。这是一个必须执行既定政策的组织工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在时,大家都清楚,中央书记处势必会成为一个具有绝对的决策权的机构。”<sup>①</sup> 斯大林在列宁病重期间明显加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专断作风引起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不满。1923年7—8月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斯大林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便决定签署土耳其海峡公约,撤换了《真理报》编委会成员,派阿洪诺多夫和伊布拉吉莫夫这些持对立观点的人作为中央特派员去处理民族问题,这等于否定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季诺维也夫非常气愤,他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所有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不无重要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sup>②</sup> 他们对书记处事实上决定一切、斯大林多次使他们面对既成事实很不满。布哈林在给加米涅夫的信中也说:事情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真的,即使绵羊也会举起反抗的旗帜。……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组织工作方法”。布哈林恳请加米涅夫通报组织状况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迹象。<sup>③</sup>

1923年8月,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部分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叶夫多基莫夫、伏罗希洛夫、伏龙芝、拉舍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聚集在一起,讨论列宁不能工作时关于集体领导的问题,实际上要限制书记处的权力。季诺维也夫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建立新的书记处,最好让斯大林、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

①: 这是季诺维也夫在十四大上的发言。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55页。

② 参见[苏联]《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第198页。

③ 同上书,第207页。

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三人中的一人进入书记处，使书记处变成“政治局的真正核心”，另一个方案是变书记处为政治局的辅助机关。斯大林收到说明这些建议的信后，赶到基斯洛沃茨克，否决了季诺维也夫的这两个方案，理由是接受这两个方案就意味着党的领导里“没有李可夫、加里宁、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sup>①</sup>斯大林提出的方案是“不变动书记处”，而让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进入组织局，以便把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实际上他们的改革方案都只是确定谁属于“小集团”，而没有在体制上保证如何实现集体领导，防止少数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之上。

托洛茨基 1923 年 10 月 8 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10 月 15 日，又有 46 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他们的信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强国家的计划，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涉；就党内民主问题而言，他们认为存在中央脱离全党的危险，他们主要是对党内干部任命制不满。如托洛茨基在信中说：“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指出要把从上到下亲自认真挑选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作为新中央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组织局挑选工作人员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另外一个方面。党员在任免调动时首先着眼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维护或者反对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非公开的、非正式的、但实际执行的党内制度。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曾提到中央委员会需要‘有独立性的’人。对这个词现在已不需要任何解释。此后，‘独立性’标准开始通行，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最基层的支部，都由总书记处任命。”“在最严酷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党内任命的广泛程度还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现在任命省委书记已成惯例。这实际上为书记创造了一个不依赖于地方组织的状

<sup>①</sup>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506 页。

况。由中央任命的从而几乎独立于地方组织的书记又是省范围内负责任免书记的人。从上到下建立的书记机构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它把所有关系网都集中到自己手中。党员群众切实参加建立党组织愈来愈成为幻想。最近一年半左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记心理，其特点就是相信书记不必了解事情的实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同志在主持苏维埃机关工作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组织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才能，一旦到了书记的岗位上，便开始发号施令地处理经济、军事等其他问题。这种情况相当有害，因为它消除并扼杀了责任感。”<sup>①</sup>“党的机关的官僚化通过采用书记挑选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国内战争最严峻的时刻，我们在党组织中甚至在报刊上还就有关吸收专家、游击队和正规军、纪律等问题进行过争论，而现在这种就实际困扰党的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的做法却根本不可能了。进入国家或党的机关的党务工作者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阶层，他们拒不接受来自本党党员的哪怕是公开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书记官员就是形成党的意见、制定党的决议的机构。在这个不接受本党党员意见阶层的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众阶层，对这个阶层来说任何决议都是以号召或者命令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些党的基本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十分合理的或由偶然因素引起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没有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公开交换意见和通过群众对党组织施加影响（选举党委书记等）的途径消除，反而悄悄积蓄，然后发展成为体内的脓疮。尽管官方机构即党的书记机构几乎使党组织越来越自动地一致起来，但对最尖锐最迫切的问题的思考和意见还是绕过了党的官僚机构，并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128--129页。

党内成立非法派别创造了条件。”<sup>①</sup>

托洛茨基谈到在他7月份休假时,政治局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裁军,而到8月份德国事变发生后,政治局又撤销了这项命令,要求制定加强军队的计划。1923年9月,中央全会决定让几个中央委员进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下面设立一个执行机构,拟吸收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克良斯基、拉舍维奇、斯大林为其成员。这自然是对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权力的削弱。托洛茨基十分不满,他在信中说:“党内没有要求对这一措施加以说明,不管党内对这一措施的想法如何,宣布成立新革命军事委员会本身只能被我们的邻国理解为转入新的即侵略的政策。只是在我最坚决的抗议下,全会才没有立即实施上述措施。全会把成立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拖到‘动员之前’。……难怪当我指责古比雪夫同志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变动的真正理由与公开宣布的理由毫无共同之处时,他不仅不否认这一矛盾(又怎么能否认得了),而且直接了当地对我说:‘我们认为必须同您斗。可又不能宣布您为敌人,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sup>②</sup>

“根本错误的党内制度、把注意力从创造性的工作转移到党内派别划分上、人为地挑选干部而完全不考虑他们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威望、用只靠对所有人实行消极纪律的正式命令来代替有威信的和内行的领导,这些都只会加剧而不会减轻困难。这种党内制度不仅破坏经济发展,而且始终是一些人日渐不满、一些人消极冷漠、一些人事实上离职的直接原因。”<sup>③</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同上书,第134页。

托洛茨基的建议是：“书记处的官僚主义应予废止。党内民主制应该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否则党就有僵化和堕落的危险。党的基层群众可以在党性允许的范围内说出自己的不满，并有实际可能按照党章、主要是按照我党的全部精神建立党的组织机构。要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首先是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需要重新配置党的力量。……摆脱目前处境的痛苦最小并且最便捷的出路，是现领导集团意识到它所人为维护的制度的一切后果，真心诚意地准备促进党内生活转上较为健康的轨道。”<sup>①</sup>

在10月15日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中，托洛茨基这封信被看成是：一个中央委员发表了一个与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我党现行政策相对抗的明确的行动纲领的事实和在此基础上建立派别组织的企图，而这一切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与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相抵触的。应该说，托洛茨基看到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不良倾向——干部任命制带来的弊端。托洛茨基写了一封对党内状况表示不满，并要求改革的信，便被说成是派别活动，这在俄共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实际上，列宁在1923年留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的批评和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描述远超过托洛茨基，可见，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问题并非妄言。

在俄共(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讨论托洛茨基的信并做出决议的同时，1923年10月15日，又有46名老布尔什维克给中央政治局写信，阐明他们的立场。他们在信的开头便声明：“目前形势极为严峻，(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134—135页。

切政治后果,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出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令人失望。”

他们认为造成党内危机的原因是:“我们在官方团结一致的表面形式下,实际上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方针时,只是片面地去适应小圈子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独立发挥作用的集体,这个集体本应敏捷地抓住时机积极进行活动,并与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正相反,我们眼看着党日益迅速地、毫不掩饰地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指定的党的官员和不参加社会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

“……党内的自由辩论事实上已名存实亡,党的舆论也缄默无言。现在省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由党,也不是由党员提名选举的(这些代表还要提名并选举省委会和俄共中央)。相反,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书记特权阶层和党的官员选定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变成这一特权阶层发号施令的会议。党内建立起的这种制度是根本不能容忍的;这一制度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用挑选出的官僚组成的机关代替党,这一官僚机关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运转自如,然而危机一旦到来必然发生故障,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有根本不能独立行动的危险。”<sup>①</sup>

他们认为,党的十大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经过时,到党的十二大召开前,这一制度已不合时宜,它开始走向了反面,党内的相互联系开始削弱。“党内斗争越是不公开,斗争也就越激烈。”“必须消灭派别制度,而这一任务首先应该由该制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148页。

度的推行者来完成,必须用同志般团结的和党内民主的制度取而代之。”他们向中央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邀请最有名望、最积极的工作人员出席会议,被邀请的人要包括那些对形势的看法与中央多数派的观点不同的人。<sup>①</sup>

46人声明的提出者,并没有结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派别组织,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看法也不尽相同,也没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参与起草了他们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声明或他们看到过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政治局把托洛茨基说成是这个集团的中心,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1923年10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托洛茨基10月8日的信做出答复,通篇都是对托洛茨基的指责,不同意托洛茨基对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称这一文件的实质是体现在两个小集团(“民主集中派”和托洛茨基的集团)的联合上,托洛茨基已成为中心,“党的所有主要反对者都集合到这个中心的周围”。他们说托洛茨基写这封信是由于中央委员充实到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去引发的,其他理由都是托洛茨基找的借口。<sup>②</sup>当时正在彼得格勒的布哈林10月20日给斯大林和托姆斯基往中央书记处发了一份电报,表示:“我强烈要求对内容作如下改动:第一,必须加进党内民主这一条并且加以阐释;第二,不可对经济危机加以粉饰;第三,必须多多使用党的统一这种调子;第四,去掉一切报纸小品文的味道。文件的形式应高度严谨,无懈可击。”10月25—27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对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148--149页。

<sup>②</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162--182页。

政治局的攻击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sup>①</sup>

1923年关于党内民主的争论正发生在列宁病重、不能工作期间,其中权力斗争的因素很浓。尽管季诺维也夫等人对斯大林的书记处的专权也不满,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更害怕托洛茨基的威望阻碍他们走上权力的巅峰,因此,他们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斗争,看不到托洛茨基建议中有合理的东西。所以,争论的结果不但没有使党的制度民主化,反而强化了党的集中专断趋势。

1923年党内争论暴露出来的不良倾向表现在:一是不同意见、对党的任何批评都被说成是反党行为和派别活动,斯大林等“多数派”谴责反对派力图破坏中央的威信,是在搞派别活动。二是力图把反对派的观点同过去党内存在的分歧联系起来,并借此宣称反对派一贯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虽然1923年12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提出了目前在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面的10项措施,包括实施各级负责人的选举制、就一切重大的党的政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等,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根本否定任命制,也没有解决党内上层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托洛茨基认为这一决议完全继承了十月全会的各项决议,是机关官僚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1924年1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关于争论总结和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完全否定反对派的意见有合理的成分,对他们的主张上纲上线,说他们“不仅企图修正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公然背离列宁主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小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年第3期,第215页。



资产阶级倾向。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反对派客观地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党内民主原则已经开始被任意地在党的范围以外加以解释，其用意就是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和扩大新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sup>①</sup>这种扣政治帽子的办法自然不会平息党内争论，也无助于加强党的民主建设。

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同志们，我认为重要的是，应该从生活提出来的新任务着眼来讨论所有的问题，因此，不应该去重演过去的那种争论……我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他向反对派挑战，号召他们在这个讲台上承认自己不对。这从心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应该停止争论，而主要来讨论生活向党提出来的那些问题。”<sup>②</sup>但是，她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在报告和发言中，都不提列宁的“遗嘱”，而大谈反对派，大谈托洛茨基的错误。这种党内斗争的方法被延续和强化下去了，直到党只用一个人的头脑思考，没有了思想和意见分歧。

应该说，在转入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俄共（布）并没有解决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党内对此看法也不一样，斯大林等人完全否定民主应该通过必要的形式来实现。当时已掌握“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很少谈民主的形式问题；相反，他不断谴责“把民主问题偶像化”。<sup>③</sup>集中并不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是权势压迫下的集中。这使得党不可能做到决策的科学化，犯错误、走弯路在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67页。

<sup>②</sup>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62页。

<sup>③</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9页。

所难免。

## 二、经济与政治：矛盾与协调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化初露端倪。纵观整个苏联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史，新经济政策时期是思想最为活跃、民主气氛最浓的时期。1921年夏天，报刊上就提出了法制国家的思想。12月底，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sup>①</sup>列宁说明了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缩减它的职能与权限的必要性。1922年2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撤销全俄肃反委员会，成立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它只保留了镇压公开反革命发动、同间谍活动和走私活动作斗争等职能，不再享有定罪权，所有案件都交由法院处理。国家政治保卫局最迟应在两周内对被捕者提起诉讼，并且最迟不得超过两个月或将其释放或将案件移交法院。随后还通过了其他旨在加强法制的法律，如劳动土地使用法、刑法典、个人基本财产权利法（该法案赋予所有公民建立商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权利）。

但是与国内战争时期相比，整个政权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和社会革命党少数派的领导人多次发表声明，要求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范围内合法活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他们批评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认为“纯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53页。

粹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实行农民的政策。孟什维克机关报《社会主义通报》在一篇社论中断言：“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得不在目前掌权的苏维埃官僚阶层极其积极和消极的反映和反抗的情况下推行其在经济方面向小私有者农民让步的实际纲领。该纲领同苏维埃官僚统治阶层的矛盾不亚于同这个阶层的整体能力和素养的矛盾，我们的改革者只有依靠农民自身积极的自主性即他们的政治力量，才能够成功地克服这种反抗。”<sup>①</sup> 知识分子也把新经济政策与创作自由联系在一起。

列宁反对在思想上搞“和平共处”，他与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进行思想斗争，要把他们送到资产阶级国家去。在列宁看来，俄国是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改造他们要经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工作，“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纪律”。<sup>②</sup>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在经济中广泛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潜伏着蜕变成一般资产阶级国家的危险，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上说：“现在国外正在大肆宣传，说布尔什维克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关进监牢，而自己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当然，我们容许资本主义存在，不过是在农民

<sup>①</sup> [苏联]K. 戈兰德：《政治与经济——20年代初社会斗争概述》，[苏联]《旗帜》1990年第3期，第126页。

<sup>②</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4页。

所需要的范围以内。这是需要的！没有它，农民就无法生活，无法耕作经营。而没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宣传，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俄国农民是能够生活的。”<sup>①</sup>

在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同时，俄共（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也恶化了。莫斯科逮捕了160名孟什维克，彼得格勒逮捕了120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被指控参与了喀琅施塔得叛乱。事实上，这些合法活动的政党并没有号召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但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能够对水兵的情绪产生影响。他们提出放弃对农民的强制措施，把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取消共产党的一党专政，重新自由选举苏维埃，实行言论自由。俄共（布）十大没有专门审议对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宁从喀琅施塔得叛乱中得出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加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但是以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对其他政党的一般态度应该怎样，有关这些问题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在4月21日完稿的《论粮食税》中，列宁阐明了对其他政党的立场。他说：“1921年春天的事态再次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帮助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背离布尔什维克，帮助‘政权’作有利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变动’。”“而我们则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sup>②</sup>虽然列宁这么说，但并没有对他们实行普遍逮捕。1921年4月底，有十多名孟什维克经过选举进入了莫斯科市苏维埃；5月中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代表都出席了全俄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但到1922年底，其他党派，无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41卷，第229、230页。

组织还是个人,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布尔什维克一党独存、独掌政权的政治局而在苏俄完全确立下来。

对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当时亦有其他方案。十分明显的是,俄国是个农民国家,经济结构复杂,阶级结构自然也不是单一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非无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他们也是得到无产阶级国家允许的,他们的利益自然也要得到承认和保护。1921年4月11日,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工作人员兼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专员伊·维·瓦尔金向俄共中央和俄共莫斯科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建议:给社会主义性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至少,给它们中的左派以合法活动的可能,包括在出版领域活动的自由,让他们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我认为让‘所有政党’而不是‘一党’参加苏维埃选举极其重要,我们在苏维埃中需要有反对派。非党工人反对的一党专政指的是在苏维埃中缺少能够经常反映他们职业的和日常生活的、而不是阶级利益和需要的政党”;对于“那些未被指控策划、号召、组织起义和罢工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最‘规矩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让他们参加4月底举行的苏维埃选举。他建议允许他们在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提醒说,沙皇政府一方面流放布尔什维克去服苦役,一方面容许杜马中存在布尔什维克党团,因为它要顾及俄国的议会制度,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自由选举’、‘遵守宪法’,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立场,就会巩固我们的阵地,而弱化新的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可能性。……我觉得,当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拥有合法地位时,

我们就更容易与他们进行政治斗争。”<sup>①</sup> 4月14日,政治局会议否决了瓦尔金提出的释放小资产阶级政党成员的建议。4月17日,列宁也没有采纳瓦尔金的建议。他在瓦尔金的报告上批示,称瓦尔金的建议是错误的,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行不通。<sup>②</sup>

1921年5月,副农业人民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恩·奥新斯基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书,建议成立“农民苏维埃协会”,其功能是促进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向苏维埃和合作社管理机关推荐候选人等等,这个协会是独立的组织,党可以通过在协会中的代表监督协会的工作,他建议通过这种途径把农民的主动性与党的领导作用结合起来。列宁对此没有反对,但认为为时尚早,他请中央委员们就此提出意见,但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反对。<sup>③</sup> 在奥新斯基之前,1906年入党的老党员格·米雅斯尼科夫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改进国内政治生活的长篇报告。他建议成立农民协会,认为没有农民的自主性,经济不可能发展,就会产生官僚主义。他还建议改变党与工人的关系,认为党脱离工人阶级,导致工人骚动和喀琅施塔得叛乱:“人们感到政权是有的,但不是自己的,可望而不可及。要想从政权中得到好处,就必须施压,否则就什么也没有。任何一点小事就会引发意大利式的罢工,工厂一罢工,就几乎满足(拆东墙补西墙)它的全部要求。”他认为,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禁止批评也是导因之一。他建议实行高度的民主:“我们在镇压了剥削者的反抗并建成国家惟一的

① [苏联]Ю. 戈兰德《政治与经济——20年代初社会斗争概述》,《旗帜》1990年第3期,第119—120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261页。

③ [苏联]Ю. 戈兰德《政治与经济——20年代初社会斗争概述》,《旗帜》1990年第3期,第120页。

政权之后，一镇压高尔察克就应该立即废除死刑，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自由在世界上从君主派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谁都未曾见过。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措施来加强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广大群众中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sup>①</sup>米雅斯尼科夫的报告没有得到答复。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伤脑筋的问题》，提出必须制定能保证和平演进、首先是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规。这种观点在党内遭到强烈反对，组织局还专门成立委员会处理米雅斯尼科夫的问题。列宁尖锐批评了他的观点。列宁赞成实现国内和平，但坚决反对出版自由。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许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我们不愿意自杀，因而决不会这样做。”<sup>②</sup>列宁建议他不要用出版自由来医治党的缺点、毛病，而通过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报刊来讨伐营私舞弊行为。米雅斯尼科夫不同意列宁所谓资产阶级比我们强大的说法：“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也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才是这样，而在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了。”关于讨伐营私舞弊行为的问题，他认为：“公开性将比监察委员会更多地消灭这种行为。”他强调，言论自由只应给工人和农民，而对资产者立宪民主党人、律师、医生、教授没什么好说的，只能镇压。由于米雅斯尼科夫坚持自己的看法，于1922年2月20日被开除出党。1923年夏，他和H.库兹涅佐夫组建了“俄共工人小组”，提出必须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

① [苏联]O. 戈兰德《政治与经济——20年代初社会斗争概述》，《旗帜》1990年第3期，第12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85—86页。

举托拉斯和辛迪加管理委员会,在工业管理中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原则,把工会变成监督机构,撤销人民委员会,取消完全脱离工人阶级的党内统治集团。该组织被九月中央全会认定是反党组织,其成员被开除出党。

列宁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被季诺维也夫等人变成了“党专政”的理论。季诺维也夫在党的十二大上说:“如果我们不想使俄国倒退,如果想发展经济,如果不想使新经济政策成为资产阶级对付工人的策略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上是我们党的专政就是绝对必需的。”“对党的路线的任何批评,尽管被称为‘左’,客观上是孟什维克式的批评。”<sup>①</sup> 斯大林所作的组织工作报告也提到了党的专政。可以说,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们贯彻的就是“党专政”的思想。

十二大后,俄共(布)加紧了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成员的镇压。1922年上半年,实际上存在的出版自由也没有了。1922年8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对持不同意见的分子和前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成员采取行政措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社会学家索洛金等被驱逐出国;经济学家尤罗夫斯基发表文章,建议为了减少财政赤字,必须消除“战时经济”的一切表现,结果被流放。列宁强调利用旧知识分子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大厦,但是中央委员会中不少人坚持的是另外的政策,列宁生病与不能正常工作妨碍了列宁政策的执行。到1922年秋,有二百多人被驱逐出境,其中不仅有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实际工作方面的专家:工程师、农学家、医生等。

1923年,在党内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中,俄共(布)中央政治

<sup>①</sup> [苏联]《旗帜》1990年第3期,第135页。



局在答复托洛茨基 10 月 8 日的信中指出：“至于谈到‘广泛民主’的原则在我们党贯彻得不充分、不彻底，这倒是事实。但托洛茨基同志似乎忘了第十一次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某些决议是有意识地对广泛民主加以限制这一点。比方说，十一大作出决定，十二大又加以重申，省委书记必须有革命前的工作经历，县委书记必须有 3 年的党龄，而且两者均应经党的上级组织批准，这当然大大限制了‘广泛民主’——但为了杜绝新经济政策对党的影响，这也是绝对必需的。”<sup>①</sup>他们害怕发展民主。加米涅夫 1924 年在第十一次莫斯科党代表会议上讲到了发展民主的危险：“今天说：党内民主；明天说：工会民主；后天非党工人就能说：给我们你们倡议的民主；那么，难道处于汪洋大海中的农民就不能对我们说：给我们民主。所以我不愿出现这种情况。”<sup>②</sup> 限制民主被认为是正常的，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然要求。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改变了苏联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层的构成，这就提出了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加强政权建设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自然是工农大众，但是如何对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农村的中心人物——中农，这个问题俄共并没有解决好。1924 年 1 月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坚持的方针是：“在农民中间，正在重新产生雇农和半雇农阶层，必须大力改善农村支部的成分，指导农村支部展开文化和政治工作，加强它们在合作社和组织农业信贷方面的工作，并且必须全力支持贫农（尤其必须加强乌克兰的贫农委员会）和吸收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177 页。

② [苏联]《旗帜》1990 年第 3 期，第 139 页。

农加入我们党的组织和全俄农林工会。”<sup>①</sup>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怀疑他们是否忠诚,努力用党员去取代他们的工作。1923年,共产党员占托拉斯领导的比重从52%增至61%,占厂长的比重从29%增至49%。<sup>②</sup> 新上任的党员由于不懂经营,盲目提高价格,成了导致1923年秋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列宁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在国内战争时期,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有了很大发展,引起了列宁的不安。从1919年起,列宁就反复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其主要措施就是吸收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监督国家机关。1920年2月,列宁在布拉吉舍—宾福尔托沃区非党代表会议上说:“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让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而这应当由非党工人去做,应当让他们在非党工农代表会议上选出自己的代表去做。要帮助那些负担太重而过于劳累的共产党员。我们应当尽量把工人和农民输送到这种机关中去。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把它做好,把官僚主义赶出我们的机关。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sup>③</sup> 从1918年到1921年,苏俄曾存在非党工农代表会议,由地方党政机关召集,代表从基层选出。这一机构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列宁说:“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56页。

<sup>②</sup> [苏联]《旗帜》1990年第3期,第135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40页。

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sup>①</sup>随着1920年底国内战争的结束和1921年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提出要**加强反对官僚主义,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晚年,他进一步提出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sup>②</sup>并提出了一些设想。

列宁改革设想的核心是有效地划分党政职能,实行干部的选举制和建立有效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应该说,这一设想抓住了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召开前,列宁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sup>③</sup>列宁认为已形成的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党的领导不是体现在代替政府进行日常的管理工作上,而应是提出国家的发展纲领、路线和总政策,以决定政权发展的方向和原则。党和苏维埃国家机关都要进行一系列改革。

列宁提出要建立可靠的机制防止个人专权。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主要思想是制定一项政治改革计划,缓解业已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建立可靠的民主保障,防止“领袖们”的专权;增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提高监察委员的素质、扩大其权限。列宁建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有一定人数的委员出席政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43卷,第337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对各级国家机关的办事制度进行检查和监督，<sup>①</sup>以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通过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提拔普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来防止少数领袖专权；实行集体领导，把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调开。为了防止干部脱离群众，列宁提出要加强监督，如必须使召开党的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使普通党员能够出席；“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并使领导机关和全党之间保持固定的切实的联系，有关的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我党中央全会已有发展成为党的一种最高代表会议的趋势。它现在平均每两个月至多开会一次，至于日常工作，大家知道，则由我们的政治局、我们的组织局、我们的书记处等等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我认为，我们应当走完这条已经走上的道路，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月开会一次，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加”。<sup>②</sup>

关于国家体制的改革，列宁开始探索分权制之路。他提出：在立法方面，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权，国家计委当时是由“内行”、专家、科技界的优秀人物组成的，应该发挥他们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他反对斯大林提出的要求民族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方案，提出“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独立”；他建议改组工农检查院，使之能够真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提出把工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4—385页。

② 同上书，第373—374页。

农检察院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即成立二者的联合机关，统一行使监察职能，以提高工农检察院的威信，把其人数从 1.2 万人减至 300—400 人，这些人应该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其工作人员要通过有关考试选拔，他们应该不顾情面地进行检查。

列宁满怀希望地欲参加定于 1923 年 4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并提出他的改革设想，但是疾病阻止了他。季诺维也夫在受托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曾提出，“两个中央并存”对党的统一有威胁，代表大会应否决这种做法，把“党的全部领导权”保持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在托洛茨基的反对下，这一条被取消了，但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大大削弱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决议指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从各方面保证党的路线能在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中得到贯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能相应地有所扩大，但仍继续承担党章所规定的任务。”<sup>①</sup>遗憾的是，当时俄共（布）不知道列宁有一份给代表大会的信（该信本来是写给党的十二大的，列宁没想到他自己不能出席十二大，但列宁注明的是他死后由克鲁普斯卡娅拆封）。十二大加强了党内的“领导核心”，在会上有不少人对他们实行派别的组织政策和干部政策、压制党内发表意见的自由提出了批评。维·柯秀尔指责“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集团”解除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工作，“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理由加入过某些派别，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 299 页。

参与了反对中央委员会所实行的官方路线的争论”。<sup>①</sup>在大会发言中，克拉辛、奥新斯基等都对存在“领导核心”、党内不允许有批评意见的现象提出了意见。

由于时间所限，列宁的政治改革设想还不够系统，但列宁的设想表明他正根据苏联的实际，探索政治体制改革之路。遗憾的是，列宁的改革设想没有得到列宁的后继者们的重视，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有所强化。这对苏联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 四、列宁时期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影响

列宁时期政治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的内容与形式不够协调。苏俄政治体制建立之初就是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其体制的表现形式是立法权不明确，行政权没有制约。在十月革命前后，社会的普遍要求是召开立宪会议，临时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拖延政策被布尔什维克所利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行动就是要挽救立宪会议。由于立宪会议的代表是在十月革命前几个月选举出来的，反映的并不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状况，因此，立宪会议是与十月革命格格不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会议被解散也是必然的。但是，俄共（布）并没有重新选举新的立宪会议，而是取消了代议机构这种形式，代之以苏维埃。同时，由于苏维埃政权尚处于弱势，苏维埃政府取消了公民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公开的、来自执政党以外的监督力量事实上被取消了。德国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

---

<sup>①</sup>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102页。

1918年所写的《论俄国革命》一书中对此评论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惟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惟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从三个月召开一次推迟到六个月！）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sup>①</sup>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没有成为世界人民向往的榜样。卢森堡的这段具有先见之明的话值得我们认真回味。

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形式，如三权分立、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等等。对此，卢森堡提出了批评。她说：“我们始终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涩内核——不是为了抛弃这个外壳，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叫他们不要满足于外壳，却去夺取政

---

<sup>①</sup> [德国]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权,以使用新的社会内容去充实这一外壳。”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sup>①</sup>“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sup>②</sup>尽管卢森堡对苏俄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她仍对俄国发生的一切表示理解,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面临着世界大战、德国入侵及其他一些可怕的压力。但是,非常情况下的措施不能被永久化,更不能作为范例成为其他共产党学习的榜样。

正因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很好地解决民主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并没有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同步发展,这种状况使苏共领导人能够不顾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抛弃新经济政策。

其次,在领导体制上没有处理好领导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问题。列宁时期党内出现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等常设机构。1922年4月党的十一大后,在书记处设立了总书记职位,斯大林担任了这一职务。但是,在列宁的眼里,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党不能有凌驾于其上的主要领导者,斯大林实际上已超越了书记处总书记职务的规定权限。列宁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没有完成。

列宁对领导干部队伍问题做过思考,但他并未来得及解决这一问题。如1922年夏天,列宁的妹妹在日记中记述到:“伊里奇开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第91—92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始发挥一个思想：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应当有各个年龄段的人——50岁、40岁、30岁、20岁的人。这样青年人就会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此工作。中央委员会就会‘长存’……看来伊里奇对这个思想非常感兴趣……他提出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就是‘选拔’和‘推荐’青年同志。”<sup>①</sup>在领导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领导人的素质便显得十分重要，但列宁没有时间来实行他的设想。

应该看到，列宁时期的政治体制具有的是过渡时期的特点，而且处于不断改革与完善的进程之中，并不是社会主义完全实现阶段的完备的形式。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从被压迫者变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实行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程度的民主，选举不再有财产、种族、性别等等条件的限制，只有阶级条件的限制，劳动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成了国家政权的基础。但是，它在选举形式和方式上并没有探索出恰当的形式。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解决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问题，对权力监督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群众的监督有名无实，党的监督系统的权限也日益缩小。在体制上没有探索出一种防止出现个人专断、个人集权的机制，党对其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无法通过相应的机制给予纠正。人民的民主权利也没有相应的机制落实。本来，苏维埃是人民自己选举产生的政权机关，但在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苏维埃的关系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保证，苏维埃成了党的附属物，人民的民主权利无法得到保证。列宁强调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的管

---

<sup>①</sup> 转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页。

理工作,强调群众对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但是,没有切实的途径予以保障。列宁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加强监督机关的权限与职责,但是并没有解决如果监督机关本身官僚化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人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变得日益脆弱。

## 第十三章 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演变与时代局限性

首先,列宁世界革命思想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带有时代的烙印。当时,所有的参战国都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其次,这一思想也与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估计有关。列宁认为,演变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总危机而不能自拔,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事实证明,必须辩证地看待列宁的这一思想,既要看到它的科学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历史局限性的一面。否则,我们就无法把握住列宁学说的发展脉络,也无法解释列宁晚期的社会主义思想。

### 第一节 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

列宁世界革命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一个是帝国主义论,另一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帝国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出现的历史现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要点有三:

一是认为,帝国主义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二是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结

构下，“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sup>①</sup>而战争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消灭战争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又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大好时机，“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sup>②</sup>“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sup>③</sup>

三是认为，帝国主义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可能和平共处，“资本是不知有祖国的，而且它通过世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证明它把维护各国资本家反对劳动者的联盟放在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放在一切之上”。<sup>④</sup>既然资产阶级是联合的，是一种国际力量，那么无产阶级自然应该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国际帝国主义拥有雄厚的资本，拥有非常先进而成为国际资本真正实力和真正堡垒的军事技术装备，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其所以不能，是由于贸易联系，是由于国际金融关系。在这方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sup>⑤</sup>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已形成世界体系的事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26页。

② 同上书，第327页。

③ 同上书，第330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07页。

⑤ 同上书，第6页。

实,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它可以在一国开始,但不能在一国完成。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曾说:“先于其他任何国家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是英国的使命。”<sup>①</sup> 1870年,恩格斯曾估计,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sup>②</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德国,都不能单独完成革命任务。巴黎公社的失败也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世界革命,实际上指的是西欧革命。西欧各国普遍地域狭小,发展水平相近,各国政府相互勾结,一国的革命自然难以成功。1893年,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末,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sup>③</sup> 次年,他在预测欧洲革命前景时又强调:“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sup>④</sup>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革命思想是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协调行动,并没有武力输出革命的思想。

列宁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他也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开始,但是,它的命运又是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不同的是,列宁把俄国纳入了他的视野。1905年革命时期,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革命可能成为欧洲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90页。

② 同上书,第32卷,第427页。

③ 同上书,第39卷,第87页。

④ 同上书,第246页。

会主义变革的序幕,而“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正像 1849—1850 年的德国革命党或 1871 年的法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一样”。<sup>①</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加紧了对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前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著名论断。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列宁驳斥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关于社会变革是所有国家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的说法,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他指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sup>②</sup> 列宁在 1915 年 9 月还说过:“帝国主义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发生的危机,同西欧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非常紧密,以致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革命任务根本不可能单独解决。”<sup>③</sup>

从列宁的这些论述看,列宁也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只有少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用联合行动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列宁在世界革命思想中加入了输出革命的内容。1915 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社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2 卷,第 142 页。

② 同上书,第 28 卷,第 151 页。

③ 同上书,第 27 卷,第 31—32 页。

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sup>①</sup>这里包含着首先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武力去推进世界革命的思想,列宁的理想是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始终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sup>②</sup>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说:“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sup>③</sup>列宁和俄共领导人都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俄国革命的目标是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sup>④</sup>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帝国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1918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554页。

② 同上书第2版,第29卷,第91页。

③ 同上书,第33卷,第279页。

④ 同上书,第38卷,第46页。

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七大上指出:“在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从西方和东方对苏维埃发动多次军事进攻,这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便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1919年3月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规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sup>②</sup>可见,国际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在精神与道义上的相互声援与支持,而且包括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跨国界去发动革命和用武力输出革命的内容。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七大指出:“代表大会确信,工人革命正在各交战国中不断地成熟,为帝国主义的必然的彻底失败创造条件,因此代表大会声明,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全部人力和物力来支持各国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sup>③</sup>

## 第二节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 两重性外交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俄政府颁布和平法令,提出结束战争,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希望得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承认,但是,它的工作重心却是要激起世界革命。苏俄政府对资本主义政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第520—52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二分册,第40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一分册,第521页。



府并不抱多大希望：“我们的想法，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sup>①</sup>“各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都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sup>②</sup>和平法令主要是宣传性的，旨在向世人表明有两条摆脱战争的出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一条是共产主义的，以此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激起世界革命；同时，苏俄政府也希望为新生制度的继续生存创造和平条件。但是，和平法令号召革命，使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受威胁，加深了它们对苏俄新政权的不信任。苏俄政府开始对与德国及其盟国单独媾和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愿望，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拖延谈判，利用谈判期间的宣传鼓动的机会，目的是进一步激起国际革命运动，以接近世界革命。他们特别寄希望于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都持这一看法。是否割地、赔款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可能按和平法令的愿望行事。1918年1—2月，俄共（布）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签订屈辱的和约还是进行革命战争。

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世界革命思想便被灌输到群众的意识中，使他们相信不久将会发生世界革命。这种思想也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与20世纪初俄国社会心理中的“弥赛亚学说”一拍即合。在与其同事的论战中，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利益应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现在列宁提出，首要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目前惟一的工农苏维埃国家——世界革命的堡垒。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列宁提出了一系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2—13页。

列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看法：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列宁坚持在实践中与资本主义国家联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支持世界革命要与自己的力量相适应、要谨慎地选择帮助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方式。1918年3月3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只是一种策略手段，是世界革命胜利斗争中的退却。但在1918年秋，世界革命纲领又频繁出现在俄共（布）和苏俄政府的文献中。1918年10月1日，列宁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说：“为了援助国际工人革命，春季之前我们应当建立一支拥有300万人的军队。”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掠夺战争期间，“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惟一出路”。<sup>①</sup> 正确的策略、惟一的国际主义的策略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sup>②</sup>

当时人们对世界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1919年3月2日—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满怀信心地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sup>③</sup> 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指导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的国际策略中心。列宁为德国等国家的革命形势所激励，致力于把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点和革命运动的经验推广运用于西欧各国。共产国际正是贯彻列宁这一思想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288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③ 同上书，第506页。

世界秩序,并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sup>①</sup>1919年3月18日—23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季诺维也夫在会上说:“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将作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布进行革命战争。首先在本国夺取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社会主义红军的帮助下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sup>②</sup>大会宣布:“我们绝对坚信,不管我们还会受到多么严重的考验,不管垂死的国际帝国主义野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但这只野兽必将死亡,社会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sup>③</sup>

实际上,十月革命没有在西方得到回应,中东欧一些国家曾发生革命,但是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匈牙利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133天,斯洛伐克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三个星期,巴伐利亚的苏维埃政权存在两个星期,而在芬兰、爱沙尼亚和波兰,以十月革命为榜样进行的革命则被扼杀。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中东欧的革命浪潮也回落了。列宁预言的由俄国革命开始,德国、法国、英国继续完成的世界革命没有实现,原因不只是无产阶级力量不足、革命觉悟不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潜力。1919年8月5日,托洛茨基给中央写信,提出把革命路线转向东方,到印度去发动革命,但没被采纳。

从1919年下半年开始,列宁逐渐放弃了以前的思想,即没有

<sup>①</sup> 《共产国际决议汇编(1919—1932)》,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83年俄文版,第60页。

<sup>②</sup> [苏联]季诺维也夫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03页。

其他国家的革命,俄国革命成果的巩固是不可能的,转而认为,苏俄不仅能存在,还能保卫自己。1919年9月23日,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提到,俄国劳动者希望得到持久和平,并表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也愿意在合理的条件下给予承租权,作为俄国从技术先进的国家取得技术帮助的一种手段。”<sup>①</sup> 列宁提出了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问题,但并没有形成坚定的路线,也不是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能理解的。

在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契切林在报告中提出,苏俄要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专注于国内建设。列宁在同一时期为全俄苏维埃七大所拟的决议草案也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这一工作一直受到阻挠:先是德帝国主义的压迫,后是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重申一贯要求和平的愿望,再次向英、法、美、意、日各协约国建议,与它们全体或单个地立刻开始和平谈判;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和平政策,采取使这一政策获得成功的一切必要措施。”<sup>②</sup> 列宁在1920年4—5月间所写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也指出,在不具备革命形势的地方,就不会有革命,“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sup>③</sup> 但是,这并不表明俄共放弃了世界革命思想。对世界革命的期望与促进,强于对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88页。

② 同上书,第394—395页。

③ 同上书,第39卷,第64页。

得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关注。苏俄也得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信任，双方难于建立正常的关系。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确切表达了红军帮助欧亚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只要苏俄没有成为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一个成员，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就决不罢休。”<sup>①</sup> 进军波兰便是证明。

波兰与苏俄在1919年便在西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存在军事冲突。苏俄建议签订和约，波兰人置之不理，他们想建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大波兰国家，得到了协约国的支持。1920年4月，波兰毕苏斯基政府与彼得留拉和弗兰格尔将军共同行动，向苏俄发动进攻。苏俄红军于1920年6月5日收复乌克兰，并推进到波兰边界。在是否越过边界的问题上，俄共内部存在分歧。6月17日，契切林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政策一如既往是和平的政策……我们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不能把自己的政权建立在枪尖上。”<sup>②</sup> 但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中，这种思想和情绪不起决定作用，为了“苏维埃化”而干涉他国内政的情绪发展起来。苏俄政府本可以接受比较有利的边界线而与波兰签订和约，但是，利用红军的高昂士气和当时的优势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见占了上风。为了激起西欧的革命，苏维埃领导人力图把正义的防卫战争变成积极的阶级进攻战争，他们为对波战争初期的胜利所鼓舞，认为在波兰胜利后是在德国，进而在整个欧洲取得革命胜利。列宁当时也认为：“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

---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5页。

② 《苏联对外政策文献》，第二卷，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299页。

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sup>①</sup>共产国际二大于7月19日向所有国家的工人发出号召,号召他们与苏俄和波兰的工人团结一致,“为了给衰弱的阶级敌人以最后一击,为了与俄罗斯工人一道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努力利用本国剥削者的失败”。<sup>②</sup>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一份命令上写道:“我们用刺刀给劳动人民带去幸福和和平,向着西方前进!”<sup>③</sup>但是,绝大多数波兰人在红军的枪尖上看到的不是阶级解放的象征,而是民族奴役的象征。从8月中旬起,波兰军队进行反攻,红军遭受很大损失。

进军波兰,是俄共(布)用武力输出革命的一次尝试。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承认(列宁的这一讲话直到1992年才第一次公布),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整个政策处于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维埃政权打的是一场防御战,在苏维埃政权打败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一个个得到协约国支持的敌人后,防御帝国主义的战争便告结束,苏俄赢得了战争。“新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防御阶段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军事形势来开始进攻战。当他们进攻我们时,我们打击了他们。现在我们要尝试进攻他们,以帮助波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还将帮助立陶宛和芬兰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应当用刺刀试探一下波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否已经成熟。”<sup>④</sup>列宁等俄共领导人试图用武力推进世界革命。列宁坦率地说:进军波兰,“这不仅是在苏维埃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是全世界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47—348页。

② 《共产国际决议汇编(1919—1932)》,第162页。

③ [苏联]波波夫主编:《档案披露的秘密》,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俄文版,第52页。

④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4期,第4、5页。

的转折。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单枪匹马地面对全世界，惟一的梦想就是抓住他们之间的些许缝隙，这样敌人就不会把我们压倒了。现在我们说：我们现在成长壮大了，你们只要胆敢进攻，我们就会以反攻来回敬，好让你们明白，你们所冒的风险不止是输掉几百万，你们已经在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身上输掉一大笔，你们还要冒这样的风险：你们每出动一次，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扩大一次”。<sup>①</sup>“我们用刺刀对波兰在社会革命方面的准备程度试探得如何呢？我们应当说，这种准备还不够。”“我们遇到的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民族情绪的空前高涨，随着我军向华沙推进，这些人为自己的民族生存而惶惶不可终日。”<sup>②</sup>列宁认为，进军波兰的失败说明我们“肯定犯了错误”，但列宁认为当时采取总的进攻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推进得太远了，“我们要是推进 50 或 100 俄里以后停下来，我们就进入波兰族聚居区，我们就稳操胜券了。如果当时我们停下来，我们现在肯定已经赢得了和平，绝对的胜利的和平，而且仍然保留了荣耀，仍然保留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是战略上犯了错误。”<sup>③</sup>列宁认识到，“当代帝国主义世界是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波兰是这个凡尔赛和约中强有力的一环，我们突破了这一环，也就打破了整个凡尔赛和约。我们当初提出了占领华沙的任务。任务发生了变化。原来，所决定的不是华沙的命运，而是凡尔赛和约的命运。”<sup>④</sup>

1920 年 9 月 22 日—25 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激烈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1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8 页。

论进军波兰的失败原因以及世界革命的前景。对此给予冷静评价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加米涅夫都认为,红军失败是由于主观原因,按他们的看法,1920年夏欧洲已经准备好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加米涅夫说:“我们进行了出击,但没成功……但必须坚信,这次出击唤醒了西欧的这一力量,应该相信我们还会有做下一次出击的时刻,我们勿庸置疑还会去做。是不是签署列宁所建议的和约,反正都一样,出击将来还会有,并将取胜。”<sup>①</sup>列宁也说:“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我们只能对协约国采取守势,但是,尽管第一次完全失利了,遭到了第一次失败,我们仍然会一次又一次地从防御政策转向进攻政策,直至把他们统统击溃。”<sup>②</sup>“不过我们要说,再次冒险的话,我们每跨出一大步都会牢牢记住应该在哪里止步。”<sup>③</sup>1923年2月,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一次课上,图哈切夫斯基专门谈了从外部输入革命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在维斯瓦河取得胜利的话,革命的火焰无疑会燃遍整个欧洲大陆……革命从外部输入是可能的。资本主义的欧洲将动摇到根基,那么,也许波兰战役会是十月革命和西欧革命联系的环节。”<sup>④</sup>1920年底,布哈林竟然发表文章,提出了“红色干预权理论”。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自以为有权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来决定俄国的命运,那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有对别国的

---

①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72年俄文版,第75页。

② [俄罗斯]《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4期,第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年第4期,第29页。

④ 转引自[俄罗斯]《苏联历史》1991年第6期,第20页。



“红色干涉”呢？<sup>①</sup> 1922年11月，布哈林就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发言时说：“我们还应该提到一个策略问题，这就是红色干预权的问题。我认为，这对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个试金石。关于红色军国主义的喊叫甚嚣尘上，我们应当在纲领上确定，每个无产阶级国家都有权进行红色干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应当征服全世界。但是用一个手指是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必须使用刺刀和步枪。因此，扩大每一个红军以之为基础的制度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就是扩大无产阶级政权和革命。在纯技术上能使干预得以实现的特殊情况下，运用红色干预权的道理就在这里。”<sup>②</sup> 可见，苏俄在波兰的失败，并没有使俄共领导人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完全放弃输出革命的想法。

1920年10月12日，苏俄和波兰签署了初步和约；1921年3月18日，双方签订里加和约，此后列宁才逐渐放弃了立即进行世界革命的思想。

### 第三节 现实变化所带来的理论调整

1920年苏波战争结束后局势很明显，世界革命的美好愿望没有得到证实，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回顾三年来俄国革命的历程时说：“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

---

<sup>①</sup> [苏联]布哈林：《论进攻战略》，载《共产国际》1920年第15期。转引自[俄罗斯]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思想》，[俄罗斯]《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第46页。

<sup>②</sup>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1页。

的条件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sup>①</sup> 苏维埃政权在国际方面面临的主要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今后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和平经济建设，把经济搞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革命施加我们的主要影响”。<sup>②</sup> 也就是不再搞武力输出革命。

1921年3月苏波里加条约的签订应该被看作是列宁对外战略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列宁在与蔡特金谈话时说：“你知道吗，同波兰媾和，最初遭到剧烈的反对，像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一模一样。我受到极其猛烈的抨击，因为我赞成接受和约条件，而那些条件，又确是十分有利于波兰而很使我们吃亏的。……我们的局面并不一定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去媾和。我们本来可以挺过冬天。但我认为，从政治观点着眼，同敌人媾和是比较聪明的，据我看来，条件苛刻的和约所带来的一时牺牲，总比继续作战的代价小一些。归根结底，我们同波兰的关系从中只会得到好处。……苏俄如果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它之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保卫自己，为了捍卫革命；证明它是世界上惟一的和平大国；证明它没有夺取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41卷，第335—336页。

任何国家的领土、征服任何民族的任何意图，根本无意于发动帝国主义冒险，——如果做到这一点，对苏俄只有好处。”<sup>①</sup> 苏俄要树立和平的国际形象。

列宁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强大，革命不能输出。苏俄外交政策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苏俄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与俄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方针政策的变化上。在对外政策上，苏俄政府努力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确立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列宁强调尽快与西方国家签订贸易协定，甚至不惜为此做出让步。1920年底，苏俄开始实行租让制，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国资本家来俄国投资办厂。列宁在论证租让制的政治经济意义时说：“租让的存在就是反对战争的经济根据和政治根据。如果那些可能同我们作战的国家接受租让，这就使它们受到约束，不能同我们作战。”<sup>②</sup> “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同样也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sup>③</sup> 列宁原来一直坚持苏维埃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发生冲突，现在他开始认识到两种制度的国家有共同的经济利益，这是它们之间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基础：“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sup>④</sup> “社会主义共和国

① 侯焕阁译：《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第78页。

③ 同上书，第42卷，第328页。

④ 同上书，第332页。

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sup>①</sup>

1921年,英苏签订贸易协定,说明资本主义大国开始承认苏俄政权。很快,俄联邦与德国、意大利也签订了贸易协定。虽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不承认苏俄,可列宁相信目前资本主义不可能进行公开的反苏战争,经济力量胜过敌对情绪。1922年,苏俄派代表团参加热那亚会议,列宁本打算亲任苏俄代表团团长,后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热那亚会议是协约国发起召开的国际经济与财政会议,苏俄政府接受了邀请,并积极进行了准备。列宁说:“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垮台)进行贸易,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最恰当、最有利地商定政治上合适的贸易条件,仅此而已。”<sup>②</sup> 苏俄代表团利用战败国德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德国签订了拉帕洛条约,从而开始了“承认苏联”时期。

列宁指出,和平共处至少在理论上,从苏维埃政府方面讲绝对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九大上,列宁向邻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倡议在和平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当时和平共处的内容主要是:和平关系,相互承认,经济上的互利联系。

列宁开始把搞好本国的经济建设看成是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放弃了对世界革命很快胜利的企盼。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三大前夕,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说:“世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16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3卷,第2页。

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二次浪潮还没有兴起,如果我们对它抱有任何幻想,那是危险的。我们不是用锁链鞭挞大海的薛西斯。”<sup>①</sup> 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的策略方针,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列宁在会上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预言过的国际革命正在向前发展。但是,这种前进运动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直线运动。一眼就可以看出,在缔结和约以后,无论这个和约怎样不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没能爆发起来,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国家里革命的迹象很多很明显,甚至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和明显得多。”<sup>②</sup> 列宁指出:虽然欧洲有可能发生革命,“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也是荒谬和有害的。”“如果代表大会对这些错误,对这些‘左的’愚蠢行为不坚决进攻,那么整个运动必定要垮台。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sup>③</sup> 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要做的是为革命进行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并深入研究它的具体情况。相应地,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着手重新调整与第二国际和第二个半国际的关系。1922年4月,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为了达成协议,俄共作了很大让步,列宁认为让步过多,但他仍表示要遵守协议,要把统一战线策略贯彻到底。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指出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学习新经济政策。

但是,列宁的认识并未成为俄共领导人的共识。在共产国际四大期间,身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在报告

① 侯焕阁译:《回忆列宁》第5卷,第2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13、27页。

中仍然说：“在国际形势中，我们也可以确认，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化。形势客观上依然是革命的。”他仍然强调：“联合起来的第二国际和第二个半国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国际形势无疑是革命的。第二国际依然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没有这个支柱资产阶级就不能维持。因此，我们对第二国际的态度问题不是党的内部策略问题，而是世界革命问题。”他只把统一战线看成是与工人下层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不是别的，正是工人阶级在其日常生活斗争中的指路明灯。统一战线应该回答的是，我们愿意同全体工人一起跟资本家进行斗争”。<sup>①</sup> 1923年秋，列宁病重期间，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斯大林的默许下，积极策动德国革命。结果，白白花掉了实行新经济政策两年来所积蓄的宝贵的黄金储备。<sup>②</sup>

1924年6月，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蔡特金在国际共产党人第三次代表会议上说：“我们不应该隐瞒事实，资本主义比我们想像的更灵活、更有生命力、更强大。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十分遗憾，能够重新巩固，因为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群众拒绝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为推翻地球上自己的、垂死的敌人，无产阶级没有表现出革命的成熟性、革命的力量。”<sup>③</sup> 但是，苏联领导人的认识并未达到这一水平，共产国际五大否认资本主义的稳定，许多人认为1923年秋的阶级战斗并未完结，很快便会出现新的革命浪潮。这与列宁的世界革命思想本身也存在着缺陷

<sup>①</sup> [苏联]季诺维也夫著、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论共产国际》，第266、269、271、273页。

<sup>②</sup> [苏联]波波夫主编：《档案披露的秘密》，第64—65页。

<sup>③</sup>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07，目录1，案卷32，第9页。转引自《俄罗斯》《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第48页。

有关。

虽然列宁在1916年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时,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他在强调资本主义寄生与腐朽这一趋势的同时,也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而。”<sup>①</sup>但整个说来,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估计是不足的,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世界革命理论没有成功也就不奇怪了。如果说在20世纪初的俄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俄国社会需要一场革命,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夜是正确的,那么,列宁把它作为普遍的规律,强调通过世界革命摆脱战争与危机,则不免有失片面,没有看到其他国家摆脱危机的其他可能性。

列宁低估了改良主义对西方无产阶级的渗透和影响。第二国际改良思想的发展决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即工人阶级的分化和中产阶级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的政策调整、工人阶级在合法的斗争中其生活条件与政治地位得到了改善等,而列宁把改良主义的基础只看成是对殖民地的剥削。从1921年到1928年,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数下降了一半,从将近90万人减至45万人,而社会民主党人数则增加了一倍,从大约300万人增至600万人。

列宁过分强调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忽视了其他国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6页。

家无产阶级的民族利益。共产国际不同于前两个国际的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把“国际”的利益绝对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每次会议都重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各国共产主义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不承认资产阶级的主权原则、资产阶级的外交及协定，不承认民族的权利，只承认阶级的权利。把国家只看成是阶级的代表，而没有看到它民族的一面。苏波战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直接冲突。虽然苏俄不承认别国的民族利益，却没有忽视自己的民族利益，如在对中国的外蒙、中长铁路等问题上，表现了苏俄的民族利己主义。1921年，苏俄红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进入中国外蒙追剿白军，之后，便在那里赖着不走，支持革命，建立亲苏政权。苏联在第一次对华声明中为了表现其国家的正义性，争得中国人民的支持，提出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把中东铁路无偿交给中国，待其政权稳固后又否认了这一承诺。

应该看到，列宁也并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这一战略目标，1922年2月，他仍说：“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列宁改变的只是策略，把世界革命的时间推迟了，把实现世界革命的过程延长了。“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什么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sup>①</sup>“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胜利一定属于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91页。



我们。”<sup>①</sup>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仍说：“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请各国无产者注意，无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共产国际的战略一直是用世界革命的办法消除世界资本的枷锁，其最终目的是用世界共产主义制度代替世界资本主义，变化的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世界革命思想与苏联对外政策的和平共处方针是矛盾的，加深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不信任，也使共产国际内部的左派分子不满，他们指责苏联领导人把世界革命置于脑后。苏联希望通过世界革命对抗帝国主义的包围，但是，这一理论实践的结果是使苏联的国际环境变得更加不利。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联盟向所有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开放，不仅包括现有的，还包括将来出现的。苏联的成立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坚强支柱和联合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为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决定性的一步。苏联的国徽图案是：镰刀和铁锤位于下面有阳光照耀、周围有麦穗环绕的地球上，顶端上绘有五角星一枚，象征五大洲联合成一个联盟，伴随这个五星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外交仍然是两重性的外交：一方面是坚持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另一方面是奉行反映新经济政策外交的外交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与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经常发生小冲突。波兰对缔结苏波和约的反应很能说明问题：要充分估计波兰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保持和巩固和平关系的巨大困难……他们有两幅面孔：一个面孔说：我是政府成员，我对第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73页。

三国际一无所知；另一个面孔说：我是第三国际成员，我对政府的义务不感兴趣。<sup>①</sup> 苏联外交的两面性在对德政策上充分表现出来：一方面，因为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苏德间友好与合作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苏联又通过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在德国策动革命。

经过五年多的实践，列宁在俄国这个落后的、曾被他认为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初步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之路，这就是要考虑农民的利益，注意满足农民的需要，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的方法，用他们能够接受并能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方法，即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上，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从彻底消灭改变为监督、限制、支持与利用；在对待小农的问题上，从把它看成异己力量发展到鼓励、支持小农经济的发展，用适合小农经济发展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在对待商业与货币的问题上，列宁从致力于最终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到利用和积极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也包括集体与私人商业）。列宁初步解决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受实践时间的限制，他并没有完全纠正以前的偏颇认识，没有明确建成后的社会主义与商品、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列宁依据苏俄的实践，充实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如发扬党内民主、加强群众监督、创造条件让普通工农参与国家的管理等，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并没有按照经济民主化的要求改变“军事共产主义”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苏维埃民主，都没

<sup>①</sup> [苏联]波波夫主编：《档案披露的秘密》，第70页。

有按照列宁的理想得到发展,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不协调成为新经济政策最终夭折的重要因素;列宁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在形式上有共通之处,没有真正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在处理两种制度的关系上,列宁曾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建立世界革命领导中心。进军波兰失败后,列宁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外交的原则,致力于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建立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列宁不再把世界革命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提出以本国的事业为中心,但是,列宁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世界革命的企盼与支援,仍把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尽管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难免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列宁所指引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是正确的;苏联后来放弃了这条道路,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则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最大的失误,其后果是严重的。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最大特色便是不断发展变化。列宁重视实践,善于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便说过,“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sup>①</sup>“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sup>②</sup>列宁的这一思想方法对于我们理解和运用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十分重要的。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08页。

② 同上书,第42卷,第280页。

### 第三编 斯大林与苏联模式的 形成和凝固

本编着重论述两个问题：一是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关于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论战情况；二是用了较多篇幅评介了斯大林—苏联模式。

与其说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国际共运史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俄国历史的产物更为确切。斯大林建成的苏联模式，概括地说，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以个人迷信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权和个人专断；二是以扩军备战为主导的国家统制经济，即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三是以闭关锁国为特征的僵化体制，并满足于这种极端保守的落后体制，还把这一体制说成是优越于一切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将这一体制模式凝固化和国际化。正是这个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改革的斯大林—苏联模式，成为苏联衰亡的主导原因。

## 第十四章 列宁去世后的理论 论争与模式选择

列宁的溘然辞世，正像他所担心的那样，果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就联共(布)最高决策层而言，出现这种分歧和斗争也并不奇怪。一方面，列宁的去世使得党的最高领袖地位出现暂时的缺位现象；另一方面，列宁的去世也给党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挑战和难题。政治真空需要有人去填补，而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也需要有人去梳理和解决。在现实中，这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历史的传统似乎是，谁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谁就掌握了绝对真理，谁就有权解释一切；反过来，谁有资格解释绝对真理，谁也就是理所当然地成了理论上的合法继承人，他同样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成为政治上的最高主宰者。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时也无力摆脱这一沉重的历史积淀——以后的发展表明，苏共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没有能够摆脱这一历史阴影。在理论的层面上，争论首先在由谁来阐释列宁的学说以及怎样阐释列宁的学说这一问题上表现了出来。随后，各方又就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理论的论争自始至终都是与权力的角逐交织在一起的。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往往被剥夺了发言权，而胜利者则成了真理的的代言人。从列宁去世前后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这场论争，对苏联的发展影响极大。

争论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更深层的东西：什么是社会主义？单独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并非无足轻重的问题是：谁拥有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解释权？在权力的较量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他也因而成了理论论争的胜利者。斯大林成了列宁主义的惟一诠释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成了苏联社会发展的惟一的选择。

### 第一节 列宁主义之争

理论的论争首先在由谁来阐释列宁的学说以及怎样阐释列宁的学说这一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列宁在世的最后几年，基本上完成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认识上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实际上是试图解决十月革命的目标追求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冷酷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的初衷，是要引发一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现实却是，世界革命的形势一闪即逝，短期内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到来，而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的俄国却又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在理想与现实的这一剧烈冲突面前，布尔什维克党应该作何选择？列宁用新经济政策作了回答。但是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列宁的战友到底懂得了多少呢？在列宁去世之后，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去继承列宁的遗志？又该如何去诠释列宁的学说呢？实践表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是集革命理论家与实际领导人于一身的无可争议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眼界、胸襟、气度和远见卓识是其任何一位战友都难望其项背的。从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领导的总体水平来看，如果这个领导集体能够群策群力，能够相互扬长补短的话，

他们或许可以沿着列宁已经开始的探索之路继续走下去。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相反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却日渐公开化、白热化了。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紧接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等46人联名上书中央政治局，对托洛茨基的看法表示赞同。“46人声明”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非常明显地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了指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群起应战，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等人的意见，这样开始了争论。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间，托洛茨基又以《新方针》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使争论进一步扩大，同时也逐渐使他的新形势下的理论观点系统化了。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又出版了《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列宁、列宁学说和十月革命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更加严厉地批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于“什么是列宁主义？”这一问题，托洛茨基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进行历史分析和确定方向的方法，而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大堆决议。列宁主义是这种方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应用。列宁主义正是这种历史特点和这种方法的结合，它制定出大胆和自信的政策，列宁为我们树立了急剧转变政策的光辉榜样，并且不止一次作了理论的阐述和概括。”<sup>①</sup>

托洛茨基是苏共党内较早使用“列宁主义”这一术语并试图从正面意义上予以阐释的领导人之一。但他的阐释却明显地带上了浓厚的托洛茨基色彩。应当承认，托洛茨基对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

---

<sup>①</sup>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53页。

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持赞成态度的,但他对这种转变的认识始终停留在策略论、对策论的水平上,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不过是形势所迫,是无产阶级国家在困难情况下所不得不作的一种让步。他说:“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军事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新经济政策只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对欧洲革命发展寄予厚望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只是适应这种发展速度的一种办法”。<sup>①</sup>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和深化,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后果表现出了越来越深的忧虑和不安,他开始从左的方面对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具体措施提出越来越尖锐的批评。从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述来看,他对列宁主义的诠释是以他对1917年2月至1918年2月的俄国局势的发展及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的认识为基点的。这一基点就是他所概括的“不断革命”理论。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sup>②</sup> 它“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sup>③</sup> 他指出:“现在在我国已有相当广泛影响的商业资本同开始逐渐支配其他手工业者的富农手工业者的结合,可能第二次在俄国造成真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sup>④</sup> 他断

① [苏联]托洛茨基,《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伦敦:多布雷迪出版公司1936年英文版,第266、41-42页。

② [苏联]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伦敦:乔治艾伦和安文出版公司1928年英文版,第35页。

③ 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关于农村工作的反提纲》,[苏联]《真理报》1927年11月5日。

④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8年俄文版,第401页。



言,新经济政策下私人资本的迅速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危险,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sup>①</sup>于是,托洛茨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用法国革命中的“热月”来比喻苏联的现实,批评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蜕化,认为当权派已“越来越上升为苏维埃耐普曼社会的上层”,<sup>②</sup>党的政策在客观上导致了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减慢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削弱,从而为资产阶级分子“根据分期计划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取胜准备了条件。<sup>③</sup>那么,出路何在呢?托洛茨基的看法是,出路就在于:“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以资产阶级共和国作政治王冠,甚至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而是得到农民支持和开辟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工人政府。因此,不断革命的概念与布尔什维克的基本路线是完全一致的。”<sup>④</sup>这就是托洛茨基所理解的列宁主义的实质。在他看来,列宁主义的精髓就是不断革命。他对世界革命的钟情,他的反农民倾向,他对中央多数派的批评和指责,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由他挑起的论争中,托洛茨基对断章取义式地摘取列宁的片言只语的文风是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的。他认为,“列宁主义就是大胆摆脱保守的回顾,不受过去纯粹正统出处和引证的束缚”,“不能把列宁著作割裂成适用于各种情况的语录”,因为“在列宁著作中并不难找出几十处或几百处似乎自相矛盾的段落。但是决不能只看段落之间的形式联系,而应看到每段话与具体现实的真正联系

① 《托洛茨基言论》,第 446 页。

② 转引自[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7 页。

③ 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第 37 页。

④ 《托洛茨基言论》,第 459 页。

……列宁主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sup>①</sup>

托洛茨基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联合反对。在论战中，无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还是斯大林，都把托洛茨基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进行批判。他们论战文章的标题十分醒目，如：加米涅夫的文章《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文章《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等等。加米涅夫历数了从1903年到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分歧与争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远非一种偶然的个人现象，而是“一股历史潮流的典型表现”，“是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为了影响工人阶级的这个或那个阶层而利用的工具，是孟什维主义的奴仆”。<sup>②</sup>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主义是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他曾一度把自己的思想隐藏了起来，“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如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托洛茨基却又“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sup>③</sup> 季诺维也夫指责托洛茨基企图修正甚至直接取消列宁主义的基础，其特点就是利用列宁的名义，根据所谓的“战略”理由来修正列宁主义，正像当年伯恩斯坦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一样。<sup>④</sup>

① 《托洛茨基言论》，第454、455—456页。

② [苏联]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苏联]《真理报》1924年11月26日。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04、309页。

④ [苏联]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真理报》，1924年11月30日。

在这里,托洛茨基的对手们面临着与托洛茨基本人差不多相同的任务,即在批判托洛茨基的同时塑造自己的理论权威形象。这首先就要求他们回答同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列宁主义?当他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时,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所以,对托洛茨基的批判不久便转化成为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的论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上的孪生子。在理论上,加米涅夫是季诺维也夫的紧密追随者。为了反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于1924年底至1925年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系统阐发了他所理解的列宁主义学说。经过整理,他的讲义于1925年9月以《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为书名结集出版。该书以托洛茨基为主要论战对象,同时也涉及到其他人的一些理论观点。

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的讲义及这一时期其他的一些相关论述中,概括了他关于列宁主义的若干定义:

“列宁主义是什么呢?列宁主义是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中帝国主义大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同时他知道,他必须直接在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行动,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工人阶级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态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胜利。”<sup>①</sup>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也就是在垄断基础上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

---

<sup>①</sup> [苏联]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真理报》,1924年11月30日。

论和实践。”<sup>①</sup>“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sup>②</sup>

“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彻底发展。”<sup>③</sup>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和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开端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sup>④</sup>

季诺维也夫还认为,托洛茨基用“不断革命论”来概括列宁主义的精髓是不正确的。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阐述的“不断革命”思想与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有原则区别的,他们赋予了这一名词“下列内容:第一,他们想借助于这一公式描述……同革命的‘下降’路线不同的,被他们不止一次地称之为革命的‘上升’路线的东西;第二,非常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不断革命’这个概念很接近于后来在列宁那里获得明确表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公式”。托洛茨基不认为俄国农民可以成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革命动力,他的“不断革命”是“横向”的“国际革命”,而不是俄国本国革命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立场与正确的革命路线相近似,而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便要么以“左”的空洞的革命词藻批判工人阶

①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④ 同上。

级政党积蓄力量，要么陷入悲观失望的“取消派”的泥潭。<sup>①</sup>

季诺维也夫认为：“农民的作用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即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sup>②</sup>“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贡献是他第一次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从理论上）和解决了（从实践上）关于把‘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战争’结合起来的问题……相互关系问题……”<sup>③</sup>他说：“理解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提出的新观点尤为重要。列宁主义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可能同盟军的作用的观点是列宁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列宁‘发现了’农民是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这无疑是在列宁主义的一部分，但在目前阶段是相当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一部分。”列宁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全面应用于农民问题的首创者，“列宁是从全世界来观察农民问题的。主要的阶级是无产阶级，它以后的第二个阶级就是农民”。<sup>④</sup>

在这场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中，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他把农民占多数的落后的俄国看成是理解列宁主义的基本切入点；其二，他把列宁主义概括为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三，他没有把自新经济政策开始的列宁晚年的重要探索纳入列宁主义的范畴，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一种暂时的“战略退却”，只有新的进攻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其四，他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

① 参见[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103、129—130页。

②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6页。

③ [苏联]《真理报》，1923年12月28日。

④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10、13页。

能够在—个国家里取得巨大的胜利，但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得以解决，并认为这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sup>①</sup>

1924年4月—5月间，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举办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的短期讲座，讲演稿分期在《真理报》上刊载。《论列宁主义基础》通篇贯穿着批判托洛茨基的主线。但是，由于托洛茨基把季诺维也夫视为主要的理论对手，季诺维也夫也只是紧紧抓住托洛茨基不放，这无形中使得斯大林在争论中处于一种得心应手的有利地位；他可以以论战双方的仲裁者的身份出现。斯大林确实这样做了。在演讲中，他集中火力批判了托洛茨基，但也没有忘记批判季诺维也夫的论点。

斯大林提出：“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sup>②</sup>那么，什么是斯大林所理解的列宁主义呢？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and 策略。”“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更进一步发展。”<sup>③</sup>

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它是半孟什维主义的东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

---

①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243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63—64页。

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sup>①</sup>

斯大林同时也否定了季诺维也夫:“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还没有概括全部真理。列宁确实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实际情况中,而且应用得十分巧妙。但是,如果列宁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特殊环境中的应用,那么列宁主义就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纯粹是俄国的而且仅仅是俄国的现象了。可是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即在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达到极点、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准备工人阶级去进行革命的旧时期已经达到尽头而转变为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条件下成长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定义带有片面性。”<sup>②</sup>如果说这时斯大林还用“有些人”来心照不宣地指称季诺维也夫的话,那么,到1926年1月发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时,他已把季诺维也夫当成公开的靶子了:“然而我们党内竟有人认为必须给列宁主义下一个稍稍不同的定义。例如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季诺维也夫所强调的几个字有什么意义呢?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这就是为鲍威尔和考茨基效劳,因为鲍威尔和考茨基否认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93页。

② 同上书,第63、65页。

列宁主义能适用于其他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sup>①</sup>

斯大林认为，季诺维也夫把农民问题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同样是不正确的：“有人以为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以为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关于农民及其作用和比重的问题。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主义中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农民问题，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等问题。”<sup>②</sup> 后来，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进一步强调说，季诺维也夫的论点“完全是从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不正确的定义中得出来的。因此，这个论点也和他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一样，是不正确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末，列宁主义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对于那些非农民的国家，就是不适用的，就是不必要的；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中的主要问题，那末，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这里必须加以选择。”<sup>③</sup>

斯大林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肯定地说，只有他自己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才是正确的，因为，第一，他的定义“正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他的定义“正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第三，他的定义“正确地”指出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确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09页。

③ 同上书，第16—17页。



定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在这场争论中，斯大林对于列宁主义的概括基本上反映了他对列宁主义认识的若干特征：其一，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和普遍适用性，不承认列宁主义的俄国特性；强调列宁主义是各国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是适用的和必要的。其二，强调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三，强调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强调“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主要的后备军是发达的国家的半无产阶级群众和小农群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主要的打击方向是孤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孤立第二国际各党，这些党是和帝国主义妥协这一政策的基本支柱”。<sup>②</sup> 其四，忽略了列宁整体思想中的建设性内涵，没有正确总结甚至根本没有认真总结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布哈林没有正面积极地介入这场争论，但他对列宁主义也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革命破坏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综合，这就是列宁主义。”<sup>③</sup> 1924年2月17日，布哈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作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长篇演说。在演说中，布哈林把从马克思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模仿者”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布哈林强调，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方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3—14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34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法论”方面，“列宁主义是向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复归”；而在“具体思想的总和上，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学说及一系列具体原理”方面，“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比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更宽阔的领域。在这一特定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界限之外的结论”。<sup>①</sup>“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是完全另一个问题，完全另一个角度。”“这是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的理论体系中最新的、最重要的东西”，“显然，在破坏路线的理论建设中已经做了许多，而在建设路线方面，在马克思从前的表述中，支撑点却极少”。<sup>②</sup>

从布哈林的有关论述来看，他把握列宁主义的视角是全新的和独特的。其一，布哈林肯定了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但列宁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复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其二，布哈林认真研究和总结了列宁转向新经济政策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列宁晚年的探索是列宁主义的合理的和更为重要的内核，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破坏性和建设性工作的综合，而……后者是最重要的”。<sup>③</sup>其三，根据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现实，布哈林向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1）关于各种经济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布哈林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开始真正长入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

① 《布哈林选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60—61页。

② 同上书，第63—64页。

③ 同上书，第62页。

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sup>①</sup>他说：“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sup>②</sup>“任何反对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灾难性发动，都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反革命。”<sup>③</sup>布哈林反对再搞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类型问题。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已有的物质基础上，各国革命必有自己的特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特点。俄国要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或者叫“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sup>④</sup>（3）关于农民问题。布哈林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因此，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特别重要”。<sup>⑤</sup>此外，布哈林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所面临的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布哈林的观点，斯大林是不同意的。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就曾含蓄地说：“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18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4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所说4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如果撇开这种把马克思的学说分为革命部分和温和部分的愚蠢庸俗的见解不说，那就必须承认，即使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

---

①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页。

③ 转引自姜长斌主编：《斯大林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4页；上册，第64页。

⑤ 同上书，第25页。

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但这只是一部分真理。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sup>①</sup>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争论时，布哈林对列宁主义的独特理解更是成了斯大林批判的靶子。

## 第二节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争

“一国建或社会主义”问题之争与列宁主义问题之争同源但不同时，相互关联却又彼此独立。说二者同源，是指它们所折射的都是十月革命的目标追求与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冷酷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说二者不同时，是说二者有先有后，并不是同时开始的。两场争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在争论中两个问题又常常互有交叉和牵扯：在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后期，“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已经成为双方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则直接关系到争论双方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把握。

十月革命胜利后，人们曾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但社会主义却无法在一个国家内建成，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然而，随着三年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却出现了两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其一，人们没有想到，到十月革命之后，新的世界革命高潮会逐渐消失，资本主义世界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其二，人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页。

们也没有想到,在没有引发世界革命的连锁反应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竟然能够支持这么久。还在红军刚刚战胜高尔察克,而对邓尼金的战争尚在进行时,列宁就已敏锐地感觉到了新发展态势的端倪。他说,随着战争的结束,国际关系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我们愿意保证”绝不干涉别国内政,“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是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俄苏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全部力量用于进行国内建设”。<sup>①</sup>在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后,列宁在分析新形势时指出,经过残酷而激烈的斗争,“无论是俄苏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终于形成了”,虽然苏维埃国家“没有获得国际胜利”,但它却争得了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sup>②</sup>双方之间出现了某种“均势”。<sup>③</sup>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虽然始终没有抛弃指望世界革命胜利的信念,但显然他已经不再把世界革命看作是惟一依靠,而是开始把眼光主要转到了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点上来。在去世前口授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列宁问道:“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88、200、394页。

② 同上书,第40卷,第22—23页。

③ 同上书,第42卷,第1页。

国人民呢？”<sup>①</sup> 不过，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并没有完全展开；同时，列宁思想中的这一变化也并没有引起当时俄共（布）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足够的注意。

到列宁逝世前后，苏联所面临的新形势已逐步明朗化：在国内，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本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开始提上日程；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之间的长期并存格局也开始稳定下来。于是，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总题目下，一系列紧迫而又必须明确予以回答的问题提到了列宁的继承者们面前：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苏联这样一个极端落后而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家能否依靠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又如何才能顺利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了这一时期联共（布）党内高层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是由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的，而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则是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从他的“不断革命论”出发，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sup>②</sup> 在后来的论战中，托洛茨基又从“不断革命论”出发，发展出了他的“世界分工”论，来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认为，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经济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于落后国家和整个大陆加速发展而日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1页。

<sup>②</sup> 《托洛茨基言论》，第177页。

益确立起来的现实,那种企图把个别国家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中抽出来而孤立地去理解其经济和政治命运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如果我们想离开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遁世归隐’……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而一切靠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话,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发展的速度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地球上毕竟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暂时只存在于新闻记者和决议起草人的幻想之中……”<sup>①</sup>“谁如果只是谈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忽视我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斗争的事实,他就是在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sup>②</sup>批评托洛茨基的人试图用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了五年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之内胜利完成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但托洛茨基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sup>③</sup>托洛茨基还不无挖苦地说:“我们在技术上的极端无知和因循守旧正

① [苏联]《真理报》,1926年12月14日。

②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5—326页。

应了一句流行的俄罗斯老话，即夸耀‘我们无所不能’、‘我们无所不会’。这种自负感在这样一种说教的激励下显得更加神气十足了。这种说教就是：即使没有任何世界革命、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我们也能够在—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硬说，我们不仅可以在—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如果加把劲的话，甚至可以在—个县里建成社会主义。”<sup>①</sup>

在同托洛茨基的最初争论中，“—国社会主义”并没有作为—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直到1924年4—5月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也还认为：“在—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sup>②</sup>斯大林后来说，他的这种说法“是用来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并且这种说法在当时（1924年5月）已经“是足够的”了。<sup>③</sup>

但是，随着同托洛茨基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为了把托洛茨基置于一贯反对列宁的“机会主义者”的行列，斯大林于1924年

---

① 转引自[苏联]尼·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及列宁之后的党内危机》，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1年俄文版，第214—215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95页。

③ 同上书，第8卷，第61页。



12月在为其《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所写的序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在他们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何况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sup>①</sup> 斯大林说,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胜利的革命论的”。<sup>②</sup> 但是,斯大林同时也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sup>③</sup> 在1925年1月的一封信中,斯大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sup>④</sup>

1925年4月,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吸收了斯大林的观点。会议决议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认为用俄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会议同意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提交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5月9日,在向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俄共(布)第十四次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21—322页。

② 同上书,第324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7—18页。

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斯大林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概括：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一般说来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呢？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且是目前还稳定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能不能完全保证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也就是说完全保证免除旧制度在我国复辟的危险呢？为了回答问题，斯大林举出了两种矛盾。他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sup>①</sup> 斯大林用第一种矛盾解释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我们面前有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私有者阶级即农民阶级。他们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去建设。”<sup>②</sup> 紧接着，斯大林又用第二种矛盾解释了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问题：“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者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

<sup>①</sup>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92页。

障,也就是说,才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sup>①</sup>

季诺维也夫加入到了论争的行列。在《列宁主义》中,他用相当大的篇幅谈了他对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季诺维也夫批评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这一理论的“根本错误正是在于对农民这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的同盟者的作用估计不足”。“由于完全不懂得农民的作用,尤其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作用,这就使得托洛茨基同志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推到’国际革命之时。而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之间,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在革命胜利国家里的合作,而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和冲突。”<sup>②</sup>然而,季诺维也夫并没有得出与斯大林一致的结论,相反,他却极具讽刺意味地与托洛茨基殊途同归了。他认为,无论是从国际条件看,还是从国内条件看,苏联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也就是说,季诺维也夫实际上并不认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他说,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第一个是国际条件,第二个是国内性质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这种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战争只有在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及时支援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第二个条件是同农民达成妥协。”“在这里,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代替另一个条件,为了取得完全胜利必须两个条件都具备。”<sup>③</sup>季诺维也夫断言:“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9—100页。

②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261、262—263页。

③ 同上书,第258页。

取得最终胜利,列宁一分钟都没忘记。”<sup>①</sup>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应理解为:1. 消灭阶级,从而,2. 废除一个阶级的专政,在这里就是废除无产阶级专政。”<sup>②</sup>季诺维也夫指出,为了更准确地弄明白1925年的苏联所面临的问题何在,应当区分两种东西:“1. 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障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自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2. 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这种最终胜利是否可能?”他认为,列宁决没有得出结论:“似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最终胜利”。<sup>③</sup>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季诺维也夫举例说,可以说争得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决不能说,八小时工作制就是社会主义;可以说在总统选举中有200万张选票投给共产党人台尔曼是“共产主义的胜利”,但不能说投共产党议员200万张选票就是共产主义。所以说,“无产阶级在这一或那一国家夺得政权,这已是社会主义的最巨大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我们决不想以此说明,甚至像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不但如此。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实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法令,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种场合我们想说的只是完成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步骤。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这一事实本身还不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sup>④</sup>季诺维也夫的结论是:“一个国家

①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243页。

② 同上书,第234页。

③ 同上书,第236、240页。

④ 同上书,第229—230页。

也可以胜利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个国家取得巨大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上解决。至少在几个有决定意义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巩固的和最终的胜利。”<sup>①</sup>

在苏共十四大上，斯大林把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如下概括：“我讲过我国内部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间的矛盾。我讲过，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克服这些矛盾。谁不相信这一点，谁就是取消主义者，谁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并且我们已经在克服这些矛盾。当然，西方的援助来得愈快，情形也就愈好，我们也就更快地克服这些矛盾，以便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如果没有外援，我们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也不会惧怕困难……”<sup>②</sup> 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了副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他说：“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着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sup>③</sup> 布哈林反驳了季诺维也夫“由于我们技术落后，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到底”的论点，认为季诺维也夫根本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国建成社会

①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243—244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9页。

③ [苏联]《真理报》，1925年12月23日。

主义,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实质上是否定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只不过是重复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论调而已。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上引述了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有关论述为自己辩护,指责“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违背了列宁主义,是一种充满“民族狭隘性气味”的“胡说”。<sup>①</sup>但是,大会在通过的决议中号召全党“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克服那种“曲解列宁主义的观点”。<sup>②</sup>这表明,斯大林的观点已经占了上风。在这次大会上,争论双方摆出了两军对垒的格局,但争论并没有深入地展开下去。

更激烈的争论发生在会后。1926年1月,斯大林在他的重要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的和系统的阐述。他承认自己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有关论述存在着缺点,以至于让季诺维也夫抓住了把柄:“缺点就在于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否定的回答。”<sup>③</sup>应当把这两个问题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回答:前一个问题指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则指的是“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的问题。斯大林说,社会主义能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25年12月30日;另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7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页。

<sup>③</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页。

够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sup>①</sup>而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sup>②</sup>至此，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本定型，此后的相关论述再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猛烈抨击了季诺维也夫：“如果现在，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之后将近两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决议（1925年4月）之后，季诺维也夫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上做结论时，竟把斯大林1924年4月所写的小册子里一个很不全面的陈旧的公式拖出来，作为解决这个早已解决了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问题的基础，——那末，季诺维也夫的这种特殊的手法就只是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弄糊涂了。在党已向前进展的时候又把它拉回去，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由中央全会批准以后又避开这项决议，这就是不可救药地陷入了矛盾，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是离开了列宁的道路，就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sup>③</sup>斯大林说：“我肯定地说：季诺维也夫在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4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上离开列宁主义而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的观点上去了。”<sup>①</sup>“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去建设社会主义,明知不可能建设成功而去建设,——请看,季诺维也夫荒唐到了什么地步。”<sup>②</sup>斯大林说,如果没有胜利的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sup>③</sup>

布哈林也积极参与了对季诺维也夫的理论批判。他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省第23次非常代表会议上的长篇报告中,在《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和《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等论文中,都批驳了反对派关于“技术落后,不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进行了正面、系统的理论阐发。布哈林认为,关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在俄国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场争论的继续。从国际机会主义者到党内的一切反对派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俄国资本主义太落后,无产阶级太弱小,无论从自身还是从农村都无法得到帮助,因此也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如果坚持这样做,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即导致党和无产阶级新制度蜕化成官僚制度,实行高压政策和政治恐怖。布哈林说,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所有的反对派都在下述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方面,在评价工农联盟的态度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7—68页。

② 同上书,第66页。

③ 同上书,第64页。



方面,在解决关于力量的配合和关于小小的工人阶级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过来的可能性方面,在解决关于这些力量之间不可避免发生冲突的问题方面,以及在解决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即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可能性问题方面。<sup>①</sup>针对季诺维也夫“由于我们技术落后,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到底”的观点,布哈林重申:“我们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尽管我国在技术上落后,尽管我国有许多农民,尽管技术和经济还极其落后,我们还是能够一步一步地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资本主义列强不用武装干涉来进行阻碍的话,我们就会把社会主义彻底建成”。“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当时我们就根本用不着走进社会主义的街垒了……”<sup>②</sup>布哈林强调:“当我们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一国’就是指的我国。我们不能说,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譬如说,如果我们面前是某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没有我国所具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低限度的物质前提,那么,我们就不能做出我们的结论。就是说,这里指的是我国,以及它的全部特点,它的技术、经济、它的社会阶级对比关系,它的无产阶级,它的农民,还有这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一定对比关系……既然我国革命要求的对比关系,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比关系是一样的,既然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那么,在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决没有这样的时刻,从那一时刻开始,这种建设似乎变得不可能。”<sup>③</sup>季诺维也夫们所以否认在俄国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

①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71、161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4、42、43页。

③ 同上书,第171页。

义,就是因为他们否认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否认列宁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布哈林以列宁的《论合作制》中的基本思想为依据,认为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农民:“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它将在一个农民国家内建设起来,因此,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我们这里就特别重要。”<sup>①</sup>他重申了列宁关于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在俄国的落后经济中存在着一个小岛,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开端。其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存着‘无产阶级同农民战争’的特殊结合。马克思曾认为这种结合是无产阶级胜利的最有利的条件。”<sup>②</sup>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从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的配合出发,那么,尽管我国落后,尽管存在由这种落后所决定的巨大困难,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够的一切,我们能够建设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sup>③</sup>

在争论中,布哈林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俄国的落后性对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影响:俄国的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拥有大量封建残余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它是一种在外国资本的影响下往往一下子就以高级形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在极其矛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我们有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高加索或土耳其斯坦等的某些地方还有许多宗法生活的残余,还有几乎是封建社会以前的形式的残余。与此同时,却可以看到许多第一流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给它留下的遗产中发展起来的,俄国的社会主义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161页。

③ 同上书,第166页。

所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基础。这个基础就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自己不同于譬如在美国或者法国或者德国的条件下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的特点。布哈林说：“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记住，我国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它还没有达到充分繁荣昌盛以前，在某种程度上将具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在其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就是说，是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的社会主义，这些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它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类型决定的。”<sup>①</sup>然而，与反对派不同的是，布哈林确定无疑地说，尽管这种社会主义是非常落后的，但“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因为它的发展将沿着完全确定的道路进行……”。<sup>②</sup>

1926年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合流。反对派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同年底相继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达到了最高潮。

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说，不能把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与仅仅对国内资产阶级的胜利混为一谈。在俄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全部的关键在于不能撇开国际事务。“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然后就是国家消亡。而斯大林同志却说，我们只要战胜国内的资产阶级，就能保证在我国建成这种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不能设想，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我们就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经济与文化资源，使无产阶级和农民融合在统一的社会主义计

<sup>①</sup>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4页。

<sup>②</sup> 同上。

划经济之中？”<sup>①</sup>托洛茨基断言：“没有任何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不。这里较多的希望完全在欧洲无产阶级方面。”<sup>②</sup>他反问斯大林和布哈林说：“为什么需要在理论上承认在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呢？”<sup>③</sup>托洛茨基抓住布哈林在《论我国革命的性质以及在苏联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中反驳季诺维也夫时所说的“争论的是，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是否能够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这句话<sup>④</sup>挖苦道：“请听，如果我们‘撇开国际事务’，我们能不能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撇开’，就能够。但撇开是办不到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此。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无论天气还是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托洛茨基问道：“我国革命从什么时候起和国际条件无关而具有独立的性质呢？我肯定说，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即第一，如果没有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第二，如果没有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革命。”可是“现在有人却对我们说：‘撇开’国际环境，在我们家里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态度”。<sup>⑤</sup>季诺维也夫支持托洛茨基，指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过，在一个国家是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变革的，而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

① 《托洛茨基言论》，第 705 页。

②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9 页。

③ 同上书，第 158 页。

④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168 页。

⑤ 《托洛茨基言论》，第 687 页。

理论就是修正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这是巨大的和轻率的错误。他说:“如果问我们,我们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说,是的,我们能建成!如果问我们,我们怎样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说,我们在同其他国家工人的联盟中建成社会主义,在同世界革命联盟中,当然也在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农民和同殖民地人民联盟中建成社会主义。”<sup>①</sup>像托洛茨基一样,季诺维也夫对布哈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果‘撇开’生理学规律,那就可以说,我们和布哈林同志还可以活两百年,并且会一天比一天变得年轻,变得聪明起来。”<sup>②</sup>加米涅夫也问道:“承认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一最起码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这些话难道不对吗?”他坚持认为,没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sup>③</sup>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夕,斯米尔加在共产主义科学院演讲时指责布哈林“完全当了恢复思想的俘虏,他认为我国经济上的落后状态不能成为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障碍是已被证实了的事情……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然而请问,恢复时期是否提供根据来审查和修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一条中心原理——在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呢?”<sup>④</sup>拉狄克则在讲话中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戏称为试图“在一个县里”甚至是“在一条街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sup>⑤</sup>

①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09页。

② 同上书,第168页。

③ 同上书,第109页。

④ 转引自《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6页。

⑤ 同上书,第247页。

斯大林在谈到与反对派的争论时说：“使党和反对派联盟发生分歧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否可能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是我国革命的性质如何和前途如何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即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这个总问题”中“包括三个问题”，即“（一）我国暂时还是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胜利，世界革命的速度已经缓慢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否可能。（二）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那末可以不可以把它称为完全的胜利，最后的胜利。（三）如果这种胜利不能称为最后的胜利，那末要使这种胜利成为最后的胜利，需要哪些条件”。<sup>①</sup> 斯大林说：“假如这（按：指在全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说，虽然我国在技术上落后，但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因为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能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建设社会主义，并终于把它建成，那末党就应该继续掌握政权，领导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以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或者是我们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那末，鉴于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国家革命胜利的支援，我们就应当老实地和公开地放弃政权，而采取在苏联组织未来的新革命的方针。党能不能欺骗自己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党是要被肢解的。正因为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17—218页。

位。”<sup>①</sup>斯大林认为,反对派否认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的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sup>②</sup>针对反对派的攻击,布哈林说:“斯大林同志关于在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表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或者说,用自己本身的力量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我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关于我国革命性质问题。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表述。总之,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是完全正确的。”<sup>③</sup>布哈林认为,在讨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时,应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关于内部资源和内部力量的结合问题;第二,关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和战争的问题;第三,关于世界经济压力的问题。他说,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第一,苏联的内部力量结合和内部资源足够建或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防止武装干涉和战争的保障只能是胜利的国际革命;第三,世界经济的压力是巨大的,但不是不可克服的。<sup>④</sup>布哈林得出结论说:“我们这里争论的是,我们的内部力量是否允许我们有充分信心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肯定说,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在前进,以后我们还要不顾关于热月的预言,逆着这一预言,对着这一预言前进并取得胜利。”<sup>⑤</sup>在争论中,他也对对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称托洛茨基“力图用劣等胶水给自己的思想库贴上列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10卷,第293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78—179页。

④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81页。

⑤ 同上书,第192、193页。

宁的标签”，称加米涅夫“在你们的空话下面半俄寸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耳朵，并且还冒出一俄寸”，称季诺维也夫总是在翻“破烂不堪的报纸，用这些报纸已经可以熬汤了”。<sup>①</sup> 布哈林对反对派的驳斥受到斯大林的盛赞。

在1927年11月的中央联席会议和12月的联共(布)十五大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也随着反对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首先是由斯大林提出来的，其矛头所指是托洛茨基。争论本身是一场重大的理论论争，但理论论争背后所隐藏着的却是激烈的权力争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的加入使得这一争论更加复杂化了。争论各方都试图利用一切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今天反过头来看，这场争论并没有能以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说理方式正常展开。争论过程中，各方都不乏犀利、睿智的惊人之语，但正面的、鞭辟入理的交锋却嫌不足。结果，争来争去，总让人有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就托洛茨基而言，他的不断革命论确实继续坚持了世界革命的思想，认为单独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托洛茨基仍然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且仍然认为苏联要坚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说：“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国家(虽然有官僚主义病态)，即还需要不顾某些错误的官僚主义的主张而大大接近工人阶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果我们不认为我国有足够的资源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我们不确信我们能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胜利，那我们显然就不能留在共产党的队

<sup>①</sup>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81、184、190页。



伍中。”<sup>①</sup>所以当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说他对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实际上是要让党放弃政权而转到在野党的地位时,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的指责完全是虚伪之词:“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掌握了政权,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以此向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伟大的范例,我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巩固我们的国家,——这一切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难道这是有争论的吗?但正因为我们是世界无产阶级,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用自己的建设来参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发展,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有什么特别的保证说我们将不依赖世界革命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却还在说,如果我们要求(向谁要求?)这种保证而不可得,我们就该辞职,把问题归结为内阁危机,并退居为苏维埃国家的在野党。难道问题的这种提法不是虚伪透顶的吗?斯大林本人的想法未必和他的报告中所说的一样。否则的话,一早就应该辞职了。”<sup>②</sup>季诺维也夫在其《列宁主义》一书中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批判,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却又同斯大林展开了论战。不管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有多大的分歧,但两人在两个基本的出发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其一,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是经典的、传统的,也就是说,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是消灭阶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仅消灭了剥削阶级,而且也消灭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他们是在理想的层面上诠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论断的涵义的。其二,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季诺维也夫,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总体评价

① 《托洛茨基言论》,第 691 页。

② 同上书,第 706—707 页。

都是否定的，他们没有能够抓住列宁晚年思想的精髓，没有充分估计到列宁晚年赋予新经济政策的深远的战略意义，而是明显地过分夸大了所谓富农危险和城乡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他们更多地把新经济政策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无可奈何的战略性的退却。季诺维也夫说过：“现在经济的重大高涨已经开始，我们正开始攀登越来越多的‘高峰’。这里不允许有幻想，在这里丧失头脑，开始用玫瑰色去看待一切，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下暂且还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看作是社会主义，看不到实际上阶级斗争还极为紧张，等等，等等，这是最危险的。”<sup>①</sup> 这典型地代表了季诺维也夫等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正是这两个相同的出发点最终导致了季诺维也夫在后来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中而同原先的对手托洛茨基结盟。同托洛茨基一样，季诺维也夫虽然否定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他也并不否定苏联正在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如果要问我们是否应当，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回答说：当然应当、能够、善于、一定。我们现在就要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什么也不等待，要不住手地工作。我们肯定能够‘保持住我们的革命’和‘为它保存哪怕几个社会主义的堡垒’，并且甚至是强有力的。我们现在有可能并且应当利用这种可能在一个国家尽最大的力量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首先是用在暂时还是‘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sup>②</sup> 加米涅夫曾更明确地表示，“在我们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前途、世界历史现阶段的性质以及

<sup>①</sup> [苏联]格·季诺维也夫著、郑异凡译：《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第27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3页。

在苏联确定共产党的总任务的问题上”，反对派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并没有重大的分歧。<sup>①</sup> 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与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他们都承认，没有世界革命，就不可能得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世界革命，才能使一国免除外部武装干涉的危险，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sup>②</sup> 布哈林也明确表示：“我国在任何可能出现的形势下，例如，在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保障，对此进行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显然，防止外来危险的惟一保障是国际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争论。争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观点体系同反对派所持的观点体系之间的分界线不在此。”<sup>③</sup> “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虚无的空间中生活，而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中。它们可不可能以武力战胜我们呢？我们回答说：‘可能’。因此，我们能不能实际上放弃国际革命的方针呢？不，不能。国际革命是使我们不致被资本主义列强扼杀的惟一保障。”<sup>④</sup>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没有放弃过根深蒂固的世界革命观点，都没有放弃过推进世界革命的努力。

在这场争论中，反对派较之斯大林和布哈林处于劣势的一个重因素就在于，他们的理论本身把他们放到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尴尬境地：在欧洲革命已经明显处于低潮的情势下，明知道

①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00、117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40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168页。

④ 同上书，第42—43页。

苏联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去建设?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在谈到这一点时一步一步地把反对派逼到了死角:“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没有前途,没有既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能把它建设成功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建设。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党就不能领导建设。我们不能按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方式来生活。……其次,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谁还愿意去建设呢?所以,没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问地会削弱无产阶级从事这种建设的意志。再其次,削弱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强……谁低估了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决定意义,谁就是帮助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谁就是培植投降主义。最后,削弱无产阶级战胜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谁企图缩小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谁就是企图打消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胜利的希望;而谁打消这些希望,谁就是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sup>①</sup>布哈林则用一句话概括说:反对派“已在不相信俄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为一种完全的取消主义”。<sup>②</sup>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反对派处处被动,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48—249页。

<sup>②</sup> 1926年7月28日在列宁格勒党组织会议上的报告,载[苏联]《真理报》,1926年8月3日。

拚命为自己的理论进行辩解，无形中已把论战的主动权让给了对手。与反对派相反，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苏联单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当时的情势下更容易抓住广大党员与普通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心：因为第一，对于一个党来说，只有当它有明确的目标的时候，它才能把广大党员凝聚在一起并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当它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时候，它才能坚定不移地、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地去奋斗，去建设，去献身。第二，对于俄罗斯民族这样一个极具自豪感的民族而言，当有人告诉它，它可以不依靠外部的力量而单单自己就足以达到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时，无疑地，它会更乐于接受这样的一套理论。第三，在一个革命浪漫主义情绪盛行的年代，当对社会主义充满着憧憬的人们从一个理论中得知建成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讲不过是一种指日可待的事情的时候，无疑地，他们从心理上也更容易认同这样一种理论。

在这场争论中，斯大林与布哈林是坚定的同盟者。斯大林的论证说服力较差，但却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很容易为党内外普通群众所接受；而布哈林的理论则相对厚重缜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投向反对派的重磅炸弹。布哈林是列宁晚年思想的忠实捍卫者和积极宣传者；斯大林对列宁晚年思想的整体把握程度远逊于布哈林，但他也敏锐地抓住了列宁晚年探索中的若干思想脉络。所以，当斯大林明确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时，斯大林与布哈林便成了可靠的盟友。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斯大林与布哈林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痕：第一，布哈林捍卫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其立足点是捍卫新经济政策，希望把新经济政策进行到底，主张把列宁主义“从‘摧毁性的’（‘破坏的’）学说变成为‘建设性的’”

(‘建设的’)学说”。<sup>①</sup>而斯大林在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不久,就已明确宣布:“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sup>②</sup>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终止新经济政策的信号。第二,布哈林赞成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但他们两人的社会主义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布哈林认为,在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然后再逐步发展到“充分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而在斯大林那里却没有这种分阶段的社会主义概念。这些裂痕埋下了斯大林与布哈林日后发生公开分歧并最终走向决裂的种子。

### 第三节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方案及其评价

关于列宁主义的争论,其实质是由谁来诠释列宁学说以及如何来诠释列宁学说的问题,其背后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则是怎样诠释社会主义的真髓,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围绕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的实质则是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依靠自身的力量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分歧的由来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涵义的不同理解——要建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与上述争论交织在一起的另一个重大分歧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就是说: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后一个问题,在最初的争论中就已经若隐若现了,布哈林、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反对派之间的分歧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06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0页。

本身就包含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论争。等到20年代末斯大林与布哈林决裂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完全凸显出来，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托洛茨基的实质回答是：“等待”世界革命，促成世界革命。在托洛茨基看来，如果没有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苏联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好像建造无数层的高楼大厦一样，尽管可以一层一层地建造下去，但不知何时才能盖上屋顶，也就是说，不知何时才能竣工。所以严格来讲，只有在世界革命完成之后，才可以认真地谈论建设新世界的道路和方法问题。这是托洛茨基及季诺维也夫等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要害之所在，也是他们同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但是，公正地说，托洛茨基等人并不反对世界革命发生之前在苏联搞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可以说，他们对于在苏联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仍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思路。

从不断革命的立场出发，强调限制和消灭私有经济，从根本上否定新经济政策所确定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的理论和政策基础。公正地说，对于以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托洛茨基是赞成和支持的。即使在同斯大林和布哈林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也没有否定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一条必要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探索逐步深化之后，当新经济政策已明显地由一种策略手段发展为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的时候，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继续前进。他们始终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新经济政策的消极后果；他们把新经济政策时期成长起来的较富裕的农民等同于富农，提出要在农村

展开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进行所谓的“第三次革命”。1926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在向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递交的《十三人声明》中认为,“2500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他们认为,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被财力雄厚的中农所掌握,而联共(布)中央“在农业政策问题上转而依靠农村中的上层阶层的危险愈来愈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与中农联盟的方针日益被歪曲成了与富裕中农的联盟,而后者往往无非就是富农……与此同时,对富农也过分宽容”。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在贫农与中农联盟的幌子下贫农实际上在政治上依附中农并通过中农依附富农的现象”,要求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对富农加税,以“限制高利贷者对贫农的奴役”。<sup>①</sup>在党的十五大上,他们又指责“党没有看清富农和耐普曼日益增加的积累,贫农日益离开我们所带来的那些困难”。<sup>②</sup>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成分和国营工业成分积累的资金的调配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要求国家在税收上对私人资本实行压制政策。<sup>③</sup>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认为,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将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去,为防止这种危险,应该与私人资本进行斗争,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人资本,实行计划经济。托洛茨基断言:“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

① 《托洛茨基言论》,第722页。

②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19页。

③ 同上书,第121页。



全掌握政权还是与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sup>①</sup>

实施“工业专政”和超高速实现工业化,是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托洛茨基等人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的“工业专政”。早在1923年秋“销售危机”发生后,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就提出了限制私人资本、实行“工业专政”、加强经济的计划性等要求。在联共(布)中央提出工业化方针之后,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又提出了“超工业化”的要求,他们把高速发展工业同战胜资本主义相联系,反复强调工业落后的危险性,要求坚决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保障工业化的高速度。<sup>②</sup>他们认为,只有当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为了得到这个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目标。只有在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的情况下,才能使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使农民得到廉价的工业品。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之所以总是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归根结底还是工业化实行得不够,从而浪费了时间,因此,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在农业本身,而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业化,在超过现在所做的一切基础上加强工业化。<sup>③</sup>那么,如何解决超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呢?托洛茨基等人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能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具体地说,就是:国家财政投资大力支持工业;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对

① 《托洛茨基言论》,第870页。

②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第129、130、286页。

③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80—281页。

农民课以高额赋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最典型地代表了托洛茨基一派在该问题上的观点：“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依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就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种形式的物质遗产愈大，这个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愈要减少自己的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即减少对后者的剥削，那么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自己的工业和自己的农业的剩余产品。”<sup>①</sup> 由此，他提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掌得更少的东西，而是……掌得更多。”<sup>②</sup>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反对通过正常的市场关系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而是主张用超经济的强制的行政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如利用国家的垄断地位提高工业品价格以及铁路运价等。他说：“通过相应的价格政策进行积累，

<sup>①</sup> 转引自《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17—218页。

<sup>②</sup> [苏联]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纪涛、蔡恺民译，《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6页。

比起向小生产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其他形式更优越,最主要的优越性是征收非常方便,不需要在专门的税收机关上花一个戈比。”此外,他还提出通过国家银行的垄断地位向农民发放高利贷和发行纸币的办法:“当国家既是管理全国的机构,又是极其庞大的经济综合体的主人的时候,发行纸币是社会主义积累的直接渠道。”<sup>①</sup> 概而言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第一,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其社会主义积累是靠剥削非社会主义经济、其中主要是小生产来进行的;第二,这些小生产者或农民无非是无产阶级工业的“殖民地”。<sup>②</sup> 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方面以保证工业高速度发展”,“用剥削小农的办法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sup>③</sup> 略有不同的是,托洛茨基主张用对富农课以重税的办法作为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他说:“资金的基本源泉就是正确利用预算、信贷和价格的办法再分配国民收入”,“工业化——社会主义的基础——发展太慢,这是打击农民……加速工业化,尤其通过对富农征收更高的税额,将提供大量降低零售价格的商品,这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大多数农民”。<sup>④</sup> 但是,在托洛茨基那里,相当一部分中农是被当做富农看待的,所以,他的主张归根结底仍然不过是要以剥夺农民、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来发展工业。在这一点上,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相通的。

---

① [苏联]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纪涛、蔡恺民译,《新经济学》,第47、78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18页。

③ [苏联]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著,纪涛、蔡恺民译,《新经济学》,第2页。

④ 《托洛茨基言论》,第898页。

如果说托洛茨基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灰暗色调的话,那么,不难看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托洛茨基道路又明显地带有冒险主义的激进色彩。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加速工业化战略,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当初所提出的、受到列宁批判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翻版,只不过在新的形势下作了些许涂抹而已。列宁在其临终前《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表现出的担心<sup>①</sup>显然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不断革命论出发到所谓“第三次革命”论,从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夕提出所谓的“把螺丝拧紧”、“整刷工会”的劳动军事化主张到超工业化理论的提出,无一不反映出托洛茨基思想中的军事化、行政化思维的强大惯性。这一思维惯性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它习惯于简单明快,习惯于大刀阔斧、势如破竹、雷厉风行,而对于“枯燥乏味”的建设任务却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总是希望打几个冲锋、搞几次运动就能解决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广泛地存在于从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刚刚转入建设年代的一大批人的头脑中,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理论不过是这种思维惯性的一种极端形态罢了。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对于建设事业是有害的,它往往不能对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当前的现实做出客观的分析;它往往急于跨越当前的状态而进到理想的社会中去;它往往借用一种极为简单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粗暴的手段去处理所面临的复杂的建设问题。欲速则不达。当革命的思维惯性遇到繁杂的建设课题的时候,常常会遭遇挫折,而当这种革命的思维惯性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惯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更会产生毁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灭性的后果。这里指的是：对待像在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复杂的建设课题时，必须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必要的革新，并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做出适时的改变。在革命时期基本结束、建设时期已经来临的关键的转折点，列宁曾经这样提醒他的战友们：“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惟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适用革命的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以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sup>①</sup>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及时指出，必须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更加艰苦的社会建设，而不可能再用高举红旗前进的方式、用高喊“乌拉”的方式达到目的了。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某种改变。从整体上说，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没有完成这一思想的转变和观念的更新，因此，在心理上难以适应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进攻向和平渐进的经济建设的转轨。在大转折的年代，托洛茨基等人是时代的落伍者。托洛茨基方案不是苏联社会发展的最佳选择。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即便不像布哈林所批判的那样即刻给苏联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但是，正像后来斯大林的准托洛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12页。

茨基方案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它也会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托洛茨基方案遭到了斯大林与布哈林等人的猛烈抨击。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的方案实际上是“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并走上使工业脱离农业的道路。它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可借以发展的基地”,<sup>①</sup>因此,托洛茨基方案实质上是“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从而摧毁真正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sup>②</sup>这一方案最终便“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sup>③</sup>布哈林则更多地从保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托洛茨基方案的要害:“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社会主义积累方法:反对派的方法和正统派的方法。……这两种‘方法’表明了两种政治路线。可以说:(1)一般说来,反对派的目标是获得单位商品的高额利润;相反地,中央的目标是获得单位产品的最低利润,这样,总的来说,在市场扩大的条件下就能提供大量的利润。(2)也可以这样说:反对派指望卡特尔的超额利润,而中央关心的是低廉的价格和农民市场容量的扩大。(3)同样还可以换另一种说法,即:可以说,反对派的政策是把重心转到垄断国家的支援上,而不去组织各种经济因素,不去进行技术改良和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但是中央的立场首先正是从此着眼的。(4)在拨款方面,反对派的重心放在国家补贴上,中央的重心在于向银行贷款过渡。(5)反对派指望有可能在高价的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55页。

② 同上书,第198页。

③ 同上书,第256页。

基础上立即获得一笔用于工业的巨款；中央指望组织经济因素，加速周转，提高资本的利用效率。……人们常常认为，反对派主张高额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高速度，而中央主张最低的利润和社会主义积累的低速度。……这些说法是庸俗的，因为它们没有表现出事物的本质，而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并且只看到直接在鼻子底下的东西。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最低的利润，而是主张单位商品的最低利润。中央不是笼统地主张积累的低速度，而是主张不脱离农民经济，归根到底是要获得比较高的，最高的积累速度。”布哈林接着说，如果采取托洛茨基方案，“那么，在我们的经济行动的最初阶段，无论我们拿多少，归根到底我们会受到损失，因为积累的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减慢”。相反，如果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走下去，那么，可能开始走得慢些，但“随后可以赶上、超过”托洛茨基方案所要求的积累速度，“并把它远远抛在后面。但是为了看到这一点，应当看看比自己的鼻子更远的地方，须知这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sup>①</sup>

#### 第四节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方案及其评价

布哈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源于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反思：“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我们幻想的破灭”，“是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制度破灭了，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破灭了，也就是我们党内曾经有过的幻想破灭了”。<sup>②</sup> 布哈林在这里所

<sup>①</sup>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28—33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07、108页。

说的“破灭了”的“幻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战时共产主义在我们想来并不是‘战时的’，也就是并不只适合于内战的某个发展阶段，而是万能的、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正常’形式。”<sup>①</sup>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战争的需要，而是在于“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sup>②</sup>

转入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开始认真分析俄国的国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落后型社会主义”理论。<sup>③</sup>布哈林明确指出：“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从空地上开始的；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开始的，而工人阶级所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给它留下的遗产……十分明显，这种遗产在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各不相同的。”“可怕的、半农奴制的野蛮状态和可怕的经济落后，同西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先进的形式的这种结合，就构成俄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构成它的所谓的‘民族面貌’。”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落后的形式，对此我们丝毫也不应当难为情。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可以满怀信心；我们现在具备种种可能性以便不断地向前迈进，以便使这些形式臻于完善，以便消灭我们的落后，以便更加迅速地过渡到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类型”。<sup>④</sup>“落后型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是发展速度缓慢，过渡时期较长，必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109页。

② 同上书，第360页。

③ 参见本章第二节的有关部分。

④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75、474—475、475—476页。



须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农民问题,想尽一切办法把分散的和落后的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把他们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在这里,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是没有用处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布哈林认识到,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会面临许多复杂、新颖、独特和困难的建设任务,企图沿袭过去的战争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企图“仅仅通过法令、通过纯粹的暴力措施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严格地说,是真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过程”,<sup>①</sup>“向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通过进化的道路而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道路”。<sup>②</sup>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布哈林提出了他的关于“乌龟速度”的名言:“我们不会由于国内的阶级差距和我们的技术落后而灭亡,甚至在低下的技术基础上我们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sup>③</sup>

布哈林进一步发挥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更加突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据我看来,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最重要的标准。”<sup>④</sup>有了市场关系,就可以把过渡时期存在着的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它们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布哈林明确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繁荣的可能性,而只有在这个基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63 页。

②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 233 页。

③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 229 页。

④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 392 页。

基础上才能得到经济的增长。”<sup>①</sup> 布哈林认为,在市场机制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当通过“进化”和“改良”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承认,“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是,他接着说,“过渡时期的社会同时是某种统一体,虽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sup>②</sup>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和在过渡时期实行的路线是不一样的,他对于“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理论在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布哈林说:“如果我们过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的想法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我们立即消灭市场,从而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立即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在这里我们是错了,不是立即,而是通过排挤、战胜和改造一系列过渡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货币、交易所、银行等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那么,“用什么办法排挤直接的敌人私人资本家呢?用竞争,用经济斗争……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sup>③</sup> 布哈林强调:“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只有在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合作社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才能战胜它……在这里也有镇压,但这不是重点。在这里也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胜利时)在排挤和消灭的基础上将会战胜阶级敌人及其代表的经济形式。归根结底,我们要撵走‘耐普曼’。”<sup>④</sup> “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的被排挤,随着国家—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357 页。

② 同上书,中册,第 275 页。

③ 同上书,上册,第 360 页。

④ 同上书,第 296 页。

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即接近计划经济,那时,一切都属于劳动人民,那时,全部生产都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sup>①</sup>

在苏俄这样一个落后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如何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布哈林认为,要吸引农民,首要的任务是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打消农民不敢冒富和不愿冒富的心理,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为了鼓励农民富裕起来,首先要扫除当时流行的左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哈林提出了他那个给他带来极大麻烦的“发财吧”的著名口号:“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sup>②</sup>与那种从农民的富裕中看到的只是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不同,布哈林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从农民经济的积累中,我们将得到什么呢?农业积累就意味着对我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需求能引起我国工业的巨大发展,而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能使我国工业对农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sup>③</sup>那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呢?布哈林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列宁的合作社思想,认为合作社道路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他写道:“列宁在具体说明应当在什么样的组织基础上使日益增长的工业和小的以及最小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时,阐述了自己的‘合作社计划’,即通过‘合作社的流转’实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36页。

② 同上书,第368页。

③ 同上书,第368—369页。

行结合的计划……因为这是‘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向‘新制度’过渡。那时候居民根据个人的利益通过合作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sup>①</sup>布哈林强调，列宁“遗嘱中的重要之点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sup>②</sup>由于旧习惯、旧经济方式在农民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想急剧打破这些习惯是不可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从自己的私有经济即单个的小农户的利益出发，必然会走上自身联合的道路，从而越来越和陆地同无产阶级的国营工业结合起来”。<sup>③</sup>正是基于对农民自身特性的分析，布哈林坚决反对在农村进行所谓“第三次革命”。他认为，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正确而积极的引导下，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可以通过合作制的形式长入社会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苏联主要是富农经济——也可以通过合作制的特殊形式长入社会主义。私有经济长入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无产阶级牢牢地把握国家政权，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这个前提下，“农民合作社必然长入无产阶级经济机关的体系中去，正如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条件下它长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一样”。<sup>④</sup>

苏联面临的另一个紧迫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本身又需要首先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来源以及如何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两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相当大的部分要取自农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如何取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49—350页。

②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244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14页。

④ 同上书，第419页。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把农村看做殖民地，要求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最大限度地从农业抽调资金到工业中去，以牺牲农业的办法发展工业。布哈林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从长远来看，其结果必然是“需求缩减，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行缓慢，工业凋蔽等等”，最后“完全会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和破产”。<sup>①</sup>所以，从根本上说，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办法掠夺农民的政策“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一种行会的、狭隘的、笨拙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就是说，简直是愚蠢的政策”。<sup>②</sup>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能把农村视为殖民地，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工业赖以发展的市场：“我们的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农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愈大，则我们的工业就发展得愈快。我们的农民经济中的积累进行得愈快，就是说，农民经济愈快摆脱贫困，它愈富裕，它购买的家具和机器愈多，它改进自己的技术愈快，采用新的耕作形式愈快，因而能够向城市工业购买的东西愈多，——则我们的工业中的积累就进行得愈快。”<sup>③</sup>所以，必须使工业适应农民市场，逐步掌握这个市场，“无产阶级工业只有依靠农民市场，才能起经济上的领导作用。如果没有农民经济中的积累，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是无法长期进行的”。<sup>④</sup>在布哈林看来，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应当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办法在开始的时候固然会走得慢一点，但是，随着农民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和资本周转的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 233 页。

② 同上书，第 424 页。

③ 同上书，第 422 页。

④ 同上书，第 299—300 页。

不断加快,我们最终会获得一个比较高的甚至是最高的积累速度。布哈林还引用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的报告说:“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人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sup>①</sup>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健康之路。

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布哈林始终关注的问题。首先,在工农业关系上,布哈林既反对托洛茨基派经济学家提出的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中去的主张,同时也反对那种要求取消用于工业的一切扣款以保护农业的主张。前一种做法是采取剥夺、剥削的手段,强迫农民“纳贡”,是杀鸡取卵的办法,而后一办法则忽略了农业对工业的依赖性;没有拖拉机、化肥、电气化,农业就要陷于停滞状态,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sup>②</sup>所以,布哈林特别强调的就是:“工业要发展,需要农业取得成就;反之,农业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业得到发展。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是最根本的东西,它本身应当决定领导党的正确政策;领导党的责任首先就在于,使局部的和暂时的、眼前的、短期的、次要的和从属的利益服从长远的、最共同的、最根本和基本的利益。”<sup>③</sup>其次,布哈林认为,不仅工农业之间存在着平衡问题,而且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

---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30页。所引列宁的报告原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77页。

②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9—280页。

③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423页。

之间等等都有一个平衡问题。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比重方面，布哈林强调两者之间的最完满的结合，反对片面重工业化。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固然需要把重心放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但这类建设周期较长，需要若干年才能出产货品，而轻工业则周转较快，因此，可以在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利用轻工业赚回的资金投入重工业建设。<sup>①</sup>为了扩大再生产和保持工业的高速度，适当扩大基本建设的规模是必要的，但是，布哈林警告说，制订基本建设规划时不能以投资越多越好和规模越大越好作为出发点，而必须考虑到国家的后备情况。他把那种不顾实际情况而一味主张多搞基本建设的做法称为“疯人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将会导致连锁反应：加剧商品荒，而商品荒又会引起粮食荒，因为农民如果不能从工业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就不会出售自己的粮食。“工业品荒意味着粮食荒。”<sup>②</sup>布哈林尖锐地指出，“从一种在经常没有后备的情况下实施的政策中会闻到一点冒险主义的气味。”<sup>③</sup>布哈林认为，在农业内部，必须保持谷物业、畜牧业和技术作物的生产之间的平衡，为此，就需要国家调整政策，在价格、税收等方面鼓励谷物生产，同时对个体农户实行积极的扶持政策。因为苏联存在着大约两千五百万小农户或极小农户，粮食的绝大多数是他们提供的，农村居民中的大多数也是由这些中农和贫农组成的，他们生活得愈好，生产得愈多，出售得愈多，对苏维埃国家就愈好。<sup>④</sup>如果国家在农村政策上出现失误，一旦谷物生产出现不稳定，就会打破农业生产内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 295—296 页。

② 同上书，第 309 页。

③ 同上书，第 292 页。

④ 同上书，第 307 页。

部的平衡,引起连锁反应。

布哈林认为,“国家的一切经济部门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sup>①</sup> 为了社会健康和稳步的发展,经济建设中必须保持各部门之间的平衡。

列宁在临终前谈到布哈林时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sup>②</sup> 应该说,布哈林是无愧于列宁的这一评价的。布哈林曾经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领袖,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上曾经同列宁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并为此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批评。对于他的理论中表现出的某种繁琐哲学的倾向,列宁在其临终遗言中也曾给予谆谆的告诫。但布哈林毕竟是布哈林,他没有辜负列宁对他寄予的厚望。在苏俄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实践探索中,在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深刻的理论反思中,布哈林的思想开始发生跳跃式的变化。他逐渐把握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脉络,最终成为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忠实的捍卫者和最接近列宁本人想法的理论阐释者,并在列宁之后推动了新经济政策战略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凸显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的雏型。在列宁去世前后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布哈林积极参与了理论方面的论争,他在一系列的著述和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的观点给予了毫不妥协的抨击:他批判了托洛茨基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寄托于西欧革命、以农民为第三次革命对象的“不断革命论”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一切都必须以工业为中心、必须严格服从国营

① 《布哈林文选》中册,第30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工业的利益的“工业专政论”，批判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剥夺农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批判了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的超工业化理论，也批判了反对派否认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从俄国落后的现实出发，布哈林强调了新经济政策的长期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落后型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文化经济建设，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当是一种有机的长入过程；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经济利益吸引农民参加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高速度关键不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强制推进工业化，而首先应当是加速农民经济的发展，迅速扩大国内农民市场的容量，为工业的持续、高速和健康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互相繁荣、互相促进作用，运用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实施经济管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真髓。历史地看，布哈林所阐述的社会发展方案是更接近列宁晚年思想的方案，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方案，也是国民经济较为均衡发展的方案。

但是，要保证布哈林方案的顺利实施，也就是说，要保证苏联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当时的苏联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它需要：第一，能够保证这一方案得以贯彻的相对健全的制度；第二，能够保证这一方案得以贯彻的领袖或领袖群体；第三，能够保证这一方案得以顺利贯彻的干部基础或者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即使在不太好的情况下，它至少也应该拥有能够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娴熟地驾驭苏联这艘巨型航船的领袖和一批能够保驾护航、推波助澜的干部队伍。但苏联当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首先，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轨，实际上是一次大的社会发展战略调整，而这种调整并没有得到政治体

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机配合；也就是说，从制度保障的层面上，社会发展战略的转轨首先就缺乏有效的支撑物。列宁确曾注意到了苏维埃政权正在和已经“成为地道的‘寡头政治’”的危险，<sup>①</sup>他也做过一些改革的努力，但是，到去世之前，他也不得不承认：“在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方面，我们已经瞎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瞎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无用的，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瞎忙使我们看来像是在工作，实际上却搅乱了我们的机关，我们的头脑。”<sup>②</sup>有鉴于此，列宁在致代表大会的信中希望能够“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sup>③</sup>但是，列宁的建议没有得到其继任者们应有的重视。结果，经济改革不仅得不到政治改革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反而常常受到旧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阻挠和干扰。这无疑加大了新经济政策前进过程的难度和风险。其次，在列宁去世之后的联共（布）的高层领导群体中，能够像布哈林那样深刻而全面地把握新经济政策的内涵者可谓凤毛麟角，而像托洛茨基那样积极反对这场经济变革的人却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还存在着一大批对这一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的人了。倘若列宁在世，以他的威望、才学、胸襟气度和远见卓识，以及他高超的领导艺术，或许可以驾驭新经济政策这条航船驶出激流浅滩，而他的后继者中却没有一人具备这种才能。又倘若列宁去世之后，其继任者们能够从大局出发，能够群策群力，能够容忍不同意见之间的正常辩论，或许依靠集体的力量也能够不断的试错和校正中拨正航向。但是，托洛茨基的自负，斯大林的心胸狭窄和粗暴任性，季诺维也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43卷，第380页。

③ 同上书，第337页。

夫和加米涅夫的目光短浅及其在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布哈林的书生气质及其对政治斗争的厌恶心理,加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诸人问鼎最高权力的野心以及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动辄使用行政和组织处理手段,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党内的正常争论日益走向激烈的权力斗争而无法得到有效的遏止。结果,这些领导人之间通力合作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并最终彻底消失,胜利者的思想也随之上升为党的路线。而深谙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布哈林却恰恰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最后,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来自国内战争前线,他们对于行政命令和军事方式习以为常,而对新经济政策所要求的管理方法却极端的陌生和不适应。布哈林曾援引一位德国教授评论布尔什维克的话说:“他们是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卓越的政治战略家,出色的鼓动家,卓越的改造人的教师;但是他们缺乏经济训练,缺乏经济修养。别看经济战线上一两万布尔什维克在埋头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但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训练……这种说法离真实情况并不远。”<sup>①</sup>列宁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商业,学习管理,学会做生意,是有其深刻的背景的。面临着一支文化水平不高,经济管理素质较差的干部队伍,新经济政策推行的难度可想而知。而对当时俄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他们虽然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得到了实惠,但对于一个文盲占70%的小农国家而言,在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的情势下,要寻求人民对新经济政策的理性的、自觉的支持也决非易事。此外,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20年代,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但仍然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

<sup>①</sup> 转引自郑异凡:《布哈林论稿》,第348—349页。

一个“孤岛”，时刻存在着的外部压力以及对苏联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判断必然会折射到领导人的思想中来，并对苏联高层关于社会发展战略的争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新经济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复杂背景下艰难地前进着。

1927年底，苏联的粮食收购量锐减，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在关于危机的成因与摆脱危机的出路问题上，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认为：“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能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呢？不，不能。”<sup>①</sup>小农经济的劣根性和“富农”的捣乱始终威胁着苏联经济的发展，斯大林认为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斯大林认为，解决粮食收购危机的当前的办法就是采取“非常措施”，强制收购粮食，而摆脱危机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出路则是“必须从工业的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也就是说，“必须逐步而又坚定不移地把出产商品最少的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出产商品最多的集体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必须使我国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在向国家缴纳粮食方面不仅能够代替富农而且能够代替个体农民”；必须“铲除一切产生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根源并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sup>②</sup>布哈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粮价不合理，造成农民不愿意种粮和卖粮。因此，摆脱危机最终要靠协调市场比例关系：组织工业品供应农村、加重对农村上层课税，使谷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7页。

② 同上。

物与经济作物、畜产品之间形成正确的比价关系等等。<sup>①</sup>他坚决反对斯大林滥用“非常措施”、试图“用强制手段把农民赶进公社”的做法。<sup>②</sup>争论不断升级，逐渐演化为一场中止还是继续新经济政策的严重的路线分歧。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批评斯大林的理论和做法是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而斯大林则指责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是“右倾”、“右倾投降主义集团”。斗争以斯大林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随着斯大林的胜利，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了，布哈林方案被斥为“印花布工业化”和“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而被抛弃。苏联没有沿着列宁晚年的设想继续探索下去，而是采取了另一种社会发展战略，走上了另一条建设道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苏联，布哈林的方案不再为人们所了解。只是在数十年之后，这一方案的深层蕴意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 第五节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方案及其评价<sup>③</sup>

如前所述，在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的争论中，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分歧，其中最深刻、最根本的分歧之一就是对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的经济政策，是列宁晚年所设

<sup>①</sup> 参见《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0—22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7—269页。

<sup>③</sup> 有关斯大林方案的具体内容，以下两章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多有涉及，为避免重复，本节不再展开论述。

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大的发展战略。而斯大林却始终把新经济政策视为社会发展的非常态,他更多的是从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策略的角度解释这一政策的,即便是同左倾反对派进行斗争时也是如此。<sup>①</sup>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是战争结束后恢复时期的一种特殊政策,是一种喘息,一种积累。当经济的恢复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当苏联人民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之后,当苏联有了建设的初步积累之后,就应当中止这种缓慢的、不正常的发展战略,转而采取高速度的发展战略,而且要不断地加速度,直到赶上和超过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列强。只有这样,苏联才能求得生存的空间,才能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虽然斯大林与布哈林都认识到了苏联经济发展落后的事实,但他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布哈林强调的是不能超越从旧俄继承下来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在这种基础上苏联将只能采取“乌龟速度爬行”,在这个过程中只能量力而行,平衡发展,为将来的工业化奠定基础;而斯大林强调的则是“落后是要挨打的”,正因为苏联从旧俄继承下来的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才必须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落后状态,以避免重新陷入“挨打”的被动局面。要么灭亡,要么改变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加速工业化,这就是斯大林向苏联人展示的两条道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sup>②</sup>在斯大林那里,工业化的速度

---

<sup>①</sup>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可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02—303页;第8卷,第82、110—112页;第12卷,第151、16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3卷,第37—39、167—168页。

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sup>①</sup> 不仅如此,斯大林在谈到工业化时,不是强调整个工业的发展,而是强调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强调重工业可以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依靠其自身的扩展。<sup>②</sup> 为了解决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斯大林不顾布哈林等人的反对,坚持实行“贡税”政策,利用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攫取更多的资金。<sup>③</sup> 为了能够保证农业为工业化服务,为了防止因为对农民挖得太苦而引发粮食收购危机,一句话,为了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和农民,将其纳入国家所规定的工业化轨道,斯大林发起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sup>④</sup> 为了应付加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所造成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他又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sup>⑤</sup> 这一理论成了全盘集体化中消灭富农运动、20年代末的镇压阶级敌人运动以及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的理论基础。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是在同托洛茨基等左倾反对派和布哈林派的论战和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已基本成型。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要是

---

①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可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09页;第10卷,第257—259页;第11卷,第80页;第13卷,第167—168页。另参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②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2—113页;第12卷,第109页;第13卷,第166—167页。

③ 同上书,第8卷,第114—116、120页;第11卷,第139—140、164页;第12卷,第47、50—51页。

④ 同上书,第11卷,第7、36、179页;第12卷,第118页;第13卷,第161页。

⑤ 同上书,第11卷,第54、149—150页;第12卷,第29、31、34—35页;第13卷,第190页。

按照斯大林的设计进行的。站在今天的高度,反过头来看,应该承认,斯大林的方案更接近于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倒是布哈林方案更忠实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路。人们在斯大林的“贡税论”中不难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影子,他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则是托洛茨基所谓在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理论的再版,而高速度工业化理论也不过是“超工业化”计划的翻新。就个性而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一样,都“喜欢采取行政措施”。对他们的这种“癖好”,列宁是不满意的。<sup>①</sup>就其方案而言,在总体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所坚持的都是一种激进的工业化路线,都希望用国家强力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不同的只是在于托洛茨基的强制更带有军营化的色彩,而斯大林的强制则更具有行政命令的特征。如同任何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革命一样,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初,革命中所爆发出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一时间尚难完全消退,激情和幻想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在这种强大的惯性的冲击下,冷静的思索往往受不到重视,甚至常常还会受到嘲笑、打击和唾弃。激进政策就是这种革命惯性和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在政治决策上的一种反映。布哈林方案之所以被抛弃,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试图在一个尚处于革命狂热的社会氛围里高扬起理智与科学的旗帜,而理智和科学的力量在这里却显得极端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于是,布哈林成了“右倾路线”的代表,成了“革命意志衰退”的象征。在由革命时代向经济建设转折的时期,布哈林的思想本来预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他是失败者和牺牲品,他成了他所代表的那种社会发展道路的先驱者和殉道者。他没有成功。托洛茨基方案

<sup>①</sup>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350页。



也没有被公开地、全面接受,除了他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失势这一重要原因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他完全无视社会已经处于由革命时期向建设时期转轨的事实,他不仅不希望已经开足马力运转的革命机器停下来,甚至还要再给这架机器加速、再加速。这很可能是一条走向毁灭的路。斯大林的优势在于,他抓住了苏联社会必须由革命转向建设这个纲,但他没有像布哈林那样走得那样远,以至于忽视了社会的革命狂热氛围。斯大林成功地利用了他出色的组织才能,较好地驾驭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惯性力,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牺牲精神、急于摆脱贫困和落后的心理引导到了工业化建设的轨道。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总前提下,斯大林激励苏联人民相信: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不必依靠外国力量,而是依靠自身的成就,就可以向西方和全世界指明人类前进的道路。这里,斯大林不仅鼓舞和再次激发了苏联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而且也唤起了深深扎根于俄国人历史中的民族自豪感和宗教救世主义的使命感。他使苏联人民相信,美好生活的远景在向他们招手,为了这个远景,他们还得忍受相当大的苦难和牺牲;但是,他们的苦干和发奋一定会给他们带来胜利、安全和福祉。在列宁去世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在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各种思想、设计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胜利者,斯大林的建设方案也随之成了苏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但是,斯大林用“直接进攻”的办法、“短促突击”的办法搞建设,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和健康的途径。群众的热情不可能持久,人民对牺牲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依靠强制的办法,以人民群众付出较大牺牲和代价的办法进行工业化,在一段时间内,在某些主要领域也可能创造奇迹,但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不可能依靠短促突击的方法完成的,而各生产部类的增长长期失

调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失衡的状态最终也无法持久地维持下去。因此,时间越久,斯大林方案的弊病便越明显;这种弊病持续的时间越长,其危害性也就越大。无论是托洛茨基方案也好,布哈林的方案也好,还是斯大林的方案也好,今天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了历史。在当初的条件下,倘若苏联党和国家选择了布哈林方案,苏联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很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尽管布哈林方案本身也不是没有缺陷的。不过,历史毕竟是不能假设的。苏联选择了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方案,这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即便是选择了斯大林方案,更多地吸收布哈林方案中的合理成分,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列宁时期,党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方案、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而斯大林没有这样做。他没有列宁的胸襟和胆识,他用组织的手段把反对自己的人一个一个地清除掉,对他们的思想也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方法。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的选择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囿于一时一地的条件,人们在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往往不一定能够得到一种最佳的方案。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不能建立起一种机制来保证及时地、不断地校正自己的选择。也许列宁晚年要求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换下来并要求对苏维埃政权机制进行一系列的变革的更深层的意义正在于此。

苏联选择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方案,从而迈出了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 第十五章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先期准备阶段,这就是1924年至1929年的党内论战及反“派别”斗争。其间,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在理论、政治、组织三条战线上存在严重分歧并展开激烈争斗,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逐渐取得优势地位。1929年底,斯大林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形成阶段的开始。在这个阶段,先后大规模地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政治大清洗三大运动,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最终建立起斯大林模式。苏共之所以选择斯大林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既有主观认识的原因,也有客观条件制约的原因。

###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

1924年列宁去世后至1929年打倒布哈林、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为止,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在理论主张、政治路线、组织配备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派别势力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党内斗争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而且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流派逐渐取得完全的优势。

## 一、理论战线的斗争

如前文所述,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理论战线立即爆发了争论。截至1929年,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所涉及的问题非常重大而又极其广泛。五年间发生了三场大争论:关于列宁主义的大争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理论是党的旗帜,谁掌握了理论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党的旗帜,从而就取得党的领袖资格。

列宁去世后,人们纷纷著书写文章,缅怀列宁的丰功伟绩。列宁的战友们竞相举起列宁主义旗帜,都从自己理解的角度阐述列宁主义,研究列宁主义,试图对列宁的思想和理论进行总结与概括,争夺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这既是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在理论上扩大影响、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于1924年4月和9月分别写成了《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两本书,季诺维也夫于1925年发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与此同时,斯大林撰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卷入了这场竞争和理论斗法。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强调说,他对列宁主义的理论概括是最正确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了列宁主义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其二,“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从而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于俄国一国环境;其三,“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926年,斯大林非常自信地说,他给列宁主义所下的“众所周知

的“定义，”看来已经得到公认了”。<sup>①</sup>在关于列宁主义的问题上，斯大林不仅批判了托洛茨基，而且还批判了季诺维也夫，逐渐地树立起自己是列宁主义继承人的形象。

在第二场大争论中，斯大林和布哈林联手坚决驳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观点，坚持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应该说，列宁去世后苏联处于转折阶段，尤其是国际革命陷于低潮之时，斯大林、布哈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坚定了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在党内树立起了一种精神领袖的形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在理论上不承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种错误的观点注定了他们要在竞争政治领袖的党内斗争中彻底失败。

在第三场大争论中，托洛茨基从其“不断革命”的理论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认为在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然会同农民发生冲突。为此，苏维埃国家必须实行“超级工业化”，以“剥夺”农民的方式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中央多数派的理论旗手是布哈林，是他在理论上无情地批驳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观点，维护了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农民合作，并且引导农民缓慢地走向社会主义。其后不久，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提出“高速工业化”、“贡税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以反对布哈林的市场综合平衡经济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的观点只是托洛茨基“超级工业化”、“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剥夺农民”理论的改头换面和重新包装。布哈林的理论被当做“右倾”而遭到批判，中央多数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3、14页。

派接受了斯大林的理论,从而为斯大林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 二、政治战线的斗争

与理论战线上的三场斗争交叉进行的是激烈的政治战线上的斗争。政治斗争的核心是:是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还是停止“退却”而实行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政策?如上所述,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怀疑新经济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退却”。布哈林阐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一定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俄国。因为存在政治路线的斗争,所以联共(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摇摆不定,时紧时松,缺乏连续性。

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新经济政策不需要修改。”<sup>①</sup>可是,从1923年夏季到整个1924年,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出现波动收缩的时期。在党的十三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到要限制和排挤私营工商业。这反映了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政治路线的斗争。

1925年4月,俄共(布)中央召开全会,专门研究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问题。党的领导人就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从去年的限制流转到灵活的国家经济调整”的任务。全会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全力改善农村消费合作社工作的同时,减轻对农村私商的税务负担和取消行政措施。决议承认:为同私商作斗争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是“军事(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四月全会后,整个经济政策有了重大的调整,主要是对私营工商业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页。

和农村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于是，新经济政策又开始顺利实施，整个经济形势出现了新局面。

到1926年，由于私营经济成分有较多发展，俄共（布）根据1925年12月召开的十四大决议的精神，执行一条进攻性的路线，又开始把私人资本看成敌对力量，并把同“耐普曼”作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按照十四大决议的说法，苏联已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局面，即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无产阶级在经济上采取进攻和向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的局面。这种进攻路线的指导思想是：目前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之间的斗争。据此，国家重新实行排挤私人资本的政策，强行关闭市场和交易所，对私营企业进行搜索和没收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私营工商业便迅速缩小了。1927年是私营工商业受到更大限制和排挤的一年。1928年初，国家又采取“非常措施”征购粮食。1929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虽然斯大林强调不会取消新经济政策，但它实际上已被停止实施，名存实亡了。

综观1924—1929年期间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波动，说明俄共（布）党内关于政治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到1929年时，新经济政策表面上虽然还保留着，但实际情况已大大改变。党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配套措施，加速进行农业集体化已提上日程。这种急剧的变化，已经完全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和安排，而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回来了。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在党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 三、组织战线的斗争

组织战线上的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宁去世

后,围绕由谁来充当他的继承人、填补他留下的政治领袖的位置,俄共(布)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出现频繁而激烈的个人权力斗争。这种斗争同时又和理论主张、政治路线的斗争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在1924—1929年之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多数派先后同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联合反对派,布哈林反对派进行了较量,反对派一个接一个地遭到失败,支持斯大林的力量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权。

1925年1月17日—20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对托洛茨基进行了严厉批判,要求他服从党的纪律,放弃任何反对列宁主义的行动。会议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并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的威望和权力均受到决定性的削弱,他基本上退出了权力中心,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再能构成重大影响。

托洛茨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集团又发生分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一个“新的”反对派,同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多数派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一方主要以列宁格勒为基地,自下而上地对中央施加压力,从而影响全国。斯大林则利用总书记的职权,极力遏制他们的影响。

俄共(布)十四大全面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主张,并以556票对65票通过斯大林的报告,还通过几项谴责新反对派的决议。同时,大会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季诺维也夫继续留在政治局,加米涅夫被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拥护他们的骨干分子则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十回大后不久,季诺维也夫所担任的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加米涅夫所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均被免除。

鉴于新反对派在列宁格勒的影响以及列宁格勒代表团在十四大会议上的表现,中央决定彻底整顿列宁格勒党组织。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在列宁格勒省委担任的职务全被免除,形成了由加里宁、莫洛托夫、基洛夫等人组成的新省委。

而对斯大林这个日益强大的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人便联合起来,成立托季联盟,先后散发了三个文件:《十三人声明》、《八十四人声明》、《反对派政纲》。这三个文件都受到中央的批判。于是他们诉诸非组织手段,组织游行示威,抗议中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27年11月14日做出决定,开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党籍。同年12月召开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开除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75名反对派骨干分子的党籍。代表大会还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采取措施,对“反对派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应当完全和彻底地解除武装”,清除“一切不可救药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以纯洁队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联共(布)历史上正式开创了用大规模组织“割除”来解决党内分歧的先例。

十五大以后,斯大林又发动了反对布哈林的斗争。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11天的会议都是在激烈争论中进行的。李可夫、托姆斯基支持布哈林的观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旗帜鲜明地支持斯大林;大多数中央委员持观望态度。会后,支持布哈林的莫斯科党组织被改组,由莫洛托夫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支持布哈林的《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列宁格勒真理报》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均被改组。各级组织中支持布哈林的干部有的被解职,有的无法行使职权。1929年4月,党中央召开全会,全

会对布哈林自我辩解不予理会，决定撤销布哈林《真理报》主编的职务，同时撤销托姆斯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职务。同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撤销布哈林担任的全部职务。11月，布哈林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在此前后，全苏上下掀起“反右倾斗争”。1929年11月26日，《真理报》登载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签名的声明，表示承认错误。至此，这场斗争宣告结束。

斯大林在组织战线上击溃了所有反对派之后，为推行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治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 第二节 斯大林模式的初步形成阶段

由于斯大林在理论、政治和组织三条战线上的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这就为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建立斯大林模式奠定了基础。

### 一、新经济政策停止标志斯大林 模式形成阶段的开始

新经济政策具有很大的魅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国家容许各种经济成分展开竞争。但是，如何得心应手地进行实际操作，很好地驾驭新经济政策，这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一种考验。面对这种考验，党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为此引起一系列的争论和斗争。但是，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制定的政策，赤裸裸地抛弃这个政策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必须要有一个考虑周全的说法和理由。斯大林找到了这样的理由。

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和时期，1921—1926年是

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和时期,从1926年开始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阶段和时期。前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农业;要发展工业,必须从农业开始,为工业发展创造起码的条件。后者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要推进整个经济,必须集中全力发展工业;就农业本身而言,如果没有拖拉机和工业产品的支持,它也不能进一步发展。<sup>①</sup>斯大林这样论证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表明,党中央的决策具有连续性,并没有违反列宁的政策,从而为以后停止新经济政策做好铺垫和准备。

果然,到1929年底战胜布哈林反对派之后,斯大林就开始改变新经济政策。他在《大转变的一年》,开篇就说:“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这个转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坚决进攻的标志下进行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在于它已经使我们在我国国民经社会主义改建(改造)事业的各个主要方面取得了许多决定性的胜利。”“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党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适当地利用了我们的退却,以便在以后,在新经济政策的下几个阶段组织转变并向资本主义分子实行胜利的进攻。”<sup>②</sup>在斯大林看来,过去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分子的退让,而现在则是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全面进攻。

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这是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发出的改变政策、实行大转变的动员令。虽然,斯大林在这里仍然表示这种大转变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继续,但实际上斯大林改变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战略性的转变。因此,公开宣布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1、112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06页。

“抛开”新经济政策、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进一步论述了自己关于新经济政策两阶段的思想，即第一阶段是退却阶段，第二阶段是进攻阶段。斯大林抓住列宁的“停止退却”的思想，加以发挥，形成了新经济政策的“进攻”、“排挤”的新阶段的思想，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不仅有“退却”，还有“进攻”。但是，事态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人民的想象，再用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的说法教导人民，已经很难让人民相信新经济政策仍在继续。因此，必须对党中央的现行政策的实质作新的说明。于是，斯大林提出：“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是永久的。”<sup>①</sup>

可见，在斯大林看来，1929年的新经济政策已经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了，应该被“抛开”。公开宣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形成阶段的开始。随后加快开展了农业全盘集体化、高速工业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形成了后人所称的斯大林模式。

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看，可分为三个时期：(1)以“全盘农业集体化”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开始建立时期；(2)以“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全面建立时期；(3)以“大清洗”运动为标志的斯大林模式最终形成时期。

---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51页。

## 二、全盘集体化运动与斯大林模式的开始建立

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是建立斯大林模式的开始。本来,农业集体化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向。然而,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主要是为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服务的配套措施,集体化运动过程中采取的一些手段及表现出的特点勾画了斯大林模式的最初轮廓。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以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为指导思想的,即在帮助个体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按照自愿原则广泛组织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首先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并通过这些合作社来引导农民加强各方面的合作,以便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渐过渡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因此,集体农庄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极其有限,国家需要的农产品也主要通过市场交换从农民手中收购。但是,从工业化建设开始后,这一政策就逐渐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了。

从1926年起,苏联的工业投资大幅度增加,工业建设的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日益增加,工业化对粮食的需求量也愈来愈大。可是,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却开始放慢,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急剧下降,由战前的26%下降到13%。农业生产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这突出地表现在粮食供应上。1927年下半年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有的城市粮食供应紧张起来,开始实行配给制;粮食出口任务也无法完成,不能换回急需的设备技术,从而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

对于当时出现的粮食困难,斯大林认为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是

小农经济“日益分散和零碎化”，而小农经济是商品率最低的经济。农户总数由革命前的 1600 万户分化为 2500 万户，其粮食商品率只有 11%。虽然 1927 年的粮食产量比革命前只低 5%，但粮食商品率却比 1913 年减少一半。二是拥有大量余粮的富户故意囤积粮食，不肯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出于这种认识，斯大林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一是采取非常措施强制收购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出路是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把“分散细小”的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党内反对派极力反对这种做法，而斯大林对这种争论也越来越失去耐心，因此到 1929 年初就给布哈林等人戴上右倾反党的帽子，并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同时开展清党活动，主要清洗农村中“富裕党员”和同富农有“直接联系”的党员。这样就把上面和下面反对农业集体化的势力压了下去，为大规模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扫清障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五大本来提出的农业逐步集体化方针，就立即变成农业全盘集体化方针。1929 年 4 月，联共（布）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向全党提出必须大力支持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任务。

由此可见，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并不是基于农业发展本身的要求，更不是基于农民的要求，而是为配合国家工业化运动而实行的一种措施，一种带强制性的把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的政治运动。正因为如此，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表现出以下特点。

### 1. 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突击实现农业集体化

为了积极配合工业化运动，在 1929—1934 年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完成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其速度与规模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1929 年 4 月，苏共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向全党提出大力支持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任务。同年 5 月，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支持整村、整乡全盘集体化的决议。1929

年下半年,首先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和下游这三个重要产粮区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即整村、整乡、整区实行集体化。斯大林于1929年11月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这标志着全盘集体化作为改造农业生产关系的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全面铺开。斯大林提出:不能再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要以村、乡、区、专区为单位集体加入集体农庄。他说:“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sup>①</sup>斯大林这篇文章的发表,使此前个别地区的全盘集体化发展成急风暴雨式的全国性政治运动。1930年初,各地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一哄而起,竞相争取提前完成任务。有些地区在几天之内就把集体化的百分比由10%提高到90%。从全国来看,集体化的百分比则由1月20日的21.6%上升到2月1日的32.5%和3月1日的56%。到今年2月,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地区已有两千多个,还出现不少全盘集体化的专区和州。

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安全支持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决议将全国农村分为三类地区,并为每一类地区分别规定了基本实现集体化的时间表。其中规定: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应在1930年秋完成,至迟延长到1931年春;一般产粮区在1931年秋完成,至迟延长到1932年春;其余地区在决议中未做规定,根据斯大林后来的解释应在1933年完成。1931年8月,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关于下一步集体化的速度和巩固集体农庄的任务》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规定的标准,一个区或一个州只要68%—70%的农户和75%—80%的播种面积加入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页。

集体农庄,就可以认为基本上完成了集体化任务。按照这个标准,许多产粮区在1931年10月前就已基本上实现了集体化,开始进入巩固集体农庄的阶段。但就全国来看,到1934年7月才基本上完成这一任务: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65%,播种面积达到87.4%。

## 2. 使用行政命令手段实现农业集体化

由于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实现农业集体化,因此,使用行政手段和出现过火行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为了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政府派出大批工作队,到农村帮助开展运动,配合基层苏维埃,用行政命令手段,要求农民集体加入集体农庄。与此同时,中央不断地发出有关的行政命令。1930年1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要求各基层苏维埃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发挥新作用,并警告村苏维埃:如果不改正自己的工作,使其适合于大规模集体化的新要求,就会事实上是一个富农苏维埃。在上级领导的严令督促下,各地基层苏维埃及集体化工作人员便纷纷采取行政措施。例如莫斯科州的领导人提出要求,农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930年春天加入集体农庄。地区的苏维埃机关则规定,农民必须一律加入集体农庄,凡拒绝者就没收土地、剥夺选举权。又如在土尔克斯坦的某些地区,有人用武力威胁、有的用经济制裁来威胁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为了追求更高的公有化形式,有些地方甚至把农民的住房、自用奶牛、猪、羊、家禽和菜园等都强行收归农庄所有。

这类过火行为引起农民的严重不满,他们用大量屠宰牲畜的办法发泄不满情绪。因此,从1929年7月1日到1930年7月1日,牛减少22%,马减少13%,猪减少33%,羊减少26%。同时,农民纷纷要求退出集体农庄。于是,斯大林针对这些过火做法写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中央也做出《关于反对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歪



曲党的路线》的决议，对集体化运动进行了整顿和纠偏。但由于中央没有改变既定的全盘集体化方针政策，整顿和纠偏就很有限。

### 3. 消灭“富农阶级”

根据1929年5月21日苏联发布的《关于富农户特征及应当对其实行劳动法典》的决议规定计算，全国有一百多万户富农，占农户总数的4%—5%。随着集体化运动的高涨，在如何解决富农问题和是否容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问题上，存在两种意见。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以《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讲话，对尚在讨论中的富农问题做出最终裁决，使富农政策发生急剧转变。他提出两点：一是把集体化运动同反富农斗争联系起来，并以反富农斗争作为推进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动力；二是把党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转变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联共（布）中央还发布决议，将富农划分为三类并规定了处理办法。其中规定：第一类富农六万多户，他们从事过反革命活动，应立即逮捕入狱，关进劳改营；第二类富农约十五万户，他们是反对集体化运动的大富农、从前的半地主，应迁徙到国家边远地区；第三类富农约八十万户，应迁到本地区专门划出的、在集体农庄以外的地段。到1932年年底，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实际上，所谓富农阶级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起来的善于经营的农民。

### 4. 严格限制商品流转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急风骤雨中，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农村集市贸易。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国家不得不容许商品流通形式存在，但还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1932年5月10日，国家通过《关于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劳动农民进行商业活动的办法和减少农产品商业税》的决议，容许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个

体劳动农民在集市上出售自产农产品。但是，严禁私商开设商店和店铺，彻底铲除企图靠损害工人和农民利益而发财的倒卖商和投机商。

上述这些特点，极其明显地反映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进程之中。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4年，集体化运动大致经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9年7月至11月，是逐步集体化向全盘集体化的大转变阶段。1929年4月，联共（布）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的“一·五”计划原本规定，到1932年全国将有23%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而1928年7月至1929年7月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只是从1.7%提高到2.2%。这些规定，本来符合十五大关于逐步实现集体化的方针。但由于粮食收购危机，1929年7月便开始加速集体化，拉开了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序幕。第二阶段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3月，这是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阶段。1929年11月的中央全会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村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它超过了最高估计和速度。斯大林乐观地认为，如果整村整乡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发展下去，“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sup>①</sup>全会后，全盘集体化运动便高涨起来。第三阶段从1930年3月至同年秋季，这是整顿和纠偏阶段。针对行政命令、过火行为和农民纷纷要求退出集体农庄的现象，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胜利冲昏头脑》和《答集体农庄员同志们》两篇文章，中央也做出决议，批评集体化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但斯大林和党中央并未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把责任推给下而。第四阶段从1930年秋至1931年秋，这是掀起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新高潮阶段。为了巩固集体化的成果，阻止农民退出集体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18页。

农庄，国家在经济上大力帮助集体农庄，给集体农庄提供5亿卢布的贷款，同时提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于是集体化再次出现新的高涨局面。第五阶段从1931年10月至1934年7月，是农业全盘集体化在全国范围基本完成阶段。到1934年7月，苏联基本上完成农业集体化的任务，其标志就是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65%，播种面积达到87.4%。

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基本完成，苏联便建立起一种新的直接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农业经济体制。从所有制结构看，有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前两者是国家所有制，后者是集体所有制。从经济管理的形式看，主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 三、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与斯大林模式的全面铺开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是加快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振兴国家、加强经济独立和国防能力的需要，而且也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斯大林不顾一切，甚至不惜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这既是建立斯大林模式的动因，也是建立斯大林模式的真正目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及出现的特点完整地反映了斯大林模式的全貌。随着工业化运动的不断推进，斯大林模式也全面建立起来了。

1925年，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宣告结束。正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列宁的指导思想，同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十四大提出工业化方针，并把国家工业化确定为党的总路线。在这次大会上，对于列宁提出的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出现意见分歧。

随着工业化运动的开展,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到1928年,国民经济中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的现象日益突出,最主要的是粮食的供应量不能满足规模愈来愈大的工业化建设需要。这时的工业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必须重新考虑工业化的政策:是继续坚持高速度地发展工业,还是根据实际条件把工业化速度降下来?对于这个问题,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多数派的态度是:不降低工业化的速度,继续坚持工业化的高速度,甚至主张不惜采取强制措施。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派,则主张放慢工业化速度,认为采取行政措施解决粮食困难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背弃,是恢复军事共产主义。但是中央多数派没有采纳这种意见。

这时,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启动,并驶上快车道。在战胜党内反对派以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联共(布)中央从理论到实践愈来愈明确地形成一整套工业化的方针与政策,其主要特点如下:

### 1. 追求高速度

强调和追求高速度,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灵魂。斯大林虽然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张,但也主张工业化速度“越快越好”,认为“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以便使苏联尽快摆脱落后和“挨打”的局面。斯大林论证高速度的主要论据有两条。第一,落后要挨打。他提醒全党、全国人民注意:我们比先进国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别人打倒,两者必居其一。他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第二,迅速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他说:“不加速发展我国工业,就不能以机器和拖拉机供给农

村。因此,迅速发展我国工业是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业的钥匙。”<sup>①</sup>于是,高速度就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过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时间才完成的工业化,苏联只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据当时公布的官方统计情况,在工业化时期,苏联工业的发展速度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的最高速度还高得多。例如,美国在1880—1885年的年增长速度为8.5%,西欧在1870—1900年为3.7%,日本在1907—1913年为8.6%。沙皇俄国的工业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发展速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但在1895—190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只有9.2%。而苏联工业在1929—194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8%,其中在1929—1932年工业化高潮时期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

## 2. 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

1925年12月俄共(布)十四大关于工业化的决议,并未强调侧重发展重工业。1926年4月,斯大林开始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明确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sup>②</sup>后来斯大林还进一步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律。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我们应“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sup>③</sup>

在这种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全部工业

---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2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462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496页。

投资的84%用于重工业。在总投资额中,重工业投资一直占30%左右,有时甚至达到40%,而轻工业投资最多也未超过7%,有时只占4%左右。至于农业投资在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则是不断下降:“一·五”时期为15.5%，“二·五”时期为11.8%，“三·五”时期为10.7%。因此,便造成一种重工业超前发展,轻工业发展缓慢,农业严重落后的经济结构。例如,官方的统计数字是,从1926年到1940年,重工业增长18.4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1.2%;轻工业增长6.2倍,年均增长速度为14.1%;农业只增长26%,年均增长速度只有1.5%。

### 3. 实行高积累

追求工业化的高速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来源。在工业化开始前,本来就很落后的国民经济尚未从战争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因此根本没有资金积累。而工业化又从需要大量投资的重工业开始,这就更增加了资金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依靠国内积累,从理论上讲就是依靠各行各业(首先是工业)实行增产节约。但从实际上看,当时投资量最大的重工业根本谈不上积累。结果,积累资金就只能依靠抑制消费,依靠全体国民、首先是农民节衣缩食。斯大林特别强调抑制消费。他说:为了工业化“必须作出牺牲,在各方面厉行节约,节约饮食,节约教育经费,节约布匹,以便积累建立工业所必需的资金”。<sup>①</sup>

当时,在抑制消费和增加积累方面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提高积累率,压缩消费率。国家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积累率,从而相应压缩用于消费的资金。例如,1913年旧俄国的积累率为9%,苏联工业化前夕的1925年积累率为

<sup>①</sup> 《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页。

16%，而在工业化时期每年的积累率则一般在26%—29%，这大大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率（一般为7%—10%，经济最景气年份也只有12%）。第二，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抑制农民消费。用斯大林的话说，这就是使农民为工业化交纳额外的“贡税”。据估计，国家通过集体农庄义务交售制、向拖拉机站交纳实物报酬制等办法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约占其总收获量的40%，而粮食收购价远远低于粮食成本，而且征购量逐年增加（1928年为1080万吨，1931年为2280万吨）。在“一·五”期间，通过上述办法从农民手中得到的资金，在工业化资金中平均每年占33.4%。第三，用征收捐税、发行公债和开展居民储蓄等措施来直接抑制居民消费。在“一·五”期间，国家向居民征收的各种捐税增加2.3倍，发行公债增加4.4倍。这两项收入之和，在1929年占全国预算收入的20.2%。

斯大林关于工业化方针与政策的上述特点，极其明显地反映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1926—1928年工业化开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改建和扩建原有工业企业，同时也新建了几千家企业（有些是在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施工的）。这一阶段对老企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和冶金企业的改建和扩建，实质上等于新建，因为这些老企业都安装了新设备，采用新工艺。在这三年内，工业投资总额约为33亿卢布，其中近四分之三的投资用于重工业。结果，固定资产增加了40%，由55.8亿卢布增加到78.4亿卢布，其中重工业固定资产增加了58%，由28.4亿卢布增加到44.8亿卢布。第二，“一·五”时期大规模工业建设阶段。“一·五”计划为工业规定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强大的重工业，作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改造的基础。为此，五年计划的工业投资由前五年的44亿卢布增加到164

亿卢布,而且其中的78%以上用于重工业。1932年,斯大林宣布,这个宏伟计划以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基本完成,工业的实际投资高达248亿卢布,超出计划27%,重工业在工业投资中所占的实际比重达到86%。整个工业的固定资产增长1.2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倍。同前一阶段不同,“一·五”时期以新建为主,全国有一千五百多个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建成投产。总之,这是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全面铺开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性阶段,在此期间,基本上建立起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重工业体系,初步改变了苏联经济技术落后和依赖外国的局面。第三,“二·五”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家对工业、农业和运输业等各个经济部门进行技术改造,并建立新的技术基础。在这一时期,工业的技术基础迅速扩大,工业的投资额比“一·五”时期增加1.2倍,高达538亿卢布,其中重工业占用83%,轻工业只占用17%。在此期间新建的企业有四千五百多个。技术改造的首要任务是使工业生产机械化,因此,“二·五”时期机器制造业仍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还加紧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建设与发展,苏联在短时间内突击建立起以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此期间,共建起九千多个现代化工业企业,使苏联从一个经济技术依赖于西方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业强国之一,按绝对工业产量计算,苏联已跃居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时,苏联也形成重工业过重、农业和轻工业过轻和农业十分落后的畸形经济结构,也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了。



#### 四、大清洗运动与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

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急风暴雨中,斯大林又掀起一场政治大清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清洗运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副产品和衍生物。之所以这样说,是三大运动存在着内在联系。因为不论是工业化运动,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都是由国家采取行政命令手段推行的,一度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党群关系紧张。这引起了党内外普遍不满。大清洗运动就是为了镇压这种不满情绪而采取的措施。斯大林这样做意在维护自己的权威,保障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继续进行,保障正在建立之中的斯大林模式不受干扰。大清洗运动表明:谁反对斯大林、谁反对斯大林模式、谁反对集体化运动和工业化运动,就要遭到镇压。因此,大清洗运动的出现并于30年代末达到高潮标志着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

自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了“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经没有公开反对派。但是,党内的不同意见和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由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采取压制措施,使这些不同意见和党内矛盾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便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事件和秘密的镇压活动层出不穷的真正原因。这些政治审判和镇压事件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构成了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

1930年11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了“工业党”。接着,又宣布破获了“劳动农民党”、“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委员会”等“反革命组织”。在这些“案件”中,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马卡

罗夫，新民粹派经济学家苏汉诺夫、巴扎罗夫，孟什维克格罗曼受到指控，后被处决。

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内部揭发了“塞尔佐夫—洛米纳泽集团”。塞尔佐夫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俄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1932年秋，党中央宣布揭露了“柳亭—斯列普科夫集团”。据说，柳亭在莫斯科组织一个有18人的秘密反对派小组，他们的主要要求是：改善党的领导；停止党内的迫害活动；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比例；改善人民生活。他们最激烈的要求是：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为此，柳亭等18人全部被开除出党、关进监狱。

1932年底，党中央又揭露了“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不久，又揭露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克雷普尼克集团”。

这些案件表明，党内外积累的矛盾与不满是非常严重的。党内以基洛夫为代表的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原有的反对派集团已被击溃，影响已经消除；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广大干部和群众日益拥护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因而他们主张：在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时期，采取激烈措施是必要的；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应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努力团结更多的力量，改善党内外关系，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种要求是非常温和的，只是要求缓和一系列行政措施的强制力度，根本没有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

面对这种要求，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采取措施，对若干政策作了某些调整。例如：对原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实行某种程度的团结政策。于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都被推选为出席党的十七大的代表。布哈林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李可夫被任命为邮电人民委员，皮达可夫担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1934年11

月，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废除面包和其他几种食品的配给制》的决议。这就把自1928年以来实行的粮食配给制取消了。同年11月，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农业中的政治部》的决议，把原来拖拉机站这种特殊政治监控组织——政治部同当地的区党委合并了。

然而，这种调整是极其有限的，斯大林只是试图缓解现存问题的严重性，而根本没有对产生诸多问题的根源——高速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进行调整。实际上，只要高速工业化运动仍在继续，其配套措施——农业集体化就必须紧紧跟上。在这种条件下，党内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党同群众的关系必定会紧张。因此就形成一种极其困难与复杂的局面：进也难，退也难。继续前进困难重重，因为高速工业化导致国家财力紧张，政治关系紧张；而农业全盘集体化只是一种国家便于得到粮食的措施，并不能达到促进生产、增加粮食总量的目的。减低速度或者稍许退却也很难，因为国际上战争威胁在逼近，另外当初同布哈林等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现在已经没有回旋与通却的余地。斯大林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正如列宁评价的那样，是简单粗暴、缺少耐心。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便采取大规模镇压的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样做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四年时间，苏联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清洗的高潮。这个大清洗运动，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 1. 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

早在1928年7月，当苏联还处于过渡时期的时候，斯大林就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sup>①</sup>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对1928年春粮食收购危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149—150页。

机和虚构的“沙赫特事件”发生的原因做了片面的总结，他认为这两个事件是城乡资产阶级分子仇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所采取的更加激烈的反抗。在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富农阶级消灭以后，苏联社会从过渡时期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时斯大林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式改变了，阶级敌人从正面进攻转为暗中破坏，但阶级斗争的程度却更激烈了。1933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联席会议上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sup>①</sup> 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国内不再存在敌对阶级。1936年宪法也确认了这一点。但是，斯大林在肯定苏联国内已经没有阶级对抗的同时，却仍然强调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1934年12月发生的基洛夫被害事件，使斯大林更加坚持这一观点。1937年3月，斯大林重申：“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sup>②</sup> 而且，斯大林把国内阶级斗争看做是外国资产阶级国家在苏联进行间谍、恐怖活动、颠覆活动越来越激烈的表现。

## 2. 大清洗运作过程脱离党的集体领导和撇开司法机关及司法程序

大清洗运动一开始，斯大林个人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依靠国家安全机关，摆脱党和司法机关，在党内外造成一种恐怖气氛。1934年12月1日，即基洛夫被害的当天晚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通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90页。

<sup>②</sup>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29页。

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其中规定：“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有关这些案件的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状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sup>①</sup>这些修改，势必使案件审理工作采用逼、供、信手段，而且剥夺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利，践踏了宪法和法律。其实，早在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通过《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特别会议》的决议，授予特别会议可将认定的社会危险分子流放五年的权力。1936年夏，联共（布）中央又授权内务部为期一年的全权，以便彻底摧毁“人民敌人”。1937年，又将这种权力无限延长。根据这些决议，内务部的审判职能和权力大大扩大了。国家安全机关不遵循诉讼程序，不受党、苏维埃、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约束，从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

### 3. 打击对象主要是党政军领导干部

大清洗运动起先是大规模地处决沙俄时期政治上属于反动营垒的人物。1934年12月6日，即基洛夫安葬的当天，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处决了一批长期在押的前沙皇政府官吏。接着，打击的矛头迅速指向党内原反对派成员。1935—1936年，以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的罪名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原反对派成员14人处决。1937年1月，以组织“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罪名将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17人逮捕审讯，除两人外，其余皆被处决。1937年2月，将布哈林、李可

<sup>①</sup>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夫等 23 人逮捕。1938 年 3 月,以组织“右派托洛茨基总部”的罪名,把布哈林等人(除三人外)处决。大清洗运动也冲击了军队。甚至一向支持斯大林方针政策的干部也成为清洗的对象。1934 年 1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曾被称做“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党代会的代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是按斯大林的意图安排的,都是拥护斯大林路线的干部。然而,在随后的大清洗中,参加这次大会的 1966 名代表中有 1108 名被逮捕;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被逮捕和处决;11 名政治局委员中,奥尔忠尼启则因抗议斯大林滥捕滥杀而被迫自杀,科秀尔和楚巴尔被杀;6 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波斯蒂舍夫、鲁祖塔克、埃赫等被杀。总之,大清洗运动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据后来公布的资料,被处决的干部和党员达 10 万人,被镇压迫害的人达数百万人。

这场大清洗运动,从 1934 年底到 1938 年秋,搞了近四年之久。整个过程时紧时松,前后有两次高潮。在这场运动中,滥用个人权力、破坏法制的现象比比皆是,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党内外造成一种可怕的恐怖气氛,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扼杀了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与此同时,经过这场大清洗运动,斯大林个人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个人专权。这对斯大林模式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形成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斯大林发动的三大运动,是相互配合、互相促进的,彼此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斯大林坚持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要求苏联在 10 年内跑完资本主义国家 50 年至 100 年所走的路,尽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这对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而言(而且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内战破坏,经济勉强恢复到 1913 年水平的国家),是难以承受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高速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为此,斯大林发动了农业的全盘集体化运动,把

个体农民组织成为集体农庄,实行义务交售制,将农村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运行轨道。不论是高速工业化,还是全盘集体化,都是由国家采取强制措施自上而下推行的,这必然引起党内外的普遍不满。为了镇压这种不满情绪,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从而为巩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体制提供了政治保障。由此可见,三大运动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的。其结果是,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苏联模式。

### 第三节 从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模式的原因分析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现象。正如恩格斯所说,重大的历史现象都是各种历史因素合力的产物,即都是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1921年春开始到1929年斯大林宣布实行农业集体化,仅有八年时间;如果从列宁去世算起,则仅有五年时间。是什么原因促使俄共(布)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转而选择并建立起斯大林模式呢?

从主观方面来说,是因为当时俄共(布)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争论的结果,则是选择了斯大林路线。

从客观方面来讲,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进行的,这就是国外的资本主义包围和国内的经济文化落后以及俄国历史传统的沉积。这种客观条件是特定的,选择的余地有限。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被斯大林模式所取代,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应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

## 一、斯大林模式形成的主观条件

这里所说的主观条件,指俄共(布)党内发生的路线斗争及其结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党内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这里,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成分的变化、斯大林个人的因素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观念的教条式理解显然起了重要作用。

### 1. 俄共(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

列宁去世后,俄共(布)党内为什么会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问题上发生激烈斗争,而且斗争的结局是斯大林的路线取得胜利呢?这里必须对当初党内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追溯。

当初,俄共(布)党内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就存在分歧。1921年春,党的十大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在十月革命后的年月里,党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某项决议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例如,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关于工会问题,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像新经济政策这样一项完全不同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在当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反对,一是形势逼人,二是人们对实施这项政策将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变化尚不清楚。果不其然,到1921年秋天,党内就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20年代末。争论的题目,主要是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和目的,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则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及其发展前景问题。当时,党内对新经济政策大致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成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由于遇到不利的国内外条件而做的退却,看成是对小生产者



的让步，他们基本上坚持列宁最初对实行粮食税和准许地方产品交换所做的解释。他们认为，今后的任务是要早日回到军事共产主义那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尤·拉林。尤·拉林曾批评新经济政策，批评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失败，是一种让步，而不是一种令人高兴的成就。<sup>①</sup>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坚决反对国营企业参与市场活动，反对同私人资本实行合作，认为寻求和私人资本合作是妄想，因为私人企业主接手国营企业仅仅是为了谋取暴利。在他的观念里，由国家以实物形式集中和分配国营企业的产品，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属性。他断言，在国营经济成分里，货币关系是多余的，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机体是格格不入的。总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无非是在敌对阶级势力面前的被迫退却，其最终结局仍旧是回到军事共产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同取消新经济政策联在一起，同取消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联系在一起。

第二种解释。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看做是能尽快恢复国家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有效地运转起来，然后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成分排挤和消灭掉的一种办法。他们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已经实行不下去，革命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转向新经济政策可以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仅仅局限于能够恢复经济，而对这一政策引入的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并不重视。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实际上也倾向于这一观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内有两种“发展的自然规律”将会同时起作用，一种是“小商品生

---

<sup>①</sup> 参阅[匈牙利]格·萨穆利著、田大畏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初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151页。

产发展的自然规律”，它“生产”或“再生产”资本主义关系。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它在大生产基础上发展，并不断削弱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包围而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这两个“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后果，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发展起来，从而导致城乡资本主义的增强，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大工业一旦恢复和发展起来，就要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这样两种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政治冲突，而且经济发展愈快，这种冲突到来愈早。在他设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要求实行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广泛的国有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行政措施就成为不可缺少的手段。这种观点比第一种解释稍有“进步”，但它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仅仅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而且认为两种经济发展的结果必定是取消新经济政策，实行全面的国有化和最严格的集中制，并利用行政手段去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成分。因此，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绝不是一种长期的政策。

第三种解释。有些人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只适于国内战争的特殊条件，而不适于和平时期。他们认为，新经济政策引入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能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建立起正常联系，从而互相促进，推动经济发展。而且认为，各种经济成分将通过市场进行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后结局是社会主义力量排挤和战胜私人资本而获得胜利，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哈林。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将通过市场竞争逐渐加强，最终排挤、战胜和改造私人资本。<sup>①</sup> 布哈林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建筑在社会主义

<sup>①</sup>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259—260页。

成分同小商品生产成分进行市场竞争的基础之上,认为这种竞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胜利,但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发展速度是相对缓慢的。这第三种观点,在当时要算是对新经济政策最深刻的理解。它同第二种观点的相近之处是,出发点都是要恢复和发展经济,而不同之点在于,它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其他经济成分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最终取得胜利的,而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无论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观点,甚至第三种观点,尽管它们之间有分歧,甚至是重大分歧,但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制度,商品货币、市场关系与社会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东西,它们等同于资本主义,它们只是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暂时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非社会主义成分的逐渐被消灭,最后将建立起一种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当时苏联党内对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和阐述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晚期,他是倾向于把这一政策当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政策。但是,列宁的思想远没有成为党的领导集团的自觉行动,这从列宁去世后党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摇摆不定,特别是党内立即就是否继续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就可以看出。

如果说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更多地带有个人权力斗争色彩的话,那么他同布哈林的斗争则是一场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主张、两条路线的斗争。斯大林的思想倾向其实更接近于托洛茨基,因而同布哈林发生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斯大林同布哈林的斗争,最终结局是斯大林的路线取得了胜利,于是新经济政策被废止,苏联开始转向斯大林模式。至于当时斯大林一派的路线为何能获得胜利,这同当时领导层的思想状况、

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成分的变化以及斯大林个人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

## 2. 俄共(布)组织原则和党内成分变化的影响

俄共(布)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它的组织原则、活动方式和党内成分的变化,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活动,是在实行封建专制统治的警察国家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组织革命团体的合法条件,一切都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状态。因此,革命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之下进行。这就是俄国革命的具体社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主张建立与第二国际各党截然不同的新型政党,建立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强调在党内实行严格的纪律,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实行集中制。列宁说:“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sup>①</sup>尽管后来列宁强调“民主的集中制”,而且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入1906年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但党的组织并未真正建立在民主选举制的基础之上,集中制仍是布尔什维克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党的最高领导权实际上集中在少数职业革命家手中。在长期进行秘密活动的条件下,以这种“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的党,在推举领导成员、决定政策路线时,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高度集中、强制命令的作风。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一个高度集中、具有严格纪律的战斗组织,也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战斗组织,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党内领导体制一旦确立,加上国内战争时期的特殊条件,使集中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508页。

制有增无减,而且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对后来党的领导体制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导体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对于党内过度的集中制,20年代就有人提出批评,但当时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本来,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如何正确处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坚持民主的表现;少数应该受到保护,也是坚持民主的体现。如果少数派受到批判,受到组织处理,那么党内就不会再出现少数派,党的政治生命就会萎缩。斯大林对党内少数派的处理是错误的。这种党内缺少民主的情况,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后,特别是经过三年国内战争,在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和俄共(布)成为执政党的同时,党政机构迅速扩大了。这就引起党内成分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有过侨居国外经历的那部分革命者相继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由于俄国的具体革命条件,俄共(布)最早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流亡国外的革命者,一部分是国内的地下工作者。前者因为侨居国外时所处的环境比较自由开放,可以自由发表革命言论,在各种场合开展自由争论,因此各种倾向可以充分表现而较少顾忌。这就使他们养成了畅所欲言的民主习惯和民主作风。后者则受国内专制统治的种种限制,难以自由发表言论,难以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各种倾向被掩盖起来而少为人知。这就使他们养成言行谨慎、习惯于服从组织纪律和集中制的作风。因此,这两部分革命者由于革命环境、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大相径庭的思想作风和习惯。在国内的地下工作者大都听得少,见得少,眼界有限,没有接触过国外那么多思潮,思想比较单纯,很少有人以某种倾向分子而闻名,加上由于组织纪律性强,因而很少加入各种反对派。相反,曾经侨居国外的革命者大都见多识广,眼界开

阔，思想活跃，而在组织纪律性方面则大大逊色于国内的地下工作者，加之许多人有过倾向分子的经历，因而后来也更多地参加了各种反对派。从实际情况看，自十月革命胜利到20年代末的历次党内争论，几乎都是由有过侨居国外经历的革命者发起的。列宁逝世后，随着党内反对派的相继失败和斯大林权力的巩固，俄共（布）党的高层领导逐渐由原先国内的地下工作者组成，这些领导人没有经历过侨居生活，民主习惯较差，而组织纪律性和集中倾向却很强，带有浓厚的俄国传统。党的领导层的这种变化，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变化：无产阶级出现“农民化”的现象。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大量来自农村的人涌入工厂，工人数量急剧增加，使工人中的真正无产阶级成分下降，农民成分上升，出现工人阶级“农民化”的现象。由于各级党政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工人中选拔的，这种工人阶级的“农民化”就不能不影响到党政机构的成分结构。这样一来，扩大了党政机构在解决民主问题和国家管理问题时常常会出现一种排斥民主、强调纪律和服从的倾向。此外，农民群众世代迷信沙皇老爷的传统，也促使了个人迷信的形成。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3. 斯大林个人的影响

斯大林模式决不是斯大林个人意志的产物，这一点应当肯定。但斯大林模式具有斯大林个人的深刻烙印，这也是明显的。列宁刚刚去世时，斯大林在党内的权力和影响还是有限的，但随着党内斗争的不断展开和反对派的相继失败，他的权力和影响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当时，在列宁周围的一班人虽然在许多方面都胜过斯大林，但在某些方面却不如斯大林。例如斯大林的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且不说他过去和列宁有过分歧，也不说他同斯大林政见之争

谁是谁非,单说他的生活小节就很不合时宜。正如苏联学者德·沃尔科戈诺夫所描写的:托洛茨基喜欢旅行,喜欢尽情休息,注意保养身体,甚至在内战最困难的年代还要去疗养、打猎、钓鱼。他身边有好几个保健医生。对自己的贵族老爷习气,他一点也不克制。在举行列宁葬礼时,他正在高加索疗养,却不想设法赶回莫斯科。1926年春,他坚持要同妻子一起去柏林求医,政治局劝阻无效,最后还是由他去了。

从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的情况,可以看出俄共(布)中央当时的安排决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缺少更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大林确有超过对手的长处。虽说那时总书记的职权同后来总书记的职权并不一样,但斯大林正是借助这个职位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与影响的。

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信中对中央六位主要领导人一一作了评价,其中谈到斯大林为人“太粗暴”的缺点,建议中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撤换下来。但1924年5月召开十三次代表大会时,党中央全会再次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并得到了代表大会的通过。

从列宁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之日,到十三大讨论这封信,前后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苏联国内、党内及中央委员会内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此代表大会不能不加以考虑。使十三大的代表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列宁逝世前不久,托洛茨基曾在党的建设和经济政策问题上挑起激烈的争论。当时长达两个半月的辩论,使中央委员会出现了对立的两派:托洛茨基一派对新经济政策表示不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一派则维护新经济政策。在代表们看来,来自托洛茨基的危险性显然要比列宁对斯大林的警告更现实,也更重要。因此,代表大会赞成斯大林继任总书记的职务

是毫不奇怪的。

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岁月里,起码有五次可以解除他这一职务的机会。这就是: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2日的中央全会;1926年1月1日的中央全会;1927年12月19日的中央全会;1924年的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扩大会议。而且,其中三次是斯大林自己提出了辞职的请求。斯大林曾说:“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请求中央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代表大会本身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所有代表团,连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也在内,都一致责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年以后,我又向全会提出辞职,但是全会又责令我留在岗位上。我还有什么办法呢?”<sup>①</sup> 在1927年12月19日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说:“我想,直到不久以前,党内的形势还是,党必须把我这个人作为人所共知的、对反对派多少还有些强烈消毒作用的消毒剂放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可是,现在反对派不仅被击溃,而且已经被开除出党。况且我们还有列宁的指示,我个人认为,这一指示是必须贯彻执行的。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sup>②</sup>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稳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由于斯大林接受了列宁的批评意见。有材料说,当时在十三大上,斯大林“在各代表团里说,他承认列宁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并向党允诺,他一定纠正自己的缺点并且以后不论对谁都不再粗暴,不再急躁”。<sup>③</sup> 苏共中央1956年6月《关于克服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151—152页。

<sup>②</sup> 参阅林利英译:《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

<sup>③</sup> 参见[苏联]E·德拉布金娜:《严冬已过》,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7年俄文版,第247页。



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决议也说，在列宁刚去世的那段时期，斯大林“考虑了对他提出的那些批评性的意见”。还有，古比雪夫在1927年乌拉尔州第十三次党代表全体会议的报告中说，斯大林考虑到了列宁的意见并且打算改变对待人的作风。其次，在列宁逝世后的那些年里，斯大林遵守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同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托季联盟反对派的斗争中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当时，全党对反对派没完没了地挑起争论彻底地厌倦了，党内不认为在那些年里有解除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必要。至于30年代出现的那种大清洗运动，在1927年是无法预料的。这是因为，要使斯大林品质性格中坏的一面表现出来，需要具备另外的条件、另外的环境和另外的力量组合。也就是说，列宁去世后那些年的斯大林不同于30年代的斯大林，斯大林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然，如果由其他人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后来的情况肯定会有所不同，起码某些细节和个别面貌会有所不同。

斯大林个人对这一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斯大林社会主义观的影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有许多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认识，诸如“暴力输出革命”、“直接过渡”、“超越阶段”、排斥商品市场关系、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等观点，这些思想认识在同布哈林的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第二，斯大林的斗争策略的影响。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面对拥有强大实力和广泛影响的反对派，非常注重斗争策略，保持低姿态。在当时，由于列宁去世不久，党内外普遍要求停止争论，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可是，反对派一再挑起争论，时而进行检讨，时而发动进攻，使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这是不符合党心民心的举动。反对派当时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官僚主义和党内缺乏民主问题，尽管是有道理的，但把这些问题扩大化并挑起公开

争论,却是极不合时宜的。斯大林抓住反对派怀疑和否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致命理论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把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击败,这样就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的这种斗争策略,对这一模式的形成也是起作用的。第三,斯大林的粗暴作风的影响。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列宁在弥留之际指出,斯大林“太粗暴”、急躁和缺少耐心,希望中央安排另一个人来代替斯大林,“这个人要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sup>①</sup>列宁显然认为,斯大林个人品质的缺陷将会危害党的事业。后来的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些缺陷并没有得到改正,反而有所发展,从而使斯大林模式打上了他个人的烙印。斯大林所犯的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等错误,虽然主要是由体制造成的,但反过来说,斯大林个人品质中“太粗暴”等等缺陷,无疑也大大加重了这一体制的弊病。

总之,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最大的优势在于遇到问题能拿出办法,把握局势。同时,他最大的缺陷在于思维方式中缺少辩证法精神和创新意识,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他像列宁一样对于革命目标具有强烈的执著精神,但是,在灵活性以及采用“迂回方式”接近目标的本领方面,他远不及列宁。他实现目标的方式,是搞“强力推进”,真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他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不足,不是把社会主义建设看成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是把某一特殊时期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固定化、神圣化,上升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和普遍原则加以坚持,不许别人提出异议。斯大林模式的许多弊病正源于此。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 4. 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观念的教条式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以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对未来社会主义做了预测。这种预测同俄国的实际情况是相距甚远的。然而,俄国共产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套用于本国。于是,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的观念作了教条式照搬。这种照搬主要是关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实行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排斥商品货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预测未来社会时,曾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俄国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十分信奉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产阶级以后,将立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要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晚年,列宁明显地倾向于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然而,从整个 20—30 年代看,党和理论界的主流倾向仍然是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当时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货币,不存在市场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自然经济”的形式。例如,就连当时最重视利用市场关系的布哈林也认为,市场关系只适用于过渡时期,一旦社会主义公有制普遍建立起来,就没有商品货币关系。他在 1928 年 8 月所作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报告》就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说:“没有小生产者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地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市场关系和类似的其它事物。”<sup>①</sup>可见,关于商品货币关系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同社会

<sup>①</sup> 《布哈林文选》下册,第 392 页。

主义社会毫不相容的思想,对形成高度集中和排斥市场作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生产资料公有制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根据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要把生产资料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手中,统一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曾经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但在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列宁根据俄国实际,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俄国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社会主义应有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在列宁那里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等人却排斥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片面强调其单一性。按照他的观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允许有任何私有成分存在,它只能采取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只能允许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便大大加强起来,国家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全民财产的惟一所有者,另一方面又集中统一领导着国民经济活动。

从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开始,苏维埃国家加快了对资本主义成分和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到30年代中期这一改造基本完成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认为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破坏作用,主张对它们展开全线进攻,尽快消灭它们;认为城乡个体所有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应予以根除;认为只要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就会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认为国家掌握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是保证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增长的唯一方法。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显然并不符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是教条主义地理解社会主义的结果。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分析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立的。在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只占少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会遇到农民问题。但是，在俄国这样经济落后而农民又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必然遇到一个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在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也容易同农民结成联盟。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种联盟能否继续保持下去呢？也就是说，在小农国家里，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阶级专政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出现的“耐普曼”和新富农。是通过市场经济，让社会主义经济同私人经济进行竞争，还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办法去消灭他们？这就是关系到众多农村人口的大问题。对于如何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列宁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很明显，在列宁看来，专政和民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但更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方面。他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sup>①</sup>也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列宁提出，要通过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来实现工农两个阶级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8页。

的联合专政。这是完全符合俄国实际情况的。

但是，斯大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是片面的。他只强调专政，无视民主。他对农民的政策也是脱离实际的，主张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措施对农民小生产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20—30年代里，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和关于不断强化国家专政职能的理论，对促成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由以上看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成分的变化、斯大林的个人因素以及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等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苏联转向斯大林模式的主观条件。如果再加上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斯大林模式的出现是一种有着某种必然性的现象。

## 二、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客观条件

所谓客观条件，主要是指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从国际环境来说，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包围以及战争威胁的影响；而从国内条件来说，则主要是受经济文化落后与历史传统的制约。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客观条件，斯大林的理论主张和路线也很难取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

### 1. 20—30年代受资本主义包围及战争的影响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显然受到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了生存，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违背常规的方式和方法。20—30年代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其基本态势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战争危险在逼近。这种国际形势，对苏联转向斯大林体制有着重要的影响。

2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革命风暴曾一度席卷欧洲一些国家,似乎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接连取胜的势头。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度十分乐观,而且特别寄希望于德国、英国、法国的工人阶级。列宁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他预计,世界革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胜利,“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sup>①</sup>但是,列宁的预期没有实现,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相继沉寂下来了。1923年德国工人起义失败后的形势表明: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

当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的时候,苏联面临的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斯大林和党中央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

1927年5月,英国宣布断绝英苏关系,同时废止1921年英苏签订的贸易协定。英国这样做,意在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苏维埃国家,并希望其他国家仿效自己的行动,以削弱苏联的国际地位。同时,英国还竭力为组织新的反苏武装干涉创造条件。1927年6月,英国外相张伯伦发起英、法、德、日、意六国外长会议,提出“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这些国际事件,理所当然地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1927年8月初,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反革命的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目前时期最尖锐的问题。苏联和资本主义包围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是目前时期的主要趋向。”<sup>②</sup>1927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趋向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79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卷,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第359页。

活跃起来，他们实行孤立苏联、包围苏联、准备条件来对苏联进行战争的政策。“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sup>①</sup>在当时，这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全党一致的看法。全党（包括反对派在内）都一致认为，“世界战争的威胁正在增长”，“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英国正在准备反苏战争”。<sup>②</sup>

30年代战争的逼近。20年代末30年代初，从美国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动摇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使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摆脱困境，各国纷纷采取措施。有的国家（如美国）采用改良政策，缓和矛盾。有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则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公开叫嚣战争。于是，在欧洲和远东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1931年9月，日本出兵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比亚战争。1937年11月，德、意、日三国达成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形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旨在“协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这就是说，局部战争已经开始，国际局势更加险恶了。

对于这种形势，苏联有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早在十七大会议上，斯大林和党中央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稳定已经结束，各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求出路，“现在又像1914年那样，……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因此，我们应当同时采取一切措施保卫我们的国家以防备突然事变，随时准备捍卫我们的国家以抵御侵犯”。<sup>③</sup>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45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言论》下册，第796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9、270页。



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来说,战争将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俄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于是,俄共(布)党内外产生一种极其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促使苏联不得不优先考虑对付外敌入侵的问题。

可见,20世纪20—30年代的国际环境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正如法国学者让·艾伦斯坦所说:“让我们想象一下1917年以来应由帝国主义负主要罪责的它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创伤(一战、国内战争、二战)吧,研究一下这些事实,这种悲惨的命运,这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难以想象的疯狂进攻,斯大林现象也就不难得到解释了。在这里,并不牵涉到对其所采取的手段作什么辩护或谅解的问题,但对苏联当时所应解决的一些问题的性质以及它不得不克服的困难,却不能不认识清楚。”<sup>①</sup>艾伦斯坦的这个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遭受三次重大的战争灾难,这怎么能不对它的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呢?

## 2. 俄罗斯对现代化的渴望与经济文化落后的制约

十月革命具有双重目标,一是社会主义目标;二是要通过这场革命加快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同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所要求的成熟程度,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十月革命的双重目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俄罗斯对现代化的渴望由来已久。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西欧主要国家要晚得多。只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

---

<sup>①</sup> [法]让·艾伦斯坦著,方光明译,《斯大林现象史》,时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

义才有较快的发展。到 20 世纪初,俄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这个国家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sup>①</sup> 俄国在一战前的基本状况是: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农奴制残余大量存在,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且在工业生产技术和资金方面都严重地依赖于外国。

早在 1900 年,财政大臣维特就上书沙皇,陈述俄国经济技术落后的严重政治后果,认为除非加快工业发展,否则经济落后必然危及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十月革命后,列宁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同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国际上非常稚嫩,而且在国内也很弱小,必须从农民的、庄稼汉的马上,跨到“机器大工业”、“电气化”的马上。列宁的看法是极富有历史远见的。列宁去世后,1925 年苏联共产党提出工业化方针,此后工业化方针逐渐演变成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斯大林的政治口号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要拼命追赶。实际上,斯大林模式的出现是俄罗斯渴望早日改变国家落后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族心声的一种反映。苏联学者布坚科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认为这一模式“无论是从它的实质来看,还是从它的现实理论和实践来看,都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方法”。<sup>②</sup>

俄共(布)领导集团希望加快工业化步伐,早日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制约因素是极其明显的。本来就很落后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2 卷,第 644 页。

<sup>②</sup> 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49 页。

的俄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国民经济又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就总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战争使俄国倒退了几十年,<sup>①</sup>经过几年的恢复,到1925年底,俄国的工农业生产才基本上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可见,俄国大工业的基础还很薄弱,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水平还很低,知识能力也很有限。而且,自然经济的封闭意识占据支配地位,商品和市场观念十分淡薄。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动员和组织人民的能力是旧制度无法比拟的,它可以利用政治优势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但是,现有的经济技术水平毕竟低下,人们的知识能力也很有限,这就严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必然要选择斯大林模式。在当年转向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习经商做买卖,搞经济核算。然而,有人就发出“监狱里没有人教我们这样做”的抱怨。其实,这并不单纯出于政治信念,而是说明当时许多人对经商做买卖这类复杂的市场活动非常陌生。市场商业原则及其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尚不具备,他们觉得采用那种简单化的、行政命令式的产品交换更容易操作,也更容易使人接受。因此,这种文化知识能力的低下也对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苏联学者齐普科在《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一文中说:“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比号召人们学习经商和进行有盈利工作的列宁更能赢得大多数党内积极分子、大多数新的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喜欢。”<sup>②</sup>所以,在20年代的党内争论中,斯大林的理论主张被中央多数派所接受,这不光是由斯

---

① 参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6页。

② 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第317页。

大林的政治权威决定的,这里也有人们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的原因。

在工业化运动开始后,1931年斯大林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1935年又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恰好说明当时非常缺乏知识和人才。斯大林之所以主张高速度和高指标,这里有急于求成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对工业化社会非常陌生和无知。以“一·五”计划的几项重要产品指标为例,先搞了一个“初步方案”,其中规定的指标已经不低,同时又搞了一个“最佳方案”,它的指标更加离谱,但还嫌不够,1930年十六大又进一步提高了指标。结果如何呢?“初步方案”规定的煤产量为6800万吨,“最佳方案”提高到7500万吨,而实际完成的只有6440万吨;“初步方案”规定的生铁产量为800万吨,“最佳方案”提高到1000万吨,十六大又提高到1700万吨,但实际只完成616万吨;“初步方案”规定的钢产量为830万吨,“最佳方案”提高到1040万吨,实际只完成592万吨;汽车产量的“最佳方案”是10万辆,十六大提高到20万辆,实际只完成2.39万辆;拖拉机产量的“最佳方案”是5.5万台,十六大提高到17万台,实际只完成4.89万台。又如,1939年十八大通过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基本经济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个任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有这些事例,都反映出经济文化落后对人们的制约与影响。人们改变现状的要求非常强烈,但是人们现有的知识能力又非常有限。所以说,斯大林模式一方面满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渴望尽快改变面貌的要求;另一方面,斯大林模式对苏联所处国情的种种困难和制约因素又认识不足。

### 3. 历史传统的影响

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经济文化落后，所以历史传统的影响十分强大。十月革命猛烈地冲击了旧的社会关系，但是，旧制度的影响并不能靠一次革命冲击就彻底消除。当革命风暴一过，历史传统的影响就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发挥影响。在俄国的历史传统中，对斯大林体制影响最大的是皇权主义和封建宗法制。

皇权主义的影响。这是同俄罗斯国家成长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联的。在历史上，由于这个国家占据的领土十分辽阔，而且缺少天然防御屏障，因此它总是具有来自亚洲和欧洲两方面敌人侵扰的危机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同无休止的征讨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最初，为了维系民族生存、抵御外来入侵和反抗鞑靼蒙古人的残暴统治，俄罗斯人需要结束诸侯割据局面，渴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一个能够动员组织民众、率领军队抗击外敌的最高统治者。这便养成了他们崇拜皇权和集权制度的传统观念。这种世代绵延的专制统治，使俄国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传统中少有民主的思想，更多的是专制集权的观念。俄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虽然一直在欧洲，但就其文化和历史传统而言，却更多地带有亚洲专制制度的特点。

因此，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俄国社会既没有形成任何独立从事有效活动的社会自治力量，更没有形成足以对国家政权进行监督和参与的政治组织或社会集团。俄罗斯著名贵族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在总结俄国 16—19 世纪的历史时说过一句非常形象的话，他说：“国家日益膨胀臃肿起来，而人民日益贫困消瘦下去。”<sup>①</sup>所以，国家就成为俄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无论是政

<sup>①</sup> [俄罗斯]克留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 3 卷，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7 年俄文版，第 11 页。

治沿革和经济变迁,还是意识形态和宗教活动,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无不由国家发挥支配作用。

由于国家政权和国家意识的最高代表是皇权,因此皇权主义在俄国社会上的影响很深。在沙俄时代,贵族地主阶级是沙皇政权的基础,农民是皇权主义者,资产阶级也支持和依附于沙皇统治,而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则受到严格控制,不能公开进行批评。总之,以沙皇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得到社会各个阶级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它们都普遍地认同皇权主义。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仍然十分有限。从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个人迷信以及凡事依靠行政命令和一切听命于长官个人等等特点,都可以看出俄国皇权主义的深刻影响。

封建宗法制的的影响。在沙俄时代,上面是至高无上以的沙皇为代表的国家政权,下面则是处在宗法制和半宗法制之下的广大农民。由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宗法制及其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农民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极其淡薄。虽然俄国在1906—1907年曾经推行斯托雷平改革,实行土地私有化,个别农户也脱离村社,建立家庭农场,从而出现了个体农户,但是到1928年实行全盘集体化为止,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前后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十月革命前,80%—90%的农民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宗法制的的影响仍很浓厚。至于俄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在阶级成分上同农民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其阶级意识和心理状态也深受宗法观念的影响。这种状况,并未因为十月革命而立即改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留恋和习惯于自然经济,否定和鄙视商业活动;而在政治生活中,则盛行个人崇拜、长官意志、家长制的作风和领导方式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宗法制的传统影响。

总之,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逼近的条件下,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经济文化落后和有着皇权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无先例可循而当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排斥商品生产的情况下,苏联建立起斯大林模式,这决不是偶然的选擇。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当时各种因素“合力”发挥作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 第十六章 斯大林和苏联社会科学 科学的命运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那么社会科学则是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果说,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参与,那么创造精神文明的重任则主要由社会科学来承担。因此,社会科学的状态如何,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形成的时期。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介绍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是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由于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同属学术界,所以除了介绍社会科学界的情况外,也顺便提及自然科学界的某些情况。

### 第一节 斯大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 科学的秘密谈话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就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的形势和任务问题发表重要“谈话”。这次谈话长期秘而不宣,60



年后,即1990年初,苏联学术界才从档案馆发现这份材料,并公布于众。这个“秘密”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关注。<sup>①</sup>

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学术界曾多次举行有关这次谈话的周年纪念活动,可见这次“谈话”的重要。如果把这次“谈话”同其后联共(布)中央公开发表的有关决议及其政策实践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这次“谈话”实际是为苏共确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指导思想,因此其作用和影响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

斯大林的“谈话”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 一、对学术领域形势的估计

斯大林对学术领域形势总的估计是:“反对派”“在哲学、自然科学和某些微妙的政治问题上占据统治地位”。由于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以斯大林集中谈的是哲学问题。他认为,“主要危险是机械论者”,“但是,对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德波林分子要特别警惕。从我们理论战线斗争的角度来看,对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要特别注意”。斯大林在谈话中两次点了自然科学。他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鬼知道他们搞了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之类的东西,而这一切又冒充为马克思主义”。“我们这里撰写的有关自然科学理论的作品有很多物活论的东西。《苏联大百科全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至少是一堆废话。因此,在这里我们面临着

---

<sup>①</sup> “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同斯大林的谈话”(简称“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0,卷宗24。

巨大的批判任务。”<sup>①</sup>

## 二、关于学术战线上的任务

斯大林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任务是展开全面的批判。主要问题是进攻。向所有的方向，向没有进攻过的地方展开进攻”。斯大林提到要“严厉批判”的对象，除了党内一批哲学大家以外，还有当时在党内身居要职的布哈林、梁赞诺夫。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还点了恩格斯的名。他说：“恩格斯也不是全都正确。”“如果我们在这项工作中（指阐述列宁的思想——作者），例如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恩格斯，这不是件坏事。”<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在“触动”恩格斯这一问题上，斯大林确实起了带头作用。1934年7月，斯大林写了《关于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对恩格斯分析批判沙俄扩张政策的正确观点，进行了“反批判”。<sup>③</sup> 应当说，由于问题涉及到了如何评价沙俄政府的大俄罗斯沙文扩张主义政策，而恩格斯对此是持批判立场的，斯大林急不可待，一反他平时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谦恭的”教条主义态度，说什么：“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

<sup>①</sup> “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哲学战线上的形势问题同斯大林的谈话”，现藏于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全宗 17，目录 120，卷宗 24。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斯大林文章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 2—8 页；该文于 1934 年 7 月分发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于 1941 年 5 月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9 期）公开发表。恩格斯文章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22 卷，第 13—57 页。

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的文章——作者)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斯大林还坚决反对联共(布)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 20 周年,首次发表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俄译本。

### 三、明确提出要把学术问题同党内 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当参加会见的一位支部委员向斯大林提出,是否应当把理论领域的争论同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时,斯大林回答说:“可以而且应当联系起来,因为任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斯大林强调,研究唯物辩证法要同“面临的最重要的阶级斗争任务结合起来”,现在“要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依据,并与此联系起来”。“如果使哲学脱离政治,理论脱离实践——那算什么马克思主义。”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一方面承认德波林学派并不曾提供“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但另一方面又给他们戴上“反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分子”、“孟什维克主义的唯心主义者”等致命的政治帽子。斯大林在短短三千三百多字的“谈话”中,竟给他所列举的批判对象戴上 13 顶不同的政治帽子。<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谈话”。

#### 四、提出进行“全面进攻”的方法

斯大林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发动的“进攻”和“批判”，要全面、彻底和不惜一切手段。他说：“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起来的粪便全部翻腾和挖掘出来。应当把德波林派写的全部东西翻腾出来，摧毁一切错误的东西。”对于已经批判过的作家，如普列汉诺夫、尤什凯维奇等，要“重新把他们的作品翻腾出来”；对布哈林要“彻底翻腾”。斯大林特别强调：“应该把所有的东西翻腾出来。为了进行战斗，需要所有的武器。”他批评当时对德波林学术观点的批判“太软，不够劲”，把德波林学派的观点定性为“形式主义者——这个术语太轻，太学术性了，应当加强”；并指示在报刊上公开提出：“他们已经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斯大林在“谈话”中还对在哲学领域如何组织“进攻”力量，“进行战士般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采取组织措施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sup>①</sup>

斯大林在“谈话”中还反复强调，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贡献”。

### 第二节 斯大林“谈话”的背景和动机

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召见哲学界的某些人，发表这样的“谈话”，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动机。

---

<sup>①</sup> 参见“谈话”。

### 一、为了适应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和 建设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先后于1926年战胜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于1928—1929年战胜了以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倾反对派”，与此同时开始取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推行高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即在工业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立国营企业，在农业中消灭富农和实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1930年6月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全面进攻”的口号，要求全国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32年，苏联宣布，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全盘集体化”基本完成，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建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基本形成。为了适应党的路线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这种“大转变”，必然需要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

对于斯大林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上面所说的“大转变”，苏联理论界是没有准备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在经济学方面的权威是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布哈林除了发表《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他主张工农业平衡发展，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反对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提出通过竞争等经济手段排挤和消灭资本主义，通过和平的、

渐进的和进化的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见，布哈林的这些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斯大林的“大转变”路线是不相容的。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实际工作成就与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强调“新的实践产生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新看法。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正是在这次演讲中，斯大林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sup>①</sup>

## 二、为了树立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需要

联共(布)路线和政策的“大转变”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时期，也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形成时期。1929年12月21日，苏联举行庆祝斯大林50岁诞辰的盛大活动。《真理报》在长达一周的纪念活动期间，拨出大量版面报导各地、各方面的祝寿活动。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发表了《斯大林与党》，伏罗希洛夫发表了《斯大林与红军》，带头对斯大林进行歌功颂德，使个人崇拜之风弥漫全国。

斯大林战胜党内各种反对派，政治地位得以巩固以后，亟需在思想理论方面树立自己的权威。斯大林首先向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刀，然后扩展到哲学、史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几乎把所有有碍于在相应学科树立斯大林个人权威的学术权威统统推倒。正如苏联学者所说，斯大林亲自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26页。

目的是要“为斯大林攀登哲学奥林匹斯山扫清道路”，以便把斯大林推崇为“随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泰斗”。<sup>①</sup>根据德波林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回忆，1930 年底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曾向他宣布：“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曾经得到斯大林面授机宜的米丁等人曾强迫德波林在批判他的大会上“把斯大林本人宣布为伟大的哲学家”。<sup>②</sup>

### 第三节 30 年代在学术界进行的大批判和大清洗<sup>③</sup>

斯大林“谈话”以后，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大批判，大批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被戴上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帽子。到了 30 年代后期，曾经受过和一批未曾受过批判的学者和科学家又被加上“人民的敌人”等各种罪名，遭到残酷镇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几乎所有的带头人都未幸免于难。下面介绍的受批判和被镇压的学者和科学家的情况来自苏联 50—60 年代的平反材料，至于苏联后来的平反材料，本节没有引用。

---

① [苏联]尼·尼·马斯洛夫：《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质》，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90 年俄文版，第 56 页。

② [苏联]《苏维埃文化报》，1988 年 6 月 7 日。

③ 本节有关内容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 353—381、851—898 页。

## 一、政治经济学领域

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的突破口。斯大林亲自上阵。如前所述，当时党内经济理论权威是布哈林。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讲中，把布哈林的经济理论概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平衡论”、社会主义“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等，进行系统批判。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又对2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就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争论做出结论。他说，争论双方，即以经济学教授И. И. 鲁宾为代表和以А. А. 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两派，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并上纲说，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sup>①</sup>曾被斯大林点名的经济学家，包括Г. 格罗曼（国家计委主席团成员）、恰亚诺夫、巴扎罗夫、И. И. 鲁宾等人，不仅在学术上受到批判，被戴上政治帽子，而且后来还被指控参与“破坏活动”，遭到逮捕和监禁，大都死于不白之冤。布哈林本人于1938年3月15日被枪决。土地问题的著名专家、老布尔什维克И. А. 泰奥多罗维奇也被捕牺牲。这一时期被处死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和国际活动家А. В. 奥金佐夫，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А. Я. 坎托罗维奇，劳动管理科学专家О. А. 叶尔曼斯基等。土地问题研究所的领导人（如盖斯特尔、克里茨曼等）被逮捕，研究机关随之关闭。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166页。



## 二、哲学领域

斯大林“谈话”以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通过了第三个关于哲学战线任务的决议，取消了以前两个决议中肯定德波林路线“基本正确”的评语，并开始对德波林进行批斗。接着，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改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撤销德波林主编的职务。大批判的浪潮波及整个哲学界，20年代自由讨论和争论的局面再也没有了。被批判的哲学家先被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政治帽子，到30年代后期，几十名苏联哲学家被捕。这其中不仅有原来的“机械主义论者”和“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而且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他们是：А. И. 瓦利亚什、И. К. 卢波尔、В. Б. 米柳宁、И. 拉祖莫夫斯基、Н. 卡列夫、В. 鲁达什、С. 彼丘金、Л. 蒂米扬斯基、А. Р. 麦德维杰夫、М. 富尔希克、Л. 德米特里也夫。这些人及其他许多人均遭迫害，其中多数人包括斯大林在“谈话”中点名的哲学家，均被处死。

斯大林在“谈话”中点名批评的 Я. 斯特恩原是斯大林的哲学老师，是列宁时代的著名老党员。1925—1928年，他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解黑格尔辩证法。受到斯大林批评以后，斯特恩被开除了党籍。1937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斯特恩遭逮捕，不久被处死。

## 三、历史学领域

历史学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学科之一。在该学科中，斯大林也是亲自出马。例如，1930年，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个普通学者斯卢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布尔什维

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章在充分肯定列宁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提到列宁战前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性有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在苏联 20 年代学术界自由讨论时期，这样的提法并不算什么严重问题。但是，斯大林为此于 1931 年 11 月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此文提出“坚决抗议”，并给作者和一系列史学家戴上了“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伪造者”等政治帽子，说该杂志发表此文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sup>①</sup>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一年，编辑部被改组，同时开始对全国所有已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史学著作进行审查。

像其他学科一样，史学界的大批判逐渐发展为政治迫害。例如：俄国史和革命运动史专家 M. H. 波克罗夫斯基是 1905 年的老党员，十月革命后曾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30 年还被选为俄共中央执行委员，在大清洗中，他和他的学生以及赞同他的观点的人被宣布为“托洛茨基分子”、“暗杀者”和“恐怖分子”而遭逮捕。著名历史学家、《消息报》最早的编辑之一 Ю. М. 斯切克洛夫也成了大镇压的牺牲品。著名党史学家、最早的列宁传记作家和《列宁全集》最早的编辑、马恩研究院副院长 B. Г. 索林也被处决。党史专家、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联共（布）中央委员 B. Г. 克诺林被枪决。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H. M. 卢金院士在 1936 年被逮捕并死于非命。这一时期牺牲的学者还有其他著名历史学家和党史专家，如，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 H. H. 波波夫以及 H. H. 瓦那格、С. 彼恩特科夫斯基、С. 班特科、Г. С. 弗里德利扬德、Э. 魏斯、B. M. 达林、Ю. Т. 铁沃斯扬、С. И. 柯尔舒诺夫等。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12 卷，第 76—77 页。

还有历史学家 C. 洛特、C. M. 杜波罗夫斯基、И. 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M. 凯尔迪什，等等。

#### 四、教育科学领域

教育科学领域也受到强烈冲击，而且情况也同样悲惨。许多人民教育的奠基人被处以死刑。例如，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 M. C. 爱普斯坦、荣获红旗勋章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委会成员 M. A. 阿列克辛斯基。牺牲的还有著名的教学法专家、科学工作者和组织者，如：A. И. 平克维奇、C. M. 加米涅夫、A. И. 绍欣、M. M. 彼斯特拉克、C. A. 盖希诺维奇、M. B. 克鲁平宁娜等。1937—19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都被摧毁了，其中遭到镇压的不仅有教育部门的许多干部，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劳动研究所所长 A. 加斯乔夫被捕和被镇压后，劳动研究所也被关闭了。教育学、心理学及劳动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都停止了。

#### 五、语言学和文学艺术领域

语言学和文学领域也受到了重大损失。30年代初，由于所谓“斯拉夫学家”错案，包括 B. B.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在内的著名语言学家都曾被捕入狱。大清洗时被处以死刑的语言学家有：列宁曾为其入党担保的基辅语言学院院长 H. M. 西雅克，优秀的语言学家和东方问题专家 H. A. 涅夫斯基等，后者所著《通古斯语言学》在1962年被追授列宁奖金。

文学艺术界遭受的损失异常惨重。1936—1939年，被捕的作

家达六百多人，占作家协会全体会员的三分之一。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被处死。大多数人牺牲时，年龄不满40岁。遭到镇压的还有许多画家、电影工作者和音乐家。

## 六、自然科学领域

斯大林“谈话”以后，对自然科学的批判也开始了。一些科学思想、科学流派遭到批判，相应的学术杂志和著作被禁止发表和出版，有些学术机构被解散。量子物理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原理的学说、谐振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被宣布为“唯心主义”，控制论、逻辑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此外，诸如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均被禁止研究。

生物学的命运最为悲惨。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大多数生物学家被戴上“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奴仆”的帽子，并遭到镇压。著名遗传学家、乌克兰科学院院士И. И. 阿戈尔教授被捕并被处死；苏联医学遗传学的权威、医学遗传学研究所领导人С. Г. 列维特也牺牲了；著名的达尔文专家和自然科学史专家Я. М. 乌拉诺夫斯基教授也遭逮捕。

农业科学也遭到厄运。苏联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А. И. 穆拉洛夫院士被枪决；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研究所的领导人也因“从事暗害活动”而被镇压；曾获得列宁勋章的大科学家Г. К. 迈斯特尔院士也遇害了；最有名的生物学家之一Н. К. 柯利佐夫受尽侮辱后被撤职，不久去世。对生物学家和农学家的迫害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完全停止。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Н. И. 瓦维洛夫院士于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他的已成长为

著名教授的学生都被捕了，其中幸存者只有一人。

1937—1938年间，由于批评斯大林支持的农业草田轮作制，农业部轮作制局、计委、全苏肥料研究所的许多领导干部和研究人員被捕，并被处以死刑。杰出的科学家、共产党员 H. M. 土莱科夫也由于反对草田轮作制而被捕，后来死在集中营。大化学家 И. P. 秦查泽也牺牲了。

遭受重大牺牲的不仅有遗传学、育种学和农业化学，而且还有生物学的其他学科，特别是微生物学。遭逮捕的著名微生物学家有：И. Ф. 兹德拉多夫斯基院士、B. A. 巴雷金教授、O. O. 加尔多赫教授、И. Л. 克里切夫斯基教授、M. И. 施图采尔教授。微生物学方面的大学者 Л. A. 季利别尔、A. Л. 舍波尔达也娃、Г. И. 萨佛诺娃等人也被捕了，其中许多人在狱中身亡。著名微生物学家 Г. A. 纳德松在北方的一个集中营里死去，他被捕时已是 73 岁高龄。30 年代中期曾任海洋和渔业研究所所长的生物学家和植物学家 A. A. 米歇也夫在集中营里被毒打致死。同时牺牲的还有著名生物学家 И. И. 菲利皮也夫，昆虫学家 A. B. 兹纳缅斯基、H. H. 特罗伊茨基，等等。

在物理学方面，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头人都遭到批判，如 И. E. 塔姆、B. A. 福克等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院士的学者都被捕了，如：A. И. 贝格、Л. Л. 兰道、И. И. 卢基尔斯基、Ю. E. 鲁麦尔等等。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著有传世之作的 M. И. 布朗施坦被枪决时才 32 岁。当时最著名的机械学专家 A. И. 涅克拉索夫院士也曾被捕。被捕和身亡的学者和专家还有：理论物理学家 B. K. 弗雷德里克斯，机械学及数学物理学专家 Ю. A. 克鲁特科夫，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 C. И. 舒宾，非线性振荡苏联学派创始人之一 A. A. 维特及物理

学家 H. H. 施皮利雷恩,等等。

数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也非常尖锐。1936年,著名数学家、当时最大的莫斯科数学学派的奠基人和领导者 H. H. 卢津被宣布为数学战线上的“黑帮分子”、“反革命”,随之,整个学派被宣布为“反动的”和“资产阶级的”。

在自然科学其他领域,也损失了许多很有才能的科学家和教授,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了。

### 七、应用科学领域

应用科学知识分子,包括有名的科学家、发明家、设计师、厂长、总工程师等也遭到大规模的镇压。例如,中央气体液体力学研究所所长 H. M. 哈尔拉莫夫及该所大批研究人员都曾被捕入狱。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A. H. 图波列夫、B. M. 佩特利亚科夫、B. M. 米雅希谢夫、Л. Л. 托马舍维奇、P. 巴尔蒂尼、K. 斯齐拉尔德、H. Г. 涅曼等也遭到迫害,实质上,苏联航空科学的全部精华都被关进了监狱。为了使飞机制造业不至于停顿,苏联不得不在监狱里建立一个代号为中央设计局(第29号)的研究所。在这里工作的除了上述飞机设计师外,还有大批有名的飞机主件设计师以及许多与飞机有关的边缘学科的杰出工程师和专家。这些专家只有一部分在1940—1941年间被释放了,还有一部分人是战后释放的。许多人是死后在苏共二十大后被平反的。

苏联第一代火箭专家许多人也在30年代末被处死,其中包括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发明人、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 H. T. 克莱麦诺夫和他的助手、“卡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 Г. Э. 朗格马克。大批军械设计师和工程师遭到镇压。苏联火箭总设计师 С. П. 科罗廖夫在

30年代也曾被捕入狱，在监狱的研究所里工作很久。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镇压的重点之一是老的技术知识分子。当时苏联报刊甚至发表这样的声明：应该毫无条件地认为，旧工程师中95%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绪的。到30年代后期，镇压的主要目标是党内专家。例如，重工业部的200名大型机器制造厂厂长中，198名是共产党员，但是到1939年，这些大型机器制造厂几乎所有的厂长都被捕了。

#### 第四节 学术界大清洗的后果

##### 一、形成了苏联模式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

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时期，同时也是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形成和苏共领导社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立和固定化的时期。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和苏共领导社会科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1)把社会科学视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立自上而下的集权的管理制度。斯大林时期，除了有政治局委员专管意识形态工作外，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问题都由斯大林亲自抓。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已形成制度。对社会科学和其他文化事业实行全国范围内的集中管理。苏联解体以前，一直有一个凌驾于其他同类研究机构之上的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对书报检查方面，实行严格的送审和事先检查制度。此外，无孔不入的克格勃也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个角落，从而在社

会科学领域建立了被苏联学者称之为“阿拉克车耶夫<sup>①</sup>式的军警统治制度”。

(2) 社会科学处于封闭状态,自我隔离于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之外,企图在一个“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科学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统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所有,并加以全盘否定。30年代后期,有些苏联科学家为免遭镇压,利用出国的机会,滞留不归,所以自那时起,当局就最大限度地削减了苏联科学家出国的机会。社会科学同外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3)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社会科学主要领域的“发明权”和做结论的权利,完全由领袖人物一个人所垄断。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最高领导人的著作和言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被认为是真理的不是那些符合实际和经过实验的东西,而是那些经过‘斯大林同志’所肯定的东西才是真理。”<sup>②</sup>

(4) 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强调必须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即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禁止科学问题的自由探讨和争论。对发表不同意见者,轻则进行政治批判,重则诉诸暴

---

<sup>①</sup> 阿·安·阿拉克车耶夫(1769—1834)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推行警察专制制度的重要人物。

<sup>②</sup>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第852页。罗·亚·麦德维杰夫生于1925年,历史学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1969年因其作品流入西方被开除出党。1989年恢复党籍,同年在苏共28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91年10月苏共被禁止后,组建“俄罗斯社会主义左派党”,为该党两主席之一,同时积极参加重建俄共的工作。此后,他继续著书立说,批评当局的政策,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俄罗斯是走不通的。



力。斯大林逝世以后,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得到制止,但是以言定罪、滥设“文字狱”的情况并未根除。例如,直到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时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进行肉体折磨的事。

(5)如前所述,理论认识和概括被最高领导人一个人所垄断,研究人员不敢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只能对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做注解和普及性工作。对领袖人物著作的引证代替了独立的理论思考和对现实问题的创造性研究。由此而来的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僵化。“社会科学”无“科学”可言,广大科研人员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哲学和社会科学无所作为的后果必然是:领袖人物的思想由于成了无源之水而枯竭,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思想和社会发展本身的停滞。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学风,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化”、“实用主义”和“奴隶主义”。正如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苏联学者所说:“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把列宁的某些原理绝对化,这些原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政治、历史情况下就不适宜。实际上,斯大林对理论的态度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斯大林主要地不是从现实情况中引出某些原理,而是强使理论迎合主观愿望,让理论去服从另外的情况,把理论政治化。此外,斯大林既在党的干部中,也在科学工作者中培养一种奴隶主义的对待理论的态度。除了斯大林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任何理论观点提出异议或进行修正,尤为甚者,对斯大林本人提出的原理也要这样对待。对这些原理只能奴隶式

地遵循，而不许离开半步。”<sup>①</sup>

## 二、严重阻碍了苏联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新学科的建立

30年代在知识界的批判和清洗，不仅使成千上万的知识精英丧失生命，而且使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受到非常消极的影响。

经济科学在20年代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斯大林上述“谈话”以后，苏联对经济科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几乎没有进行研究。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全国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2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才得以问世。这本书实际上是把30年代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做法和经验，如关于工业国营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并作为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本书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sup>②</sup>这本观点明显偏颇、禁锢人们头脑的教科书统治苏联经济科学领域近四十年。

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接触社会政治和经济材料，特别是历史档案材料的机会愈来愈少，已不可能独立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创造性地分析历史事实。在历史读物中，充满“政治空话”和对斯大林的歌功颂德。1938年出版的曾被捧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的

---

<sup>①</sup>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下），第877—878页。

<sup>②</sup>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73页。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完全是为推崇和颂扬斯大林、证明斯大林一贯正确服务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版的有关苏联党和国家历史以及斯大林传略的著作中,歪曲和伪造历史的现象非常严重。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又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历史。唯意志论、片面性、掩盖历史真实,成了苏联史学不可克服的痼疾。

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退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顶峰,并被列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成为著名的“四章二节”。其实,这本小册子和斯大林的其他哲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阐述和发挥有明显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某些地方甚至有歪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斯大林哲学著作的学习取代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深入领会和研究。对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思维规律和科学方法等都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几乎停顿,哲学不去研究活生生的事物和科学资料,特别是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使哲学变成了烦琐哲学、经院哲学。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的辩证唯物论必须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哲学家可以随意给不合自己心意或自己不懂的自然科学戴上“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帽子。这不仅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哲学自身的发展。

法学领域的状况极不正常。在个人迷信年代,法学不是捍卫法制和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科学,而是成了为破坏法制的专横行为辩护的工具。在法学领域,盛行各种错误观点,例如,法庭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只要有某种程度的概然性即可);如果法律“落后”于生活,就不再使用;同伙必须对集团的全部活动负责;证据充足不是各种罪证的总和,而是被告的招供,等等。斯大林把加强法制片

面强调为强化镇压措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法律制度被扭曲还表现在,只要最高领导人一提议,立法部门就会立即制定任何一项法律。这里且不说在实践中对宪法和法律的践踏。

总而言之,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发展都遭到了阻碍和破坏。同时,在国外已经非常发达的学科和新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以及许多边缘学科,在苏联都无法建立。

### 三、延误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例如,控制论由于是“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禁止研究,结果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使苏联计算机技术几乎比美国落后两代。由于西方在有机合成化学方面的新知识被视为“唯心主义”而被拒绝引进,从而造成苏联在许多新的合成原料的生产方面比西方落后七年到九年。至于斯大林推举李森科,批判魏斯曼主义,造成生物遗传学的落后,其后果也同样很严重。

### 四、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成为后来 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1)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规律,其功能是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我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基础。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其本质就是创新。应该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社会科学是非常重视的,但是由于领导社会科学的方法、政策和路线不对头,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所以尽管科研人员队伍非常庞大,但社会科学并

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特别是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的功能。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创新功能,紧跟现实生活的变化和时代的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提出新理论,创造新制度。如果说,3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也算是一种“制度创新”的话,那么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把这种体制神圣化和固定化,苏联共产党继续创新的精神越来越少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其它创新。”<sup>①</sup>苏联共产党失去了创新精神,它所领导的国家也因此逐渐失去前进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由兴盛走向衰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苏联社会科学管理体制以及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科学领域的路线和政策导致了苏联社会科学发展的停滞和扭曲。苏共的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科学长期被教条主义所统治。教条主义者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给以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不管苏共用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向社会灌输它的理论,仍然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应有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人所共知的“信任危机”正是这样产生的。在苏联,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产生了“信任危机”,开始是针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到了70年代,对苏共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理论长期是靠

---

<sup>①</sup> 江泽民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6月22日,第1版。

国家的强制力量支撑的，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所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舆论多元化”的情况下，在各种思潮的进攻面前，这种思想理论体系一触即溃。人民群众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和宣传，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本身。可见，苏联共产党的失败首先是从党在思想理论上失去先进性开始的，而这一点又同社会科学的状况直接有关。

(3)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余年，但是没有解决如何正确领导社会科学这一问题，也没有处理好如何正确对待社会科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问题。如前所述，在政治上，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中，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再加上其他限制，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施展聪明才智、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良好条件和环境。因此，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向右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加剧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苏联共产党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达73年之久，却没能解决如何正确领导社会科学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悲剧。

## 第十七章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

斯大林模式,是指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初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简称苏联模式。斯大林去世以后,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苏联历届领导人对这种模式进行了一定的改革,然而直至戈尔巴乔夫宣布实施“全面的根本的改革”以前,这些改革只属于局部改革范畴,斯大林模式仍然是苏联模式的基础。因此,深入地分析斯大林模式,不仅是深入研究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而且是深入研究整个苏联兴亡史的关键。

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包括些什么?中外学者历来都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主要指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特征,包括它的发展模式的特征。第二种说法:除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机制的特征之外,还包括斯大林及其追随者的思想理论。根据这种广泛的模式定义,把理论、思想观点也列在斯大林模式特征之列。<sup>①</sup>我们认为,体制、机制与理论思想是分不开的,要分析斯大林模式的特征,必然要分析它的理论思想。然而,如果把斯大林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也列进这一范畴,这太复杂了。我们应该划分两个范畴:一个是斯大林模

---

<sup>①</sup> 参阅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序言,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式的特征,一个是它的理论基础。把这两个范畴区别开来加以分析和论述,可能会更适当些。

##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即贯彻于整个模式之中的总特征,贯彻于这个模式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各个分模式(如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思想文化模式)的共同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高度集中,或称高度集权。权力配置是任何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集中什么东西,主要是集中权力,因此,高度集中的实质是高度集权。这个特征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最终集中于联共(布)中央,实际上常常集中于党的领袖斯大林个人。

第二,是军事性。这个模式的发展目标,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备战性质,后来则发展成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霸世界。这个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制都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有些学者据此称之为战时体制或备战体制。

第三,是封闭性。这个模式不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下,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封闭式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抗;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分割;在思想文化上,在“批判世界主义”的旗号下,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在这三个基本特征中,最根本的是高度集中;军事性的实质与高度集中是一致的,而封闭性则是高度集中的一种必然表现。因此,可以说,第二、第三个基本特征都是从属于第一个基本特征的,



或可以说,是从它派生出来的。

现在国内外的理论著作中,对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大约有九种概括:(1)超级集中或超级集权体制;(2)行政命令体制;(3)兵营式社会主义;(4)国家社会主义;(5)早期社会主义;(6)专横官僚体制;(7)战时体制(或备战体制);(8)极权主义体制;(9)共产主义极权体制。

上述九种斯大林体制的定义,反映着各类学者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不同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大体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尽管对这种体制持批判态度甚至是很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仍然认为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如“超级集中体制”;“行政命令体制”;“国家社会主义”;“战时体制”等。第二类,不承认这种体制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如“专横官僚体制”、“极权主义体制”;第三类,从反面的、否定的政治立场出发,承认它为社会主义模式,如“共产主义极权体制”。

然而,上述九种定义有一个共同点,即实际上认同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例如“国家社会主义”,突出的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国家管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即社会国家化,而这种国家化的实质就是高度集中,国家化是高度集中的主要表现。再如“战时体制”,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因此,把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高度集中,是较妥当的。集中与民主、集权与分权是统一事物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对立面。任何的政治经济机制都缺少不了这两个东西。这两者的不同组合,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模式。“高度集中”有别于“中度集中”,更有别于“低度集中”,而斯大林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或称高度集权。

## 第二节 斯大林经济模式的特征

斯大林经济模式，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模式，此外，还包括经济发展模式。

人类历史上的经济体制模式，基本上分两大类：自然(实物)经济与市场经济，以及介于这两类经济之间的过渡经济模式。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是社会主义自然(实物)经济模式，又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模式。由于这种经济模式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组织社会经济生活，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因而西方经济学家又称之为“命令经济”。这种模式有别于世界上各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模式，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高度集权的国家统制经济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与世界各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不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而是国家(通过政府)。首先，国家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资源和资本，控制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其次，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组织和调节全国的产品生产、分配和流通。“全社会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组织生产和分配。”

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统制经济的形式，是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即在中央、地方和企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方面，把权力高度集中于按专业划分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中央直接控制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例如，1936年苏联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地方管理的仅占10%。

在中央与企业关系方面，中央直接管理企业，建立二级(中央

一企业)或三级(中央—托拉斯—企业)管理体制。大部分企业(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企业)实行二级管理制,一部分企业(冶金、燃料工农业企业)实行三级管理制。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和供、产、销的大权。企业的厂长由中央委派,企业的财政收支要经中央批准,企业的物资供应要由中央统一调拨,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月度计划都要由中央审批,甚至“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在这种体制下,条条专政,部门林立。斯大林执政时期,1941年苏联共有17个盟部和8个共和国部。1950年,中央工业部门数量进一步增长,苏联部长会议直属的国家委员会及主管部局共七个: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国家先进技术委员会、中央统计局、国家银行、国家建设委员会。全联盟工业部共16个: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站部、冶金工业部、航空工业部、造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机床制造部、机器仪器制造部、运输机器制造部、兵器制造部、电工器材制造部、重工业工厂建筑工程部、机器制造部、建筑工程部、邮电用品制造部。联盟兼共和国工业部共六个:轻工业部、鱼品工农业部、肉类乳品工农业部、食品工业部、木材及纸张制造部、建筑材料制造部。

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第二个特征,是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

这是斯大林经济体制的核心。在这种体制下,与现代世界各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不同,实行的是经济指令性计划。社会资源的配置不是依靠市场调节,不是依靠市场的实际需要,而是政府作出所有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决策。其特点是:(1)按政府制定、批准的计划组织生产、分配和流通,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强制执行。(2)排斥除农村集市贸易以外的任何市场调节。市场调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为社会主义经济所不容。(3)保留某种特殊的“社会主

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它主要是起着经济核算手段的作用。这种特殊的商品货币关系也要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加以越来越严格的限制，逐渐归于消灭。

指令性计划渗透到苏联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古比雪夫所说的：“在我们的计划制度中，我们已经走得这样远，这样深，以致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文化或科学研究部门还在计划之外和在计划工作范围之外。”<sup>①</sup>从宏观调节到微观管理的各个环节，从中央一级到基层的所有层次，从工业、交通运输业到农业的所有经济领域，从生产、分配到交换的所有方面，指令性计划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成了高度集中体制下苏联经济生活的一大特色。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种体制称为“命令经济”是有根据的。

斯大林经济体制的第三个特征，是以行政手段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方法。

在这种体制下，与市场经济不同，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方法是行政手段。国家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经济组织、企业发生联系，组织全国的经济生活。生产的任务、分配的方案、流通的方式、企业经理的选择、职工的安排，无一不通过行政手段调节和实现，而“长官意志”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种体制下，在经济管理中排斥经济方法。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层次，排斥运用税收、贷款、财政、利率、汇率等间接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在企业微观管理层次，排斥利用价格、利润、竞争等经济手段改进管理，发展生产。总之，这种体制完全排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对看得见的那只手，也只是使用半只——直接的行政

---

<sup>①</sup> 《古比雪夫言论选集》，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3年俄文版，第226页。

管理手段。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但它实质上往往是一种单纯的计算手段、监督完成指令性计划的一种工具、行政管理方法的一种补充。

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上述三个特征,反映在苏联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制体制、分配体制、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农业体制、价格体制,等等。举凡经济各领域的运转机制,无一不明显地带着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

所有制体制。其特点是:(1)实行清一色的公有制,完全排斥非公有经济成分。1932年,苏联工商业中的中小私有企业即被完全消灭。到了30年代中期,与外资的合营经济基本上被消灭了。1937年,还有为数甚微的个体经济“残余”,在全国的生产基金中仅占有0.4%,这些个体经济“残余”是作为“特殊情况”而被允许暂时存在的,它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中沒有合法的地位。这种体制由于排斥了非公有经济成分,从而也就排斥了多种经济成分,排斥了任何的混合经济,视这些经济形式为异物。(2)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统治形式。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两种形式,而前者被认为是高级形式,后者是低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占绝对的统治地位,集体所有制从占宏观经济的比重、生产领域的选择到生产资料的占有等方面均被严格限制。据1936年统计,在全国生产基金中,国家所有制占的比重为90%,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的比重为8.7%;在工业产值中,国家所有制的比重占97.3%,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占2.6%;在农业产值中,国家所有制占76%,集体农庄所有制占20.3%。不仅城市生产资料国家化,而且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也国家化,农业机器设备(拖

拉机、收割机、汽车等)都集中在国家企业——机器拖拉机站手中。(3)国家所有制企业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绝大部分企业都由中央直接管理,中央直接掌握着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人事权、计划权、财政权和产品分配权。

分配体制。这是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特点的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到国家预算,通过政府按统一计划实行再分配;职工的收入不依赖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市场经济效益,甚至不与生产的最终成果挂钩。这个体制主要分两部分:(1)工资管理体制。工资的管理权和决策权都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3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实行新工资等级制度和修订产量定额的决议,明确规定:“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中央管理机关、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非经苏联人民委员会直属的经济委员会同意,不得颁发有关工资问题的指令,不得实行新的工资等级表、工资率、技术等级表和职务工资表。”同时,在所有企业中实行行政管理的工资等级制。工资等级制度的工资形式分为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工资制。不管是计件工资制,或是计时工资制,其基本原则都是把工资划分等级,都由上级机关用行政手段制定出工资等级、技术等级、工资标准。职工工资级别主要由行政领导评定。(2)社会消费基金制度。所谓社会消费基金,是指国家用于居民的公共福利的基金,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保险,赡养老人和残疾人员,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对居民的各种补贴(如房租补贴)等。这一部分基金的分配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需分配,由国家集中管理。这套制度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定型的。斯大林时期,社会消费基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的比重逐步提高,1933年占22.1%,1937年占29.1%;按人口平均计算,1932年每人从消费基金获得的收入为

61.73 卢布，1937 年增至 234 卢布。社会消费基金构成居民实际收入的重要部分，是对个人货币工资的极重要的补充。据 50 年代初的资料，由于这个制度，苏联居民一年的实际收入要比他们的个人货币工资约多三分之一。

计划体制。这是一个从上而下的指令性的计划工作运转机制，是实施“命令经济”的神经中枢。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1)庞大的计划管理机构体系。首先是各级政府的计划委员会系统。其任务是：编制国民经济长期计划、年度计划与季度计划，提交苏联人民委员会审查；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提出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各局和各加盟共和国编制的长期计划、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的总结；检查已经批准的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等。其次是部门（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计划机构系统。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本部门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和年度、季度、月度计划的草案，并极据政府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的任务编制和审批所属企业和组织的经济计划或其他类似计划；根据国家计划任务，按照一定的指标给企业确定月度任务，并采取措施保证完成计划；努力改善本部所属各总管理局、局、处、托拉斯、企业和组织的计划工作等。中央各部除自己的计划机构外，其所属的各总管理局、企业也设有自己的计划处或计划科，组成庞大的部门计划机构系统。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一方面通过中央各部门的计划机构系统指挥着成千上万的中央直属企业的计划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级地区计划委员会系统实际上指挥着数量众多的地方工业企业，实现着从一个中心、通过两大系统的几十万个大小计划机构计划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这是高度指令性计划体制的一大特色。(2)无所不包的计划指标体系。这是指令性经济运转的重要手段。在这种体制下，国家通过各种指标下达指令和生产任务，又通过各种指标对

企业实行监督和检查。随着苏联的计划体制的形成和完备,计划指标的范围越来越广,开始仅限于生产指标,后来增加了财务指标,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又增加了技术经济指标。50年代初苏联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时,规定的工业产品目录已达五百种左右,而在年度计划中这类指标的数目则达一千五百种左右。国民经济平衡表和定额是编制计划、确定计划指标的两个重要方法。(3)高度集权的计划编制程序。这个程序的特点是:从中央来,回到中央去,中央紧紧掌握编制计划全过程的决策权。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和政府的指示编制关于计划的指示和控制数字,下达各部门、地方各级计委和企业;各部、各级地方计委和企业依据这些指示制定自己的计划草案并逐级上报,国家计委在此基础上编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经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然后逐级下达。总之,一个中央政府直接指挥的庞大的计划机构体系,一套庞杂的指令性指标体系,一套保证严格贯彻中央政府意志的计划编制方法,这些构成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体制的主要内容。

财政体制。国家统收统支是这种财政体制的特点。统收:国民收入高度集中于国家预算(占国民收入的50%以上);国家预算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预算占70%以上);国家以行政手段保证财政收入,例如,通过政府法令把财政收入的两大来源(周转税和利润提成)直接列入企业产品成本。统支:国家实行统一的预算拨款制。发展国民经济的基金主要依靠预算拨款;新建项目的基建投资全部来自预算拨款;企业扩大再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预算拨款。企业的财政自主权非常少,主要有三项:(1)厂长基金。从企业利润



提取4%建立(仪器工业、轻工业和地方工业则提取2%);<sup>①</sup>(2)折旧提成。提成率为5.5%—6%，而且除用于大修部分外(不到一半)，由中央部门管理;<sup>②</sup>(3)少量的利润留成。利润留成制仅在不实行周转税制的一些无盈利或少盈利工业部门的企业实行，而且留成率仅占20%左右。因此企业基本上处于财政上无权地位。

信贷体制。信贷高度集中化是这种体制的特点。(1)信贷渠道单一化。国家取消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把信贷业务集中于国家银行。设立苏联国家银行、三个投资拨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公用事业和住宅建设银行)、一个外贸银行和国家劳动储金局。全部短期信贷都集中到苏联国家银行，长期信贷则归三个专业银行管理。(2)信贷计划化。各部门、各企业的信贷都纳入国家的财政计划，由国家银行和各专业银行按计划发放。

物资、技术供应体制。这是一种供给制式的体制，即国家通过庞大的供销机构集中管理产品的供给和销售，排斥市场调节的作用。(1)实行国家供委集中领导、分级管理体制。第一级是苏联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简称供委)，它负责向各个部门、主管机关和加盟共和国分配物资供应额度，但“不负责执行实现物资供应计划的职能”，即不负责直接分配产品。第二级是各经济部门，负责制订本部门的物资技术供应计划，并直接负责物资技术的调拨。第三级是地方物资技术供应机构，包括各加盟共和国、州、市、区的物资技术供应机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采购非集中计划分配的物资，向

<sup>①</sup> 参见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工业企业的厂长基金》的决议，载《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指示汇编》，第3卷，莫斯科：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58年俄文版，第120—121页。

<sup>②</sup> 《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指示汇编》，第2卷，莫斯科：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俄文版，第530—531页。

地方工业企业供应生产资料。第四级是企业的技术供应处(科)。与供应系统并行的还有销售系统。在分级管理体制中,决定性环节是中央一级,物资技术计划权、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级(国家供委和部门供销管理机构),中央一级直接掌握的统配物资和集中分配物资占全国物资技术供应总额的绝大部分。(2)实行按计划签订经济合同的物资调拨制。其办法是:订货单位向国家供应机构提出订货单,国家供应机构指定供货单位,由订货单位和供货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合同规定供货品种、数量、质量、交货期限以及仲裁措施。总之,在这种体制下,既无生产资料市场,也无劳务市场,消费品商业零售经过“有组织市场”(国家以行政手段统一规定消费品价格,同样排斥市场调节)供应。这种体制实际上是一种由国家组织的产品交换体制,是一种供给制式物资供应体制。

农业体制。国家严格控制是这种体制的特点。(1)国家严密控制的农业所有制体系。农业所有制有三种形式:国营农场、机器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前两者是国家所有制,后者是集体所有制,此外,还有作为集体所有制补充的个人副业。从生产资料的占有看,集体农庄处于国家严密控制之下。第一,国家占有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是国家所有的;农业机器,如拖拉机、收割机、汽车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二,集体农庄仅能占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役畜、农具(犁、播种机、耙、打谷机、割草机)、种子、饲养公有牲畜所必需的饲料,以及农庄经营所必需的经营用建筑物和农产品加工企业。(2)高度集中的农业计划体制。国家通过各级农业机关向集体农庄下达大量的指令性指标,包括各种作物播种面积、产量、轮种指数、牲畜头数、畜产品率、农产品收购量,直至生产方法、技术措施以及农庄内部各单位的编制,等等。同时,国家通过机器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签订的合同贯彻国家计划,直接参与农庄的生产管理。这种

合同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机器拖拉机站设有“相应的机构”监督集体农庄完成农业生产计划。机器拖拉机站被称为“国家对集体农庄农业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社会主义国家手中的对农业进行计划领导的强大杠杆”。(3)国家半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产品的收购体制。国家收购有三种形式：义务交售制(1937年占40%)；农庄支付给机器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1937年占42.1%)；国家收购多余农产品。义务交售和实物报酬占农产品收购量的80%以上。这两种收购形式的特点是国家半无偿或近乎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大量农产品，方法是通过不等价的交换。以谷物为例，1940年每公担谷物的收购价格为8卢布63戈比，而国营农场每公担谷物的生产成本为29卢布70戈比，国家收购价格不到成本的30%。<sup>①</sup>这种收购实际上带有课税性质，斯大林曾公开称之为农业“贡税”，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一种额外税”。

价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物价的决定权、管理权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物价管理部门；物价管理部门“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有计划地规定产品的价格”；价格采取企业批发价格(工业企业产品)、采购和收购价格(集体农庄的农产品)、零售价格(国家和合作商业)三种形式，除集体农庄农贸市场零售的少数农产品外，所有产品的价格均不受市场供求情况波动的影响；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格仅是一种“经济核算”的工具。总之，在这种体制下，价格规律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而是被利用作为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

---

<sup>①</sup> 阿·恩·马拉菲耶夫著、阎以誉等译：《苏联价格形成史(1917—196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8页。

外贸体制。国家垄断是这种外贸体制的特点。在这种体制下，对外贸易是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的，由政府的外贸管理机构专门统一经营管理。对外贸易成为政府的一项特权。

总之，高度集中的特征贯穿于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指令性的计划体制，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体制，以平均主义为特色的分配体制，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供给制式的物资供应体制，国家严密控制的农业体制，国家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国家垄断的外贸体制，等等。一句话，从生产、流通到分配领域的管理，从工业、商业到农业的管理，从财政、信贷、价格到外贸的管理，无一不反映着高度中央集权的特点、指令性经济的特点、行政管理制度的特点。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高度集权型的体制；从经济的类型看，这是一个产品经济型、自然经济型体制，而不是商品经济型、市场经济型的体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律和各种手段在这里都没有作用。

与斯大林经济体制密切联系的是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以“赶超”为目标取向。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工人阶级和苏联全体劳动者提出的任务是，在30年代内实现“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斯大林把这一发展目标定位为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历史任务：“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距离，或者我们做到

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sup>①</sup>

第二个特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这是“赶超”目标的要求。“赶超”要求高速度,而按通常的方法即从轻工业开始的办法,不可能实现这种高速度。于是斯大林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1)以重工业为工业化的中心和基础;(2)国民经济发展顺序应按重、轻、农来安排。起初,优先发展重工业被视为20年代末和30年代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理论上把它上升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他提出两种“工业化道路(或称方法)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把这种特殊的工业化方法看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把以经济比例失调和牺牲人民局部福利为代价的重工业发展高速度,看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后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进一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条绝对规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违反。

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其共同的特征都是排斥市场经济,违反经济规律,而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解决经济任务。

### 第三节 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特征

列宁有一句名言: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与斯大林经济模式相适应,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特征也是高度集中,而且更加明显、更加典型。

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党制。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80页。

在这种体制下,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它包括以下内容:(1)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一个党,即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明确宣布:“几个党,就是政党的自由,只有在有利益敌对而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的社会里,譬如说,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社会里,才会存在。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阶级了。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利益不仅不敌对,相反地,是互相友爱的。所以,在苏联也就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即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这就是勇敢和彻底保护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sup>①</sup> (2)苏联共产党是惟一的执政党。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是共产党的领导。“不通过共产党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领导国家这一原则于1934年首先写进党章;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写道:“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体劳动群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机关,并保证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接着于1936年写进宪法;在斯大林主持下通过的苏联宪法规定,共产党“是劳动群众的所在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斯大林模式的一党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一党制。(1)党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委员会,“各个组织服从中央”。<sup>②</sup>“最高机关是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决定一切”。<sup>③</sup>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党代表大会形同虚设。例如,从1939年到1952年的长达13年的时间里,党

①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408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8页。

代表大会才开了一次。(2)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政治局和书记处。据统计,中央全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及全党代表会议加在一起,1923—1929年平均每年三次以上,1930—1936年平均每年约两次,1937—1952年平均每年不到一次,1941—1949年八年中一次中央全会都没有召开。实际上,正如斯大林说的:“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sup>①</sup>而中央书记处则成了无所不管的全国领导中枢。(3)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中,权力最后集中于总书记斯大林,斯大林实际上拥有一票否决权和个人最后决定权。起初,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后来被写进苏共文件。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理和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南”。<sup>②</sup>十七大后,是否执行斯大林的指示和决定成为一条政治准则,接纳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一概以此为界。1941年,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主席,完全集党、政、军大权一身。

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实行三权合一的国家体制。

斯大林模式国家体制的重要特征是三权合一。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不是分立,而是结合,都统一集中到党的各级机关直至党的最高领导——斯大林一人手中。

在三权合一的体制下,苏维埃是名义上的全国和地方相应级别的最高权力机关。宪法规定:苏维埃是(1)最高的立法权力机关。全国一级的最高苏维埃分设民族院(由苏联公民按民族地区选举)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28页。

<sup>②</sup>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第401页。

和联盟院(按行政地区选举代表组成),所有立法由两院通过。(2)拥有任命、监督行政权力机关的最高权力。各级行政机关是各级苏维埃的下属机构,向各级苏维埃负责。(3)如行政机关一样,各级司法机关也隶属于各级苏维埃,向各级苏维埃负责和报告工作,由各级苏维埃任命和监督。在实践中,苏维埃的上述权力形同虚设。

三权合一的苏维埃体制下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也讲“权力制衡”。在理论上,(1)国家一级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的重要的立法均需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一致通过。如两院无法达成一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宣布最高苏维埃解散,进行新的选举。(2)检察院和法院独立于行政机关之外,直接接受苏维埃任命、监督和指令。(3)各级苏维埃,从村苏维埃到最高苏维埃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直接受人民的监督。毫无疑问,这是统一于苏维埃的某种权力制衡,苏维埃享有“全权”。从人类的国家民主发展历史看,三权分立与三权合一是民主机制的两种形式。三权分立制的权力制衡力度要强些,三权合一制的权力效率要高些,可以避免某些权力机构成为“争论的俱乐部”,这种机制比较适应革命时期、战争时期和非常时期的形势。因此,“立法权与行政权合一”的巴黎公社及其后俄国的苏维埃都产生于革命烈火中,后来又在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逼近形势下定型为苏联的国家形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政治模式的重要表现。

苏维埃体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开规定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如何理解党的领导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主要是政策领导;在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无产阶级领导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因此,这一精神应同样适用理解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然而在斯大林政治模式中,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被规定为“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国家机关不能决定任何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而且



把这一点视为“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斯大林还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时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斯大林在这里把苏维埃也列在群众组织一类——作者注）对这些指示的执行。”<sup>①</sup>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斯大林政治模式中的党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领导机关与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而且常常发展为“以党代政”。党的指示和决议“具有法律的效力”，这是它的特有现象。

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实行行政执行机关的自我监督机制。

在这种体制下，立法机关名义上对行政机关具有监督权，但它的监督力度相当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例行公事是通过最高领导人先拟定好的决议，实际上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

在这种体制下，常设性的监督机关是监察部，它从属于行政执行机关，是各级政府的一个部门。这样就形成一种行政执行机关自我监督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也被应用于苏联共产党内。俄共执政后，为了加强党的监督工作，列宁曾经设想，党建立具有平等地位的两大独立的系统：监督系统与执行系统，均直属于党代表大会。然而斯大林执政后，这一主张没有实行，而是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从属于党的执行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

此外，有些学者提出，国家安全部门具有凌驾于党政权力机关之上的特殊权力，也是斯大林政治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有道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6—38页。

理的。这个现象是高度个人集权的产物。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国家安全部门成为维护凌驾于一切权力机关之上的党的领袖权威的工具。归根到底，这一现象是与高度集权的一党制相联系的。然而，它不会明文见诸规章、条文或言论，需要我们加以引申和说明。因此，这一条也可以单独列为斯大林政治模式的特征。

#### 第四节 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的特征

思想文化模式是与政治模式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过去，我国的一些著作把思想文化模式列进政治模式中，没有单独分列。然而，从大量的资料看，斯大林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理论、政策及其机制，有相当鲜明的特色。与经济模式、政治模式一样，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强制干预为主要管理模式的模式，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浓厚色彩。

斯大林文化思想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模式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条准则。个人崇拜本来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君王是神，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复活了。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一切时代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谁反对斯大林的指示，就是犯法。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简直变成宗教狂热。“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一下子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怀疑——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立刻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如果你在不该疲劳的时候感到了疲劳——你就

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可以顺利地完成工作。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一决定。……斯大林说什么，就意味着人民在想什么……”<sup>①</sup>

总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为思想政治领域的一条神圣原则。第一，它成为衡量公民是否有觉悟、是否认识真理的最高思想准则。第二，它成为公民是否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主要政治准则，是界定某人是否是“人民敌人”的主要政治标准。第三，它还成为界定公民是否犯法的一条不见诸明文法的法律原则。

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思想高度垄断。在这种模式下，高度的思想垄断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高度的舆论一律。全党、全社会的舆论都高度统一于联共(布)中央，最后统一于斯大林。例如，1938年1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专门做出决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使用其他版本的党史教科书，凡是党史方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正式解释，一律要以《教程》为标准，进行修改和澄清，杜绝任意解释现象。这种高度的舆论一律甚至推行到语言学。1948年，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的几个问题》一书也被称为语言学的“宪法”，一切与此相违背的观点均遭查禁。

(2)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模式下，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向资本主义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在政治经济学，随后在哲学、史学、文化艺术等领域，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部门都全面“出击”，划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线，贴阶级标签，把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划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和“机械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49年12月18日。

论”著作，列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范畴”。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指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过调整之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观点，被扣上“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帽子，他的书被禁止出版。更有甚者，阶级标签贴到了自然科学上面。例如，在生物学辩论中，简单地把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物主义”的，而魏斯曼的生物基因遗传学说（现代生物工程的基础）被说成“反动的观点”。<sup>①</sup>

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以行政干预手段为主要的管理方法。

在这种模式下，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和管理。最典型的方法是“学术批判”。这种学术批判始于20年代末对布哈林的理论批判，贯彻于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它的特点是：（1）通常由斯大林亲自领导。例如，30年代在批判哲学家德波林的斗争中，斯大林亲自接见了反对德波林的青年学者米丁，指示其在意识形态各个思想理论阵地展开“全面进攻”。随后，米丁在他本人写的《笔记》中狂妄地、凶狠地胡说什么，“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全面展开批判。展开攻击是主要问题。向各个方面展开攻击，在没有攻击过的地方展开攻击”，“鬼知道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做些什么，写些关于魏斯曼主义等等，把这一切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应当把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积攒的粪便(!)全部翻摊和倒腾一遍。应当把德波林派所写的东西全部翻摊出来，摧毁全部错误的东西。可以把史登、卡列夫打掉；……为了战斗，必须使用各种武器”，等等；（2）通常由联共（布）各

<sup>①</sup> [苏联]莫洛托夫：《在新的高涨中》（在庆祝十月革命31周年大会上的报告），1948年11月6日。

级组织进行周密的工作,组织批判和斗争,逐步引向高潮。例如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刚开始时由两个青年学员著文,指责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背离党性原则”,但同时还肯定他们与“机械论”的斗争路线“基本上正确”。随后红色教授学院、共产主义科学院轮番组织批判会。当德波林据理力争时,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雅罗斯拉夫当场公布德波林的历史资料,指出他是孟什维克,从而迫使德波林承认“政治错误”,“取得了斗争的胜利”。(3)每次重大“学术批判”最终都被政治化,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例如,在史学界的学术批判中,斯大林亲自给一系列的史学家戴上“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和“伪造者”等一堆政治帽子,然后在打击一大片之后,扶起拥护斯大林的史学家,达到巩固舆论阵地的目标。据统计,经过几场大规模的学术批判后,到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sup>①</sup>进行大改组,建立了由官方直接管理的统一的行政化的社会文化和学术团体。

### 第五节 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统一的完整体系

如上所述,斯大林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都各有其自身的特点,然而,它们之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构成一个互相依赖而密不可分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各层次、各方面的一个共同的东西、共同的特征,即总的特征,就是高度

---

<sup>①</sup> 马飞龙:《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集中。

在斯大林经济模式的三个特征中,指令性计划经济是它的核心。而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必然要求国家(通过各级政府)成为这种计划经济的行为主体;中央政府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权力集中于中央,乃势之所趋,实行中央集权的部门管理体制是必然的结果。既然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排斥市场调节,因此,也必然排斥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的经济管理方法,而行政手段就成为管理经济方法的主要选择。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是共生共灭的。

在斯大林政治模式的三个特征中,党的领袖高度集权的一党制是核心。党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党要实行高度集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的苏维埃体制是最合适的国家形式,可以有效地保证中央权力畅通无阻和快速运转。而执行机关自我监督的监督机制,则是这种高度政治集权的不可避免的产物。

在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的三个特征中,高度思想垄断是核心。个人崇拜是它的极端发展,高度的垄断转变为超高度的垄断,即转变为斯大林个人的思想垄断。在思想垄断的条件下,说服的方法、辩论的方法、民主的方法都不可能成为思想文化的管理方法。

斯大林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思想文化模式三者之间也是互相依存的。列宁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论点完全适用于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是为实现斯大林的“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包围、孤立无援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在短短10年内跑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00年走完的路程,依靠什么呢?依靠正常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吗?那是“乌龟爬行”速度。于是必须依靠非常规的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特殊办

法,高度集中的反市场的斯大林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而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既是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的反映,又是它的坚强保障,是保护者。没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的保驾护航,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的运转是不可能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行为主体是国家,代表国家的是政府,因此,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与政治从本质上看是完全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它的思想文化模式与政治模式也是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是适应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而产生的,同时又是为它们服务的。经济的统制、政治的统制,势必要求思想的统制、文化的统制;而思想文化统制,反过来又促进、巩固经济的统制和政治的统制,三者是浑然一体的。

斯大林模式与历史上其他高度集权体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也有着一系列显著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斯大林模式是高度集权体制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种高度集权体制,虽然有许多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是它是在俄国工农群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的国家中建立的,是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因此这种高度集权体制又具有相当浓重的平民主义色彩。例如,大批昔日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登上政治舞台,行使权力;劳动者的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俄国历史上首次建立,等等;这是与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集权体制根本不同的。

第二个区别,是斯大林模式所体现的集中程度的超高性。在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主要表现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而斯大林模式则覆盖了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领域。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建立高度集权体制的,但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其集中程度都远远赶不上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

都毫无例外地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如此庞大的国家、全部社会生活都听从一个中央权力中心的指挥。无论从横向看，还是从纵向看，这种集权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



## 第十八章 斯大林模式的凝固 及其历史影响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①</sup>

苏联模式的僵化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斯大林拒绝改革，一直沿着僵化的道路走下去，结果是害了苏联自己；二是把这一模式视为各国普遍适用的，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改动，如有改动，便被视为脱离社会主义，是大逆不道，结果又害了别国。本章只探讨第一个问题。

### 第一节 斯大林模式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模式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实验。然而，如上所述，这一模式是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产物。第一个“特殊”是：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不同，这一模式不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生产社会化达到高度水平的国家中建立，而是在一个没有经过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经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济文化落后的小农国家建立,而在这一模式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不可避免地要被修改或遭到扭曲。第二,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不同,这一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而是在一国范围内,在资本主义包围、时刻面临战争威胁的非常环境中建立,因此,这一模式所瞄准的目标不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而是争取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权和备战。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而言,特别是从工业化的实际成果和二战的结局来看,这一模式曾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一、斯大林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度推动和促进过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保了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发展,从而为苏联社会主义奠定了大工业基础。

20年代末的苏联,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水平都很低,并未为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在工业化资金缺乏以及外部环境不良的情况下,如果苏联真走一般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显然难以实现在短期内建成工业强国的战略目标。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充分调动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大规模的攻坚战,集中力量建立新的工业部门,也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和行动集中统一到国家所面临的迫切的工业化任务上来。例如,为解决工业化资金严重缺乏的困难,国家依靠行政手段采取了两项政策和措施。其一,建立高度集中的财政管理体制,通过国家财政统管,筹集工业化所需资金。制定新的税收政策(1940年国家两项主要税收——周转税和利润提成占国家预算收入的71%),提高工业内部积累(1929年达到41.5%),对农业的高征收(低价格收购农产品,外加各种赋税),这些都成为苏联筹集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手段。其二,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把大批资金用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

设。例如,1932年与1925—1926年相比,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财政拨款增加了19倍以上,其中对重工业的拨款增加了49倍。斯大林的上述办法和措施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经济的迅速发展。从1928年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增长了5.5倍,年平均增长16.8%。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倍,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1.2%,建成了近万个工业企业和部门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工业产值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84%。这一震撼世界的“工业化奇迹”大大改变了苏联原先落后的农业国地位,使苏联成为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强国。

二、斯大林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它的适应力和战斗力,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和人员保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异常残酷的一场现代化战争。苏联在战前通过调整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赢得这场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战前,苏联的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1830万吨,石油产量从170万吨增加到3420万吨,煤产量从3550万吨增加到16470万吨,机床产量从2000台增加到58400台,电力从5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483亿千瓦时。战前,苏联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特别加强了国防工业的建设。“三五”计划的头三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3%,而国防工业则达到39%。到1940年上半年,苏联共生产了六千多架各种类型的飞机,近五千辆坦克,约两万门火炮和二十多万枝机枪和自动步枪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为反法西斯战争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同时,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在战时显示了巨大的动员

号召能力和极高的调动、组织效率。它不仅使得苏联在战争开始后迅速把国家纳入战时轨道，并为战争时期国家集中全部的人力、物力、财力，从而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二战初期，希特勒德国在横扫了欧洲多数国家之后，集中了几乎全欧洲的军事资源，对苏联发动了“闪电”战，不仅使苏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使苏联人民遭受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向全国发出紧急动员令，并迅速按战时需要，改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体制和经济体制，以便统一指挥党政军各部门，集中调动和使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斯大林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在前线地区成立各级国防委员会。联共（布）中央增设了领导坦克工业、航空工业、弹药、兵器等军工生产的工作部。同时，从党中央到州党委，还向全国大中型军工厂和重工业企业委派党代表，在机械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重新设立政治部，在领导集体农庄的各农业机构设立政工局或政工处，以加强统一调度工作。各级苏维埃组织也把保证部队兵源和军需物资、发展和扩大军工生产作为中心工作。战争爆发后，苏联党和政府紧急动员，仅用八天时间，就征集 530 万人人伍。到 1941 年末，不到半年时间，苏联就新组建了四百多个师。这期间，有 110 万党员到前线作战，其中包括 500 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至区委的各级党组织的书记，2270 名党中央机关的负责人。战争初期，铁路运输了 150 万节车厢的企业搬迁物资，向后方地区输送了一千多万人。战争爆发后，苏联仅用四个月的时间，就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组建了强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承担了供给苏军武器和装备的重任。到 1942 年，苏联已经形成了组织效率极高的、协调完善的战时经济体系，其军事生产能力大为增强。1942 年与 1940 年相比，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由 15% 增加到 55%，工业中用于战争的

成品份额由 26% 增加到 68%。1942 年军工成品几乎比战前增长了一倍。<sup>①</sup>整个战争时期,苏联共生产了 49 万门大炮,10.4 万辆坦克和自动火炮,约 13.7 万架作战飞机。<sup>②</sup>到战争后期,苏联在武器数量和装备水平等方面已经超过了法西斯德国。如到 1941 年 1 月,苏军大炮比德军多 22 倍,坦克多 18 倍,战斗机多 64 倍。

苏联战时动员速度之快,规模之庞大,军事生产能力恢复和增长之快,以及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奋起卫国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高涨,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也表明斯大林模式在战时条件下具有很高的动员能力和组织效率,是苏联在二战中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西方史学家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壮举,我国学者也认为,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体制,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不可能这样迅速地取得胜利的,‘即便胜利也会经历艰难得多、曲折得多的历程’。”<sup>③</sup>

## 第二节 战后新的历史条件对 斯大林模式的冲击

斯大林模式虽然在苏联 30、40 年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发挥过作用,但这一模式从它形成之时起,就包含有深刻的矛盾和严重的弊端。概括地说,这些矛盾和弊端主要表现为:计划和

---

① [苏联]泰达主编:《苏维埃 50 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 1967 年俄文版,第 325 页。

②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周邦新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 5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417 页。

③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1 页。

市场的矛盾；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平衡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高速度和低效益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民主和高度集权的矛盾；一党执政和权力制衡的矛盾；民族平等和中央集权体制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弊病的存在和积累，使得战后苏联社会的许多领域出现了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成为战后苏联社会改革思潮涌起的原因和动力，在历史上形成了对斯大林模式的第一次冲击波。

### 一、战后斯大林模式危机的原因及其表现

战后苏联社会的危机绝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深刻、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它首先根植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及当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30年代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用强制命令的手段推行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据统计，1927年，即使按照当时的人为地拔高了的标准，苏联“富农”的比例也不超过农户的3.9%，1929年仅为2.5%—3%，而许多地方没收富农财产涉及的农户高达10%—15%，<sup>①</sup>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致使苏联农业长期萎靡不振、徘徊不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为主要目标的超高速工业化运动致使国民经济效率长期低下，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长期严重短缺。残酷的“大清洗”和党内斗争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给党、军事和文化科学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极大地妨碍了社会进步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

<sup>①</sup> [苏联]尤·阿法纳西耶夫著、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72—773页。

所有这一切,都给战后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消极的影响。人们对斯大林模式的怀疑和不满早在战前就已经产生了。苏联人民在二战中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伤亡人数两千多万,整个战争费用和损失高达五千八百多亿美元)。然而,战争的结束并未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他们原来预想的对新生活的美好期盼和希望。一切又回到了过去。斯大林和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没有抓住大好时机,实现斯大林战前一度许下的诺言,实行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化战前的全套做法,终于酿成了战后苏联社会的严重危机。

战后苏联社会的危机主要表现为:战时体制不仅未因战争结束而改变,反而在某些方面呈强化、加剧之势。例如,以高度集权、强制为主要特征的许多战时体制和命令,战后进一步以法律、决议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战时计划经济体制、战时非常法令、战时专门法庭,或原封不动、或稍加修改、或变本加厉地被搬到了战后时代。严厉的战时劳动管理制度也被全盘照搬到了战后。如战时颁布的军工企业职工擅自离职、旷工、迟到都要被判刑的法规一直被执行到1956年。<sup>①</sup>

战后苏联社会的危机征兆也表现在工业领域。众所周知,苏联工业化的特征是高速度和高强度以及低效益,经济缺乏内部活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救亡图存、群众的爱国热情压倒一切的时候,在实现某种重大战略目标而需要集中权力的时候,在经济发展还处在粗放阶段的时候,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然而,由于低效益、高浪费等顽症不但得不到克服,反

<sup>①</sup> [苏联]泽姆斯科夫,《历史的黑洞》,载[苏联]《虹》1990年第6期,第47页。

而愈演愈烈，终于造成后来苏联经济的全面危机乃至垮台。30年代，苏联工业的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效益恐怕是世界上最低的。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35年，苏联新建的重工业企业才有第一家见到效益。英国学者莫舍·卢因指出，苏联工业化投入巨大，“但是这种积累努力并未带来与之相称的成果”，伴随着工业产出率的大大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大幅度放慢”，这一点在50年代初期表现得尤其明显。<sup>①</sup>因此，莫舍·卢因称：“斯大林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支巨大的工业力量 and 没有效率的经济。”<sup>②</sup>

战后苏联社会的危机还表现在农业方面。在“一大二公三纯”理论的指导下，苏联进一步强化了集体农庄管理体制，缩小甚至取消了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对农民的个人果园和家畜产品课以很重的赋税。在收入不抵税赋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农民砍伐果树、屠宰牲畜、不再饲养自留畜的现象。此外，战后还实现了大规模的合并集体农庄运动。合并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50年。到1951年1月1日，集体农庄被从战前的近30万个合并为12.3万个，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sup>③</sup>上述政策和措施压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战后苏联农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据统计，到1950年，农村40%的家庭没有奶牛，15%的家庭不饲养任何家畜。农民在正常年份里尚且食不果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sup>④</sup>当时担任联共（布）

---

① [英国]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盛曾安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6卷，第151页。

④ [苏联]赫鲁晓夫著、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34页。



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助手的苏汉诺夫在回忆录中承认,从斯大林晚年人们给党中央机关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农村当时生活十分艰难,民不聊生,矛盾重重,正处在爆炸的边缘。<sup>①</sup>

## 二、战后苏联社会改革思潮对 斯大林模式的冲击

战后苏联的社会危机表明,斯大林模式已不能适应战后苏联和世界的新形势,苏联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形成了战后苏联社会要求改革的第一次浪潮。

变革的思潮首先来自二战时期的“火线军人”。这批有着特殊人生体验和战斗经历的人,成为战后改革思潮最积极、最活跃的代表,被苏联理论界称为“新十二月党人”。这些出生于十月革命之后的“火线军人”战时大都 20 岁左右。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是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度过的,经历和目睹过 1932 年的大饥荒和 30 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但是当时,他们或年幼,或身处穷乡僻壤,或身置平凡岗位,因此除对自己所处地区、家乡的情况有所了解之外,对其他广大地区的真实情况是无从知晓的。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广泛交往和全面了解情况的特殊环境和条件。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工人、庄员、学生、机关干部)的人们汇集在一起,在反法西斯的战斗中并肩作战。后来连十几万刑满或刑期未了的“政治犯”也走出“古拉格”(集中营),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大家在激烈、残酷战斗的枪林弹雨中结成了生死之交,无所不谈。这时,人们

<sup>①</sup> 苏汉诺夫采访录。见[俄罗斯]祖布科娃:《1945—1964 年的社会与改革》,莫斯科:作家出版社 1993 年俄文版,第 100 页。

才知道,战前祖国曾发生过许多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战争培养了人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精神及意识。加之战争后期,打出国门的苏联红军大开眼界,亲自接触了欧洲先进国家的文明、科技和生活方式,切身感受到国内外生活的巨大反差,于是,这一批出生入死的军人普遍产生了“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生活下去”,战后应该过一种自由、美好、富足的崭新生活的想法。于是,希望变革战前体制、革除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状况和弊病的想法就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

然而,战后人们所期盼的美好生活并未出现,高度集中、强制命令的体制并未得到改变,一切又回到了过去。“火线军人”复员回家后面临的问题成堆,困难重重。许多人如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命运》所描写的主人公索利洛夫那样,复员回家后已家破人亡,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人。有些人直接从中学课堂走上前线,战争中能熟练地使用枪炮,胜利后却无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手段。幸运者可以进学校继续学习深造。多数则需要从头开始,找(建)住房、安家、找工作。战时吃苦受累,流血牺牲,是为祖国而战,为正义而战,是为了战后的工作和美好生活。在前线,时刻可以感受和体现出军人的尊严、价值、荣誉。但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则被社会无情地抛弃和遗忘了,成为“多余的人”、“不受重视的社会边缘人”,位低身微,备受冷落,生活艰辛。<sup>①</sup>这种巨大的反差给他们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荡。当时,社会上普遍产生了一种怀念部队和前线生活的“思返病”。许多复员士兵为了排遣、消除这些苦闷和烦恼,经常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些特有的交往圈子和场所。

<sup>①</sup> [苏联]康底拉季耶夫:《怪诞的前线思返病》,[苏联]《文学报》1990年5月9日。

战后，苏联社会到处出现了以“蓝色多瑙河”命名的小咖啡店、小酒吧和小吃店，有共同经历和遭遇的人们在这里聊天，借酒浇愁，排解苦闷，寻找某种感情的渲泄和寄托。战后年代的这种独特现象被称为“小酒馆民主”。<sup>①</sup>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下，“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思潮在要求变革的复员士兵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战后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环境及“火线军人”的变革思想也影响了战后成长的新一代人，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希望生活在更加自由、幸福的社会中。战后一代与战时一代年岁相差不多，他们沐浴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阳光”，在“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了我们幸福”的欢呼声中长大成人，怀着对党和领袖无限热爱和崇敬的心情度过了学生时代。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和生与死的考验，也没有体验过充满理想、豪情的幸福和自豪及理想破灭后的痛苦、无助和绝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少年时代也经历过30年代的大动荡和艰难困苦战争岁月。因此，他们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实际生活和理论学说的矛盾的体会更为敏感，更为强烈，对新生活的幻想、对独立自主精神的追求也远胜于他们的上一代。

他们不满足于现状、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和冲动首先表现在他们在学习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大增强。他们不满足于官方教科书的许多教条、僵化、过时的理论和脱离实际的说教，通过大量阅读课外书籍、读物及相互探讨和争论，逐渐形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独立思考逐渐从文学、哲学、历史发展演变到现实政治问题上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战后苏联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秘密社团。当时的学生社团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社团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主要以阅读、研讨文学作品为主，有时也阅读违禁作家、作者的作品，

<sup>①</sup> [俄罗斯]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第29页。

如“路标”派作品和生物遗传学方面的书籍。另一类社团则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1946年在沃罗涅什建立的“青年共产党”、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莫斯科出现的“革命军”和“革命事业斗争协会”等，就属于这一类。当时在列宁格勒、车里亚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及俄罗斯其他城市都有这类青年学生社团在活动。这些社团成员大多是中学高年级和大学的学生，年龄大体在16—20岁之间。各类社团人数不多，大都只有10—15人，像“青年共产党”这样人数达到五十多人的社团极少。这些社团大多思想较为活跃、解放，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一方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注意联系社会现实并密切关注和考察当时苏联的现实。他们在这种学习、研讨中发现了大量问题和矛盾，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和途径，于是许多人不仅对理论产生了怀疑，甚至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怨恨和不满。当时苏联当局破获了不少这样的社团，均以“和平时期反苏鼓动”罪、“反苏团体”罪和“恐怖活动”罪论处，多数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0—15年，也有被判极刑的。<sup>①</sup>如1946年在车里亚宾斯克师范学院被当局破获的一个叫“雪酒诗社”的学生自发团体就属于此类。它起源于一些大学生创办的文学刊物《大学生》。该刊被学校禁止后，又有几个学生秘密办起了地下刊物《雪酒》。该诗社以俄罗斯文学中的象征主义为其美学原则，出版了两期，第三期遭查封。该诗社后被定性为“非法反苏团体”，其成员被俄罗斯最高法院以“反革命活动罪”判处不同刑期的有期徒刑。<sup>②</sup>

不满社会现实、要求变革的呼声不仅通过“火线军人”、青年学生反映出来，而且在社会其他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农

<sup>①</sup> [俄罗斯]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第76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73页。

民中都有反映。他们在最高的层次上,以更加深刻的思想,更加直接、成熟的语言揭露问题,探讨解决矛盾的办法。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思维敏捷、感悟力强,对战后苏联社会的思变情绪和改革愿望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表述。作家康·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以这样的笔调谈到了当时人心思变的情况:“我记得,在战争末期和刚一进入战后,就在1946年,在相当广泛的知识界,都以为将要发生某种变化。认为这变化必能推动我们同与之并肩战斗、打败共同敌人的盟国知识界,进行更为轻而易举的交往,也能使我们走向更加宽松自由的方向……总的来说,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一种松缓舒畅的气氛。”<sup>①</sup>事实也表明,战后一段时间,苏联思想、文化、艺术界的气氛是较为松缓的。文艺刊物开始刊登轻松活泼的题材作品,电影界、戏剧界、音乐界的环境、气氛也比较活跃。在莫斯科,为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题诗歌晚会;在列宁格勒,文艺刊物上通篇连载左琴科的幽默小品和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歌。这些都从特定的方面反映出苏联社会在摆脱了战争时期紧张、凝重的气氛之后,人心思变,要求冲破束缚、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1951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会上,经济学界不少作家、学者敢于冲破专制高压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提出了一系列修改现行理论、学说的建议和主张,包括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扩大价值规律的应用范围、强化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经济管理方式,等等。

战后时期,联共(布)中央收到大量的群众、干部和党员的来信,这些来信涉及各类社会问题,如经济管理体制、农业体制、政治

---

<sup>①</sup> [苏联]康·西蒙诺夫:《在我们这一代人里》,见[苏联]《旗帜》1988年第3期,第49页。

体制等等。斯摩棱斯克军政学校的一位学员和女作家写给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的信,用翔实材料反映了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极具典型性。信中称,沉重的负担和艰难的生活使得农民再也“无法忍受”和“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另外,管理体制僵化,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已经到了非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的地步。因此,改革已是人心所向、迫在眉睫的事情。<sup>①</sup> 在与莫斯科北郊毗邻的梅季希市,一位工厂会计师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建议书。1947年初,他把这一题为《战后祖国经济》的建议书寄给了党中央、马林科夫。他认为,有效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对企业的责任心。为此,他强烈呼吁给企业、劳动者集体和个人充分的自主权。他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实行企业改制,把国营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公司,改造后的企业应当完全独立自主地“承担自己的一切风险”;(2)通过建立区和州的工业供应部,取代各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的供销部,以实现对企业的原材料、燃料供应的分化管理;(3)取消义务供应,取消国营购销体制,为集体农庄和庄员按照市场价格自由从事销售活动创造条件;建立集体农庄市场,“神圣地保护自由价格原则”;(4)彻底取消现行的货币体系,实行新的金本位体系;(5)取消国营贸易企业,将其职能完全转交给商业合作社和股份公司。<sup>②</sup> 鞑靼自治共和国第一机械修理厂的一位名叫里德的工程师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建议,在实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同时,应在企业里引进和实

<sup>①</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库,第125卷宗,第1625分卷,第26—28页;同上档案,第119卷宗,第1292分部,第14—20页。转引自《苏共党史问题》,1990年第7期,第119、120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库,第125卷宗,第454分卷,第1—2页。转引自《苏共党史问题》,1990年第7期,第115页。

行竞争机制,竞争应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的有力杠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长期困扰苏联企业的动力不足问题。这位工程师认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把竞争原则和企业的股份制原则结合起来。他强调:“拥有‘n’卢布基本资金的企业,可以发行‘m’卢布的股票。每一个在该企业工作一定期限(比如半年)的职工都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股份,数额大小取决于该职工在该企业的地位、工作年限和工资的高低。如果企业经济效益良好并取得了利润,那么,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应作为红利分配给职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最终达到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目的。<sup>①</sup>

人们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措辞都较为谨慎,语气也较为平缓,但他们私下的谈话因无所顾忌,措辞就严厉得多,暴露的问题也更加尖锐、突出。如1964年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特种手段窃听到的苏联两位将军的一次私人谈话,内容就很典型。他们的谈话内容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和军队内部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涉及农业、工业、经济管理体制、政治体制、党风。人们对物质供应不足,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严重不满,“人们连日常最必需的物品都没有,”全都生活得像“乞丐”;对农业的萧条,农民生活的艰难不满,农民盼望“解散”集体农庄;对现行的管理体制、政策不满,称现在“推行的是谁也不愿干活儿的政策”。他们希望立即改变现在的状况,建立一种新“秩序”,因为目前的“局面不会太久了”。<sup>②</sup>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库,第125卷宗,第454分卷,第3页。转引自《苏共党史问题》1992年第7期,第116页。

② [俄罗斯]《消息报》1992年7月16日。

与此同时,一些为现实的问题和矛盾所困惑的地方领导人也开始提出各种改革的建议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进行某些改革的尝试。1947年,摩尔多瓦州州委书记H. A. 科尔切尔金在地方报纸上发表题为《要正确地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一文,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提出了自由价格问题,并主张集体农庄和庄员可以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自主经营。<sup>①</sup>乌克兰库尔斯特州委改革农业经营体制,推行生产组承包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这一改革措施得到了当时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的支持,迅速在乌克兰得到了推广。同时,这一改革也得到了当时主管苏联农业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赞同。但由于这一改革措施有悖于正统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理论,终为高层领导人所不容而中途夭折。安德烈耶夫和库尔斯特州委领导人不仅在1950年先后受到《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的批判,而且为此受到罢官免职的处分。

需要提出的是,各地区领导人的改革建议和措施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到了政治等领域。1950年1月,苏联邮电部某管理局设在拉脱维亚的财务计划司司长H. M. 斯图里尼科夫向马林科夫提出改革官僚体制的建议。他指出,行政管理体制的一长制导致“一言堂”,主要领导人一人说了算的作风盛行,一些领导人因此特别迷恋、嗜好权力,听不得他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同的意见。因此,他建议“实行管理机关的根本改革,并把它建立在完全民主的基础上”,为此,必须要向选举制和集体领导制转变,应从下至上,从具体企业到各部委建立经济管理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对企业或

<sup>①</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库,第122卷宗,第210分卷,第2、4页。转引自《苏共党史问题》1990年第7期,第117页。



部门实行集体领导。<sup>①</sup>上述改革的思想、建议和措施反映了苏联社会和民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愿再在旧的体制下工作、生活的强烈要求。但最能集中体现战后改革思潮的是,在讨论、修改苏联新宪法草案和联共(布)党纲草案过程中发表、出现的大量很有见地、很有思想的言论。1946年,苏联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新宪法草案在总体上并未摆脱传统体制的框架,但同时也写入了若干新条款,强调要保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扩大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因素;在确认国家所有制为苏联所有制统治形式的同时,提出应允许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中存在个体经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各部委在对宪法草案进行讨论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其中包括:对经济活动实现分散化管理,把一些重要的经济权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人民委员会,取消战时特别法庭,特别是运输线法庭和军事法庭。

在由 A. 列昂节夫和 O. B. 库西宁提出的一个党纲草案(该草案未被采纳)中和对正式党纲草案的讨论过程中,许多人提出了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主张和要求。这些主张和要求概括起来有如下内容:(1)扩大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民主,限制党和苏维埃机构的任期,在包括最高苏维埃在内的各级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中实行差额选举;<sup>②</sup>(2)党应摆脱对经济部门的直接干预和管理;(3)实行干部轮换制度。<sup>③</sup>

虽然新宪法草案和党纲草案都未公开发表,只是在党和国家

<sup>①</sup> [俄罗斯]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第95、96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17库,第121卷宗,第476分卷,第159页。转引自《苏共党史问题》1990年第7期,第113页。

<sup>③</sup> [俄罗斯]祖布科娃:《1945—1964年的社会与改革》,第51页。

干部的有限范围内进行了讨论,但在讨论中提出的上述思想和建议,却反映出当时广大干部,其中包括一些党政高级干部的变革思想和要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苏联社会存在的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危机是战后苏联改革思潮涌起的直接原因。这股改革思潮的社会基础相当广泛,既有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出生入死的“火线军人”,又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相当一部分党政干部。应该说,这股改革潮流的力量是巨大的,影响也相当广泛。但是,由于极其复杂、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苏联领导人并未认识到并进而抓住战后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这股改革潮流最后胎死腹中,终未变成改革的具体行动。

### 第三节 战后斯大林模式凝固和强化的原因

同上述潮流相反,苏联最高当局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众所周知,斯大林模式凝固与僵化导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那么,苏联为什么会逆流而动呢?主要的具体的原因如下。

第一,二战的胜利诱发了苏联对外扩张的野心,并由此形成了以对抗性和扩张性为主要特征的苏联对外战略,这成为强化斯大林模式的巨大推动力

战前,斯大林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抵御、抗击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苏联社会主义的成果。那时,苏联高层虽然已经有“暴力输出革命”的思想和行为,但是总体说来,还是力不从心的。战后,苏联的情况已产生很大变化。即便是斯大林自己,也不像30年代那样强调战争的

威胁了。他对世界战争的形势做了以下分析：首先，“新战争的威胁不是实际存在的”（1946年）；其次，战争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1952年）；最后，资本主义国家轻易不会发动对苏战争，因为“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sup>①</sup>

斯大林模式没有随着时代的要求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反而更趋僵硬、强化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这一模式的本质特征及其逻辑发展决定的。前已述及，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备战型模式。苏联国民经济迅速工业化的最终目标和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化强国。如果说战前苏联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同世界一流强国相抗衡，处于发展中的苏联集中全部国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还有“抵御、防止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侵”的需要和借口的话，那么战后，当苏联的军事实力空前膨胀，一跃而成为能够同超级大国美国抗衡的军事强国的时候，由备战（军事化）这一特性所决定，苏联追求的目标就自然而然地由战前的带有防御性的“抵御侵略”，变成积极进攻性的输出革命（世界革命）和争夺霸权。可以说，作为战后苏联强化斯大林模式的内在动力的输出革命（世界革命）和争夺霸权，是斯大林模式的历史逻辑发展和当时国际形势、苏联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夕，苏联就在确保自身“安全战略”的掩护下，不顾别国的利益和领土完整，于1939年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苏德秘密协定》，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把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立陶宛确定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39年，苏联出兵侵占了波兰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年，苏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518、622、624页。

联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占领了卡列累阿等大片领土。1940年，苏联兼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此外，从20年代到40年代，苏联吞并了大片中国领土。在战时和战后的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以大国霸主的身份，参与了同英、美等国对战后世界的瓜分。在斯大林看来，“这场战争跟过去的战争不同，谁解放了一块领土，谁就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sup>①</sup>战后，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获得了从欧洲到亚洲的约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争霸的需要，以高度集权和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在战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第二，战前苏联在一系列理论问题上的初步教条化、神圣化是战后这些理论被进一步凝固化、僵化，并为其对外关系的总目标服务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首先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穷过渡理论”）。在斯大林模式中，“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战前，斯大林已经多次论述过这一思想。1936年，斯大林就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演说中宣布，“我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进一步提出，苏联已经是“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社会了，苏联的任务是“向共产主义前进”。1946年，当苏联刚刚摆脱战争的阴云，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之时，斯大林就断言：“‘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

---

<sup>①</sup> [南斯拉夫]米·吉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是完全可能的。”<sup>①</sup> 1952年,苏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应该“通过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sup>②</sup> 一时间,苏联理论界出现了一股论证、描绘共产主义前景的热潮。同年,斯大林以最高理论权威的身份,具体规定了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三个先决条件。其中最“实惠”、最具“实质性内容”的条件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当时苏联法律规定,工人、农民无权自由流动,即无权自行改换工作岗位和迁移他处);再就是“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sup>③</sup>

斯大林为什么如此顽固地倡导和坚持“超越发展阶段理论”呢?除了他思想的片面性,即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和理解之外,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在这一理论的表面后面潜藏着斯大林实现“军事化强国”、“世界革命”、“争夺霸权”等战略目标。1945年春天,二战还未结束之际,斯大林就表示:“战争快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sup>④</sup> 1946年,斯大林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苏联战后经济发展的具体目标,苏联“较长时间的计划”是使工业水平提高到“战前的三倍”,即“生铁达5000万吨,钢达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更长些。”<sup>⑤</sup> 为了

①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282、510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8页。

③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649—651页。

④ [南斯拉夫]米·吉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第85页。

⑤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483页。

实现这一目标,苏联需要继续以牺牲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需要继续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三纯”,特别是强化集体农庄制度。由此可见,“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理论”是为其建立在国民经济军事化基础之上的长远战略目标服务的。

其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苏联工业化过程中,斯大林提出了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方针。按照他的解释,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是为了“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至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准备抵御帝国主义的人侵,以免苏联在战争中“处于手无寸铁的地位”。然而,当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已经解除的时候,斯大林却提出了“两种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斯大林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哪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sup>①</sup>战后,苏联把这种依靠行政命令手段集中资金、物质和劳动力,以牺牲农业、轻工业和人民福利为代价片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497页。

面发展重工业的办法,看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这以后,优先发展重工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条绝对规律。这一理论为战后苏联奉行扩军备战、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为争霸战略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的,为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经济发展目标。

再次,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类型等问题做出如下“裁决”:(1)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sup>①</sup>从而把社会主义产品的大多数排斥在商品生产之外。(2)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仅归结为存在两种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现时,除了经济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能接受的。”“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sup>②</sup>这就实际上否定了国家所有制内部商品交换、商品流通的必要性。(3)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出发,认为在50年代初期苏联面临的任务是不断缩小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范围,而不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生产。“任务在于,要使农业的一切部门中都培植这些产品交换的萌芽,并把它们发展成为广泛的产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58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582、583、648页。

品交换系统。”“应该一往直前、毫不犹豫地推行这种制度，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就使社会主义易于过渡到共产主义。”<sup>①</sup>在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中，商品生产受到了严格限制，产品经济观仍占支配地位。

最后，关于农业所有制的理论。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重要特点。30年代末，由于集体农庄制的弊病越来越明显，斯大林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采取措施巩固和稳定集体农庄所有制；相继采取了农业承包制和联产计酬制等。然而战后，斯大林为了使国民经济进一步军事化，却采取了限制合作制发展的政策。他认为，合作社—集体农庄制度“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的计划”，因此，“必须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如果让集体农庄集体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不能获得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sup>②</sup>

第三，二战的胜利提高了斯大林个人和斯大林体制的威望，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空前膨胀，也对斯大林模式的僵化和凝固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战的胜利显示了苏联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斯大林的声望和威信。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空前膨胀和加剧，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斯大林骄傲自满的情绪也不断滋长和加强。这时的斯大林完全陶醉于苏联所取得的成绩中，已经看不到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缺陷，因而也无视战后苏联社会潜伏的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危机和苏联社会巨大的变革思潮。他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582、583、648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49页。



拒绝批评，满足于现状，不思改革，把30年代形成的体制进一步理想化、凝固化、神圣化。战后不久，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的演说中借二战的胜利对苏联体制进行全盘肯定。他说，战争表明苏联体制“是有充分生命力的”，是“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也表明苏联是“把民族问题、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这次演说中，斯大林还引用叶卡捷琳娜女皇评价沙俄名将苏沃洛夫的一句名言：“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这表明，斯大林用这句著名格言告诉苏联人民，他是正确和正义的化身，他是最大的“胜利者”。对“胜利者”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指责，因此，对他战前缺乏准备和战争初期的严重错误，直至对他所确定的一整套政治经济体制、模式都“不应批评，不应检查”。

第四，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两大阵营的出现、苏联和美国相互挑起冷战，对斯大林模式的强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二战结束后，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矛盾迅速尖锐化，昔日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友一变而为敌人，最终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对抗。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美国推行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而苏联则为确保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冷战。双方的这种斗争使国际形势趋于紧张，牵动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柏林危机，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则牵头组织了华沙条约集团。这种形势的变化使得苏联领导人对战后的国际形势做出了这样的估计：二战的结束并未给世界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本性使得新的世界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战后，斯大林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认为，英美领导人的政策是“发动新的战争的政策”，认为，如果战争挑拨者的谎言得逞，

就会把人民群众“卷入新的世界大战”，“战争就会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坚决反对“战争挑拨者”。苏联学者沃兹涅先斯基在1948年出版的《卫国战争经济》一书中强调：“当帝国主义存在，也就会存在有帝国主义势力进犯苏联的危险，也就会存在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则重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依然存在”的论点。由此可见，战后的国际形势及苏联领导人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和判断，对于斯大林模式的进一步固定化和僵化无疑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第四节 战后斯大林思想的变化

战后，苏联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有战时体制性质的斯大林模式面临着改革的机遇和任务。然而，被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斯大林却对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行动。战后，斯大林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随着斯大林个人专权和个人迷信现象的日益加剧，斯大林把战前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加以神圣化、固定化。这一问题前已述及，有此不再赘述。其二是在这一整套僵化、教条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对抗性、扩张性和封闭性为特点的斯大林对外关系战略，这一战略把苏联的国民经济进一步拉入了扩军备战、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深渊”，使得苏联畸形的军事化经济更加畸形，成为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教训十分深刻。

## 一、斯大林对外关系战略的基本内容

战后，在斯大林经济、政治模式进一步神圣化、固定化的基础之上，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斯大林再造了苏联对外关系战略。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对外战略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战后，斯大林在分析世界形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战略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抗阵营；(2)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3)社会主义阵营只能以苏联为首；(4)资本主义已陷入全面、深刻的总危机之中；(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6)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将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获得全胜。

两大阵营的理论是在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完整地提出来的。斯大林明确宣布，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sup>①</sup>两大阵营的理论是为苏联同美国的军事、政治对峙和斗争服务的，因此，这一理论在表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完全一致性”，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对外战略和策略等方面都应该同苏联保持高度一致。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是在1947年出现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的阵营经济对峙的基础上，伴随两大阵营理论的产生而形成的。斯大林提出：“两大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620页。

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sup>①</sup>

苏联是“老大哥”、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思想贯穿于斯大林的一系列著作中。其实,这是沙皇俄国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1946年3月,斯大林在《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里说:“苏联为了保卫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按:指苏联军队所到国家)有对于苏军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1947年,斯大林在纪念莫斯科800周年的《贺词》中自豪地说:“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按:俄罗斯的古称)建立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sup>②</sup>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一方面助长了苏联领导人盲目自大、骄傲自满的情绪,另一方面,也使他们以形而上学的态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使得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势,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宣布自己和列宁战前对资本主义形势的估计和判断都已过时。他说:“(一)可不可以断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仍旧有效呢?(二)可不可以断言,列宁在1916年春天所提出的大家知道的论点,即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仍旧是有效的呢?我认为,不可以这样断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

<sup>①</sup>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620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499、535、536页。

条件,这两个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所以,他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势做出了如下新的判断:“各主要资本主义的国家(美、英、法)争夺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只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会增大。世界市场的瓦解所造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在这里。”<sup>①</sup>

在上述四个论点的基础之上,斯大林得出了关于战后国际形势的第五个观点,即未来的大战必将在美国 and 英国、法国、德国(西德)、日本之间爆发。其具体理由是:首先,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经济的附庸,它们迟早会站起来,同美国发生冲突,直至爆发战争。其次,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资源、商品销售市场的本性决定了下一次战争爆发的不可避免性。

最后,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将会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胜利而结束。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sup>②</sup>因此,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应只是消极的旁观者,而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争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sup>③</sup>

①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 621—622 页。

② 同上书,第 624 页。

③ 同上书,第 625 页。

## 二、战后斯大林对外战略的特征

1. 对抗性。对抗性的理论基础,是斯大林关于两大制度对立体系和两大对抗阵营的思想。早在1924年,斯大林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对立的理论,认为“这两大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sup>①</sup> 基于这种认识,斯大林把苏联看做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火炬”,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目的是“保卫苏联”,推进“世界革命”。

战后,苏联以“雅尔塔协议”为基础,为争夺势力范围,同西方国家展开了全面的对抗。在军事方面,北约成立后,苏联大力扩充军事力量和武器。1948—1949年,苏联在东欧国家布置了20多个师的地面部队,6000多架飞机。当时,北约在西欧只有10多个师,1000余架飞机。1949年,苏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局面。到1955年,“华沙条约”集团成立之后,苏联同西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集团对抗。这种对抗性不仅体现在军事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在政治上,苏联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做是两大水火不相容的阵营,对西方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淡化同西方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并且提出了打垮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政治口号。在经济上,苏联抵制和反对西方国家对东欧的经济渗透。

战后,苏联奉行的对西方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对抗战略,与西方国家一贯奉行反共、反苏立场有关,但苏联领导人奉行大国霸权主义,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认识,即认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308页。

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彼此水火不相容、绝对对立,也是重要的动因。因此,对立和对抗成为战后苏联对外关系的基本基调。

2. 扩张性。战后斯大林对外战略的这一特征是以“世界革命”和大俄罗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要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支援,苏联应该推进这一捍卫和服务于苏联利益的“世界各国革命”。后来,这一思想成为大俄罗斯主义泛滥的保护伞。战后,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内,苏联控制别国党和东欧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苏联实行领土扩张政策。

战前,苏联党凭借其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颐指气使,强迫各国党执行斯大林、苏联党为共产国际制定的、常常是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谁敢违抗,谁就是革命的敌人,“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利,因而也否认它的干预权利,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sup>①</sup>在这种大党主义的干预下,许多国家的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二战之后,苏联的这种大党主义更为变本加厉。苏联党通过“九国情报局”控制、干预各国党和国家的内部事务,在东欧强制推行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对坚持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南斯拉夫进行指责和批判,说南联盟和铁托忽视、轻视苏联的经验,具有严重的反苏倾向。1949年10月,情报局决定把南共联盟开除。随后,在东欧各国党内开展了反对“民族主义分子”和“铁托分子”的清洗运动,被清洗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和党员多达几十万人。战后,苏联还推行大国霸权主义,实行领土扩张政策。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经谈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8页。

到,此处不再赘述。

3. 封闭性。军事、政治的对抗必然导致军事、政治上的封闭性。军事、政治上的封闭性又必然要求经济上的封闭性。苏联对外经济封闭性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思想,即把统一的世界市场分为两个互不相联的、并行存在和运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由于实行同西方对抗的政策,再加上斯大林“两个世界市场”理论的作用和影响,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隔绝状态。

战后,苏联经济的封闭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拒绝同西方国家扩大经济联系和合作。比如,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企图以经济援助的手段,达到在经济、政治上全面控制西欧、拉拢东欧、削弱苏联在欧洲,尤其是在东欧影响的目的。对于战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苏联和东欧,“马歇尔计划”并非不可利用。但是,苏联党和政府却从封闭、对抗的立场出发,不仅自己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而且还不许东欧国家参与该计划。斯大林曾威胁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你们参加会议(指西方国家研究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会议),你们将会用行动来证明你们甘愿充当反苏的工具”。<sup>①</sup>这样,战后,苏联及东欧就失去了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一次重要机会。此后,苏联经济与西方经济的联系只维持在互补性和补偿性贸易这样一个低层面的水平上。

其次,是建立同世界市场隔绝的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体系”。苏联组织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波兰等国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在“经互会”内强迫东欧各国按

---

<sup>①</sup>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四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照所谓“国际分工”原则，制定生产目标，规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有利于苏联的合作机制，从而使苏联经济基本脱离了世界市场而自行运转，并且把苏联一国的经济封闭性扩大为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的封闭性。

### 三、斯大林对外战略形成的原因

#### 1. 指导思想方面的失误

首先，斯大林对列宁的时代观采取了教条主义态度，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重新认识时代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苏联的对外战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已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的事实，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规律做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已进入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也由此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仅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列宁关于时代的认识和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然而，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表现出尚有根强的适应能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斯大林仍然从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抱着僵化的态度看待列宁的时代观。当时，苏联有人指出应当客观地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如，当时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者瓦尔加在分析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时，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采取调整措施以后，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矛盾也有

所缓和,因此仍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斯大林不能容忍这种与其“钦定”理论不符的论调,称之为“反革命改良主义”,对瓦尔加等人进行政治围攻和批判,迫使他们进行“自我批评”。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两个平行的因而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这种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下,得出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的结论。很明显,斯大林对战后资本主义和世界形势的认识和估计,对苏联对外战略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与对时代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相联系的是,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也做了形而上学的曲解,认为搞“世界革命”必须有一个中心,并开始强调和鼓吹苏联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和领导作用,从推进“世界革命”到“输出革命”直至搞霸权主义。

列宁逝世后,苏联的“世界革命”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斯大林宣扬“革命中心论”。他认为,苏联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而且是指挥中心。二是宣扬“利益服从论”,把“世界革命”置于苏联的最高利益之下,认为推进“世界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捍卫苏联的利益。

早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就认为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在本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但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只有通过“革命中心”苏联的对外革命扩展,才能取得“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他认为,一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胜利是“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

助力和工具”。<sup>①</sup>“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sup>②</sup>根据从苏联这个“中心”向外扩展革命的思想，斯大林要求各国革命运动必须团结在苏联这一“世界革命的强大而公开的中心周围”，“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sup>③</sup>斯大林这里所说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首先是指苏联的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sup>④</sup>

由此可见，斯大林从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出发，要捍卫和维护的是苏联的利益，其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实际上突出的是苏联大党、大国的地位和苏联的民族利益。按照这一思想，斯大林不仅号召各国党为保卫苏联不惜一切地去发动本国革命，而且苏联还先后以“共产国际”和“九国情报局”的名义指挥、干预和控制其他国家的党。苏联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不惜损害别国的利益。战前，苏联同德国签订秘密协定，用武力吞并别国领土；战后，苏联同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并把苏联模式强加给东欧国家。这一切都是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的。

## 2. 斯大林经济、政治模式的影响

产生于特定国家形势和条件下的斯大林模式的特点，是政治上高度集权和经济上高度集中。这一模式不仅影响了苏联的内政，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34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307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8页；第5卷，第64页。

④ 同上书，第47页。

而且也影响到它的对外政策,对战后斯大林思想的进一步僵化、凝固化起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苏联模式长期以来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结果是,苏联建立起超强的军工生产能力,使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军事备战性的经济模式。这一军事化、备战性的经济模式,为苏联实现对外侵略扩张,与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凭借这一强大实力基础,战前,苏联以武力向周边国家扩展苏联的“安全地带”;战后,苏联不断加大军事投入,集中大量人力、资金和资源发展军事工业,在此基础上,苏联开始向全世界渗透,并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冷战对抗。

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模式在对内实行专制的同时,对外则谋求大国霸权。由于苏联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决策机制极不正常、不完善,所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领袖意志、爱好决定着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当然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反映出来。

斯大林时期,在共产国际和“情报局”内,苏联党与各国党的关系,实际上是苏联体制模式向其他党的延伸。苏联党以“老子党”自居,把“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原则作为处理同各国党的关系的准则,要求各国党的活动必须服从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即各国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苏联党的领导,一切听从苏联党的指挥。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都首先由苏联党做出决定,然后强制各国党执行。对不遵守这一准则的党,则采取镇压等手段加以威逼。比如,1938年,按照苏联党的旨意,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解散波兰共产党,波共领导人几乎全被镇压。

### 3. 沙俄侵略扩张的历史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

意识对战后斯大林的思想变化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沙皇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侵略扩张史。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沙皇俄国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先后兼并征服了一百多个民族;其领土从最初的莫斯科公国的二百多万平方公里,扩展到20世纪初的2200万平方公里,建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在沙皇俄国的侵略过程中,形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列宁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深恶痛绝,称其“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记录”。<sup>①</sup>但是,从斯大林时期起,大俄罗斯主义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和遏制,反而呈急剧发展、蔓延之势。苏联领导人不再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当做危害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主要危险来加以批判、反对,相反,却极力颂扬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精神和传统。斯大林公开宣布:“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sup>②</sup>斯大林还否认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对沙皇俄国扩张政策的揭露和批判,公开为沙俄侵略扩张政策辩护,认为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过于兴奋而忘记了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片面“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sup>③</sup>斯大林及以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站在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上美化和颂扬为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立下汗马功劳的伊凡雷帝、彼得一世、苏沃洛夫、乌沙科夫,称他们为“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并把沙皇侵略扩张的历史写成爱国主义教材,向全民灌输大俄罗斯主义思想意识。

战前和战后,苏联侵占他国领土,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5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336页。

③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5-6页。

权,都与沙俄侵略扩张的历史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意识的突出表现。需要强调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长期作祟与苏联领导人的对外战略思想和苏联高度集权的制度模式有着内在的联系。苏联领导人主张的以苏联为中心、苏联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所谓“世界革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价值观念有相吻合之处,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极易在苏联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思想中找到新的赖以生存的根基。同时,高度集权的模式也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在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的多民族国家苏联,高度集权必然要求各个民族“团结”在统治民族——大俄罗斯民族的周围。于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正好适应苏联模式集中的内在需要。这是苏联大俄罗斯主义长期难以消除的一个重要原因。

## 第五节 斯大林模式凝固、强化的历史影响

### 一、斯大林模式凝固化、强化 对苏联社会发展的影响

#### 1. 使得苏联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

前已述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二战以前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二战之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的苏联的力量、影响和威望达到高峰,欧亚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二战结束后,对苏联的战争威胁已不存在,一个新的时代的特征,即和平与发展的特征已越来越明

显地呈现出来。苏联领导人如能认清形势，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是完全有可能把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的。但是，恰恰是在这种形势大好的情况和条件下，他们把战前的一些具体做法、措施统统上升为理论教条，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使得斯大林模式趋于固定化和僵化，不仅给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给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2. 斯大林模式由“非常模式”演变成为“正常模式”，甚至是“惟一正确模式”，使得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历次改革都十分困难

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一直固守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拒绝对传统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也不允许东欧国家“越雷池一步”，最多只能搞点改良，从而使苏联模式日趋僵化，完全失去生机和活力。

3. 斯大林模式的固定化和僵化使得苏联社会原有的矛盾在新的历史形势和条件下不断尖锐、激化

首先，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的失误，苏联长期备战，并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名，到处伸手，争夺势力范围，最后弄得民穷财尽，被争霸战略拖垮，教训十分深刻。

其次，这一模式严重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使得苏联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同战后时期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基本趋势背道而驰。主要表现在：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的备战方针，日益落后于战后国际竞争已经转向以科技为重点的经济发展新方向；苏联高度集中的对外封闭的经济，落后于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广泛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联系；苏联以重工业为主的高能耗、高物耗工

业经济,愈来愈落后于发达国家低耗高效的信息化经济。<sup>①</sup>

## 二、斯大林模式凝固化、僵化对 东欧国家的影响

二战之后,以高度垄断的国有制为核心的斯大林模式被移植到了东欧。当时东欧国家国情与苏联不同,而且东欧各国内部的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也存在着差别。就经济状况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是较为发达的工农业国家;波兰、匈牙利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为农业—工业国家;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则基本上是农业国。二战前,阿尔巴尼亚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7%,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92.4%。罗马尼亚农业人口占78.2%,人均国民收入在22个欧洲国家中属落后之列。但是,在全盘接受斯大林模式之后,各国依靠国家意志和政权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一概消灭了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建立起高度垄断的国有制经济模式。到60年代初,东欧各国普遍宣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基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

这种在东欧各国强行推行一大二公的国有垄断制的做法,不仅不符合各国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要求,严重超越了人民的思想觉悟程度,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欧各国政治、经济管理方式和社会发展道路。如果说斯大林模式在其“原生地”苏联因其产生的特定环境、条件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过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

<sup>①</sup> 详见刘克明《苏联落后时代的教训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一文,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的话,那么,东欧国家由于各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对强加给自己的斯大林模式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正因为如此,体制问题成为战后东欧各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问题。

### 三、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巨大影响

作为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大阵营及两大平行市场的理论和实践,给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苏联领导人以意识形态为界,把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完全隔绝开来。按照苏联官方理论,苏联乃至东欧等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绝不应该通过改革开放招致那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绝对不相容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苏联出现。

其次,为了保证两大阵营理论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建立“经互会”,关起门来搞建设。为了同资本主义隔绝,苏联不仅在国内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搞成对外封闭的,而且还同经互会国家搞所谓“经济一体化”,自成体系,与蓬勃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经济相隔绝。这种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关门搞建设的做法,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主观臆想成分愈益严重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样,苏联领导人根本不能认真研究当代世界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新变化、新时代给社会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机遇。这种固步自封、自我封闭的结果,最终使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陷入了绝境。

最后,苏联以反对帝国主义、推行世界革命为由,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道路的结果,是拖垮了本国经济,而且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使这个世界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笼罩在美苏争霸的阴影之中。

## 第四编 斯大林逝世后的 苏联模式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与矛盾更加突出,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革,其政治经济体制便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程度;换言之,斯大林体制模式已成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给苏联进行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与可能。赫鲁晓夫首先对传统体制发起了冲击,之后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他们都对斯大林的苏联模式表达了改革的意图。但历史证明,改革均未取得成功,到了80年代中期,即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留给他的仍然是传统的体制模式。

## 第十九章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

赫鲁晓夫执政的 11 年,是苏联首次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时期,也是一个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充满了改革的冲突与矛盾,有成功,也有失败。这场改革开辟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新的历史时代,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的要求。我们认为,一方面,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在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的开创意义必须给予足够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模式弊端的认识深度和广度的局限,加之苏联领导层中的保守力量仍固守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其僵化的理论教条阻碍和抵制改革,使赫鲁晓夫的改革未能深入和拓展,对旧体制只是起了某种修补作用。作为斯大林时代的“产儿”,赫鲁晓夫没有也不能完成改革的重任。就其实质而言,赫鲁晓夫的改革带有探索的性质,并具有不彻底性、局限性和矛盾性等特点。赫鲁晓夫的不成功昭示着苏联的改革必定要走一条曲折漫长、困难重重的道路。

### 第一节 赫鲁晓夫改革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

斯大林的逝世给苏联国家和社会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已经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历史条件已

经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很多方面已明显不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然而这种体制并未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反而陷于僵化状态,其弊病也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战后斯大林没有顺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仍然沿用僵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分析世界形势,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发展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前景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在所谓两大阵营对抗理论上制定了僵化和偏执的对外战略和路线,不但未能及时化解战后初期苏美之间出现的尖锐冷战态势,并且由于“斯大林模式的阵营化”,冷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也全而展开。在亚洲,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局部热战的存在,国际形势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在欧洲,奥地利问题的解决发生困难,德国问题更是东西方对抗的焦点,苏联与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冷战已经达到了非战争条件下最为紧张的状态。在与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方面,由于斯大林生前在对外关系问题上采取独断专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做法,苏联同许多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特别是与南斯拉夫关系的破裂,更是斯大林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误。国际关系中的这些不安定因素,均不利于苏联国内经济建设的进行。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亦十分复杂。经济方面问题成堆,首要的严重问题是农业发展迟缓。1949年,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二核大国,工业在战后得到很快恢复并取得较快发展,1953年已达到战前水平的250%,钢铁和电力发展水平也跃居世界前列,而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为了实现“国家的总战略目标”,苏联战后不但继续实行备战经济,而且掀起新一轮农业集体化运动。为给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对

农民仍然采取“挤压”政策，强迫农民持续不断地缴纳“贡赋”，低价收购农副产品，剥夺农民。同时，在农业领导中实行命令主义和行政干预，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50年代初主要农畜产品产量甚至低于革命前沙俄时代的水平。虽然马林科夫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宣布苏联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事实上粮荒已经出现。农业的落后导致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大大滞后，人民的日常生活仍然相当困难。赫鲁晓夫在其《最后的遗言》中曾谈到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他在全国视察时，亲眼看到一些集体农庄的农民一个工作日的劳动仅值1戈比，商店的货架上缺乏新鲜的菜蔬，而一些矿工的住宅甚至不如革命以前的情况。<sup>①</sup>除此以外，经济管理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全国共有20.6万个国营企业及10万个以上散布在国内各地的建筑工程企业，各种经济联合体更是不计其数，领导如此众多的经济组织，单靠一个中央机构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提出了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

在政治方面，由于斯大林长期搞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战后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出现了个人崇拜的体制化。集权体制下党和国家机关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化现象。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和积极性受到严重束缚。卫国战争中及战后遗留下来的少数民族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之上，破坏法制问题极为突出，特别是在斯大林

---

<sup>①</sup> [苏联]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87页。

时期的各次政治镇压中,约2000万人<sup>①</sup>遭受各种迫害,清洗遗留下的成堆冤假错案成为威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硬伤。

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和社会上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了。形势已发展到非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可的境地。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还能暂时压住这一切的话,那么斯大林一旦去世,这一切就必然要强烈地表现出来。从苏联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改革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 第二节 反对个人崇拜——改革 斯大林模式的起点

“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重要标志。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斗争。从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开始,到苏共二十大(1956年)和苏共二十二大(1961年),苏联持久地、大张旗鼓地批判了个人崇拜,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这一事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由于这场斗争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从一开始,它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

---

<sup>①</sup> 关于斯大林时期遭迫害和镇压的人数,由于缺少官方公布的准确的权威资料,有各种猜测和估计,这些数字差距很大。本文所用数字引自[美国]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到的评价就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这一事件也使他的倡导者赫鲁晓夫“成为20世纪声名最为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赫鲁晓夫的评价问题,已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直到今天,对赫鲁晓夫及其“非斯大林主义化”的评价也还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历史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时,需要根据客观的历史材料,对赫鲁晓夫的历史功过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 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因

一般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大量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提高自己的声誉;(2)联系斯大林的过错,打击自己的政敌,夺取并巩固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3)改变斯大林时代的某些政策,全面推行他的政治经济路线。<sup>②</sup>笔者认为,从改革的角度看,反对个人崇拜是改革斯大林体制的起点。尽管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给斯大林后的苏联社会发展造成了障碍和困难,亟待进行一场大的变革,但在当时,变革的主观条件却不具备。这主要是因为,在斯大林执政的30年间,苏联神化斯大林的造神运动愈演愈烈,个人崇拜的消极后果已经渗透到苏联社会的各

---

① [美国]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页。(作者注:该书作者应为苏联人,但原著如此)

②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苏联]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述波译:《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个领域。斯大林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在城市,在大多数的乡村,对斯大林的崇拜已变成一种宗教现象,广大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深受其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斯大林模式和体制,甚至苏联的东正教教堂也加入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对斯大林体制作任何改革,对斯大林的理论作任何修正,对斯大林的政策作任何调整,都是不可能的。个人崇拜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成为改革创新的极大障碍。新一届的领导人要对斯大林时期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某些变革,必须以反对个人崇拜为起点,反对个人崇拜已成为实行改革起码的决定性的一步。

## 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就开始不点名批评个人崇拜。1953年6月10日,《真理报》发表一篇未署名文章,第一次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1953年的苏共中央7月全会拉开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序幕。此后两年多的时间,苏联理论界陆续发表文章和讲话,批评个人崇拜,为批判个人崇拜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尽管领导层对如何批判存在不同意见,但对批判意见是一致的。在此期间,赫鲁晓夫本人也多次不点名地批评个人崇拜。而对个人崇拜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赫鲁晓夫在这场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

历史学家在评价苏联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时候,普遍认为1956年是一个转折年,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中，又首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sup>①</sup>，并将其看成是斯大林时代结束、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标志。从一开始，“秘密报告”在苏联共产党上层就引起激烈的争论；之后，围绕这一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又产生了巨大分歧。可以说，“秘密报告”是评价苏共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运动的关键问题。以下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列举的斯大林滥用权力和违反法制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后果作一归纳：

第一，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把党内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看成是对敌斗争，抛弃了列宁的说服和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向行政压力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的道路。例如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集团的斗争都是如此。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以中央的名义行事，却不征求中央委员、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第二，个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们遭到迫害。斯大林对党、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这种大规模的清洗主要是在1936—1939年间进行的，其中以1937—1938年最为激烈，一直延续到卫

---

<sup>①</sup> 这份报告当时没有正式公布于世。在1989年复刊的《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次发表了这份报告。报告前加了一个简短的按语：“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苏共中央通报》杂志上发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的内部会议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适宜的。”在我国有各种版本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本文所引用的“秘密报告”内容参考了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的附录（该附录译自《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28—170页）以及《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中的附录。

国战争的开始。赫鲁晓夫说：“调查结果表明，在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从来也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人，而他们其实一贯是忠诚的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指出，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但是这次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却有83名被逮捕和镇压（大部分是在1937—1938年间）。这次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超过半数的人也因反革命罪而遭到逮捕。

赫鲁晓夫谴责国家安全机关使用严刑逼供，以获取虚假的口供；国家安全机关之所以敢于为非作歹，就是因为有斯大林的支持。最最粗暴地破坏苏维埃法制，对无罪的人实行严刑拷打，以逼他们招供，这种行为是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

第三，斯大林违背列宁的教导，不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以个人意见代替党的决议，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彻底破坏了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原则。他说：“在列宁去世后的最初几年内，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大体上是定期召开的，而稍后，当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时，这些原则就开始遭到粗暴的破坏。在其生命的最后15年里，这表现得尤为突出。下列事实难道能认为是正常的吗：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经过了13年多，而在这期间我们党和国家又经历了多少事件？甚至在战争结束后，代表大会也有7年多没有召开了”，“也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委员会全会。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年代，实际上没有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

第四，斯大林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加自己的光荣和声望，从而使对自己的崇拜发展到了可怕的地步。赫鲁晓夫以《斯大林传

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两本书为例指出,在很多书籍和大量文艺作品中,斯大林被神化了,成了一个“永不犯错误的贤哲,最‘伟大的领袖’和‘一切时代及各族人民的不可超越的统帅’”;“使我们光荣的共产党历史中十月革命后的整个时期只成了‘斯大林天才’事业的陪衬”。

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分裂了党的队伍,削弱了党的干部力量,造成了伟大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触发了严重的民族问题,使社会产生动荡并潜伏着不安和危机。这种情况,愈到斯大林的晚年就愈为严重。他不止一次地在报告中指出:“斯大林晚年形成的领导实践成了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渊源于他理论上的错误。他说斯大林有种说法,即“愈接近于社会主义,敌人就愈多”。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正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大量的犯错误的人,和斯大林意见不同的人以及同志和朋友都是被加上“人民的敌人”这个罪名而遭到镇压的。而在当时的实践中,所谓“人民的敌人”就是要从肉体上被消灭掉。

但是赫鲁晓夫同时又指出,斯大林所做的“所有这一切他都是从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利益的立场来考虑的”。斯大林的真正悲剧就在于:“他认为,为了党和劳动者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的成果,必须这样做。”

第五,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是造成对他个人崇拜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归纳为:任性、专横、粗暴、傲慢、滥用职权、病态的猜疑、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等。这些不良品质在列宁在世时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列宁的批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还稍加检点,以

后就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他晚年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提出了根除个人崇拜的三点措施：用布尔什维克方式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对以某种形式来复活它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继续坚持列宁的领导党的原则，首先是集体领导原则；恢复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彻底纠正长期的对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斯大林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秘密报告”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国外传播开来。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又通过了《关于介绍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决议建议各州委员会、各边区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向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介绍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从这一决议加以贯彻之时起，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就成了随着时日不断发展的社会思潮和大规模运动。

### 三、反对个人崇拜的深远意义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都曾肯定过此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所起的解放思想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9月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谈到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问题时指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种解放思想。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敢想问

题了。”<sup>①</sup>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1956年9月)《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sup>②</sup>反对个人崇拜的深远意义首先在于,它提出了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变革的重大课题,同时为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创造了思想前提。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有关政策,以及斯大林在晚年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的估计、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论述,严重脱离了苏联国内和世界的客观现实,危害和阻碍了苏联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如不从这些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苏联无法走向繁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难以取得持久的发展。而正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冲击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开辟了变革之路,将人们的思想从政治高压和禁锢下解放出来,同时通过一系列人事变动,清除了一批思想保守僵化的干部,使人们有可能对传统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如同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所言,“苏共二十大向人们讲出了他们曾经猜测的许多事情的实话后,与其说它给我们的社会提供了答案,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当时谁也没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问题极其尖锐地摆出来,即必须变革,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为了能够有说服力地提出问题,就必须说出有关过去的严酷的真话,说明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斯大林主义把它带到哪里去了。在这个意义上,揭露斯大林

---

<sup>①</sup> 转引自《刘克明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所1999年版,第374页。

<sup>②</sup> 同上。

及其罪行是赫鲁晓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动。”<sup>①</sup>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不是反映了孤立的个人要求，而是代表了一种要求改变苏联社会现状，要求打破斯大林领导下形成的固定模式和僵化观念的进步社会势力。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政治、经济及对外关系方面进行的全面调整和重大改革反映了这一势力的要求。

其次，反对个人崇拜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活跃了理论研究和探讨。苏共二十大之后，个人崇拜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准则结束了。正是在反对个人崇拜运动的推动下，苏联理论界开始冲破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僵化的理论禁区，重新探讨重大理论问题。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在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逐步展开了对斯大林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在史学界，斯大林对历史事件评价中的主观主义受到批判，以为斯大林树立个人崇拜、为社会主义模式作论证为特点的苏联历史科学研究体系被冲垮；在哲学界，重新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批判了斯大林 1937 年提出的阶级斗争将随着社会主义成就的扩大而越来越尖锐的观点，对斯大林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经济学界，提出利用利润、价格、贷款等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明确肯定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在自然科学界，纠正了过去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给自然科学学派乱贴政治标签的错误做法，促进了对最新自然科学理论的研究；在文艺界，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陆续为过去在肃反扩大化和历次批判运动中受害的大批文艺界人士恢复了名誉，文艺思想和创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56 页。

作开始活跃繁荣,迎来了“解冻”时期。

再次,反对个人崇拜推动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探索进程。将传统苏联体制凝固化、普遍化、绝对化,对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理解以及对苏联模式无条件效仿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现,显然这同社会主义在各国发展的多样化进程是矛盾的。正是反对个人崇拜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的某些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使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以苏联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时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得以结束。在这之后,改革传统苏联体制的要求逐步由一国扩展到各国,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提出反对照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强调本国特点,要在自己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如南共的铁托、波共的哥穆尔卡等,都提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一种模式,各党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道路,不要一个中心等等。50年代中期到50年代末期,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第一次席卷了多数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还应强调的是,在苏共二十大即将结束时,是赫鲁晓夫坚持要在大会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承担作报告的责任。在当时的条件和政治气氛下,在党内公开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赫鲁晓夫领导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功不可没。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巨大意义。

#### 四、反对个人崇拜中的局限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赫鲁晓夫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由于苏联共产党领导当时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所

限,也由于苏共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批判个人崇拜带来了不少的消极后果,没有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首先,在批判斯大林主义中的前后不一贯性。阿尔巴托夫将其表述为“在揭露斯大林当时犯下的罪行和评论已故领袖的功绩之间来回摇摆”。<sup>①</sup>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内斗争等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评价上,赫鲁晓夫和斯大林是一致的。一方面,他赞同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人的斗争,说“这是顽强的、艰难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对世界资本主义投降”。他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赞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赞同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他认为,由于这条路线和这条道路,社会主义已在苏联获得了全面胜利。他嘲笑“花布工业化”和以富农为重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说如果这条路线获胜,“我们那时就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就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被解除武装和束手无策”。<sup>②</sup>这些观点在苏共二十二大得到进一步重新肯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指出:“苏联的工业化是工人阶级、全体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农业集体化是在经济关系、在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sup>③</sup>事实上,恰恰是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政治大清洗构成了支撑 30 年代斯大林体制存在的三大支柱,苏联正是从这三大运动开始走上“歧路社会主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59 页。

<sup>②</sup>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3 期,第 132 页。

<sup>③</sup> 《苏联共产党纲领》,载《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2 页。



义”的。

其次,把斯大林时期的错误简单地归因于斯大林个性的缺陷和个人品质问题,而没有深刻探讨个人崇拜赖以形成的根源,在谴责斯大林罪行的同时,却拒绝对政治体制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做出分析。个人崇拜本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悖的、反科学、反民主的唯心史观和思潮。个人崇拜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但最重要的是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权力的过分集中是这一体制的要害。各种权力集中于主要领导人个人,势必形成个人崇拜。集权和个人崇拜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个人崇拜在苏共党内是自上而下地兴起来的。它之所以能够长期蔓延,首先是集权体制需要它。正因为如此,它得到了集权体制的领袖人物的欣赏、支持和提倡。同时,个人崇拜的加强也巩固了集权体制,因为个人崇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对权力的崇拜。正是在集权体制下,失衡的权力体系失去对权力的制衡,才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领导干部不受群众监督,才使斯大林的个性不受约束,得以独断专行。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远比苏联领导人的认识深刻得多,如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制度。”<sup>①</sup> 铁托在著名的普拉演说中特别指出,苏联人在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的行为和他的政策,“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作个人崇拜、而不是当作制度问题。而实际上,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还认为,斯大林问题的根源“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的一长制,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

---

<sup>①</sup> 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157页。

愿望……”<sup>①</sup>陶里亚蒂在1959年6月答记者问时也说：“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许首先与整个党的生活中各个官僚机构的权力过分增长有关。”<sup>②</sup>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却拒绝这些分析，赫鲁晓夫通过塔斯社的一篇评论进行反击说，铁托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说成是“一定制度的产物”，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一种反动的言论。他认为：“个人崇拜同我们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是极其格格不入的。”考察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个人崇拜与个人集权始终是一对伴生物，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恶性循环。随着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和凝固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顶峰。赫鲁晓夫把批判个人崇拜局限在强调斯大林个人的责任，批评迷信而不批评制度，并未解决个人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未能找到防止个人崇拜重演的正确途径。“把问题归之于对‘领袖’个人的膜拜和‘领袖’个人对崇拜的恣意滥用。在以后的发展阶段上，上述做法起到了表面拥护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而实际上放弃对个人迷信现象进行批评的作用。”<sup>③</sup>由于未能从体制和制度上解决问题，当赫鲁晓夫大权在握之后，又“重新复活”了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反个人迷信的斗士自己反倒成了个人迷信的牺牲品”。<sup>④</sup>

① 葛新生：《赫鲁晓夫传》，第156页。

② 转引自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425页。

③ [苏联]尤·列瓦达、彼·舍尼斯，《1953—1964 那时为什么没能成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1988年第18期。

④ [苏联]阿·鲍文：《国家渴望变革》，载[苏联]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 同时代人的回忆》，第19页。

### 第三节 赫鲁晓夫时期的体制 改革及其成效

赫鲁晓夫执政后,即开始对内政外交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且具有一定的深度。应该说,赫鲁晓夫已经感受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并试图寻找病因,尝试医治。赫鲁晓夫的改革主要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对外政策调整和改革三个方面。

#### 一、对经济体制的某些改革

##### (一)以“放权”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为主线的农业改革

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同农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赫鲁晓夫第一个提出了苏联农业发展有问题,并把苏联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的问题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就任苏共第一书记的中央全会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长篇报告就是专谈苏联农业问题的。在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关于农业的演说、报告、备忘录和评论,总共12集,出版了八大卷。农业变革揭开了苏联改革的序幕,而他执政后期农业政策失误导致的农业大减产又成为其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赫鲁晓夫上台之初对农业问题的基本评价是:“我国的粮食基本上是有保证的”,但农业的一系列重要部门还处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阻碍着轻工业

和食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是影响集体农庄庄员收入增长的障碍。<sup>①</sup>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主要有四:第一,农业生产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第二,许多集体农庄取消了个人副业,破坏了把集体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对技术设备的利用不能令人满意;第四,现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不能刺激先进的集体农庄。<sup>②</sup>从农业改革的方向和实际效果来看,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改革以195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以前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放权”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是这一阶段改革的两大思路,1958年之后的改革则是向相反的方向进行,其实质是“收权”和搞行政命令,侵犯农民的经济利益。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1)改变农业计划管理制度,使集体农庄有较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2)全面改革农产品采购制度,取消义务交售制,改行收购制,取消多种价格结构,实行统一收购价格,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3)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合并集体农庄,发展国营农场;(4)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的物产税,对个人副业采取有限制的鼓励政策;(5)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鼓励原则,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6)探索基层劳动组织形式,推行小组包工奖励制;(7)增加农业投资,大规模垦荒。从实践看,赫鲁晓夫农业改革的思想切中了苏联传统农业体制的弊端,基本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使农业焕发了活力,调动了农民

---

① [苏联]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1卷,莫斯科,1962年俄文版,第10—11页。

② 详见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1卷,第12—13页。

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苏联农业形势好转,农业十分落后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农业形势的好转,除气候因素外,主要是农业改革带来的成效。1958年之后,赫鲁晓夫转而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农业发展的措施,如提高集体农庄内部积累,强行合并集体农庄,“提高集体农庄的公有化水平”,<sup>①</sup>降低农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农业机器零件价格,重新规定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目和饲养牲畜的定额,限制个人副业的发展等,这些措施大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后期的大规模种植玉米计划、取消休耕地、取消草田轮作制和掠夺式垦荒等错误做法阻碍了农业的正常发展,苏联农业生产在1963年重又陷入困境。1963年的农业灾难是对赫鲁晓夫农业路线的一次检验。与1958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63年的农业灾难主要也并非气候所致,而是赫鲁晓夫考虑不周的农业改革和农业政策造成的恶果。

#### (二)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的工业建筑业改组

在工业方面,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传统的、按照一元型结构的层级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部—总管理局—企业三级管理或部—企业两级管理体制妨碍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在他执政以后,力主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但在1957年之前,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整体改革的完整方案。1953—1956年间,只是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革和调整,有限度地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经济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如精简中央管理机构,改组计划体制,减少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在计划工作、基本建设、劳动工资、物质分配和财务工作等方面的权限。然而,这些改革措施没能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问题。1957

<sup>①</sup> 《赫鲁晓夫言论》,第8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38页。

年，赫鲁晓夫下决心对整个经济体制，特别是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行大改组。改组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57—1958年）的改组原则和设想是：加强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原则，改“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形式，建立经济行政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发挥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积极性。具体措施是：（1）除国防工业和某些关键性重工业部门继续实行中央控制外，所有其他部门，尤其是消费品生产部门，全部取消中央部委的直接领导，将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撤销25个联盟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部，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每区设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管理工业和建筑业的基本环节；（2）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撤销国家经济委员会，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进一步改善计划工作，减少国家计划指标，新建的国家计委负责全国长期与短期计划的平衡工作。第二阶段（1959—1961年）的改组重点是进一步发展各经济行政区、各共和国内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专业化和协作化，提出了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集约化生产、加速技术改造方面的任务，改组的主要内容是：（1）发展经济区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2）建立跨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单位；（3）推行国家标准化和规格化；（4）建立生产联合公司。从上述内容和措施看，这次大改组不是市场取向的“经济性分权”，而是在计划经济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从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进行的“行政性分权”；不是根本改变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而是把该体制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层次；不是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而只是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将其由中央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变成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因而改组不仅不可能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还会导致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如地区的“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泛滥。加之改组

触犯了过多人的利益,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再也难以进行下去了。改革受挫迫使当局采取紧急补救措施,中央回收部分物资分配权和部分生产计划权,合并和调整经济行政区,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了改组前的情况。这表明,行政性分权并非改革传统体制的可行之路,改革要取得进展和最终成功,必须另觅他途。

### (三)“利别尔曼建议”:经济改革新处方

所谓“利别尔曼建议”,是指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叶·格·利别尔曼于1962年9月9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在该文中,利别尔曼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由此触发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出现的背景是:60年代初,一方面由于工业大改组的失败,另一方面由于苏联经济中的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慢、资本产出率下降等越来越突出,迫使赫鲁晓夫寻找新的改革途径。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新的改革方向,即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强经济核算等。在大力宣传和贯彻苏共二十二大精神的形势下,“利别尔曼建议”在赫鲁晓夫授意下在苏联《真理报》发表。

利别尔曼建议的中心思想是以统一核定的部门资金赢利水平定额作为企业编制计划和对企业进行物质奖惩的基础,试图通过利润杠杆来刺激、鼓励企业接受高计划任务,挖掘生产潜力,克服国家与企业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主张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利别尔曼对如何清除苏联当时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第一,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编制本企业计划的权限。第二,改革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国家要“为各个部门以及

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制定并核准供长期使用的计划赢利定额”，从而根据赢利的多少来评价企业工作的优劣。第三，改革奖金分配制度。把奖金与企业的赢利状况联系起来。第四，规定灵活制定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

《真理报》在发表该文时加的编辑部“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号召展开讨论。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苏联展开了颇有声势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佳生产效果”的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国性、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刊都刊登文章，参加讨论。后来，这场讨论又越出了苏联国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学界都对利别尔曼建议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使之成为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波”，冲击了斯大林关于价值、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大讨论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和赞赏。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研究这些建议”。1964年，苏联科学院的生产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学术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这场讨论进行总结，并写出综合报告，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进奖励基金的形成办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采



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科技进步新产品的刺激,等等。综合报告肯定:利润是工作质量的指标、生产发展和刺激奖金的源泉。该委员会后来提出了对这一建议进行大规模试验的建议。但试验还未来得及全面推广,赫鲁晓夫就下台了。

“利别尔曼建议”的提出和讨论,无论对于苏联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而言,都是一个进步。但是,由于受到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等客观条件和人们思想认识及理论水平的限制,这场讨论具有明显的局限和不足。从上述讨论内容和总结看,这场讨论的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实质是在保持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以完成计划指标的情况作为主要考核尺度不变的条件下,更多地运用物质刺激的手段来激发企业完成计划指标的积极性。这一改革思路还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仍停留在传统经济理论水平上,没有改变企业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地位。这对推行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改革是极为不利的。尽管如此,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引发的大讨论在苏联改革史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讨论亦可视为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对传统理论和传统体制发出的一次认真的巨大冲击,为后来的柯西金改革起了理论导向的作用,对东欧国家的改革也起到了借鉴和启示作用。

## 二、对政治体制的某些改革

赫鲁晓夫在对农业和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了调整和初步改革。但他只是意识到改革苏联党政领导体制的必要性,对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想。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改革对传统政治体制仍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赫鲁晓夫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健全法制、改革干部制度、加强党政民主制度建设，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项。

(一) 批判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批判个人崇拜的直接结果，就是实行集体领导。在整个体制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着重强调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突出个人，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几次调整。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有三项。第一，把党政最高职务分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赫鲁晓夫担任，政府首脑先由马林科夫，后由布尔加宁担任。第二，苏共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定期举行会议，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第三，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充分发挥中央全会的作用，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以及主席团内部的分歧均通过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二) 恢复和健全法制。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联合采取断然措施清除了贝利亚，严格限制内务机构的职权，结束了内务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不正常局面，进行了大规模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赫鲁晓夫时期，数百万被无辜关押和劳改的人被释放回家，数百万人被死后恢复名誉。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对苏联国内生活来说，数百万人获平反的重要意义，不在苏共二十大之下。在这方面，为了更深刻地否定斯大林的理论在法制方面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苏联法学界还对师承斯大林观点的维辛斯

基法学理论进行了批判,<sup>①</sup>力求从根本上纠正过去的错误。与此同时,健全了司法制度,完善了立法。上述各项工作对苏联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三) 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干部轮换、实行任期制的思想由赫鲁晓夫首先提出,在高层领导中经过酝酿和争论,由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表达出来。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由选举产生的各级机关的经常更新,今后应成为不可违犯的党内生活准则,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生活准则。”<sup>②</sup> 苏共二十二大把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和每次选举时的淘汰比例写进了党纲和党章,而且还准备写进宪法。这项措施硬性规定:每次例行选举,中央委员及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 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三届连续当选,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每次选举时至少更换 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这项措施对苏联长期实行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是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措施。赫鲁晓夫认为,这项

---

① 安·扬·维辛斯基(1883—1954),苏联前检察长,前外交部长。主要著作有《苏联法律》、《法庭答辩》、《苏联法院组织》、《国家和法的理论诸问题》等。长期以来,维辛斯基是苏联法学界权威。按照谢列平的说法,“在法律科学中,形成了对维辛斯基的独特的个人崇拜”。维辛斯基的法学理论是建立在斯大林提出的某些错误理论的基础之上,为斯大林的错误政策服务的。其理论对扩大打击面、制造冤假错案产生了有害的作用和影响。从 50 年代中期起,苏联法学界开始系统地对维辛斯基的法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把这一批判同纠正 30 年代的冤假错案联系起来。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402 页。

措施可以成为防止个人崇拜复发的“保障”，“将为更彻底地实现集体领导制原则创造新的可能性”。<sup>①</sup>

(四)调整政府机构，精简管理人员。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即对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央部级单位通过合并减少了一半左右，人员编制精简了75万。苏共二十大提出了进一步“简化机构”，同官僚主义作“最无情的斗争”的任务。但到赫鲁晓夫后期，政府管理机构又重新扩大。

(五)改进苏维埃制度。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批评个人崇拜的同时，对苏维埃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进行了分析和揭露，并在改进苏维埃工作、扩大地方苏维埃权限、完善苏维埃内部结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完善最高苏维埃的两院制，加强常设委员会，确保苏维埃代表实现其权力和义务，确定苏维埃代表定期轮换制等。地方苏维埃的作用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同当时实行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相联系的。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有：扩大地方苏维埃代表的人数，把一些具体权力转归地方苏维埃，重视并提高地方苏维埃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作用等。由于改革是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缺乏长远而全面的指导思想，改革的许多措施都带有应急的性质，缺少相应的补充和配合，苏维埃作为橡皮图章和装饰品的命运没有多大改观，始终也未能克服苏维埃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各级苏维埃也未能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

(六)改组党的组织结构。改组的基本思想是按照生产原则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组织结构，具体做法是在边疆区和州一级分别成立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的系统。由于改组后的二元化党的领导结构割断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工农业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76、277、402页。

中出现许多无人负责的“盲点”，同时使管理机构更加庞大，党政不分现象更加严重。改组不仅没能使党组织更有效地管理经济，反而使党政领导建制系统复杂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从一开始，这一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新的管理体制的缺陷就暴露无遗。对这次改革，东西方学者有不同的评价。西方学者认为，这是赫鲁晓夫无数改革中最大胆的也许是考虑最不周到的一项改革。而苏联的一些资深学者则认为，不能将其只视为随意的即兴之作，它是完全有意识地破除权力巨大的官僚主义机关的垄断的尝试。<sup>①</sup>

### 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

从以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看，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领域相当广泛，而且具有一定的深度，改革触及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各种弊端，提出了有益的改革思路；但同时，赫鲁晓夫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两重性。他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各种危机，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自觉地剖析和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从其改革的内容上看，具有直接的针对性。如，在政治上，主要是消除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造成的后果，恢复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紧张状态；在经济上，主要是为了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防止强制集体化给农业经济带来的消极状况进一步恶化。因而，这一时期改革的各项措施并不配套。虽然某些改革措施触及到体制方面的弊病，但大都没有针对问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61页。

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制定出比较完整的方案,改革中的策略步骤并不连贯、稳妥,因此,在改革过程中,某些措施随着社会压力的减轻而中止推行,某些措施则因缺乏相应的保证而半途而废,某些措施因为消极后果过大、又缺乏相应的抑制措施被迫放弃,某些措施则因为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受阻。就总体而言,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极大地冲击了旧体制,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只是在传统体制的框架之内对其作一定程度的修改,苏联社会生活形式并没有改变,国家权力依然掌握在党的上层少数人手里。赫鲁晓夫只能改变当时势态的个别面貌,却不能改变势态发展的一般趋势。改革后的政治体制,保留了斯大林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即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国家政权和社会权力高度集中于共产党,权力缺乏约束和有效监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个人集权劣根未改。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虽然主张党政分开,自己也不兼任政府的一把手,但在党内“最后一个反党集团”被打倒之后,他又重新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又一次形成权力个人独揽的局面,导致“个人迷信的重新复活”。<sup>①</sup> 将党的组织结构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做法又使以党代政、党越过政府部门直接对经济建设做出具体指示的错误发展到更难以避免的程度。赫鲁晓夫改革干部制度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实行干部的更新制度。这一制度一方面规定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和连任届数,另一方面又作了一条例外的规定,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留了尾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还规定:“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高度的政治品质、组织者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连

<sup>①</sup> 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向中央全会作的另一个报告。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7,卷宗223。

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下须有 3/4 的选票投票赞成方可当选。”<sup>①</sup> 这项规定实际上为赫鲁晓夫这样的领导者不受限制地连选连任、终身任职提供了可能性。赫鲁晓夫本人从 1939 年联共(布)十八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经过十九大、二十大、二十二大,已连续当选四届,任职长达二十多年,干部轮换制最终被终身制所取代,干部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也根本没有变化,这表明他的干部更新制度也是不彻底的。其他如党内民主、苏维埃地位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也未能改革中得到解决。正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符·布鲁斯所指出的,斯大林之后,苏联在总体上并没有发生运行体制的根本改革,没有在企业 and 中央一级进行体制民主化的改革。<sup>②</sup>

改革后的苏联经济管理体制也保留了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配置资源的基本方法依旧是计划经济和计划方法,中央集权仍然是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1957 年到 1964 年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改革,恪守的依然是传统的产品经济观念,所谓“改善管理组织”主要是解决“条、块”关系。该措施虽对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起了一定作用,但与不良后果相比则失大于得。这次改组大大缩减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了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从工业产值比重看,1959 年,由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72%,经济区以下的地方政府管理的工业占 22%,中央直接管辖的工业占 6%(改组前为 45%)。从物资分配看,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从过去的 6000 多种减少到 1100 种。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277 页。

② [波兰]符·布鲁斯著、郑秉文等译,《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与政治体制》,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3 页。

从计划制定看,改组后,由于中央把计划、物资分配、财政等方面的许多权力交给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后,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统一宏观管理,切断了中央领导经济的各种渠道,造成了“地区割据”,破坏了国民经济综合体的发展。全国同一行业企业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受到严重影响,技术政策难以统一,全苏工业建筑业管理一时陷于一片混乱。各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表现出明显的保护本地区企业的倾向,实行经济割据,为了本地区的利益,争上计划外工程和非生产性项目,结果,1958—1962年,苏联新建项目增加了1/5,未完工程量增加了50%以上。<sup>①</sup>1962年10月,“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结构的做法又导致党政经机关的职能、权力和义务交织和彼此替代,工作重叠,机构设置恶性膨胀,到1963年,全国管理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增加了三倍以上。根据社会主义各国多年的经验教训,经济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既要改进和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又要搞活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而工业建筑业改组只是管理机构搬家,企业内部改革基本上未涉及。微观管理原封不动,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宏观调控和企业自主经营的关系过程中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条块搬家式改革造成的宏观管理失控不仅未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使工业增长速度下降。1951—195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1%,而在改革后的1956—1960年,反而下降到10.4%,1961—1965年又下降到8.6%。(见表1)

---

① [苏联]《经济问题》,1963年第11期。转引自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表 19-1 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年增长率(%)

年 份	国民收入	劳动生产率	人均实际收入
1955	11.9	9.5	0.9
1956	11.3	7.0	5.9
1957	7.0	6.6	8.7
1958	12.4	6.2	5.9
1959	7.5	7.4	1.8
1960	7.7	5.4	6.4
1961	6.8	4.4	1.6
1962	5.7	5.5	3.2

资料来源：苏联官方统计。转引自 A. Hewett,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p. 226.

据苏联经济学家统计,从 1958—1963 年,由于工业投资效益下降,国家损失了 1500 亿卢布;这期间,除电力和冶金工业外,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都在急剧下降,这是以前 40 年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改组的另一个目标,即以集约化生产代替粗放发展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达到。1955—1960 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达 7.8%,在七年计划期间下降到 5.6%,1963 年为 5.2%,1964 年上半年为 4.2%。<sup>①</sup>

从农业部门看,改革前半期指导思想基本对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54—1959 年间,农业产值以平均每年 70% 的速度增长。

<sup>①</sup> 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7,卷宗 223。

1958年,苏联农业创了奇迹,谷物产量达13470万吨,比1953年增加了5220万吨(1954年以前,苏联谷物产量从未突破1亿吨大关),畜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的迅速发展使食品工业和相关的轻工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居民的饮食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增长了37%,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向居民出售小汽车。50年代后半期,开始调整工作日,实行一周休息两天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农业发展的结果所致。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实行农畜产品统一收购制度以后出现了浮夸风和高征购,破坏了对农民的物质利益原则;拖拉机站改组推行过急,使一些经济力量不足的农庄陷于困境,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农机修理基地,减少了农机的生产和供应等,这也是后来农业发展速度降低的重要原因。1958年之后,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由一方摆向另一方,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限制个人副业、合并集体农庄、将其转为国营农场等,大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其他一系列农业增产措施,如垦荒、种玉米等也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按照七年计划的规定,1959—1963年农产品的年均增长速度应为8%,实际上,前四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7%,1962年、1963年因连年歉收,农产品出现负增长,按产值计算的总产量低于1958年的指标。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成本本应降低2.1%,实际却提高了24%。苏联国内粮食严重匮乏,赫鲁晓夫不得不恢复战后早已停止了凭卡供应制度,国家动用860吨黄金储备,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这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进口粮食)。在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内,集体农庄庄员作为劳动报酬领得的粮食也逐年减少,1963年甚至不到战前的一半。(见表19-2)农业状况的不断恶化,使赫鲁晓夫前期农业改革虽有明显成效,但却不巩固,随着一些消极因素的发展,最终导致农业改革的失败。农业改革的失败直

接影响到国内市场的供应和居民的消费水平。由于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严重影响了职工实际工资额度,引起了居民的不满。1964年,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向中央全会作的另一个报告中,对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作了如下总结:“在这些年里,由于连续不断地实行改革和推行种种‘新的’管理制度等等,工业、建筑业与农业都明显地陷入解体。”<sup>①</sup>

表 19-2 1940—1963 年部分年份作为劳动报酬  
发给每个集体农户的粮食(公担)\*

1940	8.2
1953	7.2
1959	7.1
1961	5.8
1963	3.7

资料来源: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7,  
案卷 223,第 12 页。

\* 1 公担相当于 100 公斤。

#### 四、外交战略思想、政策的调整

如前所述,斯大林晚年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这使战后出现的美苏以及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国际紧

<sup>①</sup> 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3,目录 67,卷宗 223。

张局势一直未能缓和下来。由于政策的失误，苏联在尖锐的冷战中受到经济技术封锁，外交活动亦受到重重阻碍。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在新的基础上分析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国际客观条件变化的新观点，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尽量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新观点集中体现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主要包括以下问题：“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等，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理论，并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上述理论对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不可避免理论、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理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作了修正。

在新的理论指导下，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了全面调整。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所谋求的主要目标是：化解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状态，消除战争危险，为自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改变当时苏联所处的被动防守外交态势，通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使苏联尽快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实现美苏联手，共同主宰世界；进一步调整与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输出革命，采取“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手段，加紧向第三世界的渗透，扶持亲苏势力，扩大并增强苏联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霸的力量。赫鲁晓夫对外政策实施的结果，使整个国际局势由冷战过渡到有限的缓和，由两大阵营的对抗过渡到彼此间的对话，推动了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实行闭关锁国造成的苏联与西方的经济关系停滞不前的状态。

尽管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了很多新变化，但在决定其对外政策的主观因素中，确也存在几个与斯大林一脉相

承的要素,这就是霸权主义、对外扩张和民族利己主义。与斯大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试图把原来美苏各霸一方的尖锐对抗变成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大力发展军备。正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联走上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苏联的对外战略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它使苏联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主要是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发展战略,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同时,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时,也没有放弃“老子党”和大国霸权主义思想,试图用各种办法乃至靠强权控制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各国对外政策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导致同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关系先后破裂或冷淡,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未能改善。

#### 第四节 赫鲁晓夫改革半途而废的原因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的改革出现了许多矛盾现象:一方面,他比苏联同时代的其他领导人更富有创新精神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精神,提出了一些具有突破性和强大冲击力的改革措施,在体制改革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他又非常“僵化”、“守旧”,以致许多改革有始无终,或者事与愿违。这使得他在实践中没有真正把握住改革的良机。他试图在行政协调的范围内改善经济运行效果,结果不但没有削弱行政管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强化了行政管理,同时还由于有些时候、有些方面缓和了利益矛盾,其改革措施反而有助于巩固传统体制的地位,拖延了根本性问题的解决,致使矛盾不断积累、激化。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苏联在他之前所进行的改革,“都是半途

而废的和不成功的”。<sup>①</sup>之所以如此，除了传统体制的弊端根深蒂固外，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未能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理论体系的束缚和影响。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体制而使改革不彻底。从一般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改革半途而废主要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制约。

一、指导理论的陈旧是改革难以成功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改革坚实的基础是正确的理论指导。苏联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转换，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的僵化和理论的陈旧。苏联历史中，“左”的理论和政策长期居主要地位，“左”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人民积极性的发挥，限制了制度设计和选择的范围。“左”的教条主义在赫鲁晓夫那里不仅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构想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越来越成为纯粹的主观臆想，而且还表现为，作为改革意见提出的新思想，由于各种原因，也往往局限在某种确定的框架之内。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然而，恰恰是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思想理论领域，长期受到排斥和否定。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法等基本问题上有许多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决策上的失误，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沉重的理论遗产。时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阿尔祖马尼杨院士认为：“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处理，以及他在头脑

---

<sup>①</sup> [苏联]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中对这门科学的作用形成的不正确的概念,致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陷于贫困,并且削弱了它对于革命事业的实际意义。”<sup>①</sup>还有经济学家认为,苏联工业化时期付出的无法估量的“代价”之一,就是使经济学的发展至少落后了20年。赫鲁晓夫是以斯大林的批判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上台之后,确实给沉闷的苏联政坛带来了新鲜空气。他提出了许多与其前任不同的理论,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方法,如中央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指令性计划的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经济工作领导方法、主要依靠粗放方式发展经济的经营方式。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摆脱政治和社会思维陈规旧套的束缚。这类陈旧观念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天然完善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惟我独尊”;计划经济无条件地优越于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仅由于其本性就能从各个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等。经济学家列瓦达等认为,“一时冲动和恍然大悟并不足以使人摆脱政治和社会思维陈规旧套的束缚”,斯大林这一所谓理论权威败亡之后,又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官僚阶层”,他们为维护业已定型的陈规旧套而绞尽脑汁。随意改换理论提法,出版许多有关历史、经济、哲学等等大部头的集体著作,却毫无新意,只起加固陈规旧套的作用。在1956年之后的所有批判活动中,“修正主义”成为对付任何被视为危险的思想的最常用的大帽子。<sup>②</sup>对斯大林的理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大的突破,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批判、“守旧”基础上的

<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通报》1964年第9期,第4—5页。转引自[英国]莫舍·卢因著、倪孝铨等译,《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23—124页。

<sup>②</sup> [苏联]尤·列瓦达、符·舍尼斯:《1953—1964 那时为什么没能成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1988年第18期。

“创新”。以下仅就苏联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作一简要分析。

1. 始终坚持“产品”经济观,没有从本质上认清社会主义和商品市场的联系,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二者对立起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能否结合,直接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苏联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命运,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苏联理论界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经历了长期艰难的过程。20世纪20年代,商品生产随着社会主义的建成而消亡的观点在俄共(布)领导人中和苏联理论界占主导地位,这一观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sup>①</sup>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正是在这种认识下,苏维埃经济创建之初,布尔什维克党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贸易等当成资本主义的残余加以排斥。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和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使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修正了原来的认识。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过多次反复。对苏联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30年代,苏联理论界主要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本来面目的商品生产(从而也包括价值规律)的思想出发,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的具体形式的本质问题,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的特点上。经济实践虽然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完全实行产品经济行不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将长期存在”,但继续认为货币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工具”,商品货币关系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仅仅是因为苏维埃商业没有办得尽善尽美。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社

---

<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的预测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著作中。



会所固有的。苏联经济学家叶列明在有关论文中指出：“在整个战前时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货币形式问题，尽管一直是经济学家注意的中心，但还没有形成（像战后发生的那样）商品生产的观念。”<sup>①</sup> 50年代初，联共（布）中央召开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的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问世，对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作了结论。这本书概括了30—50年代苏联经济理论探索的某些积极成果，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但该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书中，斯大林提出了后来长期影响苏联乃至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制定的观点：（1）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是由于存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国家只能支配国营企业的产品，集体农庄的产品由农庄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必要的；（2）苏联存在的是特种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是由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3）商品生产的范围仅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生产资料交换时并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生产资料只保持着商品的外壳；（4）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仅限于流通领域，它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只能影响生产。这种传统的以产品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长期地发挥着影响，它不仅是造成苏联经济体制扭曲的重要因素，也是体制改革深化的重大思想障碍。赫鲁晓夫主政时期，苏联理论界对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争论，尽管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有所发展，但一直未冲破

<sup>①</sup> 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86页。

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基本理论框框,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其实质不是商品生产”的观点在理论界仍占统治地位。60年代初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坚持的仍然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基本原因”。<sup>①</sup>对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争论中,虽然也出现了“非商品派”、“社会主义存在新型商品生产论”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等多种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社会主义不存在原本意义的商品生产的观点,仍认为对社会主义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同时仍把价值、价格、供求、利润、成本等经济范畴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因素。直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情况才有所改变,经济理论有所发展,但仍然没有重大突破。对于商品货币关系,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sup>②</sup>但也仅此而已。即使是60年代初期,在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讨论中,苏联经济学界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表述,而是较多地使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等概念和术语。在讨论中,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看作是计划经济,然后再引入市场调节的成分,是苏联经济学家所持的基本观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提出的都是一种过渡性的不彻底的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

---

① [苏联]《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莫斯科: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63年俄文版,第224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6页。

烙印。他们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商品经济,只是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认为商品、货币、市场等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原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他们过多地将着眼点放在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引入市场调节的成分,始终未能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也未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理论。经济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得赫鲁晓夫时期进行的改革只能是在坚持原体制基础上的调整和完善,改革措施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围绕着行政分权问题来展开,在集权与分权上较侧重于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而对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商品货币关系仅被看作是改进计划工作的一种手段。50年代中期,在农业政策调整和变革中,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用货币向集体农庄采购粮食,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出售技术设备,这些做法实际上已把市场和商业关系引进到农业经济中来,但赫鲁晓夫却始终不愿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有市场和商业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农庄的关系从来不是,也不应该建立在纯商业利益的基础之上;农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市场上,寄托在买卖的价格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律”;<sup>①</sup>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削分子。对他来说,市场和商业利益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并且也不导向社会主义。1958年之后,苏联农业发展出现挫折,赫鲁晓夫认为主要是因为集体农庄出现了“寄生虫”,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投机倒把分子”,即是因为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发展才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受阻,从而采取

<sup>①</sup> 《赫鲁晓夫言论》第10集,第474页。

措施禁止农民私有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农业商品经济思想，赫鲁晓夫只是从“放权”和“物质利益”原则这样的浅层次上改革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而没能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彻底改革传统农业经济模式，这使其农业改革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各项措施也就总是限制在巩固现行的集体农庄的体制范畴之内，而工业建筑业的改组也只能是一种机构的改组，着眼点是用“块块”代替“条条”，实际上只是从按部门原则转到按地域原则构建全部行政命令体制，而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以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等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2. 对公有制教条主义的理解，片面追求所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三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决定社会性质及其变革的基本问题，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服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苏联颠倒了二者的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有关未来社会的公有制形式生搬硬套到苏联社会，不仅将公有制界定为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将其绝对化，而且还进一步强化全民所有制，人为“放大”全民所有制。早在1936年，苏联通过的新宪法就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作为苏联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奠定了。”新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由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构成，其他非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混合型所有制在法律上都没有地位，仅允许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内容包括：公民劳动所得收入和储蓄、住宅、家庭副业、家庭日常用品、个人使用与享受的物品及公民个人财产的继承权。苏联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为蓝本编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国家所有

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的生产形式是社会主义生产的高级形式。”“国营企业中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最成熟、最彻底的。”<sup>①</sup>公有制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是斯大林产品经济观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体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套自30年代初开始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概念，成为似乎是不可侵犯的、最为敏感的理论禁区。在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中，所有制理论是最少受到触动的领域。赫鲁晓夫错误地把公有制的纯洁度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衡量指标，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有高低之分，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集体所有制次之，农民个体经济（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其趋势是“自然消亡”。农业实体的规模越大越好，越是大规模就越能实现最新最好的技术投资，大型国营农场被看成是最有效率的经营形式。在他执政期间，在农业中一直持续不停地进行集体农庄的改组，一方面将小的集体农庄合并成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另一方面将集体农庄改建为国营农场。经过这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升级后，1955年，全国集体农庄数目比1953年减少近60%。赫鲁晓夫在执政之初，曾经采取了鼓励私人副业发展的措施，一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只占全苏耕地总面积3%的个人宅旁园地上，生产出了占苏联农业总产值1/3的农畜产品。现在来看，实行这一政策只是权宜性的，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新的认识或政策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在越大、越公越好的思想支配下，1958年，在农业状况有所好转后，对待个人副业的政策就由扶持转变为限制，开始收回、取消社员的宅旁园地。1958年12月19日，苏共中央全会在《最近五

<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8、429页。

年来农业发展的总结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随着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发展，庄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sup>①</sup> 这些认识和说法鼓励了各地对私营经济的限制，个人副业急剧减少。上述做法使得苏联一直未能将农业变革引向深入，未能调动农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农业问题也一直未能解决。虽然后来又强调个人副业不仅不违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而且还是居民收入的“重要补充”，但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个人副业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私人养畜业也没能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在工业中，赫鲁晓夫取消了手工业合作社，把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把它们交给共和国有关工业部或州和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管辖。到50年代中期，苏联工业中已不复存在手工业合作社。这种片面追求公有化的做法，使工业集中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过早地消灭手工业合作制，急于向单一的国营所有制过渡，以及工业的高度集中化，不仅严重违背了列宁关于合作制的思想，而且不利于发挥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3. 对苏联国情缺乏科学认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定位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全局构想的一个根本理论和实践问题。长期以来，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一直存在“左”的冒进思想。而在赫鲁晓夫时期，这一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左”和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

---

<sup>①</sup>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82、383页。

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sup>①</sup>从理论根源上说,冒进思想产生于斯大林的“一国共产主义论”,而“一国共产主义论”又是在“一国社会主义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的危害和后遗症之一是混淆社会发展阶段,使领导人实行超越阶段的社会经济政策。斯大林于1924年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以后又多次论述这一问题,并且把共产主义的具体标准规定为“生铁达5000万吨,钢达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是冒进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了斯大林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原理,而且还制定了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计划。这一时期的冒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赶超美国与改革全部纠缠在一起。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对于苏联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赫鲁晓夫认识还比较冷静,他当时批判有的人“开始制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详尽的时间表”,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用“直接的产品交换代替苏维埃贸易的毫无根据的建议”,强调必须纠正“那些脱离实际、在社会主义经济根本问题上造成有害的混乱的空想家和幻想家的错误”。<sup>②</sup>但到1957年2月16日,赫鲁晓夫自己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会议上提出:“现在苏联已经拥有一切必要条件,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

---

<sup>①</sup> 这是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结论”中讲的。转引自张大军著:《改革的“雷区”——关于所有制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sup>②</sup> 赫鲁晓夫1956年2月1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报告,载《人民日报》1956年2月18日。转引自刘克明、吴仁彰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sup>①</sup> 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提出的工业与建筑业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农业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提出“苏联已经具备一切条件，要在今后几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畜产品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等产量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sup>②</sup> 到1959年的苏共二十一大，赫鲁晓夫更是大谈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提出在今后的15年内，苏联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急于过渡的冒进思想发展到了顶峰，提出要“在20年内（到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明确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把在10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上超过美国作为建立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一个重要标准。<sup>③</sup>

赫鲁晓夫超越阶段发展的思想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等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第一，它对本国经济文化方面的落后性认识不足，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过高估计主观意志的作用，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脱离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方面盲目求纯；在所有制方面，追求一大二公，急于使个体向集体、集体向全民过渡；在分配方面，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在经济体制方面，强调指令性计划，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制定不切实际的方针和政策。第二，超越阶段发展的思想干扰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使原本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实际停止，重新强调国家干预原

① [苏联]《真理报》1957年3月30日。

② 同上1957年5月23日。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72页。



则,将已放松的经济政策重新往回收缩,这在农业政策、所有制政策上表现尤为突出。第三,超越阶段思想还严重阻碍和影响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对苏联社会和改革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难以进行认真深入的探讨和论证。在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苏联理论界相当活跃,但冒进思想的提出却使理论界无法实事求是地研讨问题,本来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注意力被引导转移到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来。在政治方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组织转变的前景上,诸如国家和法的形式、政治制度、权力作用机制、实现民主的形式、健全民主制度和国家决策程序、政治体制必须革新等一系列问题却被忽视了。第四,超越阶段思想导致只能借助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再度奉行传统的赶超战略。从斯大林时代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决策就是以在短时期内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为基础的。贯彻这条总路线的三个基本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粗放的经营方式和具有无上权威的行政领导体制。赫鲁晓夫“赶超美国”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所强调的也都是“高速度”,实现这种“高速度”要求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杠杆,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行政命令体制。苏联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除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外,另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的粗放性,重视数量指标,忽视技术进步和效率。赫鲁晓夫时期虽然狠抓了原子能的利用、人造卫星和火箭等尖端技术,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却相当落后。同时,由于片面追求数量指标,重复建设、产品质量低下、资源浪费、劳动生产率低等现象一直十分严重。

总之,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

从根本上说,改革停留在浅层次,与指导改革的理论的陈旧有直接的关系。理论上的局限直接限制了改革的制度设计和选择范围,使改革的方向、目标不明确和改革措施不配套,理论上的贫弱成为他改革不能功成圆满的重要因素。

二、反对个人崇拜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的复杂局势成为阻碍改革探索的客观压力。非斯大林化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效探索在逻辑上本应是一致的,然而赫鲁晓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发生了动摇,在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和改革探索中发生了变形。这一方面是由于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模式弊端认识上的深度和广度的局限,加之苏联领导层中的保守力量仍固守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其僵化的理论教条阻碍和抵制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非斯大林化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的动荡的反作用。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斗争,不仅引起了苏共和苏联社会本身的心理危机,而且还引起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极大震动。在苏联这个几十年来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英明领袖、正直公正的共产党人的国家,在苏共中央没有采取任何事前措施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立即在党内和各阶层引起了混乱,真理和谬误的天平失去平衡。这一时期的社会情绪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倾向:对一些普通人,包括普通党员来说,非斯大林化等于摧毁了原来精神支柱的核心,他们难以抛弃过去的信仰;对知识界和文艺界来说,他们把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理解为科学与创作自由的开始,他们逾越所划定的控制线,从批评斯大林个人转向批评斯大林体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解冻”浪潮,反对个人崇拜产生的副作用也随之而来。在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发生了反对批判斯大林的骚乱,骚乱很快发展成为动乱,一些人与军队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利用斯大林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

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他们中许多人在得知秘密报告的内容后,被斯大林的恐怖行动所震惊,许多共产党人失望地感到自己过去的理想“破灭”了,大批党员退党,一大批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开始疏远共产党。在某些共产党内,过去不可想象的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采取批评态度的倾向、谋求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独立性的欲望和对新策略的探索都大大加强。一些共产党发生了内部危机,反苏情绪迅速发展,成了这些国家国内积累的政治经济问题趋于激化的催化剂,其中受冲击影响最大的是波兰和匈牙利。在波兰,发生了哥穆尔卡上台,违抗苏联旨意,改组政治局的波兹南事件;在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分子利用布达佩斯大学生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游行,使其演变为武装叛乱事件。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乱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匈牙利一年国民收入的1/4,死亡4000多人,受伤者达2万多人,外逃人数达20万以上。而在中苏两个大党之间,也因苏共二十大和对斯大林的看法出现分歧,导致展开了历时10年的政治论战。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有人把这一切归咎于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施加压力,要求苏联放弃非斯大林化的做法。在国际、国内思想极度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苏共中央内部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反对派一时也占了上风,以致出现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由“党内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策划罢免赫鲁晓夫的局面。应该承认,正是这些使赫鲁晓夫对非斯大林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在推进改革的道路上打了退堂鼓。苏联著名传记作家、历史学家费·布尔拉茨基认为,匈牙利事件期间赫鲁晓夫所受的震动可以与逮捕贝利亚、与后来的加勒比海危机相提并论。没有什么比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更能使赫鲁晓夫的认识发生动摇,更能在他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和有效

率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中引起巨大的怀疑甚至变形。<sup>①</sup> 匈牙利事件在领导层内引起了心理上的震荡,迫使他们紧急修正二十大制定的方针。<sup>②</sup> 阿·阿尔巴托夫也认为,匈牙利事件后,国外对苏共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国内对讨论苏共政策的压制,使赫鲁晓夫在勇敢地前进和急于打退堂鼓两条道路中选择了后者。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因素”在其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中苏两党在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上有严重分歧。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写过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文章在对斯大林有所批评的同时,着重肯定了斯大林的方针和路线。后来又发表了著名的“九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中苏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双方是“左”对“左”的争论。但在当时思想混乱、迷惘的情况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论战对手吓住,促使其“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中国因素对苏联“社会思想和政治的发展也起了阻碍的作用”。<sup>③</sup> 总之,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使得赫鲁晓夫转而放慢而不是去加速克服斯大林主义,放慢而不是加速进行改革。正是因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而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的复杂形势,使得赫鲁晓夫本人缺乏明确的反斯大林的立场。<sup>④</sup>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由谴责斯大林转向肯定斯大林,在各种场合颂扬斯大林,试图努力改变他的反斯大林

① [苏联]费·布尔拉茨基著、徐锦栋等译:《领袖与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3页。

② [苏联]尤·列瓦达、符·舍尼斯:《1953—1964 那时为什么没能成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1988年第18期。

③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33、134页。

④ 同上书,第62、66页。

形象，以扭转危局。

三、作为行政命令体制的产物，赫鲁晓夫不具备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素质和能力。这在今天已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原《真理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赫鲁晓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决心讲出斯大林罪行的真相，采取了振兴社会主义并使之人道化的方针。他的弱点是不彻底性、动摇性和自信绝对正确。他没有经受住权力的考验而终于失掉了权力。<sup>①</sup>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和总统顾问亚·尼·雅科夫列夫认为，赫鲁晓夫是位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斯大林镇压的报告是在政治上走出的出色的一步，它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斯大林去世后的过渡时期事态的发展方向。他想要同斯大林主义分手，但不是同这种制度分手。他虽同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决裂，可是他崇拜由这位创始者所创造的世界。这种矛盾从来就无法解决。<sup>②</sup>尤·阿克秀金认为，赫鲁晓夫是行政命令体制的产物，因而具有造就了他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特点。他的心理和对现实的感受，其本身就包含着他想摧毁的那些刻板公式。他一只脚向民主迈进，而另一只脚却陷入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他在探索改造政治体制的途径时，没有依赖党和社会的集体意见。他的“解冻”之举、他的政治勇气和干劲以及一个政治家往往必备的冒险精神，今天虽令我们肃然起敬，但他同时又缺乏一般的文化素养，爱作毫无根据的仓促决定，而且很粗鲁。所有这些都决定了

---

<sup>①</sup> [苏联]阿·鲍文：《国家渴望变革》，载[苏联]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第19页。

<sup>②</sup>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203页。

他个人的悲剧命运。<sup>①</sup> 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认为，赫鲁晓夫“本人肯定没有把扫除他前任所建立的那种政治体制当成自己的任务，相反，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以及实施某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他还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赫鲁晓夫同时又是斯大林的门生，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产物，那个时代训练了他在政治上的灵巧熟练，也为他留了一部具有残酷无情、审慎从事以及那种可以置某些明显真理于不顾之机敏颖悟的遗产。尽管受到了这些影响，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人。”<sup>②</sup> 阿尔巴托夫的看法是，不能把赫鲁晓夫前后不一贯，奉行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政策的原因归结为纯属他个人的弱点（如虚荣心和实用主义的打算（争权）），主要的问题在于他本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斯大林主义的产物。“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sup>③</sup> 从赫鲁晓夫个人的政治经历看，他毕竟还是由斯大林本人提拔起来担任要职的，他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传统，但他早期的政治生涯还是和斯大林体制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是过渡时期的人物，就他所受训练和个人性格而论，他还并不是一位能够恰代表苏联社会中正在起作用的新生力量的人物。尽管他看到了传统政治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搞清楚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在什么地方，从而不能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他能从感

① [苏联]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 同时代人的回忆》，第3页。

②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4页。

③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39—141页。

性上认识到战后新时代的到来,但又无力自觉把握住战后时代转换的重要契机,深入推进改革,而仍然沿袭斯大林“左”的教条主义的理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开展全面共产主义建设,最终不能不失败。“赫鲁晓夫虽能‘炸毁’原先的秩序,可是他不能改造这些秩序,更不能建立新秩序。”<sup>①</sup>这虽是赫鲁晓夫的悲剧,但从苏联社会当时所处的转折期背景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曲折性和长期性来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四、改革的方式方法有误,存在强烈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色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1950年南斯拉夫开始,至今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总结各国改革的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改革要有总体设计,各项改革措施必须综合配套,稳步推进,必须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联系起来作整体考虑,尤其要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发展。而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其改革的各项措施变化无常,前后不能贯彻始终。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赫鲁晓夫拿不出改革的整体方案,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孤立地抛出一个个具体措施,只进行局部的改革,而缺乏相互联系的总体配套。这种改革的结果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却不能很快建立起改革所必需的内部和外部的稳定环境。赫鲁晓夫的各项改革措施,大多未经过深思熟虑,而且经常草率从事。除根据利别尔曼建议想搞未来得及搞的经济改革外,大都未经任何试验而直接全面铺开,致使许多措施不完善,造成混乱。赫鲁晓夫执政的10年,“是在不断改革、各种改组、改造的标志下度过的”,在这期间,各种改革措施连续不断地出台,在苏联历史上“很难找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86页。

到另外一个时期,它会充满如此大量的内在矛盾,涨潮与退潮轮番交替,在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域中放松禁令与加强控制反复出现”。<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模式,反而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无所适从。如个人副业政策的反复、强行将集体农庄转为国营农场的做法,除理论认识的根源外,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反应。赫鲁晓夫的改革采用的是行政命令的老办法,“业已成熟了的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被次序混乱的行政改组和干部队伍的不停更迭所取代”。<sup>②</sup>虽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力图革除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旧体制的弊端,但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仍然习惯于沿用老办法。1957年的工业建筑业改组,仍然靠发号施令、行政干预的方式管理经济,忽视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结果是政令反复无常。

五、在政治体制方面,有限的改革招致了各个层次的人的不满和积怨。苏联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依照法律和民主程序更换领导人的制度。领导人的更替不是通过自然的淘汰,就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列宁和斯大林都执政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在他们逝世以后,党的领导层围绕接班人和新的领导权威的确立都经历了激烈的争夺和斗争。1955年马林科夫的下台和1957年的6月事件(即对“苏共党内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的斗争)就是斯大林逝世之后这种斗争的表现和重要插曲。赫鲁晓夫的改革始终未能解决接班人问题,党政主要干部仍由自己遴选或听信别人的推荐。这不仅使真正的人才不易得到,而且也给那些投机钻营者以可乘之机。在

---

① [苏联]尤·列瓦达、符·舍尼斯:《1953—1964 那时为什么没能成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1988年第18期。

② 同上。



这方面，正是赫鲁晓夫本人为自己的垮台作了铺垫，他的继任者通过一场真正的“宫廷革命”将其废黜。在党内斗争方面，赫鲁晓夫虽然改变了斯大林对于干部肆意怀疑、不断清洗、甚至动不动就从肉体上消灭的残酷做法，但却把反对派打成是“反党集团”，把反对派的意见统统打成“反党路线”，拒绝吸收其合理因素，致使工业管理体制改组的措施失败。赫鲁晓夫执政后期更加热衷于个人专断，搞“一言堂”，迷信权力意志。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地选拔干部的制度，“他挑选干部越来越不按德才兼备的原则，而按忠实于个人、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sup>①</sup>按照赫鲁晓夫的想法进行的多次干部改组，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即干部提升和任免政策是否民主化，是否吸收群众参政。“领导结构更新制和领导结构成员轮换制只是一些臆造的有关民主生活的神话”。<sup>②</sup>这些做法本身无助于克服僵化了的政治行政命令体制，反而加重了各级领导干部的不安全感。由于例行换届选举中，更换率高达60%，大批书记落选，对基层组织的稳定产生了影响。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又把州和边疆区党委一分为二，使这些党委书记的权威和地位受到损害。边疆区的党委书记大多为党中央委员，这些人的不满使赫鲁晓夫在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支撑点开始动摇。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的干部更新制“在不少地方触犯了由经济管理机构和政治头目构成的苏联新的‘中产阶级’一代”。<sup>③</sup>与此相联

<sup>①</sup> 引自解密档案材料，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7，卷宗223。

<sup>②</sup> [苏联]尤·列瓦达、符·舍尼斯：《1953—1964 那时为什么没能成功》，载[苏联]《莫斯科新闻》1988年第18期。

<sup>③</sup> [美国]H. 斯图尔特·休斯著、陈少衡译，《欧洲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6—647页。

系的是，赫鲁晓夫与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关系也大大恶化。在纠正斯大林利用享有特殊权力的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滥害无辜的错误后，并没有建立起法治政治，而只是将内务部与安全部合并，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将其置于党中央主席团的控制之下。但该委员会并不受法律的严格监督，仍然只向个人负责，是个人的权力工具。1957年6月全会，赫鲁晓夫就是利用当时的内务部长谢罗夫对他的忠诚渡过了难关。当赫鲁晓夫推行缓和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同时由于迷信核武器而大规模裁减常规部队和削减常规武器生产时，赫鲁晓夫与军队领导人的关系也恶化了。正是越来越多的随心所欲发动的改革及其失误，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人的不满和积怨，使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改革难以为继。

## 第二十章 对苏联走向衰亡起着重要作用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通过一场真正的“宫廷政变”，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14日取代了赫鲁晓夫，成为继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后的第五位苏联领导人。他执政18年（1964—1982年），时间之长短仅次于执政30年之久的斯大林。这18年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兴亡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第一节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地位

#### 一、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性

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以来，我国对苏联剧变原因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版了不少论著。但随着这一研究的深化，人们发现，对勃列日涅夫时期与苏联兴亡的关系的研究，远不如对研究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与戈尔巴乔夫时期那么重视和深入，似乎这个时期与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关系不很密切。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曾有

一个时期,有些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是苏联历史上最为稳妥的改革。<sup>①</sup>而人们没有看到,这种稳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相当一个时期里意味着停滞。正如有人指出的:“勃列日涅夫提出‘稳定’的口号,成为稳定的化身和形象,如果我们把稳定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话。”<sup>②</sup>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也就忽略了这种稳定所掩盖的在当时苏联社会正在日益发展着的种种矛盾。从而,人们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时,忽略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之所以产生这种稳定的表象,与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在苏联国内并没有发生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时期像一部平淡的历史剧,形不成高潮,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高潮叠起: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国家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伴随党内激烈的斗争而来的政治大清洗、肃反扩大化……一直到高度集权的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无不一一成为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的重要问题,也没有像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那样发生过在苏共二十大作震撼世界的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进行过1957年的工业大改组,展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大讨论,赫鲁晓夫又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改革者,还提出了超美口号和埋葬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至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联的崩溃发生在他执政的年代,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都成为学术界

<sup>①</sup> 1985年6月10日—15日,在南京召开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以后时期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一些学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成效是显著的,不能否定。(详见《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5期)

<sup>②</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09页。

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兴亡问题的热点和争论的热门话题。长期以来，勃列日涅夫时期呈现在人们面前稳定的表象，很容易使人忽视研究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其次，1991年底苏联崩溃后，人们研究的重点自然放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什么亡了，要着力探索亡的深层原因。但在某个时期，某些人更多看到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兴盛的标志。这主要指的是：从6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了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达到与美国持平的水平，苏联已成为一个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所以，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既然是“最强大的鼎盛时期”，那么在研究苏联衰亡问题时就容易忽略这个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讲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兴亡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个时期在稳定这个表象掩盖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一步一步由停滞走向全面停滞，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各种潜力，从而对苏联走向衰亡有着重大影响，可以说，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

## 二、以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 主要特征的勃列日涅夫时期

如果以主要领导人来划分苏联历史发展阶段，并且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短暂执政时期撇开不算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个历史时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对苏联国内情况进行分析之后，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时期概括为停滞时期，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

科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过去那些年的扭曲和停滞的深度和严重性估计不足。许多东西过去根本不知道,只有现在才看到,各经济领域的松松垮垮状况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还指出:“经济中的障碍和停滞现象不可能不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消极现象严重地触动了社会领域。”<sup>①</sup>把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视为停滞时期,这一总体评价,在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层和学术界较为一致。如阿尔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经济标准来评价,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赫鲁晓夫下台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个年代是停滞时期。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18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sup>②</sup>当然,由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间长达18年,在这18年中,情况错综复杂,各个阶段也有所区别。对此,阿尔巴托夫接着指出:“考虑到历史遗产的重负和斯大林专制年代形成的社会特点,而采用较为具体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18年就可能不是那么单一,不是那么全然灰暗无光。其中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期,开始在工业中实施某些改革,在农村贯彻某些重要决定,这是国民经济相当顺利发展的时期。”<sup>③</sup>我以为,阿尔巴托夫上述两段话并不矛盾。如果从总的发展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6页。

②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5页。

③ 同上。

趋势看,如果把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的角度去分析,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完全可以说是停滞和衰颓时期,僵化的保守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很多方面“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sup>①</sup>就是说,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朝着进步与完善方向迈出大的步子,总体上讲,仍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应该指出,近来,我国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如有些学术论著明确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苏联积累了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停滞。从最近十多年来苏联和俄罗斯发表的许多材料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sup>②</sup>就是说,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停滞,是在走近衰亡,这是抓住了这一时期的本质,从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苏联历史上的确切定位。

如果从这18年中的某个具体领域的情况,例如经济发展情况看,按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各个阶段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推行“新经济体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与上个五年计划期间相比,经济发展速度呈上升趋势,其中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4%,上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65年)为6.5%。但后来逐步下降,到1981—1982年,下降为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0页。

② 徐葵:《勃列日涅夫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见《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3.3%。<sup>①</sup>军事实力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它是在70年代上半期开始大大膨胀起来的。这期间,苏联战略核武器迅速发展,争得了与美国相等的超级军事大国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苏联“鼎盛”时期的主要标志。至于军事上能与美国争霸,使美国感到畏惧,是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进步的表现,它对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等问题,本章有关部分将会谈到。

这里,还想再次强调,我们是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对苏联以后的衰亡产生的影响,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前进了还是停步不前等角度,来确定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并提出这个时期是以停滞和积聚危机因素并走近衰亡为主要特征的看法的。我们并不否认这18年的前期与后期存在的差别;要找差别的话,不但前期与后期之间存在,18年间各年的情况都有不同。

## 第二节 政治体制朝着集权化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消除斯大林个人迷信、加强法制、扩大地方权限、改革干部制度、发展民主、活跃国内政治与学术气氛等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对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说:“在50年代中期,特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变革之风吹到国家上空,人民振奋起来,话跃起来,变得更大胆,更有信心。”但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冲破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架,加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少失误,使苏联出现了混乱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这样,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而临的主要任务

---

<sup>①</sup>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是,需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以便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难题,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但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时期未能取得进展。这样就使得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越来越失去吸引力。

先从政治体制说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体制,主导方面是恢复传统的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是朝着进一步僵化和集中化方向发展。可以说,在这一领域谈不上改革。如果与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

### 一、党政集中领导体制的恢复与加强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便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政策进行了批判、调整与“纠偏”。例如,苏共中央1964年11月全会决定,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重新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与领导机关,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与农业党组织合并,恢复统一的州和边疆区党的组织。之后,又恢复了苏维埃、工会与共青团统一的组织系统。苏共中央1965年9月全会又决定,撤销经济行政区,恢复部门管理体制,即按工业部门成立联盟兼共和国部和全联盟部。实行这两次重大调整措施,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克服赫鲁晓夫时期改革引起的混乱,但同时也很快地恢复了赫鲁晓夫改组前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

#### (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大大发展

自苏共取得执政党地位之后,从列宁开始一直强调党政分开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同样存在,并在后来日益严重。在勃列日涅夫上台

初期,虽然一度出现了三驾马车的体制,即勃列日涅夫任苏共第一书记(后改为总书记)、米高扬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由波德戈尔内接替)、柯西金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表面上各人都对自己主管的领域负责,但实际上一切决策都由政治局做出,而政治局做出决策也往往是形式上的,主要还是由党的最高领导勃列日涅夫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特别是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巩固与加强之后,更是大权独揽,“三驾马车”的局而逐渐消失。1977年苏共中央5月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年10月7日,最高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按新宪法增加的一些条款,勃列日涅夫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这样,他就总揽了党、政、军的大权。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不只反映在勃列日涅夫这个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身上,苏联党的很多领导人兼任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这种状况在党的组织机构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苏共中央机关设置的与政府部门相应的部门比过去更多了。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导致各级党组织往往对一些具体经济问题做决议、发指示,从而大大削弱了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领导作用。

勃列日涅夫坚持党政不分的政策,其理论根据来自斯大林。他在1977年苏共中央5月全会上决定兼任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讲话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解释说:“这绝非是一个徒具形式的行动”,“这首先是共产党领导作用不断提高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中央政治局许多成员直接处理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换言之,因为苏共是执政党,因此苏共领导人可以处理苏联国内外所有事务。十分明显,这种观点直接承袭了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报告中的下列提法:“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

员,而由于我们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

苏联长期以来未能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这虽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有关党政关系一直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因此也就没有确定党政关系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过多强调苏共执政党的地位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高度集权在客观上要求党统揽党政大权;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党政不分的体制也难以改革。

## (二)个人集权加强,独断专行现象严重

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形成的“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也不是三者之间的力量与权力处于均等状态,柯西金主管经济与外交,有较强的实力,波德戈尔内力量薄弱,而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扩大权力。苏共中央1972年12月全会上对由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之后,勃列日涅夫把在经济方面的决策权控制在自己手里,随后又控制了外交权,从而使柯西金的地位大大下降。1977年,解除了波德戈尔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并宣布他退休。这样,勃列日涅夫的权力大大膨胀,决策权高度集中。据不少材料披露,像1979年底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举动,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后做出决定的。<sup>①</sup>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专权的情况。

<sup>①</sup> 详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74—279页。

由于个人集权的加强，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和苏共代表大会按规定举行，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有真正的民主生活。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举行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讲：“让我们坦率地说，多年来，党和人民关心的许多迫切问题没有被提到全会日程上来。同志们记得，虽不止一次地举行时间很短和形式化的中央全会，但许多中央委员在其整个任期内没有可能参加讨论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全会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地方党委和党组织的工作作风。”一切重大问题不是经过认真和充分讨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更加突出。沃尔戈诺夫所著的《七个领袖》一书中说：政治局讨论问题的程式，如由谁发言，如何发言等，事先都由党中央机关秘书班子做好仔细安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政治局委员们事实上经常不是进行讨论，而是相互念自己的助手们为他们写好的2—3页讲稿。大家总是表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照例不会发表同事先由起草班子起草的决议草案有多少出入的意见。<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生活和改革》一书中说：在那个时期政治局有些会议，开会的时间只有15—20分钟，用于集合就坐的时间往往比用于讨论工作的时间还多。即使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也很难进行认真的讨论。主持者惯用的言辞是：“同志们已作过研究，事先交换过意见，也向专家作过咨询，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提什么意见？<sup>②</sup> 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不少代表对勃列日涅夫执政年代缺乏民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另外，这种政治气氛还表现在对不同观点包括学术观点动辄批判和扣政治帽子。勃列日涅夫时

<sup>①</sup>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sup>②</sup> 同上。

期是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时期，它严重地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这个问题下面作专门论述。

## 二、个人崇拜盛行

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年到1977年三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如果翻开70年代中期的苏联报刊杂志，对勃列日涅夫令人作呕的颂扬言论到处可见。1976年底，在为勃列日涅夫庆祝70诞辰时，掀起了颂扬的高潮，为此，《真理报》开辟了七天的专栏。而率先颂扬勃列日涅夫的是契尔年科，他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党的领袖”。当时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称勃列日涅夫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sup>①</sup> 那些阿谀奉承、恭维勃列日涅夫的言论更多：“党和人民热爱您，列昂尼德·伊里奇。他们爱您，是由于您的仁慈和热忱，是由于您的智慧和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您的一生，您的智慧和天才赋予您获得并融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宝贵品质的能力，这些品质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人物，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领袖的特殊品质。”<sup>②</sup> 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如有人称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英明的理论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小

① [苏联]《巴库工人报》1976年11月25日。

② 《国外社会主义研究资料》，第1期，求是出版社1983年版。

地》、《复兴》、《垦荒地》等，获列宁文学奖。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截至1981年底，出版1960次，平均每两个苏联人就有一册。<sup>①</sup>1978年11月12日的《真理报》宣传说：苏联人在“读、重读、废寝忘食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的著作”，因为这是“无穷无尽的思想智慧的源泉”。还有些报刊吹捧这些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等。而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阿尔巴托夫说，这像“全民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戏”，人们“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我国历史上我们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竖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符其实的停滞时期。其登峰造极之时我认为是1975—1982年”。<sup>②</sup>

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费尽了心机。个人迷信是个人集权的必然产物，它反过来也为巩固与发展个人集权创造了条件，二者相互促进。这样发展的结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体制朝高度集权方向一步一步地迈进，使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变得“成熟”，即更趋凝固化、僵化。这种“‘成熟’在掩盖着、钝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潜伏着危机！”<sup>③</sup>

---

① 《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2期。

②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6页。

③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页。

### 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 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

应该说,赫鲁晓夫执政时,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改革,目的是要废除像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腐朽的制度,使社会的发展富有活力。但他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干部队伍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将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免制。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

首先,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 49.6%,到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 79.4%,二十五大时上升为 83.4%,二十六大大时为 90% 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18 年中只换下 12 人。<sup>①</sup> 1981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是苏共历史上没有过的。1976 年至 1981 年两届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死亡和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sup>②</sup> 由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重要干部由“一号人物”来决定,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不可能由年轻干部去担任。勃列日涅夫后来提拔和

<sup>①</sup> 参见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第 549 页。

<sup>②</sup>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2 期。

委以重任的人员的情况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如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 1976 年去世时为 73 岁，而接替他的乌斯季诺夫当时已经 69 岁；苏联交通部长科热夫 1975 年去世时为 70 岁，接替他的索斯诺夫为 67 岁；造船工业部长托马 1976 年去世时为 69 岁，接替他的叶戈罗夫当年也是 69 岁。勃列日涅夫兼任国家元首之后，竟选择比他大五岁的库兹涅佐夫担任自己的副手。1976 年，吉洪诺夫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已 72 岁。<sup>①</sup>

其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领导干部老化。1952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55.4 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 52 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 1964 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61 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 54 岁。到 1981 年苏共二十六大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 70 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 68 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 75 岁。领导层的老化，同样反映在地方党政机关。戈尔巴乔夫在 1981 年一月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一系列党委的书记和成员，地方、共和国和全苏一级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往往好几十年没有发生必要的干部变动，没有增添新人。”干部的普遍老化，是苏联社会死气沉沉、保守、僵化和各种消极现象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个问题，从勃列日涅夫本人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大家现在已经知道，勃列日涅夫于 1974 年 12 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用机场刚送走美国总统福特，就感到不适，后确诊患了大脑动脉粥样硬化症。第二天前往蒙古，从那里乘火车返回莫斯科时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从此，他病得很重，病了很长时间。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这时起，勃列日涅夫还活了八年，并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体制下，他还“统

<sup>①</sup>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2 期。



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的病情不时地有某些好转，但他一直没有能恢复到哪怕是自己正常的工作状态。他极易疲倦，无兴趣处理手头该解决的问题，说话越来越困难，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在他生命的晚期，就连起码的谈话内容和礼节性的应酬话也要别人替他写好，没有这种“小抄”，他简直无法应付。<sup>①</sup>对此，博尔金作了以下的描述：“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勃列日涅夫不能继续领导党和国家，中央政治局会议越开越短。勃列日涅夫茫然坐在那儿，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都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用忧伤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人。为了尽快作出结论并提出提案，结束这种折磨人的场面，契尔年科出面结束会议，大家急忙通过各种议案，怀着不安的心情离开政治局会议室。”<sup>②</sup>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八年中，他已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已经无力正常执行领导者的起码职责”。<sup>③</sup>这在当时的苏联上层都很清楚，但在传统的集权体制下，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条件下，直至勃列日涅夫去世，他才离开苏联最高领导的职位。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现行的机制、传统和现实的政治环境实际上排除了‘正常’接班的可能性。”<sup>④</sup>

---

①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7—268页。

② [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③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6—267页。

④ 同上。

第三,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任命制产生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正如利加乔夫指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领导干部是否退休,主要取决于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本人的关系。这种程序(确切些说是无程序)必然要加重地方领导人对中央领导机关的依赖性。就问题的实质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好恶程度,换句话说,是否退休问题在于主观方面。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那些忘我工作的书记,由于没有注意到在中央和中央委员会的个人关系,当到退休期限时便处于‘无人过问状态’。”<sup>①</sup>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惟亲、搞裙带关系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从而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用于投机钻营,那些吹吹拍拍、讨好上级、惟上是从、在上层寻找保护伞的干部越来越多。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勃列日涅夫还对其家属与沾亲带故的人都给予“照顾”,让这些人升官、捞取私利。他女儿的最后一个丈夫丘尔巴诺夫令人头晕目眩地青云直上:在屈指可数的几年内当上中将;从一名平平常常的民警政治工作者一跃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被选入党的高层机关,获得了奖赏、汽车和别墅。勃列日涅夫的儿子被提拔为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他的弟弟也当上了副部长。这两个人都有酗酒的恶习。<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1—343页。

<sup>②</sup> 同上。

###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改善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使社会主义兴盛起来和有吸引力,不仅要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十分需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使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经济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和在经济改革方面作了一些准备之后,于1965年通过经济改革的决议,<sup>①</sup>从而正式推行“新经济体制”。可以认为,1965年通过的两项经济改革决议,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所进行的各种改革的基础,以后的各种改革措施都是这次改革的继续和修补。

####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体过程

如果粗分一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这一期间要解决的任务是:克服赫鲁晓夫时期造成的经济混乱局面,撤销在1957年建立起来的各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重新建立与加强中央的专业部,恢复部门管理为主的体制,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时期,企业和经济组织基本上完成了向“新经济体制”的过渡。

第二阶段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主要是针对

---

<sup>①</sup> 通过的决议有:《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国营生产企业条例》。

前一段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采取一些修补措施,为进一步改革进行各种试验,并通过了在工业中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决议,开始改变工业管理体制。

第三阶段是70年代末期以后。1979年7月,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体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作用的决议》,企图对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重点放在加速科技发展、贯彻生产集约化的方针和提高效率与质量方面。这个决议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涉及到各个方面的问题。

## 二、改革的主要原则、措施与执行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强调,改革要遵循以下三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是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以利于提高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经济管理上,由行政方法与经济方法相结合,逐步转向以经济方法为主,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三是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了实现以上三项原则,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 (一)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方面的措施

在计划方面,缩减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1965年改革前,国家给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约三十个,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时,改为九个。

在劳动工资方面,改革后,企业可以根据国家批准的机构和编制标准确定本企业的机构和编制,企业领导有权招聘和解雇职工,可以确定工资形式和奖励办法等。

在财产管理方面,改革后,企业可以处理多余的设备、工具和

仪器等,条件是在上级机关拒绝分配,或在发出存有多余物资通知后一个月内未得到上级答复。对于暂时不用的房屋、建筑物和运输工具等,可以出租给其他单位。

在财务管理方面,主要是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权限。

### (二)在加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方面的措施

长期以来,苏联的批发价格极不合理,主要是价格不能反映实际的生产耗费。1967年,苏联对工业品批发价格作了改革;1982年,又对工业品批发价格作了全面修订;同时扩大了贷款范围并调整了利率;通过企业基金付费制度,促使企业有效地使用资金,提高经济效益;等等。

### (三)在促进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结合方面的措施

在保证把利润主要部分上缴国家财政的条件下,适当增加留归企业支配利润的份额。同时用留归企业支配的那部分利润建立经济刺激基金,这项基金用于职工个人的物质奖励、职工集体福利及企业发展生产。

上述改革的原则,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有可取之处。这一改革思路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传统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病,但可以缓解传统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矛盾。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不断深化改革,最后朝着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方向发展,并且不断消除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产生的阻力,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可以不断地走向完善。遗憾的是,1965年苏联实行“新经济体制”时,改革的原则贯彻执行一段时间后,逐步后退,以致最后未能实现。

1. 关于企业自主权问题。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虽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没有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据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

也就是说,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有:第一,从当时的理论观点来看,虽然不少学者主张要逐步扩大企业权限,但有些学者仍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不能让企业变为独立的单位,因为这样会使企业的活动离开整个国民经济规定的和要解决的任务,从而使全民所有制成了失去经济内容的形式。第二,从计划体制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再说,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的数量,这毕竟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体制发生质的变化。第三,改革后,企业没有确立起自己的法律地位,仍受到各方面的干扰,面对着几十个“婆婆”,各个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一些禁令,而对企业执行它们的种种指示所需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而且对执行它们的指示的后果也不负任何责任。

2. 关于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的问题。在计划仍按老一套行政指令方法进行的条件下,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的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很难使计划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般也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来解决的。由于这个原因,繁琐的规定达到了简直难以使人弄清的地步。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

3. 关于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结合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使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有了一定改善,但在不少场合下,这三者之间仍然是矛盾的,并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主要是通过物质刺激基金制度来促进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改革后,

虽然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奖金在职工工资中的比重从改革前1965年的8.7%提高到80年代初期的16%左右,但奖金对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这首先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奖金与企业最终成果挂钩的问题。其次,由于在奖金分配方面存在很多矛盾,而日益出现了平均主义倾向,奖金慢慢成了固定的附加工资。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关系的作用。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用行政方法领导经济仍然盛行,往往造成行政领导不顾社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的矛盾,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使企业活动在经济利益上的动机消失了,过多的是行政杠杆起作用。

以上分析说明,1965年改革时确定的一些原则并没有顺利地实现,一些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因此,改革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 第四节 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

从上面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在政治体制方面谈不上改革,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在经济体制方面,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并没有触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

1964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sup>①</sup>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下面就一些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 一、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 理论的影响

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在苏联是个历史传统。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十分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要敢于打破旧思维的禁锢。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sup>②</sup>“僵化了”是理论上教条主义化的一种反映。而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6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



执政 18 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sup>①</sup>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sup>②</sup>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时,就提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sup>③</sup>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④</sup>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20、30年代搞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22—23页。

② 同上书,第37卷,第443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87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义的一整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如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所有制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职能问题。这里,只就“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些分析。应该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的影响最大、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商品货币关系问题。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

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直接社会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了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使其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的应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表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国家计委副主席巴秋林认为,“市场社会

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做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似乎它是行政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计划服从市场；(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巴秋林批判这一理论时指出，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决定生产过程的主要比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效果提高的不是计划，而是自发作用的市场。计划的作用仅仅被归结为消极地反映市场行情，使经济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强调，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用各个企业的互相作用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按照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企业应当同国家分离，而经济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他还尖锐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右倾修正主义者提出三种人为的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国家所有制(运输业、邮电业、动力、林业)、企业所有制(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和私有制(小型的和中型的私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侵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sup>①</sup>十分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方理论仍然是：解决国民经济计划比例是靠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利用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是两个对立的東西：一个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化；另一个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机制。这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不能凑合在一起。

<sup>①</sup> 参见[苏联]A.巴楚林著、陈慧等译：《计划经济管理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3、136—138页。

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为使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sup>①</sup>另外，在苏联官方看来，主张市场调节的作用，企业就会要求过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导致企业自治，脱离国家轨道，因此认为，正是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冲垮”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断言，这些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节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的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企业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sup>②</sup>

还要指出的是，由于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神圣化、僵化和国际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左”的教条主义态度，不允许对改革理论自由讨论，不只是在苏联难以实行改革，而且还严重阻碍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在东欧国家中，最早着手改革的是南斯拉

① [苏联]《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② [苏联]《新时代》1987年第5期。

夫。南斯拉夫的改革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时提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对斯大林模式的最早一次冲击。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各国共产党对所谓“铁托分子”与“民族主义分子”展开批判与清洗。当时斯大林明确指出:“低估苏联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不容许的。”<sup>①</sup>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在发现搬用斯大林模式出现问题后,又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到60年代,匈牙利又进行悄悄的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也是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结果遭到勃列日涅夫镇压。当时,“制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非教条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早在60年代初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若打破旧的理论教条,要改变苏联型的传统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家进行的这场公开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有效地克服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思想。所以,这场讨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有利的先决条件。”<sup>②</sup>就是说,苏联是决不允许的。这些,都使东欧各国贻误了改革的时机,不得不继续实行不能适应本国国情的斯大林模式。

---

① [英国]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1939—1973年):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

② 伊日·科斯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经济发展概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 二、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 思想导致改革的停滞

纵观勃列日涅夫 18 年的体制改革,不难发现,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为什么上述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呢?这其中大致有以下三个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从近几年来出版的勃列日涅夫传记等有关材料看,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周围的人们强烈地表现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气质、小市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sup>①</sup>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上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生活上贪图安逸,爱好打猎与开高级轿车,工作上不勤奋刻苦。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sup>②</sup>勃列日涅夫作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sup>③</sup>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期待他不时地提出新思想,不断地改革传统的体制。

其次,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搞组织工作,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在他上台初期,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积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并在这方面很快取得进展。到 60 年代末,他的地位已十分巩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337 页。

② 同上书,第 333 页。

③ [西德]米夏埃尔·莫罗佐夫著、张玉书等译,《勃列日涅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5 年版,第 370 页。

固，权力已大大扩大；在最高领导层中，他的权力与地位已明显地高于其他人。之后，到了70年代，随着苏联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当时的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并不认为苏联需要什么改革，还是认为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十分有效的，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政策表示不满。据苏共中央机关的干部回忆，当时勃列日涅夫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报告说过以下的话：“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sup>①</sup>到了197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一个病人之后，更不能指望他来推动改革了。整个体制改革像勃列日涅夫的身体一样，朝着停滞方向发展，不断地滑坡。

第三，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义。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越来越把掌握权力看作是目的本身；他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个人专政”或者说个人专权和特权。而不触动政治体制，不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仅不能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促进作用，反而会为经济体制改革制造阻力。这已为所有转轨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对此，阿尔巴托夫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有一种越来越清楚的现象，那就是大部分领导人倾向于倒退。”<sup>②</sup>因此，体制改革必然难

<sup>①</sup> 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sup>②</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64页。



以推进,这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明显地表现为对传统体制不是采取根本改革的方针,以下情况可以说明:

一是改革的保守性,即改革是修补性的,没有从根本上去变革旧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原则下,适当扩大企业权限,逐步采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改革的主要措施都是以不影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在改革前和改革过程中,没有对旧体制的弊病从根本上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的总结,使改革的目标符合商品经济原则。这样,必然使改革在不根本改变原有模式的前提下,集中在管理方法上下功夫,作些改进。与此相关,往往把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结果是,18年的改革,在理论上并未克服没有指令性就没有计划的简单化概念;在实践中,国家仍然通过集中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勃列日涅夫时期,仅在由国家计委编制下达的工农业生产计划中,就包括了约4000个产品品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90%;生产资料通过国家计划实行统一调拨的部分占95%以上,企业通过批发贸易自由采购的生产资料一直未超过5%;企业利润的83%左右由国家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不可能成为商品生产者,独立自主地经营,从而使经济核算徒具形式。

二是改革缺乏坚决性,遇到阻力和困难就动摇、退缩,通过的改革决议不能执行,导致改革原地踏步。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当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一些人对改革提出了疑问和反对,在此情况下,对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的“改革”一词,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而改用“完善”一词。在改革过程中,这种摇摇摆摆的做法,当然不可能使改革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是改革缺乏综合性。在苏联传统的体制模式下,计划、物资、价格、财政、信贷、基础建设、劳动工资等体制,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对旧体制的改革如果不综合配套地进行,不仅难以取得预期的改革效果,并且还会产生很多矛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是不配套的,如为了搞活微观经济,就不断扩大企业自主权,而对宏观调控体制却未进行相应改革,各级部门还是采取老一套的行政方法干预企业活动,实行繁琐监督。这必然会引起许多矛盾。另外,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关系与社会政策调整、改变人们传统的思想等同时进行。这样做的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人们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改革也难以取得人们的支持。改革缺乏综合性,还表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一个可行的全面的改革总思路,也不够清楚如何使我们自己从过去的变形中摆脱出来,同样地也没有足够理解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与复杂性。”<sup>①</sup>改革的这种局限性,时间一长,就必然被旧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捆住,以致改革最后被窒息。

求稳抑变,也反映在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对改革的态度上。他说:“中央委员会反对仓促轻率地改组管理机构和改变已经形成的经营管理方法。剪裁之前,不是像俗语所说的量七次,而是八次甚至十次。”过去,我们有些人在评论这段话时,只看到勃列日涅夫对改革的慎重一面,而忽视了其保守的一面。改革遇到的各种阻力,使勃列日涅夫时期讨论一项改革决议时,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66页。

### 三、革命口号下的帝国野心 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

如果以苏美关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来考察,应该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由于国内与国际诸因素的制约,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到70年代前半期,缓和有了较大发展。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主要是加强控制。特别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作为控制东欧各国的理论,“勃列日涅夫主义”出现了,特别是“有限主权论”与“国际专政论”等,像悬在东欧各国头上的一把利剑。对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则是在支援这些国家革命、民族独立的口号下,加强对这些国家的争夺与渗透。在对华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就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政策的整个内容来看,从70年代中期起,缓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逐步丧失,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80年代初,已经从缓和进入第二次“冷战”。苏联学者把这一时期的缓和称之为“短命的和不走运的缓和”。<sup>①</sup>究其原因,主要与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弱点有关,“即对外政策过分意识形态化,以及在保障安全方面过分注重军事因素,这导致了军事政策和国防计划不再受政治控制”。<sup>②</sup>苏联的对外扩张、争霸世界的政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在俄国历史上,从沙皇到斯大林,都推行扩张政策,所不同的是,后者是以推进世界“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往往把帝国奢望和野心隐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2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9页。

蔽起来,有时很难让人们在天真的革命浪漫主义与大国实用主义乃至厚颜无耻之间划清界限。<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是继承了斯大林的传统。就是对美国实行的缓和政策,对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最高领导层亦是一种策略或谋略,缓和政策的目的是在麻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同时,加快发展苏联自身的力量。这种缓和策略被西方称之为仅仅有利于苏联的“单行道”。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加,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扩军、争霸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对别国不断进行军事干涉就是例证。阿尔巴托夫指出,这个时期,“在安哥拉之后,我们沿着这条显得已经蹚平的道路大胆前进,实际上是沿着干涉升级的阶梯前进。这些阶梯就是——埃塞俄比亚、也门、一系列非洲国家(我不想涉及近东问题,它十分复杂,应该由专家研究),最后是阿富汗”。这样做的结果是,“在70年代下半期,我们自己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起来反对我们自己,并且给缓和带来严重的打击。实际上我们是在给美国极右派伴奏”。而推行扩张、争霸政策,必然使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施许多军事计划。在这些年内我们全力以赴地狂热地卷入军备竞赛的漩涡,很少考虑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sup>②</sup>

还要指出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只通过武装干涉进行扩张,还通过“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搞扩张渗透,对第三世界更为明显。据统计,1970—1979年,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达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73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73、279页。

474 亿多美元，“经济援助”达 116 亿多美元，占 1955 年以来苏联“军援”、“经援”总额的 87.6% 和 63.9%。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军事人员从 1965 年的 3635 人，增加到 1979 年的 15865 人（不含侵略阿富汗的驻军），增加 3.4 倍。苏联还通过同第三世界国家签订包含军事合作内容的条约（共签订 12 个，有两个已被废除），企图控制这些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四十多个军事基地。<sup>①</sup>

苏联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使“军工综合体已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sup>②</sup> 对于经济力量远远低于美国的苏联来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保证其扩军的重要条件。苏联通过这种体制，把大量的资金集中在国家手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66 年为 51.3%，1970 年为 54.1%，1975 年为 60.1%，1980 年为 62.2%，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 1982 年，提高到 67.4%。<sup>③</sup> 另外，苏联为了把更多的资金集中到国家预算中来，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几年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79 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增长率为 5.9%，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 2.2%；1980 年，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分别为 7.5% 和 3.8%，1981 年为 5.9% 和 3.8%，1982 年为 10.1% 和 2.6%。<sup>④</sup> 把那么多的财政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便于集中发展军工和与军工密切相关的工业部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如以工业投资为 100，那么其中甲类工业一般要占

<sup>①</sup>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 年第 3 期。

<sup>②</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80 页。

<sup>③</sup> 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 636 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 637 页。

85%—88%。国家掌握了大量资金,还保证了迅速增长的军费支出的需要。1965年苏联军费为326亿美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15.2%),1981年增至1550亿美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21%),比1965年增长3.75倍。<sup>①</sup>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把苏联在军事实力上推向“鼎盛”时期的。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两个方面影响着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一方面,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是苏联在这些国家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控制的手段。在政治上,保证这些国家按同一的政策与方向发展,不允许其背离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模式。在经济上,按统一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行事,使东欧一些国家的计划与苏联的计划挂上钩,以便保证经互会国家之间双边的计划合作得以实现,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力量与苏联联结在一起。苏联害怕的是,一旦在体制方面进行大的改革,东欧一些国家会立即跟上,尽快摆脱斯大林的体制模式,最后会导致苏联失去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从而也就失去了苏联的“切身利益范围”。这也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勃列日涅夫大大放慢体制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阿尔巴托夫认为,“在60年代末,我们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sup>②</sup>另一方面,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政策,是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决定的,即根据他们自己认识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来判断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政策是否背离了社会主

<sup>①</sup>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3期。

<sup>②</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84页。

义,是否是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背叛。基于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勃列日涅夫在决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就是以断定那里出现了“修正主义”作为根据的。据当时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契尔年科回忆,勃列日涅夫曾讲过,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取得胜利,他就只好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因为,“要知道,大家会认为是我把捷克斯洛伐克丢掉了”。<sup>①</sup>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在苏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只是到了80年代末期,我们才最后停止认为自己有权垄断真理,停止把自己看做‘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停止对邻国和盟国的内部事务的干预”。<sup>②</sup>

### 第五节 体制改革停滞带来的 严重社会经济后果

改革的停滞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全面的停滞,这自然有个发展过程;第二,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在60年代末世界上开始了新的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这种停滞并不是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意味着倒退;第三,停滞的发展一方面消耗着苏联存在的种种潜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产生种种社会经济疾病和积累大量的问题与矛盾,从而使苏联逐步地迈向衰败。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88—18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68页。

## 一、社会、政治问题日趋增多与尖锐

这一领域的问题反映在诸多方面，它又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交织在一起。

应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苏联在社会、政治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情况。

由于从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到各级地方领导弄虚作假，言行不一，使得苏联广大群众对党与国家提出的政策、口号持不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sup>①</sup>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权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所有的决定都是由最上层作出的，与此同时，‘上边’却不能真正采取任何一个决定——其中每一项决定要经过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协商。此外，领导人任何一项决定作出后，在贯彻时又受到机关的专横的阻挠。”“几乎没有人对某件事真正承担责任。”“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sup>②</sup>据俄罗斯某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做出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sup>③</sup>官僚主义的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本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此，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少事

<sup>①</sup> [俄罗斯]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7—18页。

<sup>②</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01页。

<sup>③</sup> 《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例,其中有关科技革命问题的例子最为生动。在60年代末,考虑到苏联加速科技发展的紧迫性,苏共二十四大后,政治局做出决定,准备专门就科技革命问题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会议的准备工作与通常一样,委托一个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由数名中央书记组成。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准备会议材料,其中包括起草总书记的报告。经过许多个月紧张的工作,终于拟就了一份篇幅长达130页的总结性文件。文件于1973年5月按期交基里延科等三位书记。自然,这份文件交给了勃列日涅夫,但长久没有下文,召开讨论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的整个思想石沉大海了。到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后,一个专门委员会在清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文件。之后,这份文件被转到戈尔巴乔夫手里。但到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已经整整拖延了20年。<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社会道德堕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酗酒的人数急剧增加,1980年有4000万酒徒,占全国人口的14.81%。酗酒的人群扩展到妇女和广大青少年。同时,酒精中毒程度也日益加深。1968年,苏联酒精中毒死亡人数为18150人,每10万人中就有7.6人死于酒精中毒,而到1976年,上述两个数字分别增加到39800人与15.9人。据统计,苏联3/4的暴力犯罪是在酗酒以后发生的。俄罗斯联邦法院1971年审理的案件中约有80%的抢劫案、69%的流氓袭击案、56%的盗窃案的罪行是在酒后进行的。由于酗酒,每到星期一上午,1/3的工人仍睡眼惺忪,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旷工、误工情况十分严重,还造成大量的废品与次品。据苏联专家估计,全国因酗酒造成的经

<sup>①</sup> 详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6—218页。

济损失达 350 亿—400 亿卢布。另一个问题是离婚率上升很快。1960 年,离婚家庭占全苏家庭的 10%,到 1979 年上升到 33%。<sup>①</sup>酗酒与离婚两大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迅速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也说明衰败与腐朽在滋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的真正关心。苏联报刊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是一个“拍马屁和阿谀奉承”的时代。<sup>②</sup>这个时期,赠送礼物大大盛行起来,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勃列日涅夫收到的礼物数不胜数。他每次出行,必须带大量礼品。既然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能赠送这么贵重的礼品,那么地方官员就自然要回赠贵重的礼品了。1976 年勃列日涅夫 70 岁诞辰时,更是掀起了一股送礼高潮,赠礼在苏联找到了肥沃土壤,发展到顶点。<sup>③</sup>另外,贪污、盗窃、行贿现象日趋严重。

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特点。苏联军事部门为了他们所需要的资金与其他东西,使用了各种手段,而首先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展开攻势的。“这些年来,我国实质上展开了无先例的军国主义宣传运动,积极地试图使社会精神生活军国主义化。利用伟大卫国战争这个对苏联人来说来神圣的主题,无耻地进行投机;回忆录,接连不断的文艺作品(往往同艺术性没有任何共同点,更确切些说是粗糙的手工制品),多集连续的艺术影片,电视转播,宏伟的、造价极高的纪念碑的建

① 有关酗酒与离婚率的资料,均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8、178、179 页。

② 陆南泉主编:《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 页。

③ 参见[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 34—35 页。

设,各种各样的仪式被引入日常生活(包括纪念碑和烈士墓旁身穿军装、手持冲锋枪的学生的仪仗队)。所有这些,整年地冲进国内精神生活,而且根本不是在国家上空笼罩战争威胁的条件下发生的,恰恰相反,是在缓和时期发生的。”<sup>①</sup>意识形态军国主义化,对开展军备竞赛无疑是个有力的思想武器。

“特权阶层”扩大化、稳定化和思想僵化,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特权阶层”并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而是在斯大林时期就逐步形成起来。像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等,“早在 30 年代,所有这些已经形成完整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的等级——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总局的首长,等等——每一级都有自己的一套特权。战争之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范围相当小,但特殊待遇本身是非常优厚的,特别是同人民生活相比更是如此”。<sup>②</sup>在战后,对苏联上层领导人的配给制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特别是各种商品的购货证与票券大大发展了,逐渐成了高中级干部家庭正常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这方面越来越起带头作用。有些将军大胆妄为到这种地步,以致向来对这种腐化行为眼开眼闭的斯大林不得不出来纠正,命令把某些人逮捕。但特权并没有消失,后来很快地扩大了,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高低,装在信封里秘密发给。一个部长可拿到相当于 1960 年改革后的 2000 卢布,如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81—282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311 页。

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和不纳税，这个数目相当于不久前苏联总统规定工资的两倍。<sup>①</sup>

不少西方学者也都认为，苏联的特权阶层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形成。<sup>②</sup> 他们把特权阶层的特权归结如下：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称号带来的特权；等等。对苏联上层领导来说，高薪并不是主要报酬，远为贵重得多的是上层所享有的特权。他们一切的获得主要靠特权。因此，在苏联的任何时期，作为特权阶层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即他们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领导权。这个领导权是实现特权的基础。

至于形成这个特权阶层的原因，笔者认为，阿尔巴托夫提出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他说：特权阶层的形成，“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sup>③</sup> 另外，他还指出：“社会的贫困本身实际上使特权不可避免。”<sup>④</sup> 那种把由于斯大林时期因“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作为形不成特权阶层的理由，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在斯大林时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是有区别

---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1—312页。

<sup>②</sup> 参见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81—83页。

<sup>③</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12页。

<sup>④</sup> 同上书，第310页。

的。首先,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干部领导职务搞任命制与终身制,干部队伍较为稳定,因此,“特权阶层”也比较稳定。而斯大林时期,虽然形成了“特权阶层”,但它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斯大林一方面给予上层人物大量的物质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消灭这些人。在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个“特权阶层”。其次,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发展,各级领导机关干部数量大大膨胀,与此同时,特权阶层的人数也随之增加。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sup>①</sup>人们对特权阶层的人数估计不一。“英国的默文·马修斯认为,连同家属共有100万人左右。西德的鲍里斯·迈斯纳认为,苏联的上层人物约有40万,如果把官僚集团和军事部门的知识分子包括进去,约70万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阿·利姆别尔格估计,今天苏联的特权阶层有400万人,另一些人估计不少于500万人。”<sup>②</sup>第三,斯大林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维护、巩固斯大林的体制模式。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主要使命是抵制各种实质性的改革,维护现状,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更加“成熟”。这也是这个时期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不能以斯大林时期特权人物不稳定和人数可能没有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么多为根据,得出只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才形成“特权阶层”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符合苏联历史发展情况的。虽然特权人物不稳定,今天是这一批人,明天是另一批人,人数这个时期多一些,那个时期少一些,但总是存在这么一

<sup>①</sup> 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15页。

<sup>②</sup> 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第82页。

个阶层的人。这些人,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列入‘花名册’的人,即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的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推断却成为只能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

.....

## 二、改革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率递减和停滞

勃列日涅夫给后人留下的一份最使人头痛的“遗产”、一个最大的苦果是:大量严重的经济问题。

1965年,苏联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是:力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当时已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但结果是,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使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他一些综合经济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详见表20-1)

表 20-1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情况(年平均,%)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2
社会总产值	6.5	7.4	6.3	4.2	3.3 <sup>①</sup>
国民收入	6.5	7.8	5.7	4.3	2.6
工业总产值	8.6	8.5	7.4	4.4	2.8
农业总产值	2.2	3.9	2.5	1.7	1.0
基建投资	5.4	7.3	6.7	3.7	2.0

① 为1982—1983年平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70年》纪念统计年鉴,第51页;《1984年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

从上表材料可以看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推行“新经济体制”的第一个五年期间,经济效果较好,与此前的五年计划期间相比,经济发展速度呈普遍上升的趋势。但是以后的时期,特别到80年代初,速度已下降到使苏联“几乎临近停顿的程度”。<sup>①</sup>勃列日涅夫逝世的1982年,国民收入比上年仅增长2.6%。

上面,我们完全从量这个角度即增长速度的角度来考虑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的经济停滞,即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的趋势。问题是,这个低速增长也并不能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的实际情况,其中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猛涨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所共知,1973年爆发了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为对付西方国家,把石油价格提高了15倍。苏联当时作为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国之一,借机大量出口石油。据统计,1974—1984年,苏联仅从出卖石油与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1760亿外汇卢布,约折合2700亿—3200亿美元。<sup>②</sup>这笔巨额“石油美元”对当时苏联渡过经济难关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停滞和下滑的严重性,缓解了种种矛盾。有人说,这里不存在掩盖不掩盖的问题,因为石油产量和出口量的激增是客观事实。但是,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石油价格的上涨速度比石油产量和石油出口量的增加速度不知高出多少倍。据苏联统计资料,苏联的石油产量从1974年的6.5630亿吨增加到1984年的8.7620亿吨,增长了33.5%。1974年,石油与石油产品出口量为1.1620亿吨,1985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4页。

② 参见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195—196页。

年为 1.6670 亿吨,增长了 43.5%。<sup>①</sup>非常明显,如果这个时期不是石油价格飞速地上升,单靠石油产量与出口量的增加,绝不可能获得如此多的“石油美元”。正如马龙闪同志指出的:“这笔收入在以总产值指标衡量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也掩盖了苏联 70 年代中后期经济的停滞与衰退,它像雨后天堂的彩虹一样,给苏联经济以虚幻的繁荣。待短暂的彩虹逝去,依然是飘散着片片乌云的天空。”<sup>②</sup>对此问题,阿尔巴托夫分析说,当时苏联应该把赚取的这些石油外汇视为一个喘息的时机,并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个时机推进改革,使国民经济走上正轨,但苏联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的中央全会”。他接着指出:“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不论是我还是我的许多同事都不止一次地想到,西西伯利亚石油挽救了我国经济。而后来开始得出结论,这个财富同时又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它使我们不可饶恕地丢失了许多时间,长久地推迟了已经成熟甚至过分成熟的改革。”<sup>③</sup>他还说:“那时我们把载能体出口无限度地增长,从这里找到了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那时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懂得不是挣来的财富最容易使人腐败这句古老的谚语,不但适合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家。”<sup>④</sup>

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

---

① 由于 1984 年的数字未能找到,这里石油与石油产品出口量用的是 1985 年的数字。

② 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第 196 页。

③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300—301 页。

④ 同上书,第 299 页。



80年代初苏联经济缓慢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国际市场的高价出售石油,大量生产和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如果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四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十分明显,这一状况给苏联带来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

以上的材料与分析说明,在判断苏联70年初—80年代初的经济情况时,应该看到,1973年以后因石油飞速涨价而获得的巨额“石油美元”并不能反映当时苏联经济的正常发展状况。

### 三、农业严重衰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

由于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时,苏联农业问题十分严重,市场供应也相当紧张,因此,他一上台,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首先抓农业,采取了一些措施:从管理体制来看,主要是扩大农庄、农场在计划生产方面的自主权,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副业政策,完善和继续推行集体承包制;从发展政策来看,主要是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以进一步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农业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的进程,开发俄罗斯联邦的非黑土地带,加强农业的科研工作。上述措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头几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1966—1970年,谷物年均产量为1.67亿吨,这比上个五年年平均产量1.30亿吨要高出28.5%。

但总的来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没有扭转农业落后的局面,农业仍然是拖整个国民经济后腿的薄弱部门。这一时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大而效率低,生产极不稳定。

在斯大林时期,对农业的投资是不多的,一般只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11%—13%,而通过国家预算对农业的投资只占5%左右。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农业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1965—1982年的17年中,农业投资的总额为4708亿卢布,相当于1918—1964年47年的农业投资总额(1030亿卢布)的3.6倍。从增长速度来看,1982年的农业投资比1965年增长了2.1倍,而同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增长了1.57倍。从1973年开始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建投资总额中一直要占27%左右。如果把与发展农业直接有关的化肥、农药、农机、混合饲料、微生物工业部门的投资计算在内,农业投资要占整个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30%以上。这一时期苏联农业投资的数额,在世界各大国中居首位。另外,在农业投资中,国家投资比重迅速增加。1970—1980年,国家投资在农业投资中的比重为65%—68%。在分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时,还必须考虑到当时在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条件下,为了稳定消费品零售价格,苏联每年要支出大量的财政补贴。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对肉奶和蔬菜采购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差价的补贴高达260亿卢布,约占当年预算支出总额的10%。

但是,巨额的农业投资并没有保证苏联农业稳定地发展。从农业产值五年的增长速度来看,是大幅下降的趋势。即由“八·五”(1966—1970年)计划期间的21%下降到“九·五”(1971—1975年)计划期间的13.3%，“十·五”(1976—1980年)计划期间的9%，而1981年则是-2%。谷物产量也经常达不到计划规定的指标。1976—1980年,计划规定年均谷物产量为2.17亿吨,而实际产量为2.0505亿吨;1981—1985年,计划规定的年均产量为2.4亿吨,而实际产量为1.803亿吨,比计划相差6000万吨,其中

1981—1982年为1.7249亿吨。更为严重的是,1979—1982年出现连续四年歉收,如果把1983—1985年这三年的歉收加在一起,则是连续七年歉收。这是创历史纪录的。农业的上述情况,完全打破了苏联谷物生产的一般常规,即在三年中,一年丰收,一年平年,一年歉收。农业连续多年的不景气,给苏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1979年谷物产量与农业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26.4%和3.1%,这使当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为3.4%。由于1981年农业大歉收,迫使苏联制定1982年计划时,国民收入的计划增长率只规定为3%。谷物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不靠进口来满足其国内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粮食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sup>①</sup>“1981—1982年,由于购买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进口大量粮食。”<sup>②</sup>农业占用大量资金、效率低,还限制了其他部门的发展。每年大约需要进口3000万吨粮食,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所花的钱,约等于每年外贸进口总额的20%,成了苏联仅次于机器设备进口的第二项大宗商品。这种情况,使得苏联外汇更加拮据,亦难以保证对国内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技术设备的进口,从而也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的发展。农业不景气,

---

①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39页。

② [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8页。

还限制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苏联一直在设法加速“乙类”工业的发展，但苏联轻工业原料的 2/3 和食品工业原料的 80% 来自农业，这样，甲、乙两类的比例和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很难得到改善。农业的连续多年歉收，直接影响了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能实现，从而使储蓄迅速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零售商品流转额与储蓄的增长速度很不协调。如 1970—1981 年，零售商品流转额增长了 82.7%，其中食品零售流转额增长了 56%，而同期居民的储蓄存款则增长了 2.56 倍。这显然是此后通货膨胀的重要潜在因素，并给以后的改革造成障碍。为此，勃列日涅夫在 1982 年的多次讲话中谈到，食品问题已成为苏联“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是因为改革农业体制和调整农业政策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和政策。这表现在：

(一) 长期以来，苏联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此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调整，生产资料越公越先进、生产规模越大越优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仍占统治地位。突出反映在：不断合并集体农庄，把农庄改为国营农场；对农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实际上不加区分。国家对它们下达一样的指令性指标，领导人实际上均由国家委派，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利。在理论上强调的是，加速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发展农工综合体过程中，时而出现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情况，一些农工综合体的农场由盈利变为亏损；在分配方面，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关于在农庄推行的有保证的劳动报酬制度。这种工资报酬制度一开始对提高农庄庄员的生产积极性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并不符合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吃大锅饭。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新领导和学者尖锐地批评了这一时期在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随心所欲的、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朝前奔跑——追求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现象。在分配时,不去精确计算每个人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中的劳动贡献。有的学者还明确指出,对庄员实行有保证的劳动报酬制度,使庄员的劳动报酬摆脱了气候的影响,但收成并没有摆脱天气的影响,从而使庄员所得与他们的最终劳动成果不能挂钩。

(二)在管理体制方面,特别是在农业计划制度方面,虽然明确规定国家只下达主要农产品的采购量,但实际上,农庄、农场并未摆脱上级机关的琐碎监督,仍然是从上到下,从共和国的部,经过州和区的机关,向农庄、农场下达播种计划、牲畜头数,有时简直闹到向农庄下达母猪交配任务的荒谬程度。<sup>①</sup>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是一句空话。由于投资决策权一直控制在国家手里,往往造成投资政策的不合理,使大量的农业投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举例来说,苏联有个农场,在“九·五”计划期间需要补贴400万卢布。“十·五”计划的前三年又得到补贴420万卢布。这个农场亏损的根本原因是缺少一条与城市相连的公路。据计算,修建这条公路只需要45万卢布。但国家不拨款修公路,而宁愿年年给农场补贴<sup>②</sup>。

① [苏联]《共产党人》1982年第2期。

② 同上书,1981年第14期。

#### 四、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

前面我们主要还是从量这个角度,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发展总趋势作了分析,看到了由于改革的停滞造成的后果,如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度滑坡、农业严重衰退等。但如果从质这个角度分析,这一时期的经济问题更加尖锐。经济质量与效益低以及高浪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而制约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脆弱性,它是苏联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被击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苏联社会主义逐步走向停滞和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改革停滞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时,有必要较为详细地探讨改革停滞是如何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

苏联在70年代以前(二战期间除外),经济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这是靠不断地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的,走的是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消耗型经济。苏联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的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大多数年份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1950年,苏联的基建投资只及美国的30%,到1971年已与美国相等,1974年超过美国。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

投资多 50%。

### (一) 转向集约化轨道的背景

70 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

苏联在 70 年代初决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粗放因素日益缩小。表现在:

一是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许多部门已感到劳动力不足。据计算,70 年代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年增长率为 18%,到 80 年代下降到 3.8%。1961—1965 年,靠农庄庄员补充的劳动力人数为 310 万人,1971—1975 年降到 150 万人,1976—1980 年又降到 80 万人。退休人员激增(从 1950 年的 85 万人增加到 1970 年的 1900 万人),使劳动资源问题更加突出。

二是由于长期实行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原材料、燃料动力资源消耗量大量增加,出现供需之间的不平衡。苏联虽资源丰富,但地区分布极不平衡。进入 70 年代,集中工业生产能力 80% 的西部地区资源“已近于耗尽”,要靠东部地区供应,从而使运输距离大大拉长。1966—1977 年,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从 734 公里拉长到 1152 公里,生产费用日益提高。另外,随着原料、燃料基地东移,开采条件恶化,开采成本大大提高。如 1980—1985 年,开采每吨石油的费用增加了 80%—100%。廉价原料与燃料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再者,苏联每年要出口大量原料与燃料以换取外汇。这些因素,使得苏联用大量投入资源来发展经济的道路走不通了。

三是资金日益紧张。60 年代中期之后,基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苏联 50 年代基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 13.3%,60 年代降为

7.1%，70年代降到5.3%。

另外，由于长期实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效益日益下降。如1960年，每卢布生产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为72戈比，1970年降为55戈比，下降了28%。社会劳动生产率从1961—1965年年均增长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70年代初，苏联已有大量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和第二，但质次，报废率高。如钢的产量虽然很大（1971年为1.2亿吨，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仍需进口各种钢材；拖拉机每年的报废率有时甚至高于新增产量。

苏联认识到，在不少产品数量超过美国之后，要想争取优势，必须通过科技进步，由过去的数量赶超转向质量赶超。而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行集约化方针。

70年代初推行的集约化方针并没有取得成效。苏联经济仍保持一种粗放的增长方式，集约化因素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日趋下降。（见表20-2）

表 20-2 勃列日涅夫时期集约化因素  
在扩大再生产中的比重(%)

	1961— 1965年	1966— 1970年	1971— 1975年	1976— 1980年
按社会最终产品计算	33.8	35.2	26.9	30.5
按社会总产值计算	33.6	37.1	32.9	24.6

资料来源：[苏联]《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

从表20-2可以看出，在苏联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额中，3/4是依赖于粗放因素得到的。无论按社会最终产品计算，还是按社会总产值计算，从60年代至80年代，集约化因素的作用明显下降。整



个70年代集约化未取得进展,也可以用反映集约化程度的一些效率与质量指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这一事实加以说明。例如,苏联提出集约化方针之后,反映经济效益重要指标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见表20-3)

表 20-3 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

	1961—1965年	1976—1980年	1981—1982年
社会劳动生产率	6.1	3.3	2.9
工业劳动生产率	4.6	3.2	2.4
农业劳动生产率	4.8	2.6	1.0
建筑业劳动生产率	5.3	2.1	2.3
铁路运输业劳动生产率	5.4	0.1	0.0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4年,第53页;《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纪念统计年鉴,第107页。

从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来看,也未取得进展,反而从1970年的54.9%提高到1980年的57.2%。单位产品的物资耗用量指标恶化,与苏联经济中存在严重浪费密切相关。由于集约化方针未取得成效,这一时期苏联经济中的浪费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苏联报刊大量揭示了苏联经济中的浪费现象:能源的有效利用率为43%,损失达57%,折合标准燃料相当于9亿吨;每年因锈蚀而无情地吞掉2000万—2500万吨金属;因质量低劣,每年有15%—20%的工业产品要报废或降价处理;谷物每年浪费3500万—4000万吨;由于保管不善,每年要损失500万—600万吨化肥,等于向农业提供化肥总量的1/10;苏联、美国每年木材运出量均为3亿

立方米,但苏联木材从产地运出,经运输、加工等,要耗费掉一半。苏联每吨木材所生产的纸板几乎比美国少 9/10,纸少 5/6,胶合板少 8/9;等等。<sup>①</sup>

上述情况都说明,苏联 70 年代初提出集约化方针后,经济仍是粗放型的,是拼消耗的经济,也是浪费型经济。

正是由于整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未取得进展,80 年代才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 年,苏共“二十七次”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重提集约化方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维持苏联经济最必要的增长率,必须改变过去的粗放发展道路。1985 年制订的《1986—1990 年和 2000 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规定,要把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从“十一·五”计划(1981—1985 年)的 3.1% 提高到“十四·五”计划(1996—2000 年)的 5%。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如果按粗放方式经营,要实现上述规定的增长率,要求每个五年计划需追加燃料和原材料 10%—15%,增加基建投资 30%—40%,增加 800 万—1000 万劳动力,而这种可能已根本不存在。1985 年召开的专门讨论科技问题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指出:“粗放发展方法基本上已经耗尽潜力了。”

## (二) 转向集约化的主要措施

1. 加速科技进步。苏联提出,要把科技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的战略方向”,应将其看作是推动生产集约化的主要因素。具体措施有:发展“科学与生产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实行有利于新

---

<sup>①</sup> 陆南泉,《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见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4 页。

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和生产的政策，加强科技进步的物质刺激，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等。

2. 调整投资政策，把投资重点从新建企业为主转向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提高陈旧设备报废率等。

3. 调整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主要是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部门，调整和改进行业需求结构等。

4. 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加速智力开发。为此，调整专业和学科设置，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拨款，加速科技干部与管理干部的培训等。

5. 改革经济体制，使其符合集约化方针的要求。

苏联从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集约化方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不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80年的40戈比，到1990年又下降到28戈比。另外，劳动生产率也大幅度下降，1986—1990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下降到1.5%。80年代中期，苏联单位产品消耗量仍然要比美国大得多，生产的切削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法等国同类产品高1—1.5倍。加上粗放因素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些成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1986—1990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为1.8%，1990年出现了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比上年分别下降2.3%和4%。这些情况，说明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增长方式未能转变，不仅制约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也为以后时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成为苏联社会主义走向衰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 转向集约化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

苏联从70年代初开始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政策,之所以未能取得进展,虽然有多种原因,但说到底,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

苏联长期把加速科技进步视为推行集约化方针最重要的措施,明确指出:加速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极严格的、毋庸置疑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苏联拥有巨大的科技潜力,80年代末科技人员为150万人,相当于世界科技人员总数的1/4;每年新技术发明占世界新技术发明总数的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巨大的科技能力,难以在经济转向集约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苏联只有1/4的科技成果在经济中得到应用,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长达10—12年之久。形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经济体制对科技进步的阻碍作用。苏联学者认为,传统体制在科技进步道路上制造着一种独特的“反促进因素”。下面就是经济体制阻碍科技进步从而严重影响经济集约化发展的具体过程。

1. 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苏联长期坚持指令性计划制度,企业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去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总产值指标是对企业工作评价和奖励的中心指标。这是企业对采用新技术顾虑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需要改装设备,改变工艺过程,重新培训技术人员和工人,等等。这些都会打破原来的生产节奏,并在一段时间里往往会导致产量下降,最后完不成生产计划和利润计划,从而使企业收入减少,最终影响经济刺激基金,这样,企业领导人只愿意“稳稳当当”地进行生产,不想冒采用新技术的“风险”。这就是说,传统经济管理体制促使企业的活动只局限于追求短期内获得最多的产量,

而阻碍生产的革新过程。

2. 物资技术供应制度阻碍企业技术革新。长期以来苏联企业主要是通过国家统一调拨制度获得生产资料的,而无权在市场上自由购买,因此,企业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就得想方设法生产那些在物资上有保证的产品。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物资供应往往得不到保证,因为新产品在投产的最初几年常常需要重新设计,而生产新产品的企业,对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多少物资的估计,也难以做到像生产老产品那样准确。再加上生产新产品还要使用过去未用过的材料,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与原先毫不相干的新的供货单位建立关系。这些都增加了生产新产品企业在物资供应方面的不稳定性和完不成生产计划的可能性。这样,企业就自然希望尽可能地减少改变产品结构,年复一年地生产旧产品。

3. 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在规定新技术产品价格时,往往利用一次性定价的机会,不根据新技术产品的实际生产效率和成本,大大提高价格,以获得高额利润。这就产生下列情况:新技术产品与原来同一类型的旧产品相比,价格要高出好多,而效率并没有提高多少,即价格的提高与效率的提高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单位就对这类新技术产品不感兴趣。因为改用了这类新技术,产品成本会提高,还要增加基金付费,最后会使利润率下降。据车床制造工业部统计,在生产总值中采用新技术生产的比重占10%的情况下,赢利率为23.6%,采用新技术生产占50%的情况下,赢利率则降为11%。

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压低新技术产品的价格,那么,生产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就会失去兴趣。

4. 物质奖励制度弊端甚多。这方面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苏

联长期以来把奖励的重点放在数量上而不放在质量上,结果是导致企业只顾数量,而不愿更新产品和提高质量;二是采用新技术获得的奖金数额,往往弥补不了因采用新技术而损失的奖金数额;三是奖金制度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新技术成果奖的获得者往往包括与新技术发明不相干的人员。

5. 产品供不应求,缺乏竞争。在苏联,尽管每年有一些质量低劣和不对路的产品要削价处理,但通常存在的是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加上产品由国家统一包销,缺乏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造成了一种产品可以年复一年地按老样子生产下去、可以几十年不进行技术革新的状况。

6. 企业资金不足,阻碍设备更新。苏联自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在扩大企业权利。但真正归企业自由支配的利润仍较少,并在使用上有严格规定。因此,企业缺乏更新改造设备的自主权。留归工业企业主要用于更新设备等用途的发展生产基金十分有限,如果靠这项基金来更新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的话,那么,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约要用八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全部更新。80年代中期,苏联机器设备的淘汰率为2.2%,全部设备的更新需花45年之久,而按当时技术发展速度,机器设备的役龄不应超过10年。技术设备更新缓慢,致使苏联工业部门产生了巨大的、专业化程度很小的、经济效益很低的修理行业,它不生产新技术,而只是维修旧的技术装备。

7. 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病。这方面的问题有:一是科研、设计、实验直到生产这几个环节是相互脱节的,各机构只对“研究—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负责。这是造成新技术从研制到采用周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很多科研机构缺乏必要的实验基地,现有的实验基地也不完善,能力薄弱,缺乏成套的工艺设备,不完全具备

制造新技术工业样品的生产能力；三是苏联生产部门的科研与研制工作是按部门原则实行领导的，各部门一般都把生产计划排得满满的，主要考虑完成生产计划，这样就往往把完成科研和研制新技术任务所需的人员和设备挤掉；四是国家财政为科研机构完成科研课题提供无偿的固定经费，这样不易保证科研成果的质量，即其实际应用价值；五是科技管理方面存在严重官僚主义。如苏联机床制造与工具工业部门，批准一项技术设计平均要经过 10—12 个领导人签字，要经过标准化部门及其下属技术机构的 30 道关口。每年仅花费在批准设计上的人力和时间就要 35 万个人时，即使使 40% 的最熟练的设计人员脱离自己的设计工作。这种官僚主义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技术人才，使最先进的技术设计投入生产时已变得陈旧。

另外，苏联保密范围过宽，造成了相互封锁的严重情况，技术情报传播很慢。军工部门的先进技术转到民用部门的速度十分缓慢，造成了同一领域的技术在军事工业部门十分先进，而在民用工业部门十分落后的现象。

以上分析说明，传统经济体制严重阻碍科技进步，从而成为阻碍苏联经济向集约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一些俄罗斯学者在后来总结科技进步与体制改革关系时明确指出：“要加速科技进步而不在经济上进行根本的改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sup>①</sup>另外，还应指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科技进步缓慢与当时“左”的封闭的思想有关。当时，苏联对 60 年代末开始的世界上已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信号“置之不理，直到 70 年初甚至还不准使用‘科学技术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17 页。

革命’这个概念,不仅想方设法从官方文件中勾掉,而且还从报刊书籍中删掉。”<sup>①</sup>

### 五、粗放型的投资是导致经济效率 低和浪费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前面,我们较详细地分析了由于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的,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突出地表现在投资领域,而投资规模大,是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苏联投资总额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巨额投资的效益对整个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因此,研究投资中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对于正确评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有重要意义。

(一)贪大求快,导致基建战线过长、投资分散,未完工程大量增加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靠高投资、增加基建项目来维持经济一定速度的发展,就不顾客观条件地高投资。这必然造成基建战线过长,投资分散。

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恰图罗夫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的基建任务与建筑单位拥有的力量与生产能力不相符合。当时,苏联每年同时施工的生产性基建项目达25万—26万个,<sup>②</sup>加上每年还要建筑一亿平方米左右的居民住宅和其他一些非生产性建设项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6页。

② [苏联]《真理报》1979年8月29日。



目,每年新上马的项目就要占在建项目总数的30%—40%。结果使基建力量严重分散。据时任苏联建筑部副部长提供的材料,由该部各施工单位承担的基建项目超过32000个,按该部当时拥有的建筑工人计算,平均每个项目摊到的工人还不到12人。

基建资金和建筑材料的供应难以保证。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就指出,基建中的问题之一是“在制定计划时往往不考虑现实可能性,把基本建设规模和建设项目数定得过高和过多,从而造成资金分散、未完工程增多和大量资源呆滞”。苏联财政资金一直很紧张,大规模的基建任务,再加上基建周期拖长,工程实际造价往往要比预算造价高出50%—100%。这样一来,经常造成因资金得不到及时供应而停工。在苏联工业建筑部系统,只有10%的建筑队可以不间断地得到物资供应。

以上情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未完工程大量增加。(见表20-4)

表 20-4 苏联未完工程量增长情况

年 份	未完工程量(亿卢布)	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
1965	296	69
1970	525	73
1975	767	75
1978	990	85
1979	1064	91
1980	1051	87
1981	1080	86
1982	1089	84

资料来源: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8年版,第418页。

从表 20—4 可以看到,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未完工程量大幅度增加,1982 年为 1089 亿卢布,这比 1965 年的 296 亿卢布增长了 2.68 倍,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 1965 年的 69% 上升到 1982 年的 84%,其中在 1979 年高达 9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性项目的未完工程量更大。例如,1978 年它超过了当年基建投资额的 27%,在煤炭工业部超过 40%,黑色冶金部超过 31%,化学和石油化学工业部门则超过了 73%。“成百亿甚至成千亿卢布由于可怕的损失或由于‘世纪工程’而年复一年地白白地丢掉了,冻结在‘长期建设项目’上,耗费在无用产品的生产上(更不必说用在严格保密的、吸干了经济血的、连多数领导人都不知道确切数字的军费开支上)。把问题缩小为一个财政纪律问题永远不能够医好严重的经济疾病。”<sup>①</sup> 苏联未完工程增加,除了投资本身是粗放型的这一原因外,还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例如,从苏联基建投资拨款制度来看,预算拨款一直占主要地位。近几年来实行“新经济体制”后,企业用于基建投资的自有资金比重虽然增加,但它是按国家计划规定加以使用的,这部分资金实际上同预算拨款一样,是无偿的。这种无偿拨款制度,对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都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它们不承担任何物质责任。这就导致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在编制基建计划时,竭力争项目和争投资。苏联在审批国家计划时,每次都要砍掉各部和各加盟共和国提出的大量项目。为了达到争投资、争项目的目的,设计、建筑单位往往有意压低工程造价,以便较容易地被计划部门通过。但一旦项目被列入计划,就逐步向国家提出追加预算。这使工程实际造价大大超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298 页。

过预算造价,再加上苏联施工期限长(大型项目经常达8—12年甚至20年,而规定期限为4—5年),这样必然使基建投资难以控制,未完工程也随之增加。由于各单位急于争项目、争投资,还往往发生在设计、资金、设备和材料等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就抢着施工,造成既成事实,结果使基建摊子铺得很大。

另外,评价建筑单位工作的指标和工程结算制度,也助长了未完工程增加。自经济改革以来,评价建筑安装组织工作效率的指标,简言之,就是看其资金动用多少;即基建投资用得越多,工作成绩就越大,利润和奖金就越多。对工程采用分阶段结算付款制度;就是说,在建筑单位完成某个施工阶段后,即可交给发包单位,并能得到付款。但对发包单位来说,工程某个阶段一般是不能投产使用的。以上这些做法使得建筑单位只对完成工程预算造价高的某些“有利”阶段感兴趣,如打地基、支框架等,因为这些阶段是耗用材料多的阶段。而对工程收尾阶段,由于材料消耗少,一般是薄利费工,因而建筑单位这时常把工人撤走,去搞新的工程,结果拖延了扫尾工程的完成。这必然导致未完工程增加。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动用的基建投资越多,对建筑单位越有利,就促使建筑单位毫无根据地采用贵重的材料和构件,从而使工程造价普遍提高,因而往往引起资金不足,迫使工程停顿下来,处于未完工程状态。

## (二)投资效率大大下降

基建战线过长,资金分散,周期长,大量资金冻结在未完工程上,过多地搞新建和扩建,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和改造进展不快,最终必然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集中反映投资效率的综合性指标是每卢布投资产生的国民收入增长额。这项指标在苏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如“九·五”计划时期比“八·五”计划时期,每卢布投资产生的国民收入额就减少了13戈比,减少50%。“十·五”计

划时期,每卢布投资产生的国民收入增长额分别为:1976年18.9戈比,1977年16.3戈比,1978年15.9戈比,1979年9.2戈比,1980年11.9戈比。1980年与1970年相比,每卢布投资产生的国民收入增长额下降了36.4%。由于基建项目不能按时投产,使投资回收期延长。工业部门的投资回收期,1977年比1960年几乎长四倍。反映投资效率的另一个指标——基金产值率也呈现了下降的趋势。1961—1975年,基金产值率下降了23%,1971—1977年又下降了13%。<sup>①</sup>工业基金产值率1979年比1975年下降了11戈比,这使国民经济少得550亿卢布的产品。<sup>②</sup>由于基建投资效率下降,为生产同样的国民收入,就要花更多的投资。据苏联科学院院士恰恰图罗夫计算,每增加1卢布的国民收入,所需要的基建投资在1951—1955年为1.81卢布,到1976—1977年则需要6卢布,增加了2.3倍。1977年,苏联同美国相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的投资用量高出近50%。<sup>③</sup>

农业部门投资效果下降的情况更为严重。如“八·五”计划时期,1卢布农业投资所增加的农业产值为1.47卢布,到“九·五”计划时期为0.67卢布,“十·五”计划时期进一步下降到0.36卢布。

投资中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说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断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市场难以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中起作用。同时还说明,用巨额投资即使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完成了计划,也不能以此来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问题是,在苏

① [苏联]《经济问题》1979年第5期。

② [苏联]《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

③ [苏联]《计划经济》1979年第2期。

联传统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大家最喜欢的衡量成就的一个标准是百分之百地完成计划,经济增长率多少。但这个百分之百地完成计划和经济增长多少又能说明什么呢?“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不过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花招”,因为它从不说明这“是用什么代价获得的”。<sup>①</sup>

### 五、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

改革的停滞,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充分得到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仍坚持帝国政治思维方式,即在“世界革命”旗帜的掩盖下,实现苏联“帝国”的野心,搞扩张、争霸。为了这些,必须扩军备战。这里引一下苏联知情人士的论述可能更有助于说明问题。“70年代标志着苏联战后在发展和积累各类武器方面作出了最大努力,而这是缓和已开始之时发生的,这时我们已在核武器、常规武器,在陆、海、空军事力量方面取得了军事均势。结果,就许多参数而言,我们在许多方面不仅达到了美国人和他们的军工综合体使其武器数量达到的荒谬的最高程度,而且还超过了他们。这里指的是常规武装力量中这样一些重要成分,如军人人数、坦克、火炮、战术火箭、许多种飞机、潜艇和其他许多武器系统。至于说到核武器,我们在运载工具数量、爆炸力的当量和战略武器的投掷量方面,以及在中程武器方面,都超过了美国。”<sup>②</sup>

苏联在军事实力方面很快达到“鼎盛”与“顶峰”,除了上面提

---

①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97页。

② 同上书,第282页。

到的苏联坚持旧的外交思维这一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也应指出,即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把军人视为他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他一开始就设法满足军队提出的要求。勃列日涅夫本人也特别看重自己的戎马生涯,他对获得军衔、勋章、特别是军功勋章十分贪婪。<sup>①</sup>西方学者撰写的勃列日涅夫传记也明确指出: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有“两大支柱:军人与斯大林分子”。<sup>②</sup>

军备竞赛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在国际上,逐步破坏了已经出现的苏美缓和气氛,同时,也破坏了对缓和的信任,从而使军备竞赛一轮又一轮地进行下去,“这确实像一场荒谬绝伦的竞赛”,它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因为,谁都知道,苏联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了防御的合理限度。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把苏联军事实力发展到“鼎盛”也好、“顶峰”也好,决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难道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的核武器需要消灭地球几十次、几百次吗?狂热的扩军只能说明,勃列日涅夫继承俄国沙皇和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衣钵,是为其扩张政策服务的。

这种狂热的军备竞赛和超过任何需要量的武器积累,对苏联经济的破坏作用特别严重。突出表现在:

#### (一)巨额军事开支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军费支出一直以很高的速度增长。1965—1979年,军费开支增长了三倍以上,平均每年递增8%,其中1970—1975年,五年间军费增长近一倍,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苏联国民

---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80页。

<sup>②</sup> [西德]米夏埃尔·莫罗佐夫著、张玉书等译:《勃列日涅夫传》,第226页。

收入和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军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苏联1979年的军费开支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30%以上,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占社会总产值的12%—13%,相当于全年社会新创造财富的1/5以上,几乎等于当年国民经济投资的总和。由于苏联军费支出快速增长,其军费支出总额很快就超过了美国。6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累计军费开支相当于苏联的两倍。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从1972年开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它在70年代的累计军费开支超过美国20%—30%,1979年甚至超过美国50%。<sup>①</sup>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及其盟国少2/3到3/4。<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只能使苏联经济破产。军备竞赛不只是耗费大量财政资金,还耗费大量物资。1980年,苏联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将近50%的产品用于军事目的,整个工业投入军工生产的比重达到40%左右。其中仅用于制造武器的金属消耗每年就大约增长8%。每年用于扩军备战的油料消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四年耗油量的两倍左右。<sup>③</sup>这样,苏联经济年复一年地衰败下来。没有任何敌人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sup>④</sup>

还要指出的是,随着军备竞赛由数量转向质量,要求苏联付出更大的代价。苏美两国争夺军事优势不再是简单地表现在数量上,

① 数字资料引自《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2期。

②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83页。

③ 引自《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2期。

④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169页。

而要求进一步研制更加先进的、对方难以对付的进攻武器的防御武器。这对整个经济技术水平低于美国的苏联来说，势必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

## (二)经济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常性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化的经济结构，是苏联经济的一大特点。随着勃列日涅夫时期扩军备战的加强，这一特点更加得到强化。以轻、重工业的比例为例，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曾一度拉平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但在“九·五”与“十·五”计划期间，这两类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又拉开了，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扩大到1971—1980年的1.28:1，这一差距较1951—1960年间的1.2:1和1961—1970年间的1.18:1都大。在重工业内部，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如在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10.4%)，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78%)高1.2倍。而同期的仪表制造业产值剧增了3.3倍，其中电子计算机业增长9倍。<sup>①</sup>这一时期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同样是以牺牲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因为，以当时苏联的经济实力，做不到“既要大炮又要黄油”。长期以来，苏联市场供应紧张，社会主义经济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也谈到，许多地方“向居民供应食品的困难依然存在”；他抱怨“许多消费品，特别是纺织品、皮鞋、家具、电视机的生产计划，年复一年地没有完成。在质量、装潢、品种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进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

---

<sup>①</sup> 数字材料转引自陆南泉、周荣坤：《当前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苏联经济研究会编：《苏联经济体制问题》，时事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71页。



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多”。<sup>①</sup>由于军备竞赛对苏联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到苏联剧变的1991年,市场真是“空空如也”。至今,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调整仍显得异常困难。据西方学者估计,如果苏联把它的军费预算削减25%的话,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的增长率几乎可增长一倍。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下的几十年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定义。一个是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订的第三版中,对这个定义有所修改,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改为充分地满足。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满足实行扩张政策需要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被放在发展生产的首要目的上,既谈不上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也谈不上充分满足。另一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苏联七十多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不按比例的发展。不论是农、轻、重的比例,

---

<sup>①</sup> [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26页。

还是工业内部的比例,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健康发展,不可能持续发展的,而出现由停滞、全面停滞到衰退一直到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 六、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

改革的停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sup>①</sup>应该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并不是困难的事,因为:第一,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捅了一下斯大林,特别是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并没有触动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体制。就是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报告时,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可以说还根本没有触及制度性问题。二是植入苏联社会的斯大林主义,它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为了让它生根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最极端的大规模的恐怖,从而使其在苏联根深蒂固。三是在斯大林时期,不只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体制下培养了适应和积极维护这个体制的领导干部。这些干部是“传声筒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1页。

式”的干部，同时又握有种种特权，他们离开了这个体制很难工作，又会失去特权与利益。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我们所看到的，领导层中很多很多人仍然持旧的、斯大林主义观点。他们要在任何一个别的社会政治体制下为自己寻找一个位子即使说不是完全不可能，那也是很难的。这些当权者除了往下面贯彻‘上头’的意旨外，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sup>①</sup>在上述条件下，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为重新斯大林主义化，主要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对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立场上的人施加压力，但又不采取或很少采取极端的手段，如逮捕判刑等。“一般的做法是革职，给予严厉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以及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中伤他们，送入精神病医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sup>③</sup>

勃列日涅夫在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方面，首先的步骤是恢复斯大林作为“伟大领袖”的名誉，最简单的办法是1965年利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庆典，提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后来，利用撰写各种各样的有关二次大战的回忆录，把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91页。

斯大林重新抬出来。官方要求回忆录也好，二战史也好，要符合当时的苏共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需要。这样，连十分重要的朱可夫回忆录中，也要把有损于斯大林形象的内容删去，如从书的原稿中砍掉有关1937年斯大林对红军高级指挥人员实行镇压的一章。<sup>①</sup>

与此同时，“思想限制的范围扩大了，成为迫害对象的人数增加了，社会的政治、精神和道德氛围明显地变坏了”。“‘合法性’的界限和可以在体制之内采取行动的范围变得越来越窄了，人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不久前还准许说的话和曾在崇高讲坛上讲过的话也被置于禁止之列了。”<sup>②</sup>

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的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的话题时，也常常看一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sup>③</sup>

至于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并不比其他方面好些。拿经济科学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实际上在走回头路，精力集中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摆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

---

① 朱可夫元帅的回忆录完整的未经删改的版本现在已经问世。自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遭到斯大林镇压的有近半数的团长，几乎所有的旅长和师长，所有的军长和军区司令员、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军、师、旅的政工领导干部，近1/3的团政委，以及高等和中等军事学校的许多教员。（参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02—205页）

②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191—192页。

③ 同上书，第317页。

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sup>①</sup>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而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升级,并纳入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sup>②</sup>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基扬和札斯拉夫斯卡娅等,则成为围攻的对象,并被迫远离莫斯科去新西伯利亚。

当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其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sup>③</sup>

以上就是胸前挂满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闭上双眼时给苏联人民留下的“遗产”。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20页。

② 1975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列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

③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13页。

## 第二十一章 事业无成的安德罗波夫 时期改革与濒死状态的 契尔年科时期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作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两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对待改革的态度和个人品行、素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也有共同点：一是执政时间都很短；二是都年老体弱（安德罗波夫执政 14 个月，就任总书记时已 68 岁，而契尔年科执政仅 13 个月，上台任总书记时已 73 岁），身患疾病。

### 第一节 理论上探索改革的必要性

如果与他的前任勃列日涅夫和后任契尔年科相比，安德罗波夫不论在智慧还是在才干方面，都要胜他们一筹。作为最高领导人来说，他颇有不寻常的知识分子气质，并一向为人清廉。但正如与安德罗波夫共事很久并十分熟悉他的阿尔巴托夫所说：安德罗波夫是个矛盾人物，或者说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人物”。他一方面看到苏联的状况不仅在斯大林统治下，而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都是不正常的，应该进行认真的变革，并应从经济领域开始。而在另一方面，他在这个领域的思维方式相当传统，他不敢过于超越诸如有必要整顿秩序、巩固纪律以及提高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作用等概念的范围。他工作中的另一个弱点是优柔寡断，甚至不时地

表现出恐惧心理。他常常由于“过分讲究策略”而丢失战略目标。这突出反映在改革与干部政策问题上。他很理解社会还未从斯大林主义中恢复过来，在停滞年代的岁月中又饱经失望的屈辱，社会渴求认真的改革和革新，但他对迅速彻底的变革过于审慎。在干部问题上，安德罗波夫未能使党和国家及早从那些一无所长，而且常常冥顽不化、愚昧无知同时又年老体衰、奄昏无力的人们的治理下摆脱出来。<sup>①</sup>安德罗波夫这种复杂性格不是天生的，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如同多数在斯大林统治下生活过，而且还步入了政界的他的同龄人一样，他也是个深受创伤的人。其实这正是斯大林肉体恐怖和精神恐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打断人们的心理道德脊梁骨，使他们丧失坚毅勇敢的性格、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安德罗波夫身上的创伤比起他同辈的政治家来可能不那么深重和不可救药。何况他聪明，也颇有独立思考的愿望和能力。但是我认为这一弱点使他过于轻易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妥协。”<sup>②</sup>

当然也应看到，即使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安德罗波夫仍然对苏联僵化了的政治立场作了某些变更，迈出了向前走的一步。

安德罗波夫上台的背景，在我们上一章最后一节分析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时，已看得很清楚了。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勃列日涅夫逝世时，苏联的社会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所长西奥伦·比亚勒教授在1983年9月访华时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德罗波夫就任时面临的问题，要比斯大林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73—375页。

② 同上书，第351—352页。

死后苏联领导人面临的问题还要困难,还要大,这些问题普遍与经济有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四年中,苏联经济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 1982 年 11 月 10 日去世后,苏共中央于 11 月 12 日举行的全会上一致通过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苏联广大人民渴望随着新领导人上台,结束勃列日涅夫时期留下的一潭死水的沉闷局面以及简直使人感到无止境的滑坡现象。按照阿尔巴托夫的分析,安德罗波夫的上台使苏联人民看到:第一,苏联开始由一个正常的、值得信赖的、甚至不乏魅力的人来领导了。即领导苏联的已不再是一个残疾的勃列日涅夫,此人即使在最好岁月也无法显示出才华而是拙口笨舌,在其患病期间给人的印象简直是个对周围事物丧失分辨能力的人。安德罗波夫一上台时与勃列日涅夫相比出现的这一反差本身鼓舞了国家与人民,使他们萌发出不小的希望。第二,安德罗波夫在上台后的最初几次讲话中已经许诺要进行变革,要与贪污腐化、纪律松散以及全面混乱的状态进行斗争,已经提出目标要振兴国家、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第三,人们看到了可以作为更大规模变革先兆的某些实际事例。一些民愤较大的败类已被撤职,反对索贿受贿、侵吞公款的斗争方兴未艾;在反腐肃贪、整顿秩序和加强纪律方面都已开始行动起来。在执政的头几个月,安德罗波夫的名声大振,社会各阶层对他寄予厚望。<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陆南泉:《西方学者评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苏联经济》,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6—228 页。

<sup>②</sup> 参见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371—372 页。



安德罗波夫在成为第一把手前,于1982年5月接替了1982年1月去世的苏斯洛夫的工作,任苏共中央书记,成了第二把手,他又当过克格勃的头,因此,他十分了解苏联的状况及面临的严峻问题,看到了苏联必须进行改革。为此,在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苏联围绕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讨论,有公开的,也有不公开的,讨论的深度并不亚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1962年(当时围绕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讨论的首要问题是:在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应该说,安德罗波夫在这方面是带了头的。他在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sup>①</sup>一文中明确指出,当前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文章分析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我们已建立了强大的、有计划发展的经济,它能够提出并解决规模巨大和内容复杂的国民经济任务与社会任务。当然,我们的这些可能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在这方面既有一些问题,也有严重的困难。我们的任务现在集中在提高生产和整个经济的效率上。党、苏联人民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进展还不是那样足够的顺利。在这里是什么在起阻碍作用呢?为什么在投入大量资金之后,我们现在得不到应有的效益呢?为什么在生产中掌握科技成就的速度不能使我们感到满意呢?当然,可以列举出许多原因。首先不能不看到,我们旨在完善和改革经济机制、管理形式与方法的工作仍然落后于苏联物质技术、社会、精神发展业已达到的水平所提出的要求。这也是主要的一点。文章提出,为了加速发展生产力,必须有相应的组织经济生活的形式。只要这个理论上的真理还没

<sup>①</sup> 载于[苏联]《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有变成具体的实践,情况就不会有进展。制定各种措施时,必须始终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为出发点,要避免用与经济的本质格格不入的形形色色的方法管理经济的做法。在这里回忆一下列宁下述警告是不多余的:好像用共产党员的名义发号施令,他们就能够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

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在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现在已经接近这样一个阶段:生产力的深刻质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完善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已是势在必行了。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客观的需要,对这种必要性我们既无法绕过,也无法回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们的意识,通常称为上层建筑的各种社会生活形式,也得发生变化。他还指出,要保证整个经济机制不间断地协调运转,这是当今的要求和未来的纲领性任务,是完善苏联社会制度的整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安德罗波夫在其逝世前召开的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1983年)上发表的书面讲话中,谈了具体完善苏联经济体制的一些设想,而后得出结论说:只有综合地、相互联系地研究改进管理体制的问题,才能解决最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优越性的任务。这应该成为苏共纲领修订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研究根本改革的必要性,一些学者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和产品具有直接社会性的观点进行了冲击。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T.札斯拉夫斯卡娅院士。她在1983年的一次内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报告中,在理论上集中分析了当时苏联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

在她报告的第一部分首先指出,苏联最近12~15年中,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生产关系体系以

及反映生产关系体系的国家管理机制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造成的,更具体地说,就是这一体系不能保证社会的劳动潜力和智力潜力得到完全而充分有效的利用。

苏联现行的国家管理体制(以及通过它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基本轮廓,是在大约五十年前形成的。从那时起,这个体制虽经多次小修小补,但没有进行过一次能反映生产力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彻底改革。这种体制最主要的特征是:经济决策高度集中;生产计划的指令性,市场关系很不发达(产品价格背离其社会价值、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等);对劳动的各种形式的物质刺激进行集中调节;部门管理原则优先于地区原则;对经济部门和分部门的管理处于本位主义的隔绝状态;企业管理权限有限,对经营活动结果的经济责任同样有限,居民在生产、服务、交换领域等一切形式的不受控制的经济积极性也受到限制。所有这些特征,都反映了经济管理的行政方法多于经济方法,集中多于分散。

她接着指出:上述经济管理体制是根据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再生产规律的理论概念制定的。这个概念在苏联包括以下主要因素: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两者之间不会发生矛盾;

(2)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集团和社会的利益之间不存在深刻的、更不用说是对抗性的矛盾,正如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体利益之间不存在这些矛盾一样;

(3)社会主义生产者的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

(4)用于生产商品的个人消耗不一定通过市场机制确认其社会必要性,即商品货币关系并非是社会主义经济所固有的;

(5)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分具有绝对的经济优势,它与个体经

济成分之间不可能存在竞争；

(6)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者是由“上级”集中管理的,就其本质而言是消极的,不能指望那些充当劳动资源的人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7)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物质需要、物质刺激和物质动因占绝对优势。

上述概念,连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体制,基本上适应于30年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时,劳动的社会化水平较低,部门、企业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中央容易觉察到,能够从上面进行调整;绝大多数工人刚从农村出来,法制观念淡薄,没有参加管理的要求;多数人对物质刺激的关注要超过社会鼓励和精神鼓励;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劳动力流动较少;在企业 and 机关采用了近乎战时的劳动纪律措施。

但是,迄今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此期间,苏联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现在的生产力状况比起30年代不仅在数量上不同了,而且在质量上也不同了。国民经济的部门、主管部门、地区结构复杂了许多,它的环节数目,尤其是这些环节之间的工艺联系、经济联系和社会联系都大大地增加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复杂性早已超越了统一的中央所能有效调节的界限。其次,劳动者的“社会类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见识、社会意识和法制观念今非昔比地提高了。决定生产过程效益的熟练工人的基本核心更是具有相当开阔的政治和经济视野,能批判地评价经济和政治领导人的活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在必要时会捍卫这些利益。现代工人的需要和利益比30年代的劳动者要丰富和广泛许多倍,除了经济的需要外,还有发达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最后,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

活劳动的要求发生了质变。生产资料的总量和价值、劳动的技术装备率增长了许多倍。结果,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不诚实的劳动、破坏劳动纪律和工艺纪律、对技术不负责任的态度等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的规模也大大扩大了。总之,一方面,对劳动者劳动活动的工艺要求提高了,另一方面,建立在上级对下级活动规定行政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的、集中的生产管理的效率降低了。

根据上述分析,札斯拉夫斯卡娅在报告第一部分的结论是:集中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可能性业已用尽,必须更积极地利用与发展市场关系有关的“自动”调节器,以便平衡生产,纠正最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国民经济中不断深化的比例失调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还在捍卫社会主义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和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特殊性”理论的学者们,是在给社会帮倒忙。札斯拉夫斯卡娅进一步指出,现在一切都证明,现行的生产关系体系严重落后于生产力的水平。它不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相反,却越来越变为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障碍。

## 第二节 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新看法

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在理论上探索改革必要性的同时,为了促进体制的改革,还在其他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看法。

### 一、从“建成论”到“起点论”

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以后的任务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物质技术基础,向

共产主义过渡。安德罗波夫为了在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前进,于1983年初对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与勃列日涅夫迥然不同的看法。他并不认为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指出当前苏联社会仍处于这个“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sup>①</sup>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发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要防止苏联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可能出现的夸张,并批评这一代人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论点是“脱离实际”和“超越时间发展”。第二,不要把苏联社会看做是“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社会既有许多受客观制约而形成的困难,也有不少因主观原因而造成的缺点。这就决定了,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是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第三,强调要重视并解决各种非对抗性矛盾。“简单化地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与分歧,是政治上的幼稚。”既然苏联社会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阶段,又很不完善,并存在很多矛盾,因此,通过改革解决各种问题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也就为改革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 二、所有制理论的松动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一直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并且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时,往往将其与动摇计划经济的基础即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联系起来。安德罗波夫上台后,苏联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有所松动,主要表现在:

(一)强调“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的过程”。“把‘我的’,即私有制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的,变成‘我们的’,即公有制的,并非易事。”劳动者“取得做主人的权利同当家做主——成为真正的、聪明的和勤勉的主人——远不是一回事”。<sup>①</sup>这就是说,在苏联,所有制的变革远未完成,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二)强调要从理论上把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占有方式说明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目的和社会结构,它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经营方式揭示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前者是通过后者得以实现的。苏联建立了公有制,从而可以使占有形式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但是,这种适应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要通过不断改造经营方式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能主动地相适应。因此,完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实现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规律的一种形式。

以上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为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使改革免受所有制理论禁区的束缚。因为按这种观点,改革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经营方式,而不是改革占有方式。

(三)批判超越生产力水平而一味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强调苏联现阶段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四)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不少学者写文章指出,现在该是更坚决地取消对为居民服务的各种个体劳动活动限制的时候了。<sup>②</sup>他们建议把修表、照相、理发、修鞋等行业交给个人去干,一些小商店可以试验在合同的基础上租包出去等等。一些学者还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sup>②</sup> [苏联]《劳动报》1983年9月4日。

认为,考虑到服务部门是个体劳动这一特点,最合适的办法是租赁制。租赁时间三年左右为好。租赁时,应该采用招标的方法,只租给那些能保证完成服务项目和质量要求的人。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持以下的观点,所有制关系方面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不断地提高公有化的程度,而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所有制关系成熟程度的表现。

应该说,安德罗波夫时期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制理论进行的探索,更接近于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实。

### 三、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完善刺激制度

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安德罗波夫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认为,在苏联,长期存在着随心所欲地、超越客观水平地追求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的倾向。这种平均主义在劳动工资、资金、对落后企业的照顾等方面普遍存在。也就是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没有很好地解决劳动报酬与最终成果挂钩的问题,物质刺激对生产的作用很小。在安德罗波夫提出反对平均主义之后,不少学者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方面提出以下改革方向:首先,要进一步寻找评价劳动者劳动贡献的标准;其次,要采用更灵活的工资等级制度,不应再像过去那样缩小工资差距,特别要扩大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级差;工资不只是一要刺激劳动者的潜在能力,而且要刺激这一潜在能力在具体劳动成果中得到切实的体现;加强工资对最终成果的依赖关系,这不仅指工资的“可变”部分,标准工资和职务工资也只能在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才完全支付。



#### 四、进一步探索民主管理对 完善体制的重要作用

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一再强调只有在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当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从体制改革角度看，这一年多来，苏联在探索民主管理问题时，有以下特点：一是把民主管理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发挥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的客观前提；二是把发展民主管理与发展社会自治联系起来。不少学者强调，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不仅要向广度发展，而且要向深度发展，最后导致质变：把劳动者参加管理变成生产自治。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也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找出现阶段苏联社会与共产主义自治理想的差别，而是要探索不断完善发扬民主，扩大劳动者在生产中、在所有社会实践中主人翁权利及作用的新的方式方法。这正是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sup>①</sup>

#### 五、探索改变工业企业的组织形式

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强调企业的大型化和集中化，把工厂建成职工人数众多、大而全的、包办一切的生产单位。由于苏联工业企业的多专业性，辅助车间众多，人员队伍过于庞大，因而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技术发达的西方国家。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针对上述情况,苏联经济学家Г.库拉金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现行工业企业组织结构中的这一弊病,主张改变现行工业组织中大而全的模式,效法西方国家,向小型专业化工厂方向发展。<sup>①</sup>库拉金的文章发表在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批评苏联经济效益低这一问题之后,因此,受到西方评论界的关注。这也可能说明安德罗波夫在改革经济体制时,要寻找提高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新途径。

## 六、主张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进行探索性改革

勃列日涅夫时期,通过的改革决议数以千计,搞得十分繁琐。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不少学者提出,在探索今后的改革时,必须抓住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Л.阿巴尔金认为,应该集中力量讨论最概括和最有原则意义的问题,不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如用一个指标代替另一个指标、改变鼓励基金的构成方法等)。只有这样,才能确定选择这些或那些指标和经济杠杆的适宜性的可靠标准。他还提出,当前苏联在制定改革的实际计划时,应该注意解决下列相互关联的三项任务:

(一)要制订符合当前条件和党的经济政策的专项方针和经济机制的理论模式或构想;

(二)使具有原则性的理论方针体现在有关的标准文件中;

(三)要使业已制订的措施得到充分的、及时的实现,并在企业

---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82年12月8日。

经营管理的实践中体现出来。<sup>①</sup>

除了上述问题外,这一年多来,苏联学者还在改革部门管理体制、完善发展经济的社会机制和今后改革会遇到哪些阻力等问题上进行了研究。由于时间的限制,在安德罗波夫逝世前,农业改革方向比较明确,而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还处在探索阶段。

### 第三节 推行的改革政策与措施

比亚勒教授在1983年9月的访华报告中指出,安德罗波夫执政后,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采取了以下措施:

“1. 坦率地向苏联人民讲明面临的困难,明确告诉苏联人必须勤俭地生活,使人民降低对未来的要求;2. 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加强纪律,逮捕那些腐化的干部,对那些不上班的工人进行惩罚。当然,安德罗波夫本人对这一点是非常了解的,仅仅用强制的办法是解决不了苏联目前面临的问题的。”<sup>②</sup>

由于在勃列日涅夫逝世时,苏联劳动纪律已十分松弛,旷工、消极怠工现象十分普遍,仅莫斯科州就有73%的职工在上班时去办私事,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据统计,如果把浪费的工时减少一半,就可使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5%—6%,每年工业产值可增加350亿卢布。在大力整顿劳动纪律的初期,收到了一定

---

<sup>①</sup> 陆南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金挥、陆南泉主编:《战后苏联经济》,第六章,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sup>②</sup> 陆南泉:“西方学者评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苏联经济”,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233页。

的效果,如1983年1—2月,工业产值增长5.3%。但这一增长势头单靠抓劳动纪律并没有保持下来,后来又逐步跌落下去。<sup>①</sup>这也再一次说明,根本的问题是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安德罗波夫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对农业和工业企业的改革重点放在扩大自主权方面。

### 一、在农业中着力推行集体承包制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为什么要在农业中着力推行集体承包制?对此,美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亚历山大·诺夫教授在1983年5月访华时,在其所作的讲演时,较多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近20年来,苏联在农业上投资相当大,但效率相当低,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旧俄时,每个农民在抢收时每天劳动达16个小时,而现在只劳动7小时;二是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报酬同生产成果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只要完成定额,不管质量如何,都可以得到报酬和奖励;三是在农业计划中,苏联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生产干涉太多,这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道路、仓库和必要的包装材料。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食品价格偏低影响农业生产、工业对农业缺乏帮助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组织等问题。”<sup>②</sup>

安德罗波夫为了在农业中大力推行集体承包制,首先进行了

<sup>①</sup>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65、114页。

<sup>②</sup> 陆南泉:“西方学者评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苏联经济”,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229页。

大量宣传工作,各级党政领导与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推行集体承包制是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是召开一系列会议,如1983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加强在农庄、农场中推行集体承包制的组织工作问题。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有关指示,同年3月18日—19日,苏联召开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州(边疆区)委书记、农业部长(局长)以及许多农工综合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推广农业集体承包制问题。接着,公布了《关于在种植业组织集体承包单位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为各地实行集体承包制规定了统一的原则与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种植业集体承包单位的建立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按最终成果支付集体劳动报酬,根据个人贡献在承包组织成员之间分配集体工资;承包组织的规模不宜太大,以发挥集体工资的刺激作用;必须保证给承包单位提供技术设备和其他资源;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承包单位,通过选举产生其领导人;承包单位同农庄、农场领导通过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承包单位有解决生产问题的自主权等。文件规定,在种植业中可以建立专业化单位、综合性单位和机械化单位三种类型的集体承包组织。给承包单位规定的产品生产任务应有充分的根据,年度生产任务的计划工作应从编制或修订工艺图表开始,在规定各类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时既要考虑到土地质量,还要考虑到种子质量和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给情况。由承包单位领导人定期登记本单位完成的农活量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情况,每月填写工作时间登记表,作为计算每月预付数额的根据。文件详细规定了计算劳动报酬和进行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包括产品工资单价的计算、计时预付款项的确定、按产品计算报酬和发放奖金等。承包组织在年终分配集体工资时可以采用劳动参与系数。在确定劳动参与系数时,把“我”作为基础

系数,每个工作人员的实际劳动参与系数按其劳动情况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基础系数。《建议书》具体罗列了提高或降低劳动参与系数的各种因素和相应的数额。该文件还明确规定:因发生自然灾害而引起单产急剧下降、庄稼枯死的情况下,可按照承包组织种植农作物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承包组织成员支付全数工资。<sup>①</sup>

据一些材料分析,在种植业推行集体承包的小组,其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要高20%—30%,其他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投资回收率等,也体现了优越性。但农业集体承包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地方流于形式,集体承包制本身很不完善。因此,在推行高潮的1983年,在种植业中实行集体承包制的单位占30%左右。这些承包单位中大约有1/3的组织缺乏承包的必要基础,随时都可能解散。我们上面提到的诺夫教授的访华报告,对苏联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是:

1. 由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规模很大,这给各组、各小组如何完成合同计划、各小组种植哪些作物等造成很多困难;

2. “按劳分配”是分配劳动报酬的原则,但是由于各个小组的工作量不同,劳动强度不一样,因此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比较合理,这是一个难题,地方政权一时难以解决;

3. 农庄、农场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过去,一切遵照由上级下达的指令执行,而现在,对下,要对每一个庄员、农场职工负责,对上,要对区级领导和更高一级领导负责;

4. 成立包工小组后,物资技术供应问题如何解决,也就是说,农用机器设备、化肥等如何供应、由谁供应等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

<sup>①</sup>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166页。

问题。<sup>①</sup>

## 二、在工业中实行一些扩权措施

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在这方面的主要举措有:

首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决定从1984年1月1日起在重型与运输机器制造部、电机工业部、乌克兰共和国食品工业部、白俄罗斯共和国轻工业部、立陶宛共和国地方工业部五个部,进行扩大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在计划工作和经营活动方面的权限、加强它们对工作成果的责任的试点。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的主要内容有:(1)使企业在计划工作的所有阶段上发挥积极性,为此,缩减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数目,使企业在制订计划方面有更大的权力;(2)用经济定额的办法来协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企业在权责利三个方面统一起来。这种经济定额五年不变,这有利于调动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的积极性;(3)在考核企业成绩和对企业及其领导人的奖惩办法方面,也作了一些修改。对试点的五个部的企业,在考核企业的指标方面,强调了技术发展基本任务的完成情况,其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朝集约化方面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试点条例规定,如这次指标未完成,企业领导人的奖金至少要减少25%。另外,把完成合同供货计划这一指标的作用提高了,规定在全面完成合同供货的情况下,把物质鼓励基金从原来的10%提高到15%;如果未完成这一指标,则每少完成1%的任务,就减少3%的物质鼓励基金。而企业领导人只有完成这一指标时才能

<sup>①</sup> 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230页。

获得奖金。除此以外,在试点中还有其他一些内容,这里不一一叙述。

总的来说,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改革理论上比勃列日涅夫时期要活跃,但也并没有大的突破,如对“市场社会主义”虽不再批判,但官方也不提市场调节问题,有些领导仍然肯定地说,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产生市场经济问题。从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来看,大部分与柯西金、勃列日涅夫在60年代中期提出的改革思路雷同,有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被放弃的改革办法又被重新拣了起来。因此,仍然是对传统体制的修改。正如有些评论文章指出的:“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朝着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这仅仅是为现行政治体制所能接受的极为小心翼翼的一步”。“这是一次有限的经济措施。”<sup>①</sup>安德罗波夫时期的改革之所以仍然是保守性的,除了受到“左”的理论的束缚、他本人是斯大林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和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力抵制这些带有普遍性的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首先,安德罗波夫总共执政14个月,假如扣除病重时间,则还不到半年。他上台担任总书记为时已晚,“是在‘受尽煎熬’之后才成为政治领袖的,长期笼罩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风尚使他走上领袖岗位之际已经精疲力竭,疲惫不堪。”<sup>②</sup>其次,正如我们一开头指出的,他个性的弱点是优柔寡断,过于审慎。第三,安德罗波夫上台时,最迫切的是要解决经济问题,在这一领域进行重大改革,但他不懂经济,对经济不感兴趣。在70年代下半期,就有人建议他费些力气充实经济知识,以便在政治局

---

① [南斯拉夫]《政治报》1983年7月27日。

②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86页。



讨论经济问题时更好地把握方向，“还建议请专家为其选一些有关读物；但这些都拒绝了”。<sup>①</sup> 博尔金回忆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一开始搞的整顿纪律、处理贪污受贿大案和把一些重要领导人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等，的确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一股热潮。但这股热情没有坚持长久，主要是因为没有触及造成经济停滞的内在因素。博尔金引用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安德罗波夫“既不懂生产，也不懂金融，而且不大熟悉经济问题。但一切又都取决于经济问题”。<sup>②</sup>

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83年工业产值出现了回升，增长率为4.2%，工业收入增长了3.1%，均好于1982年，但总体而言，改革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特别是体制改革，进展十分有限。在他逝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尽管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安德罗波夫走上岗位后，国家开始觉醒，开始从停滞年代的政治休眠状态中走了出来”。<sup>③</sup>

#### 第四节 处于濒死状态与白白浪费 时间的契尔年科时期

在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由契尔年科接任总书

---

①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74、355—356页。

② [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45—46页。

③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87页。

记问题一度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到了2月11日,在指定契尔年科为安德罗波夫治丧委员会主席时,这一问题才明朗化。2月13日,在苏共中央召开的非常全会上,通过了由吉洪诺夫推荐契尔年科为党的总书记的建议。

契尔年科怎么成为苏联新领袖的?他的上台说明了什么?对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来说,对研究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衰亡原因来说,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一个侧面向人们提供不少启示。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立即面临着谁是总书记候选人这个尖锐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让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担任,还是让老态龙钟的契尔年科担任。苏联最后推荐契尔年科任新的总书记。苏联为何做出这样的抉择?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各种说法。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党内强烈希望把权力移交给更年轻一代的人,即希望戈尔巴乔夫上台的人,亦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内,经过激烈争论,与老一代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次妥协性的默契:再由老一代人任最高领导,作一次过渡。但同时也提出了条件:一是今后不能把安德罗波夫视为苏联历史上不存在的人;二是不能任意给勃列日涅夫恢复名誉。这两条,在1984年2月13日契尔年科当选为总书记的讲话中得到了体现。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今后毫无保留地执行安德罗波夫的路线,而在讲话中连勃列日涅夫的名字都未提到。另外,这种妥协明显反映在有关这次中央全会的新闻报道中。按惯例,全会应由新选出的总书记契尔年科致闭幕词,但实际上,却由戈尔巴乔夫作了闭幕讲话。他在讲话中说:“统一和团结的精神是这次中央全会的特征。”从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来看,送葬的队伍是由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共同率领的。这些做法,都说明在新老领导人之间达成妥协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已成

为苏联党的第二号人物。博尔金的回忆录也说明了这一点。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在政治局权力极大的乌斯基诺夫在表示拥护契尔年科任总书记的同时,亦附带谈了另一个问题,即让戈尔巴乔夫起二把手的作用。但明确戈尔巴乔夫为第二书记的问题进展缓慢,契尔年科一直是含含糊糊地承认戈尔巴乔夫为第二把手,政治局也没有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因此,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戈尔巴乔夫未能坐在契尔年科的右侧,而还是坐在老位置上。这个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至乌斯基诺夫忍不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坐到新位置上。契尔年科好像突然醒悟过来,也跟着批准了这件事。<sup>①</sup>

之所以形成上述妥协的局面,简单地说,是由于在中央领导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怕年轻的、积极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可能会使他们失去既得的权力、地位和利益。再说,这些人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至今还心有余悸。另外,还应看到,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由于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及反贪污腐化运动,已撤换了一些领导人的职务,连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的一些好友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契尔年科就成了容易接受的人选。

实践证明,病魔缠身、长期担任勃列日涅夫总管家角色的契尔年科,在自己执政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无所事事。定于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的筹备工作,不是由任总书记的契尔年科负责,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负责的。难怪《真理报》主编B.阿法纳西耶夫在1984年10月9日对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说:戈

---

<sup>①</sup> [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54—55页。

尔巴乔夫实际上是苏共党的第二位总书记。<sup>①</sup>

契尔年科执政的一年,被称为浪费时光的一年。对苏联人民来说,他成了一个负担。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逝世的消息播出后,苏联人民的反应是既不悲痛,又不惊讶,而是无动于衷。人们似乎在说:死就死了吧!一些大学生把契尔年科的死和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而喊“乌拉”。3月13日为契尔年科举行了葬礼。在葬礼上,只有他的遗孀安娜表现得十分悲痛,而其他政治局委员们却显得漠不关心,在交头接耳、无拘无束地谈论着什么。当棺木入土时,一向总是板着面孔的葛罗米柯露出一丝微笑,似乎在说:总算卸了一个包袱。虽然苏联所有报纸都将报道契尔年科逝世的消息放在头版,但镶着黑边的死者的照片却被放在第二版;第一版刊登的是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照片和简单的传记。这与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和1984年安德罗波夫逝世时的报道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反映了契尔年科的历史地位。1986年,笔者见到一些苏联朋友。谈起契尔年科执政这段历史时,他们的表情是懊丧的:两手一摊,耸耸肩膀说,这段历史我们苏联人早就忘了,不值得再提了。但是,研究苏联问题特别是研究苏联政治体制的人,并没有忘记这段历史。普通的苏联人也没有忘记。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1984年要任命“已患有严重的疾病,而且不得人心”的契尔年科任党的总书记?这位代表说,为了防止个人崇拜,为了防止斯大林式的统治的复活,必须揭发使契尔年科上台的“根源”。

<sup>①</sup> [联邦德国]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尔著、中国北斗星翻译中心译:《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实际上,寻觅这个“根源”并不难,可以从斯大林时期留下的、后来被勃列日涅夫等人继承下来并日趋“成熟化”的政治体制中找到答案。具体地说,契尔年科上台的根源在于:

第一,它是苏联的领导体制特别是最高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的必然产物。就是说,苏联的政治制度不可能保证领导干部的正常更迭,而一般只能通过两种办法:一是宫廷政变,如赫鲁晓夫的下台和勃列日涅夫的上台;二是尽管最高领导因病已不能甚至完全不能工作(如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执政后期),但只能等到这些人去世后才能更换新领导。这些领导人最后时期的形象“更明确无误地表明,由斯大林现象在我国所培育起来的整个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是何等颓萎不济。这样说并非出自评论者的政治口味,而是因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机制根本没有力量能使社会摆脱诸如领导人患病不起、完全丧失领导国家的能力、对正常治理社会束手无策等不愉快的现象”。<sup>①</sup>契尔年科上台“再次暴露出我国形成的政治机制以及整个斯大林极权主义遗产已可谓黔驴技穷”。<sup>②</sup>

第二,在决定最高领导干部的具体人选时,有两个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在政治局中谁的权力和影响力最大;二是是否会影响到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在契尔年科执政时期,乌斯基诺夫在政治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下属具有说一不二甚至蛮横无礼的大多数“斯大林部长”的特性,连本人性格刚强的葛罗米柯在他面前也几乎总是怯生生的。当时政治局其他成员也是如此,因此,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47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88页。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谁是继承人，乌斯基诺夫有最后的发言权，他扮演导演的角色。现在进一步要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乌斯基诺夫等人在明明知道契尔年科已病人膏肓和安德罗波夫病重时向政治局的交待即把政治局与书记处的领导工作交付给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下，仍提名由契尔年科任苏共总书记？

据说，时任苏联卫生部“第四局”局长、负责领导人治病工作的恰佐夫在从红场契尔年科葬礼结束后回来的路上，曾向阿尔巴托夫发誓说，他一年前就曾给政治局委员们发出警告，契尔年科病人膏肓，已丧失工作能力，将不久于人世，因而不能让他担任领袖之职。时任安德罗波夫助理的 A. H. 沃尔斯基在《星期》周刊（1990 年第 30 期第 7 页）访谈录中曾有一段描述，内容如下：安德罗波夫去世前不久，在其分发给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中曾有下面一段话：“同志们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你们知道的原因，我不能在此时时刻刻积极参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我认为有必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这可能是持续已久的时期的最后时刻。有鉴于此，我想请求中央全会审议此事并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工作交付给戈尔巴乔夫同志。”这实际上就是他就继任人选所作的建议。然而根据沃尔斯基的说法，这一段话被契尔年科、吉洪诺夫、乌斯基诺夫三人集团从分发给中央委员的备忘录中删除了。据沃尔斯基说，这一行径使安德罗波夫十分生气。又据 A. H. 沃尔斯基 1990 年 7 月 4 日在答《文学报》记者问时说：“记得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一天政治局开会，乌斯基诺夫和吉洪诺夫在我们面前往大厅走去。国防部长把手放在总理的肩膀上说：‘柯斯嘉（契尔年科）要比此人来得随和……’”“此人”指的就是戈

尔巴乔夫。一个伟大强国的领袖问题就这样决定了。<sup>①</sup>

在乌斯季诺夫提名契尔年科任总书记这个问题上，不能排除下面这个非常自私的动机：他考虑到自己也是个年老多病的人（他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半年之后也去世），害怕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他感到与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共事会更舒服一些。其他一些领导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第三，与第二个因素相关，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最高领导集团的权利是高于国家利益的。从这个角度去看，契尔年科这个体弱多病、言语迟钝、呼吸困难的人之所以会成为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和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一是在权与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制度下，苏联领导人很难主动放弃领导职位。博尔金自问自答道：“我常想，一个人难道在死神就要降临时也不能节制自己的野心，不能为国家和宁静的繁荣放弃力不从心的担心吗？”“一个72岁高龄、体弱多病的老人竟决定迈出这么不明智的一步，他成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政党的领袖，成为这个大国危难之时的领袖，用正常心理是无法理解这种决定的。对于契尔年科同意当总书记的这个举动只能理解为缺乏现实感，有太强烈的、甚至在垂暮之年还这么强烈的权力欲望。”二是，正如前面已提及的，契尔年科的上台，也反映了苏联最高领导层不希望由于发生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妨碍传统方针政策的推行。事实也证明，契尔年科开始当总书记和不久后又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时，他也想有所作为，但他很快又回到老路上：“契尔年科惟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充当勃列日涅夫的影子，落实中央、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各部和主管部门提出的

---

① 参见〔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87—388页。

决议。契尔年科尽管职位升高了，但仍然只是他人建议的执行者和传达者，他根本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即使在年轻时他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sup>①</sup>

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这样，从1982年11月到1985年3月，在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三个苏联最高领导病亡。这严重地伤害了苏联人民的感情，极大地损害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在1985年3月初，即在契尔年科逝世前几天，苏联电视台两次播出气息奄奄、行将就木的契尔年科在别人搀扶下踉踉跄跄来到电视摄像机前面的情景，这不仅使苏联人感到厌恶，而且还向全世界宣告：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到了可称之为“极度萧条衰退的时期”。<sup>②</sup>

契尔年科执政的这个短短的过渡期，白白浪费了13个月。但这13个月使苏联人民大众得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一是苏联不能再有一个契尔年科，不能再容忍一个思想、智力、水平如此低下和年老多病的人上台执政了；二是使人们更加懂得，苏联是多么需要改革，而且是根本性的改革。

---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第50—52页。

<sup>②</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391页。





##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的动荡与解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苏联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进,在向前迈进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确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不仅未能使苏联克服各种困难,消除阻碍因素,走向振兴和繁荣,反而使苏联陷入了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引发了关于社会发展方向的大争论,导致了党内外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正是失当的改革战略和混乱的改革措施,使苏联社会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激化起来。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错误的改革路线进一步发展,引起全社会的动荡,使国家陷入无序和失控状态,最终导致国家制度的剧变和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解体,苏联最终“亡”了。

应该看到,苏联人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历了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年代和1982年至1985年三年多时间中三位年迈体弱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的国丧期后,非常希望出现一位年富力强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希望改变勃列日涅夫后期出现的苏联国家与社会死气沉沉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后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是众望所归。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

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并由此开始了称之为改革<sup>①</sup>的进程。戈尔巴乔夫上任时提出的改革口号和他上台伊始就到全国各地巡视和会见群众时所展现的旺盛精力,一时间受到了苏联全国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是,这位在苏维埃体制中培育出来的、并在苏共1985年3月中央全会上受到葛罗米柯与其他苏共中央委员高度赞扬<sup>②</sup>的党和国家接班人,在六年时间中非但未能实现苏联人民对他的期望,却在他发动的改革过程中导致苏联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大致说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苏联开始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第二阶段为1988年6月至1990年初,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社会出现混乱和动荡;第三阶段为1990年初至1991年“8·19事件”发生前,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接受了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多党并存的现实,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苏共由党内意见分歧发展为组织上的分裂,激进民主派开始左右苏联政局;第四阶段为1991年“8·19事件”后至同年年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彻底失败,其标志就是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对戈尔巴乔夫六年改革时期苏联的历史发展过程,亦即苏联“亡”的过程,我们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① 俄语称“перестройка”,含有重建与改建之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已不用此词,而改用了“реформа”这个词。

② 葛罗米柯在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上称戈尔巴乔夫具备当选总书记的“必需的和足够的”品质,“有丰富的党的工作经验”,“思路深邃和敏捷”,“原则性强和有信念”,“有擅长分析的头脑”,是“一位在国家如此关键的时刻对担任这一职务当之无愧的人选”。见[俄罗斯]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页。

---

从错综复杂的客观事实出发,努力把它梳理清楚并探讨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 第二十二章 不成功的改革起步： 初期经济改革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始的，其失败也是从经济改革的失败开始。在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了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开始一两年后，并未看到成效，遇到了一些阻力，按苏联领导人的话说，改革陷入了“空转”。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陷入“空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政治领域官僚阶层的阻力，即后来人们所说的阻碍机制。为此，从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起，将改革的重心移向了政治领域，力图以此来消除改革的阻力，结果诱发了党内外严重的政治斗争。此后，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日益成为政治斗争的附属物而被忽视，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 第一节 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 经济体制构想的提出

从苏联历史上看，苏联每一任国家领导人上台之初照例要提出一些远大的目标、有别于其前任的“鲜明理论”和超越现实发展状况的“宏伟计划”，具有“新思想”的戈尔巴乔夫这新一代苏联领导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固定套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之初，在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就提出了“加速苏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即著名的“加速战略”。随后，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一经济社会战略加以确认：“代表大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制订的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实施这一构想的实际步骤。党的战略方针是：向有极高组织程度和效益的经济过渡，这种经济应有全面发达的生产力、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理顺的经济机制。”<sup>①</sup>同时确定了实现“加速战略”的两个基本途径：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在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任务。

“加速战略”提出的指标规定，从1986年到2000年的15年中，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是：

在经济发展方面，在生产潜力翻一番（按苏联拥有的生产性固定基金结算，将由1985年的1.57万亿卢布增长到3.14万亿卢布）和对生产潜力进行质的改造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增加近一倍，即由1985年的5670亿卢布增加到约11340亿卢布，年均增长4.7%；工业产值增长一倍，由1985年的8070亿卢布增加到16140亿卢布；劳动生产率增长1.3—1.5倍，年均增长5%—6.3%；国民收入的能源消耗量降低40%，金属消耗量降低近50%，等等。

在社会发展和提高居民社会福利方面，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应增加一倍，年平均增长3.5%；非食品消费品至少增加80%—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90%，居民生活服务额增加 1.1—1.3 倍，手工劳动的比重减少一半以上，使两千多万人从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基本保证每个家庭有单独的一套住房。此外，还规定要从根本上改进教育和培训制度以及医疗服务，大力扩大和加强文化、体育、休息设施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等等。

“加速战略”是苏共新领导鉴于苏联经济增长率从 70 年代开始逐年下降，到 80 年代初已濒临危机的边缘，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苏联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愈来愈处于劣势而提出的加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构想。他们试图依靠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和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苏联经济向生产集约化、高质量和高效益的急剧转变，“实现向生产力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成熟的、经济机制理顺的高组织形式和高效益的经济过渡”。<sup>①</sup>

在提出“加速战略”的同时，鉴于对过去苏联历次经济改革的修补性质、成效不大的认识，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在当前苏联的形势下，对现行经济体制不能局限于局部调整，而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改革。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改革的大致方向：

——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加强中央在实现党的经济战略的基本目标方面，在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比例、国民经济的平衡方面的作用。同时结束中央干预下级经济部门业务活动的做法；

---

<sup>①</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 34 页。

——坚决扩大联合公司和企业的独立自主性的范围，提高联合公司和企业对取得最大的最终成果所负的责任。为此，要使它们转向真正的经济核算、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使各集体的收入水平直接取决于工作效率；

——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为此要改变物质技术供应工作，完善价格形成、拨款与信贷制度，制定有效的反浪费办法；

——使管理工作具有现代化组织结构，并考虑到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与协作化趋势。这指的是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跨部门科学技术中心、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公司、地区—生产联合公司；

——保证将部门的经济管理同地区的经济管理合理地结合起来，使各共和国和地区得到综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安排合理的跨部门的联系；

——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sup>①</sup>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对“加速战略”的内容作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六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苏联经济体制的方针、原则和具体方案，通过了《企业法》草案，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通过。这些文件集中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此时，苏共把“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作为改革经济体制的目

---

<sup>①</sup> 参见[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45—46页。



的和内容,以企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发点;

第一,把经济的增长目标从中间成果改为最终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成果,改为满足社会的需求;

第二,把社会、集体和每个工作人员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发展人,使苏联人的福利达到崭新水平;

第三,把科技进步变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四,保证平衡,克服妨碍有效经营和生产集约化的物质资源和消费资源短缺的现象;

第五,使用货单位在经济关系中具有优先地位,赋予它进行经济选择的权利和可能性;

第六,建立使国民经济、首先是使其基层环节——企业(联合公司)发挥职能的可靠的、有效的反消耗机制。

苏联过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两次不成功的改革,一次是以1957年实行工业、建筑业大改组为主要内容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另一次是以1965年开始推行“新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等苏联新领导人认为这两次改革都是修修补补的、不彻底的,所以不能解决苏联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只能半途而废。他们强调苏联再也不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搞修修补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和加速经济发展,“别的道路是没有的”。<sup>①</sup>他们制订“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构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当时他们显得很有决心和信心。

---

<sup>①</sup> 参见[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45—46页。

## 第二节 经济改革的实施

显而易见，提出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任务绝非易事，而执行、落实既定的发展战略和改革任务则更加困难。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一两年里，苏联的经济改革是围绕着扩大企业权限和调整国家与企业关系等问题展开的。这场改革运动的声势很大，但具体落实到企业和基层，困难和问题便出现了。

在开展经济改革运动之前，苏共领导人先于1985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酗酒运动。酗酒现象本来是苏联社会的一个痼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方面由于老百姓爱好喝酒的传统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还由于越来越多的居民靠酗酒来渲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再是由于苏联政府靠能源的出口和酒类产品的高税收来弥补财政上的窟窿，所以苏联的酗酒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70年代开始，苏联的酒精饮料的消耗量增长了一倍，导致人民平均寿命的下降、婴儿死亡率上升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在70年代曾多次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必须加以解决，但都无结果。苏联新领导上台之初，政治局又讨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这个问题不仅是当前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也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关系到人民未来的遗传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了。<sup>①</sup>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在对社会经济改革缺乏全局考虑的情况下，也为了显示他们不同于过去的领

---

<sup>①</sup> [俄罗斯]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39页。

导,并具有清除社会不良现象的决心,戈尔巴乔夫等苏共新领导就急躁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了这场反酗酒运动。

1985年5月16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分别发布制止酗酒现象的决议和命令,并将此视为改革的组成部分。苏共新领导以行政命令方式,采取一系列非常严厉的措施制止酗酒现象。开始时,酗酒现象确曾一度受到遏制。与1985年相比,1986年的酒精饮料的消耗量减少了近一半,由酗酒引起的犯罪减少了26%。然而,新一代苏联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迷信及过分依赖行政命令的做法却在反酗酒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显露。在反酗酒运动中,不仅烈性酒的生产和销售遭严格禁止,而且也涉及到葡萄酒和啤酒等酒类的生产和销售,因而对葡萄种植业和葡萄加工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在1985年—1988年的3年时间里,全国葡萄种植面积几乎减少了1/3,其减少程度连卫国战争期间都不曾有。”<sup>①</sup>由于严格控制了酒类生产,国营商店酒类销售量大幅度减少,却极大地刺激了各种“地下的”、“非法的”酿酒和酒类销售活动。国家损失了大笔财政收入,同时出现了靠私自酿酒和贩酒发财致富的人。从1987年底开始,政府不得不对禁酒令放宽规定。1988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发出指示,要求摸清全国的酒类实际需求,为其生产提供保障。“至此,为期3年的‘禁酒运动’宣告结束,它和美国30年代的禁酒法一样,已成为历史。”<sup>②</sup>反酗酒运动事实上的失败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投下了阴影,它不仅造成国家财政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共领

---

① [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著、王肇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领导人领导经济改革和经济工作的威信。

如上所述，苏联于1987年通过了两个有关经济改革的重要文件，即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的决议和同年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根据苏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从1988年起，占工业总产值2/3的企业和联合公司应实行《苏联国营企业法》，按照新的原则进行工作；1989年，全部企业都应完成向新的经营条件的过渡；到1990年，将同时实现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计划工作、价格形成、财政信贷、物资供应。然而，由于传统的利益格局难以打破，特别是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盘根错节，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各级经济管理机关和干部久已形成的工作方法和思维观念更是难以迅速发生变化，这一切都使改革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苏共领导人制定的经济改革时间表实际上很快便落空了。

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时间不长，便出现了变形和“空转”。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1988年，正式实行国家订货制度。苏共领导原以为实行订货制度就可改变过去由政府部门给企业下达生产指标的传统办法。可是，在计划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不少部和主管机关在实行这一制度时往往可以用超出国家规定的订货比例下达订货任务，订货额可高达企业生产能力的80%—90%，使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变成空话。在实施新的劳动报酬形式方面，由于在扩大企业的工资形式和收入分配自主权的同时，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导致职工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从而扩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而在此时，在企业中又开始采用企业领导的民主选举制度，企业领导人常以提高工人劳动报酬的方法去争取获得工人的选票，这也进一步促进了职工收入的增长。

结果,1989年,工业部门的产品生产只增长1.7%,而劳动报酬却增长了7.5%;1990年,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5%,而职工劳动报酬基金却增长了8%。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状况,消费品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

苏共新领导开始改革后,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对经济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但是最初几年的经济改革未能使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发生多大的改变,也未能阻止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的趋势,苏联经济改革的起步实际上陷于失败。

### 第三节 经济改革起步失败的原因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以及经济改革起步失败,是促使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后来将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因。他们在评价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时,不是从他们制定的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推行改革的方法上去找问题、查原因,而是片而地夸大改革的阻力,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责怪他们缺乏主动精神。戈尔巴乔夫等人就把问题主要归咎于“旧的”“管理机构的官僚阶层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力量”的抵制。要看到,由于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造就出了一支掌握着管理机关的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经济体制改革持观望、怀疑甚至抵制态度。这种改革的“阻碍机制”的确存在,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它不可能在一时间取得所有人的支持,改革本来就是要化阻力为动力,通过权利和利益的调整来达到改革的目的,这是其一。其二,在1988年苏联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绝大多数人,包括所谓官僚阶层中的一些人还是支持改革

的。当时，苏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还是很强大的。“苏共在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是决定一切的。”<sup>①</sup>由此可见，政治因素确实是影响经济改革的原因之一，但并不能因此而将经济改革起步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政治因素。

经济改革起步的不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领导者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是不能忽视的。

首先，苏共领导人在对经济改革的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失误。他们提出的加速战略并没有跳出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的框框，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打转。第一，他们提出的加速战略缺乏市场经济的取向，他们对市场取向的认识是很迟缓的，后来接受市场经济的取向也是很被动的。第二，他们对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加速战略的实施非但没有缓解苏联长期存在的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痼疾，反而更加深了这个矛盾。无论是1985年提出的“加速战略”，还是1987年制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很大程度上着重强调的是发展速度和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缓解紧张的市场、满足人民的需要。特别是，农业改革严重滞后，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其结果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未能有所改观，人民不可能从改革中得到实惠。这自然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其次，苏共领导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导致他们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针过于“超前”、乐观。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虽有体会，对经济体制进

---

<sup>①</sup> [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著、王肇等译，《大动荡的十年》，第115页。

行“根本的改革”也有决心，然而他们对问题的认识仍然继承了苏共历届领导人所固有的那种思维定式，对经济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重犯了不从实际出发、单凭主观愿望来搞改革和搞经济工作的老毛病。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中，仍然是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因而使得经济问题逐渐带有政治色彩，政治开始影响和冲击经济。

早在经济改革实施之初，苏共党内特别是领导层中便出现了不同意见。其实，这也十分自然。一些从事具体经济领导工作的人从经济现实出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受到原有体制的影响，主张对经济体制进行渐进的改革，而大部分不是从事具体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则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急躁冒进，主张通过激进的改革迅速改变现状。这种政策选择上的不同意见和分歧原本十分自然，然而，由于苏共主要领导人急于求成、好大喜功，把一切希望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的意见视为不支持甚至反对改革，致使在选择具体经济改革政策时开始出现偏差。1987年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1988年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计划草案时，在推进改革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就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和对立。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等人主张采取谨慎、渐进的改革策略，而不是从事经济工作的亚·雅科夫列夫等人则要求加速经济改革的速度，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认为部长会议提出的草案是保守的，是对改革的阻碍。戈尔巴乔夫也对计划草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政府的计划草案最终被推翻。在这场争论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出现分裂。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激进”倾向，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冒进倾向，开始在苏共领导核心中占了上风。此后，苏联在尚无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在1988年就对处于高度垄断地位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大大减少国家订货，致使这些企业得以靠提高合同价格获取大量利润，并

用以迅速提高职工的货币收入。结果，1988年，苏联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了400亿卢布，比80年代前七年的平均收入增长约2.5倍，大大超过了商品增长的速度，从而造成国家财政状况和消费品市场供应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带来消极的社会影响。

再次，在一些具体政策实施方面，缺乏深思熟虑，仍然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推行并不都符合实际的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从而使改革和改革的领导者丧失威信。

在这方面，反酗酒运动是最典型的例证。以行政命令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显然是难以成功的。反酗酒运动不仅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而且影响了政府的威信和国家政策的严肃性。在其他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这说明苏共领导人实际上远未改变传统的观念，他们还在以“旧的”领导方式工作，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手段搞改革，抓经济工作。

改革的困难和危险之一，就在于改革的领导者“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要想取胜，他的确要进行一场具有多条战线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参加者五花八门，一条战线上的敌人可能是另一条战线上的盟友”。<sup>①</sup>显然，在经济改革出现问题、遇到困难时，苏共领导集团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改革的领导者应当认真、客观地总结经验、教训，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调动改革的盟友和一切积极力量。应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改革起步的失败主要还是政策选择和具体政策实施不力造成的。然而，苏共领导人对此却做出

---

<sup>①</sup> [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6—317页。



了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解释,片面地夸大政治因素的作用,不能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未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缺乏做细致的经济工作、认真落实既定改革政策的耐心。此后,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政治问题便越来越居突出位置。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苏共领导人始终以是否支持自己所理解的改革划线,把在总体上支持改革、但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人统统推到“阻碍”改革的力量一边去,给经济改革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将改革转入政治领域,使改革偏离了主战场——经济领域。

## 第二十三章 公开性和民主化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以“完善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极力倡导实行“公开性”、“民主化”。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以往几次改革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打破长期以来苏联社会死气沉沉的局面,动员群众投身改革,必须改变过去苏共领导人高层领导决策和工作、生活情况都对群众保密的状况,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他把公开性和民主化看做是推进改革的必要条件。戈尔巴乔夫大力号召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这在改革起步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然而,由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公开性和民主化在认识上和实际运作上存在片面性和盲目性,未能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而且操之过急,因而他们实施公开性和民主化的结果是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上造成了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和混乱,使苏联社会陷入算历史旧账和对历史问题与改革方向问题的大争论,最终落到了使苏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丧失威信的局面。

###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认识

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还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他就曾

详细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sup>①</sup>。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他再次专门论述公开性问题,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同时强调:“共产党人时时处处都要讲真话”,“我们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sup>②</sup> 针对过去苏共领导在工作和决策中长期缺乏透明度,导致广大群众对政治和中央领导的疏远和冷漠的状况,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主张改变领导作风,提倡公开性,增加高层领导工作的透明度,从原则上说这是无可非议的,当时这也确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上台后就到各地视察,到群众中去发表即席讲话,宣讲苏共的改革政策。他这种不同于过去苏共领导人的做法在群众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时间,“公开性”和“改革”两个词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和作风的标志词。

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认识上和实施上却从过去苏共领导不讲公开性和缺乏民主这个极端,很快就走向了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性和片面夸大民主作用的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过去曾认为,苏联的一些革新创举之所以都半途而废、不见

---

① “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米·谢·戈尔巴乔夫 1984 年 12 月 10 日在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的报告,载《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3 页。

②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 80、81 页。

实效,主要是因为干部的疲塌马虎和能力低下,由于某些管理环节中的缺陷和立法上的不完善。<sup>①</sup>他上台后,苏联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更新,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后,许多老干部都在差额选举中落选了。但是他后来觉得“新上来的干部依然背着过去的包袱,除少数人外,多数人在工作中仍然使用旧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sup>②</sup>他说他曾“幻想”等待这批新干部在心理上出现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没有出现。于是他得出结论:问题出在旧的行政命令体制和官僚权势制度上,必须实行社会的民主化,让人民参加政治,调动社会舆论,对权势阶层施加巨大的压力,才能推动改革。1987年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原定以讨论干部工作问题为主题,但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思想认识的转变,全会的主题变成了讨论民主化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化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对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及其干部的工作进行监督的问题。”“不受批评和监督的某种‘禁区’正在变成过去”,“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sup>③</sup>

这之后,苏共领导人反复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认为“民主,这是新鲜的清洁空气,社会主义社会的机体只有在这种空气中才能朝气蓬勃地生活。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强大潜力在

---

<sup>①</sup> 参见[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俄文版,第1卷,第143页。

<sup>②</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368页。

<sup>③</sup> “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我们这儿还没有充分利用,那指的就是,不进一步发扬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的社会主义民主,加速社会的发展便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sup>①</sup>“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sup>②</sup>“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sup>③</sup>此时,戈尔巴乔夫已认为,只有靠民主化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的所有问题。他强调“民主是内容充实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法制是概无例外的法制,大小事情都要有公开性”。<sup>④</sup>他不清楚在苏联缺乏民主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政治与法律文化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的民主化也需要有个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实际上他就是陷入了民主化“万能论”的思想。后来他匆忙地把政治改革提到首位,就是这一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

## 第二节 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实施

公开性和民主化在苏联的实施,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社会上广大群众要求澄清苏联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这涉及到对历史遗产的清理和反思。

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73页。

② “关于党的根本改革和经济管理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6月26日。

③ “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④ 同上。

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导致官僚主义、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泛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改革之初,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共领导人注意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为一些历史上被错杀、错判的苏共领导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名誉和党籍。这无可非议。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有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增强党的威信,推动改革。

然而,在揭露阻碍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包括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本应通过这些事实教育、团结人民群众向前看,克服困难、开拓进取。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这种一味放开的做法,事实上分散了社会注意力,也就难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最主要的改革问题上。

苏共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党内斗争,致使大批党、政、军、社会团体的干部以及知识界人士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些错误使苏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联社会主义蒙受耻辱。又由于过去苏共领导进行的是简单化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理论宣传,并在思想领域中采取高压手段,这导致在苏共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口是心非的双重思想,即口头上同苏共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但心中并不如此认识。对此,苏共新领导应有清醒的认识,应注意引导,化解思想上的矛盾和分歧,把党内对党的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不同看法的人和社会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引向积极的方向,使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投身到改革事业中去。而简单地提倡在历史问题上不留“空白点”、不设“禁区”的做法,看起来很彻底、很客观,但其后果

必然是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去。作为执政党，苏共当然要对这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不进一步损害苏共的形象，使苏共处在受审的位置上。原本是想通过纠正以往错误，克服党自身的缺点，动员人民投身改革的良好愿望，由于对民主化的认识上的片面性，措施不当，超出了限度，反面变成了授人以柄、号召人们攻击苏共自己的大败笔，为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提供了活跃和发展的空间。由此，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作为“被告”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很难驾驭、控制这一思想运动。显而易见，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输家自然是苏共，而得益者当然是不同意或反对苏共的方针政策的势力。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这种倾向不仅未能保持警惕，进而加以抵制和批评，反而袖手旁观，任其发展，甚至有时还无意地起推动作用。这势必搞乱人们的思想，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为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直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溃败和联盟国家的解体埋下伏笔。

同样重要的是，公开性、民主化直接涉及改革本身，涉及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具体改革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国家和社会面临重大转折时期，在诸如如何对原有国家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进行改革，改革的切入点，改革应采取的具体步骤、措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观点、看法和意见。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展开，活跃了就这些问题的讨论、争论和思想交锋。同时，由于苏共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导致各种社会思潮泛起，苏共本身和整个社会陷入“政治热”。表面上看，几乎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了，“街头政治辩论”遍及全国，各种政论充斥报刊广

播,而实际上无休止的辩论、坐而论道、各种政治主张纠缠不清,使国家和社会逐渐丧失了改革的时机,越来越偏离改革的轨道。

公开性、民主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在社会上形成了某种“轰动效应”。然而,其实际效果却不明显:国家决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少数人,特别是总书记一人,还远远谈不上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利用各种“直接民主”形式吸引劳动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这种本身就带有空想成分的“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形式上;人民群众与政权疏远的现象并未有所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公开性、民主化打开了禁锢已久的思想阀门,面对各种思潮却缺乏适当的法律控制,对群众中的各种情绪缺乏引导,从而使各种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大肆泛滥,为苏共反对派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准备。

### 第三节 公开性和民主化方针引起的分歧和混乱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理论上都看似完美无瑕,既“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sup>①</sup>,又“深得人心”的公开性、民主化,为什么会得出相反的结果呢?

应该说,公开性、民主化本身并没有错,苏共领导人的许多论述也并非全无道理,就是对改革的阻碍机制的分析也是有一定根据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认识过于片面、简单,甚至将公开性和民主化当成是冲破阻碍改革机制、解决苏联改革所有重大问题的万能工具。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改革重

---

<sup>①</sup> “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心转向政治体制领域后，民主化进程实际上开始逐渐脱离苏共领导人的控制，进而导致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一步一步陷入对国家形势的完全失控。这说明，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虽然反复强调改革需要有“新思维”，然而，在他们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时往往还是从“旧的”思维定式出发，时常表现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倾向，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希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号召、动员，实际上还是依靠行政手段来推进改革，而缺乏做细致工作的耐心。与此同时，又过于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对苏联社会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估计过高，对苏共的号召力估计过高，而对苏共历史上大量的错误做法对全社会造成的心理创伤估计不足。

实际上，早在改革初期，苏共领导层中关于改革的战略、策略的争论便已开始。在1987年10月苏共中央例行会议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在发言中，批评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认为改革进展缓慢，使党和群众迷失了方向。叶利钦的发言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评，他本人虽然也承认了错误，但他本人以及与他有类似看法和观点的人并未就此罢休。此后，叶利钦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市委常委的职务，而他却得到要求进行激进改革的群众和政治势力的支持，成为“激进改革派”的首领。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艺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长篇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对苏联社会上和苏共党内出现的反斯大林、反社会主义倾向提出了批评。这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国外访问，主持中央工作的利加乔夫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会明显支持安德烈耶娃的观点，而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等人则认为这是“机关权势分子”对改革的恶毒攻击。苏共领导层出现了意见分歧。戈尔巴乔夫回国后，3月23日，苏共中

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一问题。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长篇编辑部文章,指责安德烈耶娃的这封信是反改革的宣言。

在围绕着改革问题的争论日益“深入”的同时,苏联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式组织”。一时间,关于改革的探讨、争论从苏共领导层、苏共党内发展到全社会,苏联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随之而来的是苏联社会包括苏共内在有关改革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在有关苏共历史问题上,大体上分化为三派: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派;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反对触动斯大林模式的“保守的”社会主义道路派;要求根据时代变化修正社会主义理论、改革斯大林模式、同时坚持经过“革新”和“恢复了的”社会主义的“革新派”。相应的,在有关改革问题上也自然形成了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求走“人类共同发展道路”即西方道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西方派”;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保守派”;要求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彻底改造、恢复社会主义本来面目的“改革派”三大派。当然,这种派别划分是相对的,各个派别中间的情况更是纷繁复杂、五花八门。

思想的分化使社会逐渐丧失了相对一致的意志和统一的奋斗目标。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思想斗争都是一小部分人、政治家和理论工作者的事,绝大多数群众往往处于追随、有时甚至是盲从的状况中。在改革初期经济改革陷于失败、改革未显示初步成效的情况下,从上层领导到全社会,大家都展开了对历史问题和改革道路问题的大争论,使社会失去了统一的意志和奋斗目标,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中,便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更糟的是陷入全社会的思想混乱。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主观愿望相反,苏联公开性、民主化

---

的实施正是导致了这种可悲的结果。可以说，苏共的失败首先是意识形态思想战线上的失败，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也正是以思想上的分化和混乱为起点的。

## 第二十四章 “新思维”和外交政策的调整

为了在国内进行改革,苏共新领导也迫切需要改变苏联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在国际上陷入的四面树敌、空前孤立的处境,调整外交政策,为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对苏联过去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为调整苏联的外交政策、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新思维”。为了宣传他对苏联国内形势和新的国际形势的认识和看法,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的请求,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于 1987 年 11 月在苏联和美国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宣称,“新思维”是核时代的政治思维,它不仅是针对核战争和国际政治问题的,而且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急剧转折时期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指导苏联的“改革”。一时间,“新思维”成为苏联改革的代名词,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对苏联后来的改革和外交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 国内外背景

“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主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苏联改革的代名词。简单说来,“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对迅速变化着的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之一其

地位日益衰败这一客观事实做出的判断和反应。它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人文等各方面的问题。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

进入 80 年代,苏联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对苏联不利的变化。由于长期奉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战略,在“输出革命”、与资本主义进行“总决战”旗号下,在世界各地进行自己国力无法长期支持的疯狂的扩张,争夺势力范围,不仅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展开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保持长期对峙的态势,加剧了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而且招致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对。

苏联在“两个阵营”的对抗中,处处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转移,而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关系中,又以“世界革命的中心”和“老子党”自居,干涉别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60 年代,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导致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1969 年中苏边界军事冲突的爆发、70 年代中国采取团结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反霸的对外政策方针,使苏联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政策受到遏制。

在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地区,苏联的霸权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压制东欧国家的各种改革,干涉别国内政。1968 年,勃列日涅夫推出臭名昭著的“有限主权论”,公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苏联还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积极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扩张,直至干涉第三世界主权国家的内政,1979 年悍然出兵阿富汗。所有这些,都加剧了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引起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从而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孤立。

苏联的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除了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本身日益显露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苏联模式的各种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

经济的发展之外,长期与外部世界隔绝、军备竞赛、阿富汗战争以及苏联在世界各地的介入和插手,使其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国民经济不堪重负。美国在奉行对苏“遏制战略”的同时,通过积极接触政策,同苏联展开意识形态斗争和比国家综合实力的“和平竞赛”。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更强硬的反苏政策,他的“星球大战计划”的出笼使苏联经济面临着被拖垮的危险。长期的对抗和争霸,使苏联经济处于半军事化的战备状态,经济结构严重畸形,重工业、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轻工业、农业严重滞后,消费品生产供应不足,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美苏争霸是一场比国力、比经济实力的斗争。对于苏联来说,在国内外形势并不有利,甚至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对外交战略及其指导思想进行必要的调整,放弃不符合当今实际的对外政策和措施,显然是明智的选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外交战略调整的理论依据,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反映了对时代和资本主义世界现实的新的认识以及苏联在这种形势下应做出的外交调整和外交选择,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思想认识上的模糊之处和界限不清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理想”所陶醉,对充满矛盾和对抗的现实世界缺乏清醒的认识,对西方的“良好意愿”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

## 第二节 “新思维”的基本内容

“新思维”的提出和形成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其目的很清楚,这就是:第一,尽可能消除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因素,结束与西方的冷战,减轻苏联的战略负担,为改革创造缓和的外部环境;第

二,积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消除以往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对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第三,确立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的关系,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sup>①</sup>。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战略指导思想进行了重大调整,修改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树立了一套用以指导苏联外交实践的新的价值标准,以此构成了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

### 一、基本出发点:对时代和 资本主义的看法的转变

苏联共产党长期坚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提出的、后来由斯大林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已激化;资本主义已走向“垂死、寄生和腐朽”,已走向“全面反动”;垄断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婪和对世界的瓜分与再瓜分必然导致一连串战争,而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总决战”的时期,是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在这种“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同外部世界相隔绝,同时保持紧张的对抗状态,这给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为了改革的需要,为了改善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发展同

---

<sup>①</sup> “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也是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对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认为“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sup>①</sup> 这种看法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基于对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认识。“新思维”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但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实质上是统一的整体。核时代的人类共同安全问题、经济和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下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大大加深所产生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整体性、涉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和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把世界联为一个对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单靠哪一个国家,而要靠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新思维”纠正了以往苏共对资本主义腐朽、垂死性质以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一过程过于简单化的认识,看到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承认“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起的作用的理解”。<sup>②</sup> 既然“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因此,“通过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的习惯提法只能看到在生产方式方面所发生的

---

<sup>①</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苏联]《真理报》1987年11月3日。

<sup>②</sup> 同上。



事情的本质,还谈不上政治预测”。<sup>①</sup>

对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使苏共领导人明确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竞争的长期性,而这种斗争和竞争是能够并且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当时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伟大的成就和光辉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巨大的潜力和无限的前途,而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其伟大的历史和成就,美国既不是“万恶帝国”,也不是“山顶圣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做出判断。历史能判断一切。让各国人民自己去判断,哪一种制度更好,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吧。让和平竞赛来决定这一切吧,让各种制度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吧。”<sup>②</sup> 显而易见,当时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经过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充满着信心的,认为它一定能够取得和平竞赛的胜利。

根据对时代和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苏共领导人在看待“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的问题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再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愿和现实选择,不再简单地把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后备军和革命的反帝力量。

“新思维”对苏联所处时代的重新认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

---

<sup>①</sup>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与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各国党和运动代表会晤中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7年11月5日。

<sup>②</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87页。

改变了通过革命和暴力手段战胜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放弃了把苏联模式和苏联发展道路绝对化的观点,承认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多样性,否定了两个世界,即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完全对立的观点。

## 二、基本价值观:“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对当今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同时,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了“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认为“尽管现世界矛盾重重和组成现世界的各国有着根本的差别,然而,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依附的,它是一个固定的整体”。<sup>①</sup>“随着大规模(普遍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sup>②</sup>而“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sup>③</sup>人类社会存在着许多矛盾,并由这些矛盾产生出人类的共同利益,“新思维”在人类的不同利益和共同利益这对关系中,强调的是矛盾的同一性,并且把这种同一性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新思维”的“核心”是苏联领导人和知识界对当代世界重新认识的结果,带有打破以往意识形态框框,摆脱思想束缚的性质,并因此而具有值得肯定的、合理的成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苏联]《真理报》1987年11月3日。

②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85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

分。第一,由于人类已经具有了消灭人类自己和整个地球的手段,使得维护和平、消除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威胁、保障人类生存的问题上升为最重要的问题。“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sup>①</sup>第二,摆脱了以往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方式,承认人类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各种优秀成果的结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应当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提法,作为在国际舞台上争取主动的宣传口号,作为动员进步人类进行共同斗争、消除威胁人类生存的核战争的奋斗目标,应该说有其合理性。然而,作为在国际关系中奉行的原则,作为对外政策的逻辑起点,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一,“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模糊了核威胁的根源,有宣扬对超级大国核威胁政策采取妥协、调和的立场之嫌。“新思维”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主要论据是核武器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然而,人类生存所面临的这种威胁,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超级大国推行的核威胁政策。“新思维”淡化核威胁根源问题,而一味地强调目前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希望唤起拥有毁灭地球和全人类能力的核大国的良知,其结果只能是麻痹自己和世界人民,只能是在核威胁面前退缩、让步,任由超级大国和西方国家中坚持冷战思维的强硬派和霸权主义势力操纵、摆布。

第二,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将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

---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77页。

本主义两种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为苏联领导人以后全面接受西方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当今世界,将抽象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是幼稚的,在实际外交操作上是不现实的。与西方国家国内“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比,由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宰的国际秩序显然是最不公平、最不民主、最不合理的,国际舞台上国家间的关系突出表现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国际政治显然是最“自私”、最“肮脏”的政治。可以说,尽管西方民主政治在各个国家内部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则仍然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尽管西方国家标榜民主、自由,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仍奉行着最原始的“丛林法则”。实力外交、强权政治、“弱肉强食”在国际关系领域是司空见惯的天然法则。任何理智的政治家都不会将本国的国家利益置于任何形式的超国家的抽象利益之下。其实,戈尔巴乔夫也清楚地看到当代世界还存在着四类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涉及人类生存的生态、资源、贫困等全球性矛盾。而在当今世界上,人们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和斗争无一不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在这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能作为口号和理想,不可能成为各国外交活动的准则。

### 三、重返“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

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逐渐走进死胡同。1989年前后,当苏联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即动荡失控阶段后,苏共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是根据

时代的变化,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充实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认为苏联过去脱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向往“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力图重返欧洲文明。

苏共领导人在纠正过去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对抗、埋葬帝国主义的做法的同时,走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极端,即过于重视世界的共性、矛盾的一性,而忽视苏联本身的历史特征和社会特征,忽视国际范围内存在的种种矛盾、斗争对人类社会和国际局势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等论点的要害在于,究竟什么是“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他们对包括人类共同利益在内的许多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他们评判价值的标准也千差万别。显然,“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不可能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利益和价值的简单相加,不可能是各种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价值观的总和。在这里,对戈尔巴乔夫等人来说,他们所指的“全人类价值”其实就是由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sup>①</sup>这种超阶级、超越国界的“全人类价值观”说到底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苏共领导人的思想脉络实质上就是从放弃集团对抗、停止“冷战”、打破闭关锁国局面开始,经过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理想”,承认并向往“全人类的价值”。这就逐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这一思路逐渐发展演变为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价值观。

---

<sup>①</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这时，戈尔巴乔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自己也开始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怀疑，对按照社会主义改革方式解决苏联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摆脱国内危机丧失了信心。在这里，他们通过模糊两种社会政治制度界限，逐渐背离社会主义改革道路，向往走上他们所认识的“人类共同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通过放弃自己以前的政治“盟友”和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试图换取在发达国家——“西方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

### 第三节 “新思维”指导下的外交调整

苏共领导人在对苏联对外战略指导思想进行修改、提出主要用于指导外交实践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外交政策主张。第一，积极寻求建立新的国际安全体系。提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为条件，在建立国际安全结构时应遵从“利益平衡”原则，即照顾到每一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利益。主张实现国际安全的方法只能是政治解决和裁军。“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sup>①</sup>。”“通向安全的惟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是裁军的道路。只有越来越低的战略平衡水平——其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武器，才能保障我们时代获得真正同等的安全。”<sup>②</sup>第二，积极寻求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的民

---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第177页。

② 同上书，第178页。

主化、人道主义化和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主张各国遵守自由选择原则,即各国人民都有自由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主张不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等等。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的外交活动在“新思维”理论指导下明显存在着两个阶段。从“新思维”的提出到1989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苏联外交实行战略收缩和对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在这一阶段,也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基本表现为纠正以往的政策错误,其中不乏一些基本正确的观点和看法。新思维外交在1989年以前的第一阶段,还是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的。正是因此,无论是在苏联社会和苏共内部,还是在国际社会上,这一时期的“新思维”外交都曾经受到普遍的支持和欢迎,始终是苏联改革中问题最少、争论最少的一个领域。“新思维”外交的积极方面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

第一,“新思维”外交结束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峙、争霸及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的局面,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

第二,“新思维”外交放弃军备竞赛政策,采取单方面大量裁军行动,打开了裁军谈判的僵局,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为以后的裁军谈判、《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奠定了基础。

第三,“新思维”外交放弃了苏联以往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从非洲、中东、印度支那撤回或减少苏联军事顾问,对地区性冲突采取和解态度。

第四,“新思维”外交停止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干涉、控制,使国际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走向正常化。

第五,“新思维”外交促进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在承认并积极解决影响中苏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问题的基础上,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实现了中苏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第六,“新思维”外交改变了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的传统做法,把经济外交提到重要地位,积极谋求苏联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然而,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也逐渐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苏联外交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倒向西方,到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外交领域的活动已不仅限于外交政策的调整,而是外交战略的根本变化了。这种转变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一是思想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新思维”在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在国际斗争依然十分尖锐、强权政治横行、各国无不从各自的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对待一切重大国际问题的当代世界,片面强调人类共同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只能说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甚至是幻想,是一厢情愿。在这种“新思维”理论指导下的外交活动实践自然处于被动和一味退缩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核心代表着所有国家共同的价值利益,即:防止核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结束冷战。这并不否认在我们的外交上有国家利益的存在,和在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全面重新设计中有必要的灵活性 with 想像力以克服老的教条。”然而,“戈尔巴乔夫一再地耗费掉苏联的谈判潜力,他公开地标榜‘全人类的利益’并把实际解释成他不断地做出决定,同西



方轻率地达成一些协议从而忽视了苏联的重大利益”。<sup>①</sup> 纵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外交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从战略收缩到完全倒向西方的发展脉络。

二是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苏联的改革重心转向政治领域。随着国内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到1989年底,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苏联国内民主派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开始左右改革的发展方向。这时,“新思维”的创造者在对外交往中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国内因素:从消除对抗、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转而乞求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寻求经济技术援助以求使苏联摆脱危机。在理论上,苏共领导人也正是在这时完成了认同西方价值观的过程。这一阶段的苏联外交实践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几乎所有重要外交活动上都采取一味迎合西方、乞求西方援助的做法;不再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盟友”给予支持,对东欧的局势变化完全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在中东、海湾危机中积极与美国配合,等等。甚至在苏联内政问题上也听命于西方,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统一。例如,1991年立陶宛“一月事件”中,在西方的不满和反对声中,苏联领导人缩手缩脚,不敢严正地面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势力;“8·19事件”后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满足了西方多年的要求,等等。

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外交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正是伴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逐渐发展演变的。也正是由于国内政治改革选择了以西方国家为蓝本的发展道路,外交政策便自然而然地沿着屈从西方、迎合西方

<sup>①</sup> [俄罗斯]阿·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页。

到主动倒向西方的方向转化。既然在价值观上已经实现了与西方的认同，“新思维”理论也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了。“新思维”外交的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苏联改革后期，这时，苏联外交活动指导思想上调和主义色彩日益浓重，完全认同西方价值观，急于重返“西方文明”，促使苏联在外交实践中完全倒向西方。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第一，对于苏联本身来说，全面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是苏联社会制度“全盘西化”的反映，它不仅加速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变，而且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未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苏联的“亲善”态度并未换来美国和西方的同等回报，西方依然依据“丛林法则”、强权政治行事，不断扩大、抢占苏联“让出”的战略空间。第二，对于整个世界格局来说，苏联的“倒向西方”，使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其主宰国际事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最后，苏联的解体也就宣告了“新思维”外交的终结。

## 第二十五章 政治改革成为改革的中心

如上所述,苏共领导人在实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时仍然沿袭了过去的思维定式,对苏联经济长期积累的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改革的困难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对在短期内迅速改变社会经济现状过分乐观,急于求成,提出的一些目标不切合实际。当经济改革受阻,不能立见成效的时候,又不是从经济改革本身、从影响经济工作的具体问题入手找原因,推动改革,而是简单地把注意力转向政治领域,认为旧的官僚主义结构阻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到1988年,苏共领导层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现存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我们就实现不了改革的任务”<sup>①</sup>。由此,苏联的改革开始转向政治领域,政治改革逐渐成为改革的中心。此后的问题便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复杂。

###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思想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是导致苏联

---

<sup>①</sup> “关于苏共二十七次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走向衰亡的重要前提之一。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逐渐发展、演变的。在1988年6—7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改革不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基本上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改革的任务是“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sup>①</sup>这时，苏共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为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这些提法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此时，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体制的设想中已存在某些错误端倪，但总的看来，他还是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在苏共领导下进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发动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途径，对政治体制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阻碍机制”进行改革，重点放在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克服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弊病上。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改革转向政治领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随后，在这一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问题越来越多，出现了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最初的设想完全不同的结果，苏联的改革进程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

随着形势的变化，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最终，由于其本身的种种失误，苏共反对派日益壮大。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形势逐渐失控，他的改革指导思想实际上已经不能指导苏联的改革进程，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势力开始左右苏联的发展方向。

---

<sup>①</sup> “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

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的变形”，而发生这种变形的重要原因是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力量的苏共本身、它的活动内容和它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也“发生了某种变形”。其表现为：（一）“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执行机关和“着手解决各式各样的管理任务”的党的机关的权力过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实际参加解决国家和社会事务之外”；（二）过度膨胀的管理机关“实际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经济单位和政治部门”，它们“掌握着所通过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且“不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经济责任”，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无法对部门利益实行有效的监督；（三）社会生活过分国家化，“国家调节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极广泛范畴”，严重阻碍了人民、社会组织 and 劳动集体积极性的发挥；（四）“国家结构的官僚化和群众的社会创造精神的下降使社会的思维单一化和静止不前”；（五）政治体制“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结果，“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下降，劳动者疏远公有制和管理”。<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的分析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但是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又一次反映了苏共领导理论不联系实际、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维

---

<sup>①</sup> “关于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定式。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会议强调:“应当有勇气承认:假如政治体制仍然不动,仍然毫无变化,我们就实现不了改革的任务。”<sup>①</sup>因此,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其战略目标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对根本改革后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勾画了其前景:这是(一)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二)一种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三)一种社会公正的制度;(四)一种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五)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六)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七)其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sup>②</sup>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的所有特征都与人道主义这一基本价值有着内在的联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因此这是一种“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sup>③</sup>

##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社会主义“崭新状态”为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其基本设想是:在苏共一党领导体制原则基础上,充分保障人的各种权利,实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实现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系统向国家权力机关的转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引入适当的权力制衡机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使法律取代行政命令,成为调节社

---

<sup>①</sup> “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同上。

会生活的第一准则。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最核心的部分是关于苏共在政治体制中地位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变化。

(一)确定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重申苏共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实行党政分开原则;在苏共自身建设问题上,强调发扬民主。

改革以来,苏共领导人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以党代政的状况,逐渐淡化党是政治体制的核心的传统提法,突出强调党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苏共二十七次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对党的作用作了明确的表述:“先锋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的,它保证着对国家发展的极其重要问题的理论研究,研究改革的思想,并通过在群众中的组织工作,鼓舞和激励他们,为我们整个多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指出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党实行干部政策,通过改造后的政治体制的民主机制合理配置干部。”<sup>①</sup>为使党充分发挥政治先锋队职能,确定了党的活动原则,这就是“通过在国家机关和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自己的政治方针”;“所有党组织都应严格地在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委会不能做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sup>②</sup>

继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提出改革党的领导方法和党的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88年7月5日。

<sup>②</sup> “关于苏共二十七次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干部政策的任务之后，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改革党本身、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问题，核心是恢复对民主集中制的列宁主义理解。即在问题的讨论阶段有充分的讨论自由，在大多数人通过决议后行动一致；提高通过经选举产生的机关的作用，提高党的各种会议的务实精神，扩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参加政治局活动的规模；增加党的一切组织及其领导机构工作的开放性，公布各级党委会全会的速记记录；切实遵守党的领导机关向经选举产生的机关、党委会向基层组织报告工作的制度，特别规定苏共中央政治局定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实行新的干部政策，摒弃形式主义的任命干部方法，各级党委把组织培训和进修作为干部工作的基本方法，干部的配置和选拔由选举结果确定；改革党的选举过程，在各级党委委员和书记（到中央委员为止）的选举中实行广泛讨论候选人、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制；各级党委任期五年，五年中间可举行一次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有权更换20%的委员；从各级党委委员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总书记，不得连任两届以上；加强党内监督制度，把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合并为统一的监督检查机关，并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建立。

（二）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把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

在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国家权力机关改革方面的内容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实，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职能问题展开的。基于对以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弊端的认识，苏共领导人注意到影响人民政权机关——苏维埃发挥作用和职能的关键在于：第一，各级党委超越职权，代行苏维埃的职能；第二，政府官员参加苏维埃工作，苏维埃机构不健全，政府凌驾于苏维埃之上。



为克服过去政治体制的弊端,使国家权力机关——苏维埃真正成为拥有全权的国家政权机关,要求调整政治体制中各种机构设置之间的关系。首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重提列宁时期“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恢复苏维埃全权的任务,其核心是调整政治体制内部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党与苏维埃的关系。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规定党发挥政治先锋队职能,“党的政策,包括经济、社会和民族政策,应首先通过人民代表机构贯彻实施”。<sup>①</sup>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为恢复苏维埃的全权创造必要的前提。

其次,恢复各级苏维埃对其执行机关——政府的领导地位。为防止政府控制国家权力机关,规定全苏和各加盟共和国政府成员、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其部、局领导人,法官,检察长,国家仲裁员不能成为相应的苏维埃代表,但各级部长会议主席和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可作为例外当选为同级苏维埃代表。

再次,推荐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通过选举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但应经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为使长期以来有名无权、享有“橡皮图章”之称的苏维埃真正成为能够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机关,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国家权力机关系统本身的结构也做出了调整。

第一,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增设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变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增设苏

---

<sup>①</sup>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真理报》1988年7月5日。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也建立类似结构。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内部职能划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2250人组成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苏联最高权力机关，拥有管辖苏联范围内所有问题的全权，对苏联国家生活中的一切最重要问题拥有最后决定权。两院制的、由542人组成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的常设立法、管理和监督机关，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选举产生，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最高权力，在管辖范围上具有全权性质，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分享立法权，但它通过的法律不得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相违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失去了原有的常设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成为向最高苏维埃报告工作并保证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组织工作的机关；它失去了原来集体元首的大部分作用，并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以下公职人员组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主席、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两院常设委员会主席；主席团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领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是苏维埃最高公职人员，在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代表苏联，拥有广泛的内政、外交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通过秘密投票罢免最高苏维埃主席。

第二，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仍保持权力平等，联盟院侧重于解决对全国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经济和国家建设问题，对外政策、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公民的权利、自由和义务问题。民族院侧重于研究和解决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民族文化、族际主义教育和民

族问题,民族利益与多民族国家利益相结合问题,并负责完善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

第三,加强苏维埃作为监督主体的作用,把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完全划归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领导,该委员会主席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增设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其成员从人民代表之外的政治、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不能同时参加其活动受委员会监督的机关,该委员会委员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苏联宪法。

第四,地方(边疆区、州、自治州、市、自治专区、区、市属区)设苏维埃、苏维埃主席团和苏维埃主席三层次结构;村镇设苏维埃和苏维埃主席两层次结构。地方苏维埃内部职权随结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它们的执行委员会失去原来苏维埃常设机关的地位,变成单纯的苏维埃执行机关;失去召开苏维埃会议、规定会议议程和提出议题的权利。新增设的苏维埃主席团和苏维埃主席承担筹备苏维埃会议、协调常设委员会和代表小组活动的工作。同时,地方苏维埃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

第五,确认社会团体作为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的地位,主张在意见多元化基础上增加社会团体在人民代表机关中的代表人数,以增强它们在各级苏维埃中的作用。

(三)修改人民代表选举法,扩大苏维埃选举机制的民主性,实行严格的任期制。

为适应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修改人民代表选举法问题。随后,1988年10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草案的决议,规定将苏共中央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出的两个法律草案提交全民讨论。10月22日、23日,苏联各大报刊

先后公布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草案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草案,供全民讨论。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分别通过了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选举法对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原则、选举组织、选举程序做了一些变动。规定2/3的苏联人民代表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从区域性选区和民族区域性选区选举产生,另外1/3代表由全苏性社会组织在其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上,或其全苏性机关的全体人员大会上按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选举产生;突出准备和进行选举的公开性原则,强调选举的各个环节都应有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代表参加,新闻机构可以采访报导;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兼任苏联人民代表;明确了差额选举原则。

(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造苏维埃立法体系,实行司法改革。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恢复和加强苏维埃的全权为核心,改造苏联的国家权力分配结构,改进立法程序,突出苏维埃的立法职能;实行广泛的司法改革,改革护法机关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明确司法独立原则,等等。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上述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抽象的政治理论上看似似乎并没有原则性错误,如主张党政分开、改变以党代政状况、加强法治、扩大民主等,问题在于他完全无视在当时苏联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条件下这种政治改革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

### 三、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 指导思想的发展、演变

正是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苏联社会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激烈。随着形势的发展、演变，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也在发生变化。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理论文章，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社会政治制度、斯大林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判，进一步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进程。此后，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便日益突出。

在“彻底”批判斯大林式的苏联模式的基础上，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掺杂进越来越多的“新”东西，最终形成“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观。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我国曾经出现过争论，有过一些模糊认识。一些人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他搞“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严格说，这种说法有欠公允，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客观实际。首先，作为苏共领导人指导改革的理论基础，无论是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都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民主化、公开性的提出，经过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把“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直至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

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到同年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这一行动纲领，整个这一过程并不是在“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以后），是改革实践迫使苏共领导人不断调整其改革指导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改革的前期，“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追求的目标和口号，因此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而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之时，改革进程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苏共领导人和苏共的控制。其次，作为对苏联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理论反思，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指导思想，包括“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苏共、苏联社会对斯大林模式逐步深入的认识以及迫切希望改变这种模式的愿望。尽管其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但不可否认也有着合理的成分，应当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不应该简单化。

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还设想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认为这“不是改变观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以便确保我们社会的胜利发展”。<sup>①</sup>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批判的深入，苏共领导人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现实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官僚专制制度”、“兵营社会主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

---

<sup>①</sup> “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米·谢·戈尔巴乔夫1988年2月18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2月18日。

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试图用“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改造苏联社会。在他看来,经过改革的苏联社会应该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高度民主化:以人为核心,实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建立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确立法律至上原则,保证司法独立性;经济多元化:“要使劳动人民成为所有制的真正主体,工人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sup>②</sup> 意识形态多元化,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应该注意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应该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族际关系民主化:“在苏维埃联邦制范围内,族际关系只能建立在民主、平等、彼此尊重和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之上”。<sup>③</sup> 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他的改革战略的转变。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党内外反对派势力的压力下不断调整其改革理论,进一步造成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混乱。

(一)有关改革的目的。开始时苏共领导人还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

---

①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

和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sup>①</sup>到后来则把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当做改革的目的，即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代之以“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

(二)有关改革的动力。苏共领导人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力量，认为人民自然而然地会支持改革，开始时还把苏共当成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力，后来逐渐将苏共看成是改革的阻力。

(三)有关改革的阻力。开始时是“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苏共领导人逐渐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成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

(四)有关进行改革的手段。认为民主化、公开性是进行改革的根本手段。

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一个混合物，其中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居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在不断增多，而社会主义的成分却越来越少，后来仅仅成为口头上、形式上的东西了。这种理论思想上的混杂、混乱，自然引起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各种思潮、理论应运而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年初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

<sup>①</sup> “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 第二节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会议后政治改革的实施

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8年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分别通过了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重心开始从党的系统向人民代表机构转移。

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进一步使党的机构改革具体化了。其中包括两项重要措施:第一,决定改组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改变了按照管理部门分设党的机关的做法,撤销原有的这类机关,在各级党委设立研究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委员会。苏共中央成立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意识形态问题、社会政策问题、农业问题、国家政策问题、法律问题六个委员会。机构改组后,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人数大大减少。第二,决定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兼任相应级别的苏维埃主席职务,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图用党的威望来加强苏维埃的权力,使党和苏维埃这两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最关键力量在权力重心转移过程中相互配合,避免发生对立。

### 一、从意见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

早在改革初期,随着苏共领导人大力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运动的逐步展开,苏联社会便开始了从意见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的发展进程。

在此之前,长期以来苏联经济政治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以及苏共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上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对苏联人民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从总体上看,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精神状态中。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不能说苏共不重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但在苏共领导人“一贯正确”甚至“垄断”真理的情况下,强求全社会、全民思想统一、一致的做法,不仅压制了社会的创造积极性,而且使“唯上”、“唯书”、为领导人的论点作注释的不良风气、僵化的教条主义学风盛行,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影响了苏共党的威信,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信。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政治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导致苏共领导人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在各种政法机关对社会严加控制、宣传机构以强大的声势对人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灌输的情况下,全社会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似乎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已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意识形态。在不真实、片面报导和对社会进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sup>①</sup>在这种表面上的一致、统一、平静下面,有各种潜流在形成、涌动。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对社会现实不满,人们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意见不能及时反映和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而长期处于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人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78页。

们的意见和不满逐渐转化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危机,此后又发展成为对苏联一整套做法、甚至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

显而易见,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社会状况,需要寻找动员、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途径。打破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实属必然。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同时又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出现和进行建设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发展将不可能是自然的发展过程,它必须由先进阶级的先锋队——革命政党来领导,一旦放弃这种领导,盲目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就必然会出现严重后果,因为这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自发倾向只能使国家陷入混乱。苏联出现的正是这种情况。用戈尔巴乔夫宣称的“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和教条主义的结果,是导致思想理论界的严重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势力在“自由”、“民主”旗号下兴风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成为时髦。而且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首先在苏共党内得到不断发展壮大。在苏共领导层中,尤其是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sup>①</sup>

苏共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混乱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对

---

<sup>①</sup> [俄罗斯]亚·雅科夫列夫:《序言、崩塌、结束语》,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2年俄文版,第127页。

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并使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苏共、不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力量，而有利于“民主派”和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变化。

在政治过热、政治斗争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某种势力占上风的时候，人们往往为形势和激情所左右，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这种“民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更多情况下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容易被一些人和势力所利用。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给少数人发言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这一次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占了上风。

## 二、从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

苏联的改革转向政治体制领域之后，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最终导致苏共领导权的丧失，使苏维埃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场所，造成全国性的“权力真空”和社会混乱。

第一，苏共领导人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的任务。

乍看起来，这种做法并无什么过错，划分党政职能，摆正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苏联早就应该做的事，然而，这次改革并不仅限于此，其核心在于使苏共交出国家领导权。

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其特点之一就是苏共作为权力中心，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的政策、决策实际上均由苏共，准确些说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并由其监督实施，而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只不过是在履行“橡皮图章”的认证职能

而已。对这种党政关系进行改革无疑是需要的,但是要改革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体制,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和必要的过渡,不能一蹴而就。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要一步到位,一下子就恢复苏维埃的“充分权力”,其结果是苏共交出了权力,苏维埃却不可能立即掌握“全权”,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苏联国家管理体系很快就陷入全面混乱,经济失去了控制并遭受严重破坏。

第二,根据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公开性、民主化,迷信群众自发性的一贯思路,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提出实现国家权力重心转移时,决定以真正的、“完全符合普遍平等的直接选举的原则”,使选举“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个人以及共产党、社会团体和运动、个别候选人提出供选民评判的各种主张并进行正当竞争的天地”。<sup>①</sup>

苏共及其领导人原打算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使“忠实于改革”的共产党人掌握各级国家权力。事实说明,他们完全是一厢情愿。他们以为采用按照他们的愿望设计的新选举法进行选举既可以保证苏共的领导作用,又可促使苏共在民主化进程中得到锻炼。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第一,由于苏共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在历史上又有不少错误,因此很多选民对苏共有相当深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想投苏共候选人的票。第二,苏共党内外的反对派抓住反腐败和反特权的口号,在群众中有很大大号召力和吸引力,不少群众愿意投他们的票。第三,在知识分子最为

---

<sup>①</sup>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苏联〕《真理报》1990年2月13日。

集中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由于苏共过去长期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偏差和失误,这两大城市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接受了民主派的纲领,苏共候选人在这两个城市的竞选中惨遭失败,这两个城市的权力机关首先落到了民主派手中。这对全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为吸引群众参加政治,采取了把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和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向全国直播的做法(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实践中都是罕见的),进一步推进了社会上的“政治热”,而在苏联政治文化不发达的现实情况下,这种“政治热”不可能纳入有序的民主政治的轨道,而只能是使社会陷入无序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动荡。

与戈尔巴乔夫原先的期望相反,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苏维埃的自由选举过程中,苏共党内的民主派、苏共的各种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纷纷得手,许多苏共候选人则败下阵来。苏共党内的民主派和苏共的各种反对派利用群众的逆反心理,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他们不仅在1989年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取得了不小的战果,而且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也在许多地方得手。特别是1990年3月,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选举中获胜,点燃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线。1990年5月,激进民主派首领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同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该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在其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其后,组成苏联的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都相继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

第三,在各种政治思潮和派别十分活跃、政治形势对苏共并不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改变苏联国家权力结构,其结果是各种政治

思潮和派别提供了角斗场,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国家权力机关会议上长期议而不决,人民群众远离国家权力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国家权威受到削弱。

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开始借鉴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1989年5月—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初步形成了类似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其常设机关——议会。由于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议员)的选举是在政治多元化和舆论对苏共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批苏共党内的民主派分子和苏共反对派头面人物、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等纷纷当选。他们把各种思潮带进国家权力机关,议会中逐渐形成了23个议员团,议员们醉心于政治斗争。议会中争论、角逐不断,在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争论不休,久议不决,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改革和正常的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尤其突出的问题是,这种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不仅限于联盟一级,也涉及各加盟共和国。在联盟国家权力机关受到本身各种政治势力争夺、角逐困扰的同时,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民族独立情绪日益高涨。各加盟共和国通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将一批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选进新建立起来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加盟共和国一级展开与共产党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斗争。随着民族意识、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联邦,在各自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兴起了与联盟中央争夺从经济自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主权战”、“法律战”,严重威胁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联盟中央对

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呈衰减趋势。到1991年,形势急转直下。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任全民选举的总统。7月10日,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7月20日便签署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受到限制。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苏共逐渐丧失联盟国家领导权,导致联盟国家威信的下降、权力的削弱;而正是联盟国家权力的削弱、威信的下降,为各加盟共和国的争权乃至独立提供了可能,为苏联解体开了方便之门。

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程安排,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之后,从1990年起,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市等陆续举行了地方苏维埃选举,以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改革目标。由于选举是在苏共党内思想发生混乱,已经出现各种派别,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党的威信已大大下降的情况下举行的,其结果当然不会对苏共有利。

仅以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为例。俄罗斯联邦选举法规定,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是该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由1068名人民代表组成。在1990年首届俄罗斯人民代表的选举中,尽管苏共党员占代表总数的86%,但其中许多代表是“苏共民主纲领派”成员或政治上倾向于该派的党员。苏共近80个边疆区、州委第一书记中,仅有25人在竞选中获得候选人资格,其中只有19人当选人民代表。<sup>①</sup>支持叶利钦的“民主俄罗斯运动”获得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席位。“民主俄罗斯运动”在一些大城市的影响很大,莫斯科选出的67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中有57名、列宁格勒选出的31

<sup>①</sup> 参见[苏联]《真理报》1990年3月26日。



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中有 25 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选出的 9 名俄罗斯人民代表中有 7 名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员。<sup>①</sup>

### 第三节 政治改革的曲折道路

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后，苏共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以国家权力重心转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此后，苏联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很快，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由于苏共领导人在改革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唯意志论、急于求成的老毛病始终未能克服，也由于在改革过程中缺乏对具体改革措施结果的认真分析、总结，致使政治体制改革逐渐陷入困境。改革进程逐渐被激进势力、激进的社会政治情绪所左右，最终导致苏共及其领导人丧失对改革进程、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

#### 一、从一党制到多党制

十月革命后，苏俄曾经有过很短的多党制时期，随后长期由苏共一党领导，在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政党存在。过去，苏联一直由苏共对其他社会团体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在苏共领导下工作，其主要领导干部均由苏共负责培养、选拔、安排。社会团体在配合苏共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缺乏自主性、主动性。由于苏共对社会团体事务过多的干预，社会团体本身的积极性受到抑制，难以发挥联系、团结和教育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客观上成为苏共

<sup>①</sup> 参见[苏联]《莫斯科新闻》1990年3月25日。

的附属组织。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提倡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逐渐放松了苏共对社会团体的领导,到后来,基本上对各种群众性团体和组织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而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系统,使苏共这个长期实际执掌国家权力、事实上是国家政权组织的政党丧失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所有这些,都为多党制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一,苏共领导人片面地强调个人、集团、群体利益,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缺乏正确的引导、指导。从1988年开始,苏联涌现出大量“非正式组织”,只要这些组织打出“支持改革”的旗号,苏共领导人便无不倍加欣赏,奉为“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给予“大力支持”。对一些“非正式组织”中出现的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倾向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对各加盟共和国出现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群众组织也缺乏认识和警惕性,认为“它们无关大局”。<sup>①</sup>当一些“非正式组织”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民族分裂活动的时候,苏共领导人却要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会与之打交道,进行“有益的对话、合作”。

相反,苏共领导人对工会、共青团等原有的社会团体却作了不恰当的批评和指责,认为它们不能反映自己成员的利益,指责它们行动缓慢,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从而加速了这些组织的分裂和瓦解。苏联官方甚至片面地认为,大量“非正式组织”的出现,是由于

---

<sup>①</sup> 参见“关于苏共二十七次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合法的’社会团体常常变成官僚主义的团体”<sup>①</sup>，“现有的组织在工作状况、气氛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sup>②</sup>。事实上，改革之初，原有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适当调整与苏共和政权机关的关系，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苏共领导人错误的改革政策，造成了形势的复杂化，使得这些社会团体工作十分被动。就连苏共都对千变万化的局势无能为力，更何况这些群众性社会团体了。如1989年夏季爆发的大规模矿工罢工，就给各级工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官方的”工会组织迅速瓦解或演变成“独立”工会，脱离苏共领导的独立工人运动迅速发展。

第二，苏共领导人以是否“支持改革”划线，把自发势力视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幻想依靠各种“支持改革”的群众自发组织来推动苏共和原有的社会团体进行自身改革，同时调动和唤起群众积极投身改革。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在立陶宛，这种组织的名称更加动听，称做“争取改革运动”）以支持改革为名相继成立。尽管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些组织具有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色彩，苏共领导人还是支持了它们。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人民阵线很快就成了苏共的反对派，以夺取政权作为自己活动的目标，最终导致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而独立。

各种非正式组织的出现，严重冲击了原有社会团体，形成与其争夺群众的局面。一些非正式组织逐渐向政党方向发展，其中一些

---

① [苏联]奥·巴图林：“通过劳动人民——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问题”，[苏联]《劳动报》1988年8月19日。

② 米·谢·戈尔巴乔夫1988年4月8日会见乌兹别克领导人时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4月9日。

充当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非正式组织“民主联盟”1988年一出现便提出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即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要求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反共势力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却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其思想基础,接受社会政治斗争中的所谓“自由竞争”原则,为各种政党、派别的合法活动提供了依据。

第三,苏共领导人一改过去严格控制群众团体的做法,取消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致使苏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和桥梁,丧失了大批群众。改革之初,苏共领导人还坚持社会团体都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其职能的原则。时隔不久,戈尔巴乔夫便多次提到要在党和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努力维护其成员的利益,不要受党政机关的约束。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中规定,苏共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运动和组织的合作,苏共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对话”和“伙伴”关系。苏共对群众组织放任自流的方针,使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组织纷纷宣布“独立”。这无疑削弱了苏共的影响,给苏共反对派以可乘之机。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民主派,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大肆攻击苏共,扩大自己在社会团体中的影响。一些非正式组织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做文章,公开把反对苏共作为自己的主要口号,通过与苏共的对抗哗众取宠,扩大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威望。

第四,苏联始终缺乏应有的法律来规范和限制社会团体超越法律范围的活动。首先,作为执政党,苏共及其领导人并未通过执政党所掌握的国家机器依法对非正式组织的活动进行合理的和必要的限制和干预,也未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的活动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乃至制止这种违反宪法的活动,而是对非正式组织违

反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活动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实际上损害了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丧失了手中强有力的斗争工具。其次,法律的制订工作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当各种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并积极开展活动时,实际上它们处于长期缺乏法律规范约束的状况中。当无政府主义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之后,苏联才于1990年通过和颁布了《工会法》和《社会团体(政党)法》,而到此时,这些法律已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再次,苏联多次修改补充宪法和有关法律,既动摇了法律的稳定性,又为各种组织的活动留下了空间,而且还留下了一些明显的漏洞,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团体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改革后期,随着多党制政治现实的出现,各种社会组织和政党逐渐变成少数政治家手中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权实行监督、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途径事实上已被切断,政治斗争更加混乱无序。

## 二、从议会制到总统制

改革后期,整个改革进程开始失控。面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苏联当权者开始考虑恢复和加强联盟国家的权威,以摆脱深刻的危机。

在联盟国家权力和威信受到各加盟共和国的挑战而日益陷入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并没有认真总结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没有正视前一段工作的问题、疏漏、缺陷,更没有分析一下这种改革计划是否符合苏联国情,而是仍然坚持急于求成的思维定势,把一切希望国家安定、保持苏共领导权、反对“激进改革”的人和力量视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在思维模式和政治选择方

面越来越趋于“激进”，进一步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逐渐抛弃苏维埃制度，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频繁变动国家权力结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第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转移的结果是，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不能正常发挥其管理国家的职能，国家逐渐陷入失控的境况中。在此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并没有从完善苏维埃政权体系本身、提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效率、认真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制定并实施改革战略，将各种政治斗争、民族运动纳入法制的轨道，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国家的政体模式，试图采用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方法来摆脱困境，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sup>①</sup>此时，苏共领导人已不再从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上来考虑改革和完善苏维埃制度，而转向从权力制衡方面去寻找出路了。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苏共领导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二，频繁变动国家最高权力系统，国家权力缺乏稳定性，使国家管理机构不能正常行使其管理职能。1985年以后的苏联先后四次修改、补充宪法，每一次都涉及国家权力机构这个重大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不断出台。而许多职务和新建立的机构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又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如总统制建立后，苏联总统和部长会议之间的权限出现重复，又未规定隶属关系，致使不久后又修改宪法，把部长会议改为内阁，确定了对总统的隶属关系。这种不断的变动不能不对国家管理工作产生

---

<sup>①</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随着苏共领导作用的迅速消失,国家权力系统处于各种政治派别争夺的中心。首先,立法权的拥有者——议会(最高苏维埃)成为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争斗的场所,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闹独立并宣布本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下,苏联的立法机关实际上已形同虚设。最后就连苏联解体这种纯属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也无需经由它批准和宣布。其次,行政权的拥有者——苏联总统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苏联共产党,而变得无足轻重了。本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后来还掌握了一部分立法权。但由于他思想认识、政治素质以及领导能力方面的各种错误和缺欠,他不想、其实也不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统一。再次,司法权的最重要行使者——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就遇到了各加盟共和国挑起的“法律战”、“主权战”,根本无法正常行使护宪职能。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对苏联总统与九个加盟共和国总统发表所谓“9+1联合声明”这种明显侵犯苏联议会立法权的做法也无能为力,更无法监督和阻止宣布苏联解体这种从宪法角度来看明显违宪的行为。

#### 第四节 政治改革导致的权力 斗争和全面失控

苏联政治领域改革最重大的失误在于,苏共领导人在发动和领导政治改革的过程中过于迷信群众的自发性,整个改革进程缺乏循序渐进的步骤;鼓吹甚至神化民主化、公开性的作用,在并没

有充分把握的情况下全面展开对从上到下所有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自由选举,使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作用的国家权力机关的讲台上,引发了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从而使改革进程和整个国家社会生活陷入失控状态。

为迎接1989年5月—6月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1988年12月,苏联开始了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这次选举由于采用了新的差额选举制,从而使社会的“政治热”迅速升温。在争论已经开始、社会政治多元化已初步形成的情况下,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受过苏共批评、受过组织处分的人得到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当选为人民代表。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叶利钦和萨哈罗夫。这与几十名苏共提名的党委书记落选形成鲜明对照:参加竞选的12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中11人当选,落选者为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里·索洛维约夫;150多个苏共州委书记中,当选的不足120人。<sup>①</sup>

各种派别、团体的代表,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纷纷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改变了过去苏维埃清一色是共产党员的格局,议会斗争已不可避免。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新型”议会的形成,各种观点不同、信仰各异的人聚集一堂商讨国家大事,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分帮结派。当一些人民代表还在反对“贴标签”、不赞成把人民代表分为“革命派”和“保守派”之时,1989年7月29日—30日,大约二百四十名“激进的”人民代表举行会议,组成了一个以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五人为首的跨地区议员团。

---

<sup>①</sup> 关于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结果,详见[苏联]《真理报》1989年4月4日。



跨地区议员团的出现,引起了一些人民代表的警觉,他们认为这个议员团企图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内部建立第二个最高苏维埃。<sup>①</sup>叶利钦则表示,该议员团组合了不满于改革速度的人民代表,“我们的目的决不是要分裂最高苏维埃,建立反对派,夺取政权”。<sup>②</sup>跨地区议员团出现后不久,先后又涌现出了其他各种议员团,后来发展到大小23个之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联盟”议员团、共产党议员团等等。<sup>③</sup>

作为苏共潜在的反对力量,跨地区议员团竭力主张扩大和深化对国家的“改造”。萨哈罗夫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取消规定共产党在苏联社会和政治体制中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问题,认为这一条款妨碍着党政关系问题的解决,并公开声称反对苏共的“权力垄断”。<sup>④</sup>

政治领域的改革使党和国家偏离了经济改革、经济建设这一主要的工作。而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苏共对国家的领导,促进了政治斗争的发展,而且是向着不利于苏共的方向发展。苏联国内形势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不断“激进化”,各种机构设置重新结构、反复变动,各种政治势力争斗不已;另一方面,改革未能给人民带来任何经济实惠,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食品、消费品供应更加紧张。公开性、民主化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不受约束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

① 参见[苏联]《莫斯科新闻》1989年8月2日。

② 同上。

③ 参见[苏联]《国际文传电讯》1991年7月11日。

④ 参见[苏联]《消息报》1989年6月11日。

就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1989年夏秋季,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浪潮。这一事件不仅给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标志着过去那种由共产党领导的苏共一政府—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等)—劳动集体—整套组织体系发生动摇。在这场罢工运动中,苏共的威信迅速下降;舆论工具逐渐摆脱苏共的控制,开始作为“独立”力量推波助澜,对苏共施加压力;随着原有的工会组织威信的下降,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脱离苏共领导的独立的工人运动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罢工浪潮为业已形成的苏共反对派提供了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苏共党内“激进派”借机扩大自己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1989年7月29日,叶利钦在跨地区议员团成立大会上公开表示支持工人罢工,声称:“党这个贵族阶层已构成一个阶级。这次工人运动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个阶级的,尽管工人们尚未认识到这一事实。”显然,“激进派”正在竭力把工人运动引向与苏共对立的立场上去。而苏共对此并未做出像样的反击,从而助长了反对派和各种非正式组织、民族主义团体的活动。公开性、民主化束缚住了苏共的手脚,却丝毫没有约束反对派势力的活动。

在苏共面临来自党内和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严重挑战的形势下,苏维埃联盟国家受到一些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大压力。在1990年的苏联地方选举中,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通过选举执掌了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他们的推动下,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发表了各自的“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高于全联盟的宪法和法律,从而加快了联盟解体的进程。

作为苏维埃联盟国家支柱和基石的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对苏共和联盟中央更为不利。继激进民主派在俄罗斯人民代表选举中取得初步胜利之后,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叶利钦又获得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领导职位。1990年5月底,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过程中,苏共纲领派的候选人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在第一、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的支持票从497票上升到503票,反对票从535票下降到529票;而苏共纲领派的人民代表、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的支持票从473票下降到458票,反对票从559票增加到574票。<sup>①</sup>在第三轮选举中,苏共中央推荐的候选人、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与叶利钦竞选,结果叶利钦以535票赞成、502票反对战胜弗拉索夫,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弗拉索夫的支持票仅为467票。<sup>②</sup>叶利钦的当选,使苏共丧失了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权。与此同时,民主派还控制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大城市的苏维埃,民主派代表人物波波夫、索布恰克分别当选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并于就任后不久发布了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所有这些,使得苏共和联盟中央的处境越来越困难,联盟中央也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阻止国家的分裂,然而收效甚微。

<sup>①</sup> 参见[苏联]《真理报》1990年5月25日、26日、29日。

<sup>②</sup> 参见[苏联]《真理报》1990年5月30日。

## 第二十六章 改革时期的苏共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巩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有赖于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存在和它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有赖于由共产党起核心作用的政治体制的运转。当然，苏联共产党作为在十月革命后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不论在治国的路线与方针政策上，还是在党本身的建设上，也有过不少失误和错误，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在不小程度上还受到了腐败和特权思想的侵蚀，在领导制度和领导作风上，最高领导人的家长制与个人迷信之风相继不衰。所以，苏共要领导苏联的改革，苏共本身在思想路线与方针政策、组织路线与领导制度、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等方面也必须进行改革。如果苏共不能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搞好党内的团结，就不可能带领全国人民去实现改革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苏联改革的失败、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党内。从苏联几十年的兴亡史看，可以说，苏联的“兴”，兴于苏共，苏联的“亡”，也亡于苏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总结苏联的教训时说：“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sup>①</sup> 这

---

<sup>①</sup>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俄罗斯]《真理报》1995年10月24日。

一论点相当深刻地揭示了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实质原因。所以我们研究苏联的“亡”，就必须研究苏共在历史上的发展和演变，研究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分化、分裂、衰败和瓦解的过程。本书前面几章实际上已涉及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一些问题，本章就集中探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的衰亡过程。

## 第一节 苏共的队伍从分歧走向分裂

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论是进行革命和建设，还是进行改革，苏共队伍的团结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团结则事业成，分裂则事业败。戈尔巴乔夫六年改革的失败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六年是苏共从上层开始到各个地方组织从分歧走向分裂的过程。

第一，苏共最高领导层——苏共中央政治局很早就开始出现分歧和分裂。1984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葛罗米柯等老一代领导人的相继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开始完全由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组成。他们有的是来自州和共和国一级党的领导人，有的是来自国营大企业与政府经济部门的领导人，有的是来自学术部门与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人，有的是来自安全和军队部门的领导人。他们上台时对苏联当时国内的严峻形势和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是有共同认识的，也都认为苏联不能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需要进行改革，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也是拥护的。他们中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在较早的时候就已在苏共中央工作，其他人则是后来进政治局的。此时，苏共上自政治局，下至各级党组织，还是团结的。戈尔巴乔夫对苏共还表示很有信心。在1985年3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

他说：我们更尖锐地感觉到，共产党员的队伍是多么强大，多么团结一致，我们的苏联人民是多么同心同德。在不久前举行的选举中，苏联人又一次表现出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的一致支持。”<sup>①</sup>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他又说：“苏联共产党今天拥有 1700 万党员，他们有着统一的目标、意志和纪律。”<sup>②</sup>他还强调党是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说：“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进程。”<sup>③</sup>但是改革开始后不久，政治局成员在改革的方向、速度和方针政策等问题上就出现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公开。早在改革初期，在按加速战略的要求制定经济计划时，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速度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在政治局内形成了所谓的“保守派”和“激进派”。1987 年又爆发了叶利钦事件，叶利钦因同政治局一些成员有分歧要求辞职，而中央全会则对他组织了围攻。这之后叶利钦就以反腐败、反特权的造反派姿态独树一帜。1988 年，《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真理报》发表文章进行反击。这时政治局内的分歧就暴露在全党和全国而前。政治局内的分歧未能解决，后来又与党内和社会上的意见分歧遥相呼应，结合在一起，这是苏共后来出现派别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苏共领导人和苏共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革出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不是和衷共济、互相支持、团结协作、共同去克服困难，而

① [苏联]《真理报》1985 年 3 月 12 日。

②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二十七次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真理报》1986 年 2 月 26 日。

③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和新思维》，第 63 页。

经常是互相埋怨、互相指责。这一点在戈尔巴乔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应该说，苏共广大干部是愿意改变苏联现状和进行改革的，他们中大多数也是听从苏共中央的，尽管他们身上有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影响，对新的形势和要求也有不适应的地方。由于他们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不够明确和理解，因此他们在许多次中央全会和苏共的会议上常对苏共中央提意见，认为中央的改革纲领和计划不明确，要求中央下达更具体的指示。对长期只习惯于按上级指示办事的苏共下层干部来说，提出这些意见和要求，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很难接受这些意见，总是指责下面的干部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不能独立开展工作，行动迟缓，坐失时机。综观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在苏共各次中央全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领导人和下级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矛盾始终存在，而且愈演愈烈。逐渐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心目中，大批下级党政干部都成了旧的行政命令体制的维护者，成了维护自己地位、抵制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甚至于认为苏共是改革的“阻碍机制”。这样打击一大批，势必加深而不能缓和中央领导和下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涣散而不是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

在导致苏共领导层和广大干部队伍的涣散和后来的分裂问题上，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他的个人性格对此也有着十分消极和有害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一些苏共领导人虽然以“民主”倡导者自居，但他们并不认真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无视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呼声。他们虽然指责斯大林等苏共前任领导人的独断专行、不民主，其实他们自己也未摆脱过去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戈尔巴乔夫批评过去苏共领导人的一

言堂,实际上他搞的是他自己的一言堂。许多材料都说明,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常常只有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别人无法发言,很难形成正常的民主讨论。他不善于团结同志,他周围的一些人在几年时间中都纷纷离他而去。他的理想主义、唯意志论、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等毛病,也是涣散苏共领导集体和干部队伍的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 第二节 落伍和涣散的“先锋队”

苏共广大党员在苏联历史上各个时期,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都在各个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表现了巨大的战斗力和劳动英雄主义。但是党的各级机关也逐渐地沾染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年代,更加缺乏生动活泼的气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新领导人上台后,党内曾出现一些新的气氛。但是改革起步的失败、苏共高层领导中政见的分歧和矛盾的发展、在党内和整个社会上对苏联历史问题展开的大争论和对党的阴暗面的大量揭露,这一切不能不对整个苏共产生十分消极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在改革时期,苏共不仅未能克服以前的痼疾,反而增添了新的病症,党的肌体受到严重损害,战斗力不断下降,党内危机不断加深,“先锋队”日益落伍和涣散。在党内外反共势力的联合进攻中,苏共不断分化、分裂,直至最终自行瓦解。

第一,苏共领导层在有关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分歧不断加深。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败坏,党的纪律对这些“要员”没有多少约束力,致使党内健康力量的声音往往被时髦的“激进”言辞所淹没。在社会上政治“过热”、民众中激进情绪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党内“激进民主派”逐渐占据了优势,而作为苏共中央总



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奉行“中间路线”，在客观上帮助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使这派力量迅速坐大。苏共领导层的动摇、分裂，将苏共和苏联社会带入政治动荡之中，引发并加剧着苏联社会的分裂。

第二，长期以来，苏联党政干部生活待遇特殊化问题一直十分严重，党的领导干部脱离普通党员群众、党脱离人民群众的趋势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而在不断发展。与此相适应，共产党在苏联普通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呈逐渐下降趋势。毫无疑问，苏共干部绝大部分当初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苏共干部政策方面的种种弊病，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蜕化变质，从而在苏联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由中高级领导干部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组成的、脱离群众、只关心个人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特权阶层。改革时期，这个特权阶层更多的是关心保持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现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党和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往往患得患失、“顺应潮流”、见风使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很早就抛弃了以前的信仰。也有一部分党员本来就是为了个人的仕途而入党的，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无坚定信念，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容易与党分道扬镳，转而走上摧毁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在社会经历大变革、直至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关系网、社会地位等等，获得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好处。目前俄罗斯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中，有2/3的人都是苏联时期的党政机关要员，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即使一些多少有些“良知”的人，也不过是厌烦政治、远离政治生活而已，而在原苏联党政干部中，敢于奋起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化的毕竟是少数。从总体上说，苏联特权阶层的利益取向的变化对苏共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苏联改革转入政治领域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经济连年下滑,民族矛盾、冲突迭起,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苏共党的基层组织人心涣散,党的工作陷入瘫痪,丧失了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况且这时党的方针政策也往往是自相矛盾、不符合苏联的社会实际。此时苏共已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普通党员思想混乱、迷惘,大批党员对党和国家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脱党。1990年,退党人数多达一百八十多万人,苏共开始从内部瓦解。

###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 改革和苏共地位的变化

如果说在1988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改革,他在改革干部政策和党内选举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监督等方面基本上还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的话,那么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特别是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党的改革问题上的错误就越来越发展和突出了。他们在党内“激进”势力的压力下,从改善党的领导转向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根本改变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党的自身改革变成了党的自我否定、自我取消、自我瓦解。

第一,苏共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错误地将划分党政职能变为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机械地套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从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这个极端走到放弃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另一个极端。苏共在苏联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变

再变,最后仅仅等同于一般群众性社会组织,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苏共权力削弱和逐步丧失的开端。代表会议决定将全部权力“归还”给苏维埃,规定党的职能应是政治先锋队,而不是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的政治方针;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都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结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研究解决,党不能做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长期由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本来,使苏共从日常具体的国家和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不再对各方面的具体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和面面俱到的参与、领导,当然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苏联的做法并非就此止步。在权力重心转移过程中,由于苏共领导人的各种失误以及政治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不利于苏共的变化,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处处受到反对派甚至苏共领导人自己的抵制、排斥。放弃对具体事务的领导逐渐变成了对任何国家和社会事务均无发言权,更无领导权。苏共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了。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宣称:“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将自己的代表推举到人民代表苏维埃。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

的特殊地位。”<sup>①</sup>随后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六条；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社会固体(政党)法》以及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以宪法、法律和党的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把多党制固定了下来。

苏共领导人将“自由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自觉地”取消苏共长期占据的“垄断地位”，将苏共与其他各种社会政治组织摆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并期望苏共能够适应这种激烈的竞争，保持住政权。苏共领导人这种“一厢情愿”的决策一方而反映出，他们对苏联当时的实际状况、对苏共所面临的严峻局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估计不足；另一方而也反映出，由于前一阶段的失误，政治斗争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苏共领导人原本所固守的防线受到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已无法再坚守下去，而只得被迫放弃。

随着苏共党内分裂的加剧，以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为宗旨的各种政党、团体、运动大量涌现，然而当时力量最大、对苏共真正构成威胁的还是苏共党内民主派。所有这些苏共的异己力量利用苏共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借助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展开自下而上的与苏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通过“自由”选举，苏共从1990年开始便一步一步地丧失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在俄罗斯大、中城市的执政地位。

第二，对党自身的“改革”导致党内各种思潮泛滥，苏共开始分化。苏共领导人在苏共党内民主派的压力下，不断妥协、退让，为弥

---

<sup>①</sup>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苏联]《真理报》1990年2月13日。

合党内裂痕,维护党的表面上的统一、一致,顺从反对派意愿,主动或被动地“校正”党的坐标,逐渐改变了党的性质,使党丧失了战斗力,越来越脱离群众。这样的党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打击下,显然已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更谈不上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总的”政治领导了。

改革时期,社会思想异常活跃,社会上各种思潮、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而且,作为聚集了“社会精华”的执政党的苏共,其内部,尤其是党的上层,围绕着改革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观点、看法、思想。各种思想的碰撞、交锋对改革大局、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社会面临变革的紧要关头,出现各种思想、发生思想交锋和冲突并不奇怪,关键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特别是其领导人如何把握大局,引导全党和全体人民把力量放在推动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上去,而不应是一味地纠缠所谓的“理论问题”、“历史问题”,置社会经济生活于不顾。同时还应根据改革现实生活的需要,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目的当然只能是加强和完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苏共自身的“革新”逐渐走入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取消作为党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制,为党内不同声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缺乏必要的组织约束,任意的党内“民主”,造成了党内派别的形成,各派之间的争斗加速了党内分歧和党的分裂,而这种分歧和分裂又反过来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从而一步步将苏共推向自行瓦解。在此过程中,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日益壮大的民主派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在苏共发展的大方向上主要参照民主派的意见,对苏共进行不断“革新”。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标志着苏共的“彻底革新”已由党的纲领性文件的

形式确定了下来。根据这一文件,苏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党的地位和性质:随着规定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地位的宪法第六条的被取消,苏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苏共坚决舍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地位,舍弃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将苏共改造成为能够表达并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在公民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名符其实的政党。”<sup>①</sup>在这里,苏共不再是“把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部分联合起来的、苏联人民战斗的久经考验的先锋队”,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党”、“全体苏联人民的党,”<sup>②</sup>更不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sup>③</sup>了。

(二)党的指导思想: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思想来源多元化的观点,“主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建设性地反思 20 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摆脱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利用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必须利用世界各国在有效的经营管理、解决社会问题、发展民主制度方面所积累起来的经验。”<sup>④</sup>实际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0 年俄文版,第 83 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章程》(1961 年 10 月 31 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01 页。

③ 参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1977 年 10 月 7 日苏联第九届最高苏维埃非常第七次会议通过)第 6 条,《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42 页。

④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 1990 年俄文版,第 71 页。

上,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加进了一系列西欧社会民主党以及西方其他的思想内容。

(三)党的奋斗目标:虽然仍提“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政党”<sup>①</sup>,但苏共所向往和追求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把实现人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四)党的组织原则:主张实行党的民主化,“坚决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sup>②</sup>代之以民主制。

第三,虽然苏共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实行党内民主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然而事实上,苏共仍然沿袭了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甚至总书记一人手中的传统。苏共、特别是其领导层,始终未改变决策不民主、不科学、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盛行的状况。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改革初期虽然宣称“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但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实践中从未认真依靠全党和党组织来推动改革。他掌握着党的最高领导权,却未能领导苏共去认真、客观、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和实际经验,制定明确的改革战略,而是随心所欲,把自己的意志和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极为错误的东西强加给党。从他上台后不久提出的“加速战略”,到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直至1991年“8·19事件”后在没有召开任何党的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自行发表声明“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所有这些都表明,戈尔巴乔夫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0年俄文版,第7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4页。

始终在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代替党的意志。

#### 第四节 苏共的派别化和联邦化

随着改革陷入困境，苏共党内分化日趋严重。到1989年，尽管苏共领导人还在竭力掩盖矛盾、维持党的领导层表面的团结一致，苏共党内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就是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即民主派；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这派被民主派称为“保守派”、“反改革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中派”，亦称苏共“主流派”。前两派开始时是在改革的速度、方针政策上针锋相对，随后便发展为围绕着改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尖锐对立，而“中派”则时左时右，摇摆于两派之间，寻求与“激进派”的妥协，并逐渐向“激进派”倾斜。1989年下半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苏共党内民主派大受鼓舞，加紧向党内“保守力量”发起进攻，企图夺取党和国家大权。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前后，为迎接苏共二十八大，党内各派先后提出了各自的纲领，苏共党内派别化进一步公开化了。

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以“苏共民主纲领派”的名义于1990年1月提出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民主纲领》，声称：“今天，当极权制度和我們以前的整个发展模式已陷入危机的时候，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党的新斯大林主义、反民主的模式及其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完全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进程。”“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结构，是同千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和改革的需要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直接相抵触的。”因此，“激进派”“主张对苏共进行根本改革，使之



成为在多党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型的现代民主政党”。<sup>①</sup>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sup>②</sup>该纲领反映了苏共“主流派”的立场和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其中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承认并接受了苏联社会业已形成的多党制现实，提出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问题，放弃苏共在苏联社会和政治体制中“独占”的领导地位；第二，试图以三权分立原则重新构筑国家权力结构，提出设立总统职位。同年3月12日—15日，苏联召开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中规定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条款，并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的结果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1990年4月中旬，苏共党内的正统力量“马克思主义纲领派”（“马克思主义党的俱乐部联合会”）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该派提交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sup>③</sup>该派主张恢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结合世界的不断变化而不断革命化；主张仅在过渡时期允许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反对全盘私有化。同时，这派的纲领与苏共中央的纲领草案有不少共同之处。

随着形势的不断复杂化，苏共党内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各种派别不断涌现，党的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已无从谈起。苏共组织纪律性受到削弱和破坏，苏共的派别化和联邦化倾向不断发展。

---

① 苏共民主纲领派《向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主纲领》，[苏联]《真理报》1990年3月3日。

② 参见[苏联]《真理报》1990年2月13日。

③ 同上1990年4月16日。

苏共领导人一再强调：“党的革新要求对党进行深入、包罗万象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党员群众的权力上面。”并认为，“这将有助于苏共这一完整组织的巩固，提高它在人民当中的威信”。<sup>①</sup>然而，事与愿违。片面强调党内“民主”，不讲党的组织纪律，否定、取消民主集中制，把任何要求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的呼声视为“保守”、斯大林“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残余，所有这些，使得苏共越来越失去工人阶级先锋队、社会先进部队的特性，而变成一般性的社会团体和“争论俱乐部”。

过去，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党的组织从上到下培养出了一种绝对服从和盲目服从党的决定的风气，党的生活缺乏生气，上层领导为所欲为，犯了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普通党员群众缺乏政治积极性。“党确实是统一了，但这种统一是靠取消一切民主讨论党的政策的机构，以及不断消除和在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来达到的。”<sup>②</sup>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可能长期保持没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状况。苏共党内早在50、60年代就存在着一些思想和政治派别和集团，只不过是公开自己的纲领罢了。以往由于有党的纪律约束，苏共党内控制严格，不允许派别存在，保持了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强制性，党内很少有正常的不同意见、观点的表露和思想交锋，这极大地影响着党内民主和党自身的发展。

改革时期，国家和社会面临着为数众多的问题，社会上和党内

---

<sup>①</sup> “关于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年2月5日），[苏联]《真理报》1990年2月6日。

<sup>②</sup> [苏联]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史正务等译：《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看法、不同观点,这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苏共领导人应对党内意见、观点进行引导,使之有利于改革,有利于党的建设,而绝不能任其自由泛滥,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苏共领导人推行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将党等同于一般群众组织,以“民主”作为党的活动准则,放松甚至放弃对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组织纪律要求,任由党内“自由”争论、“自由”结派。苏共领导人虽然在口头上也反对党内派别活动,但始终未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一味地迁就、退让,致使苏共党内派别化倾向不断发展并提出了各自的纲领。

苏共派别化是苏共瓦解的决定性原因。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纪律约束,党内各种派别之间,特别是“民主派”与“正统派”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而所谓的“主流派”实际上又是试图走中间路线的力量,它特别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更多地并越来越多地向“民主派”靠拢。这种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完整统一,使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同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带动了社会的政治分化。

在苏共遭受党内派别化折磨的同时,另一种直接威胁着苏共组织统一的倾向也形成并迅速发展,这就是苏共“联邦化”倾向。它对苏共组织的破坏作用不亚于派别化倾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生存造成的威胁更为直接,这一倾向恰与一些加盟共和国中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相吻合。可以说,苏共的“联邦化”是苏联解体的序幕。

苏联是联邦制国家,而苏共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原则,作为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而建立的统一政治组织。因此,苏共不仅是团结苏联一百多个民族中优秀分子的政治先锋队,而且是维系联盟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随着改革陷入困境,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中

要求按联邦原则组建自己的共产党组织的要求也提了出来。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为苏共的“联邦化”提供了条件。在同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立陶宛共产党发生分裂，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布拉藻斯卡斯为首的多数派主张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而独立，并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了立陶宛共产党独立宣言，宣布苏共立陶宛共和国组织已成为具有自己纲领和章程的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sup>①</sup>立陶宛共产党的独立揭开了苏共联邦化的序幕，各加盟共和国的党组织纷纷效仿。1990年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苏共联邦化的最终完成。

苏联在法律上和形式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其成立过程中，列宁等领导人始终坚持共产党组织不能像国家体制那样实行联邦制。“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共产党，它有领导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部分党的工作的统一中央委员会。党的各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不管其民族成分如何。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享有党省委员会的权利，并完全服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sup>②</sup>道理很简单，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俄国共产党必须团结统一，而不能按民族、民族国家划分。否则，必将对联邦制国家的统一、存在造成消极影响。

<sup>①</sup> 参见[苏联]《苏维埃立陶宛报》1989年12月21日。

<sup>②</sup> 《俄国共产党(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19年3月22日)》，《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唤起了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注,使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普遍增强,而且也唤起了民众的民族意识。这不仅使一些政治派别、政治力量有了生存、发展、甚至与苏共争夺国家各级权力的可能,而且也使各种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派别和力量获得了打着“改革”旗帜在本民族和本民族共和国广泛开展活动、影响当地民族人群社会意识的机会。

与此同时,苏共内部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改革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种情况:

第一,一部分较发达地区的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党组织中,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当地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在立陶宛是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的活动。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开始时还只是要求联盟中央下放经济权力,这符合改革的需要。随着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它们便相继“顺应”或者说迎合当地民族主义势力的要求,逐渐提出共和国独立、退出苏联的政治要求。共产党组织相应地发生分裂。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在其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为维护苏共组织统一、反对立陶宛共产党独立于苏共的“苏共纲领派”和要求立陶宛共产党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独立派”。由此,开始了苏共“联邦化”进程。

第二,改革时期,历史上遗留的一些民族纠纷、民族矛盾开始爆发,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争端。这一争端始于1987年10月,后来由危机发展到流血的武装冲突。在此问题上,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站在各自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使得两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双方的党组织实际上也已处于对立状态,苏共的团结、统一已无从谈起。

第三,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的浪潮中,苏联最大的加

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民族主义受到强烈刺激,民族情绪日益高涨,而作为苏共最大党组织的俄共历来直接归苏共中央领导,没有自己的党中央,只有俄罗斯局。1990年8月,俄共中央成立。不管其愿望如何,俄共中央的成立完成了事实上的苏共联邦化进程。俄共议员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主权宣言时对此宣言投了赞成票。俄共作为苏共最大的一个共和国组织,实际上已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处在对立面。此后,苏共便更加一蹶不振,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苏共领导人“革新”苏联共产党的实践最终使共产党陷入绝境。一些人设想在苏共身边增加一些竞争者,以便使苏共克服党内生活停滞现象、焕发活力的“良好愿望”未能如愿,相反,却使苏共陷入灭顶之灾。而苏共的不断衰弱,直至瓦解,不仅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改变国家社会制度扫清了障碍,而且也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摧毁联盟国家扫清了障碍。1991年“8·19事件”后,苏共自行瓦解;同年12月,苏联便正式解体。这两个重大事件间隔短短几个月相继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 第五节 苏共的瓦解

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各自的“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之后,联盟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不利于前者的变化,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法律战”、“主权战”极大地影响了联盟中央的权威。在此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对各加盟共和国一再让步,希望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维系松散的联盟关系。在苏联领导层中,不少人不满于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等民主派、民族主义势力一味退让、妥协的做法,他们要求通过加强国家权力来恢复国内秩

序,维护联盟的统一。他们也曾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然而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越来越倒向民主派一边的趋势,最终使他们失去了耐心。1991年8月,正是在原定签署使联盟中央权力进一步缩小的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前一天,“8·19事件”发生了。

“8·19事件”前,苏联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危机一直处在渐变过程中,而“8·19事件”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其发生了突变。尽管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以苏联国家领导人的名义、而不是以苏共的名义发动“政变”的,尽管苏共中央在整个事件中态度暧昧,在事件已见分晓后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进行了谴责并建议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尽快审议参与“违宪活动”的苏共党员的责任,尽管在事件过程中广大普通共产党员和党组织保持沉默,并未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给予有力的支持,甚至不少普通共产党员站在了民主派一边,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还是借反“政变”胜利之机对苏共发动了致命的攻击。

1990年,随着俄罗斯一步一步走向独立自主和俄共的成立,联盟中央和苏共中央逐渐被架空。“8·19事件”后,联盟中央的地位大大下降,权力进一步萎缩,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的地位迅速上升,国家的实权开始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掌握。在趁机扩大俄罗斯联邦权力、将一些全苏的职权和财产占为己有的同时,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开始对苏共和左翼力量进行清剿。

叶利钦把“8·19事件”归罪于苏共,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违宪行动”都得到了苏共领导中“新斯大林主义”核心的秘密批准和暗地里的支持,借此签署一系列命令,宣布苏联武装部队里的苏共基层组织为非法;暂停《真理报》、《苏俄报》、《公开性》、《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等的出版,取缔苏共的全部舆论工具,没收苏共的全部财产;查封苏共中央、俄共中央和

俄共莫斯科市委办公大楼；同时中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

在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声明退出苏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白俄罗斯、爱沙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共产党被中止活动。在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立陶宛共产党和拉脱维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阿塞拜疆共产党自行解散。哈萨克共产党改名为哈萨克社会党，乌兹别克共产党改名为乌兹别克人民民主党，塔吉克共产党改名为塔吉克社会党。

在苏共承受着来自外部的、掌握着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国家政权机关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势力巨大压力的时候，作为苏共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却于8月24日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声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同时发布命令，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联内务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其他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并请求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准许其举行全会或其他组织措施以讨论党今后的命运。8月29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11月5日，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解散它们的组织机构。在党内上层领导和党外反共势力的双重打击下，有一千五百多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但是，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就这样被消灭的。

其实，早在苏联社会逐渐形成多党局面、苏共处于分化瓦解状态的1990年，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便开始出现自己的“多党制”。一些苏共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不满苏共领导人的方针



政策,酝酿组成志同道合者团体。

“8·19事件”后,左派力量迅速行动起来,利用合法斗争手段与反共势力展开了顽强的斗争,首先是争取共产党组织的生存权。苏联人民代表、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在苏联第五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慷慨陈词,抗议当局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做法,指出禁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是非法的和专制的。随后,麦德维杰夫等人向苏联司法部提出了审议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是否合法的诉讼,并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争得了建立左派、共产党组织的权利。

从1991年9月起,在苏联各地,一大批左派政党和团体相继成立,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劳动党、苏联共产党人联盟、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左派共产党人重新联合、组织起来,开始与掌握着国家领导权的民主派展开新一轮斗争。

## 第二十七章 改革时期的社会和社会分化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逐步“深入”，不仅导致苏共领导层和党内出现了意见分歧，而且也引起了社会的意见分歧和思想分化。随着并无多少成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结构、社会意识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处于不断的分化过程中。在苏共及其领导上层争论不休、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同时，社会情绪也出现了“激进化”趋势，成为促使国家政治制度发生剧变的社会基础。

###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及“新的” 社会阶层的出现

改革以来，随着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批判和改革，社会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原先那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逐渐被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所取代。“改革开始前形成的各社会阶层的对比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呈金字塔形。金字塔的顶端由政界、意识形态界和管理界的精英们占据，他们人数不多，但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中履行分配和重新分配各类财富的主要职能。金字塔宽阔的下层部分由劳动群众组成，他们被剥夺了占有和支配财产的权利，完全听命于管理人员的分配职能。业已形成的社会

结构的特点是,作为它主要构成基础的不是根本的经济因素,而主要是上层建筑因素,如分配关系以及具有非经济性强制和个人相互依存形式的非商品交换。”<sup>①</sup>

在改革初期,还可以大致将苏联各社会集团划分为三大部分,即“在社会生产中从事熟练劳动的大多数职工,不分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还是经济领导人员,都是党完善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支柱,也就是为国家的未来,为国家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而斗争的社会支柱”。“第二部分是由这样一些社会成员组成的,他们准备更紧张、更有效地工作,但不是在公共条件下工作,而是在社会生产部门之外,即以个人副业、家庭承包,季节性的建筑队、各种各样的包工等形式进行工作。”“第三部分是由这样一些阶层组成的,他们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们紧紧抓住过时的东西不放,千方百计地阻碍进步的改革,况且他们也有条件这么干。这部分人首先是中央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换句话说,就是近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大量滋生起来的官僚主义者阶层。”<sup>②</sup>

在改革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长期维持国家稳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开始发生动摇和变化,政治羁绊和一些国家制度也发生了动摇和崩溃,而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却没有改变。但这并不妨碍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某种变化,并不妨碍“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

---

① [俄罗斯]Л. 别利亚耶娃:《俄罗斯面临历史性选择》,[俄罗斯]《自由思想》1993年第5期。

② [苏联]B. 格洛托夫、T. 扎斯拉夫斯卡娅:《转折时刻的社会政策与劳动问题》,[苏联]《科学与生活》1987年第10期。

首先,在新出现的阶层中,转变最迅速并且最具有政治影响的是苏联的经理阶层。改革伊始,“苏联的经理就开始由经济官僚工作人员阶层迅速变为一种‘国家资产阶级’。许多工业部及其下属机关变成了康采恩,工厂经理可以独立地决定许多种产品的价格并进行对外贸易活动,他们不再认为自己一定要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指示为顾主提供产品”。然而,“这种形式的私有化绝不会把从旧的官僚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变为正常的市场企业家。这个阶层曾同国家保持紧密的社会和心理联系,并且绝不准备割断这种联系,它继续把这种联系看作是自己的物质和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基础”。<sup>①</sup>显而易见,经理集团成为苏联社会中第一批“利益集团”中的一个集团,很快它便成立了独立于当局之外的自己的组织,并在经济改革问题上采取自己的立场。与此同时,这个集团内部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也不完全一致,并且不断发生着分化。

其次,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原先处于“地下”状态的各种“灰色”经济成分开始具有了合法的地位,小私有者阶层作为对原有的经济成分的补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由于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者并没有鼓励、甚至没有允许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畏缩不前,未能展开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还是集约化和加速机器制造业发展的计划,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完善现行体制上,从而影响了新的经济成分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直到1987年,才批准在有限的程度上建立合作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但是这种努力显然是半心半意的,在此之前的1986年,政府还在大力反对私营贸易。尽

<sup>①</sup> [俄罗斯]Г.季利根斯基:《俄罗斯的抉择》,[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3年第9期。

管如此,还是逐渐出现了独立于国家经济体制的企业家、实业家,但私营企业的比例在整个戈尔巴乔夫时期从未超过4%或5%。因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始终比较虚弱,无法与官僚制度和国家经理阶层的实力同日而语,而农业经济部门中的私营企业的地位则更为弱小。

原有的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尽管在阶级结构上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他们也未能对政治进程产生有目的的影响,但他们的政治取向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由政界、意识形态界和管理界的精英们所构成的社会整个“金字塔顶端”的情况看,可以说他们也在分化过程中,同时他们仍然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原先的党政高级干部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趁改革之机,利用他们手中的各种权力,“……盗窃正在沉没的社会航船上的财富,把他们常年积累的‘官名录资本’从党的账号上转移到与西方合资的、令人可疑的企业中去”。<sup>①</sup>从总体上看,党政“精英们”正在蜕化变质,逐渐变成了只关心权力和物质利益特权的阶层。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革都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面临着失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危险,相反,摧毁原有的制度,代之以资本主义,则会使他们成为私有者阶级,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取向。

在改革进程中,地方经济自主权逐渐扩大,掌握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党政大权和经济管理权的“地方精英们”独立自主地决定当地事务的权力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在1989年各加盟共和国人民代

<sup>①</sup> [苏联]A·索布恰克:《步入政界——关于议会诞生的故事》,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俄文版,第231—232页。

表大会选举前,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已经出现了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当地的党政领导人则往往利用这种民族情绪不断对联盟中央施加影响,争取获得更多的经济自主权。1989年加盟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主派人士和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代表人物进入加盟共和国代表权力机关,这些新的“地方精英”在逐渐排挤“传统的”地方“官僚”,摆脱苏共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开始维护并不断扩大自己通过“民主选举”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更加明目张胆地提出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政治要求。

## 第二节 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

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社会经济基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结构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意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多样化。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根基的苏联劳动者阶层在政治取向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1989年夏秋季爆发的大规模矿工罢工浪潮为标志,苏联工人阶级开始脱离苏共的政治领导,过去那种由共产党领导的苏共—政府—工会等社会团体—劳动集体的一整套组织体系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随着工会等原有的社会团体组织威信的下落,苏共及苏联政府对整个社会劳动阶层的影响力呈急剧萎缩趋势。在激进民主派的大力鼓动下,在“独立的”舆论工具的大肆渲染下,工人阶级队伍中开始出现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的要求,脱离苏共领导的独立的工人运动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开始时工人们更多地是注意自己的经济利益,对现有的生活、工作状况不

满,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激进民主派推波助澜的鼓动下,工人队伍也提出了政治要求,成为苏共和苏联政府事实上的“压力集团”。而工人队伍的这种政治态度的变化,又被主要是激进民主派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

第二,在改革过程中,思想最为活跃、对整个社会意识影响最大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知识精英”,这一集团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分化对改革进程的发展、演变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社会的知识精英在开始时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竭尽全力促进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发展。在1989年至1990年的自由选举过程中,许多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作家、教授、记者被选进各级议会和地方权力机关。然而,这一社会阶层的绝大多数人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而仅仅是充当了苏共的“反对派”角色,成为攻击和摧毁从“官僚制度”、斯大林体制到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权力结构中获得一定地位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知识精英”很快便将自己的利益主要集中于捍卫和巩固他们重新获得的物质和社会地位,事实上成为新的“民主”任命的官员的一部分。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在承受了不成功的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恶果之后,在政治上开始悲观失望,逐渐转到不满和敌视“新的”国家政权及其任何行动的立场上去。<sup>①</sup>

第三,苏联的经理阶层本身也出现了分化,其中与强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有关的企业的经理们在一般政治经济主张上趋向于强硬的保守立场,开始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要求保留现行的

---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Г.季利根斯基:《俄罗斯的抉择》,[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3年第9期。

经济体制。农业院外集团也持类似的立场。而另一些企业的经理们则遵循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立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针持拥护和支持的立场,其政治上的代表为以沃尔斯基为首的“苏联科学工业联盟”。<sup>①</sup>

第四,所谓“地方精英”,即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的领导者阶层的思想意识也在变化过程中。他们除保持着与苏联整个此类“精英”相同的各种一般特点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地方权力对联盟中央施加压力,换取更多的好处。

第五,在改革时期,苏联整个社会的政治取向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变化在思想活跃的青年一代中间更为普遍。大多数青年人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希望社会变革,甚至幻想成为“开放的”竞争社会的成功者,迷恋西方“大众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一般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持否定、批评态度。与此相对照的是,多数中老年人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社会弱势阶层,则在一定程度上留恋有保障的现行社会制度和秩序,并不十分热心于完全摧毁现行的社会制度,甚至还希望保留这种制度,以使自己的生活有充分的保证。随着改革逐渐陷入困境,整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当中对苏共和改革的不满情绪都在蔓延。

### 第三节 各种社会思潮的泛起与 社会情绪的“激进化”

随着社会结构、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

---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I·季利根斯基:《俄罗斯的抉择》,[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3年第9期。



并对推动苏联剧变和解体起了重要的作用。苏共领导人不仅越来越难以驾驭这些社会思潮,而且受制于一些社会思潮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势力。

改革时期需要解放思想,打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教条主义禁锢,抛弃陈旧的思维模式,开拓新的思路。然而,任何思想解放运动都应有一定的限度,社会主义改革条件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如此。正是由于在此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出现了重大失误,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随着苏联社会向外部世界开放,人们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原有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动摇,进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论是在苏共党内,还是在苏联社会上,传统观念中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对立已基本消失,而苏联需要战胜的头号敌人便是自己本身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导致国家始终难以摆脱困境。这种思想认识上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具有普遍性,它为后来苏联社会政治制度的剧变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此,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反而根据“改革的需要”,也在不同程度上传播类似的观点。一时间,正面的宣传教育遭到嘲笑,而各种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攻击却被视为“创新”,成为时髦。这不能不将社会情绪引向另一种方向。

在此大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出来。围绕着改革道路问题,社会主义改革思潮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丧失主导地位,激进民主主义思潮开始占上风。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以思想多元化为旗帜,号召和动员各种其他思潮,包括民族主义思

潮、各种宗教思潮以及绿色运动等等与“传统的共产主义”作斗争，使整个社会陷入思想混乱的状况中。

公众对原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所有国家行政机构持越来越不信任态度，为各类宗教和教会组织创造了趁机占据人们“心灵”的大好时机。1988年4月，戈尔巴乔夫会见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等宗教界人士，对斯大林时期对东正教教会的错误做法表示歉意，并允诺未来将会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此后，东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信教人数剧增。尤其重要的是，不少宗教界人士参加了各级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并进入苏联和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一些著名的宗教界人士不甘“清贫”的传教生涯，积极涉足“尘世”，成为积极的政治活动家。如激进民主派最大的社会组织——“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首领之一就是神职人员雅库宁神父。

宗教、神学世界观原则上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相对立的，它们虽有劝人行善、维持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在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人心。尤其是在宗教传统十分深远的苏联，各种宗教意识形态的迅速发展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改革时期，由于改革的不成功，苏联社会逐渐出现了这样一种态势：阻碍改革的保守主义思潮十分强大，破坏改革的极端主义势力、激进民主主义势力在不断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改革思想，即主张在社会主义体制内进行改革的思想派别却相对比较薄弱，并且越来越受到其他各种派别从“左”的和右的方向发起的攻击。由于多年的改革没有见成效，社会上多数人越来越对改革持观望态度。在各种思潮泛滥的背景下，改革逐渐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

从总体上看，苏联改革以后，整个社会意识和社会情绪一直沿

着不断“激进化”的方向发展。而在这里，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十分突出，正是这一阶层的“激进化”，使得改革进程日益有利于苏共党内激进民主派，从而使其后来成为决定“改革”命运的主导力量。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社会，反共、反社会主义以及“亲西方”的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时，“仍被共产主义幻想俘虏的人，只有百分之几了。共产主义在俄罗斯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共产主义教条已在人民心目中丧失了吸引力”。<sup>①</sup> 据社会学调查资料显示，1990年，有32%的人主张模仿美国模式，32%的人主张模仿日本模式，17%的人主张模仿德国模式，11%的人主张模仿瑞典模式，只有4%的人主张按中国方式进行改革。<sup>②</sup> 由此可见，走西方发展道路在当时的苏联社会几乎已成为了“共识”。

---

① [苏联]A.索布恰克：《步入政界——关于议会诞生的故事》，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俄文版，第232页。

② [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变化：社会舆论调查》1993年第6期，第14页。转引自[俄罗斯]B.索格林：《西方自由主义与俄罗斯改革》，[俄罗斯]《自由思想》1996年第1期。

## 第二十八章 民族矛盾——联盟 解体的导火线

苏联是根据列宁的联邦制思想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显然，对于苏联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处理好这一问题，特别是处理好主体民族——俄罗斯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各民族和睦相处，是保持社会安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前提。“民族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改革的致命问题。”<sup>①</sup>而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联领导人，在改革初期对民族问题重视不够，简单地重复其前任们对这一问题过于乐观的判断，认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sup>②</sup>而当民族主义兴起、民族冲突爆发、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大行其道之时，苏共领导人又被自己宣扬的民主化束缚住了手脚，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步步退让，任由联盟国家一步步走向衰败。

①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95页。

②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第71页。

## 第一节 历史遗留问题

作为一个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联盟国家，苏联在民族问题的历史上既有辉煌的篇章，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阴暗的“污点”。在这里，有沙皇俄国时期遗留的民族问题，也有苏维埃联盟国家建立以后、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民族问题方面出现的各种失误和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沙皇俄国是依靠武力征服、开拓疆土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十月革命前，俄国广大劳动群众不仅饱受沙皇政府的剥削、压迫，而且在民族关系方面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其中既有其他各少数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妥善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苏共在各个历史时期也做出过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苏共执政期间，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在民族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从国家体制、政治经济体制到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甚至还涉及外交政策领域。

第一，在国家结构形式上，苏联作为联盟国家，是以列宁的联邦制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从斯大林时期开始，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联邦制被事实上的单一制所取代，各加盟共和国自主解决本共和国事务的权力受到抑制。由于联盟中央事实上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致使在不少人看来，其他各加盟共和国是处于受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控制之下，各加盟共和国对俄罗斯人的猜忌、不满久已有之。正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后来所说：“由于斯大林的‘民族融合政策’（在实践中意味着俄罗斯化和压制民族自我意识）使族际矛盾变成了正在熊熊燃烧的社会火山

口,并随时可能引起具有致命后果的爆炸,这一切才是离心倾向的主要原因。”<sup>①</sup>在中央依靠庞大的组织系统、严格的纪律以及一整套政法机关对全联盟实行严密控制的情况下,各加盟共和国中的离心倾向受到抑制,但并未消除,而且还在积累和发展,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控制稍有松动,便会爆发出来。

第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各共和国和民族关系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消极后果,这种经济模式实际上剥夺了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处理本共和国经济问题的权利。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一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赫鲁晓夫时期,联盟部和联盟一共和国部所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97%,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3%。勃列日涅夫时期,联盟部和联盟一共和国部所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6%。<sup>②</sup>共和国所能支配的资产十分有限,却得承受由于兴建各种企业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本共和国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居民受益。<sup>③</sup>

第三,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弊病之一是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以强制手段强行搞经济建设,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过火行为,使各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

---

① [哈萨克斯坦]H. 纳扎尔巴耶夫:《从帝国联盟到独立国家联合体》,《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2年3月10日。

② 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③ 参见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第214页。

族地区都受到了伤害。而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党内斗争也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滥施暴力的做法,直接影响了民族关系。30年代的大清洗除了给俄罗斯族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外,各共和国和大批民族干部也未能幸免,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镇压、迫害。<sup>①</sup>

第四,苏共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中长期实行高度垄断,推行单一化的文化政策,在宣传工作中往往以俄罗斯为中心,过分强调俄罗斯族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在俄国历史形成问题上,把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称为“进步”,而其他少数民族抗击沙俄侵略扩张的历史人物则被描述成“罪人”。一旦有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历史人物进行颂扬,便会被扣上宣扬“民族主义”的帽子,受到迫害和镇压。

第五,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也存在着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于1939年通过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特别是苏德之间的“秘密协定”,靠侵犯周边弱小国家的利益,建立起了所谓的“东方战线”,把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摩尔多瓦部分领土强行并入苏联版图,为后来这些地区率先要求退出苏联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作为苏联最主要组成部分的俄罗斯在历史上也的确为联盟国家的建立和生存做出过巨大贡献,苏联的情况与传统的帝国有所不同。正如许多俄罗斯人所表白的那样,“如果像人们常做的那样,把苏联与传统的帝国相比较的话,那么不能不指出这个‘帝国’的许多怪事,包括宗主国不仅没有靠殖民地富起来,而且

---

<sup>①</sup> 参见[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上),第322—345页。

自己还拿出不少东西去帮助殖民地发展”。<sup>①</sup>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在其他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出现以后,俄罗斯人也感到委屈和不满,从而激发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

苏联历史上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各种失误和问题,使苏联的民族问题显得异常复杂和危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治愈、或者哪怕是抚平久已有之的民族疮疤,反而刺激了这一敏感问题,最终导致了民族危机的总爆发。

## 第二节 认识落后于实际

与其他大多数担任苏共最高领导职务的苏共领导人不同,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没有在其他加盟共和国从事领导工作的经历,这不能不影响他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认识。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初几年中,他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一系列讲话中还在不断重复历任苏联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的论点,信心十足地宣称,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sup>②</sup>直到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爆

---

<sup>①</sup>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97页。

<sup>②</sup>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苏联]《真理报》1986年2月26日。



发,直接影响了改革进程、社会安定甚至国家统一之时,在1990年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才承认:“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期间所包藏的危险性。”因此,“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sup>①</sup>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对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日益深入的批判过程中,认识到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缺乏民主,束缚了劳动人民发挥生产积极性,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说,他们对问题的认识是有一定深度的,也符合苏联的实际情况。然而,由于对苏联社会状况,特别是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缺乏认识,苏共领导人在制定改革政策时难免考虑不周。而当民族问题爆发时又缺乏相应对策,没能充分认识民族关系问题的特殊性,过于简单地相信通过对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可以从整体上解决民族问题。尤其是被民主化、公开性束缚住了手脚,各种新联盟方案最终未能为各加盟共和国接受。正是考虑不周、存在种种问题的改革方案指导下的不成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了民族问题的总爆发和难以控制。具体说来,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刺激和引发了民族危机:

第一,缺乏法律保障的民主化、公开性导致了民族问题上的自由化。公开性、民主化运动激发了苏联人,其中包括少数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对历史问题、民族问题的重新思考和评判。“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提法看似客观、彻底,却使许多历史积怨一下子迸发出来。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是否合法问题、克里米亚鞑鞞人要求返回家园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历史恩怨问题等等,各种民族

<sup>①</sup> [苏联]《真理报》1990年7月3日。

恩怨、民族纠纷、民族矛盾纷至沓来,使苏联领导人始终处于被动状况中。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提出共和国主权问题之后,苏联领导人被迫重新考虑建立新联盟这一事关联盟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

第二,削弱直至取消苏共党的领导使多民族联盟国家丧失了赖以存在的纽带和支柱。苏维埃联盟国家的出现和存在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取决于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存在。由于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强制手段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客观上需要有一种集中、统一的领导力量来实现其运转,而这种领导力量就是苏联共产党。长期以来,苏联模式、苏共的领导在许多方面是有问题的,需要完善、改进,甚至需要根本性的改革。然而,由于苏共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而且是最为关键的一部分,因而在对这种模式、这种领导方式进行任何变动、改革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苏维埃联盟国家的生存问题。戈尔巴乔夫正是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客观上削弱了苏共党的领导,造成民族纠纷和冲突无法控制的局面。而1991年“8·19事件”之后,苏共被彻底摧毁,使联盟国家失去了支柱,随后便是苏联的解体,这完全符合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

第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促进了民族危机的发展。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改革导致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最后发展成为民主派、民族主义势力同苏共、联盟中央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全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整个改革进程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战场。在此情况下,国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人民、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越来越对苏共和联盟中央领导国家的能力、制定和实施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的能力产生怀疑。与此同时,已经由民主派和民族主义势力掌握领导权的各加盟共和国便开始了寻求独自处理本共和国一切事务、自行解

决经济问题的“独立”进程。

### 第三节 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高涨

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逐渐显露出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改革时期，苏联的民族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争取生态安全、经济自主权和民族文化复兴。这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

二、争取民族聚合，要求改变自治实体地位。这特别反映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加盟共和国围绕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的民族纠纷。

三、历史上曾受到迫害的民族要求平反，要求重返家园的活动。如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抗议活动等。

四、争取共和国主权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在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共和国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主要是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

五、一些加盟共和国内民族自治单位要求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活动。如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个自治共和国，阿塞拜疆的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沿岸地区，俄罗斯的鞑靼斯坦、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要求扩大当地民族自决权、直至脱离所属加盟共和国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民族问题都在迅速发展，其中对苏联联盟国家构成直接威胁的是第四种。

1986年以后，苏联民族纠纷、民族冲突逐步升级。开始时是地

区性的民族骚乱,如1986年初,雅库茨克市发生大学生骚乱;同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爆发了阿拉木图事件;1987年7月—8月,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莫斯科和中亚举行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家园的示威活动;1987年10月,爆发了旷日持久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民族冲突,等等。各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摩擦、纠纷、械斗直至武装冲突持续不断,尤以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如果说当时的这种民族纠纷、民族骚乱和民族冲突只是造成当地大量人员伤亡,破坏了该地区的社会安定,还不足以对整个联盟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民族分离运动,则对联盟国家构成了极大的现实威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1989年4月初,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利用群众集会煽动反政府、反联盟情绪,借机提出取消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格鲁吉亚退出苏联而独立的政治要求。集会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骚乱,军队被迫介入,结果造成16人死亡、75名军警受伤、另有数百名群众受伤的严重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特别是据说军队使用了有毒气,苏联社会反响强烈。苏联最高苏维埃为此成立了由阿·索布恰克任主席的专门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而就谁下令动用军队的问题,苏共中央领导层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互相推诿责任,反映了当时苏共中央、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对突发事件缺乏必要的应对准备。

第比利斯流血事件不仅进一步刺激了格鲁吉亚民族分离主义,而且对整个苏联的政治形势造成重要的影响:民主派趁机大做文章;苏共中央领导层中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保守派”受到不断攻击;而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则以当时出国访问为由推脱责任。对第比利斯事件的处理方式、苏共领导层的暧昧

态度,对以后处理民族地区的问题产生了影响。苏共领导层、苏联社会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用“民主的方式”处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国内政治问题。

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波罗的海三国抗议 1939 年苏德秘密协定、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运动不断发展,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历史上曾是独立国家,18 世纪先后被沙俄帝国吞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 1940 年为独立国家,根据 1939 年 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于 1940 年作为加盟共和国并入苏联。

这种特殊的历史经历,使得该地区一直蕴藏着对大俄罗斯的民族不信任,甚至民族仇恨。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反对联盟中央在这里兴建大型企业,反对俄罗斯人大量迁入,要求共和国有更大的自主权,也有人提出独立要求。过去,抗议活动规模不大,很快便被当局所镇压,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受到不同方式的处罚。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如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等,受到三国的欢迎。与此同时,要求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酝酿发展。涉及国家政权体制的政治改革为这一地区民族主义势力施展自己的抱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1988 年 10 月,以拥护改革为旗号,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地方议会选举,波罗的海三国相继成立了人民阵线(在立陶宛为“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开始时它们都打着支持改革的旗号,声称决不充当苏共反对派,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在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国家,使共和国享有真正的主权。

在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成立之时，苏联领导人正集中力量对付“阻碍机制”。他们把人民阵线看做是支持改革的力量，给予支持和默许。三国的党政领导人，特别是1988年新上任的领导人<sup>①</sup>，则利用人民阵线来向联盟中央施加压力，借人民阵线之口说他们想说、暂时又不便说的话，争取使共和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

1988年9月，波罗的海三国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联合制定了一个名为《共和国经济核算协商基本原则》的文件，肯定了人民阵线的经济主张。同年10月6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决定立陶宛历史上的黄绿红三色旗可以在民族节日和社会组织举行活动时使用。此后，三国领导人的分离倾向越来越明显。11月，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了对该共和国宪法第74条的修正案，规定爱沙尼亚最高权力机关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停止使用苏联立法文件和其他法律文件，或是规定其使用限度，由此挑起了与联盟中央的“宪法战”、“法律战”。

到这时，波罗的海地区日益突出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才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1988年11月底，苏共中央派三位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维·切布里科夫、瓦·梅德韦杰夫和斯柳尼科夫分赴三国，同当地领导人交换意见，会见劳动群众，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戈尔巴乔夫频频发表讲话，称应该对未来的联盟进行广泛讨论，以便解决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他还宣布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

---

<sup>①</sup> 1988年6月16日，维亚利亚斯当选爱沙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10月4日，瓦格里斯当选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6日，戈尔布诺夫当选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0月20日，布拉蔡斯卡斯当选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等等。

11月16日通过的该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不符合苏联宪法,是无效的。<sup>①</sup>然而,三国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不听莫斯科话的人手中,戈尔巴乔夫的话以及中央的决定、决议等等已经无法发挥往日的作用了。地方权力机关不服从中央指令,宣布苏联宪法在当地可以被停止生效,这在苏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公开挑战。苏联政府和领导人虽然反应强烈,但仍然毫无效果。1989年5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政府的呼吁书,要求谴责1939—1941年间苏联和纳粹德国进行的秘密交易;爱沙尼亚也通过类似的决定,要求宣布1939年苏德条约非法、无效,事实上公开提出了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要求,开始了独立进程。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共和国独立;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宣布立陶宛独立非法、无效。4月18日,立陶宛议会复信苏联领导人,重申决不改变独立的立场。3月30日,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决定更改国名、国徽。5月4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独立宣言》,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尽管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是非法的、无效的,仍无法阻止它们争取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进程。

到1990年,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已不仅是波罗的海三国,其他加盟共和国也在发表了《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的同时宣布,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并公开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相对抗,拒不执行苏联政权机关的法律、命令。有的共和

---

<sup>①</sup>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11月28日。

国提出建立本国的武装力量、内务部队、安全机关,有的共和国提出使本国成为“中立国”、“无核区”,有的共和国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设立自己的海关和边界检查站,等等。

随着改革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国家逐渐失控。如果说在1990年地方苏维埃选举之前,联盟中央尚能控制国内局势,那么地方选举之后,苏共在许多地区丧失了执政地位,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双重政权”局面。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成立之后通过的第一个文件就是《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从而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展开了“法律战”和“主权战”,联盟中央疲于应付,威信大大下降。

在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有各自战略目标的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成了同盟,削弱联盟中央成为他们的共同策略手段。在苏共在与其反对派的斗争中不断败退的同时,另一条战线上的斗争——维护联盟国家统一、完整的努力与一些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也渐见分晓。

#### 第四节 俄罗斯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改革也引人注目地唤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我意识”,“俄罗斯知识分子明白,俄罗斯文化与苏联文化的融合,给俄罗斯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损害”。<sup>①</sup>在地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拥有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急

---

<sup>①</sup> [南斯拉夫]B.武亚契奇、[俄罗斯]B.扎斯拉夫斯基:《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俄罗斯》《民族学评论》1993年第1期。



剧膨胀。俄罗斯民主派大肆宣扬俄罗斯“吃亏论”，声称其他民族和共和国是靠吮吸俄罗斯这头“大奶牛”的乳汁养肥了自己，进而提出甩掉其他共和国、全力发展和振兴俄罗斯的口号。与此同时，“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意识到，几个最发达的波罗的海共和国脱离联盟，加重了支持‘帝国’残余部分的费用。他们断言，在俄罗斯本身面临经济灾难的时刻，不能迫使俄罗斯人承担帮助人口增长过快的中亚各共和国的大笔费用。大批工人在转向市场后从中亚流入俄罗斯的前景，只能加剧俄罗斯人中间的分离主义情绪”。<sup>①</sup>

这时，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看到一时还难以在联盟中央一级同苏共“保守派”较量，便采取了自下而上争夺国家领导权，尤其是争夺“实权”——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的斗争。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向苏维埃系统的转移，为他们提供了通过选举逐步掌握各级地方政权的机会。

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民主派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作为民主派首领和俄罗斯民族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叶利钦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他在苏联时期完成了从苏共高级领导干部、“改革派”代表人物到“民主派”首领的转变，并成为苏共和苏维埃联盟国家的主要“掘墓人”。叶利钦 1931 年 2 月 1 日出生于斯维尔德洛夫州塔利察区布特卡村一个农民家庭，1955 年毕业于乌拉尔基洛夫工学院，成为建筑工程师。1955—1957 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乌拉尔重型钢管建筑托拉斯工作，曾任工长。1957—1963 年先后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南城建筑局工地主任、主任施工员、总工程师、局长。1961 年加入苏共。1963—1968 年任该市

① [南斯拉夫]B. 武亚契奇、[俄罗斯]B. 扎斯拉夫斯基，《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俄罗斯]《民族学评论》1993 年第 1 期。

住宅建设联合会总工程师、经理。1968—1976年任苏共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建委主任。1976—1985年任该州州委第一书记。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叶利钦接连被提升四次，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后调任苏共中央建筑部长，同年7月当选苏共中央书记，12月接替格里申出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在苏共二十七次召开前的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在领导莫斯科党组织期间大力整顿秩序，消除社会不良现象，解决经济、社会领域以及其他各部门长期积累的问题，为改善莫斯科的状况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时，针对干部特殊化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大力反特权，大幅度撤换干部，在莫斯科33个区中更换了22个区的党委书记。他的这些行动曾一度在群众中赢得了积极推进改革、“果断干练，讲求实效”和“激进”的好名声。也正是这些，成为他的政治资本，为他后来的东山再起奠定了基础。

1987年10月21日，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批评了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以及苏共中央的工作，对改革进程缓慢表示不满，因此而受到苏共中央的批评和组织处理，先后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调任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1987—1989年）。此后，叶利钦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打起民主改革的大旗，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成为激进民主派的首领和旗帜。1988年，他辞去政府职务，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同“保守派”展开“议会斗争”，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1989—1990年）。在1990年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选举中当选人民代表，同年5月29日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同绝大多数民主派重要成员一样，叶利钦原本也是他所竭力

攻击的苏联“官僚体制”中的一员，而且曾任苏共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改弦更张、离经叛道对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在1990年5月召开的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尽管在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上，俄罗斯议会各派存在着意见分歧，争论不休，但在维护俄罗斯民族利益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6月12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907票赞成、13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此后，联盟中央对俄罗斯的控制能力迅速减弱。当时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俄共代表对这个主权宣言也投了赞成票。

由于俄罗斯在苏维埃联盟中的独特地位，它的独立无异于从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结构中搬走了奠基石。“正是在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权后，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sup>①</sup>出于对大俄罗斯主义的防御，其他加盟共和国立即做出本能的反应，也相继发表了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1990年，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

1990年8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保护俄罗斯联邦主权基础的决定》后不久，戈尔巴乔夫便于8月23日发布总统令，宣布该决定无效。8月25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再次宣布，苏联总统的这项命令不具有法律效力。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保障苏联法律效力法》，重申在联盟范围内苏联

---

<sup>①</sup> [哈萨克斯坦]H. 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等译：《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法律高于共和国法律,违反这一原则的共和国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苏联机关文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法》,规定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文件、总统令等,只有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之后才能在其境内生效。

各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俄罗斯联邦与联盟中央之间的“宪法战”、“主权战”,宣告各加盟共和国开始了“主权进军”,联盟中央实际上被架空,“中央政权由于‘俄罗斯人的背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支柱”。<sup>①</sup>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各加盟共和国都已独立并实际控制了本国的政治、经济大权,联盟中央逐渐成为靠各共和国施舍过日子的多余的机构。

俄罗斯民主派集中力量同苏共展开争夺权力的斗争。当他们掌握了俄罗斯国家政权后,便竭力扩大俄罗斯的权力,试图摆脱联盟中央的控制。为此,他们作为有权势的反对派,对联盟中央的政治方针和经济政策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当即表示,他将致力于实现俄罗斯主权,这种主权意味着从下到上的独立,俄罗斯在一切方面都将是独立的,苏联政府和领导正在失去人民的信任,俄罗斯一年后也要设总统职位,而且“不要分大小总统,他们应是平等的”。

民主派对实现俄罗斯的“复兴”充满信心,叶利钦许诺要用两年使俄罗斯形势稳定,三年使人民生活好转。由于不满苏联政府的经济改革纲领,特别是为了打击苏联领导层中的“保守势力”,摆脱联盟中央的控制,俄罗斯民主派在1990年掀起了一股“倒阁风”。<sup>5</sup>

---

<sup>①</sup> [南斯拉夫]B.武亚契奇、[俄罗斯]B.扎斯拉夫斯基:《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俄罗斯》《民族学评论》1993年第1期。

月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作《关于国家经济形势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报告,公布了苏联政府的改革计划。政府的计划立即遭到民主派的攻击,他们认为改革没有触动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对经济结构进行改革,还是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军工生产,因此对雷日科夫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要求雷日科夫辞职。7月20日,俄罗斯政府通过了“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500天计划》,要求迅速实现广泛私有化,其主要目的在于与苏联政府对抗,逼雷日科夫下台。9月17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雷日科夫政府辞职,认为苏联政府“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极其深刻的经济危机”,“没能履行保护俄罗斯联邦主权的宪法规定的职责”,“丧失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信任,也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俄罗斯议会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采取紧急措施,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雷日科夫政府的向市场过渡方案既遭到俄罗斯议会的反对,又得不到苏联总统的支持,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出现了严重的政府危机。

在斗争形势日趋明朗,无论是在与苏共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与联盟中央的权力争夺中,俄罗斯民主派都已占上风的背景下,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民主派再不需要以苏共为依托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了,再没有必要与苏共“保守派”争夺已经失去“实权”的苏共党的权力了。因此,叶利钦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会上宣布退出苏共,与他同时退出苏共的还有民主派主要代表人物加·波波夫和阿·索布恰克。自此,原本是苏共党内的民主派正式公开与苏共决裂,发起了对苏共的总攻。在叶利钦的大力鼓动下,俄罗斯联邦于1991年效仿联盟中央也设立了总统职位。在同年6月12日,在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的竞选中,叶利钦战胜雷日科夫(得票率16.85%)、日里诺夫斯基(7.81%)、图列耶夫(6.81%)、

马卡绍夫(3.74%)、巴卡京(3.42%)五位总统候选人,以57.3%的选票当选俄罗斯总统。

民主派掌握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特别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之后,联盟中央实际上已经对俄罗斯的控制能力大大减弱。由于苏联是以俄罗斯为基础建立和生存的,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撑,任何形式的联盟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根本无法生存的。对此,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对他们来说,要维持联盟国家的存在,就不得不以各种方式“笼络住”俄罗斯当权派。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主从关系”的易位,决定了双方态度的变化,进而决定了以后联盟国家演变的基本方向。

### 第五节 建立新联盟努力的失败与苏联的解体

在各加盟共和国擅自扩大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进而提出主权要求的背景下,革新联盟关系、制定并签署新的联盟条约成为维持联盟国家统一的法律基础。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同实际上已经拥有本共和国主权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越来越艰苦的谈判、协商,不得不一再做出让步。

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苏联联邦委员会会议,提出重建“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构想,主张各加盟共和国作为一个个主权实体,可以不同形式同中央政府建立关系,通过建立全苏大市场等经济手段促进各共和国相互接近和相互联系,以此作为联盟存在的基础。同年9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成立由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负责制定新联盟条约。11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议会以及各共和国议会提交了新联盟条约草案的第一稿。由于各方看法不一,该草

案被退回进行修改。

在1990年12月举行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尼·尼沙诺夫作了题为《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及其缔结程序》的报告,指出未来的国体为主权共和国联盟,即独立国家的联盟。新联盟所遵循的原则是:(1)全体人民不分其民族和居住地区一律享有平等权利;(2)各个民族不分其人数和发展水平一律享有平等权利;(3)使各个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与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互依存。

此后,各方代表围绕新联盟条约的具体条款,特别是中央与加盟共和国权限划分问题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几经周折。1991年3月6日,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新联盟条约草案。1991年3月9日,公布了新联盟条约(草案)文本的第二稿,供讨论。

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1)基本原则:苏联是由平等的各共和国自愿联合组成并在条约赋予它的权力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的主权联盟国家,各共和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拥有全部权利;(2)联盟体制:各共和国——签约国可以直接加入联盟,也可以作为其他共和国的组成部分加入,这不会使它们的权利受到限制;(3)联盟机关:联盟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将在各共和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组成。

为使新联盟条约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1991年1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根据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组织进行关于是否保留联盟问题的全苏公民投票及其保证措施的决定,提交全民投票的问题是:“您是否认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被革新的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邦保留下来是必要的,该联邦将完全保障各个民族的人的权利和自由”。规

定两个答案：“是”或“不是”。

在苏联议会做出进行全民投票的决定后，各共和国、甚至各共和国内不同地区做出不同反应。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六国抵制全苏全民投票，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分别于2月和3月举行了有关本国独立问题的全民投票。而其他一些共和国在参加全苏公决的同时又进行了自己的公决：乌克兰附加的问题是是否同意本国应根据其主权宣言加入联盟；乌兹别克附加的问题是是否同意本国作为平等的共和国留在联盟中；俄罗斯则要求公民同时就俄罗斯是否实行总统制进行公决。而俄罗斯联邦内的北奥塞梯、车臣—印古什、图瓦、鞑靼等四个自治共和国议会决定，只参加全苏公决，拒绝参加俄罗斯的公决。

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其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参加全民公决的约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但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六国当局拒绝在其境内举行全民公决。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发表了《关于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刻不容缓措施的联合声明》（即“9+1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克服危机的首要任务是，根据所进行的全联盟全民投票结果，签订各主权国家新条约”。根据苏联宪法，关系苏维埃联盟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本应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来决定，而“9+1联合声明”的出现则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启动了一种超出宪法规范的“新”机制，即由苏联总统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来决定联盟国家大事，苏联最高苏维埃被搬到了一边。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经过反复“较量”，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苏联领导人与地方“诸



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位移。以往地方领导人听命于联盟中央，而如今联盟领导人要看各地“诸侯”脸色行事，而且联盟中央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9+1 联合声明”发表后，新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又根据各方意见，对条约草案再次进行修改。5月下旬，苏联联邦委员会及条约起草委员会原则通过了条约草案。7月24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与10个加盟共和国全权代表团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结束了长达12小时的会晤，最终完成了有关新联盟条约的工作，新联盟条约最后定稿，并决定8月20日起转入全面签署工作。

新联盟条约淡化了联盟的社会主义性质，取消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字样，同时大大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各加盟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拥有独立确定自己国家体制和解决自身发展所有问题的充分权力；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缔结国际条约，直接参加国际组织的活动和独立从事对外贸易活动；各共和国政府首脑可以参加联盟内阁的工作并拥有表决权；各共和国可以规定程序自由退出联盟。新联盟条约还将原赋予联盟中央的管辖国防、制定军事政策、管理统一的军事企业等权力，改变为由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共同拥有确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实施组织与保障国防的措施、管理国防工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武装力量解决国内问题。中央单独拥有的权力仅限于为保障国家安全领导统一的武装力量和组织、协调、发展货币统一的全苏市场等任务。

在不少人看来，这种权力划分必将使联盟形同虚设，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四分五裂。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8·19事件”。

1991年8月19日清晨，苏联首都莫斯科先后发布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命令、亚纳耶夫致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

联合国秘书长的信、苏联领导的声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称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根纳季·亚纳耶夫从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从8月19日莫斯科时间4时起，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确保苏联宪法和法律在苏联全境具有绝对至高无上效力；成立由奥·德·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谢·帕夫洛夫（苏联总理）、鲍·卡·普戈（苏联内务部长）、瓦·亚·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亚·伊·季贾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德·季·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根·伊·亚纳耶夫（苏联代总统）八人组成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苏联全境内所有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一切公职人员和公民绝对必须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

针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违宪”行动，掌握着俄罗斯国家政权的民主派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当天中午，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由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拉托夫联合签署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宣布“这是一次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呼吁俄罗斯公民“给予应有的回击”，并“在俄罗斯全境无限期地总罢工”，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军人“不参与反动政变”。随后，叶利钦走出“白宫”，登上一辆装甲车，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俄罗斯人民立即举行总罢工。在俄罗斯的带动下，其他共和国领导人也纷纷表示不支持 and 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违宪”做法。

国际上，西方大国也纷纷做出反应。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反对通过“政变”手段搞掉戈尔巴乔夫，不承认“政变”产生的苏联

领导人,并暂停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德国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提出的在苏联恢复宪法秩序的要求。日本、加拿大、欧洲共同体等纷纷冻结对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

由于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不得力,行动不坚决,特别是几年来的政治改革使国家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可能通过全国统一的行政领导体系实施决策,党的组织系统也由于苏共的“派别化”和“联邦化”而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几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不仅使群众和军队的思想状况发生极大的变化,而且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自己也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到极大的束缚,不愿也不敢承担“不民主”的罪名贸然行事。在此情况下,形势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民主派的方向发展。2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不顾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等地实行紧急状态的禁令,召开非常会议。当晚20时18分,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至此,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冒险行动宣告失败。

“8·19事件”客观上使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计划落空。此后,苏联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联盟中央的权威已丧失殆尽,波罗的海三国终于完成了其独立进程,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在所有共和国实际上都已拥有主权并已实际上取得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把其他12个共和国捏合在一起,维持一种哪怕是形式上的联盟关系,也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

1991年12月1日,对于保留联盟国家举足轻重的乌克兰就其独立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同时进行了乌克兰总统选举。3750万乌克兰选民中,83%的人参加了投票,其中90%的选民赞成乌克兰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以60%的选票当选乌克兰首任总统。

12月3日,在戈尔巴乔夫还在呼吁全国的议员们批准联盟条约的同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表声明,宣布承认乌克兰独立。接着,各共和国领导人便撇开苏联总统和联盟中央,开始了他们自己的“联合”进程。

1991年12月8日,苏联境内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最高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别洛韦日举行会晤,认为“起草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走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成为现实”,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三国领导人以三国人民之间已形成的关系所具有的历史共同性为根据,希望在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主权、平等和不予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和发展关系;忠实于联合国宪章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宗旨和原则,保证遵守有关人权和各族人民权利的国际法准则,保证所有公民无论其国籍拥有平等权利和自由,保证有助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有特色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建立经济关系并在现行货币单位——卢布的基础上进行结算,等等;宣布从协定签署之日起,在签署协定的国家境内不许使用第三国包括苏联的准则,前联盟各机关的活动予以中止。

别洛韦日协定是对戈尔巴乔夫想把苏联改组成为松散邦联或主权国家联盟而做的种种努力的致命打击,它意味着新联盟条约的终结,是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决定性步骤。

别洛韦日协定签署后,苏联境内其他大多数共和国对“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态度从最初的震惊迅速转变为理解、欢迎、支持、参加。1991年12月12日,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五国领导人在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会晤。13日,五国

领导人发表声明，称别洛韦日协定具有积极的性质，同时强调指出：应该承认组成联合体的一切国家都是它的创建国。五国领导人表示准备成为重视其所有主体利益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的共同创建者。

12月21日，苏联11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晤，签署了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的议定书，宣布“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共和国、土库曼、乌兹别克共和国和乌克兰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作为缔约各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

同一天，独联体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称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目的是“努力建设民主的法制国家”，独联体参加国“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不可分割的自决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不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不施加经济或其他方式的压力，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人权与人的自由（包括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认真履行国际法义务及其他公认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互相承认并尊重领土完整及现有边界的不可侵犯”。同时宣布，随着独联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

在“8.19事件”后仍力图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的戈尔巴乔夫至此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 第二十九章 苏联剧变：必然还是偶然

苏联剧变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有其必然性。“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sup>①</sup>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的国家政权存在的种种问题日趋严重，同时由于历次改革的失败，传统体制具有明显的情性、保守性，使得任何改良、变革变得十分困难。由于各种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其改革政策时引发了各种矛盾，使改革进程难以控制，最终使改革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社会政治制度的急剧变化和联盟国家的瓦解。

### 第一节 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大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sup>②</sup>苏联剧变和解体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复杂的现实原因。可以说，历史原因是根本性的原因，没有历史上各种问题、矛盾的积累，不可能有后来的爆发和剧变；而现实原因则无疑是直接原因，它主要表现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

---

① [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页。

② [中国·宋代]苏洵：《管仲论》。

方针和政策。苏联的“亡”正是所有这些原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 一、历史原因

任何国家和社会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历史文化传统,更何况“苏联曾是个制度和命运复杂的国家”<sup>①</sup>。20世纪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它作为沙皇俄国的继承国这一点有关。因此,可以说苏联“亡”于戈尔巴乔夫时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这当中既有苏维埃政权以前的俄罗斯历史根源,也有苏维埃政权时期的历史根源。

从国家发展史角度看,带有古老的“直接民主制”特点的村社制度对俄罗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增添了瓦兰人(北欧诺尔曼人)、金帐汗人以及西方的印迹。<sup>②</sup>俄罗斯村社制度是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鞑靼蒙古人200年的统治使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专制主义和集权倾向得到了大大的发展;而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相对薄弱,从而形成了一种东西方文化的“混合物”,其最突出的便是俄罗斯历史传统中漫长的“独裁传统”。在此情况下,“不仅政府是非民主的,反对者也一样是非民主的”,“不仅俄罗斯政府传统是不民主的;反抗它的传统也是不

---

①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97页。

② [俄罗斯]B.奥尔洛夫:《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基础的村社家长制因素》,《欧洲迫切问题(论文集)》1997年第2期。“西方民主制中的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权力”专集。

民主的”。<sup>①</sup> 由此决定了任何改变现行制度的尝试必然是以暴力的、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俄国历史上缺乏渐进、改良的社会实践与此不无关系。

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对苏联后来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和对立者，社会主义既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又要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同时在俄国这样一个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主义”<sup>②</sup> 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面临的任务更是十分艰巨的。在这里，不仅有来自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颠覆，更重要的是旧制度的残余、植根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范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其中最关键的是始终贯穿于苏联领导层决策、国家管理以及社会控制过程中的专制主义残余。苏联各个时期的历史对苏联的兴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斯大林体制本身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我们在本书有关章节里已经作了分析，在此仅重复一句，正是斯大林体制的专制性质、不民主性质在苏联（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不仅斯大林时期本身具有了“社会主义君主制时期”的称谓，而且使得后来俄罗斯的总统制也具有了“君主装束”。<sup>③</sup>

毫无疑问，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曾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赢得卫国战争的

① [美国]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著，白洁等译：《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2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56页。

③ 参见[俄罗斯]E.奥尔洛夫：《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基础的村社家长制因素》。



胜利做出过贡献。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这种模式和体制从形成、确立之时起就存在着种种弊病,在数十年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其缺陷、弊端也在发展,尤其是其垄断性、强制性,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随着时代的变化,其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创新,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根溯源,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乃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

## 二、现实原因

苏联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斯大林体制本身的各种问题和弊端,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性原因,但这并不是说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共领导人就没有责任。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现实原因无疑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不成功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看到了必须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由于苏共领导人在改革战略、改革的目标选择以及改革的具体政策、策略方面的一系列错误和失误,使得改革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导致了悲惨的结局。关于这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已经在上面有关章节里进行了分析、阐述,在这里,仅循着苏共领导人基本的思想理论变化轨迹,探讨苏联剧变的现实的、直接的原因。

从一般现象上看,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无论对国家来

说，还是对个人来说，改革早已成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背叛行为”<sup>①</sup>。然而，显然这只是一般现象，似乎难以仅仅据此来解释苏联剧变和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知识界、理论界就已经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曾出现了摆脱苏联控制、探求改变苏联模式的尝试。尽管所有这些不同意见和改革尝试都在苏联领导人的压力下半途而废，但显然关于改革苏联模式的理论准备阶段已经开始了。所有这些改革尝试的失败不能不对新一代苏共领导人产生影响。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首先始于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向社会主义改良学说的转向，便不足为怪了。苏共领导人试图用民主模式修正、替代正统的即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在当时得到了社会多数的支持。这时，苏共领导人还是要复兴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改革领导者在改革路线、改革战略和策略以及一系列具体操作上的错误和失误，特别是当改革转入政治领域之后，各种问题、矛盾、冲突随之而来。此时，社会情绪更多的是倾向于追求西方消费社会与强大社会保障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挑战，社会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然而，苏共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叶利钦等人，则走得更远。在他们的号召和鼓舞下，民众中出现了“新的”意向——转向自由主义、带有社会保障成分的市场经济思想，或者干脆转向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思想。

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属于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但在某种程度上还与社会主义思想有所重合的话，那么，自由主义则完全是排斥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了。正是由

① [俄罗斯]尼·雷日科夫著、王肇等译：《大动荡的十年》，第5页。

于公众情绪中这种思想转变,使得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占据了上风。从西方“民主政治”到自由市场经济一整套“西方模式”开始吸引人们,成为包括苏共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在内的民主派及其追随者们的奋斗目标。在此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便逐渐丧失了对苏联社会发展的控制能力,“改革”进程开始由激进民主派来左右。

可以说,沿着这种思想变化的轨迹所进行的改革,更多的是充满了对民主、自由的盲目幻想。苏联政治体制中最突出的弊端,即它的强制、专制性质,缺乏民主和科学性的决策机制,并未因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变化的只是由其他政治力量取代了共产党的统治,由总统取代了总书记,同时“引进了”西方议会制的某些成分。而取消共产党一党“专制”,增添了议会民主制成分,并未使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反而使各种政治力量的争斗和角逐更加公开、激烈。争论不休、混战不已的党派斗争,加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日益壮大,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国家的瓦解。

## 第二节 内因和外因

自从苏维埃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西方国家就感到了这种“异己力量”对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的威胁,由此便开始对苏联实施从武装干涉、战略遏制到和平演变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在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中,外部因素、西方国家的影响确实存在。然而,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是最浅显的道理。

## 一、内因——决定性的因素

苏联国内各种问题、矛盾引起各种危机。而在所有内部因素当中，经济因素是其他各种因素的基础，民族关系方面的因素是导火线，社会政治因素直接导致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政权危机是各种危机的集中反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高速发展的奇迹，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大萧条时期，苏联经济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当时，不仅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群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知识分子、统治阶层也对此羡慕不已。由于在经济发展上、在经济竞赛中苏联处于优势地位，这时，西方对苏联的政策主要以防范社会主义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为主。而当70年代以后苏联处于“停滞状态”时，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在西方世界日益显现出巨大的潜力，而此时苏联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固有的弊端，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日渐衰落。戈尔巴乔夫不成功的经济改革，不仅未能使苏联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反而使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显然，正是由于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特别是经济发展的竞赛中优劣角色的位置互换，造成了对苏联十分不利的局面。所以说，经济因素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基本原因，其他各类因素均源于、从属于这一基本的原因。

经济竞赛的落伍，使苏联人看到了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刺激了社会意识的变化。当然，决定这种变化的决不仅仅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比在人们意识中

所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在这里,经济体制本身的深层次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公有制体系本身和国家对经济的领导潜伏着管理高度集中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不采取相对应的措施的情况下可能成为现实。”“从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它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主义原则的严重变形,这是由于广大群众与所有制和管理体制的关系日益疏远造成的。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滋长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出现社会的消极情绪。”<sup>①</sup>正是因此,人们对苏联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的许诺感到失望,开始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对西方社会的羡慕心理。而苏共长期以来过于简单的意识形态、思想教育工作的方式,更使人们产生逆反心理。改革以来,由于苏共本身的问题以及苏共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工作,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意识形态“自由化”倾向。要求变革、要求革新社会主义的愿望逐渐被走西方发展道路、迅速扭转国家现状的激进情绪所取代,从而给改革的领导者和改革本身造成巨大的压力,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

在社会情绪和社会价值取向逐步变化的过程中,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苏联制度本身缺乏民主的本质进一步使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激进化。苏共领导人“一下子全面放开”、“一步到位”式的政治改革,使激进的政治情绪失去了控制。各种社会思潮的泛起瓦解了苏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防线。苏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线上的失败,以及在“自由选举”条件下的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直接导致苏共丧失对改革进程和国家的领导权,政治危机一步步加深。

苏联的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导火

---

<sup>①</sup> [苏联]·I.阿巴尔金:《借鉴过去的教训》,[苏联]《共产党人》1987年第16期。

索，同时也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言而喻，“俄罗斯国家内部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它在历史上的形成、成长和发展都是涣散的，而不是有组织的。它的领土拓展，把所有新民族纳入它的版图，比起民族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文联系的发展进程要快得多”。因此，“最强有力的解体因素正是植根于俄罗斯国家体制本身的性质”。<sup>①</sup>苏联的联邦制本身的确存在着很难克服的矛盾，有相当大的潜在的危險性。苏共长期以来虽然在增进民族融合、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始终未能使各民族在淡化民族意识的同时切身感受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斯大林时期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做法，更使民族问题复杂化了。事实证明，靠强制手段实现的“民族大团结”是难以长久维持下去的。这进一步说明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共领导人没有处理好这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放”与“收”、强调民族自决与对民族主义加以控制方面出现偏差，盲目地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希图通过民主化解决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期的强制做法，客观上刺激了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致使民族主义借改革陷入混乱之机迅速膨胀，出现了难以抑制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民族主义势力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实际上实现了“大联合”，对共产党领导的联盟国家形成威胁，最后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和联盟国家的瓦解。

---

<sup>①</sup> [俄罗斯]Ю. 索洛杜欣：《俄罗斯联邦会步苏联的后尘吗？》，[俄罗斯]《对话》1993年第1期。

## 二、外因——并非无足轻重的因素

苏联作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载体存在于世界，它面对的是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这里，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新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苏联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上、在综合国力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着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在一系列具体方面，主要是在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上、在公民民主权利的法律保证上、在政治和法律文化上等等，也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差距。正是这些差距决定了外因，即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对苏联必然存在着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敌视社会主义的苏联。随着形势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对苏政策也在不断地变化。美国在与苏联展开全球争霸、对苏联实行“战略遏制”的同时，从未大张旗鼓、但却孜孜不倦地奉行着“积极接触政策”，通过经济贸易，文化、科技交流，人员往来等各种渠道，为使苏联和平演变、把苏联纳入西方体系创造条件。特别是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情况下，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早已冲破了苏联官方的各种思想防线，逐步渗透到苏联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中来。所有这些，为苏联发生剧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政治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大力宣传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或明或暗地支持苏共的政治反对派，对苏联领导人的某些“不民主”做法指手画脚，为反对派撑腰打气。这在“8·19事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西方政治家十分清楚，“民族主义必然要成为阻止共产主义继续前进的障碍”，“非俄罗斯人的政治热望乃是苏联的致命弱点”。民族主义“在外部世界的鼓励下”必然会“变得更加活跃”，因此“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身上”。<sup>①</sup>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西方势力积极插手苏联民族问题，到处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尤其是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其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推翻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促使苏联社会政治制度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外部影响都因苏联本身的问题和改革的失误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面对西方的影响，苏联及其领导人的应对措施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国内改革陷入困境、一筹莫展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却幻想依靠美国和西方对他“新思维外交”的支持和赞赏来抬高自己，扭转被动局面。“……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控制事件的能力已接近尾声，在头四年的执政时间里，他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领导人，到1989年底，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能控制局势并使之运转，但是到1990年苏联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戈尔巴乔夫开始感到他大势已去。他拼命地想加强他的地位，虽然不为大家所知，但他确实不遗余力地想从美国 and 布什新总统那儿得到财政和道义的支持以继续他的改革，并以此来支撑他的政权和他在国内的声望。”<sup>②</sup>苏共领导人的这种“应对措施”，无疑只能使西方的渗透和干涉更加有待无恐。外因正是这样通过内因发挥了作用。

---

① [美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刘晓明译：《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6—117页。

② [俄罗斯]阿·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第717页。



对苏联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是东欧国家先于苏联而发生的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在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尖锐对抗的情况下,苏联东欧国家通过“经互会”和“华约”建立了经济和军事同盟,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苏联一直对其“东欧盟友”实行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到军事领域的严密控制。以前东欧国家出现的历次改革尝试,均在苏联的干预下半途而止,这些国家里的各种改革力量和试图摆脱苏联控制的领导人都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受到严厉打击和镇压。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为契机,东欧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浪潮”,逐渐脱离苏联的轨道并改变了国家社会政治制度。东欧国家的剧变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鼓舞和推动下发生的,同时又对苏联政治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它极大地鼓舞了正在与苏共展开决战的激进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加快了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进程。

### 第三节 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

苏联剧变和解体有着深刻的原因,其中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一般说来,社会变革、社会制度的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瓦解,反过来说,国家的解体也并不一定非要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1991年,苏联这个多民族的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却相继发生了社会制度剧变和联盟国家解体这两个重大事件。这显然与苏联的国情有关。民族问题、国家结构上的缺陷和问题对国家的解体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是造成社会制度演变的重要原因。社会制度演变过程促进了国家解体的过程

并为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景象。在这一过程中，主、客观因素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共同起作用的。

### 一、客 观 因 素

显而易见，苏联剧变、解体的客观因素首先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对象本身，即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对苏共领导人本身思维方式、行为能力以及整个社会意识的长期影响。

第一，斯大林式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坚固性、保守性、排他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然会遭遇到重重阻力。苏联历史上，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曾有过几次改革的尝试，但都未能触及这一深层次问题。改革常常是浅尝辄止，未能触及苏联模式本身。戈尔巴乔夫这一届苏共领导人看到了这种模式的种种弊病，认识到不能再照此老路走下去了。然而，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认识）、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作风和学风对他们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难以突破。当然，他们的认识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逐渐深入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迫使“改革”的领导者们放弃了对这种模式进行“修补”、“革新”和“完善”的尝试，导致偏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轨道。

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是十分困难和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得益于旧体制、旧制度的人们心里不满意，而可能从新制度中得到好处的人又往往只是不太热心和不太可靠的支持者。这对于苏联这样具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困难、危险客观上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具有非同寻常的坚

定意志和坚定信念,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才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①</sup> 苏联领导人在创造苏联历史的时候,必然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受到长期在苏联发挥作用的体制、制度的影响;而且他们自己便是由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造就出来的,同时他们又对这种模式有自己的认识,其中一部分人逐渐成为这一模式的改革者和“叛逆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具有某种明显的弱点。

第二,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的地位特殊,它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就其制度而言,苏联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社会方面的一党制、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元制和经济方面的垄断制。共产党支配着政治、文化和生产活动,坚持主张党—国合一。”<sup>②</sup> “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国家,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党取代了国家。”<sup>③</sup> 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捍卫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任,而且也肩负着维护联盟国家统一的重任,在改革年代又面临着自身改革、革新的艰巨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共成为其政治上的反对派——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势力和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共同敌人。苏共既阻碍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争夺国家政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85页。

② [意大利]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黄华光译:《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③ 同上书,第36页。

扭转国家发展方向企图的实现，又阻碍着各加盟共和国“地方精英”和民族主义势力摆脱联盟中央控制、走向完全独立的“雄心”的实现。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政权陷入混乱和瘫痪。维系联盟国家的支柱——苏共的瓦解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失控，造成社会制度的剧变，随后便是联盟国家的解体。这就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逻辑。

第三，依靠原有体制下干部任命制度和由此产生的各级干部来改革这种体制、革新这种体制下的干部队伍，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导致“体制外”的干部队伍逐渐成熟并成为苏共的直接竞争对手。

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中，苏共的干部队伍、领导集团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事业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苏联的领导集团实际上与苏联的政治制度完全相等同。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一制度的一个根本方面是由各精英集团的质量、它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及它们权力扩展所及的范围构成的。”在苏联，统治和管理着整个国家的“是一个掌握着所有社会控制手段（包括精神、经济和强制性的手段）的精英集团”。在这里，社会事务的参与者之间的“冲突受到抑制，但精英集团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却扩大到所有至关重要的方面”。“苏联的精英集团实际上无法自我改革，尽管可以预计，为了顺应工业模式所要求的合理化，可能会出现放松权力管束的状况。然而，这并不排除以下的可能性（至少是在原则上），即：由于无法适应一个新的、也是因其在经济、科学、技术、外交等方面所获得的成绩（虽然是有限的成绩）而成熟起来的社会的需要，这一精英集团可能会自行破碎，而且可能会出现一种‘少数特权阶层内的分裂’，使‘政治人员和官僚机构的整体’之间那种休戚

与共的关系归于终结。”<sup>①</sup>

长期以来,苏联各级干部的任何一次任免都是由上级内定的,苏共党的任命制度、实际上存在的“官名录”造就了一批批唯唯诺诺、听命于上级、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本质、核心和社会基础,苏联整个国家机器正是依靠着这种从上到下、从国家最高权力直至植根于社会最基层的一般生产单位的一整套“钦定官员阶层”来维持和运作的。当然,这只是就苏共干部政策的实质而言,并不是说这种任命制度就只能培养只为自己谋求私利和权力的投机者和势利小人。

至于苏共领导层,其成员更是经过这种“官名录”阶梯,通过个人努力和上级培养、垂青,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中间不少人虽然对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决心对其进行“根本”改造,但既然他们本人就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早已习以为常的办法、手段来选拔“支持”、“拥护”改革的干部,习惯于提拔、重用那些听命于领导人、为领导人唱赞歌的干部,而不喜欢、甚至厌恶那些敢于“直言犯上”,批评领导人缺点、错误的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新思维”并未妨碍苏共领导人以“是否拥护改革”划线,大批撤换干部。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苏共干部政策并未彻底摆脱旧体制的影响,甚至还将这一体制在干部任命制度方面的弊端发展到了极限。

与波兰等东欧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苏联,反共、反社会主义直至民族分离主义的主力军不是在共产党、工人党外部发展、壮

---

<sup>①</sup> [意大利]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黄华光译:《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第35页。

大起来的另一种社会力量，而恰恰是在苏共内部由苏共上层大部分官员所构成的。正是苏共上层的“改弦更张”导致了后来的结局。“苏联的悲剧在于，党的官员们拒绝在不摧毁俄罗斯文明历史传统的前提下进行谨慎、然而却是迅速的改革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接受以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为武器：一切都应该重复西方的道路。而在此框架内则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sup>①</sup>而对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国家来说，“地方精英”，即开始时的苏共地方领导干部、随后的由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推举出来的领导人，他们的利益取向的转变对维持联盟国家的统一更是举足轻重。

随着对原有体制的改造，特别是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涉及到国家政权机关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国家政权机关选举制度的变化（以“自由”选举代替任命制）使一批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干部走上国家领导岗位，他们的合法性、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显然高于原有体制下产生的干部，特别是苏共内定的干部。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中，苏共候选人屡遭败绩，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苏共旧的干部任命制度已近终结。而这一干部任命制度的终结又预示着苏共及其领导人将无法对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第四，以往苏联社会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成为“改革”的对象之一，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奋斗目标的丧失使社会迷失了方向。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都需要有相应的思想理论基础。从十月革命时起，建设正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一直是苏维埃

---

<sup>①</sup> [俄罗斯]根·安·久加诺夫：《相信俄罗斯》，沃罗涅日：沃罗涅日出版印刷公司1995年俄文版，第228页。

国家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尽管这种“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扭曲的、“变形的”,但它所发挥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消极的,它对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苏联剧变和解体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正是这一整套社会主义理论受到了挑战和攻击,苏共的溃败也正是以此为起点的。长期指导苏联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所存在的许多问题、缺欠,不能不说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客观因素之一。至于苏共领导人对这种理论的修正和篡改则明显属于主观因素。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理论需要修正、充实、完善和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苏共领导人对此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致使整个社会主义理论都面临着被否定的危险。一些苏共主要领导人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宗教,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在其基本内容中假设和信仰起主导作用。假设过去,假设未来,相信这些概念和所有从中引申出来的东西的千真万确。”<sup>①</sup>苏共领导层中有这样的认识,不能不对全党和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最终导致改革和社会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泛滥,造成社会意识的混乱。在此情况下,国家发展不可避免地处于失控状态。后来苏联所发生的一切表明,由于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也未能成为社会的指导意识形态,使得国家和社会不可能按照苏共领导人的设想发展。

①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 288 页。

## 二、主观因素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sup>①</sup> 苏联的剧变和解体的确有客观的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因素是基本的、决定性的，然而同样也不能忽视主观因素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及其领导人的错误集中表现为他们整个改革设想、路线和方针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改革战略上的失误和错误是导致所有恶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在改革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提出的许多具体思想、观点，除一些有明显错误外，其他绝大多数原则上很难说有什么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进程并未能按照苏共领导人设计的方案（如果有的话）发展，苏共领导人的各种思想、观点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变了样，导致了另一种后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成了空洞的口号。在这里，苏共领导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忽视改革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个人性格、品质上的弱点等等也起了消极的、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苏共领导人虽然一再强调改革需要“新思维”，然而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到实际运作过程来看，他们在思想方法上还是沿袭了苏共历届领导人的传统：急躁冒进、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超越实际、唯意志论盛行。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从改革的总体规划到改革的每一步骤的具体实施，都需要慎之又慎，同时还要根据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具体

---

<sup>①</sup> [中国·宋代]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



政策措施,在不断探索中求取进步。苏共领导人从提出改革任务时起,在思想观念上一直存在着不切合实际、超越现实、急于求成的问题,而且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激进”。从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加速战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国家权力结构,到1990年二月全会提出取消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列入党的纲领性文件,随后在国家权力体制上实行总统制,苏联改革的整个进程表明,苏共领导人对本国国情,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苏共历届领导人超越时代、追求宏伟目标的传统思维模式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只不过这次不再是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是急切地向往“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退一步说,即使不谈这种目标是否正确,要向其过渡也得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来,不可能用“革命”的手段一下子完全实现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转变。

从改革战略的选择和改革策略的运用方面看,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存在的问题更多,对改革最终归于失败所起的作用更为直接。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在于,改革不同于革命,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要远远大于革命。如果说革命是一场摧毁旧制度的社会运动的话,那么,改革则是对旧制度的扬弃,是对旧制度的继承、发展与逐步部分地加以替代、更新相结合的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由此决定了与革命相比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一场革命的领导者所要做的首要的是提出鲜明的奋斗目标,置社会于“两极对立”之中,充分进行社会动员。他的敌我阵线相对分明。作为旧制度的对立面,他是“单线作战”。他的任务相对单一,这就是彻底摧毁旧制度。这也决定了他的战略必然是激进的,手段是强硬的。而改革则不同。改革客观上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者的道路是艰

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同时而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改革者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如何处理各种形式改革的轻重缓急的问题，对改革者来说也比革命者要尖锐得多。”<sup>①</sup>然而，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则有意无意地将改革和革命两者混淆起来，动辄将改革称之为“根本的改革”，“改革就是革命”，以革命的方式搞改革，最终导致了急风暴雨般的“社会革命”——一场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运动。

第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热衷于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和国内政治领域层出不穷的新举措、新方案，而缺乏将每一项具体改革步骤贯彻始终的决心和毅力。改革战略上追求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与改革策略、具体措施上脱节、乏力之间的矛盾十分明显。

苏共领导人缺乏一种深思熟虑、贯彻始终的改革思路。最初是对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缺乏全面认识，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而当认识到在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重大经济改革之后，又集全力于政治领域，偏离了经济改革、经济工作这条主线。同时，又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对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在改革的具体步骤上缺乏相对稳定性，各个不同措施、具体步骤之间缺乏连续性，常常是转弯太快，前一阶段的各个措施还未真正落实，后一个措施又出台了，从而造成操作上的混乱。

第三，由于对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苏共领

---

<sup>①</sup> [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16、317页。

导人在改革的前期充满盲目乐观情绪,认为通过改革可以一下子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使国家经济迅速扭转颓势、走向繁荣。他们为人民群众描绘出一幅幅光辉的前景,对人民群众许诺过多,使人们对改革、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充满希望和期盼,有时甚至是理想主义的幻想。

社会期望值的不断提高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遂人愿状况的增多之间的明显反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情绪的激进化 and “政治热”。在群众被激情所鼓舞和控制的情况下,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情绪大行其道,整个社会逐渐陷入危机、失控状态,根本谈不上进行改革了,甚至连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受到了影响。所谓激进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动员群众的方式上、改革目标的选择和宣传上是激进的,而在实际效果上则欲速不达,造成改革进程混乱、失控,迅速向着另一种方向急剧转化。

第四、宣传上、口头上大谈民主,时而以集体讨论、集体决定为借口,推卸领导责任、优柔寡断,时而独断专行、一言堂、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在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苏联、苏共干部队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发扬民主不够,党和国家上层更是惟总书记指示是瞻。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虽然大讲民主化、公开性,大力评判历届领导人决策不民主,但他本人在决策方面仍继承了他的前任们的许多作风。这种状况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变成了现实。正如与他共事多年的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所说:“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

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但是，仅是改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sup>①</sup>尤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戈尔巴乔夫开始走向实质上的帝制统治，在谢瓦尔德纳泽的热烈支持下，他绕过传统的政策制定机构，越来越多地由他自己做出重大决定并把整个国家的方向导向国外”。<sup>②</sup>

第五，热衷于“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过分迷信民主，被民主束缚住手脚，在关键时刻缺乏果断行动，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突出的缺陷。纵观戈尔巴乔夫当政六年多的实践，可以发现苏共领导人在个人性格上有一些明显弱点。一方面，是好大喜功，倾全力于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热衷于高峰政治舞台上的领袖形象表演，能言善辩；另一方面，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又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如一的信念和追求，特别是在改革后期，常常是一遇到某种政治势力的抵制，便迅速改变政策，举棋不定。在国内反对派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甚至就是在行使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这种天经地义的职责时也不理直气壮，而是缩手缩脚。面对一系列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民族纠纷和冲突的行为，不愿或不敢承担“不民主”的罪名来行使国家权力。正是在苏共领导人被民主辞藻所陶醉、捆住手脚，一味软弱、退让的情况下，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势力才不断发展壮大。

第六，纵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领域的改革，可以发现，围绕着政治改革，实际操作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政治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改革任务的次序、改革的速度等一系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也频频出现失误。这显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观因

① [俄罗斯]尼·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第367页。

② [俄罗斯]阿·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第711页。

素。当然这些失误与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各种原则性错误相比是次要的、从属性的,但它们对于苏联政治领域的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改革实施策略上的失误、改革目标多变、改革缺乏连续性等等,加速了原则性错误造成消极后果的过程,促使社会的急剧转变。

## 第三十章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

苏联“亡”于戈尔巴乔夫时期，作为苏联和苏共的主要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极其深刻的，决不仅限于苏共领导人个人行为能力方面，尽管这方面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改革。毫无疑问，正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然而，并不能由此断言苏联不需要、不应该进行改革。一些苏联学者和领导人认识到：“第八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下降从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分界线是1972年。”“不管怎么说，根本性的经济改革被拖延到很晚时期，这时我们已经不是从具有实力的地位出发，而只能从孱弱的地位出发来进行经济改革了，处于日益严重的许多问题的高压之下。自然，所留下的寻找改革战略和说服怀疑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sup>①</sup>正是由于苏联长期以来未能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需要调整政策、进行改革，延误了改革时机，才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给后来的改革增加了难度。也就是说，问题不是在于苏联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战略、改革路线

---

<sup>①</sup>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95页。

和改革策略的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应该时刻注意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要注意防止“左”的倾向。苏联剧变和解体无疑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说到深层次的原因,一般归结为“斯大林体制”或称苏联模式的弊病。这一模式的僵化、衰败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和多民族联盟国家的解体。进一步讲,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问题的更深层次。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却首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一个重要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这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将其具体、灵活地运用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来;第二,如何消除传统文化对新制度的影响,使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与沙俄专制制度划清界限,抛弃专制主义的遗产,成为真正民主的人民政权。正是在这两方面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后来的发展、演变,这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理想主义和专制主义。

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各个历史时期的苏共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思想僵化、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现象,其根源在于思想认识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列宁时期曾经出现过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军事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围绕着一国建成社

会主义理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系列偏差,最终形成了斯大林体制,即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模式;赫鲁晓夫时期又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口号;随后有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更为浪漫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内容方面与其前任有所不同罢了。

戈尔巴乔夫大力推行民主化、公开性,骤然间打破了多年封闭的国门,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看到了苏联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新形势下,又是激情和理想主义左右了苏联社会,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普遍出现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天真”幻想,希望通过一次激进的改革,使苏联迅速成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情绪造成了新的“幼稚病”。不少苏共理论家寄希望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和解与合作,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希望化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更是浪漫的理想主义,甚至完全是幻想、空想。在当今世界,即便不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出发,仅从国家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得出这种幼稚的结论。其结果是欲速不达,不仅未能使改革取得实际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有一定的目标模式和符合实际的改革战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蓬勃的革命激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献身精神,需要有坚强的革命政党和英明的领袖,但正确理论指导下的较为完备的改革目标模式以及切合实际的改革战略也是必不可少的。苏联的改革实践证明,在改革的战略方面,苏共领导人始终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从而导致改革战略选择和决策的失误,导致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盛行,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从性质上说,开始时还是坚持社会主义范围内的改革,以后逐渐发展、演化,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主义改革轨道的以“中派主义”为特点的“改革”路线,从而使原本就有着种种缺陷、甚至并不明确的改革战略发生了动摇和改变。在目标选择上,向往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一套,特别是北欧的“瑞典模式”。这本身就十分荒谬。脱离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各种社会现实,照搬外国的经验,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关于“瑞典模式”的特殊性,美国著名学者熊彼特早就说过,“由于形成瑞典这个国家的材料,和它的例外地匀称的社会结构”,使得任何别的国家试图抄袭瑞典的例子都是荒谬的,“唯一有效的抄袭办法是把瑞典人搬进来,并要他们负起当家的责任”。<sup>①</sup>

苏共领导人在改革战略上的失误最为突出地反映在对民主的认识和希图简单地通过民主的手段达到改革的目的上。以民主化、公开性著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其主要的思路之一在于将民主本身视为目的和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其结果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泛滥,任何改革措施都无法贯彻执行。而且,“这种神话最危险,根据这种说法,民主选举出的政权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代表人民的意志,他们永远是正确的,而他们的行动即是法律。结果科学、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统统都被抛弃了。代表多数或民主选举出的有权势的个人意见代替了法律,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改造社会,民主成了各种激进的社会集团和个人夺取政权的工具,这些集

---

<sup>①</sup> [美国]熊彼特著,绛枫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05页。

团和个人从其行动伊始就践踏民主”。<sup>①</sup>苏联的重大教训之一正在于此，即缺乏民主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而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能葬送社会主义。

苏共领导人对所谓“行政命令体制”的激烈批判和全面否定也是十分荒谬的。不言而喻，行政命令体制需要改革，但这决不意味着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就可以完全抛弃行政命令体制。“任何政权没有行政命令体制都不可能有效地运转”，一味地强调取消行政命令体制，事实上是“把取缔国家和改变国家体制混为一谈，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和社会生活日益无政府主义、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从而形成一种反常的现象：“建立在负责和专业基础上的行政命令体制继续受到破坏，而建立在不负责任和不受限制基础上的专横的官僚主义体制倒是吃得开，因而有复发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治的危险。”<sup>②</sup>这种无法达到的、不现实的目标模式，以及混乱不清的改革战略，不能不使改革陷入盲目和混乱之中。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有灵活的改革策略。改革目标模式和战略选择上的失误必然对改革的策略和具体的政策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过激的政策和策略又反过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和政治冷漠情绪。

苏共领导人在改革策略方面的错误是很多的，也是十分明显的。无论是在改革战略的选择上，整个改革的主次、先后顺序上，还是在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上，苏共领导人在策略上都出现了重大失误。改革没有本着先易后难、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的方针进行，而

---

<sup>①</sup> 参见[俄罗斯]Г.奥西波夫：《改革的神话与改革后的现实》，《俄罗斯科学院通报》1992年第5期。

<sup>②</sup> 同上。

是把所有问题一股脑地提了出来,摊子铺得太大,一时间,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到民族关系,各方面的矛盾几乎同时出现,难以驾驭。改革的同盟军迅速瓦解,而怀疑、反对改革的同盟军却迅速实现了“大联合”。原本是怀疑某一具体改革政策、措施,反对某项具体改革的力量,在同一时期几乎一起出现,实现了联合。不满意改革速度、深度、广度的势力也迅速出现并联合了起来。这种政治态势使得改革者和改革力量陷入危险境地,同时受到来自“左面”和“右面”的压力和攻击。处于左右夹击下的改革力量无法取得实际进展和成效,又为反对改革的力量提供了口实,从而使改革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况中。加之,作为改革的领导者,苏联领导人过分纠缠历史问题,造成人们对苏共历史上的严重错误和整个社会阴暗面过于关注,影响了苏共的威信,使民众对在苏共领导下、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失去信心。在执政党威信下降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显然是不明智的。就是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为了争夺选票,任何党派和政治家也总是在选民面前展露自己的政绩,为自己评功摆好,没有一个党派和政治家会愚蠢到自露其丑以为其他党派所利用的地步。在推行民主选举的过程中,苏联的做法也明显失当,不是采取自下而上逐步展开的方针,而是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从基层政权机关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律采取直接选举的办法。同时又以“公开性”的精神将一系列重要的国务活动公之于众,例如,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的重要会议、“议会辩论”等等,都通过电视台对全国现场直播,使全民卷入议会争论,推动了社会的“政治热”。显然,这种不讲究策略和领导艺术、盲目相信民主和人民群众觉悟的做法,已不仅仅是策略问题了。回顾西方民主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围绕着选举制度,从选举权的确定到具体投票方式,都经历了从低级

向高级、从部分向普遍的发展过程，这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成正比的。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是经过数百年的演进，才得以达到目前这种并不是已经完美无缺的程度。苏联实行的这种“民主”选举，甚至在拥有数百年民主政治发展史、政治体制最为完备、最“民主”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曾有过的，其结果可想而知，自然是适得其反，使执政党威信扫地。

第五，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在这里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应当明确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任何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企图，都必将使改革迷失方向，造成社会混乱。正是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犯下了重大错误，造成了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而党的领导作用的消失不可避免地使其他政治力量主宰改革进程，决定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其次，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必须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保持并发扬党内民主，坚持自身的纯洁性，及时铲除党内任何腐败现象。苏共经过短暂的“改革”，遭遇挫折便无声无息地土崩瓦解了，这当中有各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显然是它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被人民和社会所抛弃。苏共党内反对派，包括叶利钦，就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动员人民群众展开与苏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斗争并逐步占上风的。显然，苏共并不是被外部力量所摧毁的，而是由于苏共内部种种腐败现象败坏了党的形象，加之苏共领导层和一批批党员“改弦更张”、脱党、退党、另谋他就，使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一些过去的共产党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苏共自身“革新”、“变革”的总趋势是逐步放弃共产主义信念，这方面的教训

是最为惨痛的。

第六,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随时注意把握社会脉搏,最大限度地缩小因改革而给社会和社会不同阶层带来的痛苦和负面影响,使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改革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和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因此注意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十分重要。苏联的经济改革不但未给人们带来经济实惠,反而使大多数居民阶层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从而使改革逐渐失去了广大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拥护和支持。同时,改革也未能造就出拥护和支持改革的社会阶层,而涌现出来的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激烈的利益争夺和政治斗争使国力大衰。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知识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苏联历史上长期对知识分子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始终不认为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知识分子常常受到歧视,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政治运动中往往首当其冲,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如此恶劣,缺乏使他们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宽松环境。而由于平均主义作祟,使得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知识分子的劳动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所有这些,不能不影响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知识分子的亲和力,造成其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转变。

第七,在多民族国家里进行改革具有更多的困难和危险性,要特别重视妥善处理民族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这是保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

苏联按民族地域原则建立的联盟国家本身就存在着突出民族特征、促使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关注自己民族认同感的缺陷,而民

众、特别是许多少数民族一般群众的意识中国家主权与民族主权的一致性对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加之苏联作为多民族的联盟国家,历史上积累的问题很多,改革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阻力,存在着更大的危险性。苏共领导人在改革之初忽视了这方面的问题,幻想通过民主化运动,一劳永逸地解决包括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从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和方案。改变过去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忽视地方自主权和积极性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在于,苏共领导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强调下放权力,扩大经济自主权,但并不是把这些权力下放到具体的生产企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下放到了各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落到了“地方精英们”的手中,成为他们换取个人利益、甚至推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发展的巨大砝码和可靠保障。“中央在对单一制联盟进行紧迫的改革方面的保守思想和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加强离心倾向的重要原因”,<sup>①</sup>苏共领导人大力推行的政治民主化以及后来的“自由化”,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政府体制,使各种改革政策无法落实。更重要的是,随着苏共逐渐丧失对改革进程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能力,“地方精英们”在当地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举起了改革的旗帜,开始了要求独立的进程。

第八,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需要时刻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承受能力,审慎地处理好改革、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一个社会要发展,不能不进行改革,而改革又必须考虑到社会稳定问题,没有后者作保证,任何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谈起。

---

<sup>①</sup> [哈萨克斯坦]H. 纳扎尔巴耶夫:《从帝国联盟到独立国家联合体》,《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2年3月10日。

美国政治制度的创始人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sup>①</sup> 西方政治思想家和学者对苏联的制度和体制有不少批评，但他们也不无羡慕地发现，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恰恰有本事保证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在消灭饥荒、改善健康水平、扩大国民生产、开创工业和最大限度地创造福利方面并不比自由政府强。但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他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他们的党组织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他们也许不能给予自由，但他们的确能提供权威，建立能实行统治的政府。”<sup>②</sup> 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正是导致了共产党这种能力的丧失，导致苏共无法控制局势，无法“控制得住”国家和社会发展进程，从而使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

① [美国]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编，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4页。

② [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7—8页。

## 结束语：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

74年以前，俄国共产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七十多年来，苏联共产党在领导苏联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困难的考验，其中包括国内剥削阶级的武装反抗以及国外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但是，由于苏共长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行改革的时候又作了错误的战略选择，结果把国家引向了全面的危机，因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最后终于导致苏共丧失政权、苏联国家解体。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解体和拥有74年执政经验的苏共的垮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害；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苏共的失败和苏联发生的剧变远比一百多年以前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和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在经受这场剧变引起的震惊之余，全世界共产党人会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全面而科学地总结苏共失败的反面经验，一定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非常宝贵的大量新鲜材料，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



为了正确地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有必要回忆一下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中国共产党对苏联东欧当时发生的事件做出的反应。1956 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其后不久,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虽然没有像这次剧变那样引起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造成的震动和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正确地抵制和反对了苏联领导人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对苏联东欧发生的事件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但是后来在分析苏联东欧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时,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其原因是由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sup>①</sup>为了避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必须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文化大革命”。大家都记得,“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一场浩劫。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当时没能够正确地、而是错误地总结了苏联的教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看来有以下几点:(1)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来分析和总结苏联的经验和教训。(2)把当时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首先归结为是“修正主义思潮”引起的,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要求的那样,不是从人们的头脑中、而是从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的原因。(3)把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仅仅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忽视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这些事件中的态度和作用。(4)占有材料太少。当时我们作为外国人能够看到的苏联社会和苏共内部的消极面仅是冰山之颠

---

<sup>①</sup>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4 页。

而已。今天，当我们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时，记取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我党总结苏联教训时的教训，是很有益处的。下面就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主要教训，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而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sup>①</sup>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主观条件，即掌握了现代化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无产阶级队伍。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作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发生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同这个问题有关，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前后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进行过激烈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当革命形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751 页。

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的问题。相反,对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列宁评价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sup>①</sup>列宁还说:“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sup>②</sup>列宁曾经估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sup>③</sup>

按照列宁的观点,“要成为文明国家,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sup>④</sup>所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sup>⑤</sup>列宁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sup>⑥</sup>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sup>⑦</sup>可见,列宁不仅把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条件,而且把这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列宁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在制定无产阶级政党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7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8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0页。

④ 同上书,第774页。

⑤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490页。

⑥ 列宁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内。——作者

⑦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6页。

的方针政策时，始终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很快改变了列宁关于要用很长时间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思想以及他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1925年5月，斯大林宣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条件。”<sup>①</sup>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所谓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人为地加快了向“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1936年11月，苏共宣布，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sup>②</sup>苏联这时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在看来，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畸形，在同资本主义的竞赛中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优越性，其首要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在不具备或不充分具备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天不足的弱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个人崇拜、滥用职权、官僚主义、生产力遭到破坏以及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付出昂贵代价等等，无不与此有关。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其后，勃列日涅夫又宣布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同斯大林急于过渡、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总结了过去急于过渡、“穷过渡”的教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下定决心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与此同时，中国

①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341页。

②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1页。

共产党还重新确认,中国社会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可能要持续一百年。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sup>①</sup>邓小平这些朴素语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领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唯物辩证法彻底贯彻到对人类一切社会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们历来反对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某种固定的模式,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sup>②</sup>他又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sup>③</sup>列宁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乃至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十月革命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以后,列宁指出:“对于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③ 同上书,第37卷,第443页。

来谈论社会主义。”<sup>①</sup>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列宁发现，能够把革命热情和“文明的商人本领”、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很好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制度能够将小生产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时，他立即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sup>②</sup>

遗憾的是，列宁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采取的革命的辩证的态度到了斯大林时期就发生了变化。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接着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sup>③</sup> 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1952年，斯大林亲自指导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规定，这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sup>④</sup> 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充满生机和不断变革的社会，但是在这本教科书中却变成了僵化的固定模式。苏联在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过的做法和途径，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66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3页。

③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73页。

计划等,被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是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奉为圣典,影响了几代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人们的思想长期得不到解放,改革被扼杀或中途而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教科书”规定的概念,即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概念上。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这样嘲笑那些自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整个人类历史(从摩擦生火到发明蒸汽机——作者注)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意义,那是多么可笑……”<sup>①</sup>到撰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苏联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只有十多年,就认为自己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不仅要以此律己,而且还要将其强加给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不更是可笑吗!荒唐的理论在实践中带来的只能是悲剧。在苏联东欧,人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的发展逻辑同“共同规律”的创造者们的愿望相反,既然“社会主义”只能是教科书规定的那个样子,而不能是别的样子,别的样子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教科书规定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的情况下,人们要继续前进,只好抛弃“社会主义”,而选择“资本主义”了。可见,右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演化物,同时也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惩罚。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也是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更多的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获得的,而是从这本教科书中获得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而解放思想的核心内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56页。

容就是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提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sup>①</sup>正是由于破除了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改革开放的事业才得以进行，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概念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清除人们头脑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和错误认识，仍是一个很繁重的任务。

（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特别注意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sup>②</sup>社会主义既然取代的是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自然要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无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本来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但是，就是这个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长期以来被搞得极为混乱，并在实践中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为了澄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造成的混乱，还必须温习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一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51页。



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决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理解。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织部分。从这个道理出发,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任务。

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列宁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提高到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sup>①</sup>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

<sup>①</sup>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492页。

工具”。<sup>①</sup> 列宁还特别强调，要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务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任务很好地协调和区分开来。为此，他曾这样谆谆教导青年一代：“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而青年一代的任务“就是要学习”，用“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他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sup>②</sup> 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列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十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十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十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十十=总和=社会主义。”<sup>③</sup>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反复强调，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权，苏联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对鼓舞苏联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作了错误的估计。他提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还断言，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因此他本人在战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 1916 年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失效了”。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547 页。

② 同上书，第 4 卷，第 285、287 页。

③ 《列宁文稿》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4 页。

“很快就会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商品输往他国”。<sup>①</sup>在斯大林看来,不仅没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而且连同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似乎也不需要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动辄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资产阶级分子”或“帝国主义代理人”帽子的政治气氛中,在教条主义统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谈论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向资本主义学习,不仅是不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以壮大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战后四十多年,苏联始终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虽然在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和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始终紧锁国门,拒绝对外开放。1947年,苏联应邀参加“马歇尔计划”。在讨论如何落实该计划的巴黎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指责实施该计划将使“欧洲各国必将落入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使其放弃原有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地位”。<sup>②</sup>会议进行到一半,苏联代表团就扬长而去。苏联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也禁止东欧国家参加。有意思的是,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以后,苏联领导人竟然于1991年公开呼吁西方对苏联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甚至连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规划,也恳求西方帮助制定。从闭关自守到仰人鼻息,从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从害怕外来渗透到主动请求外来“和平演

<sup>①</sup>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下卷,第561、562页。

<sup>②</sup> [苏联]A. C. 阿尼金等编、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五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07页。

变”——这个历史的怪圈发人深思。看来，这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看起来很有骨气、很革命，实际结果是作茧自缚，自己削弱自己。其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企图用构筑“铁幕”、锁紧国门的做法建立一个“无菌世界”，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这完全是空想。由于这样做只能导致自己削弱自己，最后不仅无“纯洁”可言，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难保。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强调要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并且提出“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sup>①</sup>。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sup>②</sup>邓小平把对外开放提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苏联剧变的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 （四）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和民主的。

苏共之所以失去民心，多数选民不赞成苏共继续执政，其首要的原因是：在苏共执政的七十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年代，生活水平日益下

---

<sup>①</sup> 1986年11月14日新华社讯。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页。

降,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苏联人民的生活实际上处于贫困状态。<sup>①</sup>苏联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本来有条件做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苏共在自己的政策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放在优先的地位。由于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经济陷入“第一部类”而不能自拔,而为人民生活而生产的“第二部类”长期落后,特别是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因此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涉及人民生活时,只好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了。结果是,国家虽然变得强大了,成了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联的经验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内,人民“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美好的明天”,可以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人们有可能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得知曾同他们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他们的时候,这种反差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反应往往是毁灭性的。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共产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强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尽快地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贫穷绝不是

---

<sup>①</sup> 据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居第五位,70年以后则排到最后几位,在全世界排到第50位。苏联人自己讽刺自己的国家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用于职工工资的比重为36%,而美国为62%。按1991年4月1美元=1.3卢布折算,苏联职工月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8.8%。〔苏联〕《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37期)俄罗斯官方公布,1992年放开物价后,80%的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以下。

社会主义。”<sup>①</sup>他还说：“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sup>②</sup>联系苏共失败的严酷现实，可以看出邓小平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苏联剧变的教训和邓小平的论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里所说的富裕，不仅包括综合国力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且包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那么它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主义”迟早要被人民所抛弃。

在原苏联地区，还出现这样一种现象：苏共下台了，但是上台掌权的所谓“民主派”不仅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使人民的生活比在共产党执政时还糟。然而，即使这样，人民的大多数仍不愿回到原来的制度下，不欢迎共产党重新掌权。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苏共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富裕生活，而且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在过去70年，苏共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得很不够的话，那么，它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做得更差，而且在这方面同建国初期即同列宁在世的时期相比，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大倒退了。列宁非常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他说：“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sup>③</sup>邓小平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sup>④</sup>可见，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民主方面的弊端，前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从苏共在这方面的错误中，至少可以引出以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7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8页。

下几点教训：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人民在政治上享受越来越多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同法制、纪律和集中相结合的民主，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搞的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缺乏民主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二，共产党不应该丢弃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苏共的经验说明，丢弃这样的旗帜，其结果只能使自己陷人尴尬的地位，甚至丑化自己，增加反共势力的资本。人权、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只是批判资产阶级言行不一，利用人权、自由和民主等口号为本阶级的私利服务的虚伪性，但是从来没有把人权、自由和民主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理直气壮地举起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应该随着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它们的内容。第三，加强法制建设。用法治代替人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保障人民民主、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包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法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盲目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结果导致政权瓦解、国家解体。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没有可取之处。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约是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司法和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包含着民主政治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值得借鉴。

（五）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

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

苏共丧失政权，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犯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错误，但是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党自身的建设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人民的拥护、保持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特别要注意改造自己。苏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这里只能谈及以下几点。

1. 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必须永远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在革命的年代，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群众，能够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它的思想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能够正确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所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苏共到了斯大林时期，思想开始僵化，逐渐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教条主义者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不管苏共用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向社会灌输它的理论，仍然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应有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人所共知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苏联，早在50—60年代就出现了“信任危机”，开始是针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到了70年代，对苏共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理论长期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支撑着的，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舆论多元化”的情况下，在各种思潮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人民群众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和宣传，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本身。可见，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党在思想理论上失去先进性开始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



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正像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那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sup>①</sup>突破就是发展。如果不突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论断,就不可能有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十月革命的经验,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对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什么时候能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能够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时候就能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相反,什么时候搞本本主义,搞教条主义,就会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和失败。正像邓小平所说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不能前进,它的生存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②</sup>

解放思想,这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表现。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推向前进,除了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条认识路线,不断总结和研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吸收和掌握当代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源于19世纪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27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同‘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sup>①</sup>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它善于吸收人类一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用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用任何新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运用产生的效果来验证或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引起现代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如果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和结论，而不愿深入到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火热斗争中去，对外部世界的文明成果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知之甚少，或者视而不见，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像列宁所说的，顶多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sup>②</sup>

2. 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人们还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1991年“8·19”事件以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对于这道反共法令，这个掌权达74年之久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党却很少有人出来抗争。这种奇怪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立场有关外，还同党内生活不正常、党的机体不健康有直接关系。

苏共的组织原则和生活方式很多是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形成的，没有根据党的任务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苏共虽然一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但是，党内生活

---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2卷，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282页。

如同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都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被排斥在党的路线和方针制定过程之外，处在被动和绝对服从的地位。党内不能容忍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联共（布）党史》把联共（布）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都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就来源于苏共。党内生活如此不正常，必然会使生气勃勃的战斗的党变成万马齐喑的官僚化的组织。这样的党经不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就是很自然的了。从苏共的教训来看，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时，特别要强调民主的一面。要实行党内民主，关键的一点是采取有效措施，用党的组织纪律切实保证党员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只有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党员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这一组织真正的战士。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在党胜利的时候或处在危难之中时，党员都能够自觉而勇敢地为捍卫党而斗争。

3. 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苏联人民极为不满意的事情是苏共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叶利钦正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从单枪匹马逐渐登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这一事实说明，能否清除腐败，对执政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从苏共和东欧国家一些党的历史经验来看，依靠执政党自己清除自身的腐败现象，是不够的。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保证执政以后避免腐化，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洋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sup>①</sup>抚今思昔，可以看到毛泽东当时的高瞻远瞩。共产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铲除腐败，除了自己痛下决心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的经常监督之下。

(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

苏共最后不仅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而且特别是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东欧国家，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即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共产党失败得最惨重。这几乎成了规律性的现象。苏共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失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共产党在这里失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的支持，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不是偶然的。首先，苏共在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例如，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长期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为“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显然失之偏颇。30年代后期，斯大林虽然宣布，在苏维埃政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知识分子”，但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其他限制，知识分子一直缺少发挥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所必需的宽松环境。第四，分配上的平均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主义抹杀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地越来越低,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知识分子身上被扭曲得最严重。<sup>①</sup>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正确认识 and 确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当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科技进步的情况下,<sup>②</sup>作为现代科技载体和第一生产力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前途的一部分。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sup>③</sup>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队伍将日渐萎缩。第二,知识分子的多数从事的是创造性的科学劳动。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探索和试验,允许犯错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创造有利于他们大胆探索、发挥聪明才智的宽松的环境。第三,要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确实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

(七)在多民族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

<sup>①</sup> 以1985年为例,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例在工业部门为1.1:1.0;在建筑业中为0.98:1.0;整个经济部门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90.1卢布,而教育部门为150卢布,文化部门117.3卢布,卫生和体育部门132.8卢布,科研单位为202.2卢布。(见陆南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445页)

<sup>②</sup> 科技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超过50%,8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占60%—80%。(见《光明日报》,1992年7月23日,第3版)

<sup>③</sup> 1926年,苏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为300万,到1985年已发展到4200万,占就业人口的1/3还多。见前引《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1页。

苏联的解体是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是很多的。现在择其要点如下。

1. 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是个自愿、自然和长期的过程。人为地加速这一过程，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即使阶级不存在了，国家消亡了，民族问题还会存在。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都认为，由于苏联消灭了剥削制度，法律上确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民族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实践证明，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此外，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有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民族问题远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决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苏联的历史经验说明，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会增加民族积怨。

2. 要确实保证各民族平等的权利，保证各民族能够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自主权。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各民族利用本地区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势必引起地方和民族的不满，最后会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爆发。但是，盲目地迁就某些民族的不适当的要求，也会助长民族主义的泛滥。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防止。

3. 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中，出现了这样的共同现象：在凡是按照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的地方，一旦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必然导致民族分立和国家解体。这说明：第一，在民族地区实行“政治多元化”危险更大。第二，共产党是联系各个民族的纽带，加强和改善民族地区的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威信，是巩固各民族联合的关键。

4. 加快发展经济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政党

要引导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要分散了精力。只有在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和提高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对各个民族产生真正牢固的凝聚力。

#### (八)无产阶级政党要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在推行改革中犯的错误是苏联发生剧变的直接原因。根据这个教训,无产阶级政党在进行改革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谈及许多,这里再作几点补充。

1. 斯大林模式早已失去了它的优势,成了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并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陷入了危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改革这种模式。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绝不能像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的改革那样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也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左右摇摆、朝三暮四。

2. 改革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始终抓住经济改革不放,但是同时也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但是,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政治改革正确与否,要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是,决不能在经济体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就把政治体制打乱。

3. 改革是一场革命,会触及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因此改革必须有具备高度政治权威的坚强领导核心,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机构。同时,要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决不能用戈尔巴乔夫那种“大民主”的办法推行改革。认为不管什么改革方案,只有征得多数人举手赞成以后才能去实行,这是乌托邦。真正的民主化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推行一切改革的方法。

4.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改革要有目标、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力求一切经过试验,

先立后破，把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能因为求稳怕乱，看准了的事也不敢去做，贻误时机。

5.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为了解放思想、为改革扫清道路，对旧的习惯势力、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要避免坐而论道。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进行讨论。但是，切记列宁的教导，对于肩负着空前重担的党来说，千万不要沉湎于“过于奢侈的辩论和争执”。<sup>①</sup>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56页。



## 参 考 文 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

《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回忆列宁》，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苏联共产党历史》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版。

[苏联]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契尔年科言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是出版社 1982 年版。

《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 1997 年版。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萨那等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李永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姚海：《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高放、高敬增：《普列汉诺夫评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姜长斌：《苏联早期体制的形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东西方政党和文化比较研究中心：《苏共的失败及教训》，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王正泉主编：《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贾海楼、王卫东主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概要》，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

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姜长斌主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赵永穆等译：《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上、下），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 年版。

复旦大学政经系苏联经济研究组编：《二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1—5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陆南泉、张文武编：《国外对苏联问题的评论简介》，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 年版。

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

林利、姜长斌编译：《在改革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译》，求实出版社 1989 年版。

孙尚清等编：《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4 年版。

刘洪潮等主编：《苏联 1985—1991 年的演变》，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

姜长斌、左凤荣著：《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申健著：《论苏联剧变的体制原因》，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左凤荣著：《赫鲁晓夫传》，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陆南泉：《从企业改革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陆南泉等：《苏联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陆南泉主编：《苏联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 1989 年版。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俄罗斯]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

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苏联]布哈林著，余大章、郑异凡译：《过渡时期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苏联]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9 年版。

苏联科学院主编、北京编译社等译：《世界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苏联]尼·伊·帕夫连科著、斯庸译：《彼得大帝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苏联]卡瓦利舍夫斯基著、姜其煌等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

[苏联]斯米尔诺夫等著、张书生等译：《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俄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苏联]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苏联]尼·阿·察哥洛夫著、厉以宁、赵辉杰译：《俄国农奴制解体时期经济思想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苏联]波克罗夫斯基著、贝璋衡等译：《俄国历史概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苏联]马里宁著，丁履桂、郭镛森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

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苏联]涅奇金娜主编、刘祚昌等译：《苏联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苏联]谢尔盖·赫鲁晓夫著、述弢译：《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年版。

[苏联]罗伊·梅德维杰夫著、述弢译：《赫鲁晓夫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肖庆平等译：《赫鲁晓夫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贾连义等译：《政治日记》，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苏联]尤·阿克秀金编、李树柏等译：《赫鲁晓夫 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苏联]费·布尔拉茨基、徐锦栋等译：《领袖与谋士》，东方出版社 1992 年版。

[英国]伦纳德·夏皮罗著、徐葵等译：《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 1990 年版。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周邦新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 5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6 卷（盛曾安等译），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

[英国]莫舍·卢因（列文）著、倪孝铨等译：《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年版。

[俄罗斯]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

[苏联]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

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俄罗斯]瓦·博尔金著、李永全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

[美国]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吴乃华等译，《苏联解体亲历记》(上、下)，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著、王攀等译，《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美国]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

[俄罗斯]阿·多勃雷宁著、肖敏等译，《信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

[苏联]罗伊·麦德维杰夫著、史正苏等译，《论社会主义民主》，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俄罗斯]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哈萨克斯坦]H. 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等译，《站在 21 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国]理查德·莱亚德、约翰·帕克著、白洁等译，《俄罗斯重振雄风》，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刘晓明译，《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8 年版。

[美国]熊彼特著、绛枫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美国]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编、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意大利]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黄华光译：《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科学社会主义》1998 年特刊。

《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2 期。

《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列宁研究》1993 年第 1 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7 年第 4 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 年第 1 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1998 年第 3 期。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莫斯科，1957 年俄文版。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6 年俄文版：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6 年俄文版。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斯科，1926 年俄文版。

《共产国际决议汇编(1919—1932)》，莫斯科，1983 年俄文版。

《苏联对外政策文献》，莫斯科，1958 年俄文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72 年俄文版。

《别林斯基全集》，莫斯科，1953 年俄文版。



《苏联史纲(十八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

《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莫斯科，1957年俄文版。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卷，莫斯科，1954年俄文版。

《普加乔夫起义》(文件资料集)，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俄文版。

《苏联史纲(十八世纪下半期)》，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

《俄国军事史文选》，莫斯科，1947年俄文版。

《奥加廖夫社会—政治和哲学选集》(2卷本)，莫斯科，1956年俄文版。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莫斯科，1990年俄文版。

[苏联]格列科夫等主编：《苏联史》，第1卷，莫斯科，1948年俄文版。

[波兰]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波兰通史》，第2卷，华沙，1958年波文版。

[苏联]德鲁日宁：《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和约》，莫斯科，1955年俄文版。

[美国]佛罗伦斯基：《俄国——历史与解释》，第1卷，纽约，1954年英文版。

[苏联]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史》，第4卷，莫斯科，1967年俄文版。

[苏联]翁契可夫斯基：《十九世纪专制俄国的政府机构》，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

[苏联]札依翁契可夫斯基：《俄国农奴制的废除》，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苏联]德米特里耶夫：《苏联史纲(1861—1904)》，莫斯科，1960年俄文版。

[苏联]达维多维奇：《帝国主义时期的专制制度》，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

[苏联]札依翁契可夫斯基：《十九至二十世纪百年间的专制制度和俄国军队》，莫斯科，1973年俄文版。

[苏联]勃维金：《大变动前夕的俄国》，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

[苏联]费尔索夫主编：《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史》，莫斯科，1987年俄文版。

[苏联]基塔尼娜：《战争、面包和革命》，列宁格勒，1985年俄文版。

[苏联]司彼琳娜：《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念的破产》，莫斯科，1987年俄文版。

[苏联]什梅列娃：《列宁的党反对小资产阶级集团和派别的斗争》，莫斯科，1918年俄文版。

[苏联]科烈涅芙斯卡娅：《苏维埃国家管理最高机构的建立》，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

[苏联]涅克利奇：《俄罗斯史(1917—1995)》，第1卷，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

[苏联]阿法纳西耶夫、斯米尔诺夫：《历史的教训》，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

[苏联]波波夫主编：《档案披露的秘密》，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

[俄罗斯]亚·雅科夫列夫：《序言、崩塌、结束语》，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

[俄罗斯]根·安·久加诺夫:《相信俄罗斯》,沃罗涅日:沃罗涅日出版印刷公司,1995年俄文版。

[苏联]《历史学报》,1963年第73期。

[俄罗斯]《历史问题》,1998年第2期。

[苏联]《经济问题》,1991年第12期。

[苏联]《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

[苏联]《旗帜》,1990年第3期。

[苏联]《苏联历史》,1991年第6期。

[俄罗斯]《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

[苏联]安德罗波夫:“卡尔·马克思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3年第3期。

[俄罗斯]M. 别利亚耶娃:“俄罗斯面临历史性选择”,《自由思想》1993年第5期。

[苏联]B. 格洛托夫、T. 扎斯拉夫斯卡娅:“转折时刻的社会政策与劳动问题”,《科学与生活》1987年第10期。

[俄罗斯]I. 季利根斯基:“俄罗斯的抉择”,《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3年第9期。

[美国]马歇尔·戈德曼:“中国是俄罗斯的榜样”,《现代史料》月刊1993年9月号。

[俄罗斯]B. 索格林:“西方自由主义与俄罗斯改革”,《自由思想》1996年第1期。

[南斯拉夫]B. 武亚契奇、[俄罗斯]B. 扎斯拉夫斯基:“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俄罗斯]《民族学评论》1993年第1期。

[俄罗斯]B. 米罗诺夫:“俄罗斯与中派主义”,《自由思想》1993年第12期。

[俄罗斯]B. 奥尔洛夫:“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基础的村社家

长制因素”，《欧洲迫切问题(论文集)》1997年第2期“西方民主制中的和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与权力”专集。

[苏联]И.阿巴尔金：“借鉴过去的教训”，《共产党人》1987年第16期。

[俄罗斯]Ю.索洛杜欣：“俄罗斯联邦会步苏联的后尘吗？”，《对话》1993年第1期。

[俄罗斯]Г.奥西波夫：“改革的神话与改革后的现实”，《俄罗斯科学院通报》1992年第5期。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真理报》1985年3月12日。

“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关于党的根本改革和经济管理的任务”——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6月26日。

“使革命性的改革具有革新的意识形态”——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米·谢·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

续”，[苏联]《真理报》1987年11月3日。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各国党和运动代表会晤中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7年11月5日。

[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苏联]《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苏联]《真理报》1988年7月5日。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真理报》1988年7月5日。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苏联]《真理报》1990年2月13日。

米·谢·戈尔巴乔夫1988年4月8日会见乌兹别克领导人时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4月9日。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俄罗斯]《真理报》1995年10月24日。

苏共民主纲领派“向苏共二十八次提出的民主纲领”，[苏联]《真理报》1990年3月3日。

“关于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1990年2月5日），[苏联]《真理报》1990年2月6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1988年11月28日。

[哈萨克斯坦]И. 纳扎尔巴耶夫：“从帝国联盟到独立国家联合体”，《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2年3月10日。

## 后 记

本书的出版是在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以及两位学者推荐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的。东欧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意见是:

“本书系研究苏联解体原因的国家重点项目,其特点是不仅回答了苏联兴亡的原因,而且将苏联 70 年来的政治、经济体制作为兴亡原因的主线进行研究。

“该书的学术价值表现在,它从理论上论证了斯大林—苏联模式失败的必然性,通过这一模式不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中国只有根据邓小平理论进行改革和放弃斯大林模式,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推荐人郑羽(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的意见是:这一著作“基本上反映了目前我国苏联—俄罗斯研究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和关于苏联兴亡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水平和现状,因而,本书的出版和问世将标志着我国苏联研究学术界关于该领域研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身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推荐人朱晓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博士)的意见是:“总体上来说,该书是国内目前在这一问题上领先的著作,出版该书不仅会丰富中国对苏联东欧剧变的研究,促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思考,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苏联兴亡的

研究,要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逐步摆脱斯大林模式,才能取得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人民出版社对出版本书的大力支持。

**陆南泉**

2001年12月18日

责任编辑:刘智宏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等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1

ISBN 7-01-003553-9

I. 苏… II. 陆… III. 苏联-历史-研究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588 号

**苏联兴亡史论**

SULIAN XIN WANG SHI LUN

陆南泉 姜长斌 徐葵 李静杰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8.625

字数:659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01-003553-9/D·982 定价:45.00 元



封面设计 曹 春  
版式设计 程凤琴



苏联兴亡史论

CCCP

1917-1991 兴亡史论

ISBN 7-01-002551-9



9 787010 035636 >

D89/T-01-002551-9/D-932 定价: 45.00元